斯大林选集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书馆
妇女干部学校

斯大林选集

下卷

人民出版社

斯大林选集

下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25印张　504,000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25,000

书号 1001·1189　定价 1.90元

目　录

1928—1952年

论红军的三个特点(1928年2月25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红军建军十周年的全体会议上的演说)……1—5

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1928年4月13日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6—32

一　关于自我批评……7

二　关于粮食收购问题……14

三　沙赫特案件……24

四　总结……32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8年5月16日)……33—41

一　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33

二　组织来自下面的群众性的批评……36

三　青年必须掌握科学……39

在粮食战线上(1928年5月28日和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谈话节录)……42—53

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54—62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1928年10月19日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 ……63—75

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8年11月19日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76—109

一 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 ……76

二 谷物问题 ……85

三 关于反对各种倾向和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的斗争 ……93

答库什特谢夫 ……110—111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速记记录)……112~192

一 一条路线还是两条路线? …… 113

二 阶级变动和我们的意见分歧 …… 119

三 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分歧 …… 126

四 在对内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 …… 131

(一) 阶级斗争问题 …… 132

(二) 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 …… 137

(三) 农民问题 …… 141

(四) 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问题 …… 144

(五) 所谓"贡款"问题 …… 148

(六) 工业发展速度和结合的新形式问题 …… 154

(七) 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 …… 163

(八) 五年计划还是两年计划 …… 171

(九) 播种面积问题 …… 174

(十) 粮食收购问题 …… 176

(十一) 外汇储备和粮食输入问题 …… 181

五　党的领导问题 …… 183
（一）布哈林集团的派别活动问题 …… 184
（二）忠顺和集体领导问题 …… 186
（三）反右倾斗争问题 …… 189
六　结论 …… 191

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叶·米库林娜《群众的竞赛》一书序言）……193—195

大转变的一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而作）……196—209
一　在劳动生产率方面 …… 197
二　在工业建设方面 …… 198
三　在农业建设方面 …… 201
结论 …… 209

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1929 年 12 月 27 日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的演说）……210—233
一　“平衡”论 …… 211
二　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 …… 214
三　小农经济“稳固”论 …… 216
四　城市和乡村 …… 221
五　关于集体农庄的本质 …… 224
六　阶级变动和党的政策中的转变 …… 228
七　结论 …… 232

给阿·马·高尔基的信……234—237

胜利冲昏头脑（论集体农庄运动的几个问题）……238—244

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245—265

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 年 2 月 4 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266—275

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1931 年 6 月 23 日
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演说) ……276—297
一 劳动力 …… 277
二 工人的工资 …… 279
三 劳动组织 …… 282
四 工人阶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问题 …… 286
五 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转变的征兆 …… 289
六 关于经济核算 …… 292
七 用新方式工作，用新方式领导 …… 294
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 年 12 月
13 日) ……298—312
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33 年 2 月 19 日) ……313—328
一 集体农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 313
二 我们的当前任务是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
生活富裕的人 …… 320
三 几点意见 …… 323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
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 年 1 月 26 日)(摘录) ……329—350
三 党 …… 329
1. 政治思想领导问题 …… 330
2. 组织领导问题 …… 342
和美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 年 7 月
23 日) ……351—367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
的讲话(1935 年 5 月 4 日) ……368—373

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35年11月17日)……374—389

1.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 …… 374
2.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 …… 378
3. 新的人才和新的技术定额 …… 383
4. 最近的任务 …… 386
5. 简单的几句话 …… 388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1936年11月25日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90—420

一　宪法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任务 …… 390
二　1924—1936年在苏联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 391
三　宪法草案的基本特点 …… 398
四　资产阶级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 403
五　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 409
六　苏联新宪法的意义 …… 418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1938年5月17日) ……421—423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424—454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摘录) ……455—474

三　联共(布)的进一步巩固 …… 455
1. 改善党的成分的办法。划小组织单位。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 …… 456
2. 挑选干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 …… 458
3. 党的宣传工作。对党员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 461

4. 几个理论问题 …… 464

广播演说(1941 年 7 月 3 日) ……475—481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第 55 号。1942年 2 月 23 日于莫斯科) ……482—487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1946 年 2 月 9 日)……488—500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501—538

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 …… 501

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答叶·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 …… 524

答同志们 …… 530

答桑热耶夫同志 …… 530

答德·别尔金和斯·富列尔两同志 …… 531

答阿·霍洛波夫同志 …… 533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539—612

对于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 …… 539

1.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 539

2.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 545

3.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 …… 552

4. 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以及关于消灭它们之间的差别的问题 …… 557

5. 关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加深的问题 …… 561

6.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 …… 563

7.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 …… 566

8. 其他问题 …… 570

9.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国际意义 …… 573

10. 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办法…… 574

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 …… 575
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 …… 582
一　雅罗申科同志的主要错误 …… 583
二　雅罗申科同志的其他错误 …… 592
答阿·弗·萨宁娜和弗·格·文热尔两同志 …… 603
1.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 603
2. 关于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办法问题 …… 605
附录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613—624
注释……625—649
人名索引……650—669

论红军的三个特点

（1928 年 2 月 25 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红军建军十周年的全体会议上的演说）

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的红军战士、我们的红海军战士、我们的红空军战士、我们的役龄前青年——苏联的武装工人致敬。

党感到自豪的是，它依靠工人和农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红军，这支红军在极伟大的战斗中捍卫并且捍卫住了工农的自由。

党感到自豪的是，红军光荣地走过了对我国工农的内外敌人进行极残酷的战斗的艰苦道路，红军已经成为一支使工人阶级的敌人胆战心惊而使一切被压迫被奴役者欢欣鼓舞的极强大的战斗的革命力量。

党感到自豪的是，红军走过了把工人和农民从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漫长道路，终于争到了庆祝自己诞生十周年纪念日的权利。

同志们，我们红军的力量何在呢？产生这种力量的泉源何在呢？

我们红军和世界上曾经有过的一切军队根本不同的特点何在呢？

成为我们红军力量和威力的泉源的特点何在呢？

我们红军的第一个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是解放了的工农的军

队，它是十月革命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

到现在为止，一切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队，不管它们的成分怎样，都是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军队。这种军队过去是现在还是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军队。各国资产者都在撒谎，说军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这是不正确的。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军队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这是事实。然而这绝对不是说军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恰恰相反，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军队过去和现在都被卷入政治斗争，充当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军队在那里镇压工人，充当统治者的支柱，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和这种军队不同，我们红军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是巩固工农政权的工具，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把工人和农民从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工具。

我们的军队是解放劳动人民的军队。

同志们，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人民都是怕军队的，在人民和军队之间有一道把军队和人民隔开的鸿沟，这一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呢？而在我国又是怎样呢？在我国恰恰相反，人民和军队是一个整体，是一家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民都不象我国人民这样爱护和关怀军队。在我国，军队受到热爱、尊敬和关怀。为什么呢？因为工人和农民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不是为统治者效劳，而是为那些以前当奴隶、现在已经解放了的工农服务的。

我们红军的力量的泉源就在这里。

人民热爱自己的军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样的军队会有极巩固的后方，这样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一支没有巩固的后方的军队算得什么呢？算不得什么。最大

的军队，装备最好的军队，往往由于没有巩固的后方，没有来自后方、来自劳动人民的支援和同情而土崩瓦解、化为乌有。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唯一得到工农同情和支援的军队。它的力量就在这里，它的坚固性就在这里。

我们红军和世界上过去和现在所有其他一切军队不同的地方首先就在这里。

党的愿望，党的任务，就是要使我们红军的这个特点，使它和工农的这种兄弟般亲密的关系保持并巩固起来。

我们红军的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它是巩固我国各民族间兄弟关系的军队，是解放我国各被压迫民族的军队，是保卫我国各民族自由和独立的军队。

在旧时代军队受到的通常是大国主义的教育，侵略主义的教育，必须征服弱小民族的教育。正因为如此，旧式的军队，资本主义的军队，同时也就是实行民族压迫、实行殖民压迫的军队。这是旧军队的基本弱点之一。我们的军队是和实行殖民压迫的军队根本不同的。我们军队的全部实质，我们军队的全部制度，是建筑在巩固我国各民族间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是建筑在解放各被压迫民族、保卫苏联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自由和独立这个宗旨之上的。

这就是我们红军的力量和威力的第二个主要泉源。这就是我们军队在紧急关头能获得我们广大国土上各民族千百万群众最大的支援的保证。

党的愿望，党的任务，就是要使我们红军的这个特点也保持并巩固起来。

最后，谈谈红军的第三个特点。这个特点就在于我们军队中培养和巩固的是国际主义精神，充满了我们红军全军的是国际主义精神。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通常是以仇视别国人民、仇视其他国家、仇视别国工农的精神教育军队的。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把军队变成驯服的兽群，供国家间、列强间发生军事冲突时驱使。一切资本主义军队虚弱的根源就在这里。

我们的军队却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我们红军的力量在于它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受着国际主义的教育，受着尊重别国人民的教育，受着热爱和尊敬世界各国工人的教育，受着保卫并巩固各国间的和平的教育。正因为我们的军队受的是国际主义的教育，是世界各国工人利益一致的教育，所以我们的军队是世界各国工人的军队。

如果各国资产者胆敢侵犯我国，那么他们就会认识到上述这一点就是我国军队力量和威力的泉源，因为那时他们就会看见，我们的以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出来的红军在世界上各个地方，从上海到纽约，从伦敦到加尔各答，到处都有无数的朋友和同盟者。

同志们，这就是贯串在我们军队的全部精神中并成为我们军队力量和威力的泉源的第三个基本特点。

党的愿望，党的任务，就是要使我们军队的这个特点也保持并巩固起来。

我们军队所以强大有力，就是由于它具备这三个特点。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的军队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因为我们的军队不是由锡兵①组成的，而是由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和为了什么而战的觉悟分子组成的。

同志们，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红军有一切理由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军队。

---

① 外国儿童玩具。——编者注

我们的红军万岁！

红军战士万岁！

红军指挥员万岁！

产生了红军，使它获得了胜利并得到了光荣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长时间热烈鼓掌）

载于1928年2月28日
《真理报》第50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
第20—24页

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

（1928年4月13日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①）

同志们！刚刚结束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具有一个和最近两年来举行的各次全会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这次全会完全是切实解决问题的会议，是没有党内争吵的会议，是没有党内紧张局面的会议。

排在议程上的都是最迫切的问题：粮食收购问题，沙赫特案件[2]问题，以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工作计划问题。你们可以看出，这些问题都是相当重要的。虽然如此，全会上的讨论还是完全切实的，而决议也是一致通过的。

这是因为全会上已经没有反对派了。这是因为人们处理问题都采取严格的切实的态度，不耍派别手腕，不进行派别煽动。这是因为只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3]之后，只是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党才有可能认真地和切实地处理实际问题。

这就是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我们所进入的这个发展阶段的好的方面，也可以说，无比有利的方面。

---

① 在这篇报告中补进了当时报刊上没有发表的几段文字。——《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编者注

一

关于自我批评

全会工作的特点，全会讨论和全会决议的特点是：全会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极严厉的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进行的。不仅如此，在全会的每一个问题上，在每一次发言中，都对我们工作的缺点进行了批评，我们的组织都进行了自我批评。对我们缺点的批评，党、苏维埃和经济组织的真诚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这就是全会工作的总的精神。

我知道，党的队伍里有一些人不喜欢批评，尤其不喜欢自我批评。这些人，我想可以把他们叫做"涂了漆的"共产党员，（笑声）他们逃避自我批评，经常发牢骚说：又是这该死的自我批评，又是揭发我们的缺点，——能不能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呢？显然，这些"涂了漆的"共产党员和我们党的精神，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既然这些远不是热情地对待自我批评的人有这种情绪，那么请问：我们需不需要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从何而来？它有什么好处？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象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我认为没有自我批评，我们的党就无法前进，就无法割开我们的脓疮，就无法消灭我们的缺点。而我们的缺点是很多的。这一点必须公开地老实地承认。

自我批评口号不能认为是一个新口号。它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基础。既然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领导专政的是一个党，是不和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

掌政权的共产党，那么，我们要前进，我们自己就应当揭露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此外不会再有人来揭露和纠正这些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同志们，自我批评应当成为推动我们向前发展的一个极重要的力量，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自我批评口号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特别有力地贯彻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党内形成了一种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新情况。

这种新情况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我们这里再也没有或者几乎再也没有反对派了。表现在我们党内由于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反对派（这个胜利本身对党非常有利）而可能产生一种高枕无忧、安然自得、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熟视无睹的危险。

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反对派，这对我们党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个胜利本身包含着特别不利的方面，那就是党内可能滋长自满自足、自以为是的情绪而安于既得的成就。而安于既得的成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再不用前进了。为了不使这种情形发生，我们就需要自我批评，但不是反对派所进行的那种恶意的、实质上是反革命的批评，而是真诚的公开的批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

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估计到这种情况，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从那时起，自我批评的浪潮就日益高涨，它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上也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如果怕我们的敌人（国内的敌人和国外的敌人）利用我们对缺点的批评来叫嚣：瞧，他们布尔什维克那里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利啊，——那就奇怪了。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怕这一点，那就奇怪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正是在于它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让党，

让布尔什维克，让我国一切诚实的工人和劳动者来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我们建设中的缺点；让他们指出消灭我们这些缺点的途径，使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建设不会有保守、停滞和腐败的现象，使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日益改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主要的就是这一点。至于我们的敌人，那就让他们去乱谈我们的缺点吧，——这种无聊的事情是不会也不应当使布尔什维克不安的。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推动我们去进行自我批评。我指的是关于群众和领袖的问题。最近我们这里领袖和群众之间开始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这里出现了、历史地形成了一批领导者，他们的威信越来越高，同时几乎成了群众所无法接近的人物。另一方面，一般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群众，却上升得非常慢，他们开始眯着眼睛从下面向上望领袖，并且往往怕批评自己的领袖。

当然，我们这里形成了一批上升得非常高并且有很高的威信的领导者，这个事实本身是我们党的巨大的成就。显然，没有这样一批有威信的领导者，要领导一个大国是不可设想的。但是，领袖上升的时候逐渐离开群众，而群众开始从下面向上望他们，不敢批评他们，这个事实就不会不产生领袖脱离群众、群众离开领袖的某种危险。

这种危险会使领袖骄傲自大，认为自己十全十美。而领导上层骄傲自大，开始从上面向下看群众，这会有什么好处呢？显然，除了党遭到毁灭以外，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可是，我们要的是前进，改进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毁灭党。正是为了前进并改善群众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就应当时时刻刻敞开自我批评的大门，应当使苏维埃人有可能"责骂"自己的领袖，批评他们的错误，使领袖不会骄

傲自大，而群众也不会离开领袖。

有时人们把群众和领袖的问题同提拔的问题混为一谈。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虽然提拔新的领袖一事值得党严重注意，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保存已经提拔起来而且极有威信的领袖，并在他们和群众之间建立经常的牢不可破的联系。问题在于要通过对我们缺点的自我批评和批评来组织党内的广泛的舆论，来组织工人阶级的广泛的舆论，使之成为一种生动锐敏的道义上的监督；极有威信的领袖如果要保持党和工人阶级对他们的信任，就应当倾听这种监督的呼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报刊的作用，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的作用，的确是不可估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不欢迎《真理报》[4]创办《工农检查院专页》[5]来经常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不过，批评必须力求严肃深刻，不应该流于表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应当欢迎《共青团真理报》[6]带头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展开猛烈而热情的进攻。

有时人们骂批评者，说他们的批评不全面，说批评有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人们往往要求批评的每一点都是正确的；如果批评不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对批评就加以指摘和漫骂。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误看法。你们只要提出这种要求，就会把成千上万愿意纠正我们的缺点但是有时不善于正确表达自己意思的工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的嘴巴堵住。这是坟墓，不是自我批评。

你们应当知道，工人有时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有点怕说实话。他们害怕，不只是因为怕说了会“挨整”，而且也是因为怕批评得不全面会遭到“嘲笑”。普通工人或普通农民虽然亲身感到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计划有缺点，但他们哪里能够头头是道地论证

自己的批评呢？如果你们要求他们的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你们就会取消任何来自下面的批评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评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即使批评只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真理，也应该表示欢迎，细心听取，看到它有好的地方。再说一遍，否则你们就一定会把成千上万忠实于苏维埃事业的人们的嘴巴堵住；他们虽然还不大善于批评，但他们说的却是真理。

正是为了发扬自我批评而不是扼杀自我批评，正是为了这一点，必须细心听取苏维埃人的一切批评，即使批评有时不完全正确或者不是各方面都正确。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确信：他们不会因批评不全面而"挨整"，也不会因批评有某些错误而遭到"嘲笑"。只有这样，自我批评才能真正具有群众性，才能真正得到群众的响应。

不言而喻，这里指的不是"任何"批评。反革命分子的批评也是批评。但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威信，摧残我们的工业，瓦解我们党的工作。显然，我们指的不是这样的批评。我说的不是这样的批评，而是那种来自苏维埃人的批评，是为了改善苏维埃政权机关、改进我们的工业、改进我们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而进行的批评。我们需要批评是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而不是为了削弱它。正是为了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工作，正是为了这一点，党才宣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

我们期待于自我批评口号的首先是什么呢？如果自我批评口号得到正确的和诚实的执行，那么它会给我们产生什么结果呢？它至少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它会提高工人阶级的警惕性，加强他们对我们缺点的注意，使这些缺点容易纠正，使我们的建设工作不致于发生任何"意外"。第二，它会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水平，增强他们的国家主人翁感，使他们容易学会管理国家。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不仅沙赫特案件，而且1927年底的收购危机，对我们很多人都是“意外”呢？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沙赫特案件。一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家接受国际资本反苏组织的指示活动了五年。五年来我们的组织草拟并分发了各种各样的决议和决定。当然，我们的煤炭工业总还是上升的，因为苏维埃经济制度如此富有生命力，如此强大，尽管我们不用脑子而且有了错误，尽管专家们进行破坏活动，它还是占了上风。五年来，这批反革命专家在我们工业中进行暗害活动，炸毁锅炉，毁坏涡轮机等等。而我们却视而不见。“突然间”，好似晴天霹雳，——沙赫特案件发生了。

同志们，这是正常的吗？我认为极不正常。掌着舵，睁着眼，但是当某种灾难临头之前，竟什么也看不到，——这不能算是领导。布尔什维主义不是这样理解领导的。要领导就应当有预见。而预见，同志们，不是什么时候都容易做到的。

一种情况是：十来个领导同志在注意和发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而工人群众却不愿意或不能够注意和发现缺点。这里一定会忽略一些缺点，不能把所有的缺点都发现出来。另一种情况是：千百万工人和十来个领导同志一起来注意和发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揭露我们的错误，担负起共同的建设事业，并指出改进工作的途径。这里就更能保证不会发生意外，保证及时发现不良现象并及时采取措施来消除这些现象。

我们必须使工人阶级的警惕性不断提高，而不要使它丧失；我们必须使千百万工人都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我们不仅必须使十来个领导者，而且必须使千百万工人和农民都十分关注我国建设的进程，指出我们的错误，揭露我们的错误。只有这样，我们这里才不会发生“意外”。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我

们的缺点展开来自下面的批评，我们必须使批评成为群众性的批评，我们必须领会并贯彻自我批评的口号。

最后，谈一谈和实行自我批评口号有关的问题，就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力量，培养他们管理国家的技能的问题。列宁说过：

"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 **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①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工业的技能和本领。

不发挥工人的力量和才能，不发挥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力量和才能来批评我们的错误，指出我们的缺点并推进我们的工作，能不能培养工人阶级的这种技能和这种本领呢？显然不能。

为了发挥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力量和才能，并使他们能够获得管理国家的技能，需要做些什么呢？这首先需要真诚地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进行自我批评，真诚地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展开来自下面的批评。工人们能够公开和直接地批评工作中的缺点，改进和推动我们的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工人积极参与了国家、经济和工业的领导工作。而这就不会不增强工人的国家主人翁感，不会不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警惕性和文化水平。

工人阶级的文化力量问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和现在的一切统治阶级中，工人阶级这一统治阶级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是有点特殊和不十分有利的。所有以前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20—221页。——编者注

的统治阶级——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同时又是富有阶级。他们有可能使自己的子弟学到管理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工人阶级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贫穷阶级，它过去没有可能使自己的子弟学到管理的知识和技能，只有现在，在取得政权以后，才得到了这种可能。

我国文化革命问题的迫切性也就在于此。固然，苏联工人阶级在其统治的十年内，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比地主和资本家在几百年内所获得的要大得多。但是，从国际和国内情况来看，我们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因此，凡是能够提高工人阶级文化力量的发展水平的手段，凡是能够有助于培养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工业的技能和本领的手段，我们都应当尽量利用。

根据上面所说的应当得出结论说：自我批评口号是用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力量，培养工人阶级管理技能的极重要手段之一。由此又得到一个根据，证明贯彻自我批评口号是我们的迫切任务。

要求我们把自我批评口号作为当前口号的根据大体上就是如此。

因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在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进行是毫不奇怪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粮食收购问题吧。

二

关于粮食收购问题

首先，我来略为谈谈去年年底在我国爆发的粮食收购危机的实质。实际情况是这样：从去年 10 月起，我们的收购量开始下降，

12月降到最低点，到去年年底，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有了一亿三千万普特① 的缺额。我们本年度的收成大概不比上年度坏，也可能比上年度稍差一点。过去积存的粮食本年度比上年度多，一般认为本年度我国的商品粮食不比上年度少而比上年度多。

根据这种情况，本年度的收购计划订得比上年度稍微高些。但是，尽管如此，收购量却下降了，到1927年底，我们有了一亿三千万普特的缺额。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国内粮食很多，而粮食收购量却在下降，使城市和红军受到饥饿的威胁。

这种"奇特的"现象该怎么解释呢？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偶然性呢？有许多人喜欢这样解释：说我们打瞌睡了，说我们忙于对付反对派了，因而忽略了一些事情。说我们真的打瞌睡了，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这里拿打瞌睡来解释一切，那就大错特错了。更不能把收购危机说成是偶然的。这样的事情不会是偶然的。这种解释未免太不值钱了。

那么，造成收购危机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里至少有三个条件。

第一，在我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困难的。首先，我指的是发展城市工业的困难。本来应当拿各种各样的商品投放农村，以便从农村取得最大数量的农产品。为此就必须比现在更迅速地发展我国工业。但是要更有力地发展工业，就必须有更快的社会主义积累的速度。可是，同志们，要达到这样的积累速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由此就产生了农村商品供应不足的现象。

其次，我指的是我们在农村建设方面的困难。同志们，农业增

① 普特是俄国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十六点三八公斤。——编者注

长得很慢。本来农业应当一日千里地发展，粮食应当愈来愈便宜，收成应当不断提高，肥料应当尽量使用，粮食生产的机械化应当加速发展。但是，同志们，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没有出现，而且也不会很快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农业是小农经济，很难有重大的改进。统计数字说明，战前我们全国约有一千六百万个体农户，现在我们约有二千五百万个体农户。这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小农经济国家。小农经济是什么呢？这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提供商品最少的经济。同志们，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肥料、机器、农学知识以及其他改进办法，这都是些在大农场中可以有效地采用，而在小农经济中没有采用或者几乎没有采用的东西。这就是小农经济的弱点。这也就是它竞争不过富农的大农场的原因。

一般说来，我们农村中是不是有采用机器、肥料、农学知识等等的大农场呢？是的，是有的。第一，这就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但是，同志们，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很少。第二，这就是富农的大农场（资本主义农场）。这种农场在我国并不算少，它们在农业中仍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我们在农村中能不能走鼓励私人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呢？显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要加紧在农村中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类型的大农场，努力把它们变成国家的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粮食工厂。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全力展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口号。

如果以为集体农庄只能由贫农阶层组成，那就错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我们的集体农庄应当是贫农和中农的农庄，即不是只包括一批人，而是包括整个村子的农庄。应当给中农指出前途，

告诉他们：通过集体农庄，他们能够最顺利最迅速地发展经济。既然中农不能上升成为富农，而下降又是不合理的，那就应当给他们指出前途：他们可以通过集体农庄建设来改善经济。

但是，目前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很少，少得不象话。由此就产生了我们在农村建设方面的困难。由此就产生了我们粮食生产不足的现象。

第二，由此可见，我们在城市和农村建设中的困难就是收购危机得以爆发的基础。但是这还不是说，收购危机正应当在本年度爆发。大家知道，这些困难不仅本年度有，而且上年度也有。可是，为什么正是在本年度爆发了收购危机呢？秘密何在呢？

秘密在于富农在本年度已经有可能利用这些困难来抬高粮价，进攻苏维埃价格政策，从而阻挠我们的收购工作。而他们所以能够利用这些困难，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三年的丰收起了作用，富农在这个时期内成长起来了，整个农村，特别是富农，在这个时期内都积下了粮食，因此，富农就有试图操纵价格的可能了；

第二，富农得到城市投机分子的支持，这些投机分子哄抬粮价，使价格上涨。

当然，这还不是说，富农是粮食的主要持有者。持有大部分粮食的主要和基本的群众是中农。但是富农在农村中有一定的经济权威，所以在价格问题上有时能使中农跟着他们走。因此，农村富农分子就有可能利用我们建设中的困难来进行投机，抬高粮价。

如果象富农投机分子所做的那样，把粮价抬高百分之四十至五十，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就是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假定说，那时我们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得不提高工业品的价格，从而既使工人阶级也使贫农和中农在物

质生活方面受到打击。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无疑是意味着直接破坏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

但是问题还不限于此。假定说，我们在今年1月或今年春季即准备播种之前把粮价提高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那时我们的工业原料基地就会遭到破坏。棉农就会不种棉花而改种粮食，因为种粮食更有利。麻农就会不种亚麻，也改种粮食。种甜菜的农民也会这样做。以此类推。简单说来：我们的工业原料基地就会由于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投机野心而遭到破坏。

但是还不仅如此。假如我们在今年春季提高了粮价，那么我们一定会害了贫农，因为贫农在春天既需要买口粮也需要买种子。贫农和下中农也就有充分权利对我们说：你们欺骗了我们，因为去年秋天我们按低价把粮食卖给你们，可是你们现在却要我们按高价来买粮食，——苏维埃人先生们，你们到底保护谁？保护穷人还是保护富农？

正因为如此，党对富农抬高粮价这一投机进攻必须予以回击，以便打破富农投机分子拿饥饿来威胁工人阶级和我们红军的妄想。

第三，毫无疑问，假如没有另一种情况帮助农村资本主义分子，他们就不可能把我们建设中的困难利用到他们在事实上所利用到的这种程度，而收购危机也不会这样严重。这种情况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收购机关的松懈现象，彼此之间没有统一战线，相互竞争，不愿意对哄抬粮价的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再就是我们粮食收购地区的党组织消极懈怠，不愿意以应有的态度来过问粮食收购运动，不愿意过问这件事情和消除收购战线上普遍的松懈现象。

我们的收购机关和党组织陶醉于上年度收购运动的成就，认为本年度收购工作可以听其自流，让一切都听从“上帝的意志”，这样就为富农投机分子扫清了活动场所。而富农所期待的也正是这个。几乎用不着怀疑，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收购危机是不会这样严重的。

不应当忘记，我们，也就是我们的收购机关和其他组织，在供应农村工业品方面差不多掌握了百分之八十，在农村中的收购方面差不多掌握了百分之九十。不用说，这种情况使我们有可能在农村中控制住富农，只要我们的组织善于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可是我们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一切都听其自流，这样就便利了（当然是无意的）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同志们，造成去年年底收购危机的条件就是如此。

这样，你们可以看出，收购危机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你们可以看出，收购危机反映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我国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即粮食收购问题上，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

同志们，这就是粮食收购危机的阶级背景。

你们知道，为了消除收购危机和制止富农的投机野心，党和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实际措施。关于这些措施，我们的报刊上已经讲得很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决议中也讲得相当详细。因此，我想不必在这里重复了。

我只想谈一谈由于非常情况而采取的一些非常措施。当然，只要这种非常情况不再存在，这些措施也就会取消。我指的是使用对付投机活动的第一〇七条法律[7]。这条法律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6年通过的。这条法律我们在上年度没有使用。为什么呢？因为正如大家所说的，粮食收购工作进行得正常，所以没有理由使用

这一条。只是在本年度，1928年初，才想起了这一条。所以想起了这一条，是因为富农的投机勾当在我们这里造成了一些非常情况，使我们受到饥饿的威胁。显然，假如下一个收购年度不再发生非常情况，收购工作进行得正常，那么第一〇七条也就不会使用了。相反地，假如发生非常情况，资本主义分子又开始"捣鬼"，那就又用得上第一〇七条了。

如果根据这一点便说要"取消"新经济政策、"恢复"余粮收集制等等，那就愚蠢了。现在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才会想到取消新经济政策。现在新经济政策对苏维埃政权比对任何人都有利。但是，有人认为新经济政策不是意味着加强对包括富农在内的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以战胜他们，而是意味着停止同富农及其他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不用说，这种人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我们党内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人的位置。

党和苏维埃政权为了消除粮食危机而采取的措施所产生的结果，你们也都是知道的。简单说来，有下面几点：

第一，我们弥补了亏空，收购了粮食，赶上了甚至有些地方超过了上年度的收购速度。大家知道，在1—3月这三个月期间，我们已经收购了二亿七千多万普特粮食。当然，我们所需要的不止这一些。我们还需要收购一亿多普特。但这毕竟是一种必要的成绩，它使我们有可能消除收购危机。现在我们有充分权利说，党和苏维埃政权在这条战线上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就。

第二，我们整顿了，多多少少整顿了我们各地的收购机关和党组织，在实践中考查了它们的战斗准备，清除了它们中间那些不承认农村中有阶级并且不愿意同富农"吵嘴"的显然已经腐化的分子。

第三，我们改进了农村工作，孤立了富农，稍微得罪了富裕的

中农上层，使贫农更加靠近我们，使绝大多数中农跟着我们走。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列宁还在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8]上就已经提出的布尔什维克的老口号：依靠贫农，善于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一分钟也不停止对富农的斗争。

我知道有些同志不大乐意接受这个口号。如果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工农联盟就是工人和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联盟，那就奇怪了。同志们，不是的，我们不主张也不能主张这样的联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在工人阶级政权已经巩固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谁认为在我们的情况下同农民联盟就是同富农联盟，谁就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谁想在农村中实行一种使富人和穷人皆大欢喜的政策，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因为，同志们，世上是没有这种政策的。（笑声，鼓掌）我们的政策是阶级的政策。

我们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的措施所产生的结果大体上就是如此。

毫无疑问，在实行这些措施的时候，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过许多过火行为和歪曲党的路线的事实。大家知道，在许多场合由于我们不用脑子，歪曲了我们的政策，首先打击了贫农和中农，不正确地运用了第一〇七条等等。我们现在严惩并且将来还要严惩犯了这些歪曲行为的人。但是，如果因为有这种歪曲行为就看不到党采取的措施（不采取这些措施我们就不能摆脱收购危机）所获得的良好的和真正重大的结果，那就奇怪了。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看主要的东西，而把个别的和偶然的东西提到首位。这样做就是用我们的路线遭到歪曲的个别现象这一勺水淹没收购运动极其重大的成绩，其实这些个别现象完全不是从党所采取的那些措施中

产生的。

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些情况使我们的收购运动容易获得成功，并使我们容易对付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进攻呢？

是的，是有的。这样的情况至少可以指出两种：

第一，我们是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在党消灭了党内敌人而达到了最高度的统一之后，由党出来干预收购运动并打击富农投机分子的。不能认为对富农进行斗争是轻而易举的事。要粉碎富农投机分子的诡计而又不致在国内引起任何混乱，就必须有绝对团结的党、绝对巩固的后方和十分巩固的政权。几乎用不着怀疑，这些条件的存在，在迫使富农立刻退却这一点上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第二，我们做到了把压制富农投机分子的实际措施同工人阶级、红军和农村无产阶层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富农投机分子使城乡劳动群众遭受饥饿的威胁，同时违反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第一〇七条），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我们在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得到农村大多数人的拥护。富农伤天害理地进行粮食投机，给城乡造成极大的困难，同时违反苏维埃政权的法律，也就是违反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意志，——这种情况一定会便于我们孤立富农，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发生了1921年发生过的那种情形（当然是有一定的附带条件的）。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党鉴于国内发生饥荒，就提出了没收教会贵重物品用以购买粮食救济灾区的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了极广泛的反宗教运动；当时神父们抓住贵重物品不放，实际上就是反对挨饿的群众，因而激起了群众对整个教会，也对宗教偏见，尤其对神父及其领导者的愤怒。那时在我们党内有一些怪人，他们以为列宁只是在1921年才懂得同教会作

斗争的必要性，（笑声）在这以前，好象他并不懂得这一点。同志们，这当然是荒谬的。列宁在1921年以前当然也懂得同教会作斗争的必要性。但是问题完全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把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宗教运动和争取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并且要做到使这个运动为群众所了解，为群众所支持。

关于今年年初党因粮食收购运动而采取的措施也必须这样说。有人以为党只是到现在才懂得同富农危险作斗争的必要性。同志们，这当然是荒谬的。党向来就懂得这种斗争的必要性，并且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进行了这种斗争。今年年初党所采取的措施的特点是：党在今年已经有可能把反对农村富农投机分子的坚决斗争同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因为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党就做到了使农村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跟着自己走而使富农陷于孤立。

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艺术决不在于不考虑时间和地点，不考虑群众支持领导上这些或那些步骤的决心，不加选择地在各个战线上用所有的大炮同时开火。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艺术在于善于选择时间和地点并估计到各种情况，以便把火力集中到那个最可能获得最大战果的战线上。

三年以前，我们还没有得到中农的拥护，中农满怀仇恨并攻击我们的乡执行委员会主席，贫农对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感到困惑不解，我们的播种面积只有战前的百分之七十五，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在农村中扩大粮食和原料的生产，我们还没有为工业建立可靠的粮食和原料基地。如果我们那时给富农极严重的打击，事实上我们现在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我不怀疑，这样做我们就会失败，就不能把播种面积扩大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就会破坏为工业建立粮食和原料基地的可能性，就

会使富农容易壮大，就会使中农脱离我们，也许现在国内就会发生极严重的政治混乱。

今年年初我们农村中的情况怎样呢？播种面积扩大到了战前规模，为工业建立了巩固的原料和粮食基地，大多数中农拥护苏维埃政权，贫农多少是组织起来了，农村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已经改善并巩固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对富农投机分子的打击才能指望得到巨大的成就，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害神经病的人才不能了解在组织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方面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全部差别，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这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不考虑时间和地点，不考虑斗争力量的对比，不加选择地在各个战线上用所有的大炮同时开火是多么愚蠢。

同志们，关于粮食收购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谈沙赫特案件吧。

三
沙赫特案件

沙赫特案件的阶级背景怎样？沙赫特案件的根源何在？这个反革命经济事件是在怎样的阶级基础上发生的？

有些同志认为沙赫特案件是偶然的。他们一般都说：我们在这里瞌睡打得太厉害了，疏忽大意了；如果我们不打瞌睡，那我们这里是不会发生任何沙赫特案件的。这里有人在打瞌睡而且打得很厉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拿打瞌睡来解释一切，那就是不了解问题的实质。

事实说明了什么呢？沙赫特案件的材料说明了什么呢？

事实说明：沙赫特案件是一部分以前掌管煤炭工业的资产阶级专家所制造的反革命经济事件。

其次，事实说明：这些结成秘密集团的专家，是从现在流亡国外的旧主人那里和从西方资本主义反苏反革命组织那里取得经费来进行暗害活动的。

最后，事实说明：这个资产阶级专家集团是遵照西方资本主义组织的指示进行活动，破坏我国工业的。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西欧资本主义反苏组织对我国工业的经济干涉。有一个时期发生了军事政治干涉，这种干涉被我们用胜利的国内战争粉碎了。现在我们遇到的是经济干涉的尝试；要粉碎它，我们并不需要进行国内战争，但是我们还是必须粉碎它，而且我们正在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来粉碎它。

如果以为国际资本会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阶级还存在，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从前国际资本想用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种尝试没有成功。现在国际资本竭力设法而且今后还会竭力设法用隐蔽的、不总是可以察觉的、但是相当强大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国的经济实力；它组织暗害活动，在这些或那些工业部门中制造种种"危机"，从而使将来的军事干涉更有可能实现。这里的一切都和国际资本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阶级斗争密切相连，根本谈不到什么偶然性。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我们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那时国际资本将千方百计地阻

挠我们前进；

或者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作若干原则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和善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有人认为我们可以既执行以解放为使命的对外政策，同时又博得欧美资本家的赞扬。我不想来证明，这些天真的人和我们党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的。

比如说，英国要求我们和它在某些地方，如波斯、阿富汗或土耳其划分侵略性的势力范围，同时它保证，如果我们能作这种让步，它就同意和我们建立“友谊”。试问，同志们，能作这种让步吗？

全场高喊：不能！

斯大林：美国要求我们根本放弃支持别国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政策，如果我们能作这种让步，那么一切都好办。试问，同志们，能作这种让步吗？

全场高喊：不能！

斯大林：如果我们同意和日本瓜分满洲，我们就可以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我们能作这种让步吗？

全场高喊：不能！

斯大林：又譬如，有人要求我们“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并且同意偿付战时和战前的一切债务。同志们，能这样做吗？

全场高喊：不能！

斯大林：正因为我们不能作诸如此类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所以我们必须估计到国际资本今后将继续给我们制造各种各样的祸害，不管是沙赫特案件还是其他类似的什么事件，反正都是一样。

这就是沙赫特案件的阶级根源。

为什么当时国际资本能够对我国进行军事干涉呢？因为在我们国内有整批整批的军事专家，将军和军官，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他们时刻准备着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在财政上、军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支持，这些军官和将军能不能对苏维埃政权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呢？当然不能。如果没有这批白卫军官和将军的帮助，国际资本能不能组织起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呢？我认为不能。

当时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军事干涉是偶然的，如果我们不把克拉斯诺夫和马蒙托夫等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那就不会发生干涉了。这当然是不对的。释放马蒙托夫、克拉斯诺夫等白卫将军，在国内战争的发展上起过作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军事干涉的根源不在这里，而在于苏维埃政权和国际资本及其俄国走狗将军们之间的阶级矛盾，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某些资产阶级专家，从前的矿主，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在财政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如果不是指望国际资本会来帮助他们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能不能在我们这里制造沙赫特案件呢？当然不能。如果在我国没有资产阶级，其中包括我国一批恨不得用一勺水淹死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专家，国际资本能不能对我国组织象沙赫特案件这样的经济干涉呢？显然不能。一般说来，我国有没有这样一些决心进行经济干涉、破坏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专家呢？我认为是有的。我认为这些人不会很多。但是，我国有数目不大的比军事干涉时期少得多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这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对苏联进行经济干涉的基础。

这就是沙赫特案件的阶级背景。

现在来谈一谈从沙赫特案件得出的实际结论。

我想谈谈沙赫特案件提示我们的四个实际结论。

列宁说过，挑选人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之一。沙赫特案件表明，我们的经济干部挑选得不好，不但挑选得不好，而且使这些干部处于难以发展的条件下。人们提到第三十三号命令，特别是随这个命令颁布的《标准条例》[9]。这个标准条例的特点就是：它几乎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了技术厂长，正厂长的权限只是调解纠纷、"代表"本厂、弹弹三弦琴而已。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经济干部是不能充分发展的。

这个命令在当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那时我们根本还没有自己的经济干部，我们还不会管理工业，因而不得不把主要的权力交给技术厂长。但是现在这个命令已经变成了桎梏。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有经验的、能够发展成为我国工业真正领导者的经济干部。正因为如此，现在已经到了废除过时的标准条例而代之以新条例的时候了。

有人说，共产党员，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工人共产党员，不可能掌握化学公式和一般技术知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世界上没有劳动者和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鼓掌）我们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攻下了更难攻的堡垒。全部问题在于：要有掌握技术知识、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布尔什维克坚忍不拔的精神来武装自己的愿望。可是为了改变我们经济干部的工作条件，帮助他们成为真正的、有充分权力的管理者，就必须废除旧的标准条例，拿新的来代替它。否则，我们就会有毁坏我们的人才的危险。

难道我们那些堕落的经济工作人员本来就比我们中间任何人都要坏吗？为什么这一类的同志堕落腐化起来，在生活上和资产

阶级专家混在一起呢？这是因为在我们经济方面的实际工作中有不正确的地方，我们挑选经济工作人员的条件以及他们的工作条件阻碍了他们的发展，把他们变成资产阶级专家的尾巴。同志们，必须消灭这种现象。

沙赫特案件提示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我们在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里没有把干部训练好，没有把我们的红色专家培养好。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的结论。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许多年轻专家不适合于工作，对工业没有用处呢？因为他们学的是书本上的东西，他们是书本上的专家，没有实际经验，和生产脱节，他们自然会遭到失败。难道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专家吗？不，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专家，即使他们是非常年轻的专家我们也不需要。我们需要的专家，不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必须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经验上、在和生产的联系上都是很强的。

那些没有见过矿井也不愿意下矿井的年轻专家，那些没有见过工厂也不愿意在工厂里弄脏自己的年轻专家，是永远不能战胜旧的、经过实际工作锻炼的、但是仇视我们事业的专家的。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不仅旧的专家，不仅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就连工人也往往很不欢迎这种年轻专家。但是为了不再发生这种意料不到的事情，必须改变对他们的教育，并且必须这样改变：使年轻专家从进入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的头两年起就和生产、工厂、矿井等有密切的联系。

第三个结论是关于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管理工业的问题。从沙赫特案件的材料来看，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呢？很坏。坏得不象话，同志们。事实证明：劳动法规遭到破坏，地下六小时工作制并不经常遵守，劳动保护条例遭到践踏。但是工人忍受着，工会默不作声，党组织也不设法消灭这种不象话的现象。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到过顿巴斯，他下到矿井里去，向矿工了解他们的工作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矿工认为对工作条件有发牢骚的必要。这位同志问他们："同志们，你们的生活怎么样？"矿工们回答他说："同志，没有什么，生活不错。"这位同志说："我要到莫斯科去，你们有什么话要我转达中央？"矿工们回答他说："你到那里就说我们的生活不错。"这位同志对矿工们说："同志们，听我说，我又不是外国人，我是俄国人，我到这里来就是要向你们了解真实情况。"矿工们回答他说："同志，我们对谁都一样，不管对外国人或者对自己人我们都只说真实情况。"

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矿工的面貌。这不是普通的工人，而是英雄。我们已经在工人心中积累的精神资本的宝藏也正是在这里。真难以设想：我们竟象挥霍十月革命极其伟大遗产的败家子一样，如此肆无忌惮地、罪恶地糟蹋这种无比珍贵的精神资本！同志们，长久地依靠原有的精神资本，任意糟蹋这种资本是不行的。已经到了消灭这种现象的时候了。早已是时候了！

最后，第四个结论是关于检查执行情况的问题。沙赫特案件表明：一切管理部门，不管是党的，还是工业的和工会的，在检查执行情况方面都糟透了。只是写决议，发指示，但是谁也不想问问自己：这些决议和指示执行得怎样了？是确实执行了还是束之高阁了？

伊里奇说过，管理国家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检查执行情况的问题。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搞得糟透了。领导——这并不等于写决议和发指示。领导——这就是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不仅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从生动的实际工作的观点来检查这些指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我们所有的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确，那就可笑了。同志们，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而且

也不可能有的。检查执行情况正是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实践的烈火中，不仅检查我们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是否正确。因此，这方面有缺陷，也就是我们的整个领导有缺陷。

例如，就拿纯粹党的系统的检查执行情况的工作来说吧。我们通常都是叫专区委员会和省委员会的书记到中央来汇报工作，以便检查中央指示的执行情况。书记们作了汇报，也承认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中央就指摘他们，通过老一套的决议，指示说，要深入工作，要展开工作，要强调这点那点，要着重注意这点那点等等。书记们带着这种决议回到各地。以后又叫他们来，同样又是深入、展开等等一套。我不是说，所有这一套没有一点好处。不，同志们，从教育和督促各级组织的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有它好的一面。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检查执行情况的方法已经不够了。应当承认，这种方法必须拿另一种方法来补充，那就是把我们党和苏维埃上层人员派去做地方工作。（有人喊道："这个办法好！"）我说的是派我们的领导同志暂时到地方上去工作，不是去做指挥员而是去做听从地方组织指挥的普通工作人员。我认为这个办法很有前途，如果老老实实地诚心诚意地加以执行，它可以改进检查执行情况的工作。

如果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正副人民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各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经常到地方上去，在那里进行工作，以便了解工作情况，研究一切困难、一切缺点和优点，那么你们可以确信，这将是对执行情况的最切实有效的检查。这将是丰富我们可敬的领导者的经验的最好方法。如果这个方法成了一种制度（而这是必须成为制度的），那么你们可以确信，我们这里拟定的法律，我们制定的指示，就会比目前的要切合实际和正确得多了。

同志们，关于沙赫特案件的问题就是如此。

四
总　结

我们有国内敌人，也有国外敌人。同志们，这一点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

我们有过收购危机，现在已经消除了。收购危机标志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

我们有沙赫特案件，现在已在清理，而且无疑一定会清理好。沙赫特案件标志着国际资本及其在我国的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一次严重进攻。这是对我国内政的经济干涉。

不用说，无论从内部来的或外部来的诸如此类的进攻，是可能重演而且看来是会重演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有最高度的警惕，时刻戒备。同志们，如果我们警惕起来，我们将来也一定会打败我们的敌人，正象我们现在和过去打败了他们一样。（长时间热烈鼓掌）

载于1928年4月18日
《真理报》第90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
第25—54页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10]上的演说

（1928年5月16日）

同志们！通常在代表大会上总是谈成绩。毫无疑问，我们是有成绩的。当然，这些成绩并不小，而且也用不着把它们隐瞒起来。但是，同志们，我们这里最近谈成绩谈得这样多，有时谈得这样腻，以致使人再也不想重复了。因此，请允许我打破惯例，不向你们谈成绩，而略为谈谈我们的缺点以及因为这些缺点而产生的我们的任务。

同志们，我指的是有关我们国内建设问题的任务。

这些任务涉及三个问题：我们政治工作路线的问题，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问题，以及培养我们新的经济建设干部的问题。

一

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目前的特点是：我们在和平发展的条件下进行建设已经五年了。我所说的和平发展不仅是指我们没有和国外敌人作战，而且也是指国内没有内战的因素。这也就是我

们所说的我国建设的和平发展的条件。

你们知道，我们和全世界的资本家打了三年仗，就是为了赢得这些和平发展的条件。你们知道，我们已经赢得这些条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极大的成就。但是，同志们，任何胜利，其中也包括这个胜利，都有它不利的一面。和平建设的条件对我们不是没有影响的。这些条件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工作人员身上和他们的心理上，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在这五年内，我们就象在轨道上那样平稳地前进着。因此，我们许多工作人员就产生了一种情绪，认为一切都会一帆风顺，我们就好象坐在特别快车上，不用换车，沿着轨道一直向社会主义前进。

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自流"论，"碰运气"论，自然而然"一切都会搞好"的理论，我们这里没有阶级、我们的敌人已经安静、我们这里一切都会如意的理论。由此就产生了某种懈怠、沉睡的倾向。这种沉睡的心理，这种任工作"自流"的心理，也就构成和平发展时期不利的一面。

这种情绪的危险性何在呢？就在于这种情绪会蒙蔽工人阶级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自己的敌人，用夸大敌人的弱点的话来麻痹工人阶级，破坏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

决不能安慰自己说，我们的党有一百万党员，共青团有二百万团员，工会有一千万会员，因此就完全可以保证最终战胜敌人。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历史证明：最大的军队，由于骄傲自大，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过分轻视敌人的力量，由于沉睡，失去了战斗准备，在紧急关头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结果遭到了灭亡。

就是最大的政党，如果它不注意历史的教训，如果它不时时刻刻加强本阶级的战斗准备，也可能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也可能遭到灭亡。同志们，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是最危险的事情。陷于突

然受敌的境地，就是成了“意外事件”的牺牲品，成了在敌人面前张皇失措的牺牲品。而张皇失措的结果就是瓦解、失败和灭亡。

我可以给你们举出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军队生活中的许多例子，当时小部队往往把大兵团打得落花流水，因为这些兵团没有充分的战斗准备。我可以告诉你们：在1920年，不下五千人的三个骑兵师被一个步兵营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这仅仅是因为骑兵师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在敌人面前张皇失措，它们不了解敌人，其实敌人的数量非常少，如果这几个师没有处于沉睡的状态，后来也没有陷于张皇失措、束手无策的境地，那么一下子就能把敌人打垮。

关于我们的党、我们的共青团、我们的工会以及我们的一般力量也必须这样说。以为我们已经没有阶级敌人了，他们已被打垮和肃清了，这是不对的。不，同志们，我们的阶级敌人还存在。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增长，力图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

本年度冬季我们收购方面的困难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农村资本主义分子企图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政策。

沙赫特案件[2]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案件是国际资本和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表现。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的许许多多事实也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些事实你们都知道，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了。

决不能绝口不提工人阶级的这些敌人。轻视工人阶级的阶级敌人的力量就是犯罪。特别是现在，在我国和平发展时期，当破坏工人阶级战斗准备的沉睡论和“自流”论有某种适宜的土壤的时候，就更不能绝口不提这一切了。

收购危机和沙赫特案件的重大教育意义就是：它们惊醒了我们所有的组织，打破了“自流”论，再一次有力地指出了阶级敌人的存在，这些敌人存在着，他们并没有打瞌睡，必须加强工人阶级的

力量、警惕性、革命性和战斗准备去反对这些敌人。

因此，党的当前任务，党的日常工作的政治路线就是：**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去反对它的阶级敌人。**

不能不指出，共青团的这次代表大会，特别是《共青团真理报》[6]，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视这一任务了。你们知道，在发言人的讲话中以及在《共青团真理报》的文章里，都指出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同志们，这很好。不过还必须使大家不要把这一任务看做临时的、瞬息即逝的任务，因为在我们国内还有阶级、我们还受资本主义包围的时候，加强无产阶级战斗准备这样一个任务就应该贯串在我们的全部工作中。

二

组织来自下面的群众性的批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任务，关于对我们的缺点组织群众性的批评的任务，关于组织来自下面的群众性的监督的任务。

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它在我们的一切组织里，不论是党组织里、共青团组织里，不论是工会组织里、经济组织里都存在。人们说到官僚主义分子的时候，通常是指那些非党的旧官吏，这些人在我们的讽刺画中通常被画成是戴眼镜的。（笑声）同志们，这不完全对。如果问题只在旧官僚主义分子身上，那么反官僚主义斗争就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糟糕的是问题并不在旧官僚主义分子身上。同志们，问题是在新官僚主义分子身上，问题是在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分子身上，最后，问

题是在共产党员中的官僚主义分子身上。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是最危险的一种官僚主义分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党员的称号来掩饰自己的官僚主义。遗憾的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在我们这里并不少。

就拿我们党组织来说吧。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斯摩棱斯克事件[11]、阿尔乔莫夫斯克事件[12]等等。试问，这是偶然的吗？为什么在我们党组织的某些环节中会发生这种腐化堕落的可耻事件呢？这是因为有些人把党的垄断弄到了荒谬的地步，压制了下层的呼声，取消了党内民主，培植了官僚主义。怎样来消除这种祸害呢？我认为要消除这种祸害，除了组织党员群众的来自下面的监督以外，除了发扬党内民主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任何办法。激起党员群众对这些腐化分子的愤恨并且让他们有可能把这些分子撵出去，这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再拿共青团为例来说。你们当然不会否认，在共青团的某些组织里有些彻头彻尾的腐化分子，向这些分子展开无情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们暂且不谈腐化分子。我们就拿最近的事实来说，共青团内发生个人之间无原则的小集团斗争，弄得团内乌烟瘴气。为什么在共青团里“科萨列夫分子”和“索波列夫分子”要多少就有多少，而要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得不打着灯笼去找呢？（鼓掌）这个事实不是说明共青团上层机构的某些环节正处在官僚主义的僵化过程中，又是说明什么呢？

而工会呢？谁会否认在工会里有的是官僚主义呢？在企业中我们有生产会议，在工会中我们有临时监察委员会。这些组织的任务是：唤起群众，揭发我们的缺点，指出改进我们建设的途径。为什么这些组织在我们这里没有发挥作用呢？为什么这些组织不是生气勃勃的呢？工会里的官僚主义加上党组织里的官僚主义使工

人阶级的这些极重要的组织不能发挥作用，这不是很明显吗？

最后，谈谈我们的经济组织。谁会否认我们的经济机关有官僚主义的毛病呢？就拿沙赫特案件来说吧。难道沙赫特案件不是表明了我们的经济机关不是在迈步前进，而是在蹒跚爬行吗？

怎样才能肃清所有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呢？

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来自下面的监督，组织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来批评我们机关里的官僚主义，批评它们的缺点和错误。

我知道，激起劳动群众的愤怒来反对我们组织里的官僚主义病态，有时会触犯我们某些过去有过功劳而现在害了官僚主义毛病的同志。可是这难道就能阻止我们组织来自下面的监督吗？我认为不能而且不应当。他们过去有功劳，应该向他们弯腰鞠躬，他们现在犯了错误，有了官僚主义，可以把他们痛打一顿。（笑声，鼓掌）不这样又怎么办呢？既然事业的利益要求这样，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有人提到来自上面的批评，来自工农检查院、来自我们党中央等等的批评。当然，这一切都是很好的。但是这还非常不够。而且现在主要的问题完全不在这里。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掀起极广泛的来自下面的批评浪潮来反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反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只有从上下两方面施加压力，只有把重点移到来自下面的批评，才能指望顺利进行斗争并根绝官僚主义。

如果以为只有领导者才有建设的经验，那就错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建设我国工业的千百万工人群众每天都在积累丰富的建设经验，对我们来说，这种经验的价值丝毫不亚于领导者的经验。我们所以需要来自下面的群众性的批评、来自下面的监督，也就是为了不使千百万群众的这种经验白白地丧失，为了考虑到这

种经验并加以采用。

因此，党的当前任务就是：**展开无情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组织来自下面的群众性的批评，在制定消灭我们缺点的实际决定中考虑到这种批评。**

不能说共青团特别是《共青团真理报》没有考虑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这里的缺点是：这个任务往往执行得不彻底。而要彻底执行这个任务，不仅必须考虑到批评，而且必须考虑到批评的效果，考虑到批评后所实行的改进。

三
青年必须掌握科学

第三个任务是关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干部的问题。

同志们，在我们面前摆着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极伟大的任务。在农业方面，我们必须为联合的公共大经济打下基础。从莫洛托夫同志今天的公告[13]中你们一定会知道，苏维埃政权提出了把分散的小农经济联合为集体经济和建立新的大规模的国营谷物农场的极艰巨的任务。不解决这些任务，就不可能真正地迅速地前进。

苏维埃政权在工业方面所依靠的是最巨大最集中的生产，而在农业方面所依靠的却是最分散最细小的农民经济；小农经济是半商品经济，虽然播种面积达到了战前的标准，但是它所提供的商品粮食比战前少得多。将来在粮食收购方面可能发生的各种困难的根源就在这里。要摆脱这种状况，就必须切实地在农业方面组织公共的大生产。但是要建立大经济，就必须懂得农业科学。而

要懂得，就必须学习。在我们这里懂得农业科学的人简直少得不象话。因此，任务就是要造就建设新型农业即公共农业的新的、年轻的干部。

在工业方面，我们的情况好得多。但是这里从事建设的新干部的缺乏也阻碍着我们前进。只要回忆一下沙赫特案件，就能了解造就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新干部的问题是多么迫切。当然，我们有工业建设的旧专家。但是，第一，这种专家在我们这里很少；第二，他们不是全都愿意建设新工业；第三，他们中间许多人不了解新的建设任务；第四，他们中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已经老了，快要不中用了。因此，要把事业向前推进，就必须从工人阶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加速造就新的专家干部。

我国无论在农业方面或工业方面愿意参加建设和领导建设的人有的是，而会建设和会领导的人却少得不象话。相反地，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无知的。不但如此，我们还有些人决心歌颂我们的没有文化。如果你不识字或者常写错字，并以自己的落后自夸，那你就是“产业”工人，你就得到荣誉和尊敬。如果你摆脱了没有文化的状况，认识了字，掌握了科学，那你就不是自己人，就“脱离了”群众，就不再是工人了。

我认为不消除这种野蛮和不文明的现象，不消除这种对待科学和有文化的人的野蛮态度，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摆脱没有文化的状况，如果它不能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如果它不掌握科学和不善于根据科学的原则来管理经济，那它就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同志们，应当了解现在的斗争条件和国内战争时期不同。在国内战争时期，可以用冲击的方法，可以凭勇敢和大胆，可以用骑兵式的突袭方法去夺取敌人的阵地。现在，在和平经济建设的条

件下，用骑兵式的突袭方法只会把事情搞坏。现在也和从前一样需要勇敢和大胆。但是单凭勇敢和大胆是成不了大事的。现在要打垮敌人，就必须善于建设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必须抛掉对待商业的高傲的老爷式的态度。

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必须掌握科学。而要有知识，就必须学习。顽强地、耐心地学习。向所有的人学习，不论向敌人或朋友都要学习，特别是向敌人学习。咬紧牙关学习，不怕敌人讥笑我们，笑我们无知，笑我们落后。

在我们面前有一座堡垒。这座堡垒就叫作科学，它包括许多部门的知识。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占领这座堡垒。青年们如果愿意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愿意成为老近卫军的真正的接班人，就必须占领这座堡垒。

现在我们不能只限于培养各方面都会吹一点的**一般**共产党员干部，**一般**布尔什维克干部。一知半解和自诩万事通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桎梏。现在我们需要金属、纺织、燃料、化学、农业、运输、商业、会计等等方面的布尔什维克**专家**。现在我们需要大批大批的、成千上万的能够在各种知识部门中成为行家的新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否则就谈不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否则就谈不到我们能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掌握科学，培养各种知识部门的新的布尔什维克专家干部，学习，学习，最顽强地学习，——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革命青年向科学大进军，——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热烈鼓掌。高喊："乌啦！""好啊！"全体起立。）

载于1928年5月17日
《真理报》第113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
第56—66页

在粮食战线上

（1928年5月28日和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斯维尔德洛夫大学[14]学生的谈话节录）

问：我国粮食困难的根源是什么？摆脱这些困难的出路何在？既然有这些困难，那么对于我国整个工业发展的速度，特别是从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对比来看，应该得出什么结论？

答：初看起来，会觉得我国粮食困难是偶然的，只是由于计划得不好，只是由于经济平衡工作中有某些错误。

可是，仅仅是初看起来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困难的原因在这里要深刻得多。说计划得不好和经济平衡工作中有错误在这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拿计划得不好和偶然的错误来解释一切，那就是犯了极大的错误。轻视计划工作的作用和意义是错误的。可是夸大计划原则的作用，以为我们已经达到了能够计划一切和调节一切的发展水平，那就更加错误了。

不应当忘记，在我国国民经济中，除了那些受我们计划控制的成分以外，还有另一些暂时不受计划控制的成分，最后，还有敌视我们的阶级，而这些阶级是不能单单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计划工作来战胜的。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为简单的偶然现象，归结为计划工作的错误等等。

那么，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何在呢？

我国粮食困难的根源就在于我国商品粮食产量比粮食需要量增长得慢。

工业在发展。工人数量在增加。城市在发展。最后，需要商品粮食的各种经济作物（棉花、亚麻、甜菜等等）的产区也在扩大。所有这些情形使粮食需要量，商品粮食需要量迅速增长。而商品粮食产量的增长却慢得要命。

不能说我们本年度收购来的由国家支配的粮食比去年或前年少。恰恰相反，本年度我们由国家掌握的粮食比往年多得多。但是我们现在还是遇到了粮食困难。

请看几个数字吧。1925—1926年度，到3月31日止，我们共收购四亿三千四百万普特粮食。其中输出国外的有一亿二千三百万普特，留在国内的有三亿一千一百万普特。1926—1927年度，到3月31日止，我们共收购五亿九千六百万普特粮食。其中输出国外的有一亿五千三百万普特，留在国内的有四亿四千三百万普特。1927—1928年度，到3月31日止，我们共收购五亿七千六百万普特粮食。其中输出国外的有二千七百万普特，留在国内的有五亿四千九百万普特。

换句话说，本年度到3月31日止，我们收购来供国内需要的粮食比去年多一亿普特，比前年多二亿三千万普特。但是我们本年度在粮食战线上还是发生了困难。

我在一个报告中已经说过，这些困难被农村资本主义分子，首先是富农，利用来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你们知道，苏维埃政权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消灭富农的反苏维埃发动。因此，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在这里注意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指的是商品粮食产量增长得慢的原因问题，指的是虽然我国播种

面积和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战前标准，而我国商品粮食产量还是比粮食需要量增长得慢的问题。

的确，我国播种面积已经达到战前标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是的，这是事实。粮食总产量在去年已经等于战前生产标准，就是说已经达到五十亿普特，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是的，这是事实。尽管如此，我们所生产的商品粮食却比战前少了一半，而输出国外的粮食比战前少了百分之九十五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首先和主要是因为十月革命使我国农业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使它从生产商品粮食极多的地主大经济和富农大经济转为生产商品粮食极少的小农经济和中农经济。战前我国有一千五百万至一千六百万个体农户，而现在我国却有二千四百万至二千五百万农户，单是这一点就已经说明现在我国农业的主要基础是生产商品粮食极少的小农经济。

农业中的大经济，不管是地主经济、富农经济还是集体经济，它的力量就在于它有可能采用机器，利用科学成就，使用肥料，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生产的商品粮食最多。相反地，小农经济的弱点就在于它没有或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因此，它是半消费性的、出产商品很少的经济。

例如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来说。它们生产的商品粮食占其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二。换句话说，它们生产的商品粮食相对地比战前地主经济生产的多。而中小农户呢？它们生产的商品粮食只等于其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一点二。可见这里的差别是很明显的。

从下面的数字可以看出过去战前时期和现在十月革命以后时期粮食生产构成的情形。这些数字是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涅姆钦诺夫同志提供的。涅姆钦诺夫同志在说明书里附带声明说，这些

数字不能说完全精确，只能使人做一种大约的估计。但是从一般粮食生产的构成来看，特别是从商品粮食生产的构成来看，这些数字已经完全足以使我们明白战前时期和十月革命以后时期的差别了。

	粮食总产量		商品粮食（农村外的）		
	单位百万普特	百分比	单位百万普特	百分比	商品率
战前：					
1. 地主	600	12.0	281.6	21.6	47.0
2. 富农	1 900	38.0	650.0	50.0	34.0
3. 中农和贫农	2 500	50.0	369.0	28.4	14.7
总计	5 000	100	1 300.6	100	26.0
战后（1926—1927 年度）：					
1. 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	80.0	1.7	37.8	6.0	47.2
2. 富农	617.0	13.0	126.0	20.0	20.0
3. 中农和贫农	4 052.0	85.3	466.2	74.0	11.2
总计	4 749.0	100	630.0	100	13.3

这个统计表说明什么呢？

第一，它说明绝大部分的粮食生产已经从地主富农方面转到小农中农方面。这就是说，小农中农在完全摆脱了地主压迫并在基本上摧毁了富农势力之后，有可能来大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了。这是十月革命的结果。基本农民群众从十月革命得到的主要好处首先表现在这里。

第二，它说明我国商品粮食的主要持有者是小农，首先是中农。这就是说，不仅从粮食总产量来看，而且从商品粮食产量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已经成为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农已经成为农业的“中心人物”。

第三，它说明在地主经济（大经济）已经被消灭、富农经济（大经济）已经缩小三分之二以上、农业已经转为商品率只占百分之十一的小农经济、粮食生产方面又还没有比较发达的公共大经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情形下，商品粮食产量必然会而且事实上已经较战前大为减少。虽然我们的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战前标准，而我们现在所持有的商品粮食却比战前少了一半，这是事实。

这就是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

正因为如此，不能把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看做简单的偶然现象。

毫无疑问，还有一种情况也在这里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这就是我们的商业机关承担了不必要的供应许多中小城市粮食的义务，结果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国家的存粮。可是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并不在于这种情况，而在于我国农业的商品率提高得很慢，同时商品粮食需要量却增长得很快。

出路何在呢？

有些人认为出路在于恢复富农经济，在于发展和扩大富农经济。这些人不敢说要恢复地主经济，他们大概知道，现在说这样的话是有危险的。可是，唯其如此，他们也就更乐意说必须大力发展富农经济，以利于……苏维埃政权。这些人以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既依靠以剥削工人阶级为经济原则的富农阶级，又依靠以消灭一切剥削为经济原则的工人阶级。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

用不着证明，这种反动的“计划”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的任务，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有人说，富农“并不”比城市资本家“坏”，富农一点也不比城市耐普

曼① 危险，因此，我们现在不必"怕"富农，——这种说法是自由派的空话，是用来麻痹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警惕性的。不应当忘记，在工业方面我们能用产品占工业品总产量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去和城市小资本家对立，而在农村生产方面我们能用来和富农大生产对立的，却不过是尚未巩固而粮食产量等于富农经济粮食产量八分之一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了解富农大经济在农村中的作用，不了解富农在农村中的比重比小资本家在城市工业中的比重大过百倍，那就是发了疯，离开了列宁主义，而投奔到工人阶级的敌人方面去了。

那么，出路究竟何在呢？

（1）首先，出路在于从落后的分散的小农户转为有机器供应的、用科学成就武装起来的、能生产最大量商品粮食的联合的公共的大农庄。出路在于在农业方面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

列宁从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天起就号召党去组织集体农庄。从那时起，我们党内就没有停止过宣传集体农庄的思想。可是，建立集体农庄的号召只是在最近才得到广泛的响应。这首先是由于农村里合作社运动的广泛发展为农民在情绪上转向集体农庄作了准备，而许多集体农庄现在每俄亩② 已能出产粮食一百五十至二百普特、商品率达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事实，又使贫农和下中农很想参加集体农庄。

还有一种情况也在这里起着不小的作用，这就是国家只是在

① 耐普曼是俄语"непман"一词的音译，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产阶级分子。——编者注

② 俄亩是俄国地积单位，一俄亩等于一点零九公顷，合十六点三五市亩。——编者注

最近才有可能大力资助集体农庄运动。大家知道，今年国家用于帮助集体农庄的款项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共六千余万卢布)。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3]完全正确，它认为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认为加强集体农庄运动是提高我国粮食生产商品率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材料，1927年集体农庄的粮食总产量不下五千五百万普特，商品率平均为百分之三十。今年年初建立新集体农庄的巨浪和原有集体农庄的扩大，一定会使今年年底集体农庄的粮食产量大大增加。任务在于保持集体农庄运动现在的发展速度，扩大集体农庄，取消那些有名无实的集体农庄，而代之以名副其实的集体农庄，并建立一种制度，使集体农庄把全部商品粮食交给国家的和合作社的组织，否则国家就停止给以补助金和贷款。我认为只要遵守这些条件，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就能从集体农庄那里得到将近一亿普特的商品粮食。

人们有时候把集体农庄运动同合作社运动对立起来，大概他们认为集体农庄是一回事，而合作社是另一回事。这当然是不对的。有些人甚至把集体农庄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对立起来。不用说，这样对立起来是毫无道理的。其实，集体农庄是合作社的一种形式，是最明显的生产合作社形式。有销售合作社，有供应合作社，也有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是整个合作社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就是把农民从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提高到所谓集体农庄的合作社。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的集体农庄只是在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发展和加强之后才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

(2)其次，出路在于扩大和巩固原有的国营农场，建立和发展

新的大规模的国营农场。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材料，现有的国营农场1927年粮食总产量不下四千五百万普特，商品率为百分之六十五。毫无疑问，在国家一定的支持下，国营农场是会大大提高粮食产量的。

但是任务并不以此为限。苏维埃政权已经作出决定，要在没有农民份地的地区建立新的大规模的国营农场（每个农场占地一至三万俄亩），这些农场五六年后大约能生产一亿普特商品粮食。这种国营农场已经着手建立。任务就是无论如何要实现苏维埃政权的这个决定。我认为只要完成这些任务，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就能从新旧国营农场那里得到八千万至一亿普特的商品粮食。

（3）最后，出路在于不断提高中小个体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支持个体的富农大经济。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支持中小个体农民经济，提高它的单位面积产量，引导它走上合作社组织的轨道。这是一项老任务，早在1921年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强调地宣布过。我们党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5]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又肯定了这项任务。现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使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更明显了。因此，应当坚决完成这项任务，就象坚决完成上述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两项任务一样。

所有的材料都说明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在几年以内大约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现在我国所使用的木犁至少有五百万部。只要把这些木犁换成铁犁，就能使我国粮食产量大大增加。更不用说，我们还要以一定数量的肥料、精选种子和小型机器等等供给农民经济。实行预购，同整个整个的村子订立合同——供给它们种子等等，同时从它们那里必须取得相当数量的粮食，——这种方法是提高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的

最好方法。我认为只要在这方面认真工作，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就能从中小个体农民经济那里至少多得一亿普特商品粮食。

总之，只要完成这一切任务，那么三四年后，我们国家就可以多掌握二亿五千万至三亿普特商品粮食，就比较能够按国内外的需要适当地机动调度了。

摆脱粮食战线上的困难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大体上就是如此。

把这些主要措施和当前在改进农村商品供应计划方面的措施结合起来，并使我们的商业机关不再承担供应许多中小城市粮食的义务，——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除了上述措施以外，是不是还应当采取其他一些措施，比如说，采取减缓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措施（因为我国工业的发展使粮食需要量迅速增长，这种增长暂时超过了商品粮食产量的增长）？不，不应当。无论如何不应当！减缓工业发展速度，就是削弱工人阶级，因为工业发展中每前进一步，每增加一个新工厂，照列宁的说法，都是工人阶级在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斗争中、在对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中加强自己阵地的"新堡垒"。相反地，我们应当保持现在的工业发展速度，我们应当一有可能就加快这种速度，以便把大量商品投入农村而从农村取得更多的粮食，以便供给农业首先是供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机器，以便使农业工业化并使农业生产的商品率提高。

也许为了更加"慎重"起见，应当延缓重工业的发展，把主要是供应农民市场的轻工业变成我国工业的基础吧？无论如何不应当！这样做就是自杀，就是破坏我国全部工业，连轻工业在内。这样做就是离开我国工业化的口号，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

我们在这里的出发点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8]上

所指出的有名的指导性的原理，这些原理是我们全党绝对必须遵循的。请听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吧：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的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

还有：

"我们在各方面实行节约，甚至在学校里也实行节约。必须这样作，因为我们知道，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49页）①

列宁的这些指示是不能忘记的。

采取上述措施对工农联盟会有什么影响呢？我认为采取这些措施只会促进工农联盟的巩固。

的确，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加速发展起来；如果由于得到直接帮助，中小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起来，而合作社又能掌握越来越广大的农民群众；如果国家又多得机动调度所必需的几亿普特商品粮食；如果由于采取诸如此类的措施富农被制服和逐渐被战胜，——那么工农联盟内的工农矛盾因而就会日益消失，在粮食收购方面就没有必要再采取非常措施，广大农民群众就会日益转向集体经济形式，为战胜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就会日益具有群众性和组织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采取这些措施只会有利于工农联盟，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只是应当注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农联盟并不是什么普通的联盟。这种联盟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阶级联盟的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66页。——编者注

特殊形式，其目的是：（一）加强工人阶级的阵地，（二）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内的领导作用，（三）消灭阶级和阶级社会。对工农联盟的其他任何理解都是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社会革命党主义，随便叫作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叫作马克思主义，不能叫作列宁主义。

怎样把工农联盟思想和列宁所说的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① 这一著名原理结合起来呢？这里有没有矛盾呢？这里只在表面上看来是有矛盾的。其实这里没有任何矛盾。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7]上的报告中认定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而在同一个报告中他又再三论证工农联盟的必要，说“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权力”②。很明显，列宁无论如何也没有认为这里有任何矛盾。

应当怎样了解列宁所说的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这一原理呢？这是不是说农民是由资本家组成的呢？不，不是这个意思。

第一，这是说，个体农民是一个特别阶级，它是把经济建筑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因此也就和无产阶级不同，因为无产阶级是把经济建筑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

第二，这是说，个体农民是一个本身会分泌、产生和滋养资本家、富农以及其他各种剥削分子的阶级。

这种情况对于建立工农联盟是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呢？不，不是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71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477页。——编者注

能认为是和全体农民的联盟。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不同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不同富农作斗争，这样的联盟是不能实现的。不把贫农当作工人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组织起来，这样的联盟是不能巩固的。因此，目前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农联盟，只有在列宁所提出的依靠贫农、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一分钟也不停止对富农的斗争这一有名的口号① 下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实行了这个口号，才能引导基本农民群众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

由此可见，列宁这两个公式之间的矛盾只是虚假的、表面的。其实它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矛盾的。

载于 1928 年 6 月 2 日
《真理报》第 127 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
第 71—83 页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621 页。——编者注

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

自我批评口号不能看作是一种暂时的、瞬息即逝的东西。自我批评是一种教育党的干部和整个工人阶级懂得革命地发展这一思想的特殊方法，即布尔什维克的方法。马克思早就说过，自我批评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方法①。至于我们党内的自我批评，那在布尔什维主义在我国刚出现的时候，即在布尔什维主义形成为工人运动中的一个特别的革命派别的最初日子就已经开始了。

大家知道，早在1904年春天，当布尔什维主义还不是一个独立政党，而是和孟什维克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内工作的时候，列宁就已经号召全党"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列宁当时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这样写道：

"他们〈即马克思主义者的敌人。——约·斯大林注〉一看见我们发生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摘引我这本专门谈论我们党内种种缺点的小册子中的个别词句。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是久经战斗的了，决不会为这小小的针刺所惊扰，却能够不管这些针刺，继续**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②，这些缺点是一定会而且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让敌人先生们试把他们'党'内**真实**情况的图画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哪怕只是稍微有些象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图画也好！"（《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161页）③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7页。——编者注

②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③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192页。——编者注

因此，有些同志是完全不对的，他们认为自我批评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是一种时髦的东西，它很快就要过时，正象一切时髦的东西通常都要过时一样。实际上，自我批评是布尔什维主义武库中不可缺少和经常使用的一种武器，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本性及其革命精神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一种武器。

有时候人们说，自我批评对于还没有执政的党是好东西，因为它"无物可失"，但是对于已经执政的、周围有许多敌对势力的党却是危险而有害的，因为敌人会利用它的被揭露出来的弱点来反对它。

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执掌了政权，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因我们建设的成就而骄傲自大，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弱点，从而有利于敌人，所以特别是现在，特别是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尤其需要自我批评。

自我批评的目的在于揭露并消灭我们的错误和弱点，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自我批评只能有利于布尔什维主义同工人阶级的敌人作斗争，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列宁估计到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的情况的这些特点，他在1920年4—5月间所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小册子中写道：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①，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00页）②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3页。——编者注

列宁在1922年3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8]上说得万分正确，他说：

“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作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作好。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①。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60—261页）②

结论只有一个：没有自我批评，就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而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也就没有布尔什维主义。

为什么自我批评口号正是在现在，正是在目前的历史时刻，正是在1928年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呢？

因为现在国内和国外阶级关系的尖锐化暴露得比一两年前更明显了。

因为现在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的弱点和错误而对我国工人阶级进行的破坏活动暴露得比一两年前更明显了。

因为沙赫特案件[2]和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对付收购工作的手腕”的教训，以及我们计划方面的错误，对于我们来说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忘记。

如果我们想巩固革命并全副武装地迎接敌人，那就必须**尽快克服沙赫特案件**和粮食收购困难所揭露出来的我们的错误和弱点。

如果我们不想被各种“意外事件”和“偶然事件”弄得措手不及而使工人阶级的敌人拍手称快，那就必须**尽快揭露**我们的那些**还**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5页。——编者注

没有被揭露但无疑是存在的弱点和错误。

在这里，拖延就等于帮助我们的敌人，加深我们的弱点和错误。但是，如果不开展自我批评，不加强自我批评，不吸引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来揭发并消灭我们的弱点和错误，要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1]是完全正确的，它在关于沙赫特案件的决议中说：

"保证顺利地实现上述各种措施的**最主要的条件**，应当是**切实贯彻**第十五次代表大会[3]所提出的自我批评的口号。"①②

但是要开展自我批评，首先必须克服摆在党面前的许多障碍。这些障碍就是群众文化的落后、无产阶级先锋队文化力量的不足、我们的因循守旧、我们"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等等。然而最大的障碍之一，甚至是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机关里的**官僚主义**。这里指的是我们党组织、国家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以及其他各种组织里都有官僚主义分子。这里指的是靠我们的弱点和错误过日子的官僚主义分子，他们害怕群众的批评和群众的监督象害怕火一样，他们妨碍我们开展自我批评，妨碍我们克服我们的弱点和错误。决不能把我们组织里的官僚主义看作仅仅是拖拉作风和文牍主义。官僚主义是资产阶级对我们组织的影响的表现。列宁说得对：

"……我们必须懂得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斗争也象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的任务一样复杂。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机构中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444页。——编者注

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以致我们的党纲里也提到了它，这是因为**它和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散漫性是有联系的。**"①（《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220页）②

如果我们真正想开展自我批评并治愈危害我们建设事业的脓疮，那就应当更坚决地进行反对我们组织里的官僚主义的斗争。

我们应当更坚决地发动千百万工农群众进行**来自下面**的批评，进行**来自下面**的监督，作为消除官僚主义的主要药剂。

列宁说得对：

"如果我们要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那我们就应当**吸收下层群众来做这项工作。**……"因为"除了**吸收工人和农民**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克服官僚主义呢？"③（《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96、495页）③

但是，为了"吸收"千百万群众，就必须在工人阶级的一切群众性组织里，首先在党内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缺少这个条件，自我批评就等于零，就等于空谈，就等于废话。

我们需要的不是**任何**自我批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发扬他们的战斗精神、巩固他们的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力量并帮助他们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的自我批评。

有些人说：既然有了自我批评，就不需要**劳动纪律**，就可以丢开工作来胡扯乱谈了。这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对工人阶级的嘲弄。我们需要自我批评不是为了破坏劳动纪律，而是为了**巩固**劳动纪律，为了使劳动纪律成为能够抵制小资产阶级松懈现象的**自觉的**纪律。

另外一些人说：既然有了自我批评，就不再需要**领导**，就可以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9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31卷第386页。——编者注

离开船舵，一切“听其自然”。这不是自我批评，而是耻辱。我们需要自我批评不是为了削弱领导，而是为了**加强**领导，为了使它从纸上的和威信不高的领导变成**有生气的**和真正**有威信的**领导。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自我批评”，它会**破坏**党性，**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削弱**我们的建设工作，**腐蚀**经济工作干部，**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产生关于**蜕化**的空谈。托洛茨基反对派昨天叫我们进行的正是这种“自我批评”。不用说，党和这种“自我批评”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不用说，党将用一切力量、一切办法来反对这种“自我批评”。

必须把这种与我们**背道而驰的**、具有破坏性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和**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严格地区别开来；我们的自我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性，**巩固**苏维埃政权，**改进**我们的建设工作，**加强**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武装**工人阶级。

加强自我批评的运动我们才开始了几个月。我们还没有给这个运动作初步总结所必需的材料。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说，这个运动已经开始产生良好的结果。

不能否认，自我批评的浪潮已经开始高涨并扩大，席卷工人阶级的更加广泛的阶层并把他们卷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要拿生产会议和临时监察委员会已经活跃起来的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固然，还有人企图把生产会议和临时监察委员会的有根据的和经过核实的意见束之高阁，必须对这种企图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企图的目的是要打消工人对自我批评的热情。但是，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类的官僚主义企图，将被日益高涨的自我批评浪潮冲得干干净净。

也不能否认，由于自我批评，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已经开始振

作起来，更加警惕起来，开始更严肃地对待领导经济工作的问题，而我们党、苏维埃、工会以及其他一切组织的干部对群众的需要也更加敏感，更加关心了。

固然，不能认为在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里已经充分实行党内民主和一般的工人民主。但是，没有理由怀疑，这项工作将随着运动的继续展开而向前推进。

同样不能否认，由于自我批评，我们的报刊更加活跃和有生气了，而我们的报刊工作者的队伍，如工农通讯员组织，已经开始成为一支极重要的政治力量。

固然，我们的报道有时仍然流于表面，还没有学会从零碎的批评意见进到较深刻的批评，从深刻的批评进而推广开批评的结果，进而报道我们的建设方面因批评而获得的**成绩**。但是，几乎用不着怀疑，这项工作将在运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向前推进。

然而，除了这些优点以外，还必须指出我们运动中的一些缺点。这里指的是现在在运动初期就已经发生的歪曲自我批评口号的现象，这种现象如果不立刻予以反对，就会造成把自我批评庸俗化的危险。

（1）首先必须指出：好些报刊表现出一种趋向，把运动从切实批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转到以广告式的叫喊来反对**个人生活中**的极端现象。这也许令人难以相信，但可惜这是事实。

例如拿伊尔库茨克区委员会和区执行委员会机关报《劳动权力报》（第128号）来说。你们会看到报上整版登满了广告式的“口号”：“性生活的放纵是资产阶级的习气”，“喝了一杯又一杯”，“有了房子又要牛”，“双人床上的强盗”，“没有打响的一枪”，如此等等。试问，这些只有《交易所报》[19]才做得出的“批评的”叫喊和旨在改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之间能有

什么共同之处呢？很可能，这些广告式的短文的作者是共产党员。他可能对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敌人”深恶痛绝。但是，他在这里离开了正确的道路，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说的**不是我们**阶级的话，——这是毫无疑问的。

（2）其次必须指出：甚至那些一般说来还不是不善于正确地进行批评的报刊，有时也犯了**为批评**而批评的错误，把批评变成一种**耸动视听的竞技**。例如拿《共青团真理报》[6]来说。大家都知道《共青团真理报》在开展自我批评方面的功绩。但是，请你们看看该报最近几号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者的“批评”，那一连串讽刺他们的令人不能容忍的漫画。试问，谁需要这种“批评”？它除了糟蹋自我批评口号以外，还能给我们什么呢？当然，如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着想，而不是为散布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消息来博得庸人一笑，那么要这种“批评”有什么用处呢？当然，进行自我批评需要各种武器，其中也包括“轻骑队”[20]。但是，难道由此就应得出结论说，轻骑队应当成为**轻举妄动的**骑兵队吗？

（3）最后必须指出：我们许多组织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把自我批评变成对我们经济工作人员的**攻击**，使他们在工人阶级面前**威信扫地**。这有事实：乌克兰和俄罗斯中部的某些地方组织向我们**优秀的**经济工作人员发动直接**攻击**，而他们的全部罪状是他们没有保证自己百分之百地不犯错误。否则应如何理解这些地方组织关于撤销这些经济工作人员的职务的决定，这些没有丝毫约束力但分明是想破坏他们的威信的决定呢？否则应如何理解只管自己批评而不让经济工作人员答复批评呢？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这里开始把“舍米雅卡审判”[21]冒充为自我批评了呢？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如果批评是来自下面的，那么即使这种批评只有百分之五至十是正确的，我们也不

应当忽视。这都是对的。但是，难道由此就应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要求经济工作人员保证自己百分之百地不犯错误吗？难道世界上有保证自己百分之百地不犯错误的人吗？培养经济工作干部需要很多年，我们应当以最爱护最关心的态度对待经济工作人员，这难道很难了解吗？我们需要自我批评不是为了攻击经济工作干部，而是为了加强和提高他们，这难道很难了解吗？

请批评我们建设中的缺点吧，但是不要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不要把它变成拿"双人床上的强盗"、"没有打响的一枪"这类题目做广告宣传的工具。

请批评我们建设中的缺点吧，但是不要糟蹋自我批评口号，不要把它变成制造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厨房。

请批评我们建设中的缺点吧，但是不要歪曲自我批评口号，不要把它变成攻击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的工具。

而主要的是：不要用**来自上面的**"批评的"叫喊代替**来自下面的**群众性的批评，让工人阶级群众投入这个运动，并在纠正我们的缺点方面，在改进我们的建设方面表现出他们的创造主动性。

载于1928年6月26日
《真理报》第146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
第111—121页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

（1928年10月19日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
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认为首先必须撇开小事情，撇开个人因素等等，以便解决我们所关心的右倾问题。

在我们党内是否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否存在着有利于这种危险的客观条件，怎样对这种危险作斗争，——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但是，我们如果不撇开蒙蔽这个问题并妨碍我们了解问题实质的一切小事情和次要成分，就不能解决这个右倾问题。

扎波尔斯基认为右倾问题是一个偶然的问题，这是不对的。他硬说，这里全部问题不在于右倾，而在于闹意气、个人倾轧等等。姑且假定这里也和在任何斗争中一样，闹意气和个人倾轧有几分作用。可是拿闹意气来解释一切，看不见隐藏在闹意气后面的问题的实质，这就是离开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象莫斯科组织这样一个毫无疑问是老练而团结一致的大组织，是不会因为几个爱闹意气的人或爱倾轧的人的积极活动而弄得上上下下都震动起来的。不，同志们，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怪事。更不用说，莫斯科组织的力量和能力是不能这样轻视的。显然，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一些更加深刻的、和闹意气或个人倾轧毫不相干的原因。

弗龙托夫虽然承认有右倾危险存在，但是不认为这种危险值得严肃的求实的人去认真过问，这也是不对的。在他看来，右倾问题是空谈家的研究对象，而不是求实的人的研究对象。我完全了解弗龙托夫，他埋头于日常的实际工作，以致没有工夫来考虑我们的发展前途。但是，这还不是说我们应当把某些党的工作人员的狭隘的、事务性的实际主义变为我们建设工作的教条。健康的事务主义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它在工作中失掉了前途，不使自己的工作服从党的基本路线，那它就变成坏东西了。可是不难明白：右倾问题是关于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3]上所规定的发展前途是否正确的问题。

有些同志在讨论右倾问题时把问题着重在代表右倾的人的身上，这也是不对的。他们说，请给我们指出右倾分子或调和分子，请说出他们的姓名，好让我们来惩办他们。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人当然有一定的作用。可是，这里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产生党内右倾危险的条件和环境。尽管可以把人撤掉，但这还不是说，我们这样做就把我们党内右倾危险的根底铲除了。所以人的问题虽然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它没有决定的意义。

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1919年底和1920年初在敖德萨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时我们的军队已经把邓尼金匪徒赶出乌克兰，正在敖德萨一带消灭邓尼金军队的残部。那时有一部分红军战士怒气冲冲地在敖德萨搜寻协约国，他们相信只要一拿获协约国，战争就会结束。(全场大笑)可以设想，红军战士当时在敖德萨能够拿获协约国的某个代表。但是协约国问题当然不会因而得到解决，因为当时敖德萨虽然是邓尼金匪徒的最后一块地盘，但是协约国的根底不在敖德萨，而在世界资本主义中。

我们有些同志也是这样，他们在右倾问题上把问题着重在代

表右倾的人的身上，而忘记了产生这种倾向的条件。

因此，我们在这里首先应当阐明离开列宁路线的右倾和"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产生的条件问题。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而走向社会民主党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既然某一部分共产党员否认竟选中"阶级反对阶级"这个口号的适当性(法国)，或反对共产党单独提出候选人(英国)，或不愿强调对"左派"社会民主党斗争的问题（德国)，如此等等，——那就是说在共产党内有些人力图使共产主义去迁就社会民主主义。

如果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思想上被粉碎，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而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加强和巩固，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

总之，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保存**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

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底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既然我们的某一部分共产党员企图拉着党离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后退，否认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必要性；或要求收缩我国工业，认为目前我国工业的高速度发展会使国家遭到灭亡；或否认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适当性，认为这种资助是浪费金钱；或否认在自我批评基础上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

的适当性，认为自我批评会动摇我们的机关；或要求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如此等等，——那就是说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些人企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去迁就（也许他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苏维埃的"资产阶级的口味和需要。

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成分在我国大大加强。而资本主义成分在我国加强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削弱和资本主义恢复的机会的增多。

总之，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

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内，有没有使资本主义恢复（复辟）成为**可能**的条件呢？是的，是有的。同志们，这看起来也许是很奇怪的，但这是事实。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加速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并使农民经济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这些老根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它们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

资本主义的力量，正如列宁所说，在于"**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73页）①。

很明显，既然小生产在我国很普遍，甚至占优势，既然它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经常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那么我国就有使资本主义恢复成为**可能**的条件。

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内，有没有为消灭和铲除资本主义恢复的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1页。——编者注

可能性所必需的手段和力量呢？是的，是有的。列宁关于苏联有**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论点所以正确，就因为它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为此就必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从国家工业化着眼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命脉，高速度发展工业，使国家电气化，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使农民普遍合作化，提高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把个体农民经济逐渐联合为公共的集体经济，发展国营农场，限制并战胜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如此等等。

列宁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每一个细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比较过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经济基础从小农的变成大工业的。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46—47页)①

第一，由此可见，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老根的时候，资本主义比共产主义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有时候人们把树砍倒了，却没有把树根挖掉，因为力量不够。由此就产生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可能性**。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9页。——编者注

第二，由此可见，除了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以外，**在我国还有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我们努力实现国家电气化，**如果**我们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我们就**能够**消灭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就能够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并在我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由此就产生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可能性**。

最后，由此可见，不能仅仅在工业方面建设社会主义，而听凭农业去自发地发展，以为农村"自然会跟着"城市走。城市里社会主义工业的存在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因素。但是这还不是说有了这个因素就完全够了。要使社会主义的城市能够引导农民的乡村往前走到底，就必须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①，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

列宁的这一句话和他的另一句话即"新经济政策……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①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②是不是矛盾呢？不，不矛盾。恰恰相反，这两句话是完全相符的。列宁决不是说新经济政策给予我们现成的社会主义。列宁只是说新经济政策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可能**建成和**社会主义实际建成**是大有差别的。决不可以把可能性和现实混为一谈。正是为了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列宁才主张实现国家电气化，主张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在我国最终胜利的条件。

可是要在一两年内实现这个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在一两年内使国家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工业，使千百万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20页。——编者注

农民群众合作化，为农业建立起新的技术基础，把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发展国营农场，限制并战胜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为此就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多年紧张的建设工作。当这一点还没有做到的时候（而这一点并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我们就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在这里，小生产是经常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在这里，资本主义恢复的危险还是存在。

因为我国无产阶级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十分复杂的最实际最现实的生活中，所以在小生产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就"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89页）①，从而把某种犹豫、某种动摇带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我们党的队伍里各种动摇和各种离开列宁路线的倾向，其根源和基础就在这里。

正因为如此，不能认为我们党内的右倾或"左"倾问题是一个不值一提的问题。

我们党内的**右**倾危险，即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过低估计**我们敌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看不见资本主义恢复的危险，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奥秘，因而很轻易地向资本主义让步，要求降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要求宽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要求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问题推到后面去，要求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放纵资本主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00页。——编者注

义势力，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增多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机会。

我们党内的"**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过高估计**我们敌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只看见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而看不见我国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陷于悲观失望，只好用我们党内有特米多尔主义[22]这种胡说来安慰自己。

列宁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① 根据列宁这句话，"左"倾就做出不正确的结论说：在苏联根本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对农民是毫无办法的；工农联盟的思想是已经过时的思想；如果没有西方胜利了的革命的及时援助，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会垮台或蜕化；如果不采纳那种幻想的、不惜以和农民决裂为代价来实行的超工业化计划，那就必须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已经毁灭了。

由此就有"左"倾政策中的冒险主义。由此就有政策中的"超人的"跳跃。

毫无疑问，如果"左"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工人阶级脱离自己的农民基础，使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脱离其余的工人群众，因而就会使无产阶级遭受失败，使资本主义恢复的条件容易形成。

可见，这两种危险（无论是"左"倾危险或右倾危险），这两种离开列宁路线的倾向（无论是右倾或"左"倾），虽然从不同的两端出发，但引起的后果是一样的。

这两种危险哪一种坏些呢？我认为两种都坏。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9页。——编者注

从对这两种倾向顺利进行斗争的观点来说，它们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左”倾危险现在在党看来比右倾危险更为明显。我们对“左”倾已经进行了几年紧张的斗争，这个情况对于党当然不会没有作用。很明显，在对“左”倾即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几年中，党学会了许多东西，要用“左的”词句来欺骗党已经不是容易的了。

至于右倾危险，尽管它过去就已经存在，现在又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加强（和上年度收购危机有关）而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来，但我认为这种危险在我们党内某一部分党员看来还不十分明显。因此任务就是：除了丝毫不放松对“左”倾危险即托洛茨基主义危险的斗争以外，还要着重反右倾的斗争，并竭力设法使右倾危险在党看来也和托洛茨基主义危险一样明显。

右倾问题如果不是和我们发展中的**困难**问题有联系，也许不会象现在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但是问题也就在于右倾的存在使我们发展中的困难复杂化，并阻碍我们克服这些困难。正因为右倾危险阻碍我们进行克服困难的斗争，所以克服右倾危险的问题对于我们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现在稍微谈谈我们的困难的性质。应该注意到，我们的困难决不能认为是停滞或衰落中的困难。有经济衰落或经济停滞中的困难，在发生这种困难的时候，人们就竭力使经济停滞现象的害处减轻一些，或者使经济衰落的程度减轻一些。我们的困难和这种困难毫无共同之处。我们的困难的特点就在于它们是**高涨**中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当我们讲到困难的时候，通常指的是要把工业**提高**百分之几，把播种面积**扩大**百分之几，把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多少普特，如此等等。正因为我们的困难是高涨中的困难，而不是衰落或停滞中的困难，所以这种困难对于党也就不会有什么特别

的危险。

但是困难终究是困难。要克服困难就必须竭尽一切力量，必须有刚毅性和坚韧性，而刚毅性和坚韧性又不是每个人都充分具备的，也许因为有人觉得累了，疲劳了，或者因为有人宁愿过比较安静的、没有斗争和波折的生活，——所以，这里就发生犹豫和动摇，转到阻力最小的路线方面去，说什么要降低工业的发展速度，宽容资本主义分子，否认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否认一切超出平常的、安静的日常工作范围的事物。

可是，我们不克服我们面前的困难就不能前进。而要克服困难，首先必须战胜右倾危险，首先必须克服右倾，因为右倾阻碍我们和困难作斗争，并企图摧毁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斗争的意志。

这里所指的当然是对右倾进行真正的斗争，而不是口头上的纸上的斗争。我们党内有些人为了良心上过得去，也就不反对宣布对右倾危险作斗争，好象神父有时念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①一样，可是不采取（决不采取）任何实际办法来为反右倾斗争奠定巩固的基础，并在事实上克服这种右倾。这样的派别在我们这里就叫做对右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调和的**派别。不难了解：对这种调和派的斗争就是对右倾，对右倾危险的总斗争的组成部分。因为不同这种庇护机会主义者的调和派进行有系统的斗争，就不能克服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关于右倾分子的问题无疑是值得注意的，虽然它没有决定的意义。在上年度发生粮食收购危机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在我们党的下层组织里碰到右倾危险分子，当时在乡里和村里有许多共产党员反对党的政策，弄到和富农分子结合起来的地步。你们知道，

①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欢呼语，意为"赞美上帝"。——编者注

这种分子在今年春季已经被清除出党，这一点已经在今年2月我们党中央的一个大家知道的文件中特别提到了。

可是，如果说我们党内再没有这种分子，那就不对了。如果往上面去看看县的和省的党组织，并好好地观察一下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那你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在这里找到右倾危险分子以及对右倾危险采取调和态度的人。大家知道，在我们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好些工作人员所寄来的"信"、"声明"和其他文件中，右倾趋向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你们知道，在中央七月全会[23]速记记录中提到了这些信和文件。

如果再往上面去看看，提出关于中央委员的问题，那就必须承认，在中央的成员中也有一些对右倾危险采取调和态度的因素，固然这些因素是极少的。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就是这一点的直接证明。

而在政治局内又是怎样呢？在政治局内有没有什么倾向呢？在我们政治局内既没有右倾分子，又没有"左倾分子"，也没有对他们采取调和态度的分子。这是必须在这里十分肯定地说明的。对党不怀好意的分子和各种反对派分子散布谣言，说我们中央政治局内有右倾或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已经到了抛弃这种谣言的时候了。

在莫斯科组织里或它的上层机关莫斯科委员会内是不是有过犹豫和动摇呢？是的，是有过的。如果现在硬说那里没有发生过犹豫和动摇，那是愚蠢的。彼尼科夫的诚恳坦白的发言就是这一点的直接证明。彼尼科夫在莫斯科组织和莫斯科委员会里并不是居于末位的人。你们已经听见，他坦白地公开地承认了他在我们党的政策的许多极重要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这当然不是说，整个莫斯科委员会都发生过动摇。不，不是这个意思。象今年10月

莫斯科委员会告莫斯科组织全体党员书这样的文件，就毫无疑问地证明莫斯科委员会已经克服了它的某些委员的动摇。我不怀疑，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核心是一定能彻底纠正这种情况的。

各区组织干涉了这件事，提出了必须铲除莫斯科组织里某些领导人的错误和动摇的问题，有些同志对此表示不满。我不知道这种不满能有什么理由。莫斯科组织里各区积极分子发出了自己的呼声，要求铲除错误和动摇，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我们的工作不是在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进行的吗？自我批评可以提高党的和整个无产阶级的下层群众的积极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各区积极分子真正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那又有什么不好或危险呢？

中央干涉这件事情是不是做得对呢？我认为中央是做得对的。别尔津认为中央提出撤换一个为区组织所反对的区领导人的问题是做得太严厉了。这是完全不对的。我请别尔津回想一下1919年或1920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时有些中央委员在党的路线方面犯了一些在我看来并不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按照列宁的提议对这些人进行了处分以警效尤，其中有一个人被派到土耳其斯坦，另一个人几乎被取消中央委员资格。[24]

列宁当时这样处理是不是对呢？我认为他是完全对的。当时中央的情形并不象现在这样。当时有一半中央委员是跟着托洛茨基走的，而中央本身的情形是不稳固的。现在中央这样处理是宽大得无可比拟了。为什么呢？也许因为我们想比列宁慈善些？不，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现在中央的情形已经比当时稳固了，所以中央现在已经有可能处理得比较宽大。

萨哈罗夫硬说中央干涉得太迟，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不对，是因为他大概不知道中央的干涉其实是从今年2月就开始的。萨哈

罗夫如果愿意，是可以确信这一点的。固然，中央的干涉并没有立刻收到良好的效果。可是，如果拿这一点去责备中央，那就奇怪了。

结论：

（1）右倾危险是我们党内的严重危险，因为它是生根于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

（2）右倾危险因有各种困难而加深，不克服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就不能克服这些困难；

（3）在莫斯科组织里有过犹豫和动摇，有过不稳固的因素；

（4）莫斯科委员会的核心在中央和各区积极分子的帮助下已经采取一切办法去铲除这种动摇；

（5）毫无疑问，莫斯科委员会一定能克服已经发现的错误；

（6）任务就在于消除内部斗争，使莫斯科组织团结一致，在开展自我批评的基础上顺利地进行支部的改选。（鼓掌）

载于1928年10月23日
《真理报》第247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
第192—205页

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1928 年 11 月 19 日在联共(布)中央全会[25]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要讲的是政治局提纲中所提出的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关于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并保证其尽可能快的速度是工业化的主导因素的问题。

其次一个问题，是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过分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因而我们国内政策方面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农业问题，特别是谷物问题，也就是如何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提高农业，改造农业的问题。

最后，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离开党的路线的各种倾向，两条战线的斗争以及目前我们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危险，是右倾的问题。

一

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

高速度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和关键。这个原理是我们提纲的出发点。

高速度发展工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尽量增加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但是这样做会使我们的一切计划（无论预算内的或

预算外的）都很紧。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最近三年来，在改造时期中，我们的控制数字的特点是：这些数字的制定和实现都是很紧的。无论是看一看我们的控制数字，或者是翻一翻我们的预算草案，或者是和我们党内的同志（无论是在党组织方面工作的同志，或者是领导我们苏维埃建设、经济建设和合作社建设的同志）谈一谈，——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计划很紧。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般地说，我们需要不需要把计划定得这样紧呢？不紧不行吗？难道不能在比较"平静"的情况下用比较缓慢的速度进行工作吗？我们采取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方针，是不是由于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性情急躁呢？

当然不是！在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里工作的都是一些清醒而冷静的人。如果撇开外部和内部的环境抽象地来讲，我们当然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进行工作。但是问题在于：第一，不能撇开外部和内部的环境；第二，如果从我们周围的环境出发，那就不能不承认，正是这个环境迫使我们要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

现在请允许我来分析一下这个环境，分析一下迫使我们要高速度发展工业的这些外部和内部的条件。

外部条件。我们是在一个技术非常落后的国家内取得了政权的。除了少数大工业单位多少有些新的技术基础以外，我们千百个工厂的技术是根本不能拿现代技术成就来衡量的。可是，我们周围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拥有比我国发达得多的和现代化的工业技术。你们看一看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看到那里的技术不仅是在前进，而且简直是在突飞猛进，超过了旧式的工业技术。由此可见，一方面，我国有最先进的苏维埃制度和全世界最先进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应当作为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

基础的我国工业技术却过分落后。你们是否以为，在存在着这种矛盾的情况下可以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

要克服这种矛盾必须做些什么呢？为此必须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我们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即苏维埃制度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很好的。但是这还不够。为了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还必须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这些国家。或者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我们被压倒。

不仅从建成社会主义方面来看这是对的。从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保卫我国的独立来看这也是对的。不为国防建立足够的工业基础，就不可能保卫住我们国家的独立。不使工业具有高度的技术，就不可能建立这样的工业基础。

就是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高速度发展工业，就是这一点迫使我们要高速度发展工业。

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并不是我们臆造出来的。这种落后是历来就有的，是我国的全部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这种落后，无论是在从前，在革命以前的时期，或是在后来，在革命以后的时期，人们都觉得是一种祸害。彼得大帝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这也就是想跳出落后圈子的一种独特的尝试。但是十分明显，任何一个旧的阶级，无论是封建贵族或是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消灭我国落后性的任务。而且这些阶级不仅不能解决这个任务，甚至不能以多少令人满意的形式提出这个任务。只有在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才能消灭我国历来的落后性。而且只有建立了自己的专政并掌握着对国家的领导的无产阶级，才能消灭这种落后性。

如果以为我国的落后并不是我们臆造出来的，而是我国的全

部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而且不应该对此负责，——如果这样来安慰自己，那就愚蠢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既然我们取得了政权并担负起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家的任务，我们就对一切负责而且应当对一切负责，既对好的负责也对坏的负责。正因为我们对一切负责，我们就应当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如果我们真正想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才能做到。正是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我们就应当不断地使我国工业高速度发展。而我们已经在使我国工业高速度发展，这是现在大家都看到的。

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对于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或突如其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 1917 年，在十月革命爆发前的时期我们就提出来了。早在 1917 年 9 月，十月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列宁在他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书中就提出这个问题了。

请看列宁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吧：

"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以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 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1 卷第 191 页）①

列宁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出了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的问题。

这段话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的时期写的，当时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政权，还没有社会主义化的工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68—169 页。——编者注

业，还没有广泛发展的包括千百万农民的合作社网，还没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现在，当我们已经有了能够根本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的一些重要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列宁的话大体上这样变动一下：

“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在**政治**方面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应当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运输业、信用系统等等，利用合作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等，以便**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假如我们的工业和技术象德国那样发达，假如我国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象德国那样大，那么高速度发展工业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就不会象现在这样迫切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发展工业，不必担心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我们知道我们一下子就会超过它们。而那时我们也就不会有现在这样严重的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了。但是问题正在于：我们在这方面是落后于德国的，我们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还远没有赶上德国。

假如我们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一**，假如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其他比较先进的国家，比如说在德国和法国，也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高速度发展工业的问题就不会这样迫切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包围对于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样严重的危险，我国的经济独立问题自然就退到次要的地位了，我们就可以加入较发达的无产阶级国家的体系，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国家得到机器来发展我国的工业和农业，而供应这些国家原料和粮食，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发展我国的工业。但是，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还没有这种条件，我们还是一个被资本主义

国家包围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

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把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的问题当作我国发展的生死存亡问题提出来。

迫使我们要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的**外部**条件就是如此。

内部条件。除了外部条件以外，还有迫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即我国工业要高速度发展的内部条件。我指的是我国农业、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过分落后。我指的是小商品生产者及其分散而十分落后的生产在我国还占绝对优势，和这种生产比较起来，我国社会主义大工业就象大海中的一个孤岛，虽然这个岛的基础在一天天扩大，但它仍然是大海中的一个孤岛。

我们通常说，工业是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工业是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就能在集体制的基础上改造落后的分散的农业。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当抛弃这种看法。但是也要记住：如果说工业是主脑，那么农业就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因为农业是吸收工业品的市场，是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者，是为输入设备以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所必需的出口物资后备的来源。如果让农业仍然处在技术十分落后的状态中，如果不保证工业有农业基础，不改造农业，不使农业跟上工业，那么能不能把工业向前推进呢？不，不能。

因此，任务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农业有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加速并推进自己的改造所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但是，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当然，改造分散的零星的农业比起改造联合的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来，是一件困难得多的工作。但是这个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把它解决。而解决这个任务非在高速度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不可。

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必须逐步而又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去，使它跟上社会主义工业。或者我们解决这个任务，那么我国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有了保证；或者我们放弃这个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么回到资本主义去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列宁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每一个细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比较过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46页)①

可见列宁所理解的全国电气化并不是孤立地建造个别的发电站，而是逐步地"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②，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这种大生产是这样或那样地、直接或间接地和电气化事业联系着的。

这个演说是列宁在1920年12月，在新经济政策施行的前夕，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论证所谓电气化计划即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时发表的。有些同志根据这一点说：这段话里所说的原理对目前的实际情况已经不适用了。试问，为什么呢？据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9页。——编者注

②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说是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这当然是事实。我们现在拥有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拥有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的集体农庄，我们拥有旧的和新的国营农场，我们拥有稠密的发达的合作社网，我们拥有为农民经济服务的农具租赁站，我们现在采用预购的方法作为结合的新形式，我们可以运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杠杆来逐步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这一切都是事实。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小农国家，这也是事实。而这一点却是主要的。只要这个主要之点还存在，列宁关于"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因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非空话这一论点就还是有效的。

列宁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以后（1921 年 3 — 4 月间）写的《论粮食税》一书的纲要中也说过同样的但是更加尖锐的话：

"如果经过十至二十年的电气化，小农的个人主义和他们在地方流转中的自由贸易就一点也不可怕了。如果没有电气化，回到资本主义去反正是不可避免的。"

又说：

"只要在十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二十至四十年白卫恐怖的苦难。"（《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6 卷第 313 页）①

列宁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或者电气化，即"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或者回到资本主义去。

列宁对于"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的问题就是这样了解的。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313 页。——编者注

这里问题不在于对农民表示爱抚，并把这看作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的方针，因为靠爱抚是做不出大事来的；问题在于帮助农民把他们的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因为这是使农民摆脱贫困的基本道路。

可是，不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首先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把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是不可能的。

迫使我们要高速度发展工业的内部条件就是如此。

使我国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定得很紧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就是如此。

我们的经济计划(无论预算内的或预算外的)所以很紧，并规定向基本建设大量投资以保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其根源就在这里。

有人会问：提纲中什么地方，提纲中哪一部分谈到了这一点呢？(有人喊道："是呀，什么地方谈到了这一点呢？")提纲中规定的1928—1929年度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就说明了这一点。要知道，我们把提纲叫作控制数字提纲。同志们，好象是这样的吧？(有人喊道："是的。")那么，在这个提纲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在1928—1929年度投入工业基本建设的资金为十六亿五千万卢布。换句话说，我们本年度投入工业的资金比上年度多三亿三千万卢布。

由此可见，我们不仅保持了工业的发展速度，而且还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工业投资比上年度多，也就是说，使工业中的基本建设项目绝对地和相对地都增加了。

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提纲的主要点就在这里。可是有些同志看不到大象。他们只是对控制数字提纲的细节乱加批评，而最重要的东西却没有看见。

二
谷 物 问 题

我在上面所讲的是提纲中的第一个大问题——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现在来谈谈第二个大问题——谷物问题。提纲的特点是：它着重地提到整个农业特别是谷物业的发展问题。提纲的这种方针是否正确呢？我认为是正确的。早在七月全会[23]上就已经说过，整个农业特别是谷物业的**过分**落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最大弱点。

有人一讲到我们的农业落后于工业就抱怨，这当然是不严肃的。农业一向落后于工业，并且将来还会落后于工业。在我国工业高度集中而农业高度分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联合的工业当然要比分散的农业发展得快。由此也就产生了工业对农业的领导作用。因此，农业一般落后于工业，还不能作为提出谷物问题的理由。

只有当农业一般落后于工业变为农业的发展速度**过分**落后的时候，才出现农业问题，特别是谷物业问题。目前国民经济状况的特点是：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和工业区对商品粮食的需求大大增长的情况下，我们面前的事实是谷物业的发展速度**过分**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任务不在于把工业的发展速度**降低**到谷物业的发展水平（这样会使一切混乱起来，会使发展变成倒退），而在于使谷物业的发展跟上工业的发展速度，并把谷物业的发展速度**提高**到能够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无论工业或农业）迅速前进的水平。

或者我们解决这个任务，那么谷物问题也就会得到解决；或者我们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么社会主义的城市和小农的乡村之间的分裂就不可避免。

同志们，我们这里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谷物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的。

这是不是说我们谷物业的发展现在处于"停滞状态"，或者甚至"退化"了呢？弗鲁姆金在他的第二封信里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们根据他的要求，今天已经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各位委员了。他在这封信里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农业正处于"停滞状态"。他说："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在报刊上谈论退化，但是我们在党内不应当掩盖，这种落后等于退化。"

弗鲁姆金的这个论断是否正确呢？当然不正确！我们政治局委员完全不同意这个论断，而政治局的提纲和这种对谷物业状况问题的说明是根本不同的。

实际上，退化是什么？它在农业中应当表现在什么地方？显然，它应当表现在农业的后退、下降，表现在从新的经营方式倒退到旧的中世纪的经营方式。它应当表现在农民比如说由实行三圃制改为实行熟荒耕作制，由使用铁犁和机器改为使用木犁，由使用精选种子和纯种种子改为使用非精选种子和不良种子，由现代的农业文化降为低级的农业文化，如此等等。但是，难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诸如此类的事实吗？每年都有几万几十万户农民由实行三圃制改为实行四圃和多圃制，由使用不良种子改为使用纯种种子，由使用木犁改为使用铁犁和机器，由低级的农业文化转上高级的农业文化，这难道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这算什么退化呢？

弗鲁姆金总是喜欢抓住某些政治局委员的片言只字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十分可能，他这次将竭力抓住布哈林的片言只字，以便

证明布哈林在他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也是这样”说的。但布哈林远不是“也是这样”说的。布哈林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是退化的可能性或危险性这一抽象的理论问题。抽象地说，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可能的和合乎情理的。而弗鲁姆金做的是什么呢？他把退化的可能性这一抽象问题说成农业退化的**事实**了。这就是他所谓对谷物业状况的分析！同志们，这不是很可笑吗？

如果苏维埃政权在它建立的第十一年竟使农业退化了，那它还好在哪里！这样的政权应该赶走，不应该支持。如果这个政权真的使农业退化了，那么工人们早就把它赶走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专家向我们叫嚷退化，他们甚至睡觉都梦见农业退化。有一个时候托洛茨基向我们叫嚷过退化。我没有料到弗鲁姆金也会走上这条可疑的道路。

弗鲁姆金关于退化的断言的根据是什么呢？首先是今年我们的谷物播种面积比去年小了些。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也许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当然不是。这是因为乌克兰草原地带和北高加索部分地区的秋播作物遭灾，乌克兰的同一地区今夏又遭了旱灾。假如没有这些完全能左右农业的不利的气候条件，我们今年的谷物播种面积至少要比去年多一百万俄亩。

其次，他的断言的根据是我们今年的谷物总产量仅仅比去年稍微多一点（多七千万普特），而小麦和黑麦比去年少了两亿普特左右。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切情况呢？这也是因为遭了旱灾和秋播作物遭了霜灾。如果没有这些不利的气候条件，我们今年的粮食总产量就会比去年多三亿普特左右。怎么能把旱灾、霜灾等等这样一些对某些地区的收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撇开不谈呢？

现在我们提出的任务是：扩大播种面积百分之七，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百分之三，增加谷物总产量约百分之十。毫无疑问，我们将

采取一切办法来完成这些任务。但是，尽管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某些地区还是有可能又突然遭到霜灾或旱灾，发生局部的歉收；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使谷物总产量比我们计划的数字，或者甚至比今年的总产量有一定程度的减少。这是不是说农业"正在退化"，而这种"退化"应归咎于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呢？这是不是说我们使农民"失去了"经济刺激，我们"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呢？

几年以前托洛茨基就犯过这种错误，硬说"下雨"对农业没有作用。李可夫在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下驳斥了他。现在弗鲁姆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撇开对农业起作用的气候条件，力图把一切都归咎于我们党的政策。

要提高整个农业特别是谷物业的发展速度，必须采取哪些途径和方法呢？

必须采取的途径或方法有三个：

(一)提高个体贫农中农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扩大他们的播种面积；

(二)继续发展集体农庄；

(三)扩大原有的国营农场并发展新的国营农场。

关于这些，早在七月全会的决议中就已经说过了。提纲重申了七月全会上说过的东西，但是把问题提得更具体，提出了这方面一定的投资数字。弗鲁姆金在这里又找到借口来吹毛求疵了。他认为，既然把个体经济放在第一位，而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放在第二位和第三位，那么这无非是表明他的观点胜利了。同志们，这是可笑的。当然，如果从某些农业形式的比重来看问题，那就应当把个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因为个体经济出产的商品粮食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几乎多五倍。但是，如果从经济类型，从哪一种经济形式最接近我们来看问题，那就应当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放在

第一位，因为和个体农民经济比较起来，它们是农业的高级类型。这两种看法对我们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这难道还要证明吗？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在所有这三个方面进行，使农业首先是谷物业的发展速度在实际上提高呢？

为此首先必须使我们党的干部的注意力转到农业方面来，使他们特别注意谷物问题中的具体问题。应当抛弃关于**一般**农业的泛论和空谈，而最终转到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制定提高谷物业的**实际**措施。已经到了从言论转为行动并最终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了，即研究**怎样**提高个体贫农中农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扩大他们的播种面积，**怎样**改进并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怎样**组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供给农民优良种子和良种牲畜方面帮助农民，**怎样**通过农具租赁站用机器和其他农具帮助农民，**怎样**扩大并改进预购的工作和一般农业合作社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有人喊道："这是实际主义。"）这种实际主义是我们绝对需要的，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有把解决谷物问题这一极重要的工作淹没在关于一般农业的空谈中的危险。

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我们的主要产粮区的负责工作人员在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作一些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具体报告。在这次全会上，你们将要听到安德列也夫同志关于解决北高加索谷物问题的途径的报告。我想，以后我们还要陆续听取乌克兰、中部黑土地区、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等地区的类似的报告。为了把党的注意力转到谷物问题方面来，并最终使我们党的干部转上具体地提出和谷物问题有关的问题的轨道，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

其次，必须使我们党的农村工作人员在其实际工作中把中农和富农严格地区别开来，不要把他们搅在一起，不要在应该打击富农的时候打到中农身上。现在总该是消灭这些所谓错误的时候

了。例如拿个别税的问题来说吧。我们的政治局的决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个别税的征收面不得超过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就是说，只向最富裕的一部分富农征收。但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有许多地区征收面扩大到百分之十或十二，甚至更多，因此触犯了中农。现在还不到结束这种罪行的时候吗？

可是我们亲爱的"批评家们"不去拟定消灭诸如此类的恶劣现象的具体办法，而去考究字眼，提议把"最富裕的一部分富农"改为"最有实力的一部分富农"或"最上层的一部分富农"。好象这些并不是一个意思！已经证实：在我国富农约占百分之五。已经证实：按照法律应该缴纳个别税的农户只占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即最富裕的一部分富农。已经证实：在实践中许多地区违反了这项法律。而"批评家们"不去拟定消灭这些现象的具体办法，却在字眼上进行无谓的批评，不愿意了解这样做是丝毫无济于事的。十足的书呆子！（有人喊道："有人提议向所有的富农征收个别税。"）这么说来，就应当要求废除只向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的农户征收个别税的法律了。可是，我倒没有听到有谁要求废除关于个别税的法律。有人说，随意扩大个别税征收面的目的是为了补充地方预算。但是，补充地方预算是不能用违反法律、违反党的指示的方法的。我们党还存在，它还没有被消灭。苏维埃政权还存在，它还没有被消灭。如果地方预算的经费不够，就应该提出地方预算的问题，而不应该违反法律，不应该取消党的指示。

再其次，必须继续加强对个体贫农中农农户的刺激。毫无疑问，粮价的提高，革命法制的实际执行，用预购的方式给予贫农中农农户的实际帮助等等，将大大地增进对农民的经济刺激。弗鲁姆金认为我们扼杀了或几乎扼杀了这种刺激，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这当然是胡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令人不能理解：工人阶

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他们的联盟究竟依靠什么？不能认为这种联盟是精神上的联盟。终究必须了解，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打算盘的联盟，是两个阶级的利益的联盟，是工人和基本农民群众以互利为目的的阶级联盟。很明显，如果我们扼杀了或几乎扼杀了对农民的经济刺激，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结合，就不会有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显然，这里所指的不能是"创造"或"挑起"对贫农中农群众的经济刺激，而只能是增进这种刺激，继续加强这种刺激，使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相互有利。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提纲所指的正是这一点。

最后，必须加强对农村的商品供应。我指的一方面是消费性的商品，另一方面特别是能够提高农产品生产的具有生产性的商品（机器、肥料等等）。不能说我们在这方面一切都很好了。你们知道，商品缺乏的现象还远没有消除，而且大概不会很快消除。我们党内某些人有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立刻就能消除商品缺乏的现象。可惜这是不对的。要知道，商品缺乏的现象，第一，是和工农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巨大增长有联系的，商品的生产虽然逐年增加，但是还不能满足全部需求；第二，是和目前的工业改造时期有联系的。

工业的改造意味着把资金从消费资料的生产方面转到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去。不这样做，就没有而且不可能有重大的工业改造，尤其在我们苏维埃的条件下。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把钱投入新企业的建设，城市和新消费者的数量不断地增加，而这些新企业只有在三四年以后才能出产大批新商品。不难了解，这种情况是不会有助于消除商品缺乏现象的。

这是不是说，在商品缺乏的现象面前我们只好束手无策呢？不，不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我们能够而且应当采取具体办法来

缓和、减少商品缺乏的现象。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我们立即应当做到的。为此必须竭力加强那些和提高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工业部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沃罗涅什选种筒制造厂以及其他等等）。其次，为此必须尽可能地加强那些和增加稀缺商品（呢绒、玻璃、钉子等等）有关的工业部门。如此等等……

库比雅克说，从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看来，本年度用于个体农民经济的款项比上年度少。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库比雅克大概没有把我们本年度用预购的方式给农民的约三亿卢布的贷款（比上年度几乎多一亿卢布）计算在内。如果估计到这个情况（而这个情况是不能不估计到的），那么可以看出，我们本年度用于发展个体农民经济的款项比上年度多。至于新旧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这方面本年度投入的资金将近三亿卢布（比上年度多一亿五千万卢布左右）。

应当特别注意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预购的方法。不能把这些东西看作仅仅是扩大我们商品粮食资源的手段。它们同时还是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结合的新形式**。

关于预购的方法我们已经讲得很多，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谁都明白，普遍采用预购的方法有助于把个体农户所做的努力联合起来，使国家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固定起来，从而使城乡结合巩固起来。

我希望你们注意集体农庄，特别是注意国营农场，把它们看作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促进农业改造的杠杆，是在农民的头脑中引起革命并帮助他们摆脱因循习气、守旧思想的杠杆。拖拉机、大型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队在我们产粮区出现，对于周围的农民经济不会没有作用。用种子、机器、拖拉机帮助周围的农民，无疑会被农

民评价为和看作是竭力引导他们走上农业大大提高的康庄大道的苏维埃国家力量和威力的标志。这个情况我们过去没有估计到，现在大概也还估计不足。但是，我认为这是目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解决谷物问题和巩固新的结合形式方面所起的和所能起的最主要的作用。

我们在解决谷物问题方面的工作应当采取的途径和方法大体上就是如此。

三
关于反对各种倾向和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的斗争

现在来谈谈我们提纲中的第三个大问题——关于离开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问题。

各种倾向的社会基础是：小生产在我国占优势，从小生产中不断生长出资本主义分子，我们党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以及我们党的某些环节为这种自发势力所侵蚀。

各种倾向的社会基础基本上就是如此。

所有这些倾向都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

这里指的主要是右倾。右倾究竟是什么呢？它的趋向是什么呢？它的趋向是迁就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使我们的政策迁就"苏维埃的"资产阶级的口味和要求。

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那对我们会有什么危险呢？这就会使我们党在思想上被粉碎，使资本主义分子放肆起来，使资本主义复辟或象列宁所说的"回到资本主义去"的机会增多。

右倾的趋向主要潜伏在什么地方呢？潜伏在我们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合作社机关和工会机关中，也潜伏在党的机关特别是党的农村下层环节中。

我们党员中间有没有表现右倾的人呢？无疑是有的。李可夫举出反对建设第聂伯河建筑工程的沙屠诺夫斯基为例。毫无疑问，沙屠诺夫斯基犯了右倾即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但是，我还是认为沙屠诺夫斯基用来说明右倾特征、右倾面目并不典型。我认为在这方面第一把交椅应当让弗鲁姆金去坐。(笑声) 我指的是他的第一封信（1928 年 6 月）以及在这里已经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各位委员的他的第二封信(1928 年 11 月)。

现在把这两封信分析一下。我们先看一看第一封信的“基本论点”。

(1)“**农村中除了一小部分贫农，都有反对我们的情绪。**”这是不是事实呢？显然不是事实。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我们就连一点结合的影子都不会有了。要知道，从 6 月（信是在 6 月写的）到现在已经快半年了，只要不是瞎子，谁都会看到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仍然存在并日益巩固。弗鲁姆金写这种和事实不符的东西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恐吓党，使党向右倾让步。

(2)“**最近采取的方针使中农基本群众感到没有希望，没有前途。**”这是不是事实呢？完全不是事实。很明显，如果今年春季我们已经使中农基本群众感到在经济上没有希望，没有前途，那么所有主要产粮区的中农就不会扩大春季播种面积了。我国春季播种是在 4—5 月间进行的。而弗鲁姆金的信是在 6 月写的。在我国，在苏维埃政权下，谁是粮食的主要收购者呢？是国家以及和国家相联系的合作社。很明显，如果中农群众苦于经济上没有前途，如果他们处于和苏维埃政权“破裂”的状态，那他们就不会按照国

家这个粮食主要收购者的愿望去扩大春季播种面积了。弗鲁姆金的话显然和事实不符。弗鲁姆金在这里也竭力想以没有前途这种"惨象"来恐吓党，使党向他弗鲁姆金的观点让步。

（3）**"应当回到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去。"**在这里讲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3]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是无庸置疑的。这句话的重点不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而在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5]去这个口号。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放弃"加紧向富农进攻"（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我这样说，是因为弗鲁姆金以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的口号来否认党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前进的一步，而否认这前进的一步就是把党拉向后退。中央七月全会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结论。全会在决议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企图避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这一决定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倾向在我国的表现"。我现在直截了当地告诉弗鲁姆金，政治局在七月全会的决议中所说的这一点就是指的弗鲁姆金和他的第一封信。

（4）**"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加入集体的贫农。"**我们从来就是尽力和尽可能地给予那些加入或甚至没有加入集体的贫农以最大限度的帮助的。这里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比较起来，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新东西并不是这一点，而是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全力发展集体农庄运动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弗鲁姆金嘴里说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加入集体的贫农，实质上是对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全力发展集体农庄运动这一党的任务敷衍推诿。弗鲁姆金实质上是反对展开从集体农庄方面来加强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工作。

（5）**"不要用突击的和超突击的方式扩展国营农场。"**弗鲁姆

金不会不知道，我们不过刚刚开始认真地进行扩大原有的国营农场和建立新的国营农场这一工作。弗鲁姆金不会不知道，如果我们有一笔用于这个目的的后备资金，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所应拿出的钱要比我们现在拿出的多得多。"用突击的和超突击的方式"这样的字眼，在这里是用来引起人们的"恐怖"，并以此掩饰自己不愿意稍微认真地扩展国营农场。弗鲁姆金实质上是在这里反对从国营农场方面来加强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

你们现在把弗鲁姆金的所有这些论点汇集起来，就会得到说明右倾的一个总的概念。

现在来看一看弗鲁姆金的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信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它加深了第一封信的错误。第一封信里说中农经济没有前途，而第二封信里则说农业"退化"。第一封信里说要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即放松对富农的进攻，而第二封信里则说"我们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第一封信里关于工业只字未提，而第二封信则发挥了少向工业建设投资的"新"理论。但是，这两封信有两点是一致的，就是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看法是一致的。弗鲁姆金在两封信里都反对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显然，第二封信加深了第一封信的错误。

关于"退化"论我已经说过了。毫无疑问，这个理论是那些一味叫喊苏维埃政权要灭亡的资产阶级专家捏造的。弗鲁姆金让那些栖身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周围的资产阶级专家把自己吓倒了，而现在他自己又企图恐吓党，想使党对右倾让步。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也讲得够多了，因此不必再重复了。让我们来看看其余两点：关于富农经济和关于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

关于富农经济。弗鲁姆金说："**我们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不妨碍富农发展他们的剥削经济。

而不妨碍富农发展他们的剥削经济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放纵农村资本主义，给它自由，让它发展。这恰恰是法国自由主义者的老口号："让他做吧，让他走吧"[26]，就是说，不要妨碍资产阶级干它自己的事，不要妨碍资产阶级自由行动。

这个口号是法国的老自由主义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同束缚资产阶级而不让它发展的封建政权进行斗争的时期提出的。这样说来，我们现在应当从**社会主义的**口号——"要不断加强对资本主义成分的限制"（见控制数字提纲），转**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口号——不要束缚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怎么，难道我们想由布尔什维克变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吗？弗鲁姆金的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口号和党的路线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弗鲁姆金："斯大林同志，请把其他几点也读出来。"）我把这一点全读出来："我们也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同时要和它的奴役性的剥削作斗争**。"怎么，可敬的弗鲁姆金，难道你以为下半句话会使情况变好而不会变坏吗？和奴役性的剥削作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和奴役性的剥削作斗争这个口号是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或半封建的剥削方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我们发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确实提出过这个口号，并且把我们力求消灭的奴役性的剥削方式和我们当时因资产阶级制度仍然存在而不能限制和消灭的非奴役性的、所谓"进步的"剥削方式区别开来。但是那时我们要建立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现在，如果我没有弄错，我们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所持的方针是而且不能不是消灭一切剥削方式，其中包括"进步的"剥削方式。你怎么能要我们从正在发展并向前推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向后转，退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上去呢？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呢？

其次，不妨碍富农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富农自由。

而给富农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他们政权。法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要求封建政权不妨碍资产阶级发展的时候，提出的具体要求就是给资产阶级政权。当时他们是对的。资产阶级为了得到充分的发展，就必须要有政权。因此，如果推论下去，那就应当说：让富农参加政权。因为终究必须了解：剥夺富农的政权而把它集中在工人阶级的手中，就不能不束缚富农经济的发展。这些就是读了弗鲁姆金的第二封信自然得出的结论。

关于工业的基本建设。在讨论控制数字的时候，我们面前有三种数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请求八亿二千五百万卢布，国家计划委员会给七亿五千万卢布，而财政人民委员部只同意给六亿五千万卢布。我们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是怎样决定的呢？党中央决定给八亿卢布，也就是说，比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整整多一亿五千万卢布。财政人民委员部给得少，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谁都知道财政人民委员部吝啬，它也不能不吝啬。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弗鲁姆金所以坚持只给六亿五千万卢布，并不是由于吝啬，而是以新创的"可能"论为根据的，他在他的第二封信和在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上发表的一篇专论中断言：**如果我们拨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超过六亿五千万卢布，那就必定会使我们的经济状况恶化。**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弗鲁姆金反对保持现在工业发展的速度，显然，他不了解降低这个速度才真的会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状况恶化。

你们现在把弗鲁姆金第二封信里关于富农经济和关于工业基本建设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加上"退化"论，你们就会看到右倾的面目了。

你们想知道什么是右倾，右倾是什么样子吗？读一读弗鲁姆金的两封信，研究一下，你们就会明白了。

关于右倾面目的问题就是如此。

但是，提纲不仅谈到右倾，还谈到所谓“左”倾。什么是“左”倾呢？我们党内是否真有所谓“左”倾呢？我们党内是否有象我们提纲中所说的反中农倾向，超工业化倾向等等呢？是的，是有的。它们究竟是什么呢？它们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七月全会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我指的是七月全会关于粮食收购政策的著名决议，在这个决议中谈到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那些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向后退的人（这是右派），也反对那些要把非常措施变为党的经常方针的人（这是“左派”，是托洛茨基主义倾向）。

很明显，我们党内有托洛茨基主义因素和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举行争论的时候，好象将近有四千人投票反对我们的政纲。（有人喊道：“有一万人”。）我想，如果投票反对的党员有一万，那么因为没有到会而根本没有投票的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党员该有两万了。这就是那些没有退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应当认为这些人还没有摆脱托洛茨基主义。此外，我认为一部分后来脱离托洛茨基组织回到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还没有来得及抛弃托洛茨基主义，而且他们大概也不反对在党员中间散布自己的观点。最后，在我们党的一些组织中，托洛茨基主义又有些抬头了。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你们就会得到一切必要的因素来说明党内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存在。

这是很明显的：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存在的情况下，在这种自发势力向我们党侵袭的情况下，我们党内不会没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逮捕托洛茨基派的骨干或者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是一回事。肃清托洛茨基主义，这是另一回事，这会更困难一些。我们说：哪里有右倾，那里就必定有“左”倾。“左”倾是右倾的影子。列宁谈到召回派[27]时说过，“左派”也就是孟什维克，只不过是改头换

面的孟什维克。这是完全正确的。关于现在的"左派"也应该这样说。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实质上也就是右派，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右派，是用"左的"词句掩饰起来的右派。

因此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

有人会说：既然"左"倾实质上也就是右的机会主义倾向，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别何在？两条战线究竟何在？的确，既然右派获得胜利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增多，而"左派"获得胜利也会引起同样的后果，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把一些人叫作右派，把另一些人叫作"左派"？如果它们之间有差别，那么差别何在？两种倾向的社会根源是一个，两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这难道不对吗？如果这两种倾向获得胜利，它们所引起的后果是完全相同的，这难道不对吗？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别究竟何在？

差别就在于它们的政纲不同，要求不同，办法和手段不同。

例如右派说，**"不应当建设第聂伯河建筑工程"**，相反地，"左派"反对说，**"一个第聂伯河建筑工程对我们来说算什么，我们要每年建设一个第聂伯河建筑工程"**，(笑声)——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

右派说，**"不要碰富农，让他们自由发展吧"**，相反地，"左派"反对说，**"不仅要打击富农，而且还要打击中农，因为中农也和富农一样是私有者"**，——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

右派说，**"困难来了，还不是屈服的时候吗"**，相反地，"左派"反对说，**"困难对我们来说算什么，你们所说的困难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我们要开足马力向前飞奔"**，(笑声)——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

这就是"左派"的独特政纲和独特手段的一幅图画。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左派"有时能够用"左的"令人听闻的词句诱惑一部分工

人，并且能够把自己装扮成右派的最坚决的反对者，虽然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左派"的社会根源和右派是一样的，他们常常和右派达成协议，结成联盟来反对列宁的路线。

正因为如此，我们列宁主义者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

但是，既然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是"左"倾，这是不是说"左派"比列宁主义还左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列宁主义是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左的**（不带引号的）一派。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前的时期，我们列宁主义者是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极左派加入第二国际的。我们没有留在第二国际，我们在第二国际中宣传分裂，是因为我们正是作为极左派不愿意和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叛徒，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以及社会沙文主义者处在一个党内。

这个策略和这种思想后来就成了世界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是**唯一**不带引号的左派。因此，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政党。我们在自己的党内不仅同那些被我们叫作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分子的人作斗争，而且同那些想比马克思主义"更左"，比列宁主义"更左"，以"左的"耸人听闻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右的机会主义本质的人作斗争。

谁都会明白，把那些还没有摆脱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人叫作"左派"，这应当了解为讽刺。列宁把"左派共产主义者"[28]叫作左派，有时候加引号，有时候不加引号。但是谁都会明白，列宁把他们叫作左派，是讽刺他们，是以此着重指出他们仅仅在口头上，在表面上是左派，而在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的倾向。

既然托洛茨基分子昨天还和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结成统一的反列宁主义的联盟，真正直接地和国内反苏维埃的阶层勾结起

来，那他们怎么能谈得上是左派(不带引号的)呢？“左派”和右派昨天还公开地结成联盟来反对列宁的党，这个联盟显然得到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而这难道不是说明了，如果“左派”和右派没有共同的社会根源，如果他们没有共同的机会主义本质，他们就不会结成统一的联盟吗？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在一年前瓦解了。一部分类似沙屠诺夫斯基的右派分子退出了这个联盟。因此，联盟的右派今后将正是以右派的面目出现，而“左派”将以“左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右的实质。但是，有什么保证能说“左派”和右派不会再搅在一起呢？(笑声)很明显，这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保证的。

既然我们坚持两条战线斗争的口号，这是不是说我们这样就是宣布我们党内必须有**中派主义**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中派主义呢？你们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正是把事情说成这样的：有“左派”，这就是“我们”托洛茨基分子，“真正的列宁主义者”；有“右派”，这就是其余一切人；还有“中派”，他们摇摆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能不能认为对我们党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呢？显然不能。只有那些把一切概念都混淆起来的、早已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只有那些看不见和不了解战前时期的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利益和小资产阶级利益**联盟**的党)和共产党（革命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党）之间的**原则差别**的人才会这样说。

不能把中派主义看作一个空间的概念：比如说，一个地方坐的是右派，另一个地方坐的是“左派”，而中间坐的是中派。中派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思想体系是迁就的思想体系，是**在一个共同的党内**使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和列宁主义相违背、相对立的。

中派主义对于战前时期的第二国际来说是自然的现象。第二国际中有右派(占多数)，有左派(不带引号的)，也有中派，中派的全部政策就是以左的词句来粉饰右派的机会主义，并使左派服从右派。

那时以布尔什维克为核心的左派的政策是什么呢？是同中派作坚决的斗争，争取同右派分裂（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后)，建立由真正的左派，由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革命的新国际。

为什么那时会产生第二国际内部的这种力量配置和布尔什维克在第二国际中的这种政策呢？因为那时第二国际是迎合小资产阶级社会和平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一个无产阶级利益和小资产阶级利益**联盟**的党。因为那时布尔什维克不能不集中火力反对企图使无产阶级成分服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派。因为那时布尔什维克必须宣传分裂思想，不这样无产者就不能建立自己的一个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

能不能断定说，在我们共产党内也有同样的力量配置，在我们党内也应当实行布尔什维克在战前时期第二国际各党内实行过的那个政策呢？显然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这就是不了解社会民主党这个无产阶级成分和小资产阶级成分**联盟**的党和革命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共产党之间的**原则差别**。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党的阶级基础是一种，在共产党人这里党的阶级基础完全是另外一种。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中派主义是自然的现象，因为不同利益联盟的党不会没有中派，而布尔什维克也必须采取分裂路线。在共产党人这里，中派主义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是和列宁的党性不相容的，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党，而不是不同阶级成分联盟的党。

正因为我们党的统治力量是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最左派（列宁主义者），所以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在我们党内实行分裂政策是没有而且不能有任何理由的。（有人喊道："在我们党内有没有分裂的可能？"）这里谈的不是分裂的可能性，而是在我们这个一个阶级的列宁的党内实行分裂政策，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是不能认为有理由的。

谁不懂得这个原则差别，谁就是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谁就是和列宁主义决裂。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只有发了疯的和失去了最后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的人才能当真断定说，我们党的政策，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政策是中派主义的政策。

列宁在我们党内向来都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派"，又反对明显的孟什维主义倾向。看一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看一看我们党的历史，你们就会知道，我们党是在反对两种倾向，即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一方面同召回派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作斗争，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期间以及在十月革命以后，同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这就是我们党在自己的发展中所经过的阶段。大家都知道列宁的一句话：我们必须进行既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学理主义者的斗争。

这是不是说列宁就是中派主义者，他实行了中派主义的政策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的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说到右倾，它当然不是战前时期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倾向还不等于是机会主义。我们知道列宁当时是怎样解释倾向这个概念的。右的倾向，这是一种还没有形成机会主义的而

且是可以纠正的倾向。因此，不能把右的倾向和已经形成的机会主义看成一个东西。

说到“左”倾，它是一种和战前时期第二国际中的极左派即布尔什维克绝对相反的东西。“左”倾分子不仅不是不带引号的左派，而且他们实质上也就是右倾分子，不过和右倾分子有差别，就是他们不自觉地以“左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真正本质。看不到“左”倾分子和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这个我们党内的**唯一的**左派（不带引号的）之间的全部深刻差别，就是对党的犯罪行为。（有人喊道：“而使各种倾向合法化呢？”）如果同各种倾向进行公开斗争就是使它们合法化，那就应当承认，列宁早已使它们“合法化了”。

他们这些倾向分子，无论右派或“左派”，都是从非无产者阶层的各色各样分子中招募来的，这些分子反映着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党的侵袭和党的个别环节的腐化。一部分来自其他政党的人，党内具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人，从前党内各种派别的残余，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合作社机关和工会机关中正在官僚主义化的（和已经官僚主义化的）并且和这些机关中明显的资产阶级分子勾结在一起的党员，我们农村组织中和富农结合起来的富裕党员，以及其他等等，——这就是离开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的培养基。很明显，这些分子不能接受任何真正左派的和列宁主义的东西。他们只能培养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或者培养以左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所谓“左”倾。

正因为如此，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党的唯一正确的政策。

其次，提纲中说，展开思想斗争应当是我们同右倾作斗争的**主要方法**，这是否正确呢？我认为是正确的。这里最好回忆一下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经验。我们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是从何着手的呢？也许是从组织处理着手的吧？当然不是！我们是从思

想斗争着手的。这个斗争从1918年进行到1925年。在1924年，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29]就已经作出决议说托洛茨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倾向。但是托洛茨基还留在我们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这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可见我们"容忍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留在中央。为什么我们容许他们留在党的领导机关呢？因为当时托洛茨基分子虽然和党有分歧，对中央的决议还是服从的，对党还是忠顺的。什么时候我们才开始比较大规模地进行组织处理呢？只是在托洛茨基分子组织了派别，成立了自己的派别中央，把自己的派别组织变为新的党并开始号召人们举行反苏维埃游行以后。

我认为我们同右倾作斗争也应该走这条道路。虽然右倾正在党内增长，但是目前还不能把它看作一种已经形成和定形的东西。它仅仅是在形成和定形中。右倾分子有没有派别组织呢？我认为没有。能不能说他们不服从我们党的决议呢？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根据拿这一点来责备他们。能不能断言右倾分子一定会组织自己的派别呢？我对这一点是怀疑的。因此结论是：展开思想斗争应当是我们**现阶段**同右倾作斗争的主要方法。这个结论所以正确，尤其是因为在我们某些党员中间有着相反的倾向：同右倾作斗争不从思想斗争着手，而从组织处理着手。他们直截了当地说：你给我们指出十个二十个右倾的人吧，我们一转眼就会把他们粉碎，这样就铲除了右倾。同志们，我认为这种情绪是不对的和危险的。正是为了不致随着这种情绪东飘西流，为了把反对右倾的斗争引上正确的轨道，必须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思想斗争是我们**现阶段**同右倾作斗争的主要方法。

这是不是说我们排斥任何组织处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但毫无疑问这是说，组织处理在这里应起从属作用；既然右倾分子没

有破坏党的决议，我们就不应当把他们赶出这些或那些领导组织和领导机关。（有人喊道："莫斯科的做法呢？"）

我认为莫斯科的领导同志中间未曾有过右倾分子。那里有过对右倾情绪的不正确的态度。甚至可以说，那里有过调和倾向。但是我不能说，莫斯科委员会中有过右倾。（有人喊道："组织斗争不是有过吗？"）

组织斗争是有过的，虽然只占从属地位。有过这种斗争是因为莫斯科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改选，而且各区积极分子会议有撤换他们的书记的权利。（笑声）（有人喊道："难道我们宣布过改选书记吗？"）谁也没有禁止过改选书记。中央的六月宣言[30]明确指出，如果不能保证下层组织有撤换任何书记和任何委员会的权利，那么开展自我批评就会成为空谈。你能用什么话来反对这样的宣言呢？（有人喊道："在党代表会议以前吗？"）是的，即使在党代表会议以前。

我看到某些同志的脸上流露出捉弄人的微笑。同志们，这是不好的。我看到你们中间有些同志迫切地盼望尽快撤销某些表现右倾的人的职务。但是，亲爱的同志们，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撤销职务比开展一个解释运动来广泛地透彻地把右倾、右倾危险以及反右倾斗争的问题解释清楚要容易。但是不能认为最容易的就是最好的。要努力组织广泛的反对右倾危险的解释运动，不要吝惜时间，这样你们就会看到，运动愈广泛愈深入，对右倾就愈不利。所以，我认为思想斗争应当是我们反右倾斗争的中心环节。

至于说到莫斯科委员会，我不知道对于乌格拉诺夫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作结论时所说的话还能做些什么补充。他坦白地声明：

“如果稍微回忆一下历史，回忆一下1921年我在列宁格勒和季诺维也夫作战的情形，就会知道当时‘激战’的规模比现在大些。当时我们战胜了，因为我们是对的。现在我们打败了，因为我们错了。这对我们是会有益的。”

可见乌格拉诺夫现在进行了斗争，如同他当时进行过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一样。但是他最近进行斗争究竟是反对谁呢？看来是反对中央的政策。还能是反对谁呢？这个斗争在什么基础上才能进行呢？显然是在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基础上。

因此，提纲完全正确地强调必须反对对离开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特别是反对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认为这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之一。

最后一个问题。提纲中指出，我们目前应当特别强调同右倾作斗争的必要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右倾危险在目前是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斗争，并且是集中火力的斗争，我们已经进行了十年。这个斗争的结果是击溃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骨干。不能说，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最近也进行得同样激烈。这种斗争所以没有进行得特别激烈，是因为右倾在我们这里还处在形成和定形的时期，它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加强（与我们的粮食收购困难有关）而正在加强和增长起来。所以主要的打击应当对准右倾。

同志们，我在结束讲话之前还想指出一个在这里没有谈到的事实，这个事实在我看来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政治局委员向你们提出了控制数字提纲。我在演说中维护了这个提纲，说它是绝对正确的。我不谈对这个提纲可能提出的个别修正。但是，这个提纲基本上是正确的，它能保证我们正确执行列宁的路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里我应当向你们声明，这个提纲是我们在政

治局内一致通过的。我认为这个事实多少有些意义，因为一切对我们党不怀好意的人、反对我们党的人以及我们党的敌人不时在我们队伍里散布谣言。我指的谣言是：说我们政治局内有右倾、"左"倾、调和态度以及鬼才晓得的其他什么东西。就让这个提纲作为我们全体政治局委员团结一致的再一次，第一百次或第一百零一次的证明吧。

我希望这次全会同样一致地通过这个提纲作为基础。(鼓掌)

载于1928年11月24日
《真理报》第273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
第212—249页

答库什特谢夫

库什特谢夫同志：

1928年12月11日的来信收到了。

你的问题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正确的。实际上它经不起任何的批判。不难了解，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①，既不是要说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将有怎样一种政权，也不是要说明如果我们认真地实行国家电气化，就等于已经实现共产主义了。

列宁讲这句话是要说明什么呢？在我看来，他不过是要说明：要走向共产主义，单靠苏维埃政权是不够的；要走向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必须使国家电气化，**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为了达到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决心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列宁的这句名言只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通过电气化走向共产主义。

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不是说我们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并废除了国家（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意味着国家的消亡）？或者，这是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会有阶级、国家等等存在？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既然如此，我们有没有权利把我们的共和国叫做社会主义共和国呢？当然有。这是从什么样的观点来看的呢？这是从我们**决心**和**准备**实现社会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80页。——编者注

主义、消灭阶级等等的观点来看的。

库什特谢夫同志，也许你同意听听列宁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吧？如果同意，就请听吧：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新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513页）①

看来已经清楚了。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1928年12月28日

第一次发表于《斯大林全集》第11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68—269页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40页。——编者注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

(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31]上的演说)
(速记记录)

同志们！我不想谈到个人因素，虽然在布哈林集团某些同志的发言中个人因素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我所以不想谈，是因为个人因素是小事，小事是不值得多谈的。布哈林谈到和我的私人通信。他读了几封信，从这几封信中可以看出，我们昨天在私人关系上还是朋友，现在却在政治上发生分歧了。乌格拉诺夫和托姆斯基的发言也流露出这种口气。他们说，怎么会这样，我们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可是突然彼此之间发生分歧，不能互相尊敬了。

我认为所有这些怨言和号叫是一个破钱都不值的。我们不是家族集团，不是私人友谊团体，而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决不容许把私人友谊的利益摆在事业的利益之上。

同志们，如果我们被称为老布尔什维克只是因为我们**老**，那我们的事情就糟了。老布尔什维克所以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老**，而是因为他们同时又是永远年轻而不衰老的革命者。如果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离开了革命道路，或者在政治上颓废和堕落了，即使他活到一百岁，他也没有权利称为老布尔什维克，他也没有权利

① 在这篇演说中补进了当时报刊上没有发表的三十多页原文。——《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编者注

要求党尊敬他。

其次，决不能把私人友谊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常言道，友谊是友谊，公事是公事。我们都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如果私人友谊的利益和革命利益发生冲突，那就应该把私人友谊放在次要地位。作为布尔什维克，我们只能这样提出问题。

我也不想谈到布哈林反对派某些同志的发言中所夹杂的那些对个人的暗示和隐约的责备。看来这些同志想用暗示和双关语来掩盖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政治基础。他们想用政客手腕来代替政治。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是托姆斯基的发言。他的发言是一个企图用政客手腕代替政治问题的工联主义政客的典型发言。但是，他们这套把戏是骗不了人的。

现在我们来谈本题。

一

一条路线还是两条路线？

我们有一条共同的总路线还是有两条路线，——同志们，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李可夫在这里发言时说，总路线我们只有一条，如果说我们有某些“不大的”意见分歧，那么这是因为在对总路线的理解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这样说对不对呢？可惜不对。不但不对，而且和事实完全相反。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路线是一条，只是我们在理解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那么，为什么布哈林跑到以加米涅夫为首的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去，企图和他们组织派别联盟来反对中央和中央政

治局呢？布哈林在那里说中央的路线会“招致灭亡”，说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党中央有原则性的分歧，说必须彻底更换中央政治局的成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为什么布哈林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勾结起来进行反对中央的秘密活动呢？为什么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这件事上支持他呢？

如果总路线是一条，那么，怎么能设想遵循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会陷害遵循同一条总路线的另一部分委员呢？

难道能够设想，在存在着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的情况下会有这种倒戈政策吗？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布哈林1月30日的那个彻头彻尾反对中央及其总路线的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三人团（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2月9日的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在这个宣言中厚颜无耻地对党进行粗暴的诬蔑，责备党（一）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二）实行培植官僚主义的政策，（三）实行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

也许这两个宣言已经不复存在于世了？也许这两个宣言现在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了？也许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已经同意收回这两个无疑是错误的和反党的宣言了？那就让他们公开老实地告诉我们吧。那时大家就会明白，我们的路线是一条，只是我们在理解上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们不想这样做。不但不想这样做，而且也不打算在将来撤销他们的宣言，他们声称将继续坚持他们在这两个宣言中所陈述的观点。

既然如此，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究竟在哪里呢？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在布哈林集团看来又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那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难道想和我们一起实行这种会招致灭亡的政策而不和它进行斗争吗？这真是胡说八道。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在布哈林反对派看来又是培植官僚主义，那么，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难道想和我们一起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而不和它进行斗争吗？这真是无稽之谈。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在布哈林反对派看来又是瓦解共产国际，那么，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难道想和我们一起瓦解共产国际而不和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进行斗争吗？怎么能相信这种荒谬的话呢？

不是的，同志们，李可夫说我们有一条共同的路线，这话是不大对头的。不管怎样，如果看看刚才所说的布哈林集团在宣言和行动方面的事实，那就可以看出有一条共同路线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辞职政策是从哪里来的呢？在有共同的总路线的情况下，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一贯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屡次决议，在党内实行怠工达半年之久，难道这是可以设想的吗？如果我们确实有一条共同的总路线，那么，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竭力实行的这种瓦解性的辞职政策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实行辞职政策的例子。例如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一部分同志要求改变党的政策，拒绝担任委托给他们的职务。大家知道，当时他们实行辞职政策的理由是要求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32]一起成立联合政府，反对我们党中央实行成立清一色的布尔什维

克政府的政策。但是，当时的辞职政策是有意义的，因为它的根据是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其中一条路线主张成立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另一条路线主张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共同成立联合政府。这是很明白的，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布哈林反对派一方面宣称总路线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实行从十月革命时期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里抄袭来的辞职政策，那就丝毫不合逻辑了。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路线是一条，那么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辞职政策就是不可理解和无法解释的；或者我们的路线是两条，那么辞职政策就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可以解释的。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政治局中的三人团（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认为在政治局通过关于五年计划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提纲时可以**弃权**的事实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家的总路线是一条，而一部分同志在经济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竟放弃了表决权，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不，同志们，世界上是不会有这种怪事的。

最后，如果路线是一条，只是我们在理解上有细微的差别，那么，为什么布哈林反对派的同志们（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同意接受政治局委员会在今年2月7日向他们提出的和解方案呢？这个和解方案给布哈林集团指出了一条完全可以接受的出路，使他们能够摆脱他们自己所陷入的绝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下面就是大多数中央委员在今年**2月7日**提出的这个和解方案的原文：

“从委员会内部交换意见中查明：

（1）布哈林承认和加米涅夫谈判是政治错误；

（2）布哈林承认，他在1929年1月30日的‘声明’中关于中央实际上‘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论断，关于中央瓦解共产国际并在党内培

植官僚主义的论断，都是他在激烈辩论中冒火时说出来的，他不再坚持这些论断，并认为他在这些问题上和中央没有分歧；

（3）根据这一点，布哈林承认在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4）布哈林不再辞去《真理报》4 和共产国际方面的职务；

（5）因此，布哈林收回他在 1 月30日的声明。

根据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可以不向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提出从政治上评定布哈林的错误的决议草案，并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收回现有一切文件（发言的速记记录等等）。

委员会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布哈林在《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岗位上进行正常工作保证一切必要的条件。”

如果我们的路线确实是一条，只是我们在理解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那么，为什么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拒绝这个和解方案呢？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本来应当竭力抓住政治局向他们提出的这个和解方案，以便消除党内的紧张局面，造成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的环境，这难道很难理解吗？

有人谈到党的统一，谈到政治局内的集体工作。但是，谁想达到真正的统一并重视工作的集体性，谁就应当接受这个和解方案，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究竟为什么拒绝这个和解方案呢？

如果我们的路线是一条，那么天地间既不会有 2 月 9 日的三人团宣言，也不会有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拒绝中央政治局向他们提出的和解方案的事，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不，同志们，如果看看上面所说的事实，那就可以看出你们所说的有一条共同路线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可见实际上我们不是一条路线，而是两条路线，其中一条是中央的路线，另一条是布哈林集团的路线。

李可夫在他的发言中说我们的总路线是一条，这是说谎。他想以此掩饰他自己的那条不同于党的路线的路线，以便暗中破坏党的路线。机会主义的政策正是在于抹杀意见分歧，掩盖党内的真实情况，掩饰自己的立场，使党不能把问题完全弄清楚。

机会主义需要这样的政策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用路线一致的空谈做掩护，而在实际上执行它自己的那条不同于党的路线的路线。李可夫在这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中就是采取了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

不妨听一听列宁同志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对一般机会主义者所做的评定。这个评定对我们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它的一般意义，而且是因为它对李可夫完全适用。

列宁关于机会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特点是这样说的：

"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320页)①

这就是机会主义者的面目，他们害怕明确性和肯定性，力图掩盖事物的真实情况，抹杀党内真正的意见分歧。

是的，同志们，应当善于正视现实，不管现实多么令人不愉快。如果我们染上害怕真理的毛病，那就很危险了。布尔什维克同其他一切政党的区别之一就是他们不怕真理，不怕正视真理，不管真理多么令人痛苦。而现在的真理是：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99页。——编者注

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

这是用任何外交辞令，用任何关于只有一条路线的狡猾声明等等都掩盖不了的事实。

二
阶级变动和我们的意见分歧

我们的意见分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们是和什么有关的呢？

它们首先是和最近我们国内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所发生的阶级变动问题有关的。有些同志以为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带有偶然性。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是在最近发生的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造成了发展中的转变。

布哈林集团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看不见这种变动和这种转变，看不见而且不愿意看见这种变动和这种转变。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了解党和共产国际的新任务，而这种不了解就成了布哈林反对派的特征。

布哈林反对派的领导者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中完全避开了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问题，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甚至丝毫没有暗示一下我们的意见分歧正是和这种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有关的。同志们，这一点你们

是否注意到了呢？他们无所不谈，既谈哲学，又谈理论，但是对于决定当前我们党的方针和实际工作的那些阶级变动却一句话也没有提到。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也许是因为健忘？当然不是！政治家是不能忘记主要东西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和不了解目前我们国内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所发生的新的革命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主要东西，忽略了政治家没有权利忽略的阶级变动。正因为如此，布哈林反对派在我们党的新任务面前就显得张皇失措和束手无策。

请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党内最近的一些事件。请你们回想一下最近党因为我们国内发生新的阶级变动而提出的那些口号。我说的是这样一些口号：**自我批评**的口号，加强**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清洗苏维埃机关**的口号，**培养新的经济工作干部和红色专家**的口号，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的口号，**向富农进攻**的口号，**降低产品成本**和**彻底改进工会实际工作**的口号，**清党**的口号等等。有些同志觉得这些口号令人胆战心惊，头晕眼花。可是很明显，这些口号是当前党最迫切最需要的口号。

最初，我们因为沙赫特案件[2]而重新提出了新的经济工作干部的问题，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红色专家来代替旧专家的问题。

沙赫特案件表明了什么呢？沙赫特案件表明了：资产阶级还远没有被消灭，他们对我国经济建设正在组织而且以后还会组织暗害活动，我们的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一部分党组织忽略了我们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因此必须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来巩固并改善我们的组织，提高并加强我们组织的阶级警惕性。

因此就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评**口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不大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把我们各个组织的工作置于群众的

监督之下，就不能改善我们的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党组织，就不能把建设社会主义和镇压资产阶级暗害活动的工作向前推进。暗害活动不仅在产煤区，而且在金属生产方面，在军事工业方面，在交通人民委员部内，在金铂工业等等方面，都曾经发生并且继续在发生，这是事实。因此就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

其次，由于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由于富农进行反对苏维埃价格政策的发动，我们着重提出了全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向富农进攻、对富农和富裕分子使用强迫手段收购粮食的问题。

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表明了什么呢？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表明了：富农并没有打瞌睡，富农在发展，他们在暗中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而我们的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和合作社组织，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不是看不见敌人，就是迁就敌人，不和敌人作斗争。

因此就再一次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提出了检查和改善我们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一般收购机关的口号。

再其次，由于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工业和农业的新任务，就产生了不断降低产品成本、加强劳动纪律、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等等口号。这些任务要求重新审查工会和苏维埃机关的全部实际工作，彻底活跃这些组织，并清除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分子。

因此就着重提出了反对工会和苏维埃机关里的官僚主义的口号。

最后，关于清党口号的问题。如果以为不砸碎党本身就可以巩固我们的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就可以清除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恶习，那就可笑了。毫无疑问，官僚主义分子不仅在经济组织、合作社组织、工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里存在着，而且还在党本身的各级组织里存在着。既然党是所有这

些组织的领导力量，那么很明显，清党是彻底活跃和改善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的必要条件。因此就提出了清党的口号。

这些口号是不是偶然的呢？不，不是偶然的。你们自己可以看出，这些口号不是偶然的。**它们是一根分不开的链条上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这根链条就叫作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分子的进攻。**

这些口号首先是和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我国工业和我国农业的时期有关的。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社会主义向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实行全线进攻。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向建成社会主义方面前进的一个极大的进展。但是为了进行这种改造，必须首先提高和加强在经济、苏维埃和工会方面以及在党和合作社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干部，必须砥砺我们的一切组织，清除这些组织里的脏东西，必须提高千百万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其次，这些口号是和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分子抵抗社会主义进攻的事实有关的。决不能认为所谓沙赫特案件是偶然的。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其中很多人已经落网，但是还远没有捕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这种暗害活动所以危险，尤其是因为它和国际资本有联系。资产阶级的暗害活动毫无疑问地证明：资本主义分子还远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正在积蓄力量来进行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发动。

至于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那更不能认为已经继续了一年多的富农反对苏维埃价格政策的发动是偶然的。很多人至今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富农在1927年以前自发地拿出粮食，而在1927年以后不再自发地拿出粮食了。但是，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过去富农的力量还比较弱，没有可能把自己的经济认真搞好，没有足够

的资本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余粮运到市场上去；而现在，经过连年丰收，他们的经济已经搞好了，他们已经积蓄了必要的资本，于是他们就有可能在市场上玩弄手腕，就有可能把粮食这种宝中之宝囤积起来作为自己的后备，而宁愿把肉类、燕麦、大麦以及其他次要农产品运到市场上去。现在希望富农会自愿地拿出粮食是可笑的。

这就是现在富农抗拒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根源。

城乡资本主义分子抵抗社会主义的进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变更兵力部署，以便保持旧制度，反对新制度。不难了解，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可是要击破阶级敌人的抵抗并为社会主义的前进扫清道路，除了其他一切办法以外，还必须砥砺我们的一切组织，清除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提高这些组织的干部，并动员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农村劳动阶层群众去反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

我们党目前的口号就是在这种阶级变动的基础上产生的。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变动也应当这样说。如果以为资本主义的稳定没有变化，那就可笑了。如果断言稳定日益巩固，日益牢靠，那就更可笑了。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稳定每月每日都在毁坏，都在动摇。争夺国外市场和原料的斗争的尖锐化，军备的扩充，美英之间对抗的加剧，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左倾，欧洲各国罢工和阶级搏斗时期的到来，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所有这些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说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促成新的革命高潮的因素正在增长。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和它的"左"翼作斗争的任务，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支柱。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作斗争的任务，因为他们是社会民主党影响的代理人。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的任务，因为它是机会主义在共产党内的隐蔽所。

由此就产生了清除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口号。

由此就产生了共产主义在工会中的所谓新策略。

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些口号的意义和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时候都懂得：不实现这些口号，就不能准备无产阶级群众去进行新的阶级战斗，就不能战胜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挑选出能够率领工人阶级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领袖。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国内和资本主义国家内所发生的阶级变动，我们党目前在对内政策方面和在共产国际方面的口号就是在这些阶级变动的基础上产生的。

我们党看到了这些阶级变动。它了解新任务的意义并动员力量去解决这些任务。所以它有充分准备应付事变。所以它不怕摆在它面前的困难，因为它对克服困难已经有了准备。

布哈林集团糟糕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看不见这些阶级变动，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正因为他们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所以他们总是表现张皇失措，他们总是准备逃避困难，在困难面前退却，放弃阵地。

你们看见过在叶尼塞那样的大河上遇到风暴的渔夫吗？我看见过不止一次。有一种渔夫在风暴来临时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伙伴，勇敢地划着船迎着风暴前进："弟兄们，把舵掌得更稳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

但是也有另一种渔夫，他们一感到风暴要来临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瓦解自己队伍的士气："真倒霉，风暴就要来了，弟兄们，躺

在船底里，闭上眼睛，也许能侥幸冲到岸边。”（全场大笑）

布哈林集团的方针和行动同在困难面前张皇退却的第二种渔夫的方针和行动一模一样，这还用得着证明吗？

我们说，欧洲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正在成熟，这种情况向我们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我们加紧同共产党内的右倾作斗争，把右倾分子驱逐出党，加紧同掩护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加紧同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作斗争等等。可是布哈林回答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新任务，实际上是大多数中央委员想对他布哈林进行“恶意攻击”。

我们说，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向我们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我们不断降低产品成本和加强企业中的劳动纪律，要实现这些任务，非根本改变工会的全部实际工作不可。可是托姆斯基回答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新任务，实际上是大多数中央委员想对他托姆斯基进行“恶意攻击”。

我们说，国民经济的改造向我们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我们加紧同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里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清除这些机关里的腐化分子、异己分子和暗害分子等等。可是李可夫回答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新任务，实际上是大多数中央委员想对他李可夫进行“恶意攻击”。

同志们，这难道不可笑吗？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除了自己的肚脐以外，看不见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布哈林集团不幸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看不见新的阶级变动，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正因为他们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所以他们不得不做事变的尾巴，在困难面前低头。

我们的分歧的根源就在这里。

三
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分歧

我已经说过，布哈林看不见和不了解由于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条件日益增长而向共产国际提出的新任务：把右倾分子驱逐出共产党、制止调和态度并清除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我们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完全证实了这种情况。

这方面的意见分歧是从什么事情开始的呢？

是从布哈林提交第六次代表大会[33]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开始的。通常，提纲都是预先经过联共(布)代表团审查的。可是这一次没有遵守这个条件。于是由布哈林签署的提纲在送交联共(布)代表团的同时也分发给了出席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团。但是提纲中的许多条文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联共(布)代表团不得不对这个提纲提出了大约二十处的修正。

这种情况使布哈林的处境有些尴尬。但这是谁的过错呢？布哈林为什么不经联共(布)代表团审查就把提纲分发给各国代表团呢？既然提纲不能令人满意，联共(布)代表团能够不提出修正吗？结果弄成了这样：联共(布)代表团实际上等于提出了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新提纲，各国代表团就把它和布哈林签署的原来的提纲对立起来。很明显，如果布哈林不急于把自己的提纲分发给各国代表团，就不会有这种尴尬的处境了。

我想指出联共(布)代表团对布哈林的提纲所提出的四个主要修正。我所以想指出这几个主要修正，是为了更清楚地揭示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性质。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性质问题。照布哈林的提纲说来，目前没有发生任何动摇资本主义稳定的新现象，相反地，资本主义**正在改造**，并且基本上相当**巩固**。很明显，对所谓第三个时期，即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做这样的估计是联共（布）代表团不能同意的。所以不能同意，是因为保留对第三个时期的这种估计会使我们的批评家得到借口，说我们采取了所谓资本主义"恢复元气"的观点，即希法亭的观点，即我们共产党人所不能采取的观点。因此，联共（布）代表团提出了修正，从修正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巩固的，而且不可能是巩固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尖锐化，这种稳定正被事变的进程动摇着，而且以后还会被动摇。

同志们，这个问题对于共产国际各支部具有决定的意义。资本主义的稳定是在动摇还是在巩固，——共产党在日常政治工作中的全部方针都要根据这一点来决定。我们现在是处在革命运动低落的时期即单纯聚集力量的时期，还是处在形成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日益增长的时期即准备工人阶级迎接即将到来的阶级战斗的时期，——共产党的策略方针要根据这一点来决定。联共（布）代表团所提出而后来为代表大会所采纳的修正，好就好在它提出了以第二种前途即以形成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日益增长的前途为依据的明确的方针。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问题。在布哈林的提纲中说，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是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基本任务之一。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还不够。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必须强调和社会民主党的所谓"左"翼作斗争的问题，因为就是这个"左"翼玩弄"左的"词句并以此巧妙地欺骗工人，从而阻碍工人群众离开社会民主党。很明显，不粉碎"左"翼社会民

主党人就不可能战胜整个社会民主党。可是在布哈林的提纲中，关于"左"翼社会民主党的问题竟完全没有谈到。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此，联共(布)代表团不得不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相应的修正，这个修正后来被代表大会采纳了。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共产国际各支部内的调和态度问题。布哈林的提纲中说到必须和右倾作斗争，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到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为当我们向右倾宣战的时候，右倾分子总是装扮成调和分子，使党陷于困难的境地。为了防止右倾分子玩弄这种手腕，必须提出坚决和调和态度作斗争的问题。因此，联共(布)代表团认为必须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相应的修正，这个修正后来被代表大会采纳了。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党的纪律问题。布哈林的提纲中没有提到必须在共产党内保持铁的纪律。这也是一个不小的缺点。为什么呢？因为在加紧和右倾作斗争的时期，在贯彻清除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这一口号的时期，右倾分子总是组成派别，建立他们自己的派别纪律，违反和破坏党的纪律。为了使党不致受到右倾分子的派别袭击，必须提出党的铁的纪律和党员无条件服从这个纪律的问题。否则就根本谈不到和右倾进行严重斗争。因此，联共(布)代表团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了相应的修正，这个修正后来被第六次代表大会采纳了。

我们能不能不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这些修正呢？显然不能。古时候有人关于哲学家柏拉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爱柏拉图，但是我们更爱真理。关于布哈林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爱布哈林，但是我们更爱真理，更爱党，更爱共产国际。因此，联共(布)代表团不得不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这些修正。

这可以说是**我们**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第一**

阶段。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第二阶段是和所谓维托尔夫和台尔曼事件有关的。维托尔夫是汉堡党组织的前任书记，被控盗用党的经费，因此被开除出党。虽然台尔曼同志和维托尔夫的罪行毫无关系，但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的调和分子竟利用维托尔夫接近台尔曼同志这一点，把维托尔夫事件变成了台尔曼事件，并开始来推翻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你们大概已经从报刊的报道中知道，调和分子埃韦特和格尔哈特当时竟能暂时把德国共产党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拉到自己方面去反对台尔曼同志。结果怎样呢？他们解除了台尔曼的领导职务，诬告他营私舞弊，并且没有通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没有得到它的批准就公布了"相应的"决议。

由此可见，他们不但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和调和态度作斗争的指示，不但没有和右倾以及调和态度作斗争，实际上反而极粗暴地违反了这个指示，和德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进行斗争，和台尔曼同志进行斗争，以便**掩护**右倾并**肯定**调和派在德国共产党队伍里的地位。

而布哈林不但不去掉转船舵，扭转局势，不但不去恢复被违反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指示的效力，叫调和分子守规矩，反而在他的一封人所共知的信里建议**批准**调和分子的篡夺行为，把德国共产党交给调和分子，再度在报刊上诬蔑台尔曼同志，再一次宣布台尔曼同志有过错。而这就叫作共产国际的"领导者"！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领导者"吗？

中央讨论了布哈林的建议并把它否决了。这当然是布哈林所不喜欢的。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并不是要人们去违反它，而是要人们去执行它。既然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向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宣布斗争，把德国共产党的领

导保持在以台尔曼同志为首的基本核心手中，而调和分子埃韦特和格尔哈特却想推翻这个决议，那么布哈林的职责就是叫调和分子守规矩，而不是把德国共产党的领导让给他们。这是布哈林的过错，因为他"忘记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第三阶段是和反对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的问题，和粉碎布兰德勒与塔尔海默的派别组织并把这个派别组织的首领开除出德国共产党的问题有关的。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对这个根本问题的"立场"是：他们总是避不参与这个问题的解决。实质上这是决定德国共产党的命运的问题。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知道这一点，但总是阻挠这件事，一贯避不参加有关机关的会议。为了什么呢？大概是为了既在共产国际面前又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面前都不失为"洁白君子"。为了以后可以说："把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开除出共产党的并不是我们布哈林派，而是他们大多数中央委员。"而这就叫作和右倾危险作斗争！

最后，**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第四阶段**。这个阶段是和布哈林在中央十一月全会[25]前提出的要求有关的。他当时要求从德国召回诺伊曼，要求叫台尔曼同志守规矩，说台尔曼同志似乎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布哈林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布哈林的要求，因为我们手里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实布哈林的要求是对的。布哈林答应提出控诉诺伊曼和台尔曼的文件。可是他什么文件也没有提出来。他不但没有提出文件，反而把安贝尔-德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发表的一篇人所共知的讲话分发给联共(布)代表团团员，而这篇讲话正是后来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评定为机会主义的讲话。布哈林把安贝尔-德罗的讲话分发给联共(布)代表团团员，并把它推荐为控诉台尔曼的材料，想证实他要求召回诺伊曼和要求叫台尔曼同志守规矩是正

确的。实际上他却以此证明了他是赞同安贝尔－德罗的，而安贝尔-德罗的立场是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看作机会主义立场的。

同志们，这些就是我们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主要分歧点。

布哈林认为，我们同共产国际各支部内的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清除德国共产党内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传统，把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海默之流开除出党，就是“瓦解”共产国际，“毁灭”共产国际。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我们实行这样的政策，强调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的问题，就是巩固共产国际，清除共产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使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帮助各国共产党准备工人阶级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战斗，因为党是靠清除自身的腐朽物而巩固起来的。

你们可以看出，这不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之间单纯看法上的细微的差别，而是在共产国际政策的根本问题上的相当严重的意见分歧。

四
在对内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

上面我已经说过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我说过布哈林集团患了盲目症，看不见这些变动，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我说过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布哈林反对派的张皇失措，害怕困难，准备向困难低头。

决不能说布哈林派的这些错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恰恰相

反，这些错误是和已经过去的那个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发展阶段有关的，当时的建设是通过和平道路进行的，也可以说是自流地进行的，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阶级变动，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但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是和旧时期即恢复时期不同的新的发展阶段。现在我们所处的是新的建设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这个新时期引起了新的阶级变动，引起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它要求我们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变更我们的兵力部署，改善并巩固我们的一切组织。

布哈林集团不幸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还过着旧生活，他们看不见这个新时期的特点，不了解采取新的斗争方式的必要性。由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盲目症，张皇失措，在困难面前惊惶不安。

(一)阶级斗争问题

布哈林集团的这种盲目症和这种张皇失措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种盲目症和这种张皇失措的理论基础就是布哈林对我国阶级斗争问题所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我指的是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我指的是他不了解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奥秘。

有些人在这里屡次引证布哈林的《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那段人所共知的话。但是在这里引证这段话时有一些遗漏。让我把这段话全部引出来。同志们，为了说明布哈林已经远远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样做是必要的。

请听吧：

"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由一些不是富农式的而是'劳动'式的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我们的全部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因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窝巢也会同样**经过银行等等**长入这个体系中去**；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物**，**例如象租让企业那样**。"①

有些同志在引证布哈林书中的这段话时不知为什么把最后一句关于承租企业家的话遗漏了。罗济特大概想给布哈林帮忙，就利用这一点在这里从座位上叫喊起来，说人家曲解了布哈林的意思。可是这整段引文的要点正是在于最后一句关于承租企业家的话。因为既然把承租企业家和富农相提并论，而富农又长入社会主义，那么由此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承租企业家也长入社会主义，不仅富农，而且承租企业家也长入社会主义。（全场大笑）

这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罗济特：布哈林说的是"异物"。

斯大林：布哈林说的不是"异物"，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物"。所以，富农和承租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异物。布哈林的错误正是在于他认为富农和承租企业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物，但还是长入社会主义。

请看布哈林的理论弄到了多么荒谬的地步。

城乡资本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都长入社会主义，——请看布哈林说得多么愚蠢。

不，同志们，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社会主义"。让布哈林自己把它拿去吧。

---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城乡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现在，按照布哈林的资本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正在消失，剥削者正在长入社会主义。

罗济特：这样说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前提。

斯大林：可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

罗济特：问题就在这里。

斯大林：但是照布哈林说来，资本家是长入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罗济特，你怎么不了解这一点呢？如果城乡资本家会长入无产阶级专政体系，那么，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需要进行斗争呢？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需要采取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呢？

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需要，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和根除资本主义。但是既然城乡资本家，既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会长入社会主义，那么，一般说来是否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呢？如果需要，那是为了镇压哪一个阶级呢？

罗济特：问题就在于布哈林所说的长入是以阶级斗争为前提的。

斯大林：我看罗济特已经发誓要为布哈林效劳了。但是他的效劳象熊的效劳一样，因为他本来想救布哈林，事实上却把布哈林沉到水底了。难怪人们说："喜欢效劳的熊比敌人更危险。"[34]（全场哈哈大笑）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资本家阶级和已经掌握政权并建立了自己专政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或者

是没有这种利益上的对立，那就只有宣布阶级利益的协调。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或者是**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或者是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或者是**阶级利益协调的理论。

布伦坦诺或悉尼·维伯之类的"社会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长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那还可以理解，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可是，一个想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同时鼓吹资本家阶级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那就不可理解了。

布哈林在他的发言中企图引用列宁的一段有名的话来证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同时他硬说列宁所说的和布哈林所说的**一样**：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对列宁的粗暴而不可容忍的诬蔑。

下面是列宁这段话的原文：

"当然，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405页）①

你们可以看出，这里一句话也没有讲到资本家阶级长入社会主义。这里只说到我们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工人和农民的合作。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因此就认为耐普曼有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呢？当然不是。只有不知羞耻的人才会这样解释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7页。——编者注

列宁的这段话。这只是说，我们**现在**不消灭资产阶级，我们**现在**不没收他们的财产，而容许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所谓一定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这些法律是要不断限制资本家并逐步把他们从国民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的。

不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能不能排挤资本家，铲除资本主义的根柢呢？不，不能。

依靠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能不能消灭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只能培植阶级并使阶级永久存在，因为这个理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矛盾的。

而列宁的这段话完完全全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根据的。

在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列宁的专政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很明显，这里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

布哈林认为，为了达到消灭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应当**熄灭**，应当**取消**。恰恰相反，列宁教导说，**只有**通过顽强的阶级斗争才能消灭阶级，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要比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更加残酷**。

列宁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315页）①

关于消灭阶级，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8页。——编者注

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

通过阶级斗争熄灭和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布哈林的公式。

这两个公式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由此可见，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它是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35]的理论的。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一切错误的根源就在这里。

有人会说，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值得多谈的，因为这个理论本身就说出了——不仅说出了，而且喊出了——布哈林的错误。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当这个理论搁着不用的时候，还可以不去理它，因为在各种各样的同志的作品中有的是各种各样的蠢话！直到最近我们都是这样处置的。可是最近情况变了。近几年来嚣张起来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已经开始鼓舞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它具有现实的性质了。现在已经不能说它是搁着不用的了。现在布哈林的这个奇怪理论妄图成为我们党内右倾的旗帜，成为机会主义的旗帜。因此，我们已经不能忽视这个理论。因此，我们必须粉碎这个不正确的和有害的理论，使我们的党员同志便于和右倾作斗争。

（二）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

布哈林从他的第一个错误中产生出来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他对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对资本主义分子加紧反抗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政策问题采取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说资本主义分子比我国经济中的

社会主义成分增长得快，因而他们就加紧进行反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呢？不，这里说的不是这个。并且，说资本主义分子比社会主义成分增长得快是不对的。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已经濒于破产了。

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正在**胜利地进攻资本主义分子，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分子增长得**快**，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因此**正在下降**，正因为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正在下降**，资本主义分子才感觉到有死亡的危险，于是就加紧进行反抗。

资本主义分子所以暂时还能够加紧进行反抗，不仅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援助他们，而且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他们的相对增长和社会主义的增长比较起来虽然在减低，但他们的绝对增长还是有的，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积蓄力量来抵抗社会主义的增长。

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在目前这种力量对比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反抗的加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这个简单明白的真理。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是以庸人的态度来对待问题，企图用各种偶然的原因来解释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例如：苏维埃机关"不中用"，地方上的同志执行政策"不谨慎"，"缺乏"灵活性，"过火行为"等等。

请看布哈林的《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表明他完全是以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的：

"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过去的表现形式爆发出来，而且这种尖锐化通常是由富农分子引起的。例如富农或者靠剥削别人发

财并钻进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人刺杀农村通讯员，——这就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表现形式〈这是不对的，因为最尖锐的斗争形式是暴动。——约·斯大林注〉。可是，这类事件通常发生在地方苏维埃机关还软弱无力的地区。十分明显，**随着这种机关的改善**，随着苏维埃政权一切基层组织的巩固，随着农村地方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改善和加强，**这类现象**会愈来愈少，以至最后**绝迹**。"①

这样说来，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是在机关方面，是在我们的基层组织中用还是不中用，软弱还是强有力。

这样说来，例如沙赫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这是资产阶级分子反抗苏维埃政权的一种形式，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一种形式）并不是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增长，而是由于我们的机关不中用。

这样说来，在沙赫特区发生大规模暗害活动以前，我们的机关是好的，而后来在发生大规模暗害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机关不知为什么突然就变成毫不中用的了。

这样说来，在去年以前，当粮食收购工作还在自流地进行，我国阶级斗争还没有特别尖锐化的时候，我们的地方组织是好的，甚至是理想的，而从去年起，当富农的反抗采取了特别尖锐的形式的时候，我们的组织突然就变成不好的、毫不中用的了。

这不是解释，而是嘲弄解释；这不是科学，而是巫师说鬼话。

这种尖锐化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原因有两个：

第一，我们在前进，我们在进攻，工业中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都在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城市和乡村的一部分资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本家受到相应的排挤。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正在按照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生活：是我们把他们资本家打倒，如列宁所说的和他们作一次最后的斗争，还是他们把我们打倒。

第二，资本主义分子不愿意自动退出舞台，他们现在反抗而且将来还会反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他们所以暂时还能进行反抗，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是他们在绝对量上还是在增长：城乡小资产阶级，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每日每时都从自己中间分泌出大小资本家来，而这些资本主义分子会采取一切办法来卫护自己的生存。

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不管我们的基层苏维埃机关是好还是坏，我们的前进，我们的进攻总是要减少资本主义分子，把他们排挤出去的，而他们，垂死的阶级，总是要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的。

我国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源就在这里。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资本家反抗的加紧和资本家比重的增长混同起来了。这样混同起来是毫无根据的。所以没有根据，是因为资本家进行反抗决不是意味着他们变得比我们更有力量。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垂死的阶级进行反抗并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比我们更有力量，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比他们增长得快，他们愈来愈比我们弱。正因为他们愈来愈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反抗。

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和资本家进行反抗的奥秘就在这里。

实际情况既然如此，那么党的政策应当怎样呢？

党的政策应当是唤起工人阶级和农村被剥削群众，提高他们

的战斗力，加强他们的动员准备，以便和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以便和正在进行反抗的阶级敌人作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好处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动员工人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

布哈林的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他对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的见解的害处在什么地方呢？

在于它会麻痹工人阶级，破坏我国革命力量的动员准备，涣散工人阶级，便利资本主义分子向苏维埃政权进攻。

（三）农民问题

布哈林的第三个错误是在农民问题上发生的。大家知道，农民问题是我们政策中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在我国的条件下，农民是由几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即由贫农、中农和富农组成的。很明显，我们对这些集团的态度不能是一样的。贫农是工人阶级的**支柱**，中农是**同盟者**，富农是**阶级敌人**，——这就是我们对这些社会集团的态度。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尽人皆知的。

可是布哈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有些不同。在他说明农民的特征的时候，农民分化的事实不见了，存在着几个社会集团的事实也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剩下的只是叫作农村的灰茫茫的一片。在他看来，富农不是富农，中农不是中农，农村是一片贫穷。他在这里发言时也就是这样说的。他说：难道我国的富农可以叫作富农吗？这不过是穷人罢了。布哈林在这里还说：我国的中农难道象中农吗？这不过是挨饿的穷人罢了。很明显，对农民的这种看法是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根本错误的看法。

列宁说过，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①。这个原理是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2卷第471页。——编者注

否正确呢？无疑是正确的。为什么把个体农民看作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资本家来。

这种情况对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问题具有决定的意义。这就是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和农民的**任何一种**联盟，而只是建立在和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的基础上的**那种联盟**。

由此可见，列宁关于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论点不但不和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思想相矛盾，反而给这个旨在反对一般资本主义分子，特别是反对农村中农民资本主义分子的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农民的联盟提供了根据。

列宁提出这个论点，是为了指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只有建立在和农民本身所分泌出来的那些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的基础上才能是巩固的。

布哈林的错误就在于他不懂得和不接受这个简单的道理，他忘记了农村中的社会集团，在他的视野中富农和贫农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清一色的中农群众。

这种情况表明了布哈林的毫无疑义的右倾，这种右倾和"左"倾即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相反，"左"倾除了贫农和富农以外看不见农村中的其他社会集团，中农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在和农民联盟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集团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和中农群众建立**巩固**联盟的政策，而布哈林集团则**主张**和全体农民建立**任何一种**联盟。用不着证明，这两种立场都是不正确的，一个是半斤，一个是八两。

列宁主义无疑主张和基本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联盟，即主张和中农建立联盟，但不是主张建立任何一种联盟，而是主张和中农建立能保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促进消灭阶级**的那种联盟。

列宁说："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协议，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只有当这种协议支持工人阶级专政并且成为一种消灭阶级的手段时，它才是可以容许的、正确的和原则上可能的，如果忘掉这一点，那么工人阶级和农民成立协议的公式自然就会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和专政的一切敌人所主张的公式。"（《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387页）①

其次：

列宁说："现在，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领导着政权。它领导着农民。领导农民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第一，要实行消灭阶级而不是保存小生产者的路线。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和主要的路线，那我们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就会滚到小资产者，滚到现在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一边去。"（同上，第399—400页）②

这就是列宁对于和基本农民群众联盟即和中农联盟问题的看法。

布哈林集团在中农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中农的两重性，看不见中农介于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两重地位。列宁说："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级。"③为什么呢？因为中农一方面是劳动者，这就使他和工人阶级接近，而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者，这就使他和富农接近。由此就产生了中农的动摇。这不仅在理论上是正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5—396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410页。——编者注

③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9页。——编者注

确的。这种动摇也是每日每时都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

列宁说："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宁愿工人专政而不愿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要退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去。"(《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314页)①

因此，和中农的联盟只有当它的目的是反对资本主义分子，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时候，只有当它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时候，只有当它促进消灭阶级的时候，才能是巩固的。

布哈林集团忘记了这些简单明白的道理。

(四)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问题

布哈林的第四个错误是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发生的。布哈林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他看不见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方面，只看见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方面。我们在1921年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是把它的锋芒指向战时共产主义，指向排斥**任何**私人贸易自由的制度和秩序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容许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这一方面布哈林记住了。这是很好的。

但是，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有这一方面，那就错了。布哈林忘记了新经济政策还有另一方面。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决不是容许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决不是容许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新经济政策是**在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私人贸易在**一定**限度、**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方面。而且新经济政策的这一个方面比它的第一个方面对我们更为重要。在我国市场上没有象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常见的那种自由玩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7—858页。——编者注

弄价格的现象。粮食价格基本上是由我们规定的。工业品价格是由我们规定的。我们努力实行降低产品成本和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同时我们力求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这种独特的市场秩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没有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只要新经济政策存在，就应当保存它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反对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其目的是保证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第二个方面是反对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其目的是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取消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就不会有新经济政策。

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只会受到"从左边"即从那些想取消**任何**贸易自由的人们方面来的危险。这是不对的。这是极大的错误。而且这种危险现在是最不现实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里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不懂得保持**一定的**贸易自由是完全必要的和适当的。

从右边来的危险，即从那些想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想"解放"市场，从而开辟私人贸易完全自由的纪元的人们方面来的危险要现实得多。毫无疑问，这种从右边来破坏新经济政策的危险现在要现实得多。

不应当忘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正是在这方面进行活动，正是从右边来破坏新经济政策的。也应当记住，富农和富裕分子的号叫，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的号叫（我们的许多同志常常受这种号叫的影响），正是从这方面来攻击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看不见破坏新经济政策的这第二种真正现实的危险，这个事实无可怀疑地说明他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屈服了。

布哈林提议使市场"常态化"，按地区"调整"粮食收购价格，即提高粮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不满意苏维埃的市场

条件，他想逐渐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提议向从右边来破坏新经济政策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让步。

姑且假定我们听从了布哈林的劝告。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比如说，我们在秋天，在收购初期提高了粮价。但是由于市场上总有一些人，各种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会用高出两倍的价钱来收买粮食，而我们又不能和投机分子竞争，因为他们总共不过收买一千万普特左右，而我们却要收买几亿普特，所以粮食持有者还是会把粮食囤积起来，等待价格继续上涨。这样，到了春天，当国家最需要粮食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再度提高粮价。而在春天提高粮价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害了贫农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他们在春天不得不买进粮食，一部分做种子，一部分供消费，而这些粮食就是他们在秋天按照比较低廉的价格卖出去的。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是否就能收到什么显著的效果即得到足够数量的粮食呢？最可能的是得不到，因为总有一些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又会用高出一两倍的价钱来收买这些粮食。于是我们又必须准备再一次提高粮价，徒劳无益地争取赛过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

由此可见，只要一走上提高粮价的道路，我们就必定会继续滚下去，而不能保证得到足够数量的粮食。

但是问题还不限于此：

第一，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我们以后就必须提高农业所生产的原料的价格，以保持各种农产品的一定比价。

第二，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我们在城市里就不能保持低廉的粮食零售价格，因而就必须提高粮食的售价。既然我们不能够而且不应当损害工人利益，我们就必须加速提高工资。但是，这样做就不能不提高工业品价格，因为不提高工业品价格就会违反工业化的利益，使资金从城市流入农村。

结果我们就必须不是在**降低**或至少稳定价格的基础上，而是在**提高**粮价和工业品价格的基础上来拉平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

换句话说，我们就必须采取使工业品和农产品**涨价**的方针。

不难了解，这样"调整"价格不能不弄得完全取消苏维埃价格政策，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完全放纵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

这会有利于谁呢？

只会有利于城乡富裕阶层，因为工人阶级以及贫农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是买不起昂贵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占便宜的是富农和富裕分子，是耐普曼和其他富有阶级。

这也是结合，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结合——同城乡富有阶层的结合。工人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将有充分权利来质问我们：我们是什么政权，是工农政权还是富农耐普曼政权？

同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破裂，同城乡富有阶层结合，——这就是布哈林的市场"常态化"和按地区"调整"粮价的必然结果。

很明显，党不能走这条死路。

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概念是多么混乱，他做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俘虏是多么服贴，——这一点就从他对城乡之间，国家和农民之间新的商品流转形式问题所表现的极端否定的态度中也看得出来。他看见国家成了农民的商品供应者，农民正在成为国家的粮食供应者，就表示愤怒，大肆反对。他认为这是违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规章，几乎是破坏新经济政策。试问，为什么呢？有什么根据呢？

国家，国营工业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农民的商品供应者，而

农民也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工业，成为国家的粮食供应者，这有什么不好呢？

农民已经**变成**国营工业所需要的棉花、甜菜、亚麻的供应者，而国营工业已经**变成**这些农业部门的城市商品、种子和生产工具的供应者，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策的观点看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预购的方法在这里是建立城乡之间这些新的商品流转形式的基本方法。难道预购的方法是同新经济政策的要求抵触的吗？

由于采用这种预购的方法，农民不仅在棉花、甜菜、亚麻方面，而且在粮食方面**正在成为**国家的供应者，这有什么不好呢？

为什么小宗交易、少量交易可以叫作商品流转，而按照预先就货物的价格和质量订立的合同(预购合同)进行的大宗交易就不能叫作商品流转呢？

城乡之间按照预购的方法进行商品流转的这些新的广泛采用的形式正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形式是我们各个组织在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的领导方面的一个极大的进步，这难道很难了解吗？

布哈林竟不会了解这些简单明白的道理了。

(五)所谓"贡款"问题

布哈林的第五个错误（我说的是他的主要错误），是他在城乡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即所谓"贡款"问题上对党的路线进行了机会主义的歪曲。

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1929年2月）关于"剪刀差"问题的著名决议说的是什么呢？决议说的是：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

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

农民缴纳的这种超额税实际上是存在的，这是不是事实呢？是的，是事实。我们还把它叫作什么呢？我们还把它叫作“剪刀差”，叫作为迅速发展我国工业而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是否需要采取这种“流入”的办法呢？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我们真正想保持工业发展的高速度，采取这种“流入”办法作为暂时的措施是需要的。而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持工业的迅速发展，因为这不仅是工业本身所需要的，而且首先是农业，是农民所需要的，农民现在最需要拖拉机、农业机器和肥料。

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取消这种超额税呢？可惜不能。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年内一有可能就取消它。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取消它。

于是，由于“剪刀差”而形成的这种超额税就成了“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不是贡款，而是“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落后而产生的“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需要这种超额税是为了推进工业的发展，消除我国的落后状态。

这是不是说，征收这种额外税我们就是剥削农民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苏维埃政权的本质不容许国家对农民有任何剥削。我们许多同志在七月全会[23]的发言中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在苏维埃制度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剥削农民的，因为劳动农民物质福利的不断提高是苏维埃社会的发展规律，而这就排斥了任何剥削农民的可能性。

农民是否担负得起这种额外税呢？是的，担负得起的。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这种额外税是在农民物质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条件下征收的。

第二，因为农民有自己的个人经济，个人经济的收入使农民能够缴纳额外税；对于工人就不能这样说，因为工人没有个人经济，虽然如此，工人却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工业化事业。

第三，因为额外税的数量是逐年减少的。

我们用"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的字眼来称呼这种额外税是否正确呢？无疑是正确的。用这些字眼可以提醒我们的同志：征收这种额外税是令人不愉快的，不是出于自己的心愿的，把它长期保留下去是不可容许的。我们这样称呼加于农民的额外税，是想指出我们征收这种税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心愿，而是由于需要，我们布尔什维克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一有可能就尽快取消这种额外税。

关于"剪刀差"问题，关于"流入"问题，关于"超额税"问题，关于在上述文件中被称为"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的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曾经企图挑剔"贡款"这个字眼，并责备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但是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这是布哈林分子极粗暴地诬蔑我们党的卑鄙企图。现在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默认，他们关于军事封建剥削的胡说是彻底破产了。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布哈林分子承认"剪刀差"和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们就应当承认自己的责备是诬蔑，承认党是完全正确的；

或者他们否认"剪刀差"和"流入"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请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好让党把他们算入我国工业化的反对者之列。

不管怎样，我可以引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许多次

发言，在那些发言中他们无条件地承认“剪刀差”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承认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也就是承认“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的提法。

怎么样，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坚持“流入”的观点，还坚持在目前保留“剪刀差”的观点呢？让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吧。

布哈林：流入是需要的，但“贡款”是一个不好的字眼。（全场大笑）

斯大林：这样看来，**在问题的实质上我们并没有意见分歧**，这样看来，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所谓“剪刀差”，额外税，“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是目前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然而是暂时的一种手段。

很好。那么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吵嚷呢？是因为他们认为“贡款”这个**字眼**或“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没有使用，所以他们不喜欢这个字眼吗？

好吧，我们就来谈谈“贡款”这个**字眼**。

同志们，我肯定地说，这个字眼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例如在列宁同志的文章中，早已得到了公认。同志们，这会使一些没有读过列宁著作的人感到奇怪，然而这是事实。布哈林在这里“大喊大叫”，说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能容忍“贡款”这个字眼。他对于党中央和一般马克思主义者竟敢使用“贡款”这个字眼感到气愤和奇怪。但是，既然已经证明这个字眼在列宁同志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早已广泛地使用，那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或许在布哈林看来，列宁不合乎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吧？那么，亲爱的同志们，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例如你们就拿列宁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年5月）来读一读下面一段话：

"存有几千小款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无疑希望把这几千小款用在自己身上，反对贫民，反对任何全国性的监督，而这几千小款却给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造成数十亿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一千的价值。又假定说，在我国，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二百落了空。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一千中拿出三百来就能建立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三百，不是二百，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打破，那么以后减少这种'贡款'，比如说减到一百或五十，就会是十分容易的任务。"(《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515页)①

看来已经清楚了。能不能根据这一点就宣称列宁同志主张对工人阶级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呢？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试试看！

有人喊道：反正对中农从来没有使用过"贡款"这个概念。

斯大林：你是不是以为中农比工人阶级更靠近党呢？你真是一个糟糕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场大笑)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既然对于工人阶级可以说"贡款"，为什么对于不过是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就不能这样说呢？

有些爱挑剔的人会以为《论"左派"幼稚性》一文中的"贡款"这个字眼是列宁同志的失言，是偶然的失言。但是经过检查证明，这些爱挑剔的人的猜疑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你们就拿列宁同志的另一篇文章(更正确地说是小册子)《论粮食税》(1921年4月)来读一读其中的第三二四页(《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324页)②。你们可以看到，刚才引证的关于"贡款"那一段话，列宁同志在那里又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最后，你们再拿列宁同志的《苏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43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4卷第506—507页。——编者注

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1918年3—4月，《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448页）来看一看，你们可以看到，列宁在这里也说到“我们因在组织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工作上的落后而付出的贡款〈已不加引号〉”①。

由此可见，“贡款”这个**字眼**在列宁的文章中决不是偶然的东西。列宁同志使用这个**字眼**是为了强调“贡款”的暂时性，加强布尔什维克的毅力，以便一有可能就取消工人阶级因为我们的落后，因为我们的“缺点”而付出的这种“贡款”。

由此可见，在用“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的说法上，我是和一些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伙的，和列宁同志一伙的。

布哈林在这里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容许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贡款”这个字眼。他说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如果他指的是斯列普科夫、马列茨基、彼得罗夫斯基、罗济特等等一类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布哈林的气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人与其说象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象自由主义者。如果他指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列宁同志，那么应当承认，“贡款”这个字眼在他们中间早已得到了公认，而不大熟悉列宁著作的布哈林在这里是说错了。

但是“贡款”问题还不限于此。问题在于：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挑剔“贡款”这个字眼而且说起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话来，这并不是偶然的。毫无疑问，他们吵嚷说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是想表示他们对于我们各机关所实行的我们党对待富农的政策的极端不满。对党在领导农民方面的列宁的政策不满，对我们的粮食收购政策不满，对我们的全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政策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04页。——编者注

不满，最后，希望“解放”市场和规定私人贸易完全自由，——这就是布哈林关于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号叫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我没有看见过责备党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第二个例子。这种反党武器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的武库里拿来的。那么是从哪里拿来的呢？是从立宪民主党[36]首领米留可夫的武库里拿来的。当立宪民主党人想挑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时候，他们总是说：布尔什维克先生们，你们是在农民的白骨上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就“贡款”问题吵吵嚷嚷，就是附和米留可夫之流的先生们，就是做人民公敌的尾巴。

(六)工业发展速度和结合的新形式问题

最后是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和城乡结合的新形式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意见分歧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在党的经济政策问题方面的**实际**分歧的一切线索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什么是结合的新形式呢？从我们的经济政策方面来看，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就是说，除了城乡结合的旧形式以外，我们还需要结合的新形式。在旧形式下，工业主要是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花布、鞋子、一般纺织品等等），而在新形式下，工业将满足农民经济的**生产**需要(农业机器、拖拉机、优良种子、肥料等等)。

过去我们**主要是**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很少触及农民经济的生产需要，而现在除了继续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以外，我们还必须尽力供应那些对于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农业机器、拖拉机、肥料等等。

当问题是**恢复**农业、使农民学会使用过去地主和富农的土地的时候，我们可以满足于旧的结合形式。可是现在，当问题是**改造**农业的时候，这就已经不够了。现在需要更进一步，需要帮助农民在新技术和集体劳动的基础上改造农业生产。

其次，这就是说，在重新装备我国工业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开始认真地重新装备农业。我们正在重新装备我国工业，而且已经重新装备了一部分，为工业奠定了新的技术基础，给工业供给了新的优良机器和新的优秀干部。我们正在建设新工厂，我们正在改造和扩建旧工厂，我们正在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在这个基础上，城市正在发展，新的工业区正在增多，旧的工业区正在扩大。在这个基础上，对于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求正在增长。而农业仍然使用着旧式农具，使用着古老陈旧的耕作方法，使用着原始的、现在已经不适用或几乎不适用的旧技术，采用着旧的、个体小农的经营方式和劳动方式。

例如我国在革命前约有一千六百万农户，而现在至少有二千五百万农户，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不是说明农业日益分散和零碎化又是说明什么呢？而分散的小经济的特征就在于它无力充分利用技术、机器、拖拉机和农业科学成就，它是出产商品很少的经济。

由此就产生了农产品商品量的不足。

由此就产生了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关系破裂的危险。

由此就产生了使农业跟上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必要性。

要避免这种关系破裂的危险，就必须开始认真地在新技术基础上重新装备农业。而要重新装备农业，就必须逐步地把分散的个体农户联合为大农庄即集体农庄，必须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建

设农业，必须扩大集体规模，必须发展原有的和新建的国营农场，必须有步骤地把预购这种广泛采用的形式应用到农业的一切主要部门中去，必须扩大那个帮助农民掌握新技术并使劳动集体化的机器拖拉机站系统，——一句话，必须逐步地把个体小农经济转到集体大生产的基础上去，因为只有公共的大生产才能充分利用科学成就和新技术，才能一日千里地推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应当丢开个体贫农中农经济。不，不是这个意思。个体贫农中农经济在供给工业以粮食和原料方面现在起着主要作用，在最近的将来还会起主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必须帮助还没有联合为集体农庄的个体贫农中农经济。

但这是说，单靠个体农民经济**已经**不够了。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必须以全力发展集体经济形式和国营农场来**补充**个体贫农中农经济的发展。

因此，必须在个体贫农中农经济和公共的集体经济形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即广泛订立预购合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全力发展合作社运动，以便使农民易于把他们的细小的个体经济转上集体劳动的轨道。

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真正发展农业。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解决谷物问题。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使力量单薄的农民阶层摆脱破产和贫困。

最后，这是说，必须全力发展我国工业——我国农业生产在改造时的主要养料来源，必须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必须建设拖拉机制造厂、农业机器制造厂等等。

无须证明，不通过广泛订立预购合同来把基本农民群众引向集体经营形式，不以大量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等等供给农业，就不可能发展集体农庄，就不可能发展机器拖拉机站。

但是不加速发展我国工业，就不可能以机器和拖拉机供给农村。因此，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是在集体制基础上改造农业的钥匙。

结合的新形式的意义和作用就是这样。

布哈林集团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的必要性。但这不过是**口头上的**承认，其目的是要在口头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的幌子下偷运一种完全**相反的**东西。其实布哈林是反对结合的新形式的。布哈林所持的出发点不是高速度发展工业这一改造农业生产的杠杆，而是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使市场"常态化"，容许在农产品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容许私人贸易完全自由。由此就产生了他对集体农庄的不信任态度，他在中央七月全会上的发言中和他在中央七月全会前提出的提纲中都表现了这种态度。由此就产生了他对收购粮食时所采取的一切对付富农的非常措施的否定态度。

大家知道，布哈林躲避非常措施就象小鬼躲避阎王一样。

大家知道，布哈林直到现在还不能了解，富农在目前条件下是不会自愿地、自发地交出充分数量的粮食的。

这一点现在已经由我们两年来收购工作的经验证明了。

如果商品粮食还是不够，那该怎么办呢？布哈林回答说：不要用非常措施惊扰富农，要从国外输入粮食。就在不久以前，他还提议从国外输入五千万普特左右的粮食，就是说，用大约一亿卢布的外汇输入粮食。如果外汇需要用来输入工业设备，那又怎么办呢？布哈林回答说：应当尽先从国外输入粮食。这显然是要把输入工业设备的事情放在后面。

这样说来，解决谷物问题和改造农业的基础不是高速度发展工业，而是通过自由市场和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来发展个体农

民经济(包括富农经济在内)。

于是我们就有了两个不同的经济政策方案。

党的方案:

1.我们重新装备(改造)工业。

2.我们开始认真地重新装备(改造)农业。

3.为此必须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广泛地订立预购合同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作为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生产结合**的手段。

4.至于目前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那么必须承认可以采取一些依靠中农和贫农群众共同赞助的临时的非常措施,作为击破富农反抗和从富农手里取得最大限度余粮的一种手段,而这些余粮是避免输入粮食和保存外汇以发展工业所必需的。

5.个体贫农中农经济在供给国家粮食和原料方面现在起着主要作用,将来还会起主要作用,但是单靠它已经不够了;因此,必须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广泛订立预购合同、加紧发展机器拖拉机站来**补充**个体贫农中农经济的发展,以利于把资本主义分子从农业中排挤出去,把个体农民经济逐步引上大规模集体经济的轨道,引上集体劳动的轨道。

6.但是要做到这一切,首先必须加紧发展工业,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拖拉机制造厂、农业机器制造厂等等。不然就不可能解决谷物问题,也不可能改造农业。

结论:**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

布哈林的方案:

1.使市场"常态化",容许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和抬高粮价,即使这样做会使工业品、原料和粮食涨价。

2.相当地减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速度,以便全力发

展个体农民经济(布哈林在七月提出的提纲，布哈林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

3.以自流的方式收购粮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采取甚至不可以部分地采取非常措施来对付富农，即使这些措施受到中农和贫农群众的赞助。

4.缺粮时就输入约值一亿卢布的粮食。

5.如果外汇不够，不能同时输入粮食和工业设备，那就应当减少工业设备的输入，也就是说，减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不然我国农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直线下降"。

结论：**发展个体农民经济是改造农业的钥匙**。

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

布哈林的方案是**降低**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破坏**结合的新形式的方案。

我们的意见分歧就是这样。

有时人们问：我们在发展结合的新形式，发展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等方面是不是做迟了呢？

有人武断地说，党在这件事情上至少大约做迟了两年。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不了解苏联经济情况的"左的"空喊家才会这样说。

在这件事情上做迟了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的是预见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那么我们早在十月革命时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还在那时，在十月革命时期，党就已经预见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并且可以看看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8]（1919年3月）所通过的我们的党纲。那里十分清楚地注意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

但是单靠我们党的领导上层预见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的必要性，还不足以实现和组织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群众运动**。可见这里说的不是预见，而是**实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计划。但是要实现这样的计划需要许多条件，这些条件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而直到最近才出现的。

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

为了实行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群众运动的计划，首先必须使党员**群众**在这方面支持党的领导上层。大家知道，我们党是一个有百万党员的大党。因此，必须说服广大党员群众，使他们相信领导上层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第一。

其次，为此必须在农民中间造成拥护集体农庄的群众运动，必须使农民不害怕集体农庄，使他们根据经验相信集体农庄比个体经济优越，而自行加入集体农庄。这是一件需要相当时间的严重事情。这是第二。

再其次，为此必须使国家有一笔为资助集体农庄建设、为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必需的经费。亲爱的同志们，这件事情是需要几亿几亿卢布的。这是第三。

最后，为此必须使工业有相当高度的发展，以便供给农业以机器、拖拉机、肥料等等。这是第四。

能不能断言我们在两三年以前就已经具备了这一切条件呢？不，不能这样断言。

决不能忘记，我们是**执政**党，**而不是在野**党。在野党可以提出一些口号(我说的是运动中的根本的实践口号)，以求在取得政权后加以实现。谁也不会责备在野党不立刻实现他们的根本口号，因为大家都明白，执政的不是他们在野党，而是别的政党。

我们布尔什维克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种政党的口号不是单纯的鼓动性的口号，而是一种更重要得多

的东西，因为这些口号具有**实际决定**那样的效力，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立即予以执行。我们党不能提出一个实践口号，然后又把它搁置起来不去执行。这样做就是欺骗群众。要提出一个实践口号，特别是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引上集体制轨道这样重大的口号，就必须具备直接实现这个口号的条件，而且必须创造和组织这些条件。正因为如此，对我们来说，单靠党的领导上层预见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还需要具备为立刻**实现**和**贯彻**我们的口号所必需的条件。

比如说在两三年以前，我们的党员**群众**对全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不是已经有了准备呢？不，他们当时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准备。党员群众向结合的新形式方面实行大转变是从粮食收购方面发生第一批严重困难的时候才开始的。由于发生了这些困难，党员群众才感觉到加速建立结合的新形式，首先是加速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全部必要性，并在这方面坚决支持自己的中央。你们看，这就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而现在已经具备的一个条件。

在两三年以前，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千百万农民群众拥护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的基础扎实的运动呢？不，没有。谁都知道，在两三年以前，农民敌视国营农场，而把集体农庄鄙视为毫无用处的"康姆尼"①。可是现在呢？现在是另一种情况了。现在我们已经有整个整个的农民阶层把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看作农民经济获得种子、良种牲畜、机器、拖拉机等等帮助的来源。现在只要供给机器和拖拉机，集体农庄事业就会加速前进。

一些相当大的农民阶层中的这种转变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什

① 当时苏联农民把"共产主义"叫作"康姆尼"。——编者注

么促成了这种转变呢？

首先是合作社和合作社运动的发展。不容怀疑，如果没有合作社特别是在农民中间造成了拥护集体农庄的心理基础的农业合作社的蓬勃发展，我们就不会看到现在整个整个的农民阶层所表现的那种参加集体农庄的渴望。

现有的办得很好的集体农庄在这里也起了很大作用，它们给农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把小农经济联合为大经济即集体经济是可以改进农业的。

现有的设备完善的国营农场在这里也起了作用，它们帮助农民改善了经济。至于你们都熟知的其他事实，我就不谈了。你们看，这又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而现在已经具备的一个条件。

其次，能不能断言在两三年以前我们就已经有可能大量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给这方面拨出几亿卢布呢？不，不能这样断言。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当时甚至缺少资金去发展最低限度的工业，而没有这些工业就根本不可能实现任何工业化，更不用说改造农业了。我们当时能不能从作为国家工业化基础的工业中抽出这些资金，把它交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呢？显然不能。而现在呢？现在我们有了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资金。

最后，能不能断言在两三年以前我们在工业方面就已经有了充分的基础来加紧供给农业以机器、拖拉机等等呢？不，不能这样断言。当时的任务是要建立**最低限度的工业基础**以便将来供给农业以机器和拖拉机。当时我们也就是把有限的资金用来建立这个基础的。而现在呢？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发展农业的工业基础。至少这个基础在我国正在加速建立起来。

由此可见，只是到最近才在我国造成了大量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必需的条件。

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

正因为如此，不能说我们在发展结合的新形式方面做迟了。

（七）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

右倾反对派的理论家布哈林在我们政策的各个基本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大体上就是这样。

有人说，布哈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之一。这当然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他那套理论并不完全行得通。这就从我刚才所分析的他在党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一大堆错误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错误，即在共产国际方面的错误，在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结合的新形式问题上的错误，——所有这些错误出现在他身上决不能说是偶然的。不，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布哈林的这些错误是从他的不正确的理论观点，从他的理论缺陷中产生出来的。是的，布哈林是理论家，但他这个理论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还需要补习一下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有人援引列宁同志评论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的那封有名的信。让我们来读读这封信吧：

列宁说："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与皮达可夫谈几句。在我看来，他们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①（1926年七月全会速记记录第4册第66页）②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617页。——编者注

总之，不了解辩证法的理论家。烦琐哲学的理论家。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理论家。这就是列宁对布哈林的理论面目所做的评定。

同志们，你们自己知道，这样的理论家还需要补习一下。假如布哈林知道他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家，他还需要补习一下，他是一个还没有领会辩证法的理论家，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假如他知道这些，那么他就会谦虚一点，这对党是只会有好处的。但糟糕的是布哈林不知道谦虚。糟糕的是他不仅不知道谦虚，而且在许多问题上，首先是在国家问题上，竟教训起我们的导师列宁来了。这就是布哈林糟糕的地方。

说到这里，让我援引一下1916年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所发生的那次大家知道的理论争论。这对我们揭露布哈林妄想教训列宁的那种不自量的奢望，以及他在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重要问题上的理论弱点的根源，是很重要的。

大家知道，1916年在《青年国际》杂志[37]上登载了布哈林的一篇署名 Nota Bene 的论文，这篇论文实际上是专门反对列宁同志的。布哈林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赞成国家，后者反对国家，那就完全错了。其实，差别在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想要组织新的社会生产，集中的生产，即技术上最进步的生产；而分散的无政府主义生产只是意味着退到旧技术，退到旧式企业……”

“……社会民主党是或者至少应当是群众的教师，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着重指出它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 目前的战争表明，国家观念的根蒂已经深深地渗入工人的心灵。”

列宁在1916年发表的一篇有名的论文中批评布哈林的这种观点说：

"这是不对的。作者提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的态度有什么差别，但回答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经济基础的态度有什么差别。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必要的问题。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国家态度上的**主要**差别。社会主义者主张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利用现代国家及其机关，同样也主张必须利用国家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特殊的过渡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的过渡形式，**它也**是一种国家。无政府主义者想'废除'国家，把它'炸毁'("sprengen")，象 Nota Bene 同志在一个地方所说的那样，不过他错误地把这种观点加在社会主义者身上了。社会主义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引得太不完全了——认为资产阶级被剥夺**以后**，国家才会'消亡'，逐渐'泯灭'……"

"要'着重指出''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就必须真正'明确地'了解这种态度。但是作者恰恰没有明确的了解。'国家观念的根蒂'——语是十分含混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不是'国家观念'和对国家观念的否定相冲突，而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即以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即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来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来利用国家反对资产阶级以便推翻这个阶级）相冲突。这是两种完完全全不同的东西。"（《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296页）①

看来很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布哈林滚入了什么样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泥坑！

斯滕：列宁当时还没有详细阐述"炸毁"国家的必要性。布哈林虽然犯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但是已经着手阐述这个问题了。

斯大林：不，现在说的不是这个，现在说的是对于一般国家的态度，说的是布哈林认为工人阶级应当**在原则上**敌视**任何**国家，包括工人阶级的国家在内。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3卷第165—166页。——编者注

斯滕：列宁当时只谈利用国家的问题，在对布哈林的批评中丝毫没有谈到"炸毁"问题。

斯大林：你弄错了。"炸毁"国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而是无政府主义的公式。我敢向你担保，这里说的是布哈林(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工人应当着重指出自己在原则上敌视任何国家，因而也敌视过渡时期的国家，敌视工人阶级的国家的态度。

你试向我们的工人解释一下，说工人阶级应当抱着在原则上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国家。

布哈林在他登载于《青年国际》杂志上的论文中所陈述的观点，是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国家的观点。

布哈林在这里忽略了一件"小事情"，即忽略了整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工人阶级如果真正想镇压资产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就非有自己的国家不可。这是第一。

第二，说列宁同志当时在他的批评中没有提到"炸毁"、"废除"国家的理论，这是不对的。从我所摘引的一段话里可以看出，列宁不仅提到了这种理论，而且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把它视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并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建立**和**利用**新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理论来和它对立。

最后，决不能把"炸毁"和"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国家"消亡"或"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混为一谈。有人喜欢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以为它们是同一思想的表现。但这是不对的。列宁在批评"炸毁"和"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时候，正是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国家"消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据的。

为了使问题更加清楚，我在这里不妨引证列宁同志关于国家问题的一篇手稿，这篇手稿大概是在 1916 年底或 1917 年初(1917

年二月革命前）写的。从这篇手稿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

（一）列宁批评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半无政府主义错误的时候，是以无产阶级国家“消亡”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据的；

（二）照列宁的说法，虽然布哈林“比考茨基接近真理”，但他还是“不但没有揭露考茨基主义者，反而以自己的错误帮助了他们”。

请看这篇手稿的原文：

“1875 年 3 月 18—28 日**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对国家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现在把最重要的地方全部引出来：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sich auflöst) **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黑体是恩格斯用的〉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黑体是恩格斯用的〉一词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的“公社”。’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这大概是所谓‘**反对**国家’的最精彩最激烈的一段了。

（1）‘应当抛弃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

（2）‘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那么是什么呢？显然是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形式！）

（3）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in die Zähne geworfen——直译＝打嘴巴）够了。（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自己

德国朋友的这种明显的错误感到羞愧;—— 但是,他们认为,并且**按当时情况来看**当然是正确地认为,这种错误比起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来要小得多。注意这一点!!)

(4)'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分解("解体")(注意)和消失。'(对照后来的:"消亡")

(5)国家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所需要的(自然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一种暂时的机关'。

(6)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Niederhaltung 就本来意义说不是镇压,而是制止复辟,制服)**无产阶级的敌人**。

(7)一到有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国家了。

(8)'我们'(即恩格斯和**马克思**)建议(在纲领中)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公社'!!!

由此可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庸俗化和玷污了的不仅是机会主义者,而且还有考茨基。

这**八**点极丰富的思想,机会主义者一点也**不**理解!!

他们**仅仅**看到目前的实际需要:利用政治斗争,利用**现代**国家来训练、教育无产阶级,来'争取让步'。这是正确的(和无政府主义者比较),但这还只是百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可以用算术来表达的话。

考茨基在他的宣传活动和一般政论活动中完全抹杀了(或者忘记了?或者不懂得?)1、2、5、6、7、8各点和马克思的'打碎'(在1912年或1913年同潘涅库克的论战中,考茨基(见后面第45—47页)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陷入了机会主义)。

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是:(α)**现在**利用国家,并且(β)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利用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点现在就对实践极其重要。(布哈林正是**忘记了**这两点!)

我们同机会主义者的区别是我们有更深刻、'更永恒的'真理:($\alpha\alpha$)国家是'暂时'的,($\beta\beta$)现在关于国家的'废话'是**有害的**,($\gamma\gamma$)无产阶级专政不完全是国家,($\delta\delta$)国家和自由是矛盾的,($\varepsilon\varepsilon$)用来代替国家的'公团'是个更正确的观念(概念,纲领用语),($\varsigma\varsigma$)'打碎'(Zerbrechen)官僚军事机器。

此外,不应当忘记:对**无产阶级专政**,德国公开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科尔布等等)是直接地否认,而正式纲领和考茨基则是**间接地**否认,在日常宣

传中闭口不谈它，并且容忍科尔布之流的背叛行为。

1916年8月曾写信给布哈林：'让你的关于国家的思想**成熟起来**吧。'但是他**没有让它**成熟起来，就以'Nota bene'为笔名爬上了报刊，结果不但没有揭露考茨基主义者，反而以自己的错误**帮助了他们**！！不过，从实质上看，布哈林比考茨基接近真理。"①

关于国家问题的理论争论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

问题看来已经很清楚：布哈林犯了半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已经是改正这些错误，跟随列宁前进的时候了。但是只有列宁主义者才会这样想。布哈林原来是不同意这一点的。他反而硬说：犯错误的不是他，而是列宁；不是他跟随了或者应当跟随列宁走，相反地，倒是列宁不得不跟随布哈林走。

同志们，你们不认为这是可能的吗？那么，请再往下听吧。1916年发生这些争论后过了九年（在这九年当中布哈林一直保持缄默），**列宁逝世后过了一年**，即在1925年，布哈林在《法的革命》文集上发表了从前《〈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38]编辑部（即列宁）所未予发表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布哈林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公然声称：在这次争论中对的不是列宁，而是他布哈林。同志们，这看来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但这是事实。

请听这个注释的原文吧：

"弗·伊·〈即列宁〉发表了一篇短评来反对《青年国际》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并没有错误，那个错误是硬加在我头上的，因为我清楚地看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从伊里奇的短评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对'炸毁'国家**（当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论点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把这个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问题混淆起来了**②。也许我当时应当更多地发挥专政的问题。但我所能为自己辩护的，就是当时社会民主党人

① 参看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197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26页。——编者注

②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普遍颂扬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炸毁**这个机器的问题上了。

当我从美国回到俄国遇见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时候(这是在我们秘密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时弗·伊·隐藏起来了)，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弗·伊·要我转告你，在国家问题上他现在和你没有意见分歧了。'**伊里奇**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关于'炸毁'**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①，但是他把这个问题，后来又把专政学说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在这方面的理论思想发展中开辟了整整一个时代。"

列宁逝世后**过了一年**，布哈林就是这样议论列宁的。

你们看，这就是没有学成的理论家的过分妄自尊大的标本！

很可能，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真的向布哈林说过布哈林在这里所写的话。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只应当得出一个结论：列宁有某些根据认为布哈林放弃了或准备放弃自己的错误。仅此而已。可是布哈林却另有想法。他认定：从今以后，应当被看作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始者或者至少是提倡者的不是列宁，而是他布哈林。

我们一向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我们是列宁主义者。而现在看来，列宁和我们(他的学生)都是布哈林主义者。同志们，真是有点好笑。可是，既然遇到了布哈林的这种狂妄自大，那有什么办法呢。

也许有人以为布哈林在他上述文章的注释中不过是偶而失言，他说了蠢话，后来就忘了。但这种想法原来是不对的。布哈林说这些话原来是十分认真的。这就从下面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布哈林在这个注释中所做的关于列宁**错误**而布哈林**正确**的声明，在不久以前，就是在1927年，即在布哈林第一次攻击列宁后过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了两年，又在马列茨基所写的布哈林传略中发表了，而布哈林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抗议马列茨基的这种……大胆行为。很明显，布哈林反对列宁的言行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这样说来，对的是布哈林，而不是列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提倡者不是列宁，而是布哈林。

同志们，布哈林的理论偏见和理论野心就是这样。

尽管如此，这个人在这里发言时却还有勇气说我们党的理论观点中"有某种东西腐朽了"，说我们党的理论观点中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

说这种话的就是这个布哈林，就是这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现在犯了（过去也犯过）许多极严重的错误，不久以前还是托洛茨基的门生，昨天还企图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联盟反对列宁主义者，还跑去和他们暗中勾结的布哈林！

同志们，这难道不可笑吗？

（八）五年计划还是两年计划

现在让我来谈谈李可夫的发言。布哈林曾经企图给右倾提供理论根据，而李可夫在他的发言中竭力想为这件事情打下实际建议的基础，拿我国农业方面的困难的"可怕景象"来吓唬我们。这并不是说，李可夫没有涉及理论问题。不，他是涉及理论问题的。可是，他涉及理论问题的时候，至少犯了两个严重错误。

李可夫在他那个被政治局委员会否决了的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草案中说："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在于国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虽然政治局委员会否决了这个完全不正确的观点，但是李可夫在这里发言时仍然为这个观点辩护。

苏维埃国家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话

对不对呢？不，不对。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增长。我们需要的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特定的一种**增长，即能够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贯比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的增长。五年计划如果忘记了这个中心思想，就不是五年计划，而是五年胡说了。

任何一个社会，无论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前的社会，都关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苏维埃**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所关心的不是劳动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增长，而是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比其他经济形式首先比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占优势，因而能够保证战胜和排挤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那种增长。可是，李可夫忘记了**苏维埃**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的这个真正的中心思想。这是他的第一个理论错误。

他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认为从商品流转的角度来看集体农庄和任何个体经济（包括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在内）没有差别，或者不愿意了解这种差别。李可夫断言，从粮食市场上的商品流转的角度看来，从取得粮食的角度看来，他认为集体农庄和粮食私有者之间没有差别，所以在他看来，我们向集体农庄，向粮食私有者还是向阿根廷的某个粮商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是重复人所共知的弗鲁姆金的论调，弗鲁姆金有一个时候曾经断言，在他看来，无论在什么地方和无论向什么人买粮食，向私有者还是向集体农庄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

这是用伪装形式为富农在粮食市场上捣鬼进行辩护、辩解和辩白。虽然这种辩护是从商品流转的角度进行的，但是这个事实终究不能改变为富农在粮食市场上捣鬼做辩护这个实质。如果从商品流转的角度看来集体经济形式和非集体经济形式之间没有差别，那么是否还值得去发展集体农庄，是否还值得给它们优待，是

否还值得去执行战胜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分子这一困难任务呢？显然，李可夫采取了不正确的观点。这是他的第二个理论错误。

这些不过是顺便提一提。现在来谈谈李可夫在发言中提出的实际问题。

李可夫在这里断定说，除了五年计划以外，还需要有另外一个平行的计划，即发展农业的两年计划。他以农业方面的困难作为提出这个平行的两年计划的根据。他说，五年计划是一件好事，他赞成这个计划，但是如果我们同时还提出一个农业的两年计划，那就更好了，否则农业就会停滞不前。

从表面上看，这个提议似乎没有任何坏处。但是如果仔细地看一看，那就可以看出：想出农业的两年计划是为了强调五年计划具有不现实的、纸上空文的性质。我们能不能同意这一点呢？不，不能。我们对李可夫说过：如果你在农业方面不满意五年计划，如果你认为五年计划所规定的用于发展农业的拨款不够，那就请你直率地说出你的补充建议，说出你的追加投资额，我们同意把农业方面的这些追加投资额加进五年计划。结果怎样呢？原来李可夫并没有任何关于农业追加投资的补充建议。试问，究竟为什么需要平行的农业两年计划呢？

其次，我们对他说过：除了五年计划以外，还有年度计划，这是五年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你在发展农业方面的那些具体的补充建议加进头两年的年度计划，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建议的话。结果怎样呢？原来李可夫并不想提出这种具体的追加拨款的计划。

于是我们明白了：李可夫提出两年计划不是为了发展农业，而是想强调五年计划具有不现实的、纸上空文的性质，想破坏五年计划的威信。为了安慰"心灵"，为了装饰门面，就需要五年计划；为

了行动，为了进行实际工作，就需要两年计划，——这就是李可夫的战略。李可夫提出两年计划，是为了以后在五年计划实际执行过程中拿两年计划来和五年计划对立，改编五年计划，使五年计划迁就两年计划，削减工业拨款。

就是根据这些理由，我们否决了李可夫关于平行的两年计划的建议。

(九)播种面积问题

李可夫在这里吓唬党，断言苏联的播种面积有不断缩小的趋势。同时他向党暗示，播种面积的缩小应当归咎于党的政策。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农业正在走向退化。但是他的发言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我们有某种类似退化的现象。

播种面积有不断缩小的趋势，这样说对不对呢？不，不对。李可夫在这里利用的是全国播种面积的平均数。但是使用平均数的方法如果不用按地区统计的材料加以校正，那就不能认为是科学的方法。

也许李可夫曾经读过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他读过，他就应当记得列宁在那本书中怎样责骂那些在估计播种面积的增长时采用平均数的方法而忽视按地区统计的资料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真奇怪，李可夫现在竟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如果按地区观察播种面积的变动情形，就是说，如果科学地对待问题，那就可以看出，一些地区的播种面积在**不断**增加，另一些地区的播种面积**有时**缩减（主要是受气候条件的影响），但是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我国有什么地方，哪怕只是一个重要的产粮区，播种面积在**不断**缩小。

的确，在遭受霜灾或旱灾的地区，例如在乌克兰的某些地区，

播种面积最近有缩小的现象……

有人喊道：并不是整个乌克兰。

施利希特尔：乌克兰的播种面积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七。

斯大林：我指的是乌克兰的草原地带。但是在其他没有受到不良气候条件影响的地区，例如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和巴什基尔，播种面积是不断增加的。

为什么有些地区的播种面积不断增加，而另一些地区的播种面积有时缩小呢？实际上，不能武断地说党的政策在乌克兰是一种，而在苏联的东部或中部是另一种。同志们，这是胡说八道。很明显，气候条件在这里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是的，富农缩小播种面积并不是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这也许应当"归咎于"党的帮助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的政策。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难道我们什么时候答应过实行一种能使农村所有的社会集团（包括富农在内）都满意的政策吗？而且一般说来，如果我们还想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政策，那么难道我们能够实行一种既使剥削者满意又使被剥削者满意的政策吗？如果由于我们实行了列宁的旨在限制和战胜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富农开始部分地缩小他们的播种面积，这又有什么特别呢？难道还能不是这样吗？

也许这个政策不正确，——那么请直截了当地向我们说。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因为富农部分地缩小播种面积而惊慌起来，硬说这是**一般**播种面积的缩小，忘记了除富农以外还有贫农和中农，他们的播种面积正在扩大，忘记了还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的播种面积正在加速增加，这不是很奇怪吗？

最后，在李可夫的发言中，关于播种面积问题还有一个不正确的地方。李可夫在这里抱怨说，在某些地方，即在集体农庄最发

展的地方，贫农和中农的个人耕地开始缩小了。这是事实。但这有什么不好呢？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既然贫农和中农开始抛弃个人耕地而转上集体经济，那么集体农庄的扩大和增多就必然会引起贫农和中农个人耕地的缩小，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而你想要怎样呢？

现在集体农庄有二百多万公顷土地。到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集体农庄将要有二千五百万公顷以上的土地。集体农庄的耕地靠吸收谁的耕地来扩大呢？靠吸收贫农和中农的个人耕地。而你想要怎样呢？否则又怎样把贫农和中农的个体经济引上集体经济的轨道呢？在许多地区，集体农庄的耕地将要靠吸收个人耕地增加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真奇怪，有人竟不愿意了解这些简单的道理。

(十)粮食收购问题

关于我们在粮食方面的困难，有人在这里说了一大堆荒唐话。但是，他们把我们在粮食方面发生暂时性的困难的主要因素忽略过去了。

他们首先忘记了今年我们收获的黑麦和小麦（我说的是总收获量）大约比去年少五至六亿普特。这能够不影响到我们的粮食收购吗？当然不能不影响到。

也许这应当归咎于中央的政策吧？不，这同中央的政策毫不相干。这是由于乌克兰草原地带发生严重歉收(霜灾和旱灾)和北高加索、中部黑土地区、西北地区发生部分歉收的缘故。

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去年截至3月31日，我们在乌克兰收购了二亿普特粮食（黑麦和小麦），而今年只收购了二千六百万至二千七百万普特。

同样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小麦和黑麦的收购量在中部黑土地区几乎减少了八分之七，在北高加索几乎减少了四分之三。

今年在东部某些地区内，粮食收购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但是，这不能补足当然也没有补足我们在乌克兰、北高加索和中部黑土地区少购的数字。

不应当忘记，在收成正常的情况下，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收购的粮食约为全苏联收购的全部粮食的一半。

真奇怪，李可夫竟把这个情况忽略过去了。

最后，还有第二种情况，这种情况也是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发生暂时性的困难的主要因素。我指的是农村富农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反抗。李可夫回避了这个情况。但是回避这个因素，就是回避粮食收购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最近两年来的粮食收购经验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手里有很多余粮并在粮食市场上起重要作用的农村富裕阶层不愿意按照苏维埃政权规定的价格自愿地把必要数量的粮食卖给我们。为了保证城市、工业区、红军和经济作物区的用粮，我们每年大约需要五亿普特粮食。用自流的方法，我们大约能收购三亿至三亿五千万普特。其余的一亿五千万普特就不得不用有组织地对农村富农阶层和富裕阶层施加压力的方法来取得。这就是最近两年来的粮食收购经验向我们说明的问题。

最近两年来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自流的方法从前有成效，而现在已经不够了呢？发生的变化是：这几年来富农和富裕分子成长起来了，几年的丰收对他们发生了作用，他们在经济上巩固了，积蓄了一些资本，因此，他们现在能够在市场上玩弄手腕，把余粮囤积起来等待高价，而依靠其他农产品来周转。

决不能把粮食看作普通商品。粮食不是棉花，棉花是不能吃的，也不是任何人都买的。粮食和棉花不同，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它是人人都买而且没有它就不能生存的一种商品。富农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把粮食囤积起来，并以此感染了一般的粮食持有者。富农知道粮食是宝中之宝。富农知道余粮不仅是他们发财致富的手段，而且是盘剥贫农的手段。在目前情况下，富农手里的余粮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强富农分子的手段。因此，我们从富农手里取得这些余粮，不仅有助于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而且能打破这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强富农的手段。

要取得这些余粮，必须做些什么呢？首先必须消除有害和危险的自流心理。必须**组织**粮食收购工作。必须发动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组织他们共同支持苏维埃政权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的措施。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按照捐献[39]原则实行的粮食收购方法，其意义就在于它能发动农村劳动阶层反对富农以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经验表明，这个方法能使我们获得良好的结果。经验表明，这些良好的结果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我们取得了农村富裕阶层的余粮，从而有助于国家的粮食供应；第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发动了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在政治上教育他们，把他们组织成为我们在农村中的一支强大的千百万人的政治军队。有些同志没有注意到这后一种情况。然而这后一种情况正是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粮食收购方法的重要结果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结果。

固然，这种方法有时候同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的办法结合起来了，于是引起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可笑的号叫。但这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不能在某些时候，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我们的阶级敌人即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呢？为什么在城市里可以成百地逮捕投机分子，把他们放逐到土鲁汉斯克边疆区去，而对于那些进行粮食投

机活动、企图扼杀苏维埃政权并盘剥贫农的富农，就不能用社会强制的方法，按照贫农和中农卖给我们收购机关粮食的价格去收购他们的余粮呢？这是从哪里得出来的结论呢？难道我们党曾经表示过**在原则上**反对对投机分子和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吗？难道我们没有对付投机分子的法律吗？

显然，李可夫和布哈林主张**在原则上**反对对富农采取任何非常措施。但是要知道，这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你们不会不知道，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以后甚至主张恢复贫农委员会[40]政策——当然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那么对富农部分地采取非常措施又算得什么呢？这和贫农委员会政策比较起来，甚至算不得沧海一粟。

他们，布哈林集团的拥护者，希望说服阶级敌人自愿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余粮自愿卖给我们。他们希望那些已经成长起来、进行着投机活动、有可能依靠其他农产品来玩弄手腕而把余粮藏起来的富农按照我们的收购价格自愿把自己的余粮卖给我们。他们不是疯了吗？他们不懂得阶级斗争的奥秘，不知道什么是阶级，这不是很明显吗？

他们是不是知道在为加强粮食收购工作而召开的村民大会上，富农怎样嘲弄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政权呢？他们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事实，例如在哈萨克斯坦，我们的鼓动员花了两个钟头劝说粮食持有者把粮食拿出来供应国家，可是富农口里衔着烟斗走出来回答说："小伙子，你跳个舞，我就给你两普特粮食。"

喊声：混蛋！

斯大林：你们试试说服这样的人吧。

是的，同志们，阶级就是阶级。谁也逃不出这个真理。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方法的好处其实就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发动贫农和

中农阶层去反对富农，它能够帮助我们击破富农的反抗，强迫他们把余粮交给苏维埃政权机关。

目前在布哈林集团中最时髦的字眼就是粮食收购工作中的“过火行为”。这个字眼在他们那里是最畅销的货物，因为它能够帮助他们掩盖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当他们想掩盖自己的路线时，他们通常总是说：我们当然不反对对富农施加压力，可是，我们反对在这方面所发生的触及中农的过火行为。接着他们就叙述这些过火行为的“可怕景象”，宣读“农民”的来信，宣读马尔科夫一类同志的张皇失措的信，然后就做出结论：必须取消对富农施加压力的政策。

请看：**因为**在实行正确的政策中有过火行为，**所以就必须取消这个正确的政策**。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段就是：借口在实行正确的路线中有过火行为，就来取消这条路线，用机会主义的路线来代替它。同时，布哈林集团的拥护者处心积虑地保持缄默，绝口不提还存在着另一种过火行为，更危险和更有害的过火行为，即同富农结合，迁就农村富裕阶层，用右倾分子的机会主义政策来代替党的革命政策。

当然，我们大家都反对这些过火行为。我们大家都反对对富农的打击触及中农。这是很明显的，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但是，我们坚决反对用布哈林集团所热心使用的那套关于过火行为的废话来取消我们党的革命政策，用布哈林集团的机会主义政策来代替我们党的革命政策。不，他们这套把戏是骗不了人的。

请你们说一说，党的哪一个政治措施在实行中没有发生过某种过火行为。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是，难道可以**根据这一点**来斥责唯一正确的路线本身吗？

就拿实行七小时工作制这样的措施来说吧。毫无疑问，这个

措施是我们党最近所实行的最革命的措施之一。谁不知道，我们实行这个实质上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的措施时常常发生许多过火行为，有时是最可恶的过火行为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应当取消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政策呢？

布哈林反对派的拥护者是不是知道，他们拿粮食收购工作中的过火行为做王牌，是滚到什么样的泥坑里去了呢？

（十一）外汇储备和粮食输入问题

最后，略为谈谈粮食输入和外汇储备问题。我已经说过，李可夫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曾经屡次提出从国外输入粮食的问题。李可夫起初说必须输入八千万至一亿普特粮食。这大约需要两亿卢布的外汇。后来他提出输入五千万普特，即价值一亿卢布（外汇）的粮食的问题。我们否决了这种做法，认定对富农施加压力，取得他们握有的大批余粮，要比花费准备用来输入我国工业设备的外汇好些。

现在李可夫改变了进攻的方向。现在他硬说资本家要贷给我们粮食，而我们似乎不想接受。他说，从经过他的手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资本家愿意贷给我们粮食。同时他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人，或者由于任性，或者由于其他某种不可理解的原因而不愿意接受贷给我们的粮食。

同志们，这都是胡说。如果以为西方的资本家突然怜悯起我们来，愿意几乎白白地或者长期地贷给我们几千万普特粮食，那就可笑了。同志们，这是胡说。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各种不同的资本家集团想摸我们的底，想试探我们的财政力量、我们的支付能力、我们的坚定性已经有半年了。他们找我国驻巴黎、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和阿根

廷的商务代表，答应以三个月或最多六个月的最短期的信贷方式卖给我们粮食。他们要达到的与其说是想以信贷方式卖给我们粮食，不如说是想探知我们的情况是否真的困难，我们的财政力量是否真的已经枯竭，我们的财政状况是否稳固，我们是否会上他们的钩。

目前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对于我国的财政力量问题争论得很厉害。有些人说，我们已经破产，苏维埃政权的垮台即使不是几星期的事，也只是几个月的事了。另外一些人说，这话不对，苏维埃政权很稳固，它有财政力量和足够的粮食。

现在的任务在于我们要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和刚毅性，不要理睬关于贷给我们粮食的虚伪诺言，要向资本主义世界表明：我们不输入粮食也行。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根据这个理由，我们决定拒绝南森之类的各种慈善家关于以信贷方式输入苏联一百万美元粮食的建议。

根据同一理由，我们对巴黎、美国、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这些资本主义世界的侦探关于贷给我们少量粮食的建议给了否定的回答。

根据同一理由，我们决定在粮食消费方面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在粮食收购方面发挥最高度的组织性。

我们这样做是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避免输入粮食，保存外汇以输入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向我们的一切敌人表明，我们稳固地屹立着，我们不打算理睬小恩小惠的诺言。

这样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我认为它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它所以正确，不仅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在我国内部发现了取得粮食的新的可能性。它所以正确，还因为我们既然避免了输入粮食，既然抛

开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侦探，我们就巩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提高了自己的支付能力，并彻底粉碎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即将灭亡”的胡说。

前几天，我们和德国资本家的代表们进行了几次初步谈判。他们答应给我们五亿贷款，并且事情看来是这样的：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业得到苏联的订货，的确认为给我们这笔贷款是必要的。

前几天，英国保守党代表团来到我国，他们为了保证自己得到苏联的工业订货，也认为有必要确认苏维埃政权是巩固的，给我们贷款是适当的。

我想，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出我在上面说过的那种必要的坚定性，我们就不会有取得贷款的这些新的可能性，就不能首先从德国人方面，随后又从一部分英国资本家方面得到贷款。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我们似乎因为任性而拒绝接受以想象中的长期信贷方式贷给我们的想象中的粮食。问题在于要识破我们敌人的面目，识破他们的真正意图，并表现出为巩固我国国际地位所必需的刚毅性。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拒绝输入粮食的原因。

由此可见，粮食输入问题并不象李可夫在这里所说的那样简单。粮食输入问题是我国的国际地位问题。

五
党的领导问题

这样，我们就分析了我们在理论方面以及在我们党在共产国际内的政策和对内政策方面发生意见分歧的一切主要问题。从上

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李可夫说我们有**一致的**路线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实际上我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党的总路线，是我们党的革命的列宁路线。另一条是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在布哈林集团中有想象不到的糊涂观点，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第二条路线在党内的势力很小，于是总想用某种方法伪装起来。但是你们可以看出，这条路线还是存在着，而且是一条同党的路线**不同的**路线，是一条几乎在我们政策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右**倾的路线。

现在来谈谈党的领导问题。

(一)布哈林集团的派别活动问题

布哈林说我们党内没有反对派，说布哈林集团不是反对派。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从全会的争论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布哈林集团是新反对派。这个集团的反党活动在于它企图修正党的路线，它企图修改党的路线，并准备条件使另一条路线即反对派的路线(它只能是右倾的路线)代替党的路线。

布哈林说三人团不是派别集团。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布哈林集团含有派别活动的一切因素。这里既有政纲，又有派别性的小圈子，既有辞职政策，又有反对中央的有组织的斗争。还需要什么呢？既然布哈林集团的派别活动的真相已经昭然若揭，为什么还要隐瞒呢？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就是为了在这里说出我们意见分歧的全部真相。而真相就是布哈林集团是派别集团。而且这不是普通的派别集团，我可以说它是我们党内有过的一切派别集团中最讨厌最爱吹毛求疵的派别集团。

这就从他们现在企图利用阿扎尔骚动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来

达到他们的派别目的这一点也看得出来。其实，这个所谓阿扎尔"暴动"同喀琅施塔特暴动[41]那样的暴动比较起来算得什么呢？我认为，和这种暴动比较起来，所谓阿扎尔"暴动"甚至算不得沧海一粟。是否有过托洛茨基分子或季诺维也夫分子企图利用这种严重的喀琅施塔特暴动来反对中央、反对党的事情呢？同志们，应该承认，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相反地，在发生这种严重暴动的时期，存在于我们党内的一些反对派集团都曾经帮助党来镇压暴动，不敢利用暴动来反对党。

而现在布哈林集团是怎样做的呢？你们已经有机会看到，他们企图最卑鄙最无耻地利用这个极小的阿扎尔"暴动"来反对党。这不是极端严重的由派别性造成的头脑发昏和吹毛求疵，又是什么呢？

看来，他们要求我们做到在和资本主义国家接壤的边疆地区不发生骚动事件。看来，他们要求我们实行一种能使我们社会中的一切阶级，使富人和穷人，使工人和资本家都感到满意的政策。看来，他们要求我们做到在我们这里没有不满分子。布哈林集团中的这些同志不是疯了吗？

怎么能要求我们这些和国内外资本主义世界作斗争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做到在我们国内没有不满分子，在和敌视我们的国家接壤的某些边疆地区不会偶而发生骚动事件呢？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使国际资本能竭尽全力在我国边疆地区组织我国不满分子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发动，那又是为了什么呢？除了头脑简单的自由派以外，还有谁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呢？派别性的吹毛求疵有时能把人弄到自由派的盲目无知和目光短浅的地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二)忠顺和集体领导问题

李可夫在这里断言，布哈林对我们党中央来说是最“无可责难”和最“忠顺”的党员之一。

请允许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我们不能相信李可夫的话。我们需要事实。李可夫却拿不出事实来。

例如拿布哈林同那个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的加米涅夫集团进行幕后谈判，即进行关于组织派别联盟、改变中央政策、更换政治局委员、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反对中央的谈判来说吧。试问，布哈林对自己中央的“忠顺”和“无可责难”究竟在哪里呢？

相反地，这不就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完全违反对自己的中央、对自己的党忠顺吗？如果这叫作对中央的忠顺，那么什么叫作对自己的中央的背叛呢？

布哈林爱说忠顺，爱说老实，但是为什么他不想看看自己，问问自己：他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幕后谈判反对自己的中央，因而背叛了自己的中央，是不是最不老实地违反了忠顺于自己的中央的起码要求呢？

布哈林在这里说党中央缺乏集体领导，并且要我们相信，是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委员违反了集体领导的要求。

当然，我们的全会对一切都容忍。它也可以容忍布哈林的这些厚颜无耻的假仁假义的话。但是只有真正不知羞耻的人才敢于在全会上这样反对大多数中央委员。

事实上，既然大多数中央委员都驾上国家的大车，尽一切力量向前拉，请求布哈林集团在这项艰难的事业中帮帮忙，而布哈林集团不但不帮助自己的中央，反而千方百计地加以阻碍，把棍子投到车轮下，以辞职相威胁，并和党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商量反对我们

党中央，那么在这里还谈得上什么集体领导呢？

除了伪君子以外，还有谁能否认，和托洛茨基分子建立反党联盟而背叛自己中央的布哈林，不愿意而且不会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中实行集体领导呢？

除了瞎子以外，还有谁能看不见，布哈林之所以总是空谈中央的集体领导，指摘大多数中央委员，就是为了以此掩盖自己的背叛立场呢？

应当指出，布哈林违反忠顺于党中央的起码要求和党中央集体领导的起码要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42]，当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布哈林在和约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后就跑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3]那里，跑到我们党的敌人那里，和他们进行幕后谈判，企图和他们结成联盟来反对列宁和中央。当时他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了些什么，可惜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打算逮捕列宁并举行反苏维埃政变……　然而最奇怪的是：布哈林一方面跑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和他们串通一气进行反对中央的秘密活动，一方面却继续叫喊（也象现在这样）必须实行集体领导。

此外，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有过这样的例子：当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布哈林在我们党的莫斯科区域局中拥有多数并得到“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支持时竟号召全体党员表示不信任党中央、拒绝服从党中央并提出我们党内的分裂问题。这是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在中央已经通过必须接受布列斯特和约条件的决议以后的事情。[44]

布哈林的忠顺和集体领导就是这样。

李可夫在这里说必须实行集体工作。同时他指出他和他的最

亲密的朋友主张集体工作，这样也就是暗指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是反对集体工作的。但是，李可夫没有举出一个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话。

为了揭穿李可夫的这种无稽之谈，让我举出几个事实，几个例子，来说明李可夫是怎样实行集体工作的。

第一个例子。你们都知道向美国输出黄金的事情。也许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以为黄金是根据人民委员会或中央的决定，或者是得到中央的同意，或者是通知中央之后向美国输出的。但是，同志们，事实不是这样。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同这件事情毫无关系。我们有一个非经中央批准不得输出黄金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被违反了。究竟是谁准许输出黄金的呢？原来是李可夫的一位副手告知李可夫并得到他的同意之后准许输出黄金的。

这是什么，是集体工作吗？

第二个例子。这是关于和美国一家私营大银行谈判的问题。这家银行的财产在十月革命后被收归国有，现在它要求赔偿损失。中央已经得悉，我们国家银行的代表正在和这家银行谈判赔偿它的损失的条件。

你们知道，赔偿私人损失问题是同我国对外政策有直接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许有人以为这个谈判是得到人民委员会或中央的准许进行的。但是，同志们，事实不是这样。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同这件事情毫无关系。后来，中央得悉这个谈判之后，决定停止谈判。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是谁批准这个谈判的呢？原来是李可夫的一位副手告知李可夫并得到他的同意之后批准这个谈判的。

这是什么，是集体工作吗？

第三个例子。这是关于供应富农和中农农业机器的问题。事

情是这样：俄罗斯联邦经济委员会①（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李可夫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位副手）决定**减少**对中农的农业机器供应，**增加**对农村上层阶层即富农的机器供应。请看俄罗斯联邦经济委员会的这个反党反苏维埃的决议原文：

"在哈萨克和巴什基尔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西伯利亚边疆区和下伏尔加边疆区、中伏尔加州和乌拉尔州，本条指出的农业机器和农具的销售百分数，对农村上层阶层**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对中农阶层**降低**到百分之三十。"

请看：在党加紧向富农进攻并组织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的时期，俄罗斯联邦经济委员会却通过了关于**降低**对中农的机器供应额和**提高**对农村上层阶层的供应额的决议。

这就叫作列宁的共产主义政策！

后来，中央知道了这件怪事之后，撤销了经济委员会的决议。但是，是谁批准这个反苏维埃决议的呢？是李可夫的一位副手告知李可夫并得到他的同意之后批准这个决议的。

这是什么，是集体工作吗？

看来，这些例子尽够说明李可夫和他的副手是怎样实行集体工作的了。

（三）反右倾斗争问题

布哈林说，被我们党的组织"恶意攻击"（用他的话说）的三个政治局委员受到了"公民死刑"[45]。他说，党在报刊和会议上批评三个政治局委员即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错误，是使他们受到了"公民死刑"，而他们这三个政治局委员却"不得不"默不作声。

① 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　——编者注

同志们，这都是胡说。这是一个自由主义化的共产党员企图削弱党的反右倾斗争的谎话。在布哈林看来，如果他和他的朋友犯了右倾错误，那么党没有权利揭露这些错误，党应该停止反右倾的斗争，等待布哈林和他的朋友自愿地放弃自己的错误。

布哈林对我们的要求岂不是太多了吗？他是否以为党是为他而存在，不是他为党而存在呢？当全党都动员起来反对右倾并向困难进行坚决攻击的时候，谁强迫他默不作声，静坐不动呢？为什么他布哈林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现在不出来进行坚决斗争去反对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呢？如果布哈林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决定采取这个并不怎么困难的步骤，党是会欢迎他们的，这一点难道有谁会怀疑吗？究竟为什么他们不决定采取这个他们终究必须采取的步骤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把自己集团的利益摆在党和党的总路线的利益之上呢？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没有参加反右倾的斗争，这究竟应该怪谁呢？关于三个政治局委员受到“公民死刑”的那些话，是这三个政治局委员想强迫党默不作声并停止反右倾斗争的一种掩饰得很拙劣的企图，这不是很明显吗？

决不能把反右倾的斗争看作我们党的次要任务。反右倾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决定性的任务之一。如果我们在自己的队伍里，在自己的党内，在领导运动和引导无产阶级前进的无产阶级政治参谋部里，容许右倾分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动，而右倾分子正在企图涣散党，瓦解工人阶级，使我们的政策适合“苏维埃”资产阶级的口味，从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面前低头，——如果我们容许这一切，那么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岂不是意味着我们准备逐渐消灭革命，瓦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逃避困难，把阵地让给资本主义分子吗？

布哈林集团是否懂得，拒绝和右倾作斗争就是背叛工人阶级，

背叛革命呢？

布哈林集团是否懂得，不克服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就不可能克服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而不克服这些困难，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胜利呢？

既然如此，那么所谓三个政治局委员受到“公民死刑”的抱怨还有什么价值呢？

不，同志们，布哈林分子用所谓“公民死刑”这种自由派的废话是吓不倒党的。党要求他们和我们党的全体中央委员站在一个行列中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坚决的斗争。党要求布哈林集团这样做，是为了有助于动员工人阶级，击破阶级敌人的反抗并彻底克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

或者布哈林分子执行党的这个要求，那么党就会欢迎他们；或者他们不这样做，那么就让他们自己去埋怨自己吧。

六
结 论

现在我来做结论。

我提出下列几项建议：

（1）首先应该斥责布哈林集团的观点。应该斥责这个集团在它的宣言和它的代表的发言中所陈述的观点，认定这些观点是同党的路线不相容而同右倾的立场完全一致的。

（2）应该斥责布哈林和加米涅夫集团的幕后谈判，认定这是布哈林集团不忠顺和派别活动的最明显的表现。

（3）应该斥责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所实行的辞职政策，认定这

是严重违反党纪的起码要求的行为。

（4）应该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现任职务，并警告他们，如果再有任何不服从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情形，中央委员会将不得不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

（5）应该采取措施，使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在会议上的言论中没有任何违背党的路线、离开中央和中央各机关的决议的地方。

（6）应该采取措施，使一切机关报刊（无论是党的或苏维埃的，无论是报纸或杂志），都完全执行党的路线和党的各个领导机关的决议。

（7）应该规定特别办法（直到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来对付那些企图泄漏党、党中央委员会、党政治局的决议的机密的人。

（8）应该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关于党内问题的决议分发给各地方党组织和出席第十六次代表会议[46]的代表，暂时不在报刊上公布。

在我看来，出路就是这样。

有些同志坚持立即取消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资格。我不同意这些同志的意见。在我看来，现在不必采取这种极端办法。

全文第一次发表于《斯大林全集》第12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96页

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

（叶·米库林娜《群众的竞赛》一书序言）

几乎用不着怀疑，在我国建设事业中，目前广泛展开的千百万工人群众的竞赛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也是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家各个不同角落的整个整个工厂的竞赛，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竞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之间的竞赛，这种群众性的生产上的挑战应战在劳动者的专门合同中固定下来，——所有这些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表明，群众的社会主义竞赛已经展开了。

劳动群众的强大的生产高潮开始了。

甚至最悲观的怀疑论者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了。

列宁说："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自己的才能。有才能的人在人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他们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残、压制和窒息了。……"

"……只有现在才广泛地、真正普遍地使群众有可能表现进取心，进行竞赛和发挥大胆首创的精神。……"因为"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了**……"

"……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竞赛。"①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46]关于竞赛问题发出专门的告工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92页和第393页。——编者注

人和劳动者书就是以列宁的这些论点为根据的。

有些官僚主义的"同志"认为竞赛是布尔什维克的一种例行的时髦花样，既然是时髦花样，就一定会随着"季节"的结束而消失。这些官僚主义的"同志"当然是错了。实际上，竞赛是在千百万劳动群众最大**积极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方法**。实际上，竞赛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杠杆**。

另外一些官僚主义的"同志"被竞赛的巨浪吓倒了，他们企图给竞赛制造人为的框子，对竞赛加以限制，把竞赛事业"集中"起来，缩小它的规模，从而去掉竞赛中最重要的东西——群众的**主动性**。不用说，官僚主义者的企图是不会实现的。无论如何，党是会采取一切办法来粉碎这种企图的。

不能把社会主义竞赛看做办公室里的事情。社会主义竞赛是群众实事求是的革命的**自我批评**的表现，这种**自我批评**所依靠的是千百万劳动者的创造**主动性**。凡是有意无意地压制群众的这种自我批评和这种创造主动性的人，都是我们伟大事业的障碍，应被一脚踢开。

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具体地表现在它束缚群众的干劲、主动性和自动精神，它埋没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工人阶级和农民内部的巨大的潜力，它不让我们利用这些潜力去同我们的阶级敌人作斗争。社会主义竞赛的任务就是要粉碎这些官僚主义的束缚，为发挥群众的干劲和创造主动性开辟广阔的天地，发掘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的巨大的潜力，让这些潜力在反对我们国内外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发挥作用。

有时人们把社会主义竞赛和竞争混为一谈。这是很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竞赛和竞争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

竞争的原则是：**一些人的失败和死亡**，另一些人的胜利和统治。

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同志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

竞争是：**打败落后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

社会主义竞赛是：一些人工作得不好，另一些人工作得好，再有一些人工作得更好，——**赶上更好的**以达到**普遍的提高**。

其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社会主义竞赛能使千百万劳动群众表现出空前未有的生产热情。不用说，竞争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产生任何类似这种群众热情的东西。

近来我们的报刊上关于竞赛的文章和报道越来越多了。人们说到竞赛的哲学、竞赛的根源、竞赛的可能结果等等。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报道：比较连贯地描写**群众自己如何**进行竞赛，千百万工人群众在实行竞赛和签订合同时的**体验如何**，工人群众怎样把竞赛事业看作**自己的切身事业**。可是，这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正是竞赛的极重要的一面。

我认为叶·米库林娜同志的小册子是根据竞赛的**实际**材料来连贯地叙述竞赛是劳动群众自己的事情的第一次尝试。这本小册子的优点在于它朴素而真实地叙述了构成社会主义竞赛内部动力的那些伟大劳动高潮的深刻过程。

1929 年 5 月 11 日

载于 1929 年 5 月 22 日
《真理报》第 114 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
第 97—100 页

大转变的一年

（为纪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而作）

过去的一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生大**转变**的一年。这个转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的标志下进行的。这个进攻的特点在于它已经使我们在我国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建（改造）事业的各个主要方面取得了许多决定性的**胜利**。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党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适当地利用了我们的退却，以便在以后，在新经济政策的下几个阶段组织**转变**并向资本主义分子实行**胜利的进攻**。

列宁在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说过：

“我们现在退却，好象是右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快跑，更有力地向前跳。仅仅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才在施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时向后退却……以便在退却之后开始极顽强地向前进攻。”（《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61—362页）①

过去一年的总结毫无疑问地说明，党在自己的工作中胜利地执行了列宁的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指示。

* *

*

如果拿过去一年对我们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建设方面的总结来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5页。——编者注

看，那么我们在这条战线上进攻的**胜利**，我们过去一年的**成就**，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主要部分。

一

在劳动生产率方面

几乎用不着怀疑，最近一年来我国建设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就是我们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达到了**决定性的转变**。这个转变表现于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发挥了**创造主动性**，掀起了强大的**劳动高潮**。这是我们过去一年的第一个主要**成就**。

群众的创造主动性的发挥和劳动高潮的掀起是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促成的：

（一）通过**自我批评**反对束缚着群众劳动主动性和劳动积极性的官僚主义；

（二）通过**社会主义竞赛**反对旷工和破坏无产阶级劳动纪律的分子；

（三）通过实行**连续生产制**[47]反对生产中的守旧思想和因循习惯。

结果，我们在劳动战线上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在我们这个辽阔广大的国家的每个角落里都可以看到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的劳动热情和他们在劳动中挑战应战的情形。而这个成就的意义实在是无可估量的，因为只有千百万群众的劳动高潮和劳动热情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如果没有这种增长，社会主义在我国就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列宁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342页）①

根据这一点，列宁认为：

"我们必须充满劳动热情、劳动意志和顽强精神，因为现在只有这样才能最迅速地拯救工人和农民，拯救国民经济。"（《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77页）②

这就是列宁在党面前提出的任务。

过去的一年表明，党胜利地执行了这个任务，坚决地克服了这条道路上的困难。

党在过去一年的第一个重要成就就是这样。

二

在工业建设方面

党的第二个成就是和党的第一个成就密切地联系着的。党的第二个成就就是我们在过去一年中基本上顺利解决了重工业基本建设的**资金积累问题，加快了速度**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并创造了把我国变为**金属**国家的前提。

这就是我们过去一年的第二个主要**成就**。

轻工业问题没有特别的困难。这个问题我们在几年以前就已经解决了。比较困难、比较重要的是重工业问题。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6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63页。——编者注

所以**比较困难**，是因为它需要大量投资，而且工业落后的国家的历史表明，重工业没有大量长期的借款是不能发展的。

所以**比较重要**，是因为不发展重工业我们就无法建立任何工业，就无法实行任何工业化。

但是因为我们过去和现在既没有得到长期的借款，也没有得到比较长期的信贷，所以问题的尖锐性对我们就非常明显了。

世界各国的资本家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拒绝给我们借款和信贷，他们以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资金积累问题，我们在改造重工业问题上必定失败，因而不得不向他们低头，受他们盘剥。

过去一年的总结在这方面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过去一年的总结的意义在于它彻底粉碎了资本家老爷们的如意算盘。

过去的一年表明，尽管苏联受到公开的和隐蔽的金融封锁，可是我们并没有去受资本家盘剥，而且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胜利地解决了资金积累问题，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这一点现在连工人阶级的死敌也不能否认了。

第一，既然去年大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是十六亿多卢布，其中约有十三亿卢布投入了重工业，而今年大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是三十四亿多卢布，其中有二十五亿多卢布将投入重工业；第二，既然去年大工业的总产值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其中重工业的总产值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而今年大工业的总产值应当增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重工业的总产值应当增加百分之四十六，——那么重工业建设的资金积累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已经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们正在加快步伐沿着发展我国重工业的路线前进，超过旧速度，把我们"历来的"落后性扔在后面，这难道可以怀疑吗？

既然如此，那么五年计划的预计数字在过去一年已经超额完

成，被资产阶级文人看做“无法实现的梦想”的、使我们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布哈林集团）胆战心惊的五年计划**最高**方案实际上变成了五年计划**最低**方案，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列宁说：“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的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 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 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补助，那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文明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49页）①

请看，列宁是多么尖锐地提出资金积累问题和党在建立重工业方面的任务。

过去的一年表明，党胜利地执行了这个任务，坚决地克服了这条道路上的种种困难。

这当然不是说工业不会再有严重的困难了。建立重工业的任务不仅会遇到资金积累问题，而且会遇到干部问题，就是：

（一）**吸收**成千上万的拥护苏维埃的技师和专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二）**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新的红色技师和红色专家的问题。

如果说资金积累问题可以认为基本上已经解决了，那么干部问题却还待解决。而在目前工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情况下，干部问题正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列宁说：“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 **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07页）②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66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20—221页。——编者注

很明显，这里所说的首先是“文化力量”问题，是一般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和工业管理的干部问题。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尽管在资金积累方面取得了对重工业具有重要意义的极大成就，但是只要干部问题没有解决，建立重工业的问题就不能认为已经完全解决了。

因此，党的任务是：切实地解决干部问题，无论如何要攻下这个堡垒。

党在过去一年的第二个成就就是这样。

三
在农业建设方面

最后，谈谈党在过去一年的第三个成就，这个成就是和前两个成就有机地联系着的。这里指的是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从细小的落后的**个体**经济进到巨大的先进的**集体**农业，进到共耕制，进到机器拖拉机站，进到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进到用数百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装备起来的巨大的国营农场。

这里党的成就在于我们已经使许多地区的基本农民群众从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转到**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仅仅有利于一小撮富翁资本家，而绝大多数农民不得不破产和忍受贫困的痛苦；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则排挤富翁资本家，按新方式重新武装中农和贫农，用新工具，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来武装中农和贫农，使他们摆脱贫困和富农的盘剥，走上协作的集体耕种制的广阔道路。

党的成就在于我们已经在农民中间组织了这种**根本转变**，并引导了广大的贫农和中农群众跟着我们前进，尽管我们遇到了许多难以置信的困难，尽管各色各样的黑暗势力，从富农和神父到庸人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进行了疯狂的反抗。

请看几个数字。

1928年，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是一百四十二万五千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是六百多万公担（三千六百多万普特），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是一百三十九万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约三百五十万公担（二千多万普特）。

1929年，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是一百八十一万六千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约八百万公担（约四千七百万普特），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是四百二十六万二千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约一千三百万公担（约七千八百万普特）。

在即将到来的1930年，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照控制数字规定大概将达到三百二十八万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将是一千八百万公担（约一亿一千万普特），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必将达到一千五百万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将是四千九百万公担左右（约三亿普特）。

换句话说，在即将到来的1930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商品谷物产量将要达到四亿多普特，即占**整个**农业商品谷物产量（农村外的流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应当承认，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连我国社会主义化的大工业也**未曾有过**，虽然这种工业的发展速度一般说来已经很快了。

很明显，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大农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有着伟大的前途，它将显示出发展的奇迹。

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取得这个空前的胜利是有许多原因的，

其中至少应当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取得这个胜利是因为党执行了列宁的教育群众的政策，通过开展合作社运动逐步地引导农民群众走向集体农庄。取得这个胜利是因为党从两方面进行了胜利的斗争，一方面反对那些企图超过运动而用命令手段发展集体农庄的人（"左的"清谈家），另一方面反对那些企图把党拉向后退而做运动尾巴的人（右倾糊涂虫）。党如果不执行这样的政策，就不能把集体农庄运动变为农民自己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列宁说："当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清楚地知道，农村中的建设将遇到很大困难，在这里必须更加稳步前进，在这里企图用法令和命令来实行共耕制是极端荒谬的，能够赞成共耕制的只有极少数的觉悟农民，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决定这样做。因此，我们仅仅采取了革命发展所绝对必需的办法：决不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而要等到前进的运动从这些群众亲身的经验中、从他们亲身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252页）①

如果说党在集体农庄建设战线上取得了极大的胜利，那么这是因为党切实地执行了列宁的这个策略指示。

其次，在农业建设方面取得这个空前的胜利是因为苏维埃政权正确地估计到了农民对新农具、新技术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正确地估计到了农民保存旧式耕作方法就没有出路，并且估计到这一切之后及时地给了农民许多帮助：成立农具租赁站、拖拉机队和机器拖拉机站，组织农民共耕，建立集体农庄，用国营农场的力量从各方面帮助农民经济。

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政权，苏维埃政

① 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124页。——编者注

权，它用事实证明了它有决心而且有能力给予劳动农民群众以系统的长期的生产上的帮助。

历来苦于缺乏农具的劳动农民群众，走上了集体农庄运动的道路，就不会不热烈欢迎这种帮助，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从今以后，工人的旧口号“面向农村”大概要用集体农民的新口号“面向城市”来补充，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最后，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取得这个空前的胜利是因为我国先进工人担任了这项工作。我指的是成十成百地散布在我国各主要地区的工人工作队。必须承认，在一切现有的和可能有的集体农庄运动宣传员中，工人宣传员对于农民群众是最好的宣传员。工人已经说服了农民，使他们相信集体大经济比个体小经济优越，并且现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是显示出这种优越性的明显的例证，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成就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成就在我看来是近几年来一切成就中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

“科学”的反对意见，即否认建立面积四至五万公顷的大规模谷物工厂是可能的和适当的那种意见，已经破产而且被粉碎了。实践推翻了“科学”的反对意见，再一次表明了不仅实践应当向“科学”学习，而且“科学”也不妨向实践学习。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大规模谷物工厂是扎不下根的。但是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忘记这个“小小的”差别。

在资本家那里，因为存在着土地私有制，所以不购买许多土地或不缴纳绝对地租，就不能建立大规模谷物工厂，而要这样做就不能不使生产担负很大的开支。在我们这里则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既没有绝对地租，也没有土地的买卖，

这就不能不为大规模谷物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在资本家那里，建立大规模谷物农场的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或者至少是获得相当于所谓平均利润率的利润，一般说来，不这样资本家就没有兴趣去建立谷物农场。在我们这里则恰恰相反，大规模谷物农场同时又是国营农场，它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发展既不需要最大限度的利润，也不需要平均利润率，可以只限于最低限度的利润，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利润，这又为大规模谷物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大规模谷物农场无论在信贷上或税收上都没有特别的优待，而在以支持社会主义经济为宗旨的苏维埃制度下，现在和将来都有这种优待。

最可敬的"科学"竟把这一切都忘记了。

右倾机会主义者（布哈林集团）的断言已经破产而且被粉碎了，他们断定说：

（一）农民不会加入集体农庄；

（二）加速发展集体农庄只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工农结合的破裂；

（三）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大道"**不是**集体农庄，**而是**合作社；

（四）发展集体农庄和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会使国家没有粮食。

所有这些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陈词滥调都已经破产而且被粉碎了。

第一，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而且是整村、整乡、整区加入的。

第二，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不是削弱而是巩固了工农结合，给了工农结合以新的、生产的基础。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如果基

本农民群众还有什么严重的不满，那就不是由于苏维埃政权的集体农庄政策，而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在供应农民机器和拖拉机方面赶不上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

第三，关于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大道"的争论，是只有艾亨瓦尔德和斯列普科夫一类年轻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才会去进行的烦琐争论。很明显，当没有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时候，合作社的低级形式即供销合作社是"大道"，而当合作社的高级形式即它的集体农庄形式出现的时候，集体农庄就成为发展的"大道"了。

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加引号的大道，这个计划包括农业合作社的一切形式，从低级形式（供销合作社）到高级形式（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把集体农庄同合作社对立起来**，就是侮辱列宁主义并证明自己愚昧无知。

第四，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如果不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如果不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我们现在既不会有今年粮食收购方面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也不会有已经积蓄在国家手中的几千万普特常备粮。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的发展，我们正在完全摆脱粮食危机，或者说已经摆脱粮食危机。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更加迅速地发展下去，那就没有理由怀疑，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

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新现象**是什么呢？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象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这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的基础，而这个根本转变是苏维埃政权过去

一年最重要的成就。

托洛茨基主义的所谓工人阶级没有本领领导基本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孟什维克“观点”正在破产，正在被粉碎。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中农转到集体农庄方面来了。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工业和农业的五年计划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年计划，那些不相信我国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人是没有权利庆贺我们的五年计划的。

世界各国资本家梦想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点希望——“神圣的私有制原则”正在破灭，正在化为泡影。被他们看作资本主义滋养料的农民正在大批大批地离开被颂扬的“私有制”旗帜而走上集体制的轨道，走上社会主义的轨道。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点希望正在破灭。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资本主义分子拚命企图发动旧世界一切力量来反对正在进攻的社会主义，因而使阶级斗争尖锐化。资产阶级是不愿意“长入”社会主义的。

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资产阶级的走狗，形形色色的司徒卢威和盖森、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唐恩和阿布拉莫维奇最近对布尔什维主义发出了恶毒的狂吠。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点希望正在消失，这可不是开玩笑。

阶级敌人的这种发狂的憎恨和资产阶级走狗的这种恶毒的狂吠，除了证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困难的战线上确实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列宁说：“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耕种制的优越性，只有用协作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了农民，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

第579页)①

列宁就是这样提出把千百万农民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的方法问题的，就是这样提出把农民引上集体农庄建设轨道的方法问题的。

过去的一年表明，党胜利地执行了这个任务，坚决地克服了这条道路上的种种困难。

列宁说："只有我们真正改进和改善了中农生活的经济条件，中农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会站到我们方面来。如果我们明天能够拿出十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驾驶员(你们很清楚地知道，这在目前还是一种梦想)，那么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康姆尼'(即赞成共产主义)。可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必须迫使它给予我们这些拖拉机，或者必须把我们的生产率提高到能够自己制造这些拖拉机的程度。只有这样提出这个问题才是对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170页)②

列宁就是这样提出在技术上重新武装中农的方法问题的，就是这样提出把中农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方法问题的。

过去的一年表明，党也胜利地执行了这个任务。大家知道，到即将到来的1930年的春天，我们的田野上将要有六万多台拖拉机，再过一年将要有十万多台拖拉机，而再过两年就会有二十五万多台拖拉机了。几年前认为是"梦想"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把它变为现实，而且绰绰有余了。

这就是中农转到"康姆尼"方面来的原因。

党的第三个成就就是这样。

党在过去一年的几个主要成就就是这样。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06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184—185页。——编者注

结　论

我们正在开足马力沿着工业化的道路前进，向社会主义前进，把我们“俄罗西”历来的落后性扔在后面。

我们的国家正在变成金属的国家，汽车化的国家，拖拉机化的国家。

当我们使苏联坐上汽车，使农夫坐上拖拉机的时候，让那些以自己的“文明”自夸的可敬的资本家们试试追上我们吧。我们还要看看，到那时哪些国家可以“评定”为落后的国家，哪些国家可以“评定”为先进的国家。

1929年11月3日

载于1929年11月7日
《真理报》第259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
第106—121页

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

（1929年12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者
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48]上的演说）

同志们！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件主要事实，人们普遍注意的一件事实，就是集体农庄运动在蓬勃发展。

目前集体农庄运动的特点是：不仅象过去那样有一批一批的贫农加入集体农庄，而且连中农也大批地加入集体农庄了。这就是说，集体农庄运动已经由一批一批的和个别阶层的劳动农民的运动变成几百万几千万基本农民群众的运动了。这一点也应该用来说明下面这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具有**反富农**性质的汹涌澎湃的集体农庄运动，正在自己的道路上扫除富农的反抗，击破富农，为农村中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

但是，如果说我们有理由以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际**工作成就自豪，那么关于我们在一般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的**理论**工作成就就不能这样说了。而且应当承认，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我们的实际工作成就和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但是，理论工作不仅必须赶上实际工作，而且要超过实际工作，武装我们的实际工作者去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我不想在这里多讲理论的意义。你们对于理论的意义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大家知道，理论如果是真正的理论，就能使实际工作者有能力确定方针，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

必定胜利。这一切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而且不能不具有莫大的意义。糟糕的是我们正是在这方面，在我国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方面开始跛脚了。

否则又怎样解释在我们这里，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关于我国经济问题还流行着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呢？怎样解释这些大大小小的理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反击呢？怎样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原理，这些能消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的特效解毒剂，竟开始被遗忘，不在我们报刊上广泛宣传，没有被提到首要地位呢？不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理论作不调和的斗争，就不能彻底战胜阶级敌人，这难道很难了解吗？

新的实践产生对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的新的看法。现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新的提法。为了不落后于实践，必须立即根据新的情况研究这一切问题。不这样就不能战胜那些引起我们实际工作者思想混乱的资产阶级理论。不这样就不能根除这些已经成为顽固偏见的理论。因为只有和理论上的资产阶级偏见作斗争，才能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

现在让我从这些被称为理论的资产阶级偏见中拿出几个来批判一下，并通过对我国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的说明来揭示出这些偏见的荒诞性。

一

"平 衡" 论

你们当然知道，在共产党员中间还流行着一种所谓我国国民

经济两种成分"平衡"论。这种理论当然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右倾营垒中的许多人在鼓吹这种理论。

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我们首先有社会主义成分，——这是一个箱子；此外，我们还有非社会主义成分，或者说资本主义成分，——这是另一个箱子。这两个箱子沿着不同的轨道和平地向前移动，互不相撞。大家知道，按几何学说来，平行线是不会相交的。可是，这个高明理论的编造者认为，这两条平行线总有一天会相交，而当它们相交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没有看到，在这两个所谓"箱子"后面站着阶级，而这两个"箱子"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在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进行的斗争中移动的。

不难了解，这种理论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不难了解，从客观上说，这种理论的目的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经济的阵地，用"新的"理论武器把富农分子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农庄，破坏集体农庄的阵地。

可是，这种理论直到现在还在我们的报刊上流行着。而且不能说它已经受到我们的理论家的严重反击，更不用说致命的反击了。发生这种荒诞的事情，不是由于我们的理论思想落后，又是由于什么呢？

其实，只要用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再生产理论来反击，就能把两种成分平衡论批得体无完肤。的确，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教导说，现代社会不逐年实行积累就不能发展，而没有逐年扩大的再生产就不能实行积累。这是很明白易懂的。我们的集中的社会主义大工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发展的，因为它的规模每年都在扩大，它有自己的积累，并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的大工业并没有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相反地，在我

国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还是小农经济。能不能说我国小农经济是按照扩大再生产原则发展的呢？不，不能这样说。我国小农经济的大部分不仅不能实现逐年扩大的再生产，相反地，连简单再生产也很少有可能实现。如果农业基础是这样一种既不能实现扩大再生产而又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小农经济，那么能不能加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呢？不，不能。能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呢？不，不能。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部崩溃。

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农业成为大农业，使农业能实行积累和实现扩大再生产，从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

但是怎样使农业成为大农业呢？

要做到这一点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就是用在农业中培植资本主义的方法使农业成为大农业，结果是使农民贫困，使资本主义企业在农业中发展起来。我们屏弃了这条道路，因为它是和苏维埃经济不相容的。

另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农业中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结果是使小农经济联合成为以技术和科学装备起来的集体大经济，这种经济有可能向前发展，因为它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

因此，问题就是这样：或者走第一条道路，或者走第二条道路；或者向资本主义**后退**，或者向社会主义**前进**。任何第三条道路都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平衡"论就是企图指出第三条道路。正因为它指望着第三条（不存在的）道路，所以它是空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

因此，只要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来反击，就能把两种成分

"平衡"论批得体无完肤。

为什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不这样做呢？谁需要使这种可笑的"平衡"论在我们报刊上流行，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束之高阁呢？

二
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

现在来谈政治经济学中的第二种偏见，即第二种资产阶级类型的理论。我指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流"论，这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是，我们右倾营垒中的同志们竭力鼓吹这种理论。

这种理论的编造者的论断大致如下：我们这里有过资本主义，当时工业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而农村是自发地、自流地跟着资本主义城市走，按照资本主义城市的形象进行改造的。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这样，为什么在苏维埃经济制度下不能也是这样呢？为什么农村，小农经济不能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自发地按照社会主义城市的形象进行改造呢？这种理论的编造者根据这一点就断言农村能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农村本来就能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我们何必为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操心，我们何必争吵呢？

你们看，这又是一种从客观上说来目的在于给农村资本主义分子一种新武器来反对集体农庄的理论。

这种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

而我们的理论家直到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去痛斥这种引起我

们集体农庄实际工作者思想混乱的奇怪理论，这不是很奇怪吗？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城市对个体小农农村的领导作用是巨大而不可估量的。正因为如此，工业对农业有改造的作用。但是，单靠这个因素是否就能使小农的农村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自流地跟着城市走呢？不，不能。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自发地跟着城市走，因为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的小商品个体经济就其基础来说是**同一类型的**经济。当然，小农商品经济还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就其基础来说它和资本主义经济是同一类型的，因为它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列宁在评论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时说得万分正确，他说："农民的商品**资本主义趋势**"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① 是完全相反的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③（**列宁**）。

能不能说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就其基础来说和城市中的社会主义生产也是同一类型的呢？很明显，如果不离开马克思主义，是不能这样说的。否则列宁就不会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④

因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流"论是一种腐朽的反列宁主义的理论。

因此，要使小农的农村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除了其他一切办

① 黑体是列宁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页。——编者注

③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1页。——编者注

④ 同上，第399页。——编者注

法以外，还必须在农村中**培植**社会主义大经济，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作为能**带领**基本农民群众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的社会主义基地。

因此，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城市只有在农村中**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按照新的，即社会主义的方式来改造农村，才能**带领**小农的农村前进。

奇怪的是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受到我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家应有的反击。

三
小农经济“稳固”论

现在来谈政治经济学中的第三种偏见，即小农经济“稳固”论。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大经济优越于小经济的著名论点，认为这个论点只在工业中有效，而在农业中是不适用的。鼓吹这种理论的大卫和赫茨之类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企图“依据”的事实是：小农吃得苦，耐得劳，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甘愿忍受任何困苦；因此，小农经济在和农业中的大经济作斗争的时候就表现出稳固性。

不难了解，这种“稳固性”比任何不稳固性都坏。不难了解，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有一个目的：赞美和巩固那个使千百万小农群众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因为这种理论有这样的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很容易就把这种理论击破了。

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的实践，我们的实际情况提供了反对这种理论的新论据，而我们的理论家却令人奇怪

地不愿意利用或不会利用这种新武器去反对工人阶级的敌人。我所指的实践是：土地私有制已经消灭，土地已经国有化，小农正在摆脱对自己那一小块土地的奴隶般的依恋，因而易于从小农经济转向集体大经济。

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过去和现在而且在将来还会把西欧的小农束缚在他们的小商品经济上呢？首先而且主要的是他们私有的一小块土地，是土地私有制。他们为了买一小块土地成年累月地攒钱，他们买到以后，自然就不愿离开它，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他们的个体经济的基础，他们宁愿忍受各种困苦，宁愿陷入愚昧和贫困的境地。

能不能说这个因素在我们这里，在苏维埃制度条件下还同样继续发生作用呢？不，不能这样说。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土地私有制。正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我们这里的农民也就没有西方农民的那种对一小块土地的奴隶般的依恋。这种情况不能不使小农经济易于转上集体农庄的轨道。

这就是在我们这里，在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农村的大经济，农村的集体农庄能够很容易地显示出对小农经济的优越性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消灭了绝对地租、废除了土地私有制而实行了土地国有化的苏维埃土地法的伟大革命意义。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我们拥有新论据去反对那些说小农经济在反对大经济的斗争中表现出稳固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究竟为什么我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家不充分地利用这个新论据去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理论呢？

我们实行土地国有化的根据，就是《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的名著《剩余价值理论》和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所提供的理论前

提，这些著作是最丰富的理论思想宝库。我指的是关于一般地租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绝对地租的理论。现在很明显，这些著作的理论原理已经在我们城乡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光辉的证实。

只是令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恰扬诺夫一类的“苏维埃的”经济学家的反科学理论应当在我们报刊上通行无阻，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地租和绝对地租理论的天才著作就不应当广泛宣传并提到首位，倒应当束之高阁呢？

你们大概记得恩格斯的《农民问题》这本著名的小册子。你们当然记得恩格斯多么慎重地对待把小农引上合作经济道路即集体经济道路的问题。让我从恩格斯的这本小册子中引证有关的一段话吧：

“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①②

你们看，恩格斯多么慎重地对待把个体农民经济引上集体制轨道的问题。怎样解释恩格斯的这种初看起来似乎过分慎重的态度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显然，他的出发点是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农民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农民）很难离开它。西方的农民就是这样。存在着土地私有制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就是这样。当然，在这里是需要十分慎重的。

能不能说在我们苏联也有同样的情况呢？不，不能这样说。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国不存在把农民束缚在他们的个体经济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1页。——编者注

上的土地私有制。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国实行了使个体农民易于转上集体制轨道的土地国有化。

这就是近来我们的集体农庄运动能够比较容易和比较迅速地发展的原因之一。

遗憾的是我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家还没有打算把我国农民的情况和西方农民的情况之间的这种差别尽量清楚地揭示出来。但是，这样的工作不仅对我们苏维埃工作人员，而且对世界各国共产党人都会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将来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初期，究竟要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在没有这种基础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这对于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我在不久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大转变的一年》①）中发挥了几个人所共知的证明农业中的大经济优越于小经济的论据，在那里我指的是大规模的国营农场。无须证明，所有这些论据也完全适用于集体农庄这种大经济单位。我说的不仅是那些有机器拖拉机基础的发达的集体农庄，而且是那些代表集体农庄建设中所谓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依靠农民的原有农具的初级集体农庄。我指的是目前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所建立的那些不过是把农民的生产工具集合起来使用的初级集体农庄。

例如拿前顿河州霍漂尔河地区的集体农庄来说吧。从表面上看，这些集体农庄在技术方面似乎和小农经济没有区别（机器少，拖拉机少）。其实，在集体农庄里面单是把农民的工具集合起来使用就产生了我们的实际工作者所梦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效果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转上集体农庄轨道后播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三

① 见本卷第196—209页。——编者注

十，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五十。为什么会有这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效果呢？因为农民在单干条件下是没有力量的，而在他们把自己的工具集合起来并联合为集体农庄以后，就变成了巨大的力量。因为农民已经有可能开垦在单干条件下难以开垦的熟荒地和生荒地。因为农民已经有可能把生荒地拿到自己手里。因为已经有可能把空地、零星小块土地和地界等等利用起来。

开垦熟荒地和生荒地问题对于我国农业有极大的意义。你们知道，过去俄国革命运动的轴心就是土地问题。你们知道，土地运动的目的之一是要消除缺地现象。当时许多人认为缺地现象是绝对的，就是说，俄国再没有适于耕种的闲地了。而实际情形怎样呢？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在苏联有过而且现在还有几千万公顷的闲地，但是农民用他们可怜的工具是根本无法开垦这些土地的。正因为农民过去无法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所以他们就趋向于耕种“熟地”，耕种属于地主的土地，耕种适于在单干条件下用农民原有的农具耕种的土地。这就是“缺地”的根本原因。因此，无怪乎我们的以拖拉机装备起来的谷物托拉斯现在有可能使用约两千万公顷的闲地，这些土地是农民没有耕种过的，而且是以单干的方式用小农的农具所不可能耕种的。

各个阶段（不论是初级阶段或是用拖拉机装备起来的较发达的阶段）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农民现在已经有可能使用熟荒地和生荒地了。这就是农民过渡到集体劳动之后播种面积大大扩大的秘密所在。这就是集体农庄优越于个体农民经济的一个根本原因。

不用说，当我们的机器拖拉机站和机器拖拉机队去帮助全盘集体化地区的初级集体农庄的时候，当集体农庄本身有可能把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集中在自己手里的时候，集体农庄对个体农民

经济的优越性就更加不容争辩了。

四
城市和乡村

关于所谓"剪刀差"问题，存在着一种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培植的偏见，对这种偏见也象对其他一切不幸还流行在苏联报刊上的资产阶级理论一样，应该宣布无情的战争。我指的是一种认为十月革命给予农民的东西似乎比二月革命少，认为十月革命其实什么也没有给予农民的理论。

这种偏见有一个时候曾被一位"苏维埃的"经济学家在我们的报刊上宣扬过。固然，这位"苏维埃的"经济学家后来放弃了自己的理论。(有人喊道："这个人究竟是谁?")这个人就是格罗曼。但是，这种理论得到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拥护，并被利用来反对党。而且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定，这种理论目前在"苏维埃的"舆论界已经不流行了。

同志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牵涉到城乡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它牵涉到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问题。它牵涉到最迫切的"剪刀差"问题。因此，我认为这种奇怪的理论是值得分析一下的。

说农民从十月革命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这是否正确呢？让我们看看事实吧。

我手里有著名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同志的著名统计表，这个统计表在我的《在粮食战线上》一文中发表过①。从这个统计表中

① 见本卷第45页。——编者注

可以看出，革命前地主"生产"的粮食不下六亿普特。所以，**地主**当时是六亿普特粮食的持有者。

根据这个统计表，**富农**当时"生产"的粮食是十九亿普特。这是富农当时所拥有的一种很大的力量。

根据同一个统计表，**贫农**和**中农**生产的粮食是二十五亿普特。

这就是旧的农村，十月革命前的农村的情景。

十月革命后农村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可以引用同一个统计表的数字。例如拿1927年来说吧。**地主**在这一年生产了多少粮食呢？很明显，他们一点也没有生产，而且也不可能生产，因为地主已经被十月革命消灭了。你们一定懂得，这必然大大改善农民的状况，因为农民摆脱了地主的羁绊。这当然是农民由于十月革命而得到的很大的好处。

富农在1927年生产了多少粮食呢？不是十九亿普特，而是六亿普特。可见富农的力量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被削弱了三分之二以上。你们一定懂得，这不能不改善贫农和中农的状况。

而**贫农和中农**在1927年生产了多少粮食呢？不是二十五亿普特，而是四十亿普特。可见贫农和中农在十月革命后所生产的粮食比革命前多了十五亿普特。

这就是说明贫农和中农从十月革命得到了莫大好处的事实。

这就是十月革命给予贫农和中农的东西。

既然如此，怎么能硬说十月革命没有给予农民任何东西呢？

但是，同志们，还不止此。十月革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消灭了土地的买卖，实行了土地国有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在农民要生产粮食，完全用不着购买土地了。从前，他们为了购买土地成年累月地攒钱，只要买到土地，情愿借债，情愿遭受盘剥。购买土地的费用当然加在粮食生产的成本上。现在农民用不着这

样做了。现在农民不必购买土地就能生产粮食。因此，农民用来购买土地的几亿卢布，现在都留在农民的荷包里了。这是什么，是改善了农民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善农民的状况呢？显然是改善了农民的状况。

其次，直到最近，农民还不得不以单干方式使用旧式农具耕种土地。大家都知道，使用旧式的、现在已经不适用的生产工具单干，不能为生活得好些，为不断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发展自己的文化和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道路提供必要的好处。现在，在大力开展集体农庄运动以后，农民已经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同邻居的劳动联合起来，联合为集体农庄，开垦生荒地，利用熟荒地，得到机器和拖拉机，从而把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甚至两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由于联合为集体农庄，农民现在已经有可能用同样的劳动生产出比以前多得多的东西。因此，这就是说，粮食生产的成本比以前低得多了。最后，这就是说，在价格稳定的情况下，农民出卖粮食得到的钱会比以前多得多。

既然如此，怎么能硬说十月革命没有给予农民好处呢？

说这种荒唐话的人显然是在诬蔑党，诬蔑苏维埃政权，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剪刀差"问题，消灭"剪刀差"问题，现在应当有新的提法。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如果集体农庄运动以现有的速度发展下去，"剪刀差"在最近期间就会消灭。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城乡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城乡之间的对立将加速消除。

同志们，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有极大的意义。它改变着农民的心理，使他们面向城市。它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

创造了基础。它为用集体农民的“面向城市”的口号补充党的“面向农村”的口号创造了基础。

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因为现在农民从城市得到了机器、拖拉机、农艺师、组织者以及为反对和战胜富农所需要的直接帮助。极不信任城市，把城市看做强盗的旧式农民退到后面去了。代替他们的是对城市抱着希望，希望从城市得到**生产上的**实际帮助的新式农民，即集体农民。生怕下降为贫农而只想悄悄地（会剥夺选举权啊！）上升到富农地位的旧式农民，已经被有着新的前途——加入集体农庄，摆脱贫困和愚昧而走上经济和文化高涨的广阔道路的新式农民所代替了。

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变化的。

同志们，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家竟没有采取一切办法，去痛斥和根除一切企图诋毁十月革命的成果和日益增长的集体农庄运动的资产阶级理论。

五
关于集体农庄的本质

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经济**类型**，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之一。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有一个人在这里发言时诋毁集体农庄。他断言集体农庄这种经济组织同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毫无共同之处。同志们，我必须指出，对集体农庄做这样的估计是完全不正确的。毫无疑问，这种估计是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经济类型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很明显，是由人们在生产过程

中的关系决定的。否则还有什么可以决定经济类型呢？但是，难道在集体农庄里有生产资料占有者阶级和生产资料被剥夺的阶级吗？难道在集体农庄里有剥削者阶级和被剥削者阶级吗？难道集体农庄不是在属于国家的土地上实行基本生产工具公有化吗？有什么根据断言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经济类型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之一呢？

当然，在集体农庄里是有矛盾的。当然，在集体农庄里是有个人主义残余甚至富农思想残余的，这些残余还没有消失，但是过一个时候，随着集体农庄的巩固，随着集体农庄的机械化，这些残余必定会消失。但是整个说来，把矛盾和缺点都包括在内，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经济**因素基本上是农村的新的发展道路，是和富农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相反的**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难道可以否认吗？在我国条件下，集体农庄（我说的是集体农庄，而不是冒牌的集体农庄）是在同资本主义分子进行殊死搏斗中发展起来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基地和策源地，这难道可以否认吗？

有些同志企图诋毁集体农庄，把它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式，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不是很明显吗？

1923年我们还没有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列宁在他的《论合作制》一书中指出的是合作社的一切形式，既包括它的低级形式（供销合作社），也包括它的高级形式（集体农庄）。他当时关于合作社，关于合作社企业是怎样说的呢？请看列宁的《论合作制》一书中的一段话吧：

"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①，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96页)①

可见列宁并不是把合作社企业孤立起来观察，而是把它们和我们的现存制度联系起来观察，注意到合作社企业是在生产资料属于国家的国家里，在属于国家的土地上经营的；列宁这样观察合作社企业之后，就断定它们和社会主义企业并无不同之处。

列宁关于一般合作社企业就是这样说的。

关于目前的集体农庄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这样说，这不是很明显吗？

列宁认为在我国条件下“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②，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你们可以看出，上面提到的那位发言人诋毁集体农庄，是犯了极严重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

从这个错误中产生了他的另一个错误——关于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这位发言人把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说得有声有色，使人会以为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农庄外的阶级斗争**并无不同之处**。甚至会以为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更加残酷。而且不只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发言人一个人犯了这种错误。空谈阶级斗争，叫嚷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是目前我们的一切“左的”空喊家的特征。在这种叫嚷中最可笑的是这些叫嚷者在没有或几乎没有阶级斗争的地方“看见了”阶级斗争，而在有阶级斗争并且阶级斗争很尖锐的地方却看不见阶级斗争。

集体农庄内是否有阶级斗争的因素呢？是的，是有的。既然集体农庄内还保存着个人主义心理甚至富农心理的残余，既然集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6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687页。——编者注

体农庄内还存在着物质生活状况方面的某些不平等现象，那么集体农庄内就不能没有阶级斗争的因素。能不能说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农庄外的阶级斗争是相同的呢？不，不能。我们的“左的”清谈家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这个差别。

集体农庄**外的**，集体农庄成立**以前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同**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并用这些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盘剥**贫农的富农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

而集体农庄**基础上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就是说，富农已经被击溃并被剥夺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其次，这就是说，贫农和中农已经在基本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联合为集体农庄。最后，这就是说，这是集体农庄庄员之间的斗争，他们中间一部分人还没有摆脱个人主义残余和富农思想残余，企图利用集体农庄内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图利营私，而另一部分人想把这些残余和这些不平等现象从集体农庄中铲除掉。只有瞎子才看不见集体农庄基础上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农庄外的阶级斗争之间的差别，这不是很明显吗？

如果以为有了集体农庄，就有了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那就错了。如果以为集体农庄庄员已经变成社会主义者，那就更错了。不是的，要改造集体农民，克服他们的个人主义心理，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还必须做很多工作。集体农庄机械化实现得愈快，集体农庄拖拉机化实现得愈快，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愈快。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弱集体农庄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杠杆的极大的意义。集体农庄的伟大意义，正在于它是农业中采用机器和拖拉机的主要基地，是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改造农民、改造农民心理的主要基地。列宁说得对：

“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只有

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关于小农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的可以说是全部心理健全起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239页）①

集体农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只有通过它，千百万个体小农才能参加拥有机器和拖拉机的大经济，而机器和拖拉机是经济繁荣的杠杆，是农业按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杠杆，谁能否认这一点呢？

我们的"左的"清谈家把所有这些都忘记了。

我们的这位发言人也把这一点忘记了。

六

阶级变动和党的政策中的转变

最后谈谈国内阶级变动和社会主义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问题。

我们党最近一年来的工作的特点就是：

（一）我们党、我们苏维埃政权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展开了全线进攻；

（二）大家知道，这个进攻产生了并且继续产生着非常显著的**良好**结果。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实行并且还在继续实行我们整个政策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5页。——编者注

直到最近，党都是主张**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的。大家知道，这个政策早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8]上就已经宣布了。这个政策在施行新经济政策时以及在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8]上又重新宣布了。大家都记得列宁评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纲的著名的信①（1922年），列宁在那封信里再一次说到必须实行这个政策的问题。最后，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3]又肯定了这个政策。直到最近，我们都是实行这个政策的。

这个政策是否正确呢？是的，它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在五年或者三年以前，我们能不能向富农举行这样的进攻呢？当时我们能不能指望这样的进攻获得胜利呢？不，不能。这样做就是最危险的冒险主义。这样做就是最危险地以进攻为儿戏。因为这样做我们一定会失败，既然失败了，就会使富农的阵地巩固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在农村还没有能够据以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的据点，即广大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网。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可能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社会主义生产**代替**富农的资本主义生产。

在1926—1927年期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曾拚命强迫党采取立刻向富农进攻的政策。党没有采取这种危险的冒险行动，因为党知道，严肃的人是不能允许自己以进攻为儿戏的。向富农进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决不能把它和反富农的高调混为一谈。也不能把它和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拚命强迫党采取的同富农扭打的政策混为一谈。向富农进攻，这就是摧毁富农并把它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离开这些目的，进攻就是高调，就是扭打，就是空喊，随便叫作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叫作真正的布尔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8—212页。——编者注

什维克的进攻。向富农进攻，这就是准备实际行动，打击富农，而且把他们打得再也站不起来。这就是我们布尔什维克所说的真正的进攻。在五年或者三年以前，我们能不能举行这样的进攻而指望获得胜利呢？不，不能。

的确，富农在1927年生产了六亿多普特粮食，其中通过农村外的交换卖出了大约一亿三千万普特。这是一个十分严重而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时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了多少呢？大约八千万普特，其中运到市场去的（商品粮食）约为三千五百万普特。请你们自己判断一下，我们当时能不能用我们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和商品粮食**代替**富农的生产和商品粮食呢？显然不能。

在这种情况下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一定会失败，一定会加强富农的阵地而落到没有粮食的境地。正因为如此，当时尽管有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冒险主义高调，我们也不能够而且不应当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

可是现在呢？现在的情况怎样呢？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来打击富农，摧毁富农的反抗，把它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大家知道，1929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粮食不下于四亿普特（比1927年富农经济的总产量少二亿普特）。其次，大家知道，1929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的商品粮食在一亿三千万普特以上（即比1927年富农的商品粮食多些）。最后，大家知道，1930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粮食总产量将不下于九亿普特（即比1927年富农的总产量多），而它们所提供的商品粮食将不下于四亿普特（即比1927年富农的商品粮食多得多）。

同志们，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国经济中所发生的变动。

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生产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我们向富农举行的坚决进攻现在取得了不容置疑的胜利。

如果说的是真正的坚决进攻，而不限于空洞的反富农高调，那就应当这样向富农进攻。

这就是我们近来从**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的原因。

那么，对于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怎样办呢？是否可以容许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呢？——各地的人们问。真是可笑的问题！当我们主张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可能转为向富农坚决进攻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可能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生产的时候，剥夺富农财产是不能容许的。那时不容许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而现在呢？现在情形不同了。现在我们有可能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击破富农的反抗，把它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现在剥夺富农财产是由实行全盘集体化的贫农和中农群众自己进行的。现在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单纯的行政措施。现在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多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头都掉了，何必怜惜头发呢。

还有一个同样可笑的问题：能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

七
结　论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的理论工作决不能忽略的六个关键问题。

这些问题的意义首先在于对这些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就能根除一切资产阶级理论，而这些理论有时——真叫我们丢脸——竟被我们的党员同志传播着，引起我们的实际工作者的思想混乱。早就应该铲除这些理论，抛弃这些理论了。因为只有和诸如此类的理论作无情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的理论思想才能成长和巩固起来。

最后，这些问题的意义在于它们使过渡时期经济中的旧问题有了新面貌。

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集体农庄问题，过渡时期的经济问题，现在都有了新的提法。

必须揭露有些人把新经济政策了解为退却而且仅仅了解为退却的那种错误。事实上，列宁还在施行新经济政策时就曾说过，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退却，它同时又是为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举行新的坚决进攻作准备。

必须揭露有些人认为需要新经济政策只是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的那种错误。我们需要的不是城乡之间的任何一种联系。我们需要的是能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那种联系。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

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

还必须提出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问题。必须研究编制我国国民经济平衡表提要的问题。中央统计局在1926年当作国民经济平衡表公布的东西，不是平衡表，而是数字游戏。巴扎罗夫和格罗曼对国民经济平衡表问题的见解也是不合适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把苏联国民经济平衡表的提要制定出来，如果他们一般说来愿意研究过渡时期的经济问题的话。

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分出一部分工作人员根据过渡时期经济问题在目前发展阶段的新的提法去专门研究这些问题，那就好了。

载于1929年12月29日
《真理报》第309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
第126—151页

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亲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

非常抱歉，信回迟了(太迟了!)，请不要骂我。我忙得不成样子。此外，还生过一点病。这当然不能成为理由，但也能说明一点问题。

(1)我们不能没有自我批评。无论如何不能，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没有自我批评，机关的停滞和腐朽，官僚主义的滋长，工人阶级创造主动性的破坏就不可避免。当然，自我批评会给敌人提供材料。在这一点上你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也为我们的前进，为劳动者建设力量的发挥，为竞赛的展开，为突击队等等提供材料(和推动力)。好处是会抵销和超过坏处的。

可能我们的报刊过分强调了我们的缺点，有时候甚至(无意地)宣扬了这些缺点。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可以肯定的。这当然不好。因此，你要求用我们的成绩来平衡我们的缺点(依我说，要使成绩来超过缺点)。在这一点上你当然也是正确的。我们一定立即弥补这个缺陷。这一点你可以不用怀疑。

(2)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青年。有垂头丧气的，疲倦懈怠的，悲观失望的(例如捷宁)。也有朝气勃勃的，活泼愉快的，意志坚强和不达胜利决不罢休的。现在，当我们割断生活中的旧联系而建立新联系的时候，当我们破坏走惯了的老路而铺设没有走惯的新路的时候，当从前过着富裕生活的整批整批居民脱离他们的生活常

规而不能再起作用，给从前受压制、受折磨的千百万人让开道路的时候，青年不可能都是清一色的同情我们的群众，他们中间不可能没有分化和分裂。第一，在青年中间有富家子弟。第二，即使拿我们自己的（按社会地位）青年来说，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意志、力量、毅力和理解力，能认识到大规模破坏旧事物和急速建设新事物这种景象是**理所当然的**因而是**合乎心愿的**，但又远不是那种让人能够"休息"和"享福"的"四海升平"的天堂般的理想境界。显然，在这种"令人头痛的混乱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没有疲倦懈怠的人，神经过度紧张的人，未老先衰的人，悲观失望的人，开小差的人以及投到敌人阵营里去的人。这是革命不可避免要花的"费用"。

现在主要的是：在青年中间起领导作用的不是垂头丧气的人，而是我们的战斗的共青团员——摧毁资本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建设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解放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奴役者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数众多的新一代的核心。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也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3）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采取有组织地从思想上（以及从其他一切方面）进行诱导的办法来竭力减少灰心者、叫苦者、怀疑者等等的人数。相反地，我们的党、我们的文化组织、我们的报刊、我们的苏维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这方面的工作并力争作出重大成绩。因此，我们（我们的朋友）完全接受你的建议：

（一）创办《在国外》杂志[49]；

（二）出版一些关于"国内战争"的通俗文集，吸收阿·托尔斯泰和其他文学家参加这个工作。

不过必须附加一句：这些事情一件也不能交给拉狄克或他的哪一个朋友去领导。问题不在于拉狄克的善良心愿或诚恳态度。问题在于派别斗争的逻辑，而他和他的朋友并没有完全放弃这种

斗争(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会推动他们进行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并且不仅我们党的历史)教导说,事物的逻辑比人的心愿的逻辑更有力量。如果把这些事情交给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领导,而吸收拉狄克和他的朋友做撰稿人,那就会更正确些。这样做会更正确些。

(4)我们认真地讨论了关于创办专门杂志《论战争》的问题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没有出版这种杂志的理由。我们认为比较适当的是在现有的**政治**杂志上论述战争问题(我说的是**帝国主义**战争)。况且不能把**战争**问题同**政治**问题分开,因为战争是政治的表现。

至于描写战争的小说,那必须严加选择之后再出版。在书籍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描写战争"惨祸"、引起对**一切**战争(不仅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也对其他**一切**战争)反感的文艺小说。这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小说。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的小说,它们能够把读者从注意**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祸引导到了解必须打倒组织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政府。此外,要知道我们不是反对**一切**战争。我们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因为它是反革命的战争。但是我们**拥护**解放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战争,虽然大家知道这种战争不仅没有免于"流血的惨祸",甚至充满了这种惨祸。

在我看来,沃朗斯基打算声讨战争"惨祸"的立场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没有多大区别。

(5)你说得完全正确,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报刊上,在反宗教宣传问题上极为混乱。有时竟说出了有利于敌人的令人惊奇的蠢话。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多极了。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和做反宗教工作的同志们商谈你的建议。关于这一点我下次写信告诉你。

（6）我不能满足加米古洛夫的请求。没有时间！此外，我算什么批评家，真是见鬼！

就此搁笔。

紧紧握手并祝你健康。

谢谢你的问候。

约·斯大林

听说你需要一位俄国医生。是真的吗？想要哪一位？请来信告知，一定派去。

约·斯·

1930年1月17日

第一次发表于《斯大林全集》第12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2—155页

胜利冲昏头脑

（论集体农庄运动的几个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苏维埃政权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的胜利。甚至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获得了重大胜利。这些胜利确实是伟大的。

截至今年2月20日，苏联全国百分之五十的农户已经集体化了，这是事实。这就是说，截至1930年2月20日，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集体化五年计划的一倍以上。

截至今年2月28日，集体农庄**已经**收集了春播用的种子三千六百多万公担，等于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约合二亿二千万普特，这是事实。不能不承认，在粮食收购计划顺利完成以后，单是集体农庄方面就收集了二亿二千万普特种子，这是一个极大的成就。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说明**农村向社会主义的根本转变可以认为已经有保障了。**

无须证明，这些胜利对于我们国家的命运，对于作为我国领导力量的整个工人阶级以及对于党本身都有极大的意义。姑且不说直接的实际结果，这些胜利对于党本身的内部生活，对于我们党的教育也是有巨大意义的。这些胜利鼓起了我们党的勇气和对自己力量的信心。这些胜利用相信我们的事业必胜的信念武装了工人阶级。这些胜利把千百万新的后备力量吸引到我们党的周围。

因此，党的任务是：**巩固**既得的胜利，有计划地**利用**这些胜利以求进一步的前进。

但是，胜利也有它的阴暗的一面，特别当它是比较"容易地"，所谓"出乎意料之外地"得到的时候。这样的胜利有时使人产生自负和骄傲的心理："我们什么都能干！""我们什么都不在乎！"这些胜利往往使人陶醉，人们也就开始被胜利冲昏头脑，丧失权衡轻重的知觉，丧失了解现实的能力，出现过高估计自己力量而过低估计敌人力量的倾向，出现想"一下子"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问题的冒险企图。这样也就不会关心**巩固**既得的胜利和有计划地**利用**这些胜利以求进一步的前进。为什么我们要巩固既得的胜利呢，我们就这样也能"一下子"跑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因为"我们什么都能干！""我们什么都不在乎！"

因此，党的任务是：和这种对事业有害的危险情绪作坚决斗争，把它从党内清除出去。

不能说这种对事业有害的危险情绪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什么广泛的散布。但是，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毕竟是有的，而且没有根据可以断定说这种情绪不会加强起来。如果这种情绪在我们这里蔓延开来，那么毫无疑问，集体农庄运动就会大大削弱，这个运动被破坏的危险就会成为现实。

因此，我们报刊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揭穿诸如此类的反列宁主义的情绪。

举几个事实来说。

1. 我们的集体农庄政策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政策是以集体农庄运动的**自愿原则**和**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为依据的。决不能用强力去建立集体农庄。这样做是愚蠢的和反动的。集体农庄运动应当依靠基本农民群众的

积极支持。决不能把发达地区集体农庄建设的样板机械地搬到不发达地区去。这样做是愚蠢的和反动的。这样的"政策"一下子就会破坏集体化思想。在规定集体农庄建设的速度和方法的时候，应当周密地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

在集体农庄运动中，我们的产粮区走在一切地区的前面。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在这些地区我们有最多的已经巩固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通过这些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农民已经有可能相信新技术的力量和意义，相信新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力量和意义。

第二，因为这些地区在粮食收购运动中有两年反富农斗争的经验，这不能不有助于集体农庄运动。

最后，因为这些地区最近几年来从工业中心得到了大批优秀干部。

能不能说其他地区，例如消费地区（如我国北方各州）或者至今仍然落后的民族居住的地区（如土耳其斯坦），也具备了这些特别有利的条件呢？

不，不能这样说。

很明显，和自愿原则一样，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是健康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最重要前提之一。

而我们的实际情况有时又是怎样呢？能不能说自愿原则和估计到地方特点的原则没有在某些地区遭到破坏呢？不，可惜不能这样说。例如大家知道，在北方某些消费地区，立即组织集体农庄的有利条件比产粮区要少些，但是人们往往竭力用对集体农庄运动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用发展集体农庄的纸上决议，用组织实际上还不存在但是已经有一大堆吹牛的决议说得它好象"存在"的纸上集体农庄，来代替组织集体农庄的准备工作。

或者拿土耳其斯坦某些地区来说，那里立即组织集体农庄的有利条件比北方消费地区还少。大家知道，在土耳其斯坦某些地区已经有人试着用武力威胁的办法，用不供给暂时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灌溉用水和工业品的威胁办法来"赶上并超过"苏联各先进地区。

在这种普里希别叶夫中士[50]的"政策"同党在集体农庄建设事业中以自愿原则和估计到地方特点的原则为依据的政策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很明显，它们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

谁需要这种歪曲，这种对集体农庄运动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这种对农民的可耻的威胁呢？除了我们的敌人，谁也不需要！

这种歪曲会造成什么结果呢？会加强我们的敌人而败坏集体农庄运动的思想。

以"左派"自居的制造这种歪曲的人事实上是在帮助右倾机会主义，这不是很明显吗？

2. 我们党的政治战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它善于在每一个时机找出运动的**基本环节**，抓住了这个基本环节后，它就把整个链条拖向一个总的目标去解决任务。是否可以说党在集体农庄建设体系中已经找出了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呢？是的，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说。

这个基本环节是什么呢？

也许是**共耕社**吧？不，不是共耕社。生产资料还没有公有化的共耕社是集体农庄运动中已经过时的阶段。

也许是**农业公社**吧？不，不是公社。公社在目前还是集体农庄运动中的个别现象。把这种不仅生产公有化而且分配也公有化的农业公社作为**主要**形式，条件还没有成熟。

在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即现在应当抓住的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形式，就是**农业劳动组合**。

在**农业劳动组合**中实行公有化的是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谷物业方面的基本生产资料：劳动、土地使用、机器和其他农具、耕畜以及经营用的建筑物。在农业劳动组合中**不实行公有化的**是：宅旁园地（小菜园、小果园）、住宅、一部分产乳牲畜、小牲畜、家禽等等。

劳动组合是**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因为它是解决谷物问题的最适当的形式。而谷物问题又是**整个农业体系中的基本环节**，因为不解决谷物问题就不可能解决畜牧业（小牲畜和大牲畜）问题，也不可能解决给工业提供主要原料的经济作物和特种作物问题。正因为如此，农业劳动组合在目前时期是集体农庄运动体系中的基本环节。

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它的最后定本今天公布了①。

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也应当从这一点出发，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切实研究这个章程并彻底实行这个章程。

党在目前时期的方针就是这样。

能不能说党的这个方针在实行时没有遭到破坏和歪曲呢？不，可惜不能这样说。大家知道，在苏联某些地区，争取集体农庄存在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劳动组合还没有巩固，但是有人试着跳出劳动组合的范围，一下子跳到农业公社。劳动组合还没有巩固，但是他们已经在使住宅、小牲畜和家禽"公有化"，而这种"公有化"正在变成纸上的官僚主义的命令，因为现在还没有使这种公有化成为

① 1930年3月2日《真理报》。

必要的条件。他们这样做，仿佛谷物问题在集体农庄中已经解决，它是已经过去的那个阶段的问题，目前时期的基本任务不是解决谷物问题，而是解决畜牧业和养禽业问题。试问，谁需要这种把集体农庄运动的各种形式搅成一团的鲁莽"工作"呢？谁需要这种愚蠢的对事业有害的急躁冒进呢？当谷物问题还**没有解决**，集体农庄的劳动组合形式还**没有巩固**的时候，拿住宅、全部产乳牲畜、全部小牲畜和家禽的"公有化"来戏弄集体农民，——这样的"政策"只能合乎我们的死敌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在这种热心的"公有化者"当中，有一位竟向劳动组合下命令，责令"三天之内把每个农户的家禽总数统计出来"，设置专门的"指挥员"来指挥统计和监督工作，"占领劳动组合中的制高点"，"指挥这场社会主义战斗，不得离开岗位"，而且不用说，要把整个劳动组合完全控制起来。

这是什么呢，是领导集体农庄的政策还是**瓦解**集体农庄和**破坏**集体农庄**威信**的政策呢？

至于那些从拆下教堂的钟来**着手**组织劳动组合的所谓"革命家"，那就更不用说了。把钟拆下，——看，这多革命呵！

在我们队伍里怎么能产生这种"公有化"方面的鲁莽儿戏，这种想跳过自身的可笑尝试，这种目的在于回避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的阶级敌人的尝试呢？

它们只有在我们集体农庄建设战线上"容易地"和"出乎意料之外地"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能产生。

它们只有在一部分党员产生了鲁莽情绪，认为"我们什么都能干！""我们什么都不在乎！"的情况下才能产生。

它们只有在我们的某些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暂时丧失了清醒的理智和冷静的眼光的情况下才能产生。

为了纠正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工作路线，**必须消除这种情绪。**

这就是党的当前任务之一。

领导的艺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落在运动后面，因为落在后面就是脱离群众。但是也不能跑得太远，因为跑得太远就是失掉群众而使自己孤立。谁想领导运动而同时又保持和千百万群众的联系，谁就应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落后的人，又反对跑得太远的人。

我们党所以强而有力和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在领导运动的时候善于保持和加强自己同千百万工农群众的联系。

载于1930年3月2日
《真理报》第60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
第167—174页

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

大家从报上知道，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① 一文和中央的《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著名决议② 在集体农庄运动的实际工作者中间引起了很多反应。因此，近来我收到了庄员同志们的许多来信，要求答复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本来我应当以私人通信方式答复来信。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半数以上的来信没有写明寄信人的地址（忘记写地址了）。可是，信中所涉及的问题对于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有莫大的政治意义。此外，当然我也不能不答复那些忘记写明自己地址的同志。因此，我不得不从来信中挑出一切必要的问题，公开地即在报刊上答复庄员同志们的来信。加上中央对此已有直接的决定，所以我就更乐意这样做了。

第一个问题：在农民问题上发生错误的**根源**在哪里？

答：在于不正确地对待了中农。在于在和中农的经济关系方面采用了暴力。在于忘记了和中农群众的经济结合不应当建立在强制手段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和中农协议的基础上，建立在和中农联盟的基础上。在于忘记了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基础是

---

① 见本卷第238—244页。——编者注

② 这个决议发表在1930年3月15日《真理报》第七十三号上（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分册第117—120页）。——编者注

工人阶级和贫农联合中农去反对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反对富农。

当和中农结成统一战线向富农进攻的时候，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可是，当我们的某些陶醉于胜利的同志不知不觉地从进攻富农的道路滚到反对中农的道路的时候，当他们因为追求集体化的高的百分数而对中农采用暴力，褫夺中农的选举权，象剥夺富农那样剥夺中农财产的时候，进攻就被歪曲，和中农的统一战线就被破坏，富农当然也就得到了恢复元气的机会。

他们忘记了：在和我们的阶级敌人斗争时，暴力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在对待作为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时，暴力就是不可容许的和极端有害的了。

他们忘记了：在解决军事性质的任务时，骑兵式的突袭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在解决集体农庄建设的任务而且是联合中农来进行建设的任务时，骑兵式的突袭就是不适用的和极端有害的了。

这就是在农民问题上发生错误的根源。

请看列宁关于和中农的经济关系所说的话：

"我们首先应当依据的真理，就是在这里采用暴力方法其实是什么也做不到的。这里的经济任务完全是另一种样子。这里没有上层可以拆去，而留下整个基础和整个结构。这里没有城市有过的那种上层，即资本家。**在这里采用暴力，就是葬送全部事业。**…… **再愚蠢不过的是想在经济方面对中农采用暴力。**"（《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168页）①

其次：

"用暴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中农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千百万人的阶层。甚至在欧洲，那里任何地方的中农都没有这样大的力量，那里技术和文化、城市生活和铁路交通特别发达，那里最容易产生用暴力对待中农的思想，可是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都没有主张用强制手段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3页和第804页。——编者注

对待中农。"(《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167页)①

看来是很明白了。

第二个问题：集体农庄运动中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答：主要错误至少有三个。

(1)违背了列宁的建立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违背了党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的基本指示和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关于自愿原则的规定。

列宁主义教导说，必须根据自愿原则，用说服农民，使他们相信公共的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优越的方法把他们引上集体经济的轨道。列宁主义教导说，只有向农民**指明**并用事实、用经验**证明**集体农庄比个体经济好，集体农庄比个体经济有利，集体农庄能使农民，使贫农和中农摆脱贫穷和困苦的时候，才能说服农民，使他们相信集体农庄的优越性。列宁主义教导说，没有这些条件，集体农庄就不能巩固。列宁主义教导说，任何想用暴力迫使农民接受集体农庄经济的企图，任何想用强迫手段建立集体农庄的企图，都只能产生不良后果，只能使农民离开集体农庄运动。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当遵守这个基本规则的时候，集体农庄运动就节节取得胜利。但是，我们的某些陶醉于胜利的同志竟开始忽视这个规则，开始表现出过分的急躁，并且因为追求集体化的高的百分数而开始用强迫手段建立集体农庄。无怪乎这种"政策"的不良后果很快就暴露出来了。迅速出现的集体农庄，象它迅速出现那样迅速地消失了，而一部分昨天还很信任集体农庄的农民现在开始躲避集体农庄了。

这就是集体农庄运动中的第一个和主要的错误。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3页。——编者注

请看列宁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所说的话：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过渡到**共耕制**，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但是，任何强迫手段都是苏维埃政权所不能采取的，任何法律都不能强迫这样做。农业**公社是根据自愿原则**建立的，过渡到**共耕制**只能是**自愿的**，在这方面，任何强迫手段都是工农政府所不能采取的，而且是法律所不容许的。如果你们中间有人看到这种强迫现象，那你们应当知道，这是滥用职权，这是违反法律，这是我们正在竭力纠正而且一定要纠正的现象。”①（《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43页）②

其次：

“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耕种制的优越性，只有用协作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了农民，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此，无论哪一种能够促进协作的、劳动组合的农业的措施，其意义都是难以估价的。我国有千百万个体农户，分散在偏僻的农村。…… 只有**在实践中根据**农民的切身**经验证明**必须而且可能过渡到协作的、劳动组合的农业，我们才可以说，俄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农民国家已经在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①（《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579－580页）③

最后，再看列宁著作中的另一段话：

“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们鼓励中农成立各种协作社和农业公社，但是不应当容许在建立这种协作社和农业公社的时候采取**任何强迫手段**。只有那些由农民自己自由发起的、其好处经他们在实践中检验过的联合才是有价值的。**在这件事上过分急躁是有害的**，因为这只能加强中农对新事物的成见。那些擅自利用不仅是直接的而且哪怕是间接的强迫手段来使农民加入公社的苏维埃政权代表，都应当受到极严厉的处分，应当撤销他们在农村中的工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25页。——编者注

③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06页和第107页。——编者注

作。"①(《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174页)②

看来是很明白了。

几乎用不着证明,党是会十分严格地执行列宁的这些指示的。

(2)违背了列宁的在进行集体农庄建设时必须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忘记了苏联有各种各样的地区,这些地区各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文化水平。忘记了这些地区有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差别。忘记了集体农庄运动的速度和集体农庄建设的方法对于这些远不相同的地区**不能是一样的**。

列宁说:"如果我们简单地按照死板格式来为俄国各地抄录法令,如果乌克兰和顿河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笼统地把这些法令推行到其他地区去,那就错了。……"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束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成不变地认为我们的经验,俄国中部的经验,可以完全搬到一切边区"。(《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125—126页)③

其次,列宁说:

"如果死板地把俄国中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混为一谈,使它们服从于一定的死板格式,那将是极为愚蠢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243页)④

最后,列宁责成高加索的共产党员,要他们

"了解他们的特殊情况,即他们共和国的情况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情况和条件不同的地方,了解决不可以抄袭我们的策略,而必须深思熟虑地把它加以改变,使它适合于不同的具体条件"(《列宁全集》俄文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189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133页。——编者注

④ 同上,第32卷第210页。——编者注

第3版第26卷第191页)①。

看来是很明白了。

根据列宁的这些指示，我们党中央在它《关于集体化的速度》的决议（见1930年1月6日《真理报》）②中按照集体化的速度把苏联各地区分成三类，其中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游和伏尔加河下游基本上可以在1931年春季完成集体化；其他产粮区（乌克兰、中部黑土地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等等）基本上可以在1932年春季完成集体化；其余地区可以把集体化的完成延到五年计划期末，即延到1933年。

而实际上又是怎样呢？实际上我们的某些陶醉于集体农庄运动的初步成就的同志把列宁的指示和中央的决议都安然忘记了。莫斯科州因为拚命追求集体化的虚夸数字，竟责成其工作人员在1930年春季就完成集体化，虽然该州拥有不下三年的时间（到1932年底）。中部黑土地区因为不愿意“落后于他人”，竟责成其工作人员到1930年上半年就完成集体化，虽然该地区拥有不下两年的时间（到1931年底）。而南高加索人和土耳其斯坦人因为热心于“赶上并超过”各先进地区，竟采取了在“最短期间”完成集体化的方针，虽然他们拥有整整四年的时间（到1933年底）。

很明显，在集体化“速度”过快的情况下，那些对集体农庄运动准备较差的地区因为热心于“超过”准备较好的地区，就不得不加紧施加行政压力，企图用自己的行政热情来弥补集体农庄运动快速发展所缺少的因素。其后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知道，在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0页。——编者注

② 指联共（布）中央1930年1月5日《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分册第112—115页）。——编者注

这些地区造成了混乱，后来不得不由中央加以干涉来消除这种混乱。

这就是集体农庄运动中的第二个错误。

（3）违背了列宁的在进行集体农庄建设时不容许跳过运动尚未完结的形式的原则。违背了列宁的原则：不要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不要命令群众运动，不要脱离群众，而要和群众一起前进并推动他们前进，把他们引导到我们的口号下面，并帮助他们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来相信我们的口号的正确性。

列宁说："当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清楚地知道，农村中的建设将遇到很大困难，在这里必须更加稳步前进，在这里**企图用法令**和命令来**实行共耕制**是**极端荒谬**的，能够赞成共耕制的只有极少数的觉悟农民，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决定这样做。因此，我们仅仅采取了革命发展所绝对必需的办法：决**不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而要等到前进的运动从这些群众亲身的经验中、从他们亲身的斗争中成长起来。"①（《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252页）②

根据列宁的这些指示，中央在它《关于集体化的速度》的著名决议（见1930年1月6日《真理报》）中认为：

（一）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农业劳动组合；

（二）因此必须制定作为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形式的农业劳动组合的示范章程；

（三）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决不能容许从上面"命令"集体农庄运动和"把集体化当作儿戏"。

这就是说，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方针不是建立公社，而是建立作为集体农庄建设的主要形式的农业劳动组合；决不能容许跳过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124页。——编者注

农业劳动组合而径直成立公社；决不能用“命令”集体农庄和“把集体农庄当作儿戏”来代替农民参加集体农庄的群众运动。

看来是很明白了。

而实际上又是怎样呢？实际上我们的某些陶醉于集体农庄运动的初步成就的同志把列宁的指示和中央的决议都安然忘记了。这些同志不去组织建立农业劳动组合的群众运动，却把个体农民径直“引向”公社章程。不去巩固运动的劳动组合形式，却用强迫手段使小牲畜、家禽、自用产乳牲畜和住宅“公有化”。

列宁主义者所不容有的这种急躁情绪的后果现在是大家都知道的。稳固的公社当然照例都没有建立起来。但是许多农业劳动组合却放弃了。固然，“好的”决议留下来了。但是它们有什么用处呢？

这就是集体农庄运动中的第三个错误。

第三个问题：怎么会产生这些错误，党应当怎样纠正这些错误？

答：这些错误是由于我们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迅速取得胜利而产生的。胜利有时能冲昏人的头脑。胜利往往使人产生过分的自负和骄傲。这特别容易发生在执政党的代表人物身上。尤其是象我们党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比的力量和威望的党。列宁所激烈反对的那种共产党员骄傲自大的事实，在这里是很可能产生的。相信法令、决议和命令万能的心理，在这里是很可能产生的。党的革命措施在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家的某些角落变成党的个别代表的空洞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的危险，在这里是很现实的。我指的不仅是地方工作人员，而且是个别州委委员和个别中央委员。

列宁说：“所谓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就是说，一个置身于共产党内而还没有被清洗出去的人，以为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就能完成他的一切

任务。"(《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50—51页)①

集体农庄运动中的错误，对党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路线的歪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如果让这些错误和歪曲行为今后仍然继续下去，如果不把它们迅速而彻底地消灭，那么它们的危险在哪里呢？

这里的危险就在于这些错误会直接使我们去破坏集体农庄运动，和中农闹翻，使贫农队伍瓦解，使我们的队伍混乱，使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削弱，使富农恢复起来。

简单地说，这些错误有一种倾向，要把我们从巩固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的道路，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推上同这些群众决裂的道路，推上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这种危险在2月下半月就已暴露出来了，当时我们的一部分迷惑于过去的胜利的同志和列宁的路线背道而驰。党中央注意到这种危险，立即干预这件事，委托斯大林在专论集体农庄运动的文章中给那些轻举妄动的同志们以警告。有些人以为《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是斯大林个人的创举。这当然是胡说。我们中央所以存在，并不是为了让什么人在这种事情上表现个人的创举。这是中央所采取的深入探查的办法。而当错误的深度和范围已经查明的时候，中央就立即以自己的威望的全部力量来打击错误，公布了它的1930年3月15日的著名决议。

要使狂奔疾驰的人悬崖勒马转上正确的道路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所以称为列宁党的中央委员会，就是因为它善于克服甚至更大的困难。而且它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整个整个的队伍要止住自己的奔驰，及时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59页。——编者注

转上正确的道路并在行进中整编自己的队伍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党所以称为列宁党，就是因为它有足够的机智来克服这样的困难。而且它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

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要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并在自己身上找到在最短期间消灭这些错误的力量。因为陶醉于不久以前的胜利而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自我批评，不愿意迅速而坚决地纠正错误——这就是主要的困难。只要克服了这个困难，只要抛弃了夸大的计划数字和文牍官僚主义的追求最高数字的做法，只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集体农庄的组织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任务上，就能使错误彻底消灭。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党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这个危险的困难。

列宁说："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①（《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60—261页）②

列宁的这些话是不能忘记的。

第四个问题：同歪曲党的路线作斗争是不是后退，是不是退却？

答：当然不是！只有那些把继续犯错误和继续进行歪曲当作进攻，而把同错误作斗争当作退却的人，才会说这是退却。用堆积错误和再三歪曲来实行进攻，——不用说，这是很好的"进攻"……

我们提出了农业劳动组合作为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形式，制定了相应的示范章程作为集体农庄建设工作的指南。我们是不是离开这件事而退却了呢？当然不是！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5页。——编者注

我们提出了巩固工人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的生产结合作为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基础。我们是不是离开这件事而退却了呢？当然不是！

我们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作为目前时期我们在农村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口号。我们是不是离开这件事而退却了呢？当然不是！

我们还在1930年1月就规定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一定速度，把苏联各地区分为几类并为每一类地区规定了特殊的速度。我们是不是离开这件事而退却了呢？当然不是！

这怎能说是党的"退却"呢？

我们要使那些犯了错误和有歪曲行为的人从他们的错误中退出来。我们要使鲁莽的人从他们的鲁莽行为中退到列宁主义立场上来。我们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继续向我们的阶级敌人实行**真正的**进攻。这是不是说我们这样做就是后退呢？当然不是！这只是说我们要实行**正确的**进攻，而不要把进攻当作鲁莽的儿戏。

只有怪人和"左"倾过火分子才会把党的这个立场看作退却，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这种妄谈退却的人至少不懂得两件事情。

（一）他们不知道进攻规律。他们不懂得**不巩固**既得阵地的进攻是必遭失败的进攻。

比如在军事方面，进攻在什么时候才可以成为胜利的进攻呢？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人们不是一味前进，而是同时努力**巩固**既得阵地，根据已经改变的情况**变更**自己的兵力**部署**，**使**后方机关**跟上来**，**使**预备队**靠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保证自己免遭意外，消灭任何一次进攻都可能发生的个别地方被突破的现象，从

而做好彻底消灭敌人的准备。1920年波兰军队的错误，如果单从军事方面来说，在于他们忽视了这个规则。这也就是他们一口气打到基辅，然后又不得不同样地一口气退到华沙的原因之一。1920年苏维埃军队的错误，如果也是单从军事方面来说，在于他们进攻华沙时重犯了波兰军队的错误。

关于阶级斗争战线上的进攻规律也必须这样说。**不巩固**既得阵地，**不变更**自己的兵力**部署**，不给前线保证**预备队**，不使**后方机关**跟上来等等，就不能实行顺利的进攻以消灭阶级敌人。

全部问题在于鲁莽的人不懂得进攻规律。全部问题在于党懂得这些规律并实现这些规律。

（二）他们不懂得进攻的阶级本质。他们大叫进攻。但是向**哪个**阶级进攻，联合**哪个**阶级去进攻？我们是联合中农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因为只有这种进攻才能使我们取得胜利。但是，如果这种进攻因为党的个别队伍陶醉于胜利而开始离开正确的道路，把自己的锋芒转向我们的同盟者，转向中农，那怎么办呢？难道我们需要的是**任何一种**进攻，而不是联合一定阶级去反对一定阶级的进攻吗？要知道唐·吉诃德[51]也以为他向风车冲锋就是向敌人进攻。可是大家知道，他在这种所谓进攻中曾碰得头破血流。

大概我们的"左"倾过火分子不甘心让唐·吉诃德专美于前吧。

第五个问题：我们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是右倾危险还是"左"倾危险？

答：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右倾危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这种说法同中央1930年3月15日的决议中关于"左"倾过火分子的错误和歪曲行为是目前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障碍的著名论点是不是矛盾呢？不，不矛盾。因为"左"倾过火分子在集体农庄

运动方面的错误是一种为右倾在党内的加强和巩固造成有利环境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错误把党的路线歪曲了，因而便利了破坏党的威信的活动，也就便利了右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的斗争。破坏党的领导的威信是右倾分子借以掀起反党斗争的最基本的条件。这个条件是"左"倾过火分子，是他们的错误和歪曲行为给右倾分子造成的。因此，为了胜利地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必须克服"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左"倾过火分子在客观上是右倾分子的同盟者。

"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主义之间的特殊联系就是这样。

这种联系也应该用来说明下面这个事实：某些"左"倾分子时常说要和右倾分子结成同盟。这种联系也应该用来说明下面这种特殊现象：一部分"左"倾分子昨天还在"实行"高呼乌拉的进攻并企图在短短两三个星期内使苏联全国集体化，而今天却消极起来，心灰意懒，把斗争地盘安然让给右倾分子，从而实行在富农面前真正退却（不带引号！）的路线。

目前时期的特点，就在于和"左"倾过火分子的错误作斗争是我们胜利地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条件和特殊形式。

第六个问题：怎样估计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这件事？

答：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这件事说明最近在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些不巩固的集体农庄，目前不坚定的分子正在离开这些集体农庄。这就是说，有名无实的集体农庄将要消失，巩固的集体农庄将要继续存在和更加巩固。我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某些同志因此而悲观失望，张皇失措，拚命抓住夸大的集体化百分数。另外一些人则幸灾乐祸，预言集体农庄运动必定"失败"。这两种人都大错特错了。这两种人都远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集体农庄运动实质的了解。

退出集体农庄的首先是那些所谓死魂灵[52]。这甚至不是退出，而是暴露了空架子。我们是不是需要死魂灵呢？当然不需要。我认为北高加索人和乌克兰人解散有死魂灵的集体农庄而组织真正有生命的和真正稳固的集体农庄是做得完全正确的。这种做法对集体农庄运动是只有好处的。

其次，退出的是那些真正敌视我们事业的异己分子。很明显，这种分子被驱逐得愈快，对集体农庄运动就愈好。

最后，退出的是那些动摇分子，这种人既不能叫作异己分子，也不能叫作死魂灵。这是**今天**我们还没有能说服他们相信我们事业的正确，但**明天**我们一定能说服他们的那些农民。这种农民的退出是集体农庄运动的一个严重损失，虽然这个损失是暂时的。因此，争取集体农庄的动摇分子是目前集体农庄运动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由此可见，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并不仅仅是一种坏现象。由此可见，既然这种退出使集体农庄清除了死魂灵和真正的异己分子，那么它也就是使集体农庄健全和巩固的一种有益过程。

一个月以前，有人认为产粮区的集体化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现在已经很清楚，如果指的是真正的和比较稳固的集体农庄，那么这个数字显然是夸大了的。如果在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以后产粮区的集体化能保持百分之四十（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那就是目前集体农庄运动的极大成绩。我是拿产粮区的平均数字来说的，我清楚地知道我们个别全盘集体化地区的集体化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产粮区的集体化达到百分之四十，——这就是说，到1930年春季我们就完成了原定集体化五年计划的**一倍**。

谁敢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方面的这个**历史性**成就的**决定**意

义呢？

第七个问题：动摇的农民退出集体农庄是不是做得对？

答：不，他们做得不对。他们退出集体农庄是违反自己切身利益的，因为只有集体农庄才能使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他们退出集体农庄就是把自己置于更坏的境地，因为他们使自己失去了苏维埃政权给予集体农庄的那些优待和好处。集体农庄中的错误和歪曲行为不能成为退出的理由。应当留在集体农庄里用共同的力量来纠正错误。既然苏维埃政权将用全部力量和这些错误作斗争，那么这些错误就更容易纠正了。

列宁说：

"在商品生产下的小经济制度**决不能**使人类摆脱群众生活贫困和遭受压迫的状况。"（《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122页）①

列宁说：

"靠小农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540页）②

列宁说：

"如果我们仍然依靠小经济来生活，即使我们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不免要灭亡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417页）③

列宁说：

"只有依靠共同的、劳动组合制的、共耕制的劳动才能走出帝国主义战争把我们驱入的绝境。"（《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537页）④

列宁说：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0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6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24卷第463页。——编者注

④ 同上，第30卷第123页。——编者注

"必须过渡到模范大农场的共耕制"，因为"不这样就不能摆脱俄国现在遭到的经济破坏，就不能摆脱这种简直是绝望的处境"。（《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418页）①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说明集体农庄是使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的**唯一**手段。

很明显，农民退出集体农庄是做得不对的。

列宁说：

"当然，大家从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工作中知道，我们**非常重视**农业公社、劳动组合，以及一切能够把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公共的、协作的或劳动组合的经济的组织，一切能够逐渐促进这个转变过程的组织。"②（《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579页）③

列宁说：

"苏维埃政权……把公社和协作社放**在第一位**，给了它们直接的**优先权**。"②（《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399页）④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将给集体农庄以个体农户所享受不到的优待和优先权。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在分配土地方面，在供应机器、拖拉机、种子等等方面，在减轻赋税方面，在发放贷款方面，将给集体农庄以优待。

为什么苏维埃政权给集体农庄以优待和优先权呢？

因为集体农庄是使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手段。

因为优先帮助集体农庄是帮助贫农和中农的最切实的方式。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464页。——编者注

②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③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06页。——编者注

④ 同上，第3卷第694页。——编者注

前几天，苏维埃政权决定对集体农庄的全部公有化的耕畜（马、犍牛等等），对集体农庄集体所有的和庄员个人所有的全部奶牛、猪、羊和家禽**免税两年**。

此外，苏维埃政权决定把庄员偿付贷款的期限**延**至年底，并把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在4月1日以前被判处的全部罚款和法律处分**取消**。

最后，苏维埃政权决定在本年度必须给集体农庄五亿卢布的贷款。

这些优待是用来帮助集体农民的。这些优待是用来帮助那些在退潮时能够站稳脚跟，在反对集体农庄的敌人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保住了集体农庄并擎住了集体农庄运动的伟大旗帜的集体农民的。这些优待是用来帮助那些现在是我们集体农庄的基本核心，而且将要巩固和办好我们的集体农庄，把千百万农民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贫农和中农庄员的。这些优待是用来帮助那些现在是集体农庄的骨干，并且完全配称为集体农庄运动的英雄的集体农民的。

退出集体农庄的农民是**得不到**这些优待的。

农民退出集体农庄是做错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他们只有回到集体农庄里来才能保证自己得到这些优待，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八个问题：对公社怎么办，是不是应当把它们解散？

答：不，不应当而且用不着把它们解散。我说的是真正的公社，而不是纸上的公社。在苏联产粮区有许多值得奖励和支持的优秀公社。我指的是那些经受多年考验，受过斗争锻炼，完全证实了自己有存在价值的老公社。不应当把它们解散，但是应当把它们改造成劳动组合。

建立和管理公社是一件复杂而困难的事情。只有具备了有经验的干部和受过锻炼的领导者，巨大而稳固的公社才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匆忙地从劳动组合章程转到公社章程，只能使农民离开集体农庄运动。所以对待这件事情要特别郑重，丝毫不能急躁。劳动组合是一件比较容易办的事情，是广大农民群众比较容易了解的。所以劳动组合是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最普遍的形式。只有随着农业劳动组合的加强和巩固，才能造成农民转向公社方面的群众运动的条件。但这不会是很快的事情。所以作为高级形式的公社只有在将来才能成为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环节。

第九个问题：对富农怎么办？

答：前面我们所说的都是关于中农的问题。中农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因此，我们对中农的政策应该是友好的。富农则是另一回事了。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和平。我们对富农的政策是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能把他们消灭掉。但这是说我们将设法包围他们并把他们消灭。

请看列宁关于富农所说的话：

"富农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他们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父、资本家的政权。富农的人数比地主和资本家多。但是富农在人民中间毕竟占少数。…… 这些吸血者在战争期间靠人民的贫困发了财，他们抬高粮食和其他产品的价格，积蓄了成千上万的金钱。这些蜘蛛靠因战争而破产的农民，靠挨饿的工人长肥了。这些吸血虫吸吮劳动者的血液，城市和工厂的工人愈挨饿，他们就愈发财。这些恶魔过去和现在都把地主的土地抓到自己手里，他们再三盘剥贫苦农民。"（《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205—207页）①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84页。——编者注

我们在实行限制这群吸血者、蜘蛛和恶魔的剥削倾向的政策时是容忍了他们的。我们所以容忍了他们，是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可以代替富农经济，代替富农生产。现在我们有可能用我们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济来代替他们的经济，而且绰绰有余了。现在用不着再容忍这些蜘蛛和吸血者了。再容忍这些焚烧集体农庄、杀害集体农庄活动家并企图破坏播种的蜘蛛和吸血者，就是违反工人和农民的利益。

因此，必须以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那种最坚决最彻底的精神去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第十个问题：集体农庄最近的实际任务是什么？

答：集体农庄最近的实际任务是为播种而斗争，为最大限度地扩大播种面积而斗争，为正确组织播种而斗争。

目前集体农庄的其他一切任务都必须适应于播种任务。

目前集体农庄的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于组织播种的工作。

这就是说，集体农庄是否稳固以及集体农庄非党积极分子是否坚定，集体农庄的领导者及其布尔什维克核心的才能怎么样，这些将不是在响亮的决议和堂皇的祝词中受到检验，而是在正确组织播种这一实际工作中受到检验。

但是要光荣地实现这个实际任务，必须把集体农庄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转到集体农庄建设的**经济**问题方面去，转到**集体农庄内部**建设的问题方面去。

直到最近，集体农庄工作人员所注意的中心问题还是追求集体化的高的数字，而且人们不愿意看见真正集体化和纸上集体化之间的差别。现在应该抛弃这种醉心于数字的心理。现在工作人员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巩固**集体农庄，使集体农庄在组织上趋于

完善，组织集体农庄中的实际工作。

直到最近，集体农庄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还集中于组织大集体农庄，组织所谓“大型农场”，而这些“大型农场”往往变成在农村中没有经济根基的笨重的纸上机关。于是，表面工作吞没了实际工作。现在应该抛弃这种醉心于表面的心理。现在工作人员应该特别注意农村集体农庄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工作。当这项工作有了相当成绩的时候，“大型农场”自然就会出现。

直到最近，还很少注意吸收中农参加集体农庄的领导工作。可是在中农中间有许多出色的管理人才，他们能够成为集体农庄建设中极好的经济工作人员。现在应该消除我们工作中的这个缺点。现在的任务就是吸收中农中的优秀分子参加集体农庄的领导工作，让他们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

直到最近，还没有充分注意农村中的妇女工作。过去一段时期表明，农村中的妇女工作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现在应该坚定不移地消除这个缺点。

直到最近，某些地区的共产党员还认为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力量解决集体农庄建设的一切任务。因此，他们没有充分注意吸收非党分子参加集体农庄的负责工作，没有充分注意提拔非党分子担任集体农庄的领导工作，没有充分注意在集体农庄中组织广大的非党积极分子。我们党的历史证明，集体农庄建设的过去一段时期再一次表明，这种方针是根本不正确的。如果共产党员关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用一堵墙同非党分子隔开，他们就会葬送整个事业。共产党员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战斗中能够遍体光荣，共产主义的敌人能够被击溃，其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员善于吸收非党优秀分子参加工作，他们善于在非党的广大阶层中间吸取力量，他们善于把广大非党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党的周围。现在应该坚定

不移地消除我们对非党分子的工作中的这个缺点。

纠正我们工作中的这些缺点，彻底消除这些缺点，——这也就是把集体农庄的经济工作纳入正轨。

总之：

（1）正确地组织播种，——这就是任务。

（2）把注意力集中在集体农庄运动的经济问题上，——这就是解决这一任务所必需的手段。

载于1930年4月3日
《真理报》第92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
第177—200页

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

（1931 年 2 月 4 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
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53] 上的演说）

同志们！你们代表会议的工作快要结束了。现在你们就要通过决议了。我相信这些决议是会一致通过的。在这些决议中（这些决议我知道得不多），你们赞成 1931 年的工业控制数字并且保证完成这些控制数字。

布尔什维克的话是严肃的。布尔什维克是习惯于履行他们所许下的诺言的。可是保证完成 1931 年的控制数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保证使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五。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不仅如此，你们作这样的保证还意味着你们不只是要四年完成我们的五年计划（这是已经解决了的事情，再不需要任何决议），——**这就是说，你们要在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三年完成五年计划。**

代表会议提出诺言完成 1931 年的计划，三年完成五年计划，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有过“沉痛的经验”。我们知道，诺言并不总是履行的。1930 年初也曾提出过这种完成年度计划的诺言。当时必须使我们的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然而诺言并没有完全履行。事实上，1930 年工业产值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我们要问一问：今年会不会又出现这种情形呢？我们工业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现在提出诺言在1931年使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

四十五。但是有什么保证能履行这个诺言呢？

为了完成控制数字，为了使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五，为了不是四年完成五年计划，而是在基本的和有决定意义的部门三年完成五年计划，需要什么呢？

为此需要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要有实际的或者象我们平常所说的"客观的"可能性。

第二，要有领导我们企业的愿望和本领，以便把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

去年我们有没有完成全部计划的"客观的"可能性呢？是的，是有的。不容争辩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事实是：去年3月和4月工业产值比前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试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完成全年计划呢？什么东西阻碍了这件事呢？缺乏什么呢？**缺乏利用现有可能性的本领。缺乏正确领导工厂和矿井的本领。**

我们具备了第一个条件，即完成计划的"客观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没有充分具备第二个条件，即领导生产的本领。正因为缺乏领导企业的本领，所以计划没有完成。我们没有使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而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

当然，**增长**百分之二十五是一件大事。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值在1930年都没有**增长**，而且现在也没有**增长**。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毫无例外地都发生了生产急剧**下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已经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我们本来能够增长得更多。我们具有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客观的"条件。

那么，有什么保证能使今年不再重复去年的意外事件，使计划全部完成，使现有的可能性被我们充分地利用，使你们的诺言不致有某一部分成为纸上空文呢？

在各个国家的历史上，在各国军队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

形：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为领导者没有看见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没有发生作用，于是军队也就失败了。

我们有没有完成1931年的控制数字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呢？

有的，我们有这样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是什么呢？需要什么才能使这些可能性成为实际的呢？

首先需要国内有充足的**自然富源**：铁矿石、煤炭、石油、粮食、棉花。我们有没有这些东西呢？有的。而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就拿乌拉尔来说吧，它是在任何国家都找不出来的富源总汇。矿石、煤炭、石油、粮食——在乌拉尔哪一样没有呢！我们国内什么都有，也许只是橡胶没有。但是再过一两年，连橡胶我们也会有的。在这方面，在自然富源方面，我们是完全有保障的。在我国，自然富源甚至是绰绰有余的。

还需要什么呢？

需要**一个**愿意而且能够利用这些丰富的自然富源来为人民谋福利的**政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政权呢？有的。固然，在利用自然富源的工作方面，我们的工作人员之间有时不免发生一些争执。例如去年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在建立第二个煤炭钢铁基地的问题上进行一些斗争，而没有这个基地我们就不能继续发展。但是，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些障碍。我们很快就会有这个基地。

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这个政权受到千百万工农群众的**拥护**。我们的政权是不是受到这样的拥护呢？是的，是受到的。你们在世界上再找不到另外一个象苏维埃政权那样受到工人和农民拥护的政权。我不准备举出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突击运动的发展、为生产财务响应

计划而斗争的运动等等事实。这一切显然表明千百万群众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事实是大家知道的。

为了完成并超额完成1931年的控制数字，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一种**不患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而且大大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失业、浪费和广大群众的贫困，——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我们的制度不患这种病症，因为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因为我们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地积累资财，并且按国民经济各部门合理地加以分配。我们不患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这就是我们和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有决定意义的地方。

请看资本家想怎样摆脱经济危机。他们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工资。他们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料价格。可是，他们不肯稍微认真地降低日用工业品和食品的价格。这就是说，他们想靠牺牲商品主要消费者的利益，牺牲工人的利益，牺牲农民的利益，牺牲劳动者的利益来摆脱危机。资本家在拆自己的台脚。结果不是摆脱危机而是加深了危机，积累了引起更加剧烈的新危机的新前提。

我们的优越性在于我们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我们没有而且不会有几百万失业者，我们没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为我们实行计划经济。不仅如此，我们是工业集中程度最高的国家。这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最优良的技术基础上建设我们的工业，从而保证空前未有的劳动生产率，空前未有的积累速度。我们过去的弱点在于我们的工业是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但这是**过去的**情形。现在这种情形已经没有了。不久，也许再过一年，我们就会成为世界上农业规模最大的国家。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它们就是大经济形式）今年出产的商品谷物已经占我国全部商品谷物的一半。这就是说，我们的制度，苏维埃制度，使我们有了任何资产阶

级国家所梦想不到的迅速前进的可能性。

为了一日千里地前进，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一个政党**，这个党要十分团结和统一，足以把工人阶级一切优秀分子的努力集中到**一个目标**上去，这个党要十分有经验，不会在困难面前退缩，而能一贯实行正确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党呢？是的，是有的。它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是的，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政策使我们获得重大的胜利。这一点现在不仅工人阶级的朋友，就连工人阶级的敌人也都承认。请看人所共知的"可敬的"绅士们——美国的菲什、英国的邱吉尔、法国的彭加勒怎样向我们党暴跳狂吠呵。他们为什么暴跳狂吠呢？就因为我们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就因为这个政策使我们接连不断地获得胜利。

同志们，这就是使我们容易实现1931年控制数字、帮助我们四年完成五年计划而在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甚至三年完成五年计划的一切客观的可能性。

可见，完成计划的第一个条件即"客观的"可能性我们是具备的。

我们有没有第二个条件即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本领呢？

换句话说，我们对工厂和矿井有没有正确的经济领导呢？这里是不是一切都很好呢？

可惜这里并不是一切都很好。我们既然是布尔什维克，就应当公开坦白地说出这一点。

领导生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些人并不总是用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待领导企业的问题。我们有些人往往以为领导就是签署公文和命令。这是令人痛心的，但这是事实。有时不禁令人想起谢德林小说中的彭帕杜尔[54]。你们记得彭帕杜尔太太是怎样教

导小彭帕杜尔的：不要埋头学问，不要钻研业务，让别人去干这些事情吧，这不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是签署公文。应当承认，可耻的是在我们布尔什维克中间也有不少靠签署公文来进行领导的人。至于钻研业务，掌握技术，变成内行，——这方面他们却根本不管。

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干过三次革命的人，是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的人，是解决了建立现代工业的重大任务的人，是把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可是在领导生产方面我们为什么会屈服于一纸公文呢？

原因就在于签署公文要比领导生产容易。于是很多经济工作人员就走上了这条阻力最小的道路。这里也有我们的过错，中央的过错。十年以前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既然共产党员还没有很好地懂得生产技术，既然他们还需要学习管理经济，那么就让旧的技师、工程师、专家去管理生产，你们共产党员不要去干预业务；虽然可以不干预，但是你们要不懈地研究技术，研究管理生产的科学，以便将来和忠实于我们的专家一道成为真正的生产领导者，真正的内行。"当时的口号就是这样。可是事实怎样呢？这个公式的后一部分被抛弃了，因为学习要比签署公文困难；公式的前一部分被庸俗化了，把不干预曲解为放弃研究生产技术。结果就变成胡闹，有害和危险的胡闹。必须摆脱这种状况，愈快愈好。

生活本身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发出警报，说这方面的情形不好。沙赫特案件[2]就是第一次严重的警报。沙赫特案件表明：党组织和工会缺乏革命警惕性。这一事件表明：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在技术方面落后得不象话；某些旧工程师和技师因为在工作上无人监督，就比较容易滚到暗害活动的道路上去，况且国外敌人还不断用种种"建议"来缠住他们。

第二次警报就是"工业党"审判案[55]。

当然，暗害活动的基础是阶级斗争。当然，阶级敌人是要疯狂地反抗社会主义进攻的。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暗害活动如此猖獗。

暗害活动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规模呢？这是谁的过错呢？这是我们的过错。如果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来处理经济领导问题，如果我们老早就开始研究业务，掌握技术，如果我们更多地和精明地干预经济领导，那么暗害分子就不能干出这样多的暗害勾当来。

必须使自己成为专家，成为内行，必须面向技术知识，——这就是实际生活要我们走的道路。但是，无论第一次警报，甚至第二次警报，都还没有促成必要的转变。已经是而且早已是面向技术的时候了。已经是抛弃那个过时的不干预技术的旧口号而使自己成为专家，成为能手，成为精通经济工作的行家的时候了。

人们时常问：为什么我们没有一长制呢？只要我们还没有掌握技术，我们就没有而且不会有一长制。只要在我们中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还没有足够的精通技术、经济和财务问题的人才，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一长制。如果你们不掌握工厂和矿井的技术、经济和财务，那么随便你们写多少决议，随便你们怎样宣誓，也都无济于事，也都不会有一长制。

因此，任务就是要我们自己掌握技术，成为内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计划全部完成，而一长制也才能实行。

这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科学、技术经验、知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得到的。今天没有，明天就会有。这里主要的就是要有布尔什维克的掌握技术、掌握生产科学的热烈愿望。有了热烈愿望，就能得到一切，就能战胜一切。

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

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别克① 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你们记得革命前的一位诗人的话吧："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② 这些先生把旧日诗人的这句话背得很熟。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富饶"，那就可以靠你发财。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贫穷，软弱"，那就可以打你抢你而不受到惩罚。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

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

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么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别的办法是没有的。

① 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和土耳其等地王公贵族等上层人士的尊号。——编者注

② 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编者注

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说："或是灭亡，或是赶上并且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①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这就是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更重大的义务。这就是我们对世界无产阶级所负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和第一种义务相符合的。但是我们把这种义务看得更高。苏联工人阶级是世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所以取得了胜利，不仅是由于苏联工人阶级的努力，而且是由于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如果没有这种支持，我们早就被消灭了。有人说，我国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突击队。这说得很好。但是这使我们担负了极重大的义务。国际无产阶级为什么支持我们呢？我们凭什么配受这种支持呢？因为我们最先投入了对资本主义的战斗，我们最先建立了工人政权，我们最先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我们所进行的事业一旦成功，就会翻转整个世界，解放整个工人阶级。可是要怎样才能成功呢？要消灭我国的落后状况，展开布尔什维克的高度的建设速度。我们应当这样向前迈进，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可以望着我们说：看呵，这就是我们的先锋队，这就是我们的突击队，这就是我们的工人政权，这就是我们的祖国，他们把自己的事业，也就是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很好，让我们来支持他们反对资本家，让我们来推进世界革命事业吧。我们是否应当实现世界工人阶级的希望呢？我们是否应当履行我们对他们所负的义务呢？是的，是应当的，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脸丢尽的话。

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和国际的义务。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69页。——编者注

你们看，就是这些义务要求我们采取布尔什维克的发展速度。

我并不是说我们这几年来在领导经济方面什么也没有做。是做了的，甚至做得很多。我们使工业产值比战前增长了一倍。我们创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业生产。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期间真正努力掌握生产、生产的技术、生产的财务和经济，那我们会做得更多。

我们至多在十年内就应当跑完我们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我们有一切"客观的"可能性来做到这一点。所缺乏的只是真正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本领。而这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并且**仅仅**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已经是我们学会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时候了。已经是抛弃那种不干预生产的陈腐方针的时候了。已经是领会另一个方针，即适合于目前时期的**要干预一切**的新方针的时候了。如果你是厂长，你就要干预一切事务，就要熟悉一切，什么都不要忽略过去，就要学习再学习。布尔什维克应当掌握技术。已经是布尔什维克自己成为专家的时候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一个经济工作人员竟不愿意研究技术，不愿意掌握技术，——这是笑话，这就不成其为经济工作人员了。

有人说，掌握技术是困难的。不对！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我们已经解决了许多极困难的任务。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我们取得了政权。我们建立了规模极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把中农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做到了。剩下的已经不多，这就是钻研技术，掌握科学。当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甚至我们现在不敢梦想的速度。

只要我们真正愿意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载于1931年2月5日
《真理报》第35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3卷
第29—40页

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

（1931 年 6 月 23 日在经济工作人员
会议[56]上的演说）

同志们！从会议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我们各工业部门执行计划的情形是十分参差不齐的。在过去五个月内，有些工业部门的产值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有些工业部门至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最后，有个别工业部门增长得非常少，只增长了百分之六至十，甚至比这还少。属于最后一类的有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可见情形是参差不齐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参差不齐的情形呢？某些工业部门落后的原因何在呢？为什么某些工业部门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而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增长得更少，落在其他部门后面呢？

原因在于近来工业发展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一种要求采取新的领导方法的新环境，而我们的某些经济工作人员不去改变工作方法，仍然按照旧方式工作。这就是说，问题在于工业发展的新条件要求按照新方式来工作，而我们的某些经济工作人员不了解这一点，不懂得现在必须按照新方式来领导。

这就是我们的某些工业部门落后的原因。

我国工业发展的新条件是什么呢？这些新条件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新条件至少有六个。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这些条件。

一
劳 动 力

首先要谈的是保证各企业**劳动力**的问题。从前通常是工人自动跑到工厂里来，所以当时在这方面有某种自流现象。这种自流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当时有失业人口，有农村中的分化，有贫困，有驱使人们从农村跑进城市的饥饿的威胁。你们还记得“庄稼汉从农村逃进城里来”这句话吧？当时是什么东西迫使农民从农村跑进城市呢？是饥饿的威胁，是失业，是因为当时农民觉得农村是他们的后母，农民总想逃开它，随便逃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能找到一点工作就行。

不久以前我国的情形就是这样，或者几乎是这样。

能不能说我国现在的情形还完全是这样呢？不，不能这样说。恰恰相反，现在的环境已经根本改变了。正因为环境改变了，所以我们就再也没有劳动力的自流现象了。

在这个时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第一，我们消灭了失业，因而也就消灭了压迫“劳动市场”的力量。第二，我们根本打破了农村中的分化，因而也就消除了驱使农民从农村跑进城市的普遍的贫困。最后，我们供给了农村数万台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打垮了富农，组织了集体农庄，使农民有了象人一样地生活和工作的可能。现在已经不能把农村叫做农民的后母了。正因为再不能把农村叫做后母，所以农民就留在农村安居乐业，而我们就再也没有“庄稼汉从农村逃进城里来”的现象，再也没有劳动力的自流现

象了。

可见我们现在有了完全新的环境和保证各企业劳动力的新条件。

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第一，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再不能指望劳动力的自流了。这就是说，应当由自流"政策"转到**有组织地**给工业招收工人的政策。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各经济组织同集体农庄和庄员订立合同。你们知道，某些经济组织和集体农庄已经开始采用这种办法，而且经验表明，订立合同的办法无论对集体农庄或工业企业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必须立即使最繁重的劳动过程**机械化**，并且大力开展这一工作（在森林工业、建筑业、煤炭工业、装卸工作、运输业、钢铁工业等方面）。这当然不是说，应该抛弃手工劳动。恰恰相反，手工劳动还会长期地在生产中发挥极大的作用。这只是说，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对我们是一种**新的**和**决定的**力量，没有它就不能保持我们的发展速度，也不能维持新的生产规模。

我们还有不少的经济工作人员既"不相信"机械化，也"不相信"和集体农庄订立合同。这就是那些不了解新环境，不愿意按照新方式工作，而怀念着劳动力"自流"到企业里来的"旧日黄金时代"的经济工作人员。不用说，这种经济工作人员是和新环境向我们提出的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相去万里的。看来他们以为劳动力的困难是偶然的现象，以为缺乏劳动力的现象会按所谓自流方式自行消灭。同志们，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劳动力的困难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只有靠我们自己努力，这种困难才会消灭。

总之，**采用和集体农庄订立合同的办法来有组织地招收工人，**

使劳动机械化，——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一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条件。

二
工人的工资

我刚才已经谈过有组织地给我们各企业招收工人的问题。但是招收工人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要保证我们各企业有劳动力，必须把工人固定在生产中，使企业中的工人比较固定。几乎用不着证明，没有相当精通生产技术并熟悉新式机器的固定的工人，就不能前进，就不能完成生产计划。没有这种固定的工人，就得每次都来重新训练工人，花一半时间去训练他们，而不是去进行生产。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形怎样呢？能不能说我们企业中的工人是相当固定的呢？不，可惜不能这样说。恰恰相反，我们的企业中还有所谓劳动力的**流动现象**。而且许多企业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不仅没有消灭，反而在增长和加强起来。不管怎么样，在半年内甚至在一个季度内工人变动少于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企业是少见的。

从前，在工业恢复时期，我们的技术设备还不复杂，生产规模还不很大，还可以勉强"容忍"所谓劳动力的流动现象。现在情形不同了。现在环境已经根本改变了。现在，在大规模的改造时期，生产规模变得很大了，技术设备极端复杂了，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也就成了生产的祸害，足以使我们的企业解体。现在"容忍"劳动力的流动现象就是瓦解我国工业，消除完成生产计划的可能，破坏改进产品质量的可能。

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何在呢？

就在于工资规定得不合理，工资等级制规定得不合理，工资方面有“左的”平均主义。我们很多企业制定的工资率几乎把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重劳动和轻劳动之间的差别抹杀了。平均主义使非熟练工人不想成为熟练工人，因而丧失了上进的前途，于是他就觉得自己是工厂里的“游客”，只是暂时在这里工作，以便稍微“赚一点钱”，然后就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幸福”。平均主义使熟练工人不得不从一个企业跑到另一个企业，以求最后找到一个能够真正重视熟练劳动的企业。

由此就产生了“普遍的”从一个企业跑到另一个企业的现象，产生了劳动力流动的现象。

要消除这种祸害，就必须取消平均主义，打破旧的工资等级制。要消除这种祸害，就必须在规定工资等级制时注意到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重劳动和轻劳动之间的差别。钢铁备料工和扫地工人得到同样多的工资的情形是不能容忍的。火车司机和抄写员得到同样多的工资的情形是不能容忍的。马克思和列宁说过：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也还会存在；这种差别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会消失；因此，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也应该按劳动来发给，而不应该按需要来发给。但是，我们经济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中的平均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他们认为在我们苏维埃制度下这种差别已经消失了。究竟是谁对呢？是马克思和列宁对呢，还是平均主义者对？应当认为马克思和列宁在这里是对的。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谁现在不顾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而根据平均主义的“原则”来规定工资等级制，谁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列宁主义。

在每个工业部门中，在每个企业中，在每个车间中，都有一部分主要的比较熟练的工人。我们如果真想保证企业中有固定的工人，就应当首先和主要地把这一部分工人固定在生产中。他们，这一部分主要的工人，组成生产的基本环节。把他们固定在企业中，固定在车间中，就意味着把全体工人固定下来，根本消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但是怎样才能把他们固定在企业中呢？只有提升他们，只有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只有在规定工资时充分地照顾到工作人员的熟练程度，才能把他们固定在企业中。

而提升他们和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是什么意思呢？这对非熟练工人会有什么影响呢？除了其他一切以外，这就是给非熟练工人开辟前途，刺激他们上进，刺激他们成为熟练工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现在需要几十万几百万熟练工人。但是要造就熟练的工人基干，就必须给非熟练工人开辟前途，刺激他们前进和上升。我们愈是大胆地这样做就愈好，因为这是消灭劳动力流动现象的基本手段。在这件事上节约，就是犯罪，就是违反我们社会主义工业的利益。

但是这还不够。

要把工人固定在企业中，还必须进一步改善工人的供应和居住条件。不能否认，近几年来我们在住宅建设和对工人的供应方面做了不少事情。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还远不能满足工人迅速增长的需要。决不能借口从前住宅比现在少，因此就可以安于既得的成绩。也不能借口从前工人的供应比现在坏得多，因此就可以满足于现状。只有那些腐朽透顶的人才会借口过去来安慰自己。不应当以过去为出发点，而应当以现在工人日益增长的需要为出发点。必须了解，我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已经根本改变了。现在的工人已经不是从前的工人了。现在的工人，我们苏联的工人，

希望满足他们的一切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既要满足食物供应方面的需要，又要满足住宅方面的需要，还要满足文化及其他一切方面的需要。他们有这样的权利，而我们也有保证他们的这些条件的义务。固然，我国工人没有失业的痛苦，他们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桎梏，他们已不再是奴隶，而是自己事业的主人。但是这还不够。他们要求满足他们的一切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我们也有义务满足他们的这种要求。不要忘记，现在我们自己也向工人提出一些要求，要求他们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工作，进行竞赛，开展突击运动。不要忘记，绝大多数工人非常热情地接受了苏维埃政权的这些要求，并且英勇地实现着这些要求。因此，工人在实现苏维埃政权的要求时，自然也要求苏维埃政权履行它的义务，进一步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

总之，**消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消灭平均主义，合理地规定工资，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二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三个条件。

三
劳 动 组 织

上面我已经谈过必须消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把工人固定在企业中。但是把工人固定下来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单单消灭流动现象是不够的。还必须给工人创造适当的劳动条件，使他们有可能有效地工作，提高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因此，必须把企业中的劳动组织得能使生产率一月高于一月，一季高于一季。

能不能说我们企业中的现行劳动组织符合于现代生产的要求呢？可惜不能这样说。无论如何，我们还有一些企业，那里的劳动组织得很糟糕，那里不是秩序井然，工作协调，而是毫无秩序，乱七八糟；那里盛行的不是对工作负责的现象，而是完全不负责任和**无人负责的现象。**

无人负责是什么意思呢？无人负责就是对所担任的工作不负任何责任，对机器、机床、工具不负责任。显然，在无人负责的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爱护机器、机床和工具的。你们知道，无人负责现象在铁路运输方面引起了什么结果。无人负责现象在工业中也正引起同样的结果。我们在铁路运输方面已经消灭了无人负责现象，因而提高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在工业方面也应当这样做，以求把这方面的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

不合理的劳动组织同无人负责现象和每个工作人员对所担任的具体工作不负责任的现象是能很好地相处的。从前，这种不合理的劳动组织还可以勉强"过得去"。现在情形不同了。现在环境完全改变了。在目前生产规模如此宏大并且已经有了许多大型企业的情况下，无人负责现象就是工业的祸害，这种祸害会威胁到我们各企业在生产方面和组织方面的一切成绩。

为什么无人负责现象能在我们某些企业中生根呢？它是作为连续生产制[47]的不合法的伴侣出现在企业中的。如果说连续生产制一定会引起生产中的无人负责现象，那是不对的。如果劳动组织得合理，如果规定每个人对一定的工作负责，如果指定一定的工人使用一定的机器和机床，如果轮换的班次组织得合理，各班的质量和熟练程度彼此不相上下，那么连续生产制就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工作质量，根除无人负责现象。例如铁路运输方面的

情形就是如此，现在那里正在实行连续生产制，但是无人负责现象已经没有了。能不能说我们工业企业中实行连续生产制的情形也一样良好呢？可惜不能这样说。问题在于我们某些企业实行连续生产制太仓卒了，没有准备好相当的条件，没有适当地组织质量和熟练程度大体相等的轮换班次，没有规定每个人对所担负的具体工作负责。结果就使连续生产制自流而变成了无人负责现象。结果是我们某些企业中有了纸上的口头的连续生产制以及非纸上的实在的无人负责现象。结果是对工作缺乏责任感，不爱护机器，让机床大批毁坏，缺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刺激。无怪乎工人说："我们本来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工作，但是既然什么事情都没有人负责，那么谁会重视我们呢？"

由此可见，我们某些同志在某些地方实行连续生产制太仓卒了，因为实行得太仓卒了，就曲解了连续生产制，使连续生产制变成了无人负责现象。

要消灭这种情形并消灭无人负责现象有两条出路：或者照铁路运输方面所做的那样，改变实行连续生产制的条件，使连续生产制不致变成无人负责现象。或者在现在还没有具备做这种试验的有利条件的地方，照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不久以前所做的那样，抛掉纸上的连续生产制，暂时改为六日生产制，并准备条件，以便将来在必要时可以再来实行真正的非纸上的连续生产制，再来实行没有无人负责现象的连续生产制。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对于这一切都是十分明白的。但是他们却默不作声。为什么呢？看来是因为害怕真理。但是，布尔什维克从什么时候开始害怕起真理来了呢？在某些企业中，连续生产制变成了无人负责现象，因而也就被曲解到了极点，这难

道不是事实吗？试问谁需要这样的连续生产制呢？谁敢说保存这种纸上的被曲解了的连续生产制的利益高于合理组织劳动的利益，高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利益，高于真正的连续生产制的利益，高于我们社会主义工业的利益呢？我们把纸上的连续生产制埋葬得愈快，我们实现合理的劳动组织也就会愈快，这不是很明显吗？

有些同志认为只要痛骂一顿，发表一些冠冕堂皇的演说，就可以消灭无人负责现象。据我所知，有些经济工作人员反对无人负责现象只限于动辄在大会上把无人负责现象痛骂一顿，大概以为说过这些话以后，无人负责现象就会自行消灭，就会所谓自流地消灭。如果他们认为靠演说和痛骂就可以从实践中铲除无人负责现象，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同志们，无人负责现象是任何时候也不会自行消灭的。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而且应当去消灭无人负责现象，因为我们掌握着政权，我们大家要对一切负责，也要对无人负责现象负责。我认为，如果我们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员不是从事于演说和痛骂，而是拿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深入矿井或工厂，研究劳动组织方面的一切细节和"小事"，把那里的无人负责现象真正消灭，然后把这个企业的经验推广到其他企业中去，那就要好得多。那就不知道要好多少。这才是真正为反对无人负责现象而斗争，为合理的布尔什维克的劳动组织而斗争，为在企业中合理地配置力量而斗争。

总之，**消灭无人负责现象，改善劳动组织，在企业中合理地配置力量**，——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三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四个条件。

四
工人阶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问题

一般工业指挥人员，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形也改变了。

从前我们的情形是这样：我国全部工业的主要来源是乌克兰的煤炭钢铁基地。乌克兰把金属供给我国所有的工业区，无论是南方，或者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它又把煤炭供给我们苏联的基本企业。这里我不谈乌拉尔，因为乌拉尔在这方面所占的比重和顿巴斯比较起来要小得多。这样，我们在当时有三个培养工业指挥人员的主要基地：南方、莫斯科区、列宁格勒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靠我国当时仅有的为数极少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可以勉强过得去。

不久以前的情形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完全不同了。我认为现在很明显，我们要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单靠乌克兰煤炭钢铁基地已经不能对付了。你们知道，虽然乌克兰的煤炭和金属产量在增长，但是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了。你们知道，我们因此不得不在东方建立新的煤炭钢铁基地，即乌拉尔—库兹巴斯。你们知道，我们建立这个基地不是没有成绩的。但是这还不够。其次，我们需要在西伯利亚建立冶金业来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我们已经在建立了。此外，我们需要在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斯坦建立新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最后，我们需要展开极广泛的铁路建设。这是苏联全国利益——各边疆共和国利益和中部地区利益所要求的。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我们从前还够用的为数极少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指挥人员现在已经不够用了。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旧有的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基地已经不够了，必须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建立巨大的新的基地网。如果我们真想实现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纲领，那我们现在就应当保证自己有比原来多二倍四倍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指挥人员。

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任何一种**指挥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了解我国工人阶级的政策、能够领会这个政策并决心老老实实地实现这个政策的**那种**指挥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人阶级应当为本身造就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造就能够维护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利益，即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

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能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苏联工人阶级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的。

苏维埃政权注意到这种情况，为工人和劳动农民打开了国民经济各部门高等学校的大门。你们知道，现在有几万名工农青年在高等学校里学习。从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高等学校是公子哥儿独占的场所，而现在在苏维埃制度下，工农青年却是高等学校里的统治力量了。毫无疑问，我们很快就能从我们的高等学校得到几千名新的技师和工程师，我国工业的新的指挥员。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将不仅是由读过高等学校的人所组成的，而且是由我们企业中的实际工作人员、熟练工人、工厂和矿井中的工人阶级文化力量来补充的。竞赛的发起人，突击队的领导者，劳动高潮

的实际鼓舞者，各部分建设工作的组织者，——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新的阶层，这个阶层也应当和读过高等学校的同志一起组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核心，组成我国工业指挥人员的核心。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要排挤这些来自“下层”的有创造性的同志，要更大胆地提拔他们去担任指挥职务，使他们有可能发挥自己的组织能力，使他们有可能充实自己的知识，并且要不惜金钱来为他们造成适当的环境。

在这些同志中间有不少是非党员。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更大胆地提拔他们去担任领导职务的障碍。恰恰相反，正是应当特别关心他们这些非党同志，应当提拔他们去担任指挥职务，使他们真正相信党是重视有能力和有才华的工作人员的。

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提拔党员同志去担任工厂的领导职务。因此，他们往往排挤那些有能力和有创造性的非党同志，而把党员提到首位，即使他们能力较差和没有创造性。不用说，再没有比这种所谓“政策”更愚蠢和更反动的了。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政策”只能破坏党的威信，使非党工人离开党。我们的政策决不是要把党变成闭关自守的帮会。我们的政策是要使党员工人和非党工人之间有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相互检查”的气氛（**列宁**）。我们党在工人阶级中强大有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总之，**使苏联工人阶级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四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五个条件。

五
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转变的征兆

关于对待旧的资产阶级生产技术知识分子的问题也要有另一种提法。

两年以前我们的情形是这样：旧的技术知识分子中最熟练的一部分人感染了暗害病。而且暗害活动在当时是一种时髦的东西。一部分人进行暗害活动，另一部分人包庇暗害分子，还有一部分人袖手旁观，保持中立，再有一部分人则在苏维埃政权和暗害分子之间动摇不定。当然，大多数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多少还是忠顺地继续工作的。但这里所说的不是大多数人，而是技术知识分子中最熟练的那一部分人。

暗害活动是由什么造成的，是由什么培植起来的呢？是由于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由于苏维埃政权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实行进攻政策，由于这些资本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进行反抗，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化，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有困难。如果说从事战斗的暗害分子的积极性是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阴谋以及我们国内的粮食困难的鼓舞，那么另一部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向积极的暗害分子方面的动摇则由于托洛茨基分子和孟什维克空谈家的时髦论调而加强起来。这些空谈家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反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苏维埃政权反正是在蜕化而且很快就要垮台的”，“布尔什维克正以自己的政策促成武装干涉”等等。此外，既然连右倾分子中间的某些老布尔什维克都抵挡不住这种“时疫”而在当时跟党背道而驰，那

么从来没有闻过布尔什维主义气味的一部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也蒙上帝保佑而表现动摇不定，就自然是不足为奇的了。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所能实行的唯一政策就是**粉碎**积极的暗害分子，**分化**中立分子，**吸收**忠顺分子。

一两年前的情形就是这样。

能不能说我们现在的环境还完全是那样呢？不，不能这样说。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的环境完全不同了。首先，我们击溃了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并且正在顺利地制服他们。当然，这不会使旧知识分子感到高兴。很可能他们还对自己的已被击溃的朋友表示同情。但是，同情者尤其是中立者和动摇者，在自己的积极活动的朋友遭到无可挽救的惨败以后，还甘愿和这些朋友遭受同样的命运，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

其次，我们克服了粮食困难，不仅克服了粮食困难，而且还向国外输出粮食，其数量之多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未曾有过的。于是动摇分子的这一"论据"也破产了。

再其次，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我们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战线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获得了确定不移的胜利。

于是旧知识分子"武库"中最主要的东西也就完蛋了。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武装干涉的希望，那就必须承认，这种希望已经成了——至少暂时成了——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的确，人们答应实行武装干涉已经有六年了，可是武装干涉一次也没有尝试过。现在必须承认，我们的高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过是上了当而已。更不必说，积极的暗害分子在有名的莫斯科审判案中的行为本身就应当使而且实际上已经使暗害活动的思想破产了。

当然，这些新的情况不能不影响到我国旧的技术知识分子。

新的环境在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当中应当造成而且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一种新的情绪。正因为如此，从前同情过暗害分子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有了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明显的征兆。现在不仅这一部分旧的知识分子，就连昨天的明显的暗害分子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在许多工厂里和工人阶级同心协力地工作，这个事实毫无疑问地说明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转变已经开始。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这里再也没有暗害分子了。不，不是这个意思。暗害分子是有的，而且只要我国还有阶级，只要还有资本主义的包围，暗害分子还是会有的。这只是说，既然从前这样或那样同情过暗害分子的很大一部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现在已经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那么剩下的积极的暗害分子就为数不多了，他们已经陷于孤立，而且将不得不暂时转入极端秘密的状态。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我们对待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应该根据这种情形而改变。在暗害活动猖獗时期，我们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主要地表现于粉碎政策，而现在当这些知识分子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时期，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就应该主要地表现于吸收和关怀他们的政策。如果在已经改变了的新的条件下还继续实行旧政策，那是不正确的和不合辩证法的。如果现在还几乎把每个旧专家和旧工程师都看做未被拿获的犯人和暗害分子，那是愚蠢的和不合理的。在我们这里，“反专家主义”向来被看作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有害的和可耻的现象。

总之，**改变对旧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态度，多多关心和照顾他们，更大胆地吸收他们参加工作，**——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五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最后一个条件。

六
关于经济核算

如果我不谈到另一个新条件，那还不能算全面。这里指的是为工业、为国民经济积累资金的来源问题，加快这种积累的速度问题。

从积累方面来看，我国工业发展中的新的和特别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旧的积累来源已开始不能保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了。因此，我们如果真想保持并加快布尔什维克的工业化速度，就必须找到新的积累来源并扩大旧的积累来源。

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可以知道，任何一个想把自己的工业提到更高水平的新兴国家都必须得到外来的援助，即长期的信贷或借款。西方各国的资本家有鉴于此，就完全拒绝给我国信贷和借款，以为没有信贷和借款，我国的工业化就一定会破产。可是资本家们想错了。他们没有估计到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有某些特别的积累来源足以恢复和继续发展工业。的确，我们不仅恢复了工业，不仅恢复了农业和运输业，而且已经把改造重工业、农业和运输业的巨大工作引上了轨道。当然，我们在这方面是花了几百亿卢布的。这几百亿卢布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是从轻工业方面，从农业方面，从预算上的积累方面得来的。我们不久以前的情形就是这样。

现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过去，旧的积累来源足够用来改造工业和运输业，而现在，旧的积累来源显然已开始不够了。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改造旧工业。现在的问题是要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

哈萨克斯坦建立技术装备优良的新工业。现在的问题是要在苏联各产粮区、畜牧区和原料区建立新的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现在的问题是要在苏联的东部和西部之间建立新的铁路网。当然，旧的积累来源是不能保证这一巨大工作的完成的。

不仅如此，还必须指出另一种情况，就是在我们许多企业和经济组织中，由于不善经营，经济核算的原则已经被破坏无余了。事实上，在许多企业和经济组织中，计算、成本核算和可靠的收支平衡表的编制早已停止了。事实上，在许多企业和经济组织中，"节约制度"、"缩减非生产开支"、"生产合理化"早已成了过时的概念了。显然，他们指靠的是国家银行"反正会拨给我们必要的款项"。事实上，近来许多企业的成本已开始提高了。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把成本降低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以上，可是他们却把成本提高了。而降低成本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知道，把成本降低百分之一，就等于在工业内部积累一亿五千万至二亿卢布。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成本就等于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损失几亿卢布。

从这一切应该得出结论：已经不能单靠轻工业，单靠预算上的积累，单靠农业方面的收入了。轻工业是一个极丰富的积累来源，而且它现在也有继续发展的一切可能，但这个来源不是无穷的。农业也是一个丰富的积累来源，但是在目前农业改造时期，它本身还需要国家的资助。至于预算上的积累，你们自己知道，这种积累不可能而且不应该是无穷的。此外还有什么呢？还有重工业。因此，必须使重工业，首先是它的机器制造业，也能拿出积累来。因此，除了加强和扩大旧的积累来源外，同时还必须使重工业，首先是机器制造业，也能拿出积累来。

出路就在这里。

为此需要做些什么呢？需要消灭不善经营的现象，动员工业

内部的资源，在我们的一切企业中实行并巩固经济核算制，不断降低成本，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加强工业内部的积累。

这就是到达出路的途径。

总之，**实行并巩固经济核算制，提高工业内部的积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七
用新方式工作，用新方式领导

同志们，以上就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新条件。

这些新条件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为工业造成新的环境，要求我们用新方法来工作，用新方法来领导。

由此可见：

（一）已经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指望劳动力的自流了。要保证工业有劳动力，就必须有组织地招收他们，必须使劳动机械化。如果以为我们不必实行机械化就可以保持今天的建设速度和生产规模，那就等于希望用匙子舀尽海水。

（二）其次，不能再容忍工业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了。要消除这个祸害，就必须按新的原则规定工资，使企业中的工人比较固定。

（三）其次，不能再容忍生产中的无人负责现象了。要消除这个祸害，就必须按新方式组织劳动，必须合理地配置力量，使每一部分工人都对工作、对机器、对机床、对工作质量负责。

（四）其次，不能再象过去那样依靠我们从资产阶级俄国继承下来的为数极少的旧工程技术人员了。要提高现有的速度和生产

规模，就必须使工人阶级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

（五）其次，不能象过去那样把所有的旧专家和旧工程技术人员都看成是一样的了。要适应已经改变的环境，就必须改变我们的政策，尽量关心那些确定不移地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的旧专家和旧工程技术人员。

（六）最后，不能象过去那样依靠旧的积累来源了。要保证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开辟新的积累来源，消除不善经营的现象，实行经济核算，降低成本，提高工业内部的积累。

这就是工业发展的新条件，这些条件要求我们用新方法来工作，用新方法来领导经济建设。

为了按新方式进行领导，需要做些什么呢？

首先，需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领导者了解新的环境，具体地研究工业发展的新条件，根据新环境的要求来改造自己的工作。

其次，需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领导者不是“一般地”、不是“从空中”来领导企业，而是具体地切实地领导企业；需要使他们不是从一般的空谈出发，而是以严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对待每一个问题；需要使他们不限于纸上的敷衍或一般的空话和口号，而要精通业务，了解工作的细节，熟悉“小事”，因为这些“小事”现在可以造就成大的事业。

其次，需要把我们现有的有时包括一二百个企业的那些庞大的公司立刻划小，分为几个公司。一个公司的主席要和一百个或一百个以上的工厂打交道，当然不能真正地了解这些工厂，了解这些工厂的生产能力和工作情况。他既然不了解工厂，当然就不能领导它们。因此，要使公司的主席有可能真正地研究工厂的情况并领导工厂，就必须使他们摆脱过多的工厂，必须把一个公司分为几个公司，使公司接近工厂。

其次，需要把我们的公司由委员会管理制改为一长管理制。现在的情况是公司的委员会里有十个到十五个人坐在那里，写写公文，讨论讨论问题。同志们，继续实行这样的管理方法是不行的。必须停止纸上的"领导"而去进行实际的、求实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让公司的主席和几个副主席留下来领导公司。这对于管理公司完全够了。其余的委员最好派到下面去，派到工厂去。这无论对于他们或对于工作都要有益得多。

其次，需要使公司的主席和副主席更经常地巡视各工厂，花更多的时间留在那里工作，更好地熟悉工厂的工作人员，不仅要教导现场的工作人员，而且要向他们学习。如果以为现在可以远离工厂坐在办公室内，从办公室来进行领导，那就错了。要领导工厂，就必须更经常地和企业的工作人员接触，必须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最后，略微谈谈我们1931年的生产计划。在党的周围有一些庸人，他们硬说我们的生产计划是不现实的，是不能完成的。这就象谢德林小说中的"绝顶聪明的鲈鱼"[57]一样，它总是在自己周围散布一种"无意义的疑虑"。我们的生产计划是不是现实的呢？绝对是现实的！所以是现实的，至少是因为我们具备实现这一计划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所以是现实的，至少是因为这一计划的完成现在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极丰富的可能性的本领和愿望。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许多企业和工业部门已经**超额完成了**计划呢？这说明其他的企业和工业部门也能够完成并超额完成计划。

如果以为生产计划是一张开列着数字和任务的一览表，那是愚蠢的。事实上生产计划是千百万人的活的实际行动。我们的生产计划的现实性就在于我们有千百万创造新生活的劳动者。我们

的计划的现实性就在于有活的人，有我们大家，我们的劳动意志，我们按新方式工作的决心，我们完成计划的决心。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决心呢？是的，是有的。因此，我们的生产计划是可能实现而且应该实现的。（长时间鼓掌）

载于1931年7月5日
《真理报》第183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3卷
第49—72页

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

（1931 年 12 月 13 日）

路德维希：承蒙你接见，我非常感激。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卓越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事业。我觉得我很会鉴别人，可是我一点也不懂得社会经济条件。

斯大林：你太谦虚了。

路德维希：不，的确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我要提出的一些问题你也许会觉得奇怪。今天我在这里，在克里姆林宫看见了彼得大帝的某些遗物，因而我要向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容许把你自己和彼得大帝相比拟？你是不是认为你自己是彼得大帝事业的继承者？

斯大林：绝对不行。历史的比拟总是冒险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

路德维希：但是要知道，彼得大帝为了发展自己的国家，为了把西方文化移植到俄国来，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斯大林：是的，当然，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许多事情的。彼得为了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时也应该说，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农奴来进行的。

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

为列宁的学生。

我毕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另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这个任务不是要巩固什么“民族”国家，而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说，要巩固国际主义国家，并且这个国家在任何程度上的巩固都会有助于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巩固。我在提高工人阶级和巩固这个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中的每一步骤如果不是为了巩固和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那么我认为我的一生是没有意义的。

可见你的比拟是不恰当的。

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么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

路德维希：马克思主义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卓越作用。而你毕竟还承认历史人物的卓越作用。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

斯大林：不，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① 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么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51]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页。——编者注

他们才能创造历史。至少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是这样了解马克思的。而我们研究马克思已经不止十年了。

路德维希：大约在三十年前，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许多自认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信徒的德国教授向我们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英雄的作用，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斯大林：这是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

路德维希：在我们面前这张桌子的周围有十六把椅子。在国外，人们一方面听说苏联是个一切事情都必须由集体决定的国家，另一方面又听说一切事情都是由个人决定的。究竟是由谁决定的呢？

斯大林：不，个人不能决定。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也都有发表不正确的意见的人。根据三次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一百个没有经过集体审查和修改的个人决定中，大约有九十个是片面的。

我们的领导机关，即领导我们所有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约有七十个委员。在这七十个中央委员中有我们优秀的工业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我们优秀的供应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军人、我们优秀的宣传家、我们优秀的鼓动家、我们优秀的办国营农场的专家、我们优秀的办集体农庄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个体农民经济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苏联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专家。在这个最高机构里集中了我们党的智慧。每个人都有可能改正任何人的个人意见和建议。每个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由个人来作决定，那么我

们在工作中就会犯极严重的错误。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改正个别人的错误，因为我们重视这些改正，所以我们做出的决定是比较正确的。

路德维希：你做过几十年的地下工作。你曾经秘密运送过武器、书报等等。你不认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会借用你的经验，用同样的方法来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吗？

斯大林：这当然是完全可能的。

路德维希：你们的政权在和敌人斗争时所以严厉无情，原因是不是就在这里？

斯大林：不，主要原因不在这里。可以举出几个历史上的例子。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后，最初他们对自己的敌人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孟什维克继续合法存在，并出版自己的报纸。社会革命党人[32]同样继续合法存在，并有自己的报纸。甚至立宪民主党人[36]也继续出版自己的报纸。当克拉斯诺夫将军向列宁格勒举行反革命进攻而落入我们手中的时候，按战时情况我们至少可以把他当俘虏押起来，而且应该把他枪毙。但是，我们根据他的"保证"把他释放了。结果怎样呢？不久就弄清楚了：这种温和态度只会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我们对工人阶级的敌人采取这种温和态度是犯了错误。如果我们以后再犯这个错误，我们就是对工人阶级犯罪，我们就是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一点不久就完全弄清楚了。很快就弄清楚了：我们对我们的敌人愈温和，这些敌人的反抗就愈厉害。不久，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郭茨等人和右派孟什维克就在列宁格勒组织了士官生的反革命发动[58]，由于这次发动，我们的许多革命水兵牺牲了。就是那位因作了"保证"而被我们释放的克拉斯诺夫组织了白卫哥萨克。他和马蒙托夫联合起来，对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两年武装斗争。不久就弄明白了：这些白卫将军的

后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国、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的代理人。于是我们相信，我们采取温和态度是多么错误。我们从经验中懂得了只有对这些敌人采取最无情的镇压政策，才能战胜他们。

路德维希：我觉得苏联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对苏维埃政权有恐惧、害怕的心理，而苏维埃政权的稳固在一定程度内是建筑在这种恐惧心理上的。我很想知道，在你意识到为了巩固政权而必须引起恐惧的时候，你个人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要知道，在你和你的同志、你的朋友交往的时候，你采取的完全是另外的手段，不是引起恐惧的手段，而对居民却要引起他们的恐惧。

斯大林：你错了。然而，你的错误也是许多人的错误。难道你以为用恫吓、恐吓的手段能够保持政权十四年之久并能得到千百万群众的支持吗？不，这是不可能的。沙皇政府是最善于恫吓的。它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老经验。欧洲资产阶级，其中包括法国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竭尽全力帮助了沙皇制度，教导它去恐吓人民。尽管有这种经验，尽管有欧洲资产阶级的帮助，恐吓政策还是使沙皇制度覆灭了。

路德维希：可是要知道，罗曼诺夫王朝却支持了三百年。

斯大林：是的，可是在这三百年中间有过多少次起义和暴动：斯切潘·拉辛的起义，叶梅利扬·普加乔夫的起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59]，1905 年的革命，1917 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更不必说，现在国内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条件和旧时的条件是根本不同了，那时候群众的愚昧无知、没有文化、驯服和政治上的闭塞使当时的"统治者"有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执掌政权。

至于苏联人民，至于苏联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完全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温顺、驯服和畏缩。欧洲有很多人用旧眼光来看苏联人，以为生活在俄国的人，第一是驯服的，第二是懒惰的。这是过时

的和根本不正确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从俄国地主开始跑到巴黎，在那里挥霍掠夺来的金钱，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的时候起在欧洲形成的。这的确是些没有意志和毫无用处的人。由此就得出了"俄国人懒惰"的结论。但是这同过去和现在都靠自己劳动来谋得生活资料的俄国工人和农民毫不相干。认为在短时期内进行了三次革命、摧毁了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现在胜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的俄国农民和工人是驯服的和懒惰的，那就太奇怪了。

你刚才问我，在我们这里是否由一个人决定一切。我们的工人现在决不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个人专断。在我们这里，最有威望的人只要不再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只要失去了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就会完全垮台，就会一钱不值。普列汉诺夫曾经享有非常高的威望。结果怎样呢？一旦他在政治上跛了脚，工人就把他忘记了，就离开他并且把他忘记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也曾享有很大的威望，当然远不如普列汉诺夫那样。结果怎样呢？一旦他离开了工人，工人就把他忘记了。

路德维希：完全忘记了吗？

斯大林：有时也想起他，——怀着憎恶的心情想起他。

路德维希：是所有的人都怀着憎恶的心情吗？

斯大林：说到我们的工人，他们是怀着憎恶、愤怒和仇恨的心情想起托洛茨基的。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居民确实是害怕苏维埃政权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我指的是正在被消灭的垂死阶级的残余，首先是不大的一部分农民，即富农。但是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对这些集团实行恐吓政策，这种政策确实是存在的。大家知道，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这里不仅限于恐吓，而且更进一步，要消灭这个资产阶级阶层。

但是如果拿苏联劳动居民来说，拿至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

十的工人和劳动农民来说，那么他们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而且他们绝大多数是积极支持苏维埃制度的。他们所以支持苏维埃制度，是因为这个制度是为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

苏维埃政权所以巩固的基础就在这里，而不在于所谓恐吓政策。

路德维希：我很感谢你这个回答。请原谅我再向你提出一个会使你感到奇怪的问题。在你的生平中有一些所谓"强盗性的"事迹。你对斯切潘·拉辛这个人物是否感到兴趣？你对他，对这个"有思想的强盗"抱什么态度？

斯大林：我们布尔什维克对鲍洛特尼科夫、拉辛、普加乔夫以及其他这样的历史人物向来是感到兴趣的。我们认为这些人的发动是被压迫阶级自发暴动的反映，是农民反对封建压迫的自发起义的反映。对我们说来，研究这种农民起义的最初尝试的历史总是有兴趣的。但是这里当然不能拿他们和布尔什维克作任何比拟。个别的农民起义，即使不象斯切潘·拉辛的起义那样带有"强盗性"和无组织性，也不能得到任何重大的结果。农民起义只有在和工人起义结合起来并由工人领导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只有以工人阶级为首的联合起义，才能达到目的。

除此以外，在说到拉辛和普加乔夫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要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口号。

由此可见，拿他们和布尔什维克相比拟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

路德维希：请允许我对你的生平提几个问题。当我在马萨里克那里的时候，他对我说，他从六岁起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是什么和在什么时候使你成了社会主义者的？

斯大林：我不能说我从六岁起就已经倾向社会主义了。甚至

也不是从十岁或者十二岁。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十五岁开始的，那时候我和当时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这些小组对我有很大影响，使我对秘密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发生了兴趣。

路德维希：是什么激起了你的反抗行为？也许是你的父母待你不好吧？

斯大林：不是的。我的父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他们待我很不坏。而当时我读书的正教教会中学就不同了。为了抗议正教中学里所实行的侮辱人的校规和耶稣会士的办法，我决心要成为并且真的已经成为革命者，成为真正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了。

路德维希：可是难道你不承认耶稣会士有好的品质吗？

斯大林：是的，为了实现丑恶的目的，他们在工作中是有一贯性和顽强性的。但是，他们的基本方法是监视、间谍活动、刺探情况和侮辱人，这里能有什么是好的呢？例如在宿舍中的监视：九点钟铃响喝茶，我们都到食堂去，而当我们回到自己房间里的时候，发觉我们所有装东西的箱子在这段时间内都已经搜查过、翻过了……这里能有什么是好的呢？

路德维希：我看到在苏联对美国的一切特别尊重，甚至可以说是崇拜美国的一切，也就是说，崇拜金元国家，崇拜最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你们工人阶级中也有这种情绪，他们不仅对拖拉机和汽车，而且对一般的美国人也是这样。你怎样解释这一点呢？

斯大林：你太夸大了。我们对美国的一切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尊重。但是，我们尊重美国在各方面——在工业、技术、文学和生活方面的求实精神。我们从来没有忘记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美国人中间有许多在精神和身体方面健康的人，在对待

工作和事业的整个态度上健康的人。这种求实精神和这种朴实作风我们是赞成的。虽然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是那里工业中的风气和生产中的习惯有一些民主主义的东西，而对欧洲的老资本主义国家就不能这样说了，因为那里还存在着封建贵族的老爷习气。

路德维希：甚至你自己都没有料到你讲得多么正确。

斯大林：谁知道，也许是料到了的。

虽然封建制度作为社会制度在欧洲早已被打破了，但是它的相当多的残余在生活和习惯中还继续存在。从封建世家中还在继续产生技师、专家、科学家和作家，他们把老爷习气带到工业、技术、科学和文学中去。封建传统还没有被彻底打破。

对美国就不能这样说了，美国是一个没有地主、没有贵族的"自由移民者"的国家。因此，美国在生产中的风气是实实在在的，比较朴实的。我们的工人和经济工作人员到了美国，立刻就看出了这个特点。他们带着某种愉快而惊奇的心情说，在美国，在生产过程中很难从外表上把工程师和工人区别开来。这当然使他们很高兴。而在欧洲就完全不同了。

但是既然说到我们对某一个民族的好感，或者更正确地说，对某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好感，那么当然应该说到我们对德国人的好感。我们对美国人的感情是不能和这种好感相比的！

路德维希：为什么恰恰是对德意志民族呢？

斯大林：至少是因为德意志民族给世界贡献了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人物。只要指出这个事实本身就够了。

路德维希：近来在德国某些政治家中间有一种严重的忧虑，生怕苏联和德国传统的友好政策会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这种忧虑是由于苏联和波兰的谈判而引起的。如果经过这次谈判，苏联对波

兰现在疆界的承认成了事实，那么就会使全体德国人民大失所望，因为德国人民直到现在还认为苏联是反对凡尔赛体系[60]的，是不打算承认它的。

斯大林：我知道在德国某些政治家中间有某种不满和担心，生怕苏联在和波兰的谈判中或者在和波兰签订的什么条约中会采取一种意味着苏联承认和保证波兰的领土和疆界的措施。

据我看来，这种忧虑是错误的。我们一向声明我们愿意和任何国家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我们已经和许多国家缔结了这种条约。我们公开声明我们也愿意和波兰签订同样的条约。既然我们声明我们愿意和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那么我们这样做就不是为了讲空话，而是为了真正签订这种条约。我们可以说是特种的政治家。有一些政治家，他们今天答应或者声明一件事，到第二天不是忘记了，就是否认他们声明过的东西，而且竟不觉得难为情。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在国外做的事情，国内必然会知道，全体工人和农民必然会知道。如果我们说的是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那么我们就会丧失我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当波兰人声明他们愿意和我们举行关于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时，我们自然表示同意并着手进行谈判。

在德国人看来，可能发生的最大危险是什么呢？是对德国人的关系的改变，关系的恶化吗？但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正如波兰人一样，应当在条约中声明我们将不采取暴力和侵略来改变波兰和苏联的疆界或者来破坏双方的独立。正如我们向波兰人许下这种诺言一样，他们也向我们许下这种诺言。不写下这样一点，即我们两国不打算进行战争来破坏双方的独立或疆界的完整，不写下这一点就不能缔结条约。没有这一点就谈不到什么条约。我们所能做到的至多就是这样。

这是不是承认凡尔赛体系呢？不是的。或者这也许是保证疆界吧？不是的。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做波兰疆界的保证人，正如波兰没有做过而且也不会做我们疆界的保证人一样。我们对德国的友好关系仍然和以前一样。这是我坚决相信的。

因此，你所说的忧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种忧虑是由某些波兰人和法国人所散布的谣言引起的。如果条约由波兰签了字，当我们把它公布出来的时候，这种忧虑是会消失的。大家将会看到，这个条约并不包含任何反对德国的东西。

路德维希：我非常感谢你这个声明。请允许我向你提出下面的问题：你谈到"平均主义"，而且这个名词对普遍的平等来说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但是要知道，普遍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理想。

斯大林：所有的人都领取同样的工资、同等数量的肉、同等数量的面包，穿同样的衣服，领取同样的和同等数量的产品，——这种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所不知道的。

马克思主义只是说：在阶级还没有彻底消灭的时候，在劳动还没有从生存手段变成人们的第一需要，变成为社会谋福利的自愿劳动的时候，人们将按自己的劳动来领取工作报酬。"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公式。

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每个人一方面尽自己的能力来劳动，另一方面将按自己的需要来领取劳动报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十分明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同的人具有而且将来也会有不同的需要。社会主义从来不否认人们在口味上、在需要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别。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对施蒂纳平均主义倾向的批

判①，只要读一读马克思1875年对《哥达纲领》的批判②，只要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后来的著作，你就会看到他们对平均主义的抨击是多么尖锐。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素朴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平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只有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幼稚地设想，似乎俄国布尔什维克想把一切财富聚集在一起，然后把它们平均分配。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就是这样设想的。象克伦威尔时期和法国革命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者"那样的人就是这样设想共产主义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和这种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路德维希：你抽纸烟了。斯大林先生，你那只传奇似的烟斗在哪里呢？你曾经说过，言论和传奇是会消失的，而事迹却会存在。但是请你相信，国外千百万不知道你的某些言论和事迹的人都知道你的传奇似的烟斗。

斯大林：我把烟斗忘在家里了。

路德维希：我现在向你提一个可能使你感到十分惊奇的问题。

斯大林：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早就忘记惊奇了。

路德维希：我们在德国也是这样。

斯大林：是的，你们在德国很快就会不再惊奇了。

路德维希：我的问题是这样的：你不止一次地冒生命的危险，

---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532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编者注

而且遭到过危险，你受到过迫害。你参加过战斗。你的许多亲密的朋友都死了，而你还活着。你怎样解释这一点呢？你相信命运吗？

斯大林：不，不相信。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是不相信“命运”的。命运这个概念，即“希克扎尔”① 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偏见，就是胡说，就是古希腊人的神话这一类东西的残余，古希腊人认为命运之神支配着人们的命运。

路德维希：那么，你没有死这件事是不是偶然的呢？

斯大林：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两种原因凑在一起就使我没有死。但是，不管我死没有死，都可能有另外一个人来担任我的职务，因为总有一个人必须担任这个职务。“命运”是一种不合乎规律的东西，是一种神秘的东西。我是不相信神秘主义的。当然，我避开了危险是有原因的。但是当时也可能发生一些会引起完全相反的结果的其他偶然事件和其他原因。这和所谓命运是毫不相干的。

路德维希：列宁在国外侨居过多年。你在国外住的时间却很短。你是不是认为这是你的缺陷？你认为给革命带来更多利益的是那些侨居国外并且有可能认真研究欧洲，但是和人民没有直接联系的人呢，还是那些在俄国工作并且了解人民情绪，但是不大知道欧洲的革命者？

斯大林：在作这种比较时应当把列宁除外。虽然列宁住在国外很久，但是留在俄国的同志中间很少有人象他那样和俄国实际情况以及国内工人运动有密切的联系。每当我到国外去看他时（1906年、1907年、1912年和1913年[61]），我总是看见他那里有一大堆俄国实际工作者寄来的信件，列宁总是比那些留在俄国的同

① “希克扎尔”系德语“Schicksal”一词的音译，意即命运。——编者注

志更熟悉俄国情况。他始终认为居住国外对自己是一种负担。

在我们党内和党的领导人员中，留在俄国而没有到过国外的同志当然比在国外侨居过的人多得多，他们当然有可能比在国外侨居的人给革命带来更多的利益。要知道，我们党内在国外侨居过的人已经剩下很少了。这样的人在二百万党员中只占一二百人。在七十个中央委员中几乎只有三四个人是在国外侨居过的。

至于认识欧洲，研究欧洲，那么那些想研究欧洲的人住在欧洲当然有更多的机会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中间没有长期居住国外的人是有某种损失的。可是居住国外对研究欧洲的经济、技术、工人运动干部、各种文学著作或科学著作完全没有决定的意义。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住在欧洲当然更容易研究欧洲。但是，没有在欧洲住过的那些人所受到的损失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相反地，我知道有许多同志，他们在国外住了二十年，住在沙洛顿堡或拉丁区[62]的某个地方，在咖啡馆里坐了好多年，喝喝啤酒，却始终没有能够研究欧洲，也没有了解欧洲。

路德维希：你是不是认为德国这个民族对秩序的爱更甚于对自由的爱呢？

斯大林：在德国，有一个时候人们确实非常尊重法律。1907年我曾经在柏林住过两三个月，当时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常常嘲笑某些德国朋友这样尊重法律。例如流传过这样的笑话：柏林社会民主党委员会规定在某日某时举行一次游行示威，凡城郊各组织的人员都必须参加这次游行示威，某郊区一个二百人的小组虽然按时在指定时间内到达城市，但是没有来得及参加游行，因为他们在车站的月台上站了两小时，不敢离开月台：在出口处没有收票的检票员，车票没有人可交。人们开玩笑说，需要有一个俄国同志来给德国人指出一条简单的出路：走出月台，不要交票……

可是，难道现在德国还有什么类似的情形吗？难道现在德国还有人尊重法律吗？难道那些本来应该比所有的人都更维护资产阶级法律的国社党人[63]自己不是在破坏法律，不是在捣毁工人俱乐部，不是在肆无忌惮地杀害工人吗？

更不用说工人了，我以为他们早已不再尊重资产阶级法律了。

是的，近来德国人已经大大地改变了。

路德维希：在什么条件下，工人阶级才能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完完全全团结起来？为什么共产党人说，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工人阶级的这种团结才有可能？

斯大林：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周围的这种团结可以最容易地实现。但是，这种团结还在革命前无疑就会基本上实现。

路德维希：功名心对于伟大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是一种刺激还是一种障碍？

斯大林：在不同的条件下，功名心的作用是不同的。依据条件为转移，功名心对于伟大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可能是一种刺激，也可能是一种障碍。它多半是一种障碍。

路德维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月革命是不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和完成？

斯大林：十月革命既不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也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完成。法国革命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制度以建立资本主义。十月革命的目的则是消灭资本主义以建立社会主义。

载于 1932 年 4 月 30 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 8 期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
第 93—109 页

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64]上的演说

（1933 年 2 月 19 日）

集体农庄男女庄员同志们！我本来不打算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讲话。我所以不打算讲话，是因为在我以前讲话的几位同志已经把要说的话都说了，而且说得很好，很中肯。既然如此，是不是还用得着我来讲话呢？可是因为你们一定要我讲话，而权力又在你们手里，（长时间鼓掌）我就只好遵命了。

现在我就个别的几个问题说几句话。

一

集体农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第一个问题：集体农民所走上的道路是不是正确的呢？集体农庄道路是不是正确的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你们集体农庄突击队员对于集体农庄是否站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一点大概是不会怀疑的。因此，这个问题在你们看来可能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象你们这样想法。有不少的农民，其中也有庄员，还怀疑集体农庄道路是否正确。这也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的确，人们数百年来过着旧的生活，走着旧的道路，在富农和地主跟前低头做人，在高利贷者和投机分子跟前低头做人。不能说这条旧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得到过农民的赞同。可是，这条旧道路总是一条已经走熟了走惯了的道路，而且谁也没有实地证明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过较好的生活。何况在各个资产阶级国家里，人们仍然过着旧的生活……　而布尔什维克却象疾风骤雨一般，突然冲进这个旧的泥潭似的生活里来说：是抛弃旧道路的时候了，是开始过新生活，过集体农庄生活的时候了，是开始不过资产阶级国家里大家所过的那种生活，而过新生活，过劳动组合生活的时候了。而这种新生活是怎样一种生活呢，有谁知道。但愿它不会比旧生活更坏。至少新道路是一条没有走惯的道路，是一条没有走熟的道路，是一条还没有完全熟悉的道路。留在旧道路上不是好些吗？等一等再转上新的集体农庄的道路不是好些吗？冒险是不是值得呢？

这就是现在一部分劳动农民所抱的疑问。

我们是否应该消除这些疑问呢？我们是否应该公开提出这些疑问，指出这些疑问有什么价值呢？显然是应该的。

所以，上面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不能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

那么，集体农民所走上的道路是不是正确的呢？

有些同志以为我们向新道路即集体农庄道路的过渡是在三年以前开始的。这种看法只有一部分对。当然，群众性的集体农庄建设在我们这里是在三年以前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个过渡的标志是富农被击溃，千百万贫农和中农群众加入集体农庄。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是为了开始这种群众性的向集体农庄的过渡，必须具备一些先决条件，一般说来，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有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

首先，必须有苏维埃政权，它曾经帮助而且正在继续帮助农民走上集体农庄道路。

第二，必须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剥夺他们的工厂和土地，并宣布工厂和土地为人民的财产。

第三，必须压制富农，剥夺他们的机器和拖拉机。

第四，必须宣布只有加入集体农庄的贫农和中农才能使用机器和拖拉机。

最后，必须使国家工业化，创立新的拖拉机工业，建设新的农业机器制造厂，以便供给集体农民以充足的拖拉机和机器。

没有这些先决条件，就根本谈不到三年前开始的群众性的向集体农庄道路的过渡。

所以，要过渡到集体农庄道路，首先必须进行十月革命，推翻资本家和地主，剥夺他们的土地和工厂，创立新工业。

向新道路即集体农庄道路的过渡是从十月革命就开始的。这个运动所以直到三年前才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是因为十月革命的经济果实直到那个时候才完全显露出来，我们直到那个时候才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

在各国人民的历史上有过不少次革命。它们和十月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们都是片面的革命。一种剥削劳动者的形式被另一种剥削形式代替了，但是剥削本身仍然存在。一些剥削者和压迫者被另一些剥削者和压迫者代替了，但是剥削者和压迫者本身仍然存在。只有十月革命的目的才是消灭**任何**剥削，消灭**所有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

奴隶革命把奴隶主消灭了，把奴隶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废除了。可是，这个革命用农奴主和农奴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代替了奴隶主和奴隶占有制的剥削形式。一些剥削者被另一些剥削者代

替了。在奴隶制度下，“法律”允许奴隶主杀死奴隶。在农奴制度下，“法律”“只”允许农奴主出卖农奴。

农奴革命把农奴主消灭了，把农奴制的剥削形式废除了。可是，这个革命用资本家和地主，用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代替了农奴主和农奴制的剥削形式。一些剥削者被另一些剥削者代替了。在农奴制度下，“法律”允许出卖农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法律”“只”允许使劳动者失业和贫困，破产和饿死。

只有我们的苏维埃革命，只有我们的十月革命才这样提出问题：不是用一些剥削者代替另一些剥削者，不是用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而是根绝任何剥削，根绝所有一切剥削者，所有一切富豪和压迫者，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长时间鼓掌）

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是农民向新的集体农庄道路过渡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前提。

农民支持十月革命是不是做得对呢？是的，他们是做得对的。他们所以做得对，是因为十月革命帮助他们摆脱了地主和资本家，高利贷者和富农，商人和投机分子。

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赶走压迫者，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压制富农和投机分子，——这是很好的。但是这还不够。为了最终摆脱旧时的羁绊，仅仅击溃剥削者是不够的。为了做到这一点，还要建立新生活，建立一种使劳动农民能够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而且能够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上升的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在农村中建立新制度，即集体农庄制度。这就是问题的另一面。

旧制度和新的集体农庄制度有什么不同呢？

在旧制度下，农民进行单干，用古老陈旧的方法和旧式农具工作，为地主和资本家、为富农和投机分子工作，自己过着半饥半饱

的生活而使别人发财致富。在新的集体农庄制度下，农民按劳动组合的方式共同工作，用新式农具——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工作，为自己和自己的集体农庄工作，过着没有资本家和地主、没有富农和投机分子的生活，为了使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而工作。在旧制度下，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它帮助富豪反对劳动农民。在新的集体农庄制度下，政府是工农的，它帮助工人和农民反对所有一切富豪。旧制度导向资本主义。新制度导向社会主义。

可见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有些人以为可以走什么第三条道路。有些还不完全相信集体农庄道路的正确性而摇摆不定的同志特别喜欢搬出这条谁也不知道的第三条道路。他们想要我们回到旧制度去，回到个体经济去，不过不要地主和资本家。同时，他们想要我们"只"容许富农和其他小资本家作为我国经济制度中的合法现象而存在。其实，这并不是第三条道路，而是第二条道路，即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请你们问一问农民：他们是不是愿意恢复富农盘剥，回到资本主义去，取消苏维埃政权而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呢？你们只要问一问农民，就会知道大多数劳动农民认为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哪一条道路。

所以，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向前进，向上走，走到新的集体农庄制度；或者向后退，向下走，走到旧的富农资本主义制度。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劳动农民屏弃了资本主义道路而走上了集体农庄建设道路是做得对的。

有人说，集体农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它是一条困难的道路。这种说法只有一部分对。当然，在这条道路上困难是有的。美好的生活不花代价是得不到的。可是问题在于：主要的困难已经度过了，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困难简直是不值得认真谈到的。无论如何，同工人在十年至十五年前所遇到的那些困难比较起来，庄员同志们，你们目前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你们的发言人在这里讲话的时候称赞列宁格勒、莫斯科、哈尔科夫和顿巴斯的工人。他们说，他们工人有成绩，而你们庄员的成绩却少得多了。我觉得你们的发言人在演说中甚至流露出一种同志的羡慕：如果我们集体农民有象你们列宁格勒、莫斯科、顿巴斯和哈尔科夫工人那样的成绩，那该多好呵……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你们知道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用了多大的代价才换得这些成绩，他们经过怎样的艰难困苦才终于取得这些成绩吗？我可以给你们讲一讲1918年工人生活中的一些事实。当时常常整个整个星期不发给工人一块面包，更不必说肉类和其他食品了。当时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能够领到八分之一磅黑面包，还掺着一半豆饼渣，就算是好日子了。而且这种情况不是继续了几个月或半年，而是继续了整整两年。但是工人忍耐着，并没有灰心丧气，因为他们知道好时光一定会到来，他们一定会取得重大的成就。结果怎样呢？你们看见，工人没有想错。你们只要把你们的艰难困苦和工人受过的艰难困苦比较一下，就会看出

你们的艰难困苦简直是不值得认真谈到的。

怎样才能推进集体农庄运动和全力展开集体农庄建设呢？

首先，集体农庄必须拥有十分固定而适于耕种的土地。你们是否有这种土地呢？是的，是有的。大家知道，所有的好地都交给集体农庄，而且归集体农庄永久使用了。所以，集体农庄庄员可以尽力耕种和改良这些土地，不必害怕这些土地会落到别人手里。

其次，集体农庄庄员必须能够使用拖拉机和机器。你们是不是有这些东西呢？是的，是有的。大家知道，我们的拖拉机制造厂和农业机器制造厂首先而且主要是为集体农庄生产的，它们供给集体农庄以一切现代工具。

最后，政府必须以人才和拨款来全力帮助集体农民，而不让敌对阶级余孽破坏集体农庄。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政府呢？是的，是有的。这个政府就叫工农苏维埃政府。请你们指出来给我看看，还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是帮助资本家和地主，不是帮助富农和其他富豪，而是帮助劳动农民的。世界上没有而且不曾有过这样的国家。只有在我们苏维埃国家里才有这样的政府，它竭力保护工人和集体农民，保护城乡一切劳动者，反对一切富豪和剥削者。（长时间鼓掌）

所以，你们有展开集体农庄建设和完全摆脱旧时羁绊的一切条件。

现在对你们的要求只有一个：诚实地劳动，按劳动分配集体农庄的收入，爱护集体农庄的财产，爱护拖拉机和机器，好好照料马匹，完成你们的工农国家所给予的任务，巩固集体农庄，把钻进集体农庄的富农和富农走狗驱逐出去。

你们大概会同意我的意见：克服这些困难，就是说，诚实地劳动和爱护集体农庄的财产，是并不怎样困难的。何况你们现在不

是为富豪工作，不是为剥削者工作，而是为自己，为自己的集体农庄工作。

由此可见，集体农庄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劳动农民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二

我们的当前任务是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

第二个问题：我们在新道路上，在集体农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什么成绩呢？我们想在最近两三年内取得什么成绩呢？

社会主义是一件好事。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活是一件无可争辩的好事。可是，这一切都是将来的事情。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我们将来能取得什么成绩，而在于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什么成绩。农民走上了集体农庄道路。这是很好的。可是，农民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什么成绩呢？我们沿着集体农庄道路前进取得了什么显著的成绩呢？

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帮助千百万贫农群众加入了集体农庄。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千百万贫农群众因加入集体农庄并在集体农庄里使用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农具而上升到中农的水平。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千百万从前过着半饥半饱生活的贫农群众现在在集体农庄里成了中农，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我们取得的成绩是打破了农民分化为贫农和富农的过程，击溃了富农，帮助贫农在集体农庄里成了自己的劳动的主人，成了中农。

四年以前，在集体农庄建设展开以前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当

时富农日益富有，日益上升，而贫农则日益贫困和破产，遭受富农的盘剥。当时中农常常向富农的地位爬，但是每一次都跌下来补充贫农的队伍而使富农称快。不难猜想，在这一片混乱中占便宜的只有富农，也许还有几个富裕农民。当时农村里每百户中有四五户富农，八户或十户富裕农民，四十五至五十户中农，三十五户贫农。所以，受富农盘剥的贫农至少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我还没有算中农中半数以上的力量单薄的阶层，他们按生活状况来说同贫农很少区别，他们也是直接依赖于富农的。

我们展开集体农庄建设的结果，消灭了这种混乱和不公平现象，打破了富农盘剥，把所有这些贫农群众都吸收到集体农庄里来，在集体农庄里给了他们有保障的生活，把他们提高到中农的水平，使他们能够使用集体农庄的土地，享受对集体农庄的优待，使用拖拉机和各种农业机器。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使不下二千万农民人口，不下二千万贫农摆脱了贫困和破产，摆脱了富农盘剥，因加入集体农庄而变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

同志们，这是很大的成绩。这样的成绩是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是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取得过的。

这就是集体农庄建设的实际的明显的结果，是农民走上集体农庄道路的结果。

但这还只是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所取得的**第一个**成绩。

如果以为我们应当停留在这第一步上，停留在这第一个成绩上，那就不正确了。不，同志们，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成绩上。要继续前进并彻底巩固集体农庄，我们必须走**第二**步，我们必须取得**新的**成绩。这第二步是什么呢？这第二步就是要把集体农庄庄

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都提得更高。这第二步就是要**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是的，同志们，成为生活富裕的人。（长时间鼓掌）

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依靠集体农庄把贫农提高到中农的水平。这是很好的。但是这还不够。我们现在必须更前进一步，帮助全体集体农庄庄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上升到富裕农民的水平。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到的。（长时间鼓掌）

我们现在有达到我们这个目的所必需的一切。我们的机器和拖拉机现在利用得还不好。我们的土地耕种得还不大好。我们只要改进机器和拖拉机的使用，只要改进土地的耕种，就能做到使我们的产量增加一两倍。而这就完全足以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集体农庄土地上的劳动者了。

从前，富裕农民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当时要成为富裕农民，就必须欺负自己的邻人，就必须剥削他们，和他们做买卖时高价卖出，低价买进，雇佣几个雇农，竭力剥削他们，积累一点小资本，稳固以后就爬上富农的地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从前在个体经济下，富裕农民就引起贫农和中农的不信任和仇恨。现在情形不同了。现在条件也不同了。现在，集体农庄庄员要成为生活富裕的人，完全不需要欺负或剥削自己的邻人。而且现在要剥削什么人也不容易，因为我们这里不再有土地私有制或租佃制，机器和拖拉机都属于国家，而拥有资本的人在集体农庄里面已经不时髦了。曾经时髦过，但是这种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集体农庄庄员要成为生活富裕的人，只需要一件事情，就是在集体农庄里诚实地工作，正确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正确地使用耕畜，正确地耕种土地，爱护集体农庄的财产。

有时有人说：既然有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还要劳动呢？从前劳动，现在还劳动，难道还不到不劳动的时候吗？同志们，这种说法是根本不正确的。这是懒汉的哲学，而不是诚实的劳动者的哲学。社会主义决不否认劳动。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是建筑在劳动上的。社会主义和劳动是彼此分不开的。

我们的伟大导师列宁说过："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什么意思呢？列宁的话是反对什么人的呢？是反对剥削者，反对那些自己不劳动而强迫别人劳动，靠剥削别人发财致富的人的。还反对什么人呢？还反对那些好逸恶劳，想靠别人养活的人。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好逸恶劳，而是所有的人都诚实地劳动，不是为别人劳动，不是为富豪和剥削者劳动，而是为自己、为社会劳动。如果我们诚实地劳动，为自己、为自己的集体农庄诚实地劳动，那么我们就能做到在短短两三年内把全体集体农庄庄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提高到富裕农民的水平，提高到享有丰富产品并过着完全文明生活的人的水平。

这就是我们的当前任务。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而且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到的。（长时间鼓掌）

三
几点意见

现在让我谈谈几点意见。

首先谈谈我们的农村**党员**。你们中间有党员，可是非党员更多。参加这次大会的非党员比党员多，这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正是首先需要吸收非党员参加我们的事业。有些共产党员是用布尔什

维克态度来对待非党庄员的。可是也有一些共产党员摆党员架子，不许非党员接近他。这是不好的，而且是有害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共产党员的力量就在于他们善于把千百万非党积极分子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能争取到千百万非党工人和农民对我们党的信任，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胜利。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党员不要和非党员隔绝，不要把自己关在党的圈子里，不要摆党员架子，而要倾听非党员的呼声，不仅要教导非党员，而且要向非党员学习。

不要忘记，党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记住，所有的党员自己有一个时候都曾经是非党员。今天他不是党员，明天他就会成为党员。这里究竟有什么可以自傲的呢？我们老布尔什维克中间有不少人已经在党内工作了二三十年。可是要知道，我们自己有一个时候也曾经是非党员。假如在二三十年以前，当时的党员鄙视我们，不许我们接近党，那我们会怎样呢？也许我们还会有好几年和党疏远。可是，同志们，我们老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一些最不中用的人。（活跃，长时间鼓掌）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党员，现在有时瞧不起非党员的一些年轻党员应当记住这一切，应当记住：使布尔什维克增光的不是骄傲，而是谦逊。

现在稍微谈谈**妇女**，谈谈**女庄员**。同志们，集体农庄中的妇女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知道你们中间有许多人轻视妇女，甚至讥笑妇女。可是，同志们，这是一个错误，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妇女占人口的一半。问题首先在于集体农庄运动已经把许多卓越的能干的妇女提拔起来担任领导职务。你们只要看一看这次大会，看一看大会的成员，就可以看出妇女早已由落后者上升为先进者了。妇女在集体农庄中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埋没这

支力量就是犯罪。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推动集体农庄中的妇女前进，运用这支力量。

固然，苏维埃政权在不久以前和女庄员发生过一点小误会。是关于奶牛的问题。可是现在奶牛问题已经妥善解决，于是误会也就消释了。（长时间鼓掌）我们已经做到使大多数庄员每户有一头奶牛。再过一两年，你们就找不到一个自己没有奶牛的庄员了。我们布尔什维克一定设法使我国所有的庄员每户有一头奶牛。（长时间鼓掌）

至于女庄员自己，她们应当记住集体农庄对于妇女的作用和意义，应当记住她们只有在集体农庄里面才有可能和男子处于平等地位。没有集体农庄，就没有平等，在集体农庄里面，就有平等权利。请女庄员同志们记住这一点，请她们象爱护眼珠一样爱护集体农庄制度。（长时间鼓掌）

现在对于集体农庄中的**男女共青团员**说几句话。同志们，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青年应当接替我们老年人。青年应当举起我们的旗帜直到胜利的终点。农民中间有不少老年人背着旧包袱，带着旧习惯，怀念着旧生活。当然，他们不是时常都跟得上党，跟得上苏维埃政权的。我们的青年就不同了。他们没有背上旧包袱，所以他们最容易领会列宁的遗训。正因为青年最容易领会列宁的遗训，所以他们负有引导落后分子和动摇分子前进的使命。固然，青年缺乏知识。但是，知识是可以求得的。今天没有知识，明天就会有了。因此，你们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列宁主义。男女共青团员同志们！学习布尔什维主义，引导动摇分子前进吧！少说空话，多做工作，你们就一定会成功。（鼓掌）

现在稍微谈谈**个体农民**。这里很少有人说到个体农民。但这并不是说世界上已经没有个体农民了。不，不是这样一回事。个

体农民还存在，决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因为他们是我们明天的集体农庄庄员。我知道有一部分个体农民已经完全堕落，跑去做投机买卖了。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庄员接受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时选择得很严格，有时根本就不接受他们。这当然是正确的，而且是不容有异议的。但是另外还有更大的一部分个体农民，他们没有去做投机买卖，而是靠诚实的劳动谋生的。这些个体农民也许并不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但是他们还没有加入。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还怀疑集体农庄道路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现在庄员中间有一种憎恨个体农民的心理。

当然，也应当了解庄员，处在庄员的地位来想一想。他们这些年来受到了个体农民不少的侮辱和讥笑。但是，侮辱和讥笑在这里不应当有重大的意义。不能忘掉侮辱而把自己的感情置于集体农庄事业的利益之上的领导者是一个不好的领导者。如果你们想做领导者，你们就应当善于忘掉个别个体农民给你们的侮辱。两年以前，我接到了一个寡居农妇从伏尔加寄来的信。她抱怨人家不愿意接受她加入集体农庄，要求我帮助她。我当时写信去问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给我回信说，他们不能够接受她加入集体农庄，因为她侮辱过集体农庄大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在一次农民大会上，庄员号召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而这个寡妇听了号召之后就提起裙子说：给你们，把集体农庄拿去吧！（活跃，笑声）毫无疑问，这个寡妇做得不对，侮辱了大会。可是，既然她经过一年以后真诚悔过并承认了错误，能不能还拒绝接受她加入集体农庄呢？我认为不能拒绝。我就把这个意见写给集体农庄了。他们接受了这个寡妇加入集体农庄。结果怎样呢？原来她现在在集体农庄的工作队伍里不是站在后面，而是站在前列。（鼓掌）

这又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领导者如果想成为真正

的领导者，那么当事业的利益需要他忘掉侮辱的时候，他就必须善于忘掉侮辱。

关于一般个体农民也都必须这样说。我不反对接受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要加以选择。可是，我反对不加选择地堵死一切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道路。这不是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政策。集体农庄庄员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在不久以前也曾经是个体农民。

最后，稍微谈谈**别金楚克区集体农庄庄员的一封来信**①。这封信已经在报上发表，你们大概都读过了。这封信确实是很好的。它证明在我们的庄员中间有不少有经验有觉悟的集体农庄事业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他们是我们国家的骄傲。但是信里有一个不正确的地方，对于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同意的。原来别金楚克区的同志们把他们在集体农庄中的劳动看做平凡的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劳动，而把那些往往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演说家和领袖们的劳动看做伟大的创造性的劳动。能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呢？不，同志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别金楚克区的同志们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也许他们是由于谦虚而犯了这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不能因此就不算错误。把领袖看做唯一的历史创造者，而不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决定的。工人和农民不声不响地建设工厂、矿井、铁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创造一切生活资料，供给全世界以衣食，——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创造者。我们的别金楚克区的同志们大概把这一点忘记了。一个人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夸耀自己的功

① 指中伏尔加边疆区（现古比雪夫州）别金楚克区机器拖拉机站工作地区集体农庄庄员给斯大林的信，该信发表在1933年1月29日《真理报》第二十八号上。——编者注

绩，这是不好的。结果会造成妄自尊大，而妄自尊大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看不到自己的“平凡的”“不显著的”劳动实际上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劳动，那就更坏了。

我希望别金楚克区的同志们接受我对他们那封信提出的这个小小的修正。

同志们，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掌声经久不息，转为欢呼。全场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高喊：“乌拉”。全场高呼：“斯大林同志万岁，乌拉！先进的集体农庄庄员万岁！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载于1933年2月23日
《真理报》第53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3卷
第212—229页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65]上
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摘录)

(1934年1月26日)

三
党

现在谈谈党的问题。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列宁主义取得完全胜利的旗帜下，在各种反列宁主义集团残余被肃清的旗帜下举行的。

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列宁主义集团被击溃、被驱散了。这个集团的组织者们现在在国外资产阶级政党的后院里混日子。

右倾分子的反列宁主义集团被击溃、被驱散了。这个集团的组织者们早已抛弃自己的观点，现在正竭力设法向党赎罪。

各种民族主义倾向分子的集团被击溃、被驱散了。这些集团的组织者们不是和主张武装干涉的流亡者完全勾结在一起，就是低头认罪了。

这些反革命集团的大多数参加者不得不承认党的路线正确而向党投降了。

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3]上还不得不证明党的路线正确，还不得不和一些著名的反列宁主义集团进行斗争，在第十六次代表大

会[66]上也还不得不把这些集团的最后一批信徒彻底击溃，而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既没有什么要证明的，大概也没有什么人要打击的了。大家都看得见，党的路线胜利了。(掌声如雷)

国家工业化的政策胜利了。它的成果现在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

消灭富农和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政策胜利了。它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

我们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

显然，所有这些成就，首先是五年计划的胜利，把各种各样的反列宁主义集团打得一败涂地，打得粉碎了。

必须承认，党现在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一致了。(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1. 政治思想领导问题

但这是不是说，斗争已经结束，社会主义的继续进攻已经成为多余的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不是说，我们党内一切都很好，党内再不会出现任何倾向，因此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

党的敌人，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都被击溃了。但是，他们的思想体系的残余还留在个别党员的头脑中，并且时常流露出来。决不能把党看做一种和周围的人们隔绝的组织。党是在它周围的人们中间生存和活动的。有一些不健康的情绪往往从外界渗入党内，这是不足为奇的。而滋长

这种情绪的土壤在我国也无疑是有的，这至少是因为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中至今还存在着一些中间阶层，他们就是这种情绪的培养基。

我们党的第十七次代表会议[67]说过，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之一，就是“肃清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种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能不能说我们已经肃清了经济中的一切资本主义残余呢？不，不能这样说。更不能说我们已经肃清了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所以不能这样说，不仅因为人们意识的发展落后于人们的经济地位，而且因为资本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包围力图复活和支持苏联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我们布尔什维克对这种资本主义的包围必须时刻戒备。

很明显，这些残余不能不是已被击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体系在我们个别党员的头脑中复活起来的良好土壤。此外，如果注意到我们大多数党员的理论水平不很高，党机关的思想工作薄弱，我们党的工作人员担负的纯粹实际工作过重而使他们不可能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你们就会了解，个别党员头脑中对列宁主义的一些问题的糊涂观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种糊涂观念往往传播到我们的报刊上，并有助于已被击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体系残余复活起来。

正因为如此，不能说斗争已经结束，社会主义的进攻政策再也不需要了。

可以举出列宁主义中的几个问题来说明已被击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体系残余在某些党员中间还有多大的生命力。

例如拿建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来说吧。党的第十七次代表会议说过，我们正向着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

当然，无阶级社会是不会按所谓自流的方式到来的。它是必须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努力，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展开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消灭资本主义阶级残余等手段，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战斗中争得和建成的。

问题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可是，谁不知道，这个明白浅显的列宁主义论点的宣布竟在一部分党员中间引起了不少的糊涂观念和不健康的情绪呢？我们走向无阶级社会，这个论点是当做口号提出的，而他们却了解为自发的过程。于是他们就这样想：既然说是无阶级社会，那就是说，可以削弱阶级斗争，可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可以根本取消国家，因为国家反正在最近必然会消亡。于是他们就欣喜若狂，等待着很快就会没有任何阶级，就是说，不会再有阶级斗争，就是说，不必再操心和担忧，就是说，可以放下武器，高枕而卧，等待无阶级社会的降临。（全场大笑）

毫无疑问，这种糊涂观念和这些情绪同大家知道的右倾分子的观点一模一样。按照这种观点看来，旧东西必然会自流地成长为新东西，总有一天我们必然会不知不觉地进到社会主义社会。

由此可见，已被击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体系残余还完全能够复活起来，它还远没有丧失自己的生命力。

很明显，如果这种糊涂观点和这些非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掌握了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那么我们党就会涣散而被解除武装。

其次，拿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的问题来说吧。现在大家都承认，劳动组合在目前条件下是集体农庄运动唯一正确的形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一）劳动组合正确地把庄员的个人生活利益和他们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二）劳动组合成功地使个人生活利益适应公共利益，从而有助于以集体主义精神教育昨天的

个体农民。

公社和劳动组合不同，劳动组合只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公社直到不久以前为止不仅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且把每个社员的生活也公共化了，就是说，公社社员和劳动组合成员不同，他们没有私有的家禽、小家畜、奶牛、谷物和宅旁园地。这就是说，在公社中，与其说是照顾到社员的个人生活利益，把它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不如说是为了达到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而用公共利益把社员的个人利益压抑下去了。很明显，这是公社的最大弱点。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公社没有得到广泛发展，而只有几个或几十个。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公社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而避免垮台，就不得不放弃生活公共化的办法，开始按劳动日计工，把谷物分给各户，允许社员私养家禽、小家畜、奶牛等等，但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公社实际上改为劳动组合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正常发展的利益要求这样做。

这当然不是说公社根本不需要了，它不再是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了。不，公社是需要的，它当然是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但不是目前的在技术不发达和产品不足的基础上产生并且自然改为劳动组合的公社，而是将来的在技术更发达和产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产生的公社。目前的农业公社是在技术不很发达和产品不足的基础上产生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它实行了平均主义，很少照顾到社员的个人生活利益，因此现在不得不改为把庄员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合理地结合起来的劳动组合。将来的公社是从发达的富裕的劳动组合中成长起来的。将来的农业公社是在劳动组合的田地上和养畜场中有了十分丰富的谷物、家畜、家禽、蔬菜和其他各种产品的时候，在劳动组合中附设有机械化洗衣坊、现代化厨房、食堂、面包厂等等的时候，在庄员看见从养畜场领取肉

类和乳类比自己饲养奶牛和小家畜便宜的时候，在女庄员看见在公共食堂吃饭、向面包厂取面包、在公共洗衣坊洗衣比自己料理这些事情方便的时候产生出来的。将来的公社是在更发达的技术和更发达的劳动组合的基础上，在产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什么时候才会这样呢？当然不是很快的。但是一定会这样。如果人为地加速劳动组合转变为将来的公社的过程，那就是犯罪。那就会打乱一切而帮助我们的敌人。劳动组合转变为将来的公社的过程应当随着**全体**庄员对这种转变的必要性的确信程度而逐步地进行。

关于劳动组合和公社的问题就是这样。

问题看来是很明白的，而且几乎是很浅显的。

可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糊涂观念。他们认为党既然宣布了劳动组合是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形式，那就是远离了社会主义，从公社即从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向低级形式后退了。试问，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在劳动组合里没有平等，因为在劳动组合里还保存着其成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上的差别，而在公社里却有平等，因为在公社里社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状况都是平均的。但是，第一，我国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在需要和个人生活方面都拉平，都实行平均主义的公社了。实践证明，如果公社不放弃平均主义，不在实际上改为劳动组合，那么它们就一定会灭亡。所以不必去援引世上已经不存在的东西。第二，任何一个列宁主义者，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都知道在需要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谬论，这种谬论适合于某种原始的禁欲主义教门，但是不适合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的需要和口味都一样，所有的人的个人生活方式都一样。最后，难道在工人中间不

是保存着需要和个人生活上的差别吗？这是不是说，工人比农业公社社员距离社会主义更远呢？

看来，这些人以为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不用说，这种设想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平等，并不是个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阶级的消灭。这就是说：(一)在推翻和剥夺资本家以后，一切劳动者都平等地摆脱剥削而得到解放；(二)在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以后，对于大家都平等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三)大家都有尽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劳取酬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社会)；(四)大家都有尽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各取所需的平等权利(**共产主义**社会)。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共产主义时期，各人的口味和需要在质量上或在数量上都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彼此一样，大家平等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

任何其他的平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承认过而且现在也不承认的。

如果由此做出结论，说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要求他们的口味和个人生活都是一律的，说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计划大家都应当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和同量的饭菜，那就是胡说八道，诬蔑马克思主义。

现在应当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平均主义的敌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痛斥了原始的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鼓吹"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① 而称它为反动的社会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1页。——编者注

主义。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严厉批判杜林提出来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那种“激进派的平均社会主义”。

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①

列宁也这样说：

“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教授们企图用平等这个概念来证明我们想使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们企图用他们捏造的这种无稽之谈来责备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由于自己无知，竟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消灭阶级，从这方面说，我们是主张平等的。但是硬说我们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谓的空谈和知识分子的愚蠢的捏造。”（**列宁**的演说《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293—294页）②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资产阶级作家们喜欢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描绘成过去沙皇时代的兵营，那里一切都服从平均主义“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对资产阶级作家们的无知和愚蠢负责的。

毫无疑问，个别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种糊涂观点和对农业公社的平均主义倾向的迷恋是同我们“左派”糊涂虫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一模一样的。“左派”糊涂虫有一个时候把农业公社理想化到这种地步，甚至企图在工厂里建立公社，在公社里，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各干各的工种，但是必须把工资交出来合在一起，然后再平均分配。大家知道，“左派”糊涂虫的这些平均主义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8页。——编者注

的儿戏使我们的工业受到了多大的损害。

由此可见，已被击溃的反党集团的思想体系残余还有相当大的生命力。

很明显，如果这些"左派的"观点在党内获得了胜利，党就会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的党，而集体农庄运动就会完全瓦解。

又如拿"**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这一口号来说吧。这个口号不仅和庄员有关。它更和工人有关，因为我们要使全体工人成为生活富裕的人，成为过富裕的和十分文明的生活的人。

看来问题是很明白的。如果我们不是要使我国人民过美满生活，那就用不着在 1917 年 10 月推翻资本主义，进行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

可是，这个很明白而且实在很浅显的口号在一部分党员中间竟引起了许多疑虑、糊涂观念和混乱思想。他们说，这个口号不是回到"发财吧"那个被党屏弃的旧口号去了吗？他们还说，如果大家都成了生活富裕的人，而穷人再也没有了，那么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工作中究竟依靠谁呢？没有穷人我们究竟将怎样工作呢？

也许这是很可笑的，但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存在着这种幼稚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这却是无疑的不可忽视的事实。

看来，这些人不了解"发财吧"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这两个口号之间隔着一道鸿沟。第一，能够发财的只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生活富裕的口号关系到的不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是**全体**集体农庄庄员。第二，**个别**人或**个别**集团发财是为了支配其余的人和剥削他们，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在集体农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条件下过富裕生活的口号**排除了**一些人剥

削另一些人的任何可能性。第三，“发财吧”的口号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当资本主义部分地恢复起来的时候，当富农还有力量、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集体农庄经济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提出的，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后阶段，当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已被消灭、农村中的富农已被击溃、个体农民经济已被排挤到次要地位、集体农庄已变为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的时候提出的。更不用说，“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不是孤立地提出的，而是和“使集体农庄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的口号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提出的。

“发财吧”的口号实质上是号召**恢复**资本主义，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却是号召用加强集体农庄经济实力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变为生活富裕的劳动者的办法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这不是很明显吗？（喊声：“对！”）

这两个口号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这不是很明显吗？（喊声：“对！”）

至于说没有穷人似乎就不能有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就不能有社会主义，那是一种甚至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蠢话。当有资本主义分子并且有受资本家剥削的穷人的时候，列宁主义者是依靠穷人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分子已被击溃，穷人已摆脱了剥削的时候，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不是要巩固和保存已经被消灭了存在前提的贫穷现象和穷人，而是要消灭贫穷现象并把穷人提高到过富裕生活的水平。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在缩减个人需要和把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穷人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那就愚蠢了。何况穷人自己也不愿意再做穷人，而是力求往高处走，过富裕生活的。谁需要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呢？这并不是什么社会

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产品和商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在劳动者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在文化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建成。因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缩减个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扩大和发展个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绝满足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

毫无疑问，个别党员对贫穷和富裕的这种糊涂观点是我们"左派"糊涂虫观点的反映。"左派"糊涂虫把穷人理想化了，他们以为在任何条件下穷人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永久支柱，而把集体农庄看做残酷的阶级斗争的舞台。

由此可见，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上，已被击溃的反党集团的思想体系残余还没有丧失自己的生命力。

很明显，如果这一类糊涂观点在我们党内获得了胜利，集体农庄就不会有它们在最近两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它们就会在最短期间瓦解。

再如拿**民族问题**来说吧。在这里，在民族问题方面，也和在其他问题方面一样，有一部分党员持有一种危害颇大的糊涂观点。我说过资本主义残余有生命力。应当指出，在民族问题方面，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更有生命力。所以更有生命力，是因为它们有可能用民族外衣很好地伪装起来。很多人认为斯克雷普尼克的堕落变节是个别的例外事件。这是不对的。乌克兰的斯克雷普尼克和他的集团的堕落变节并不是例外事件。在其他民族共和国里，个别同志也有这种错误。

民族主义倾向，不管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还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是什么意思呢？民族主义倾向就是使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政策迁就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民族主义倾向反映出

"自己的""民族的"资产阶级企图破坏苏维埃制度而恢复资本主义。可见这两种倾向的根源是共同的。这个根源就是**离开**列宁的国际主义。如果你们想打击这两种倾向，那就首先应当打击这个根源，打击那些离开国际主义的人，不管他们倾向于地方民族主义还是倾向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热烈鼓掌)

有人在争论：哪一种倾向是主要危险，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还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在目前条件下，这是一种表面的因而也是空泛的争论。如果想提出一种对任何时间和条件都适用的辨别主要危险和非主要危险的现成方法，那就愚蠢了。世上根本没有这种方法。主要危险就是人们停止和它作斗争因而让它发展到危害国家的那种倾向。(长时间鼓掌)

在乌克兰，乌克兰民族主义倾向在不久以前还不是主要危险，但是当人们停止和它作斗争而让它发展到和武装干涉者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倾向就成了主要危险。解决什么是民族问题方面的主要危险的问题不是靠空泛的表面的争论，而是靠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靠研究这方面所犯的错误。

关于一般政策方面的**右倾和"左"倾**也必须这样说。在这方面也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的个别党员有不少糊涂观点。他们在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时候往往丢开了"左"倾，减弱了反"左"倾的斗争，认为它不危险或者不很危险。这是一种严重而危险的错误。这是对"左"倾让步，党员是不容许这样做的。所以不容许这样做，尤其是因为最近"左派"已经完全滚到右派的立场上去了，实质上已经和右派毫无区别了。

我们一向都说，"左派"就是右派，不过用左的词句掩饰了右的实质。现在"左派"自己证实了我们的这个说法。就拿去年的托洛茨基派《公报》[68]来看吧。托洛茨基派先生们在公报里要求什么，写

些什么呢？他们"左的"纲领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要求：**解散国营农场**，因为国营农场不能赢利；**解散大部分集体农庄**，因为这些集体农庄有名无实；**放弃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恢复租让政策，把我国的许多工业企业租出去**，因为这些企业不能赢利。

这就是卑鄙的懦夫和投降主义者的纲领，这就是要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

这个纲领和极右派的纲领有什么区别呢？显然毫无区别。由此可见，"左派"为了和右派结成联盟进行共同的反党斗争，公开地附和了右派的反革命纲领。

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左派"不危险或者不很危险呢？说这种蠢话的人是在为列宁主义的死敌张目，这不是很明显吗？

由此可见，在这里，在离开党的路线的各种倾向方面，不管是一般政策上的倾向还是民族问题上的倾向，人们意识中和我们的个别党员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也是有充分的生命力的。

这就是我们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几个严重而迫切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一部分党员有模糊观点、糊涂观念，甚至有完全离开列宁主义的倾向。要知道，可以拿来证明个别党员有糊涂观点的问题还不止这些。

既然如此，能不能说我们党内一切都很好呢？

显然不能。

我们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任务是：

（1）把党的理论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

（2）在党的一切环节中加强思想工作；

（3）在党的队伍中不倦地宣传列宁主义；

（4）以列宁的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党组织及其周围的非党积极分子；

(5)不要掩饰而要大胆地批评某些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

(6)不断地揭露放视列宁主义的派别的思想体系及其残余。

2.组织领导问题

我讲过了我们的成就，讲过了党的路线无论在国民经济和文化方面还是在克服党内各种反列宁主义集团方面所取得的胜利，也讲过了我们的胜利的世界历史意义。但这并不是说，在一切地方，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胜利，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的成就和胜利。我们还有不少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各种各样的缺点。在我们面前有一大堆需要解决的任务。但这无疑是说明大部分刻不容缓的当前任务已经胜利解决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党获得了极伟大的胜利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胜利是怎样造成的，它实际上是怎样获得的，经过什么斗争，经过哪些努力？

有些人以为只要制定正确的党的路线，把它公布出来，把它制成一般的提纲和决议并一致通过，胜利就会自行到来，即所谓自流地到来。这当然是不对的。这是很大的错误。只有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才会这样想。事实上这些成就和胜利不是自流地取得的，而是在争取执行党的路线的残酷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任何时候都不会自行到来，它通常是由人们争取来的。有了贯彻党的总路线的好决议和好宣言，这只是事情的开始，因为它们只表示争取胜利的愿望，而不是胜利本身。在正确的路线提出以后，在对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后，事情的成功就取决于组织工作，取决于组织实现党的路线的斗争，取决于正确地挑选人才，取决于检查领导机关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否则，党的正确路线和

正确决议就会有遭到严重破坏的危险。不仅如此，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

事实上，胜利是通过不断和执行党的路线的道路上的各种困难进行残酷的斗争，通过克服这些困难，通过动员全党和工人阶级去克服困难，通过组织克服困难的斗争，通过撤换不中用的工作人员，挑选能够和困难作斗争的优秀工作人员而达到和取得的。

这是些什么困难，它们隐藏在什么地方呢？

这些困难是我们组织工作的困难，是我们组织领导的困难。这些困难隐藏在我们自己身上，隐藏在我们的领导工作人员身上，隐藏在我们的组织里面，隐藏在我们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和其他一切组织的机关里面。

应当了解，我们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和其他一切组织及其领导者的力量和威信增长到了空前的程度。正因为他们的力量和威信增长到了空前的程度，所以现在一切事情或者几乎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他们的工作。借口所谓客观条件是没有理由的。既然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已经为多年的经验所证实，而工人和农民拥护这条路线的决心又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所谓客观条件的作用就缩小到最低限度，而我们的组织及其领导者的作用就成为决定性的独一无二的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今后我们工作中产生缺陷和缺点的责任十分之九不在“客观”条件，而在我们自己身上，并且仅仅在我们身上。

我们的党有两百多万党员和候补党员。我们的共青团有四百多万团员和候补团员。我们有三百万以上的工农通讯员。我们的国防航空化学建设促进协会有一千二百多万会员。工会有一千七百万以上的会员。我们获得成就应该归功于这些组织。如果尽管

有这些有助于获得成就的组织和可能性，而我们在工作中还是有不少缺点，还是有不少缺陷，那就只能归咎于我们自己，归咎于我们的组织工作，归咎于我们的组织领导不好。

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一般领导”的空谈代替了实际的具体领导，各组织实行职能管理制[69]而缺乏个人负责制，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现象和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对执行情况缺乏经常的检查，害怕自我批评，——这就是我们的困难的根源，这就是目前我们的困难藏身的地方。

如果以为用决议和决定就能克服这些困难，那就太天真了。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早就善于在口头上表示忠实于党和政府的决议，而在实际上把这些决议束之高阁。要战胜这些困难，必须消除我们的组织工作落后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的现象，必须把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组织领导的水平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必须做到使我们的组织工作能够保证党的政治口号和决议的切实执行。

要战胜这些困难并获得成就，必须**组织**克服这些困难的斗争，必须吸引工农群众参加这个斗争，必须动员党本身，必须清除党和经济组织中的不可靠的、不坚定的和蜕化的分子。

为此需要做些什么呢？

为此需要组织下列工作：

（1）开展自我批评，揭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2）动员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去和困难作斗争；

（3）动员工农群众为实现党和政府的口号和决议而斗争；

（4）在劳动者中间开展竞赛和突击运动；

（5）广泛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政治部，使党和苏

维埃的领导接近农村；

（6）缩小人民委员部、总管理局和托拉斯的规模，使经济领导接近企业；

（7）消除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现象，消灭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

（8）取消“职能管理制”，加强个人负责制，采取废除委员会制的方针；

（9）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采取改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方针以进一步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

（10）把熟练的工作人员从办公室调到更接近生产的地方；

（11）揭发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把他们从管理机关驱逐出去；

（12）把违反党和政府的决议的人、欺上瞒下的人、爱说废话的人撤职，而另外提拔新人，即提拔能保证具体领导所担负的工作并能保证加强党和苏维埃纪律的认真办事的人；

（13）清洗苏维埃组织和经济组织，精简人员；

（14）最后，把不可靠的和蜕化的人清洗出党。

党为克服困难，为把我们组织工作的水平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以保证党的路线的实现而必须采取的办法，基本上就是这些。

你们知道，我们党中央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正是这样进行组织工作的。

中央在这里所遵循的是列宁的英明思想：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挑选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

关于挑选人才和撤换那些不称职的人，我想说几句话。

除了我们一致认为必须撤职的那些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以外，还有两种工作人员阻挠着我们的工作，妨碍

着我们的工作，不让我们前进。

一种工作人员是那些过去有过一些功劳而现在已经成为要人的人，他们认为党的纪律和苏维埃的法律不是为他们而是为傻瓜制定的。这些人并不认为执行党和政府的决议是自己的义务，因而破坏党和国家纪律的基础。他们违反党的纪律和苏维埃的法律是指靠什么呢？他们指靠苏维埃政权会因为他们过去有功而不去触犯他们。这些妄自尊大的要人认为他们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可以违反领导机关的决议而不受惩罚。对这种工作人员该怎么办呢？必须毫不犹豫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不管他们过去有过什么功劳。(喊声："对！")必须把他们降职并把这件事在报纸上公布。(喊声："对！")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打掉这些妄自尊大的官僚主义要人的傲慢习气，叫他们安分一些。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在我们整个工作中加强党和苏维埃的纪律。(喊声："对！"鼓掌)

现在来谈第二种工作人员。我指的是那种爱说废话的人，可以说是一些爱说废话的老实人，(笑声)是一些忠诚于苏维埃政权但是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没有能力做组织工作的老实人。去年我曾经和这样一个同志谈过话，这个同志很受人尊敬，但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爱说废话的人，能够把任何一件活生生的事情淹没在废话中。下面就是这一次的谈话。

我问：你们的播种工作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你问播种工作吗？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笑声)

我问：那么结果怎样呢？

他答：我们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笑声)

我问：那么以后又怎样呢？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有了转变，马上就会有转变。（笑声）

我问：究竟怎样了？

他答：我们那里有了一些进展。（笑声）

我问：可是你们的播种工作究竟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播种工作暂时还毫无头绪。（全场哈哈大笑）

这就是爱说废话的人的面目。他们动员起来了，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他们既有转变，又有进展，可是工作却没有动起来。

这和不久以前一位乌克兰工人所描述的某一组织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有人问他这个组织有没有路线时，他回答说："路线吗……路线当然是有的，只是工作看不见。"（全场大笑）看来这个组织也有爱说废话的老实人。

当我们把这些爱说废话的人撤职，把他们远远地调离实际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摊开双手困惑不解地问道："究竟为什么要把我们撤职？难道我们没有把一切必要的事情都做了吗？难道我们没有召集突击队员大会吗？难道我们没有在突击队员会议上宣布党和政府的口号吗？难道我们没有把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选为名誉主席团吗？（全场大笑）难道我们没有给斯大林同志拍致敬电吗？——你们究竟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呢？"（全场哈哈大笑）

对这些不可救药的爱说废话的人该怎么办呢？要知道，如果仍然让他们担任实际工作，他们就会把任何一件活生生的事情淹没在滔滔不绝的废话中。显然，必须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派他们去做别的非实际的工作。实际工作中是不容许有爱说废话的人的。（喊声："对！"鼓掌）

关于中央如何指导了苏维埃组织和经济组织中挑选人才的工

作，如何设法加强了对执行情况的检查，我已经简略地报告过了。在进行代表大会第三项议程的时候，卡冈诺维奇同志会更详细地向你们报告。

关于今后如何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我想说几句话。

正确地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在反对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斗争中有决定的意义。领导机关的决议是在执行呢，还是被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束之高阁了？这些决议是在正确地执行呢，还是被歪曲了？机关是在诚实地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进行工作呢，还是在空忙？——这一切只有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才能及时地知道。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这是随时帮助查明机关的工作状况并揭发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的探照灯。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缺点和缺陷十分之九是由于没有对执行情况正确地组织检查而产生的。毫无疑问，如果对执行情况有这样的检查，缺点和缺陷是一定能够防止的。

但是，对执行情况的检查要达到目的，至少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对执行情况的检查必须是经常的，而不是时断时续的；第二，在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各个环节中领导对执行情况的检查的必须不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而是一些有充分威信的人，即各组织的领导者自己。

正确地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对于各中央领导机关有极大的意义。工农检查院按其组织来说，不能够满足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的要求。几年以前，当我们的经济工作还比较简单，还不大令人满意，还可以指望有可能检查各人民委员部和各经济组织的工作的时候，工农检查院是胜任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经济工作已经扩大并更加复杂了，已经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可能由一个中央机关来检查经济工作了，因此，工农检查院应当改组。现在我们

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检查，而是对中央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检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对中央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监督。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不以检查所有一切为目的，而能集中全力搞好监督工作，集中全力检查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组织。只有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才能成为这样的组织。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按照人民委员会的指示进行工作，在各地有不属地方机关领导的代表。为了使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有充分的威信，使它能够在必要时处分任何负责工作人员，必须使它的人选由党的代表大会提名，经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我认为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加强苏维埃监督工作和苏维埃纪律。

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大家知道，它首先而且主要是为防止党内分裂而成立的。你们知道，有一个时候我们党内确实存在过分裂的危险。你们知道，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所属各组织防止了分裂的危险。但是现在我们不再有分裂的危险了。现在我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集中全力检查党和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组织。只有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才能成为这样的组织。党的监察委员会按照党和党中央的指示进行工作，在各地有不属地方组织领导的代表。很明显，这样一个负责的组织应当有很高的威信。为了使这个委员会有充分的威信，使它能够处分任何一个犯错误的负责工作人员，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必须使它的委员只有党的最高机关即党的代表大会才能选举和撤换。毫无疑问，这样的组织完全能够保证对党中央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监督并加强党的纪律。

关于组织领导的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的任务是：

(1)今后也要使我们的组织工作适应于党的政治路线的

要求；

（2）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

（3）使组织领导能够完全保证党的政治口号和决议的实现。

载于1934年1月28日
《真理报》第27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3卷
第307—331页

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1934年7月23日）

威尔斯：斯大林先生，承蒙接见，不胜感谢。不久以前我去过美国，和罗斯福总统作了一次长谈，我想弄明白什么是他的领导思想。现在我来拜访你，是想详细地问一问：你在做些什么事情来改变世界……

斯大林：做得还很不够……

威尔斯：我有时候游历全世界，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观察在我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斯大林：象你这样的大活动家，并不是"普通人"。当然，只有历史才能表明一个大活动家的重要性，但是无论如何，你并不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观察世界的。

威尔斯：我不是故意谦逊。我是指我竭力用普通人的眼光，而不是用有党派的政治家或十分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的眼光来看世界。这次美国之行，给了我极强烈的印象。旧的金融界在崩溃，全国的经济生活以新的方式在改造。列宁当年曾经说过，要"学习做生意"，要向资本家学习这一点。现在资本家应当向你们学习，以便领会社会主义精神。我以为，在美国，问题是在于进行深刻的改造，是在于建立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你和罗斯福是从两个不同的起点出发的。但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有没有思想上的联系、思想上的血缘关系呢？例如，我在华盛顿就曾经看到了

这里所进行的事情：扩大管理机关，建立许多新的国家调节机关，组织无所不包的社会服务部门。象贵国一样，那里也是领导本领不够。

斯大林：美国的目的和我们苏联的目的不同。美国人所追求的目的，是从经济紊乱、经济危机的基地上产生的。美国人希望不改变经济基础，而在私人资本主义活动的基础上摆脱危机。他们力求把现存的经济制度所招致的破坏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我们国家里，你知道，旧的经济基础已被破坏，建立起了完全不同的新的经济基础。即使你所说的那些美国人能够部分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把这种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能消灭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无政府状态的根源。他们还保存着这种一定要导致而且不能不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制度。因此，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谈不到改造社会，谈不到消灭这种产生无政府状态和危机的旧的社会制度，而只是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这些美国人主观上也许认为他们是在改造社会，但是客观上在他们那里还保留着现今的社会基础。所以，客观上是不可能对社会进行任何改造的。

计划经济也是不可能有的。什么是计划经济呢，它有一些什么特征呢？计划经济力求消灭失业现象。我们假定，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可以做到把失业现象减少到某种最低限度。但是不论哪一个资本家，从来不会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完全消灭失业现象，消灭失业后备军，因为失业后备军的使命，就是压制劳动市场，保证工资比较低廉的劳动力。你看，这已经是资产阶级社会“计划经济”中的一个破绽。其次，计划经济要求加强产品为人民群众所特别需要的那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可是你知道，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扩大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动机来进行的，哪一个经济部门的利润率比较高，资本就流向哪一个经济部门。你永远不能迫使资本家自己受损失，同意较低的利润率，以便满足人民的需要。如果不摆脱资本家，如果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原则，那么你就不能建立计划经济。

威尔斯：你的话有好多我是同意的。但是我想着重指出，如果整个国家接受计划经济原则，如果政府逐渐地、一步步地开始彻底实行这个原则，那么最终金融寡头就会消灭，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就会建立起来。罗斯福的"新政"口号具有巨大的效果，而且据我看来，那是社会主义的口号。我觉得不要强调两个世界的对抗，要在当前环境下力求确立一切建设性力量间的共同语言。

斯大林：当我说在保存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下不可能实现计划经济原则时，我丝毫不想以此贬低罗斯福的卓越的个人品质——他的主动、勇敢和坚决。毫无疑问，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脑中间，罗斯福是一个最有才能的人物。所以，我想再一次着重地说，我相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但这个信念绝不意味着怀疑罗斯福总统个人的能力、才干和勇敢精神。但是一个最有才干的统帅，如果环境对他不利，他就不能达到你所说的那种目的。当然，在理论上并不排斥这样一点，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逐渐地、一步步地走向你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解释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个目的。但这种"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意味着稍微抑制一下个别最不受抑制的资本主义利润的代表者，稍微加强一下国民经济的调节原则。所有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只要罗斯福或现代资产阶级世界的任何其他首脑，采取任何认真的办法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那么他就

不可避免地要完全失败。要知道银行不在罗斯福手中，工业不在他手中，大企业、大农场不在他手中。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私有财产。无论是铁路也好，商船也好，都掌握在私有主手中。最后，熟练劳动者大军、工程师和技师，他们也都不在罗斯福手中，而是在私有主手中，他们都是为私有主工作。不可忘记国家在资产阶级世界中的职能。这是一个组织国防、维持"秩序"的机关，征收捐税的机构。真正的经济是很少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系的，它并不在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相反地，国家是掌握在资本主义经济手中。因此，不管罗斯福有多大的精力和能力，我担心他不会达到你所说的目的，要是他真有这个目的的话。也许，经过几代以后，可以稍微接近于这个目的，但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很少有可能的。

威尔斯：也许我比你更相信从经济上说明政治。由于各种发明和现代科学，强大的力量得到了利用，这些力量导致把人类集体更好地组织起来，使它更好地发挥作用，即导致社会主义。不管社会理论如何，把个人行动加以组织和调整，已成为客观的必然。如果从国家监督银行开始，进而监督运输业，监督重工业，监督一般工业，监督商业等等，那么这种无所不包的监督就等于把国民经济一切部门国有化了。这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要知道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并不是象黑与白那样水火不相容。它们之间有着许多中间阶段。有与土匪行为相近的个人主义，也有与社会主义意义相同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实现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经济组织者、熟练的技术知识分子，而这种知识分子是可以一步步地争取到社会主义组织原则方面来的。这是最主要的。因为首先是组织，然后才是社会主义。组织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组织，社会主义思想也就只是一种思想罢了。

斯大林：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没有而

且也不应当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应当有这种对立，是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此外，社会主义社会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唯一可靠的保证。在这个意义下，“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但是难道能否认阶级之间的对立，有产者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吗？一方面是有产者阶级，他们掌握着银行、工厂、矿山、运输业、殖民地种植园。这些人除了自己的利益、自己追求利润的欲望以外，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他们不服从集体的意志，他们力求使任何集体部服从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是穷人阶级、被剥削者阶级，他们没有工厂，没有银行，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他们被剥夺了满足自己最起码的需要的可能性。这些互相对立的利益和欲望，怎么能调和起来呢？据我所知，罗斯福并没有找到调和这些利益的途径。经验告诉我们，这也是不可能的。你对于美国的情况要比我知道得清楚些，因为我没有去过美国，主要是根据书报来观察美国情形。但是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方面，我却有一点经验，这种经验告诉我，如果罗斯福真的企图牺牲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来满足无产者阶级的利益，那么资本家就会拿别的总统来代替他。资本家们会说，总统可以上台下台，我们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如果某一总统不能保卫我们的利益，我们就另找一个。总统能拿什么来反抗资本家阶级的意志呢？

威尔斯：我反对这样简单化地把人类分为穷人和富人。当然，有专以发财为目的的一类人。但是这些人，难道不也象在这里一样被认为是障碍物吗？有一些人不是以发财为目的，他们有一定数量的钱，希望投资，由此获得利润，但是根本不认为这是自己

活动的目的，这种人难道在西方很少吗？这些人把投资看作一种很勉强的必要。有一些有才干的和忠心耿耿的工程师、经济组织者，他们的活动不是受发财而完全是受其他刺激推动的，这种工程师、经济组织者难道很少吗？据我看来，有一个为数众多的实在是能干的人们组成的阶级，他们意识到现存制度的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的使命是在将来社会主义社会里起巨大的作用。近几年来，关于必须在广大的工程师、飞行员中间和军事技术界等等宣传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想，我已做了许多，想了许多。对这些人作直截了当的阶级斗争宣传，是没有用的。这些人懂得这个变为血泊的世界是处在怎样的状态中，但是他们认为你们搞阶级斗争的那种粗陋的对立是毫无意义的。

斯大林：你反对简单化地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当然，有中间阶层，也有你所说的技术知识分子，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有很诚实的好人。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也有不诚实的坏人。什么人都有。但是人类社会首先是分为富人和穷人、有产者和被剥削者，撇开这个基本划分，撇开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就是撇开基本事实。我不否认中间阶层的存在，这些中间阶层不是站在这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中的一个阶级方面，便是在这一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或半中立的立场。但是，我重说一遍，撇开社会的这一基本划分和两个基本阶级间的这一基本斗争，就是忽视事实。这一斗争正在进行，而且还要进行下去。这一斗争的结果，是由无产者阶级、劳动者阶级来决定的。

威尔斯：但是劳动的、劳动效率很高的、可是并不穷的人难道很少吗？

斯大林：当然也有小土地占有者、手工业者、小商人，但决定各国命运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生产社会一切必需品的劳动群众。

威尔斯：但是要知道有各种各样的资本家。有只想牟利、只想发财的资本家，也有甘愿牺牲的资本家。例如，老摩根，他就是只想发财，他简直是社会的寄生虫，他只是把财富聚积在自己手中。可是我们看一下洛克菲勒，他是出色的组织者，他是组织石油销售的模范，值得仿效的榜样。或者看一下福特。当然，福特是很狡猾的，自私自利的，但他不是你们正要学习的合理化生产的热情的组织者吗？我要着重指出，最近在盖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对于苏联的社会舆论已经有了重大的转变。其原因首先就是日本的态度和德国的事件。但也有不单是从国际政治产生的其他一些原因。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广大的各界人民认识了以私人营利为基础的制度正在瓦解。在这些条件下，我以为不应该过于强调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抗，而应该竭力把一切建设性运动、一切建设性力量尽可能地结合起来。我觉得我比你更左些，斯大林先生，我认为世界离开旧制度死亡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斯大林：当我说到只想牟利、只想发财的资本家时，我根本不打算以此来说明，他们都是一无所能的最不中用的人。他们中间有好多人无疑是具有很大的组织能力的，这一点我绝不想否认。我们苏联人向资本家学习很多东西。就说这个被你说得那么糟糕的摩根，无疑也是优秀的能干的组织者。但是，如果说到立志改造世界的人们，那么，在那些一心一意专事营利的人中间，当然是找不到这种人的。我们和那些专事营利的人站在对立的两极上。你说到福特。当然，他是能干的生产组织者。可是难道你不知道他是怎样对待工人阶级的吗？难道你不知道他毫无道理地把多少工人抛到街头吗？资本家是和利润血肉相连的，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和利润分开。资本主义将被工人阶级所消灭，而不是被生产"组织者"、不是被技术知识分子所消灭，因为这一阶层不能起独立的

作用。要知道，工程师、生产组织者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而是按照别人的命令、按照主人的利益所要求的去做工作的。当然也有例外，这个阶层中间也有摆脱了资本主义欺骗的人。技术知识分子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创造“奇迹”，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利益。但是他们也能带来巨大的害处。我们苏联人对于技术知识分子有不少切身的经验。十月革命以后，一部分技术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新社会的建设，抗拒这一建设，实行怠工。我们曾经多方努力把技术知识分子吸引到这一建设中来，对他们用了各种办法。经过不少的时间，我们的技术知识分子才走上了积极帮助新制度的道路。今天，他们当中优秀的一部分已站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最前列了。我们有了这一经验，就决不低估技术知识分子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我们知道，他们既能造成危害，又能创造“奇迹”。当然，如果经过一次突击就能使技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脱离资本主义世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这是空想。难道能够从技术知识分子中找到很多决心跟资产阶级世界决裂而献身于社会改造的人吗？据你看来，比方在英国和法国，这种人是很多的吗？不，愿意同自己的主人决裂而去改造世界的人是很少的呀！

此外，要改造世界，就应该有**政权**，这一点难道可以忽视吗？威尔斯先生，我觉得你非常低估政权问题，你根本没有想到它。要知道即使有美好愿望的人，如果不能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和没有掌握政权，他们能做出什么来呢？最多他们只能协助夺取政权的新阶级，而他们自己是不能把世界翻转过来的。为此，就必须有一个巨大的阶级，这个阶级可以代替资本家阶级，成为象资本家阶级那样握有充分权力的主人。这样的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当然，应该接受技术知识分子的帮助，而反过来又应该给技术知识分子以帮助。但是不应该认为技术知识分子能起独立的历史作用。改造世

界是一个巨大、复杂和痛苦的过程。要完成这个巨大的事业，必须有一个巨大的阶级。远航必须有大船。

威尔斯：是的，但要远航，就必须有船长和领航员。

斯大林：对的，但要远航，首先就必须有大船。要是没有船，那么领航员算什么呢？是一个没有事做的人。

威尔斯：大船就是人类，而并不是阶级。

斯大林：威尔斯先生，看来，你是从一切人都是好人这个前提出发的。可是我没有忘记，有很多的坏人。我不相信资产阶级的好心。

威尔斯：我回想起几十年以前技术知识分子的情形。那时候技术知识分子很少，但是事情很多，每个工程师、技师、知识分子都找得到应用自己知识的机会。因此，这是一个最不革命的阶级。今天技术知识分子太多，他们的情绪急剧地改变了。以前甚至听也不愿听革命言论的熟练知识分子，现在对革命言论感到兴趣了。不久以前我应邀参加了我们英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皇家学会的宴会。主席的演说赞成社会计划化和科学管理。三十来年以前，该学会甚至没有人会听我刚才说的话。而现在领导该学会的，是具有革命观点和主张科学地改造人类社会的人。你们宣传阶级斗争，是没有估计到这些事实的。情绪在改变。

斯大林：是的，我知道这一点，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在陷入了绝境。资本家正在找寻但又找不到一个摆脱绝境的出路，这个出路是要符合这个阶级的尊严、这个阶级的利益的。他们可以部分地爬出危机，但是他们是找不到可以使他们昂着头走出来而根本不损害资本主义利益的出路的。当然，广大的技术知识界都感到了这一点。他们很大的一部分开始觉悟到，他们跟那个能够指出摆脱绝境的出路的阶级有共同的利益。

威尔斯：斯大林先生，什么是革命，而且在实践上是怎样，你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是否群众自己会在某个时候举行起义呢？你是否认为一切革命都是少数人进行的这一事实是确定的真理呢？

斯大林：要革命就必须有领导革命的少数人，但是最有才能、最忠诚和最有干劲的少数人，如果不依靠千百万人的哪怕是消极的支持，他们也会束手无策。

威尔斯：哪怕是消极的支持吗？也许是下意识的支持吧？

斯大林：部分地也依靠半本能的支持，依靠半自觉的支持。但是没有千百万人的支持，最优秀的少数人也是无能为力的。

威尔斯：我观察了西方的共产主义宣传，我觉得这种宣传在现代条件下听起来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因为它宣传暴力行动。这种主张以暴力推翻社会制度的宣传，只有在某一暴政实行绝对统治的时代才是适当的。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统治的制度反正在毁坏，本来在解体，就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暴乱上，而应该放在效率上，放在本领上，放在生产率上。我觉得暴乱的调子已经陈腐了。在那些建设性地思考问题的人看来，西方的共产主义宣传是一种障碍。

斯大林：当然，旧制度是在毁坏，在解体。这是真的。然而人们正在作新的挣扎，正在用另一些方法、用所有的办法来捍卫、拯救这个正在灭亡的制度，这也是真的。你从正确的认识中作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你正确地认定旧世界是在毁坏。但是你认为它在自行崩溃，那就不对了。不，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这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过程，这是斗争，这是与阶级冲突相联系的过程。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跟一棵已经十分腐朽、自己一定会倒在地上

的树相比。不，革命，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痛苦的残酷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每当新世界的人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就应该保卫它，以防旧世界用暴力恢复旧制度，他们，新世界的人们总是应该保持戒备，准备回击旧世界对新制度的侵犯。

是的，你说旧社会制度在毁坏，这是对的，但是它不会自行崩溃。例如，就拿法西斯主义来说吧。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企图用暴力来维持旧世界的反动力量。你对法西斯分子将怎样办呢？劝告他们吗？说服他们吗？但要知道这对他们是不会有丝毫效力的。共产党人决不把暴力方法理想化。可是他们，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不能期待旧世界会自己离开舞台，他们看到旧制度是在用暴力保卫自己，因此共产党人向工人阶级说：准备以暴力回答暴力，尽力防止正在灭亡的旧制度击溃你们，别让旧制度给你们的双手戴上镣铐，你们是要用这双手去推翻这个旧制度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和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共产党人不能不估计到这些事实。

威尔斯：不过请你注意看一看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要知道这不简单地是制度的崩溃。这是那种蜕变为露骨暴徒行为的反动暴力的爆发。我觉得，在谈到跟这些反动的愚笨的暴徒冲突时，社会主义者应当诉诸法律，并且不要把警察看作敌人，而要支持警察跟反动分子作斗争。我觉得，不可简单地用旧的、呆板的、暴乱的社会主义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来行动。

斯大林：共产党人是从丰富的历史经验出发的，这个历史经验教导我们，已经衰亡的阶级不会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请你回忆一下十七世纪的英国历史。难道不是有很多人说过旧社会制

度已经腐朽了吗？然而难道不需要克伦威尔用暴力去粉碎旧制度吗？

威尔斯：克伦威尔是依靠宪法和以立宪制度的名义行动的。

斯大林：为了宪法他采用了暴力，处决了国王，解散了议会，逮捕了一些人，杀了另一些人！

再从我国历史中举个例子吧。难道在一个长时期中人们不是知道沙皇制度在腐朽，在崩溃吗？然而为了推翻它，不知流了多少血啊！

而十月革命呢？难道知道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才指出了唯一正确出路的人还少吗？难道人们不懂得俄国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吗？但是你知道，为了保卫十月革命不受国内外一切敌人的侵害，我们进行了多么大的抵抗，我们流了多少血啊！

或者再看一看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在1789年以前很久，许多人就已经知道，王权和农奴制度腐朽到了什么地步。但是没有人民起义，没有阶级冲突，你对它们就没有办法而且也不可能有办法。

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那些应当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总是直到最后才相信他们的作用已经完结。要他们确信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已经腐朽的旧制度建筑物上的裂口是可以填补的，正在毁坏的旧制度建筑物是可以修补和挽救的。因此，垂死的阶级拿起武器，开始用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使自己能够作为统治阶级生存下去。

威尔斯：但领导法国大革命的还有不少律师。

斯大林：难道你否认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吗？难道法国大革命是律师的革命，而不是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制度、保卫了第三等级的利益并取得了胜利的人民革命吗？难道

法国大革命领袖中间的律师们，是按照旧制度的法律行动吗？难道他们没有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法制吗？

丰富的历史经验教导我们，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阶级曾经自愿让路给另一个阶级。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这种先例的。共产党人掌握了这个历史经验。共产党人是会欢迎资产阶级自愿地退出舞台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共产党人愿意作坏的准备，号召工人阶级警觉起来，作战斗的准备。谁需要那种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决不会投降而应当加以击溃的统帅呢？作这样的统帅，就是欺骗和出卖工人阶级。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你觉得不合时宜的东西，事实上对工人阶级来说，正是一种革命的合适方法。

威尔斯：我绝不否认暴力的必要性，但是我认为斗争形式应当最大限度地接近于现存法律所给予的可能性，应当保卫这种可能性不受反动的侵犯。旧秩序之所以用不着加以瓦解，是因为它本身正在充分地瓦解着。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觉得反对秩序、反对法律的斗争，是一种陈旧的、不合时宜的东西。而我有意地要夸张一点，以便更清楚地显示真理。我可以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如下：第一，我拥护秩序；第二，既然现存制度不保证秩序，我就要抨击它；第三，我认为宣传阶级斗争思想，会把社会主义同恰好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受过教育的人们隔离开来。

斯大林：为了进行巨大的严重的社会事业，必须有一个主力、支柱、革命阶级。其次，必须把辅佐力量对这个主力的援助组织起来，这个辅佐力量在目前情况下就是知识分子的优秀力量也可以加入的政党。你刚才说到"受过教育的人们"。但你所指的是哪一种受过教育的人呢？不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在十月革命时代的俄国，难道站在旧秩序方面的受过教育的

人是很少的吗？有很多受过很高教育的人站在旧制度方面，替旧制度服务，他们维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要知道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取决于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个武器去打击谁。当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需要受过很高教育的人。很明显，蠢才是不能帮助无产阶级去争取社会主义，建立新社会的。我并不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反地，我却强调他们的作用。问题只在于，说的是哪一种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有各种各样的。

威尔斯：如果不根本改变国民教育制度，那就不可能有革命。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一个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例子，它不曾触动旧的教育制度，因而它从未成为共和国；另一个是英国工党的例子，它坚持根本改变国民教育制度的决心不够。

斯大林：这是正确的意见。

现在让我来回答你所提出的三点：

第一，对于革命来说，主要的就是要有社会支柱。这个革命支柱就是工人阶级。

第二，必须有辅佐的力量，共产党人把这种力量称作党。具有知识的工人以及技术知识分子中间跟工人阶级有密切联系的分子，都可以加入这个党。知识分子只有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是强有力的。如果他们反对工人阶级，那么他们就变成毫不足道的人了。

第三，必须有政权作为改革的杠杆。新政权建立新法制、新秩序，这种秩序就是革命秩序。

我不是拥护任何的秩序。我只拥护与工人阶级利益一致的秩序。如果旧制度的某些法律可以被利用来为争取新秩序而斗争，那就应当也利用旧法制。你说既然现存制度不保证人民所必需的秩序，就应该加以抨击；对你的这个意见，我是没有丝毫异议的。

最后，如果你认为共产党人醉心于暴力，那就不对了。如果统治阶级同意让位给工人阶级，那么共产党人是会乐意放弃暴力方法的。但是历史经验是否定这个假设的。

威尔斯：但是在英国历史上就有过一个阶级自愿把政权让给另一个阶级的例子。在1830年到1870年这个时期中，未经过任何残酷斗争便发生了贵族自愿把政权转交给资产阶级的过程，贵族的影响到十八世纪末还是很大的，而资产阶级则是君主制的多情的支柱。政权的这一转移，后来便导向金融寡头统治的确立。

斯大林：可是你不知不觉地从革命问题转到改良问题了。这不是同一个东西。你是否认为宪章运动[70]在十九世纪英国的改良事业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呢？

威尔斯：宪章派做的事情很少，而且已经消声匿迹了。

斯大林：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宪章派和他们所组织的罢工运动曾起了巨大作用，曾经迫使统治阶级在选举制度方面、在消灭所谓"衰败城镇"[71]和实行"宪章"某几条方面作了许多让步。宪章派曾经起了不小的历史作用，并且促使一部分统治阶级为了避免重大的震动而作了一些让步，实行了一些改良。一般地应该说，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英国的统治阶级，无论是贵族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从他们的阶级利益看来，从维持他们的政权看来，都是最聪明、最圆滑的。我们就从现代历史上举一个例子吧。比如1926年英国总罢工[72]。当时工联总理事会[73]号召罢工，任何资产阶级遇到这种事件，首先就会逮捕工联领袖。英国资产阶级没有这样做，从他们的利益看来，他们是做得很聪明的。不论在美国、德国、法国，我都不能想象资产阶级方面会有这样圆滑的阶级战略。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英国统治阶级从来不惜实行若干小的让步和改良。但是以为这些改良是革命，那就错了。

威尔斯：关于我国的统治阶级，你的评价比我的要高。但是一般讲来，小的革命和大的改良之间的区别是不是很大呢？改良不是小的革命吗？

斯大林：由于从下面来的压力、群众的压力，资产阶级有时候可以实行某些局部的改良，而依然保存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他们在这样行动时，认为这些让步是为保存自己的阶级统治所必需的。改良的实质就在这里。革命则表示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因此，任何改良都不能叫作革命。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期望社会制度的更替可以通过改良，通过统治阶级的让步，使一种制度悄悄地过渡到另一种制度来实现。

威尔斯：我很感谢你这次谈话，因为它对我有很大的意义。你在给我解释时，大概回忆起了你在革命前的地下小组里阐明社会主义原理的情形。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物，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每一句话是千百万人注意听的。这就是你和罗斯福。其他的人尽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不会有人登载，不会有人理会。我还不能评价贵国所进行的事情，因为我昨天才到这里。不过我已经看见了健康的人们的幸福面容，我知道你们正在进行一种非常重大的事业。跟1920年形成了惊人的对比。

斯大林：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更聪明些，那么我们做的事情也许还多些。

威尔斯：不，如果人们全都更聪明些。不妨想出一个改造人类头脑的五年计划，因为人类头脑显然还缺少为完善的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很多东西。（笑声）

斯大林：你是不是打算出席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呢？

威尔斯：可惜得很，我杂务在身，只能在苏联逗留一星期。我这次来是为了会晤你，我对我们的谈话深为满意。但是我打算跟

我能够会见的苏联作家谈谈他们能否参加笔会的问题。这是高尔斯华绥所创立的一个国际作家组织，在他逝世以后我就担任了主席。这个组织还是很薄弱的，可是它在很多国家里都有分会，因而(这是更重要的)该会会员的言论可以广泛地发表出来。这个组织坚持有自由发表一切意见的权利，连反对的意见也在内。我打算和马克西姆·高尔基谈一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这里是否允许有这样广泛的自由。

斯大林：我们布尔什维克把这一点叫作"自我批评"。它在苏联是广泛地运用的。

如果你有什么愿望的话，我是乐意帮助的。

威尔斯：谢谢。

斯大林：谢谢你和我的谈话。

克·乌曼斯基记录

载于《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
第599—613页

选自《斯大林文选》
第1—18页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935年5月4日）

同志们！不可否认，我们近来无论在建设方面或在管理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是在我们这里人们就过多地谈论起领导人的功绩，领袖们的功绩来了。人们把所有一切，几乎把我们所有的成绩都归功于他们。这当然是不对的，不正确的。问题不仅仅在于领袖。但是我今天想说的，不是这一点。我想就干部问题，就我们所有的干部，其中也包括我们红军的干部问题讲几句话。

大家知道，我们从旧时代所得到的遗产，是一个技术落后的、近于赤贫的和遭到破坏的国家。它遭到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又遭到三年国内战争的破坏。在这个国家里，居民很少识字，技术水平很低，工业好象零星的孤岛淹没在无数极小农户的汪洋大海中，——我们从旧时代继承下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当时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国家从中世纪和愚昧无知的轨道转到现代化工业和机械化农业的轨道上去。可见，任务是严重而困难的。当时，问题这样摆着：**或者是**我们在最短期间解决这个任务并在我国把社会主义巩固起来；**或者是**我们不能解决这个任务，那时我们这个技术薄弱和文化落后的国家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立，而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玩物。

我国当时处在技术极其缺乏的时期。没有足够的机器供应工

业。没有机器供应农业。没有机器供应运输业。没有国家工业改造所绝对必需的起码的技术基础，而只有一些创立这种基础的前提。当时必须创立头等的工业，必须使这个工业在技术上不仅能够改造工业，而且能够改造农业并改造我国的铁路运输业。为此必须作出牺牲，在各方面厉行节约，节约饮食，节约教育经费，节约布匹，以便积累建立工业所必需的资金。那时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克服十分缺乏技术的困难。列宁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我们在这一事业中也正是踏着列宁的足迹前进的。

当然，在这样巨大而困难的事业中，决不能期望获得接连不断的和迅速的成功。在这种事业中，只有经过几年以后，才会看到成就。因此必须用坚强的精神、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顽强的耐心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便克服最初的挫折，坚定不移地向着伟大的目标前进，不许在自己的队伍里有动摇和犹豫。

大家知道，我们正是这样进行这一事业的。可是，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具有足够的顽强精神、耐心和坚定性。当时在我们的同志中，有些人开头遇到一些困难，就叫人退却。常言道："既往不咎"。这固然是对的。但是，人既然有记性，因此在总结我们的工作时，就会在无意中想起过去的事情来。（全场活跃）我们当时确实有一些同志是害怕困难并叫党退却的。他们说："你们的工业化、集体化、机器、钢铁、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汽车，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倒不如多给一些布匹，多买一些生产日用品的原料，多给人们一些美化日常生活的零星物件更好些。要在我国落后的情形下建立工业，而且是头等的工业，这是危险的幻想。"

当然，我们当时也可以把我们厉行节约获得的、花在建立我国工业上的三十亿金卢布，拿去进口原料，增加日用品的生产。这也是一种"计划"。可是，如果我们采用了这种"计划"，我们就不会有

冶金业，就不会有机器制造业，就不会有拖拉机和汽车、飞机和坦克了。我们在外来敌人面前就会成为手无寸铁的人。我们就会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就会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的俘虏。

显然，当时必须在两个计划中间选择一个：一个是退却的计划，是要使社会主义遭受失败，而且不能不使社会主义遭受失败的计划；另一个是进攻的计划，是要使社会主义在我国获得胜利，而且你们知道，是已经使社会主义在我国获得了胜利的计划。

我们选择了进攻的计划，循着列宁的道路前进，而撇开了那些同志，因为他们只看到自己鼻子底下的一点东西，却根本不愿看见我国最近的将来，不愿看见我国社会主义的将来。

可是，这些同志并不始终只限于批评和消极抵抗。他们还以在党内举行暴动反对中央委员会来威胁我们。他们甚至曾用子弹威胁过我们中间的某些人。看来，他们指望吓倒我们，迫使我们离开列宁的道路。这些人显然忘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具有特殊气概的人。他们忘记了，布尔什维克不是用困难和威胁所能吓倒的。他们忘记了，把我们锻炼成钢的是在斗争中不知道和不承认恐惧为何物的伟大的列宁，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我们的父亲。他们忘记了，敌人愈是发疯，党内的反对者愈是歇斯底里地发狂，布尔什维克就愈加奋发地进行新的斗争，愈加急速地向前迈进。

当然，我们也根本没有打算过离开列宁的道路。而且，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站稳脚跟以后，扫除路上的种种障碍，更加急速地前进了。固然，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进时曾经不得不狠狠地打击了这些同志中间的某些人。可是这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应当承认，对于这件事我也是出了一臂之力的。（热烈鼓掌，高呼“乌拉”）

是的，同志们，我们是充满信心地、一往直前地沿着使我国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道路前进的。现在这条道路可以认为是已经走过

来了。

现在大家都承认，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大家都承认，我们已经拥有强大的头等的工业，强大的机械化的农业，日益发展的和蒸蒸日上的运输业，有组织的和装备精良的红军。

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度过了十分缺乏技术的时期。

可是，度过十分缺乏技术的时期以后，我们就进入了新的时期，进入了我认为是十分缺乏人才、缺乏干部和缺乏能够驾驭技术并推进技术的工作者的时期。问题在于我们有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运输业、军队，我们有技术来装备所有这一切部门，但是缺乏具有足够的必要的经验来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的人才。从前我们说："技术决定一切。"这个口号曾经帮助我们消灭了十分缺乏技术的现象，在一切工作部门里建立了极其广泛的技术基础，使我们能够用头等技术来武装我们的人才。这是很好的。但这还远远不够。为了把技术运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如果在我们的头等工厂里，在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在我们的运输部门里，在我们的红军里，有足够数量的能够驾驭这种技术的干部，那么我们国家所得到的效果，就会比现有的要多两三倍。正因为如此，现在应当特别注意人才，特别注意干部，特别注意掌握技术的工作者。正因为如此，"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反映了我们十分缺乏技术的过去的时期的口号，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了。这是现在的主要问题。

能说我们的人都已经充分了解到和认识到这个新口号的伟大

意义了吗？我看不能这样说。否则，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不会有人时常用一种岂有此理的态度去对待人才、对待干部、对待工作者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要求我们的领导人对我们的工作者，对无论在哪个部门中工作的“大”“小”工作者，采取最关切的态度，用心地培养他们，当他们需要支持时帮助他们，当他们做出初步成绩时鼓励他们，推动他们前进等等。而实际上我们却往往看到人们对工作者竟采取一种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态度和简直是岂有此理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所以往往不去考察人才，不是先考察后任用，而是往往象对待小卒子那样把他们摆来摆去。重视机器，报告我们工厂里有多少技术设备，这一点已经学会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人用同样的热情来报告说，我们在某个时期内培养了多少人才，我们怎样帮助这些人才在工作中成长起来和受到锻炼。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工作者，重视干部。

我回想起了我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碰见的一件事。这是在春季涨水时发生的。当时有三十个人到河里去捞取被波涛汹涌的大水冲下来的木料。当傍晚他们回到村里时，却少了一个同伴。当我问第三十个人在哪里时，他们冷淡地回答道：第三十个人“留在那里了”。我问：“怎么会留在那里呢？”他们又同样冷淡地回答道：“那还要问什么，当然是淹死了。”当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忙着要走，说是“要给母马饮水去”。我责备他们对人还不如对牲畜那样爱惜，他们中间便有一个人在其余的人的赞同下回答道：“干吗我们要爱惜人呢？人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做出来的。而母马呢……你试一试去做出一匹母马来看。”（全场活跃）你们看，这件事也许不大重要，但是很能说明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些领导人对人才、对干部采取的冷淡态度以及不会重视人才，就是上述这个在遥远的西伯

利亚发生的事情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对人的奇怪态度的残余。

所以，同志们，如果我们想要顺利地消灭十分缺乏人才的现象，使我国得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推进技术和运用技术的干部，我们首先就应当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干部，重视每一个有益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工作者。毕竟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让我举杯祝贺我们的红军学院毕业生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祝你们在组织和领导我国国防事业中获得成就！

同志们！你们已经在高等学校毕业了，你们在那里受到了初步的锻炼。但是，学校还只是一个预备阶段。干部的真正锻炼，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在学校以外，在同困难作斗争中，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得到的。同志们，要记住：只有那些不害怕困难，不躲避困难，反而前去迎接困难，以便克服和消灭困难的干部，才是好的干部。真正的干部，只有在同困难作斗争中才能锻炼出来。如果我们的军队拥有足够数量的真正受过锻炼的干部，那它就将是无敌的。

同志们，祝你们身体健康！（全场热烈鼓掌。全体起立，高呼“乌拉”向斯大林同志致敬。）

选自《列宁主义问题》
第578—583页

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74]上的讲话

（1935 年 11 月 17 日）

1.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

同志们！关于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这里，在这次会议上，已经说得很多，而且说得很好，因此我实在没有多少话可说了。可是，既然你们把我叫到讲台上来了，我总得说几句话。

不能把斯达汉诺夫运动看作是一个普通的男女工人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定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册最光荣的篇章之一的男女工人运动。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何在呢？

首先就在于它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的更高的阶段。为什么是新的阶段，为什么是更高的阶段呢？因为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一社会主义竞赛形式，比社会主义竞赛的旧阶段优越。在过去，在三年以前，在社会主义竞赛第一个阶段的时期内，社会主义竞赛并不一定要和新技术相联系。而且在当时，我们本来也就几乎没有什么新技术。相反，社会主义竞赛的现阶段，即斯达汉诺夫运动，却一定要和新技术相联系。没有新的更高的技术，就不会有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座的这些人，象斯达

汉诺夫、布瑟京、斯梅塔宁、克里沃诺斯、普罗宁、两位维诺格拉多娃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是新的人才，都是完全掌握了本行的技术，驾驭并推动着这种技术前进的男女工人。三年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或者是几乎没有这样的人才。这都是新的特殊的人才。

其次，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以打破当前的技术定额，打破现有的设计能力，打破现行的生产计划和平衡表为目的的男女工人运动。所以要打破这些定额，是因为它们对现在来说，对我们的新人才来说，已经是陈旧的了。这个运动打破了旧的技术观点，打破了旧的技术定额、旧的设计能力和旧的生产计划，而要求规定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设计能力和生产计划。它负有在我国工业中进行一场革命的使命。正因为如此，所以斯达汉诺夫运动其实是一次深刻的革命运动。

这里有人已经说过，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的表现，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达到，而资本主义不能达到的那种高度劳动生产率的典范。这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资本主义打破和战胜了封建制度呢？因为它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使社会有可能得到比在封建制度下多得多的产品。因为它使社会更加富足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应当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出更高的劳动典范，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给予社会更多的产品，使社会更加富足起来。

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可以在贫苦生活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各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方法巩固起来。这是不对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念。其实，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产

品和各种消费品丰裕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但是，为了使社会主义达到这个目的，并把我们苏联社会变成最富裕的社会，就必须使我国有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否则，就绝对不会有丰裕的产品和各种消费品。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

但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还不止这一点。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

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按他的能力进行工作，但不是按他的需要、而是按他为社会所做的工作取得消费品。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不很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依然存在，劳动生产率还没有达到能保证消费品丰裕的高度，所以社会只得不按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而按他们为社会所做的工作来分配消费品。

共产主义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按他的能力进行工作，但不是按他所做的工作、而是按一个有高度文化的人的需要取得消费品。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足以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基础的高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而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可以保证消费品十分丰裕的高度，所以社会就有可能按各个成员的需要来分配这些消费品了。

有些人以为，可以在工程师和技师即脑力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降低到中等熟练工人水平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的方法来做到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

动的对立。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才这样来想象共产主义。其实，只有在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水平的基础上，才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如果以为没有提高到这种水平的可能，那就可笑了。这在苏维埃制度下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因为在这里，全国的生产力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束缚，劳动摆脱了剥削制度的压迫，工人阶级掌握着政权，工人阶级的青年一代有受到完备的技术教育的一切机会。毫无疑问，只有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提到这样的高度，才能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基础；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为了开始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必需的高度劳动生产率和丰裕的消费品。

因而，从这方面看来，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正是包含着我国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到这样的高度的萌芽，虽然还是幼弱的萌芽，但毕竟是萌芽。

真的，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同志吧。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大都是年轻的或中年的男女工人，是有文化素养、有技术素养的人才，他们作出了工作严格认真的榜样，善于在工作中珍惜时间的因素，学会了不仅用分而且用秒来计算时间。在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学过所谓基本技术知识，而且还在继续充实自己的技术知识。他们没有某些工程师、技师和经济工作人员的那种保守主义和思想僵化；他们勇敢地前进，打破旧的技术定额，创造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他们对我国工业领导者制定的设计能力和经济计划提出修改，他们往往补充和修正工程师和技师的意见，他们时常教导工程师和技师，并推动工程师和技师前进，因为他们是完全掌握了本行技术并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的人才。今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还不很多，可是明天他们会增加十倍，——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我国工业的

革新家，斯达汉诺夫运动代表着我国工业的未来，它包含着工人阶级未来文化技术高涨的种子，它为我们开辟了达到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所必需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这一切难道不是都很明白吗？

同志们，这就是斯达汉诺夫运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意义。

当斯达汉诺夫和布瑟京着手打破旧的技术定额时，他们是不是想到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这种伟大意义呢？当然没有。他们当时所关心的，是力求使企业消除完不成计划的现象并超额完成经济计划。但他们在力求达到这一目的时，必须打破旧的技术定额，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程度。然而，如果以为这个情况会多多少少降低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那就可笑了。

关于1905年第一次在我国组织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那些工人，也可以这样说。他们当然没有想到工人代表苏维埃会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他们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只是为了防御沙皇政府的进攻，防御资产阶级的进攻。但是，这个情况丝毫也不与下述这件毫无疑义的事实相矛盾，即列宁格勒工人和莫斯科工人在1905年开始的争取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运动，归根到底导致了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资本主义的毁灭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2.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

现在我们站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摇篮边，站在这个运动的泉

源旁。

应当指出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某些特点。

首先令人注意的事实，就是这个运动是自行开始的，几乎是自发地开始的，由下面开始的，并没有受到我们各企业行政方面的任何推动。不仅如此，这个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违反我们各企业行政的意志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和他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开展起来的。莫洛托夫同志已经向你们说过，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锯木工人穆辛斯基同志不知受了多少罪，他背着经济组织，背着检验员，暗中作出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斯达汉诺夫本人的遭遇也并不见得好些，因为在他前进时不仅须要防御某些行政人员，而且须要防御某些因他“标新立异”而讥笑和诽谤他的工人。至于布瑟京，那么大家知道，他由于自己的“标新立异”，几乎失去了工厂里的工作，幸亏车间主任索科林斯基同志出来干涉，这才把他留在厂里了。

由此可见，如果要说我们各企业行政上对斯达汉诺夫运动起过什么作用，那么这种作用不是为了帮助它，而是为了阻碍它。所以，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从下面产生和开展起来的运动。正因为它是自行产生的，正因为它是来自下面的，所以它是现代最富有生命力的和不可遏止的运动。

其次，还应当讲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在于斯达汉诺夫运动不是逐渐地，而是象飓风那样空前迅速地传播到我们苏联全国各地的。事情是怎样开始的呢？斯达汉诺夫把采煤的技术定额提高了四五倍，甚至更多。布瑟京和斯梅塔宁也做到了这一点，——一个是在机器制造业方面，而另一人是在制鞋工业方面。报纸报道了这些事实。于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火焰就立刻燃遍了全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斯达汉诺夫

运动传播得这样快呢？也许是因为斯达汉诺夫和布瑟京是两个大组织家，在苏联各州各区有很多关系，而且亲自组织了这件事情吧？不是，当然不是！也许是因为斯达汉诺夫和布瑟京居心要成为我国伟人，而亲自把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火星散布到全国各地去的吧？同样不是。你们在这里已经看见了斯达汉诺夫和布瑟京。他们在会上发了言。他们是谦虚朴实的人，没有任何想作全苏伟人的野心。我甚至觉得，他们看到这个运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地在我国发展成这样的规模，还有些困惑。虽然这样，斯达汉诺夫和布瑟京两人点燃的火星，也已经足以使这件事情发展成了熊熊火焰，那就是说，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一件完全成熟了的事情。只有完全成熟的、有一触即发之势的运动，才能这样快地传播，才会象雪球那样愈滚愈大。

为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完全成熟了的事情呢？这个运动传播得这样迅速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斯达汉诺夫运动有哪些根源呢？

原因至少有四个。

（1）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基础，首先就是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根本改善。生活得更好了，同志们。生活得更愉快了。生活既然愉快，工作也就顺利了。于是就产生了高的生产定额。于是就产生了男女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首先就在这里。如果我国有危机，如果我国有使工人阶级遭受苦难的失业，如果我国人民生活得不好，不象样，不愉快，那么我国是决不会有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鼓掌）在世界上，只有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才不仅向人民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成果，而且显示了自己的物质成果。在过去的一切工人革命中，我们知道，只有一次革命勉强取得过政权。这就是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没有存在多久。固然，它也企

图打破资本主义的枷锁，但是没有来得及打破，更没有来得及向人民显示革命的美好物质成果。只有我国革命才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的枷锁，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人民创造了富裕生活的物质条件。我国革命所以有力量而且不可战胜，原因就在这里。赶走资本家，赶走地主，赶走沙皇的爪牙，夺得政权，取得自由，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是很好的。但是，单靠一个自由，可惜还远远不够。如果粮食不够，油类不够，布匹不够，住宅不好，那么单靠一个自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单靠一个自由是很难生活的。（齐声赞同，鼓掌）为了能生活得好，生活得愉快，除了政治自由的福利以外，还必须要有物质福利。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福利，给了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生活得愉快了，而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

（2）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第二个根源，就是我国已经没有剥削现象了。在我国，人们不是替剥削者做工，人们做工不是为了让不劳而获者发财致富，而是为自己，为自己的阶级，为自己的由工人阶级优秀分子掌握政权的苏联社会。正因为如此，劳动在我国是有社会意义的，它是光荣和荣耀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是私人的、个人的。你做得多些，你就多赚些钱，自顾自地生活吧。谁也不知道你，也不愿意知道你。你替资本家做工吗，你是替他们赚钱吗？又怎能不是这样呢？人家雇你就是要你去替剥削者赚钱。你不愿意这样干，那就请你滚到失业工人队伍里去，随你的便挨饿受冻去吧，而我们随时都能雇到别的更驯服的工人。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是不受重视的。在这种条件下，当然不会产生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可是，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那就不同了。在这里，劳动者是受人尊敬的。在这里，

他不是替剥削者做工，而是为自己做工，为自己的阶级做工，为社会做工。在这里，劳动者不会觉得自己是无人过问的孤苦伶仃的人。恰巧相反，在我们这里，劳动者觉得他是自己国家中的自由公民，是一种社会活动家。如果他好好做工，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那他就是一位劳动英雄，就会十分光荣。显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产生斯达汉诺夫运动。

（3）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第三个根源应当认为是在我国有了新技术。斯达汉诺夫运动与新技术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我国没有新技术，没有新工厂，没有新设备，我国就不会产生斯达汉诺夫运动。如果没有新技术，那么至多只能把技术定额提高半倍到一倍。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把技术定额提高了四五倍，那是因为他们完全依靠了新技术。由此可见，我国的工业化，我国工厂的改造，我国有了新技术和新设备，是斯达汉诺夫运动产生的原因之一。

（4）但是，单靠新技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尽管有头等的技术，头等的工厂，如果没有能够驾驭这种技术的人才，那么这些技术就不过是技术而已。为了使新技术能够产生效果，一定还要有能够操纵技术和推进技术的人才，有这样的男女工人干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表明，在我国男女工人中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干部。大约两年以前，党说过：我们虽然建成了新工厂，给了我们各企业新设备，但我们只做了一半事情。党在当时说过：除了有建设新工厂的热情以外，还要有学会运用这些新工厂的热情，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进行到底。显然，这两年来，学习了这种新技术，产生了新干部。现在很清楚，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干部。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没有这样的新人才，那我们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所以，男女工人中那些学会了运用新技术的新人才，是一支形成和推进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力量。

这些就是产生了和推进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条件。

3. 新的人才和新的技术定额

我已经说过，斯达汉诺夫运动不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是象大水决堤一样突然爆发式地发展起来的。显然，这个运动曾经必须克服某些障碍。有人妨碍过它，有人压制过它，然而，在它把力量积蓄起来以后，它就冲破这些障碍而传遍全国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究竟是谁妨碍过它呢？

妨碍它的，是旧技术定额以及站在这些定额背后的那些人。几年以前，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根据我国男女工人当时的技术落后状况规定了某种技术定额。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几年了。在这几年中，人才成长起来了，受到了技术训练。而技术定额却仍然没有改变。当然，这些定额现在对于我国的新人才来说是已经陈旧的了。现在大家都在责骂这些现行的技术定额。但是，这些定额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且这里问题根本不在于当时把这些技术定额规定得太低，而首先在于现在，当这些技术定额已经陈旧的时候，有人企图把它们当作现代的定额保留下来。他们死抓住我国男女工人的技术落后不放，只考虑这种落后，一切都从这种落后出发，最后，竟到了滥用这种落后的地步。但是，既然这种落后已经成为过去，那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应当崇拜我们的落后，把它奉为圣像，奉为偶像吗？既然男女工人成长起来了，受到了技术训练，那该怎么办呢？既然旧技术定额已经不再符合实际情况，而我国男女工人已在事实上超过它们五倍、十倍，那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发过誓说一定要忠于我们的落后吗？同志

们，我们似乎没有这样做过吧？（全场大笑）难道我们是以我国男女工人的永远落后为出发点吗？我们好象没有以此为出发点吧？（全场大笑）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打破我们某些工程师和技师的保守主义，打破旧传统和旧定额，给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以广阔的活动场所吗？

有些人在谈论科学。他们说：科学上的规定，技术指南和技术规则的规定，是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对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的要求矛盾的。但是，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哪一种科学呢？科学上的规定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检验的。如果科学和实践、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如果科学就是象我们某些保守主义同志所形容的那样，那它对于人类早就没有作用了。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经验和实践的呼声。否则，我们就根本不会有科学，譬如说，不会有天文学，而直到现在还会信奉陈腐不堪的托勒密体系了；那我们就不会有生物学，而直到现在还会迷信上帝造人的神话了；那我们就不会有化学，而直到现在还会相信炼金术士的预言了。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如果我们那些远远落在斯达汉诺夫运动后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能够不再抱住旧的技术定额不放，认真地、用科学的精神、用新的斯达汉诺夫的精神来改造自己的工作，那就好了。

有人会对我们说：好吧，那么对整个技术定额怎么办呢？技术定额究竟是工业需要的呢，还是完全不要任何技术定额也可以过得去呢？

有些人说：我们再也不需要什么技术定额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而且是很愚蠢的。没有技术定额，就无法进行计划经济。除

此以外，所以需要技术定额，是为了促使落后群众赶上先进分子。技术定额是一种巨大的调节力量，它能在生产中把广泛的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周围。所以，我们需要有技术定额，但不是现行的定额，而是较高的定额。

另外有些人说：技术定额是需要的，可是现在就应该把它提高到斯达汉诺夫们、布瑟京们、维诺格拉多娃们以及其他人所达到的高度。这也是不对的。这种定额在目前这个时候是不现实的，因为那些比斯达汉诺夫和布瑟京等人的技术素养差些的男女工人，就会完不成这种定额。我们现在需要的技术定额，应当是一种介乎现行技术定额和斯达汉诺夫和布瑟京等人所达到的定额之间的定额。例如就拿玛丽亚·杰姆钦科来说吧。大家知道，她是著名的甜菜五百公担丰产模范。她达到了每公顷五百公担或五百公担以上甜菜的产量。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成绩当作譬如说乌克兰全部甜菜种植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定额呢？不可以。现在还谈不到这一点。玛丽亚·杰姆钦科每公顷收获了五百公担或五百公担以上的甜菜，而今年每公顷甜菜的平均产量，例如在乌克兰，却只有一百三十至一百三十二公担。可见，这里的差别是不小的。是不是可以把甜菜的单位面积产量定额规定为每公顷四百公担或三百公担呢？所有的内行人都说，暂时还不能这样。显然，1936 年全乌克兰的单位面积产量定额，必须规定为每公顷二百至二百五十公担。而这个定额也是不低的，因为完成这个定额，就能使我们获得比1935年多一倍的糖。工业也是如此。斯达汉诺夫大概已超过现行技术定额十倍，甚至十倍以上。如果把他所达到的这种成绩宣布为全体风镐采煤工人的新技术定额，那就不合理了。很明显，我们必须规定一个介乎现行技术定额和斯达汉诺夫同志所达到的定额之间的定额。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现行技术定额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这些定额已经落后而变成阻碍我国工业的东西了，所以，为了不致阻碍我国工业，必须用新的较高的技术定额来代替它们。既然有了新的人才，到了新的时期，也就应当有新的技术定额。

4.最近的任务

为了更好地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我们最近的任务是什么呢？

为了突出重点，我们把它归结为两个最近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帮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继续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使它扩大和深入到苏联各州各区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要约束经济工作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中所有墨守成规、不愿前进、一味阻碍斯达汉诺夫运动开展的分子。为了把斯达汉诺夫运动全力推广到我国各地，单靠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本身，当然是不够的。一定要我们的党组织也参与这件事，帮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把运动进行到底。顿涅茨州党组织在这一方面显然表现了很大的主动性。莫斯科州党组织和列宁格勒州党组织在这一方面也做得很好。其他各州的情形怎样呢？其他各州大概还正在“动起来”。例如，关于乌拉尔就没有听到或者很少听到有什么动静，虽然大家都知道乌拉尔是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在西伯利亚西部和库兹巴斯也是如此，那里的人大概也还没来得及“动起来”呢。然而，不容置疑，我们的党组织一定会担负起这件工作，帮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克服各种困难。至于事情的另一方面，即约束经济工作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中间顽固的保守分子的问题，那就比较复

杂一些了。首先必须进行说服，用同志的态度来耐心说服工业方面的这些保守分子，使他们相信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进步性和用斯达汉诺夫精神改造工作的必要性。如果说服不了，那就只得采取更坚决的措施。例如拿交通人民委员部来说吧。不久以前，在这个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里，有一些教授、工程师以及其他专家，其中也有共产党员，硬说每小时十三至十四公里的火车旅行速度已经到了极限，如果不想违反“运营科学”，就不能超过这个极限。这是颇有威信的一部分人，他们在口头上和刊物上鼓吹自己的观点，并向交通人民委员部有关机关发出种种指示，而且他们本来就是铁路运营人员中的“权威”。我们虽然不是内行，但是根据铁路事业方面许多实际工作人员的建议，也奉劝过这些有威信的教授说：十三至十四公里的速度，决不能当作极限，在工作组织得当时，是可以超过这个限度的。但他们不仅没有倾听经验和实践的呼声，改变态度，反而拚命反对铁路事业方面的先进分子，加紧宣传他们的保守主义观点。当然，我们只好把这些受人尊敬的人物轻轻打击一下，并客客气气地请他们离开交通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鼓掌）结果怎样呢？我们现在的火车旅行速度已经是每小时十八至十九公里了。（鼓掌）同志们，我认为，在我们国民经济其他部门里，如有绝对必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当然只有在顽固的保守分子不停止妨碍和阻挠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行为时才采取这种办法。

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帮助另外一种经济工作人员、工程师和技师改造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能领导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些人并不想阻碍斯达汉诺夫运动，他们是同情这个运动的，但他们还不会改造他们的工作，还不会领导这个运动。同志们，我应当说，这样的经济工作人员、工程师和技师在我国是不少的。而只要我们帮助这

些同志，这些同志在我国是一定会更加多起来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切实执行这些任务，那么斯达汉诺夫运动就会非常猛烈地开展起来，就会普及到我国各州各区去，而向我们显示出新成就的奇迹来。

5. 简单的几句话

关于这次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意义，我还要说几句话。列宁教导说：只有不仅善于教导工农，而且善于向工农学习的领导者，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领导者。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些人听不惯列宁的这些话。但是，历史表明，列宁在这方面也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的确，千百万劳动者，工人和农民，是在劳动，在生活，在斗争。他们并不是白白地生活，他们在生活和斗争时，积累了很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忽视这种经验的领导者，决不能算是真正的领导者，——这一点难道可以怀疑吗？所以，我们这些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不仅应当教导工人，而且应当向工人学习。我决不否认，你们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在这里，在会上，向我们政府领导人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我们政府领导人，也向你们，向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向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学到了许多东西。因此，同志们，谢谢你们的指教，非常感谢！（热烈鼓掌）

最后，关于应当如何纪念这次会议的问题，我还有两句话要说。我们主席团这里已经商量过了，决定必须给这次政府领导者和斯达汉诺夫运动领导者的会议留下某种纪念。最后我们决定，授予你们中间一百至一百二十人最高的奖赏。

喊声：对。(热烈鼓掌)

斯大林：同志们，既然你们赞成，那我们就这样办吧。

(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的全体参加者向斯大林同志热烈欢呼。掌声雷动，雄壮的"乌拉"声震动全场。场内到处发出向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志致敬的无数次欢呼声。最后，参加会议的三千人齐声高唱无产阶级的《国际歌》。)

选自《列宁主义问题》
第584—598页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

（1936 年 11 月 25 日在全苏苏维埃
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75]上的报告）

（斯大林同志一走上讲台，全场就长时间热烈欢呼。全场起立。场内到处高喊："斯大林同志乌拉！""斯大林同志万岁！""伟大的斯大林万岁！""伟大的天才斯大林同志乌拉！""万岁！""红色战线！""光荣属于斯大林同志！"）

一

宪法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任务

同志们！

大家知道，提出宪法草案来给这次代表大会审核的宪法委员会，是根据苏联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特别决议成立的。这个决议在 1935 年 2 月 6 日通过，决议说：

"1. 按以下方针修改苏联宪法：

（一）使选举制更加民主化——用平等的选举来代替不完全平等的选举，用直接的选举来代替多级的选举，用不记名的选举来代替记名的选举；

（二）更准确地规定宪法的社会经济基础——使宪法适合苏联目前的阶级力量对比（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建立，富农已被粉碎，集体农庄制度取得

了胜利，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苏联社会的基础，等等）。

2. 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宪法委员会，委托宪法委员会根据第一项规定的原则起草宪法的修改草案，然后提交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

3. 苏联苏维埃政权机关下届选举，应根据新选举制举行。"

这是1935年2月6日的事。在通过这个决议的第二天，即1935年2月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为执行苏联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而成立了由三十一人组成的宪法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责成宪法委员会起草苏联宪法的修改草案。

这就是宪法委员会开展工作所必须遵循的正式依据和苏联最高机关的指示。

因此，宪法委员会修改1924年通过的现行宪法，应当估计到从1924年到现在苏联生活中取得的走向社会主义的一切进展。

二

1924—1936年在苏联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在1924—1936年这一时期内，苏联生活中发生的哪些变化须要宪法委员会在宪法草案中反映出来呢？

这些变化的实质何在呢？

我们在1924年的情形怎样呢？

这是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时期，当时，苏维埃政权在尽一切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活跃，打算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经济体系的竞赛过程中，造成社会主义

体系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优势。当时的任务是要在这一竞赛过程中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消灭资本主义分子，完成作为国民经济基本体系的社会主义体系的胜利。

当时，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状况很不好。固然，它在慢慢恢复起来，可是生产量远未达到战前水平。它建立在落后的贫乏的旧技术的基础上。当然，它是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的。我国工业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约占百分之八十。可是，资本主义成分在工业中占的比重，毕竟还不少于百分之二十。

当时，我国的农业更不成样子。固然，地主阶级已被消灭，可是，农业资本家阶级，即富农阶级，还有相当大的力量。整个说来，农业好象是无数用中世纪落后技术经营的个体小农户形成的汪洋大海，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象是这个大海中的一些零星岛屿，老实说，它们当时在我们国民经济中还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力量薄弱，而富农却还有力量。我们当时还没有说消灭富农，而是说限制富农。

国内商品流转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商品流转方面，社会主义成分只占约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而其余的地盘还被商人、投机者和其他私人占据着。

1924年我国的经济状况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1936年的情形又是怎样呢？

如果说当时我们是处在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期，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活跃的时期，那么现在我们是处在新经济政策最后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时期，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中完全消灭的时期。

首先来看我国的工业。我国工业在这个时期已经发展成为巨大的力量。现在已经不能说它是力量薄弱和技术设备不好的工业

了。恰巧相反，它现在建立在丰富的现代新技术的基础上，十分发达的重工业以及更发达的机器制造业的基础上。而最主要的，就是资本主义已经从我国工业范围中完全驱逐出去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现在是在我国工业中独占统治的体系。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工业按产量来说已超过战前工业六倍多这一事实，是不能看作一件小事的。

在农业方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处于无数技术落后的个体小农户形成的、富农到处横行的汪洋大海中，而是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机械化的、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生产，即无所不包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系。大家知道，在农业中，富农已被消灭，而用中世纪落后技术经营的个体小农经济成分只占很小的地位，它在农业中所占的比重，从播种面积来看，至多不过百分之二至三。不能不指出一件事实，就是集体农庄现在已经有了三十一万六千台拖拉机，共五百七十万马力，而同国营农场合起来计算，已有四十多万台拖拉机，共七百五十八万马力。

至于国内商品流转，商人和投机者已经被我们从这方面完全驱逐出去了。现在全部商品流转都已掌握在国家、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手中。新的苏维埃的商业，没有投机者参加的商业，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业，已经产生而且发展了。

因此，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完全胜利，现在已经是事实了。

而这说明什么呢？

这就是说，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长时间鼓掌）

由于苏联国民经济方面发生了这一切变化，我们现在有了新

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个经济不会有危机和失业，不会有贫困和破产，而公民们有一切可能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

1924—1936年这一时期在我国**经济**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大体上就是如此。

由于苏联经济方面发生了这些变化，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大家知道，地主阶级已经因国内战争胜利结束而完全消灭了。其他剥削阶级也遭到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命运。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

剩下了工人阶级。

剩下了农民阶级。

剩下了知识分子。

可是，如果以为这些社会集团在这一时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以为他们还是象在譬如说资本主义时期一样，那就错了。

例如拿苏联工人阶级来说。人们往往照旧叫它无产阶级。但什么是无产阶级呢？无产阶级就是，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资本家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经济制度下被剥夺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阶级。无产阶级就是被资本家剥削的阶级。而在我国，大家知道，资本家阶级已被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已从资本家手中夺来，交给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的国家。因而，已经没有能够剥削工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了。因而，我国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反而是同全体人民一起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既然它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而资本家阶级已被消灭，那么任何剥削工人阶级的可能都完全铲除了。

既然如此，难道还可以把我国工人阶级叫做无产阶级吗？当然不可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粉碎资本家阶级，从资本家手中夺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把产生无产阶级的生产条件消灭。可以说苏联工人阶级已经实现了解放自己的这些条件吗？绝对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说。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苏联无产阶级已经变成完全新的阶级，已经变成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引导着苏联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苏联工人阶级。

由此可见，苏联工人阶级是完全新的、摆脱了剥削的工人阶级，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

现在我们来谈农民问题。人们通常都说，农民是小生产者阶级，它的成员好象一盘散沙，分布在全国的地面上，各人单独地在自己的小经济范围内用落后的技术埋头种地，他们是私有制的奴隶，是遭到地主、富农、商人、投机者、高利贷者等等肆意的剥削的。的确，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农民，就其基本群众来说，正是这样的阶级。能不能说我国现在的农民，苏联农民，就其大多数而言，是与这样的农民相象的呢？当然不可以这样说。这样的农民在我国已经没有了。我们苏联的农民是完全新的农民。在我国已没有能够剥削农民的地主、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了。所以，我国农民是摆脱了剥削的农民。其次，我们苏联的农民，绝大多数都是集体农庄农民，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和财产不是建立在个体劳动和落后技术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集体劳动和现代技术的基础上的。最后，我国农民的经济基础不是私人所有制，而是在集体劳动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集体所有制。

由此可见，苏联农民是完全新的农民，这样的农民是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

最后，我们来说知识分子问题，来说工程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以及所有职员等等的问题。在过去这一时期中，我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已经不是那种旧的顽固的知识分子，那种企图使自己超脱各阶级，而实际上大多数都是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知识分子了。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和农民骨肉相连的完全新的知识分子。首先，知识分子的成分改变了。在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中，贵族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所占的百分数很小。苏联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都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阶层出身的。而且，知识分子活动的性质也改变了。从前，他们一定为富人阶级服务，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出路。现在，他们一定为人民服务，因为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正因为如此，他们现在是苏联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利的成员，在这里，他们同工农并肩前进，建设无阶级的社会主义新社会。

由此可见，这是完全新的劳动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地球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

这就是过去这一时期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化。

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

第一，这些变化说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线正在消除，而从前的阶级特殊性也在消失。这就是说，这些社会集团间的距离正在日益缩小。

第二，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经济矛盾在缩小，在消失。

最后，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政治矛盾也在缩小，也在消失。

这就是苏联**阶级结构**方面的变化。

关于苏联社会生活变化的情形，如果不说一说还有一方面的

变化，那是不完全的。我指的是苏联**民族**相互关系的方面。大家知道，苏联约有六十个民族和民族集团。苏维埃国家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很明显，苏联各族人民的相互关系问题，对我们不能不具有头等的意义。

大家知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1922年在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76]上成立的。它是根据苏联各族人民平等和自愿的原则组成的。1924年通过的现行宪法，是苏联第一个宪法。那时，各族人民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调整，对大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心理的残余还没有消失，离心力还继续发生作用。当时必须在这种条件下，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互助的基础上调整各族人民的兄弟合作关系，把他们联合成一个联盟制的多民族国家。苏维埃政权不能不看到这项事业的困难。它看到了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多民族国家的失败经验。它看到了旧奥匈帝国瓦解的经验，但它毕竟进行了创立多民族国家的实验，因为它知道，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多民族国家，一定能够经得住所有一切考验。

从那时起，已经有十四年了。为了审查这一实验，这样一个时期已经足够长了。结果怎样呢？过去这一时期，毫无疑义地证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多民族国家的实验，是完全成功了。这是列宁的民族政策取得的毫无疑义的胜利。（长时间鼓掌）

为什么会有这个胜利呢？

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不存在，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不存在，反对一切奴役而忠实地实现国际主义思想的工人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各族人民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一切方面已经切实实行互助，最后，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即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已经有了蓬勃的发展，——所有这些因素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导致苏联

各族人民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中间互不信任的心理已经消失，而相互友爱的感情已经发展，因而建立了各族人民在统一的联盟国家体系中真正兄弟合作的关系。

因此，我们现在有了完全形成的、经住了一切考验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巩固，是世界上任何一洲的任何一个单民族国家都比不上的。(热烈鼓掌)

这就是过去这一时期苏联**各民族相互关系**方面发生的变化。

这就是1924—1936年这一时期在苏联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发生的各种变化的总结。

三
宪法草案的基本特点

苏联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变化，在新宪法草案中得到了什么反映呢？

换句话说，提交这次代表大会审核的宪法草案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宪法委员会受委托修改1924年宪法的条文。宪法委员会工作的结果，产生了宪法的新条文，即苏联新宪法草案。宪法委员会起草新宪法草案时是从宪法不应该同纲领混淆这一点出发的。这就是说，纲领和宪法有重大的差别。纲领上说的是还没有的东西，是要在将来获得和争取到的东西，相反，宪法上应当说的是已经有的东西，是现在已经获得和已经争取到的东西。纲领主要是说将来，宪法却是说现在。

让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吧。

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长时间鼓掌）大家知道，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一公式。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当反映社会主义已经争取到了这一事实呢？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当以社会主义已经争取到了这一事实为基础呢？完全应当。其所以应当，是因为社会主义在苏联是已经获得和争取到了的东西。

可是，苏联社会还没有实现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公式作为通行的原则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虽然它把将来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作为自己的目的。我们的宪法是不是能以现在还没有、还应当争取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为基础呢？当然不能，因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苏联还没有实现而应当在将来实现的东西。如果不愿意使宪法变成纲领或关于将来的成就的宣言，那就不能这样做。

这就是我们的宪法在当前历史时期的范围。

这样，新宪法草案是已经走过的道路的总结，是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总结。所以，它是把事实上已经获得和争取到的东西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热烈鼓掌）

这就是苏联新宪法草案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各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通常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动摇这一信念为出发点的。这些宪法的主要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原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准则：对土地、森林、工厂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对人的剥削，以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存在；在社会的一个极端是多数劳动者受冻挨饿，而在另一个极端是少

数不劳而获的人奢侈挥霍；以及其他等等。各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就是以资本主义的这种准则为依据的。它们反映这些准则，用立法程序把这些准则固定下来。

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不同，苏联新宪法草案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已被消灭这一事实，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胜利这一事实。苏联新宪法草案的主要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已经争取到和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对土地、森林、工厂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多数人贫困和少数人奢侈现象的消灭；失业的消灭；劳动是每个有工作能力的公民按“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公式履行的义务和光荣职责。劳动权，即每个公民有得到有保障的工作的权利；休息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等等。新宪法草案就是以社会主义的这些准则为依据的。它反映这些准则，用立法程序把这些准则固定下来。

这就是新宪法草案的第二个特点。

再其次，资产阶级宪法暗中从以下的前提出发：社会是由彼此对抗的阶级，即占有财富的阶级和没有财富的阶级组成的；无论哪一个党执政，对社会的国家领导权（专政）都应当属于资产阶级；宪法所以需要，是为了把合乎有产阶级愿望并有利于有产阶级的社会秩序固定下来。

和资产阶级宪法不同，苏联新宪法草案所依据的是：社会主已经不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这两个互相友爱的阶级组成的；执政的正是这两个劳动阶级；对社会的国家领导权（专政）属于工人阶级这个社会的先进阶级；宪法所以需要，是为了把合乎劳动者愿望并有利于劳动者的社会秩序固定下来。

这就是新宪法草案的第三个特点。

再其次，资产阶级宪法暗中从以下的前提出发：各民族和种族彼此不能平等；有享受完备权利的民族，也有享受不完备权利的民族；此外，还有第三种民族或种族，例如殖民地的民族或种族，他们享受的权利要比享受不完备权利的民族更少。这就是说，所有这些宪法基本上是民族主义的宪法，即统治民族的宪法。

和资产阶级宪法不同，苏联新宪法草案具有深刻的国际主义性质。它的出发点是，一切民族和种族权利平等。它的出发点是，各民族和种族在肤色或语言、在文化水平或国家发展水平方面的区别，以及其他任何区别，都不能成为替民族不平等现象辩护的根据。它的出发点是，一切民族和种族，不管它们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如何，不管它们强或弱，都应当在社会一切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享受同等的权利。

这就是新宪法草案的第四个特点。

新宪法草案的第五个特点，就是它的彻底的信守不移的民主主义。从民主主义的观点来看，各资产阶级宪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宪法直接否认公民有平等的权利和民主自由，或在事实上把它们化为乌有。另一类宪法很乐意地接受、甚至标榜民主原则，但同时加上许多附带条件和限制，而使民主权利和自由残缺不全。它们说一切公民都有平等选举权，但同时又用居住期限、教育程度以至财产资格来加以限制。它们说公民有平等权利，但同时又加上附带条件，把妇女或一部分妇女除外。如此等等。

苏联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就在于它完全没有这类附带条件和限制。它根本不分什么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认为所有公民都是积极的。它不承认男性和女性、"定居者"和"暂居者"、有产者和无产者、受过教育者和未受过教育者有权利上的差别，认为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决定每个公民在社会上的地位的，不是财产状

况，不是民族出身，不是性别，不是职位，而是个人的能力和个人的劳动。

最后，新宪法草案还有一个特点。资产阶级的宪法通常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不注意实现这些权利的条件，实现这些权利的可能，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它们空谈公民平等，可是忘记了，既然资本家和地主在社会上有财富和政治势力，而工人和农民却没有财富和政治势力，既然资本家和地主是剥削者，而工人和农民是被剥削者，那么厂主同工人、地主同农民，就不能有真正的平等。又如，它们空谈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可是忘记了，既然工人阶级不可能拥有适当的会场、良好的印刷厂、充分的印刷纸张等等，那么这些自由对于工人阶级就会变成空话。

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就在于它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放在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的问题上。它不是简单地宣布公民权利平等，而且用立法程序把剥削制度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把公民已经摆脱任何剥削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障公民权利平等。它不是简单地宣布劳动权，而且用立法程序把苏联社会没有危机的事实、把失业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证劳动权。它不是简单地宣布民主自由，而且按立法程序，用一定的物质手段来保证这些自由。因此，很明显，新宪法草案的民主主义，并不是“通常的”“公认的”一般民主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

这就是苏联新宪法草案的各个基本特点。

这就是1924—1936年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变化和进展在新宪法草案上的反映。

四
资产阶级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现在来说一说资产阶级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外国资产阶级报刊怎样对待宪法草案的问题，当然是很有意思的。由于外国报刊反映各资产阶级国家里各阶层居民的舆论，所以我们不能不来说一说这些报刊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从外国报刊对我国宪法草案的最初反应看，它们有一种不理睬这个草案的倾向。这里我指的是最反动的法西斯报刊。这种批评家认为最好是干脆不理睬宪法草案，似乎天地间根本没有过、根本就没有这个宪法草案。也许有人说，不理睬不是批评。但这是不对的。不理睬作为一种特别的藐视办法，也是一种批评方式，固然是愚蠢可笑的，但毕竟是一种批评方式。（全场大笑，鼓掌）可是，他们采取隐瞒手段，并没有发生效果。最后，他们不得不揭开盖子，告诉世界说，真痛心，苏联宪法草案毕竟存在，不仅存在，而且已经开始发生蛊惑人心的影响。不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总还有舆论，有读者，有活人，他们想知道事实的真相，要长期硬是欺骗这些人是绝不可能的。靠欺骗是走不多远的……

第二种批评家承认宪法草案确实存在于天地间，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宪法草案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它事实上不是宪法草案，而是一纸空文，是用来玩弄某种手腕和欺骗人们的空洞诺言。同时他们又说，而且苏联也不能拟出较好的草案，因为苏联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而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全场大笑）既然苏联不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宪法也就不能是真正的宪法。这种批评家的典型代

表，说来奇怪，就是德国半官方杂志《德意志外交政治通讯》。该杂志公然说：苏联宪法草案是空洞的诺言，是欺骗，是“波将金的村落”[77]。它毫不犹豫地宣称：苏联不是一个国家，苏联“不过是一个确定的地理概念”，（全场大笑）所以苏联宪法也就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宪法。

对于这种所谓批评家可以说些什么呢？

俄国伟大作家谢德林在他的一篇寓言故事① 中，描写了一个刚愎自用，十分狭隘、迟钝，可是非常自信和尽职的官僚的典型。这个官僚在他“管辖的”地区杀了成千累万的居民，烧毁了几十座城市，建立了“秩序和安宁”以后，眺望四周，忽然在天边看见了一个美国，这个国家固然不很著名，但那里却有着诱惑人心的自由，用另一种方法管理国家。这个官僚一看见美国，就气愤地说：这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有什么理由存在呢？（全场大笑，鼓掌）当然，它是在几世纪以前偶然被人打开的，可是难道不能又把它封起来，使它完全无声无臭吗？（全场大笑）他说罢这一番话，就作了批示：“把美国重新封起来！”（全场大笑）

我觉得，《德意志外交政治通讯》杂志的那些老爷，同谢德林的寓言中的官僚一模一样。（全场大笑，鼓掌赞同）苏联早已成了这些老爷的眼中钉。苏联象灯塔一样屹立着已经有十九年了，它用解放的精神感染全世界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的敌人气得发狂。而它，这个苏联，却不仅存在，而且日益成长，不仅日益成长，而且日益繁荣，不仅日益繁荣，而且制定了新宪法草案，制定了使各被压迫阶级精神焕发、满怀新希望的草案。（鼓掌）既然如此，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又怎能不气愤呢？他们大声叫喊：这是个什么国

① 指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一位励精图治的长官怎样因为热心害得上司发愁的故事》。——编者注

家，它有什么理由存在呢，（全场大笑）如果它是1917年10月打开的，那为什么不可以又把它封起来，使它完全无声无臭呢？说罢这一番话，就作了批示：把苏联重新封起来，并当众宣布苏联这个国家不存在，说苏联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已！（全场大笑）

谢德林的寓言中的官僚虽然十分迟钝，可是他写下把美国重新封起来的批示时，总还表现出一点了解实情的能力，因为他立刻自言自语地说："但也许这是不能由我作主的吧。"（欢笑声大起，热烈鼓掌）我可不知道，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是否有充分的智力猜想到，他们在纸上当然能够"封闭"这个或那个国家，可是如果认真来说，那么"这是不能由他们作主的"……（欢笑声大起，热烈鼓掌）

至于说苏联宪法好象是空洞的诺言，好象是"波将金的村落"等等，那我就要援引一系列确定不移的、无须证明的事实。

在1917年，苏联各族人民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其次，苏维埃政权消灭了地主阶级，把从前属于地主、官府和寺院的一亿五千多万公顷土地交给了农民，而从前属于农民的土地不在内。这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其次，苏维埃政权剥夺了资本家阶级，没收了他们的银行、工厂、铁路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宣布这些东西为社会主义财产，派工人阶级的优秀人物领导这些企业。这是事实，而不是诺言。（长时间鼓掌）

其次，苏维埃政权按社会主义的新原则、在新的技术基础上组织了工业和农业，取得了这样的成绩：现在苏联的农业产量比战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工业产量比战前增加了六倍，而国民收入则比战前增加了三倍。所有这些都是事实，而不是诺言。（长时间鼓掌）

其次，苏维埃政权消灭了失业，实现了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保证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保证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记名投票的选举制能够实行。所有这些都是事实，而不是诺言。（长时间鼓掌）

最后，苏联制定了新宪法草案，这个草案不是诺言，而是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把已经取得和争取到的东西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

既然如此，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关于"波将金的村落"的废话，如果不是为了对人民隐瞒苏联真相，使人民陷入迷途，欺骗人民，试问又是为了什么呢。

事实就是如此。而事实正象俗话所说的那样，是改变不了的。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也许会说，那就该事实倒霉。（全场大笑）可是，那时就可以用俄国一句著名的谚语来回答他们："对愚蠢的人讲法律是没有用的。"（欢笑，长时间鼓掌）

第三种批评家不反对承认宪法草案有相当多的优点，他们认为这个草案是一种好现象，但看来很怀疑草案中许多条文能够实现，因为他们确信这些条文根本无法实现，只是纸上空文。如果说得客气一点，这就是怀疑论者。这种怀疑论者是各国都有的。

应当说，我们并不是第一次遇到他们。当 1917 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时候，怀疑论者就说过：布尔什维克也许不是坏人，但掌握政权这件事他们是办不好的，他们一定会失败。可是事实上失败了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怀疑论者。

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这种怀疑论者就说过：苏维埃政权当然是不坏的东西，但是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又加上外国人，大概会战胜这个政权的。可是事实上怀疑论者就在这一点上也失算了。

在苏维埃政权公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怀疑论者又跑出来说：五年计划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未必能实现，五年计划的事布尔什维克大概是搞不成的。但事实又证明怀疑论者倒霉：五年计划在四年内完成了。

关于新宪法草案以及怀疑论者对这一草案的批评也是这样。草案一公布，这种批评家就又跑出来发表他们那一套悲观的怀疑论，说宪法中有些条文未必能实现。毫无疑问，怀疑论者现在这一次，也会象他们过去屡次失败了那样遭到失败。

第四种批评家攻击新宪法草案，认为这个草案是"向右转"，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是"取消布尔什维克制度"。他们用各种腔调说："布尔什维克向右转了，这是事实。"在这方面特别卖力气的，是某些波兰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纸。

对于这些所谓批评家可以说些什么呢？

如果扩大工人阶级专政的基础，使专政变成对社会实行国家领导的更灵活、因而也更强大的体系这一点，竟被他们解释成不是加强工人阶级专政，而是削弱这个专政，甚至放弃这个专政，那就可以问一问，这些老爷一般是不是知道什么是工人阶级专政呢？

如果用立法程序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固定下来，用立法程序把工业化、集体化和民主化的成就固定下来这一点，在他们看来竟是"向右转"，那就可以问一问，这些老爷究竟知道不知道，左和右的区别是什么？（全场大笑，鼓掌）

毫无疑问，这些老爷在批评宪法草案时头脑完全混乱了；既然他们头脑混乱了，就把左右都弄错了。

说到这里，不禁会想起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家里的"娃儿"彼拉格娅米。果戈理描写说，这个"娃儿"有一次替乞乞科夫的马车夫缓里方带路，但她因为不会分辨向左向右，脑筋乱

了，结果弄得很窘。应当承认，波兰报纸的批评家虽然十分自负，但是他们的理解程度却与《死魂灵》中地主家里的"娃儿"彼拉格娅相差不远。(鼓掌)你们记得，马车夫绥里方因为彼拉格娅分不清左右，认为必须斥责她，于是对她说："阿唷！你这泥腿……连左右也分不清。"我觉得也应当这样斥责这些倒霉的批评家，对他们说：阿唷，你们这班蹩脚的批评家……连左右也分不清。(长时间鼓掌)

最后，还有一种批评家。如果上面那种批评家责备宪法草案是放弃工人阶级专政，那么恰巧相反，这一种批评家责备宪法草案丝毫没有改变苏联现状，没有触动工人阶级专政，没有容许政党自由，而保留了苏联共产党现在的领导地位。同时，这一种批评家认为在苏联没有政党自由，就是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标志。

我应当承认，新宪法草案确实保留了工人阶级专政制度，同样也毫无变动地保留了苏联共产党现在的领导地位。(热烈鼓掌)如果可敬的批评家认为这是宪法草案的缺点，那就只能对此感到遗憾。我们布尔什维克却认为这是宪法草案的优点。(热烈鼓掌)

至于说到各种政党存在的自由，那么在我们这里却持有略为不同的观点。党是阶级的一部分，是阶级的先进部分。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譬如说，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等等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可是，在苏联已经没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阶级了。在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相反地，是互相友爱的。所以，在苏联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这就是勇敢和彻底保护工农利益的共产党。它对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保护得不坏，这大概不能有任何怀疑吧。(热烈鼓掌)

人们谈论民主，但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在有对抗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归根到底是给有势力的人享受的民主，是给有财产的少数人享受的民主。相反地，民主在苏联却是给劳动者享受的民主，也就是说给所有的人享受的民主。由此可见，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不是苏联新宪法草案，而是资产阶级的宪法。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苏联宪法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

资产阶级对苏联新宪法草案的批评就是如此。

五
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现在，我们来谈公民们在全民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的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大家知道，在全民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了相当多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所有这些意见，都在苏联报刊上公布了。因为这些修改意见的内容很不相同，价值也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应当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修改意见的特点，就在于它们说的不是宪法问题，而是将来立法机关的日常立法工作问题。关于保险事业的个别问题，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某些问题，关于工业建设的某些问题，关于财政的问题，——这就是第一类修改意见提到的问题。提出这些修改意见的人，大概没有弄懂宪法问题和日常立法问题的区别。正因为如此，他们竭力要把尽可能多的法律塞到宪法里去，简直要把宪法变成一部法律汇编。可是，宪法并不是法律汇编。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宪法并不排除将来立法机关的日常立

法工作，而要求有这种工作。宪法给这种机关将来的立法工作以法律基础。这一类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既然与宪法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认为应当把它们交到我国将来的立法机关去。

应当归入第二类的修改和补充意见，企图把历史资料的成分，或者关于苏维埃政权现在还没有取得而将来应当取得的成就的宣言成分，载入宪法。要在宪法内指出党、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多年来在为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克服了哪些困难，要在宪法内说明苏维埃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建成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这一类修改意见用各种不同的说法提到的问题。我认为这一类修改和补充的意见和宪法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也应当不采纳。宪法是把已经取得、已有保障的成果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如果我们不愿意曲解宪法的这一基本性质，我们就不应当使宪法通篇都是关于以往历史的资料，或关于苏联劳动群众将来成就的宣言。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和其他文件去说。

最后，应当归入第三类的是和宪法草案有直接关系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这一类修改意见中有一大部分是属于文字上修改性质的。因此，可以把它们交给本届代表大会审定委员会，——我想代表大会一定会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委托它来最后审定新宪法全文的。

至于第三类修改意见中其余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有比较实质性的意义，所以我认为必须在这里说一说。

（1）首先谈一谈对宪法草案第一条的修改意见。共有四个修改意见。第一个意见主张用“劳动者国家”几字来代替“工农国家”。另一个意见主张把“工农国家”改为“工农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国家”。第三个意见主张用“苏联境内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国家”来代替“工农国家”。第四个意见主张用“集体农庄庄员”或“社会主

义农业劳动者”来代替“农”字。

是否应当采纳这些修改意见呢？我认为不应当。

宪法草案第一条说明的是什么呢？它说明苏联社会的阶级成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宪法内是不是可以不提到我国社会的阶级成分问题呢？不可以。大家知道，苏联社会是由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宪法草案第一条说的正是这一点。所以，宪法草案第一条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阶级成分。也许有人会问：那么劳动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且也不能是一个阶级，——它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由社会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从前，知识分子是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有一部分是农民出身，而工人出身的是极少数。而在我们苏维埃时代，知识分子主要是工农出身的。可是，不管它的出身如何，不管它的性质怎样，它还是一个阶层而不是阶级。

这种情形会不会损害劳动知识分子的权利呢？一点也不会！宪法草案第一条所说的并不是苏联社会各阶层的权利，而是这个社会的阶级成分。苏联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其中包括劳动知识分子的权利，主要在宪法草案第十、第十一两章内说明了。从这两章内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各方面，都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所以，关于劳动知识分子的权利会受损害，是根本谈不到的。

关于苏联各民族和种族也是这样。在宪法草案第二章内已经写明，苏联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各民族的自由联盟。是不是需要在说明苏联社会阶级成分而不是说明苏联社会民族成分的宪法草案第一条里，重复这一公式呢？显然不需要。至于苏联各民族和种族的权利，在宪法草案第二、第十和第十一章内都已说明。从这几章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

文化生活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所以，根本谈不到民族权利会受损害。

用"集体农庄庄员"，或用"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者"来代替"农"字，同样是不正确的。第一，在农民中，除了集体农庄庄员，还有一百多万非集体农庄庄员的农户。怎样处理他们呢？提出这个修改意见的人，是不是想把他们去掉不算呢？如果这样，那就不合理了。第二，虽然大多数农民已经经营集体经济，但这还不是说他们已经不是农民，他们已经没有个人经济，个人的园地等等了。第三，如果这样，那就也要用"社会主义工业劳动者"来代替"工"字了，但是，提出这个修改意见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提议这样做。最后，难道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消失了吗？如果他们还没有消失，那是不是应当把他们的固定名称从字典中删去呢？提出这个修改意见的人，大概不是指现在的社会，而是指将来的社会，指将来已经没有阶级，而工人和农民都变成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的社会。所以，他们显然是跑到前面去了。可是，在制定宪法时，不应当从将来出发，而应从现在、从已有的事实出发。宪法不可以、而且不应当跑到前面去。

（2）其次，是对宪法草案第十七条的修改意见。这个意见主张把宪法草案上关于各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的第十七条全部删去。我认为这个提议是不正确的，因此是代表大会不应当采纳的。苏联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各加盟共和国的自愿联盟。如果把关于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这一条从宪法上删去，那就违反了这个联盟的自愿性质。我们可以同意这个做法吗？我认为不可以而且不应当同意这样做。有人说，在苏联，没有一个共和国会愿意退出的，所以第十七条没有实际意义。说在我们苏联没有一个共和国会愿意退出，这当然是对的。可是绝对不能由此得出

结论说，我们不应当在宪法上明文规定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同样，在苏联也没有哪一个加盟共和国会愿意压迫另一个加盟共和国。可是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应当把关于各加盟共和国权利平等的一条从苏联宪法上删去。

（3）再其次，有人提议在宪法草案第二章内另外加上一条说：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发展到相当水平时，可以改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这个提议可以采纳吗？我认为不应当采纳。这个提议，不仅从内容来说不正确，而且从它的理由来说也是不正确的。把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不能以该共和国经济和文化的成熟程度为理由；同样，把某个共和国保留为自治共和国，也不能以该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落后为理由。如果这样，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列宁主义的态度。例如鞑靼共和国还是自治共和国，而哈萨克共和国却成了加盟共和国，但这还不是说，从文化和经济发展方面来看，哈萨克共和国高于鞑靼共和国。实际情形恰巧相反。例如，关于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情况也是这样，从文化和经济方面来看，前者高于后者，但前者还是自治共和国。

究竟要具备哪些标志才有根据把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呢？

这种标志有三个。

第一，这个共和国必须在边疆，而不是四周都被苏联领土环绕着。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加盟共和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那就一定要这个成了加盟共和国的共和国有可能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提出退出苏联的问题。而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只有同某一外国交界，即不是四周都被苏联领土环绕着的共和国。当然，我们没有哪一个共和国会在事实上提出退出苏联的问题。可是，既然

加盟共和国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那就必须使这个权利不致变成毫无意思的纸上空文。例如拿巴什基尔共和国或鞑靼共和国来说吧。假定这两个自治共和国改成了加盟共和国。试问，它们能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提出退出苏联的问题吗？不能。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四周都被苏联的共和国和州环绕着，老实说，它们就是要想退出苏联也无处可退。（全场大笑，鼓掌）因此，把这些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是不正确的。

第二，这个民族在用它的名称命名的苏维埃共和国人口中，必须是比较聚居而占多数的。例如拿克里木自治共和国来说吧。它虽然是边疆共和国，但克里木鞑靼人在该自治共和国内并不占多数，反而是占少数。所以，如果把克里木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那是不正确的，不合逻辑的。

第三，这个共和国按人口数量来说，必须不是一个很小的共和国，它的人口至少要在一百万以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以为人口极少而军队不大的一个小苏维埃共和国，能够指望维持独立国的生存，那就不正确了。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强盗会立即把它抓到手的。

我认为，没有这三个客观标志，在目前的历史时期提出把某个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的问题，是不正确的。

（4）再其次，有人提议，把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九等条内关于各加盟共和国所属各边疆区和各州行政区域划分的详细记载删去。我认为这个提议也是不能采纳的。在苏联有些人非常喜欢不厌其烦地改变各边疆区和各州的界线，以致在工作中造成混乱和缺乏信心。宪法草案正是要给这些人一个限制。这是很好的，因为在这方面，也象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们要有自信的气氛，要有稳定性、明确性。

（5）第五个修改意见是关于第三十三条的。提意见的人认为建立两院制是不适当的，提议取消民族院。我认为这个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如果苏联是一个单民族的国家，那么一院制会比两院制好。但是苏联不是单民族的国家。大家知道，苏联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有一个不分民族而代表苏联一切劳动者共同利益的最高机关。这就是联盟院。可是，苏联各民族除了共同利益以外，还有与民族特点有关的各自特有的特别利益。可以忽视这些特别利益吗？不可以。是不是需要一个正是反映这些特别利益的专门最高机关呢？绝对需要。无疑，没有这样一个机关，就无法管理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样的机关就是第二院，即苏联民族院。

有人援引欧美各国议会史中的事实，说两院制在这些国家里只有坏处，第二院一般都成了反动的中心，成了前进的障碍。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的。可是，这些现象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国家里的两院是不平等的。大家知道，第二院往往比第一院有更多的权利，而且第二院照例不是通过民主方式成立的，往往是用上面指定议员的方式成立的。毫无疑问，如果两院平等，第二院也象第一院那样用民主方式成立，就不会有这种坏处。

（6）其次，有人对宪法草案提出补充，要求两院代表名额相等。我认为这个提议是可以采纳的。据我看来，这个提议有明显的政治上的好处，因为它强调两院的平等。

（7）再其次，有人对宪法草案提出补充，说民族院代表也应当象联盟院代表一样由直接选举产生。我认为这个提议也是可以采纳的。固然，这会在选举方面造成某些技术上的不便。可是，这在政治上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它一定会提高民族院的威信。

（8）再其次，是对第四十条的补充，说应当赋予最高苏维埃主

席团以颁布临时立法文件的权利。我认为这个补充是不正确的，是代表大会不应当采纳的。终究必须铲除不由某一个机关而由许多机关立法的情形了。这种情形同法律稳定性的原则相抵触。而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律的稳定性。立法权在苏联只应当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一个机关来行使。

（9）再其次，是对宪法草案第四十八条的补充，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不由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而由全国人民选举。我认为这个补充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根据我国的宪法制度，在苏联不应当有和最高苏维埃同等地由全国人民选举而能和最高苏维埃对立的个人总统。苏联的总统是集体的——这就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内，这个主席团不是由全国人民，而是由最高苏维埃选举，并应向最高苏维埃报告工作。历史经验表明，建立最高机关的这种办法，是最民主的，能够保障国家免除不良的事故。

（10）再其次，是对同一条，即第四十八条的修改意见。主张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增加到十一人，使每个加盟共和国有一个副主席。我认为这个意见可以采纳，因为这会改善我们的事业，而且只会巩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威信。

（11）再其次，是对第七十七条的修改意见。要求成立一个新的全苏人民委员部——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我认为这个意见也应当采纳，（鼓掌）因为把我国国防工业特别分出来，给它正式建立一个相当的人民委员部的时机已经成熟。我觉得这只会改善我国的国防事业。

（12）再其次，是对宪法草案第一二四条的修改意见。要求根据禁止举行宗教仪式的方针来修改这条宪法。我认为这个意见应当否定，因为它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

(13)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实质性的修改意见。我说的是对宪法草案第一三五条的修改意见。这个意见主张剥夺僧侣、过去的白卫分子、所有从前的显赫人物和不参加公益劳动的人的选举权，或者，无论如何应当限制这种人的选举权，只给他们选举权而不给他们被选举权。我认为这种意见也应当否定。苏维埃政权从前剥夺不劳动者和剥削者的选举权，不是永久的，而是暂时的，有一定期限的。有一个时候，这些人进行反对人民的公开战争，反抗苏维埃法律。关于剥夺他们选举权的苏维埃法律，是苏维埃政权对他们这种反抗的回答。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不少时间了。在过去这一时期中，我们已经把剥削阶级消灭，而苏维埃政权已经变成不可战胜的力量了。修改这种法律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了呢？我认为已经到了。有人说这有危险，因为那些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某些过去的白卫分子、富农、神父等等，会钻进国家最高机关里来。但这里究竟有什么可怕呢？你怕狼，那你就不要到树林里去。（全场活跃，热烈鼓掌）第一，并不是所有从前的富农、白卫分子或神父都敌视苏维埃政权。第二，如果在某些地方人民竟会选举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那就证明我们的鼓动工作做得太坏，我们就理应受到这种耻辱；如果我们的鼓动工作真是按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去进行的，那人民就决不会容许这些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混进自己的最高机关。这就是说，应当做工作，而不应当叫苦，（热烈鼓掌）应当做工作，而不应当等待用行政命令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列宁在1919年就说过，苏维埃政权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认为实行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遍选举权是有益的。请你们注意：**没有任何限制**。他说这话的时候，外国武装干涉还没有消灭，我国工业和农业还处在极坏的状态。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十七年了。同志们，难道还没有到实行列宁这一指示的时候吗？我认为已经到了。

请看列宁在1919年写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是这样说的。让我来读一下：

“为了避免对暂时的历史必要性做不正确的概括，俄共应当向劳动群众说明，在苏维埃共和国内有一部分公民被剥夺选举权，但这决不是那类在大多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内终身被宣布为无权的公民，而只是剥削者，只是那些违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根本法、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剥削地位并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内，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一天天地巩固，随着那些客观上有可能继续做剥削者或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的数目日益减少，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自然也会减少。在俄国现时，这个比例未必超过百分之二、三。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将来，外国侵略的停止和剥夺者的完全被剥夺，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会选择另外的方式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实行**没有任何限制**①的普遍选举权。”(《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94页)②

看来是很清楚了。

对苏联宪法草案提出的修改和补充意见就是如此。

六

苏联新宪法的意义

从进行了差不多五个月的全民讨论的结果来看，可以预料宪法草案是一定会被这次代表大会批准的。(热烈鼓掌，转为欢呼。全场起立。)

再过几天，苏联就会有以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新的社会主义的宪法了。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58页。——编者注

这将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用简单明了的语句，几乎是用记录的体裁，说明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事实，说明苏联劳动者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的事实，和广泛的最彻底的民主在苏联胜利的事实。

这个文件证明，资本主义国家里千百万诚实的人过去和现在所渴望的东西，已经在苏联实现了。（热烈鼓掌）

这个文件证明，在苏联已经实现的东西，在其他国家里也完全可能实现。（热烈鼓掌）

由此可见，苏联新宪法的国际意义是怎样估计也不算过高的。

现在，法西斯主义浊流污辱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玷污了文明世界优秀人物的民主要求，苏联新宪法将成为对法西斯主义的控诉书，说明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战胜的。（鼓掌）苏联新宪法对于所有目前进行反法西斯暴行的斗争的人，将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和实际上的援助。（热烈鼓掌）

苏联新宪法对于苏联各族人民有更大的意义。苏联宪法对资本主义各国人民来说具有行动纲领的意义，而对于苏联各族人民，却是他们斗争的总结，是他们在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战线上胜利的总结。走过了艰难和斗争的道路，现在得到了这一个说明我们胜利果实的宪法，我们是多么高兴啊。知道了我国人民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进行了斗争，他们是怎样取得了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我们是多么高兴啊。知道了我国人民的大量鲜血没有白流，而是产生了应有的结果，我们是多么高兴啊。（长时间鼓掌）这就会在精神上武装我国工人阶级，我国农民，我国劳动知识分子。这就会推动他们前进，激发他们的理所当然的自豪感。这就会加强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动员他们去进行新的斗争，争取共产主义的新

胜利。（热烈欢呼。全场起立。高呼“乌拉”。全场高呼：“斯大林同志万岁！”全体代表起立，高唱《国际歌》。唱完《国际歌》又欢呼。高喊：“乌拉！”“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选自《列宁主义问题》
第599—628页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1938年5月17日）

同志们！

让我举杯祝贺科学，祝贺科学繁荣，祝贺科学工作者身体健康。

祝贺不与人民隔绝、不远离人民、而决心为人民服务、决心把一切成果都贡献给人民的那种科学日益繁荣，这种科学为人民服务并不是迫不得已的，而是心甘情愿、非常乐意的。（鼓掌）

祝贺科学繁荣，这种科学不让自己的负有盛名的老领导者满足于献身科学和作为科学垄断家而故步自封，这种科学懂得老年科学工作者和青年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的意义、作用和无穷力量，它心甘情愿地、非常乐意地给我国青年打开一切科学的大门，使他们能够攀登科学高峰，它承认未来是属于科学青年的。（鼓掌）

祝贺科学繁荣，从事这种科学的人虽然懂得科学中已有的传统的力量和意义，并善于为科学而利用这些传统，但他们仍然不愿作这些传统的奴隶；当旧传统、旧标准和旧方针趋于陈腐而变成前进的障碍时，这种科学有勇气、有决心打破这些旧传统、旧标准和旧方针而建立新传统、新标准和新方针。（鼓掌）

在科学发展史上有不少勇敢的人，不管有什么障碍，他们都能不顾一切而破旧立新。这样的科学勇士，象伽利略、达尔文以及其

他许多人，都是人所共知的。我想要说的一位科学大师，他同时又是当代的一位最伟大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的导师和我们的教养者列宁。（鼓掌）请回想一下1917年的情况。当时列宁根据对俄国社会发展的科学分析，根据对国际状况的科学分析而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在俄国胜利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这是当时科学界的许多人根本意想不到的结论。科学界的一位卓越人物普列汉诺夫，当时曾经轻蔑地谈论列宁，硬说列宁是在"说梦话"。科学界的其他一些同样有名的人物则硬说"列宁发疯了"，应当把他藏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当时科学界形形色色的人都咆哮起来反对列宁，说他是科学的破坏者。但是，列宁不怕逆流而进，不怕反对守旧习气。结果是列宁胜利了。（鼓掌）

你们看，这就是一个科学勇士的典范，他大胆地进行斗争反对陈旧了的科学，并为新科学开拓道路。

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为科学和技术开拓新道路的，有时并不是科学界的著名人物，而是科学界毫不知名的人物，平凡的人物，实践家，工作革新者。在座的斯达汉诺夫同志和帕帕宁同志，就是科学界毫不知名的人物，他们没有学位，他们是本行业务的实践家。但是，谁不知道斯达汉诺夫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工业方面从事自己的实际工作时，曾把科学界和技术界著名人物所规定的现行定额当作陈腐定额加以推翻，而采用了适合于真正的科学和技术要求的新定额呢？谁不知道帕帕宁和帕帕宁探险家们在漂流的冰块上从事自己的实际工作时，没费特别工夫，就顺便把关于北极地带的旧观念作为陈腐观念加以推翻，而确立了适合于真正的科学要求的新观念呢？谁能否认斯达汉诺夫和帕帕宁是科学革新者，是我们先进的科学界的人物呢？

你们看，在科学中竟有这样的"奇迹"。

我刚才讲的是科学。但是有各种各样的科学。我所说的科学叫作先进的科学。

祝我们先进的科学繁荣！

祝先进科学的工作者身体健康！

祝列宁永垂不朽，列宁主义万古长青！

祝斯达汉诺夫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身体健康！

祝帕帕宁和帕帕宁探险家们身体健康！（鼓掌）

载于1938年5月19日
《真理报》第136号

选自《斯大林文选》
第174—176页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38 年 9 月）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辩证方法的时候，通常援引黑格尔，认为他是表述了辩证法基本特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采取的仅仅是它的“合理的内核”，而屏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且向前发展了辩证法，赋予辩证法以现代的、科学的形态。

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①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17 页。——编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的时候，通常援引费尔巴哈，认为他是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权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采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把它进一步发展成为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而屏弃了它那些唯心主义的和宗教伦理的杂质。大家知道，费尔巴哈虽然在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他竭力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恩格斯屡次说过：费尔巴哈"虽然有唯物主义的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652—654页）①

辩证法来源于希腊文"dialego"一词，意思就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在古代，所谓辩证法，指的是以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艺术。古代有些哲学家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后来推广到自然界现象中去，就变成了认识自然界的辩证方法，这种方法把自然界现象看作是永恒地运动着、变化着的现象，把自然界的发展看作是自然界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作是自然界中对立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

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来，是同形而上学截然相反的。

（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是：

（1）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依赖的各个对象或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着，互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227页和第229页。——编者注

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现象，如果被孤立地、同周围现象没有联系地拿来看，那就无法理解，因为自然界的任何领域中的任何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条件没有联系、与它们隔离的现象，那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反之，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现象，那就可以理解、可以论证了。

（2）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静止不动、停滞不变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在发展，有某种东西在破坏、在衰颓。

因此，辩证方法要求我们观察现象时不仅要从各个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角度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的角度，从它们的产生和衰亡的角度去观察。

在辩证方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方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恩格斯说："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原始的活细胞。——约·斯大林注〉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同上，第484页）①

恩格斯说，因此，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4页。——编者注

23 页)①。

(3)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作简单的增长过程，量变不引起质变的过程，而是看作从不显著的、潜在的量的变化到显露的变化，到根本的变化，到质的变化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迅速地、突然地发生的，表现为从一种状态飞跃式地进到另一种状态，并且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规律地发生的，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量变积累而成的。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不应该把发展过程了解为圆圈式的运动，了解为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而应该把它了解为前进的运动，了解为上升的运动，了解为从旧质态到新质态的转化，了解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恩格斯说："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同上，第 23 页)②

恩格斯在说明辩证的发展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时写道：

"在物理学中……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或所承受的某一形式的运动的量在数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例如，水的温度最初对它的液体状态是无足轻重的；但是由于液体水的温度的增加或减少，便会达到这样的一点，在这一点上这种聚集状态就会发生变化，水就会变为蒸汽或冰。…… 例如，必须有一定的最低强度的电流才能使电灯泡中的白金丝发光，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白热点和融解点，每种液体在一定的压力下都有其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19—420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420 页。——编者注

特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们有办法造成相应的温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在这一点上相当的压力和冷却能使气体变成液体。……物理学的所谓常数〈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点。——约·斯大林注〉，大部分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变化〉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同上，第527—528页）①

接着，恩格斯讲到化学时又说：

"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黑格尔本人已经知道这一点……拿氧来说：如果结合在一个分子中的有三个原子，而不是象普通那样只有两个原子，那么我们就得到臭氧，一种在气味和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待说，如果把氧同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么其中每一种化合都会产生出一种在质的方面和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同上，第528页）②

最后，恩格斯在批评杜林，批评这位大骂黑格尔而暗中又剽窃黑格尔关于从无感觉世界王国进到感觉的王国，从无机界王国进到有机生命王国，是向新状态的飞跃这一著名原理的杜林时写道：

"这完全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例如在把水加热或冷却的时候，沸点和冰点就是这种关节点，在这种关节点上——在标准压力下——完成了进入新的聚集状态的飞跃，因此，在这里量就转变为质。"（同上，第45—46页）③

（4）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或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因为它们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过去和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而这种对立面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487—488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84页。——编者注

的斗争，旧东西和新东西之间、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之间、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和谐的开展，而是通过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矛盾的揭露，通过在这些矛盾基础上活动的对立倾向的"斗争"进行的。

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哲学笔记》俄文版第 263 页）①

其次：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3 卷第 301 页）②

简略说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

不难了解，把辩证方法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既然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现象，既然一切现象都是彼此联系、互相制约的，那就很明显，在估计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制度、每一个社会运动的时候，不应当象历史学家常做的那样，从"永恒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见出发，而应当从产生这种制度、这个社会运动的条件和同它们有联系的条件出发。

奴隶占有制度，从现代的条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反常的荒谬事情。然而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的条件下，奴隶占有制度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因为它同原始公社制度相比是前进了一步。

① 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78 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712 页。——编者注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譬如说在1905年的俄国，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正确的和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当时意味着前进一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从我们苏联现在的条件看来，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和反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同苏维埃共和国相比是后退了一步。

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

显然，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

其次，既然世界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中，既然旧东西衰亡和新东西生长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没有什么"不可动摇的"社会秩序，没有什么私有制和剥削的"永恒原则"，没有什么农民服从地主、工人服从资本家的"永恒观念"。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替代，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代替了封建制度一样。

这就是说，不要指靠已经不再发展的社会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是占优势的力量，而要指靠正在发展的、有前途的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不是占优势的力量。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斗争的时期①，俄国无产阶级同当时占人口大多数的个体农民比较起来，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但是无产阶级是一个发展着的阶级，农民则是一个日趋瓦解的阶级。正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发展着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就指靠无产阶级。他们没有错，因为大家知

① 关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的斗争，参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一章。——编者注

道，无产阶级后来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力量发展成了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头等力量。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

其次，既然从缓慢的量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进行的革命变革，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不可能通过缓慢的变化，通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通过革命来实现。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做革命者，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

其次，既然发展是通过内在矛盾的揭露，通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对立势力的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就很明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不要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而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要熄灭阶级斗争，而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执行无产阶级的不调和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使无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相协调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执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妥协主义的政策。

以上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观察社会生活，观察社会历史的情形。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那从根本上说来，它是同哲学唯心主义截然相反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

（1）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绝对观念"、"宇宙精神"、"意识"的

体现，而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辩证方法所判明的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发展规律；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的，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

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651页）①

古代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持着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列宁在谈到这个唯物主义观点时说：“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列宁**《哲学笔记》俄文版第318页）②

（2）唯心主义硬说，只有我们的意识才是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存在、自然界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的感觉、表象、概念中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物质、自然界、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感觉、表象、意识的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那就不能把思维和物质分开。

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　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5页。——编者注

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29页）①

其次：

“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同上，第332页）②

马克思谈到物质和思维问题时说道：

“**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同上，第302页）③

列宁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时写道：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意识、感觉、经验……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266—267页）④

其次：

“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是第二性的。”（同上，第119—120页）⑤

“世界图景就是物质运动和‘**物质思维**’的图景。”（同上，第288页）⑥

“脑是思想的器官。”（同上，第125页）⑦

（3）唯心主义否认认识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能性，不相信我们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4卷第223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3卷第384页。——编者注

④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2页。——编者注

⑤ 同上，第146页和第147页。——编者注

⑥ 同上，第361页。——编者注

⑦ 同上，第153页。——编者注

知识的可靠性，不承认客观真理，并且认为世界上充满着科学永远不能认识的“自在之物”，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以认识；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知识，经过经验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而只有还没有被认识、而将来科学和实践的力量会加以揭示和认识的东西。

恩格斯在批判康德和其他唯心主义者所谓世界不可认识和“自在之物”不可认识的论点，坚持唯物主义关于我们的知识是可靠知识这一著名原理时写道：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列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30页）①

列宁指责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尤什凯维奇以及马赫的其他信徒堕入信仰主义（一种排斥科学而崇尚信仰的反动理论），列宁坚持唯物主义的著名原理，说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科学知识是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222页。——编者注

可靠的，说科学的规律是客观真理。列宁写道：

“现代信仰主义决不否认科学；它只否认科学的‘过分的奢望’，即科学想达到客观真理的奢望。如果客观真理存在着（如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只有那在人类‘经验’中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才能给我们提供客观真理，那么一切信仰主义就无条件地被否定了。”（《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102页）①

简略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特征就是这样。

显而易见，把哲学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就是说，社会生活、社会历史不再是一堆“偶然现象”，因为社会历史成了社会有规律的发展，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成了一种科学。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不应该以“卓越人物”的善良愿望为基础，不应该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的要求为基础，而应该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基础，以研究这些规律为基础。

其次，既然世界可以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

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24页。——编者注

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在它的实际活动中，不应该以任何偶然动机为指南，而应该以社会发展规律、以这些规律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为指南。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从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空想变成了科学。

这就是说，科学和实际活动的联系、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它们的统一，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党的指路明星。

其次，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

这就是说，形成社会的精神生活的源泉，产生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① 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这就是说，社会历史的不同时期所以有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奴隶占有制度下是一种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封建制度下是另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是一种，——那不能用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的“本性”和“属性”来解释，而要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的不同的社会物

① 原文为“учреждение”，系指和一定的理论观点相适应的组织和机构。——编者注

质生活条件来解释。

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

因此马克思说：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页）①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要不陷入空想家的地位，无产阶级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就不应当从抽象的"人类理性原则"出发，而应当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出发；不应当从"伟大人物"的善良愿望出发，而应当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

包括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32]在内的空想主义者所以垮台，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作用，他们陷入唯心主义，不是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上，而是不顾这种需要并且违反这种需要，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理想计划"和"包罗万象的方案"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正是以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依据，任何时候也不脱离社会的现实生活。

但是，从马克思的话中不能引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意义，它们不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生活物质条件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暂且只是说到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起源**，只是说到它们的**产**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编者注

生，只是说到社会精神生活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至于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意义，至于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否认，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势力的利益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势力的利益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可是，一经产生，它们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和新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所必需的，因为没有它们那种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和改造工作，就不可能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中的已经成熟的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就为自己开拓道路，成为人民群众的财富，它们动员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去反对社会上衰颓的势力，从而有助于推翻社会上衰颓的、阻碍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势力。

可见，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即社会存在的发展所提出的已经成熟的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物质生活，为彻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已经成熟的任务，为社会物质生活能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的

条件。

因此马克思说：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406页)①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为着有可能去影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加速这些条件的发展，加速这些条件的改善，就应当依据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和社会思想，这种理论和思想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因而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能动员他们，把他们组织成一支决心粉碎社会反动势力、为社会先进势力开辟道路的无产阶级党的大军。

“经济派”和孟什维克所以垮台，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先进理论、先进思想有动员作用、组织作用和改造作用，他们陷入庸俗唯物主义，把先进理论和先进思想的作用看成几乎等于零，从而要党消极起来，无所作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以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先进理论为依据，把这种理论提到它应有的高度，并且把充分利用这种理论的动员力量、组织力量和改造力量，看作自己的职责。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样来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条件和社会精神生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

现在还要说明一个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对于归根到底决定社会面貌、社会思想、观点和政治设施等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应该作怎样的了解？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编者注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究竟是什么，它们的特征究竟怎样？

首先，"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无疑包括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怎样呢？地理环境是不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人们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

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会提到它。这是很明显的。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其次，人口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大小，无疑也包括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中，因为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必要因素，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人口的增长是不是决定人们社会制度性质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也是否定的。

当然，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

的发展，但是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能是**决定的**影响，因为人口的增长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某种社会制度恰恰被一定的新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为什么原始公社制度恰恰被奴隶占有制度所代替，奴隶占有制度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封建制度被资产阶级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

如果人口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那么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会产生出相应的较高类型的社会制度。可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情形。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三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中国，因为在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而美国早已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比利时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十八倍，比苏联高二十五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比利时，同苏联相比，比利时更是落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因为在比利时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苏联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在国内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人口的增长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面貌的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1）既然如此，那么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究竟什么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种力量就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就是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鞋子、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要生活，就要有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要有这些物质资料，就必须生产它们，要生产它们，就需要有人们用来生产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的生产工具，就需要善于生产这

些工具，善于使用这些工具。

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

但是生产力还只是生产的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它所表现的是人们同那些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自然对象和力量的关系。生产的另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同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的，而是以一个人群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的生产的时候，在生产内部彼此建立这种或那种相互关系，即这种或那种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是不受剥削的人们彼此间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可能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最后，也可能是从一种生产关系形式向另一种生产关系形式过渡的关系。可是，不管生产关系带有怎样的性质，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制度下，都同社会的生产力一样，是生产的必要因素。

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429页）①

可见，生产、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编者注

（2）生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变化，即引起全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人们利用不同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得粗浅一些，过着不同方式的生活。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有一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下有另一种生产方式，在封建制度下又有一种生产方式，如此等等。与此相适应，人们的社会制度、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政治设施也是各不相同的。

社会的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基本上也就怎样，社会的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

或者说得粗浅一些：人们的生活方式怎样，人们的思想方式也就怎样。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各种生产方式在许多世纪过程中依次更迭的历史，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那些蹂躏他国的“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

这就是说，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关键，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社会的观点和思想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在每个特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到社会的经济中去寻求。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要想成为真正的党，首先应当掌握生产发展规律的知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无产阶级党在制定自己的党纲以及进行实际活动的时候，首先应当从生产发展的规律出发，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出发。

（3）生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加速或者延缓它的发展。而且必须指出：生产关系不能过分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并和这一增长相矛盾，因为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并且给生产力以发展余地的时候，生产力才能充分地发展。因此，无论生产关系怎样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们迟早必须适合——也确实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不然，生产体系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会根本破坏，整个生产就会破裂，生产就会发生危机，生产力就会遭到破坏。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危机就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是两者冲突的例子，在那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同生产力的性质极不适合。这种不适合的结果，就是破坏生产力的经济危机，而这种不适合的情况本身是以破坏现存生产关系、建立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新生产关系为

使命的社会革命的经济基础。

反之，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①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

所以，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

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必须怎样。

生产力的状况所回答的问题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产、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个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且被用来剥削其他的个人、集团和阶级。

下面就是从古代到今天的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情景。从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箭，与此相联系，从狩猎生活过渡到驯养动物和原始畜牧；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铁斧、铁锹犁等等），与此相适应，过渡到种植植物和农业；用于加工材料的金属工具进一步改良，过渡到铁匠的风箱，过渡到陶器生产，与此相适应，手工业得到发展，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手工业生产以及后来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从手工业生产工具过渡到机器，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机器工业；进而过渡到机器体系，出现现代化机械化大工业，——这就是人类史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大致的、远不完备的情景。这里很明显，生产工具的发展和改善是由参加生产的人

①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的问题，可参看斯大林后来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见本卷第577页和第590页）。——编者注

来实现的，而不是与人无关的，所以，生产工具变化和发展了，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人也随着变化和发展，人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也随着变化和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也相应地变化和发展。

历史上生产关系有五大类型：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在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性质。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使人无法单身去同自然力量和猛兽作斗争。为了在森林中采集果实，在水里捕鱼，建筑某种住所，人们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则就会饿死，就会成为猛兽或邻近公社的牺牲品。公共的劳动导致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过有些生产工具（也是用来防御猛兽的工具）归个人所有。这里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

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这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这时人们拥有的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金属工具；这时，没有畜牧业、也没有农业的那种贫乏原始的狩猎经济，已经被畜牧业、农业、手工业以及这些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所代替；这时已经有可能在各个人之间和各公社之间交换产品，有可能把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而生产资料确实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这时已经有可能迫使大多数人服从少数人并且把大多数人变为奴隶。这里社会一切成员在生产过程中的那种共同的自由的劳动没有了，占主要地位的是受不劳动的奴隶主剥削的奴隶的强迫劳动。因此生产资

料和产品的公有制也没有了。代替它的是私有制。这里，奴隶主是第一个和基本的十足的私有者。

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他们彼此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奴隶占有制度的情景。

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封建主已经不能屠杀农奴，但是可以买卖农奴。除了封建所有制以外，还存在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他们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的私有经济。这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铁的冶炼和加工更进一步的改善，铁犁和织布机的推广，农业、园艺业、酿酒业和榨油业的继续发展，除手工业作坊以外工场手工业企业的出现，——这就是当时生产力状况的特征。

新的生产力要求工作者在生产中能表现出某种主动性，愿意劳动，和劳动有某种利害关系。于是，封建主就抛弃奴隶，抛弃这种和劳动没有利害关系、完全没有主动性的工作者，宁愿利用农奴，因为农奴有自己的经济、自己的生产工具，农奴和劳动有某种利害关系，这是为耕种土地并从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实物交给封建主所必需的。

私有制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剥削几乎同奴隶制度下的剥削一样残酷，不过是稍许减轻一些罢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这里已经没有私自占有生产工作者的情形，这时的生产工作者，即雇佣工人，是资本家既不能屠杀，也不能出卖的，因为雇佣工人摆脱了人身依附，但是他们没有生产资料，所以为了不致饿

死，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套上剥削的枷锁。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外，还存在着摆脱了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且这种私有制在初期是很流行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手工业企业被用机器装备起来的大工厂所代替。用农民简陋的生产工具耕作的贵族庄园，被根据农艺学经营的、使用农业机器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所代替。

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工作者比闭塞无知的农奴有文化、伶俐，能够懂得机器和正确地使用机器。因此，资本家宁愿利用摆脱农奴制羁绊、有相当文化程度来正确使用机器的雇佣工人。

可是，资本主义把生产力发展到巨大的规模以后，便陷入它解决不了的矛盾中。资本主义生产出日益增多的商品并且减低商品的价格，这样就使竞争尖锐化，使大批中小私有者破产，把他们变成无产者，缩小他们的购买力，因而使生产出来的商品无法销售出去。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并把千百万工人集合在大工厂内，这样就使生产过程具有社会性，因而破坏资本主义本身的基础，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要求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却仍然是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不相容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

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暴露出来，在危机时期，资本家由于自己使居民群众遭受破产而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得不烧掉产品，销毁成品，停止生产，破坏生产力；千百万居民则被迫失业挨饿，而这并不是由于商品不够，却是因为商品生产太多。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合社会生产力状况，它同社会生产力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孕育着革命，这个革命的使命就是要用社

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来代替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这就是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已经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动分配的。这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是不受剥削的工作者之间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

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没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没有同危机相联系的荒谬现象。

因此，生产力在这里以加快的速度发展着，因为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这样发展的充分广阔的天地。

这就是人类史上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情景。

这就是生产关系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依赖于生产工具的发展的情况，因为有这种依赖关系，所以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相应的变化和发展。

马克思说："劳动资料①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

① 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资料"，主要是指生产工具。——约·斯大林注

产…… 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卡·马克思**《资本论》1935年俄文版第1卷第121页）①

其次：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364页）②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才是停滞不动的。”（同上，第364页）③

恩格斯在说明《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说道：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恩格斯为《宣言》德文版所作的序言）④

（4）生产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新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不是离开旧制度而单独发生，不是在旧制度消灭以后，而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不是人们有意的、自觉的活动的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的。其所以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因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109页。——编者注

④ 同上，第232页。——编者注

为每一辈新人开始生活时，他们就遇到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前辈人工作的结果，因此新的一辈在最初必须接受他们在生产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现成东西，必须适应这些东西，以便有可能生产物质资料。

第二个原因，就是人们在改进这种或那种生产工具、这种或那种生产力因素时，不会意识到，不会了解到，也不会想到，这些改进将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谋得某种直接的、可以感触到的益处。

原始公社社会的某些成员在逐渐地摸索着从石器过渡到铁器的时候，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他们没有了解到，也没有意识到，向金属工具过渡意味着生产中的变革，结果一定会引起奴隶占有制度，——当时他们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和谋得眼前的感觉得到的益处，——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个人利益的狭隘范围。

欧洲年轻的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时期，除行会小作坊之外，开始建设大的工场手工业企业，从而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它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它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这种"细微的"革新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发生革命，这个革命不但会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王权，而且会打倒它的优秀人物往往梦想厕身其间的贵族，——当时资产阶级只是想要减低商品生产的费用，把更多的商品投到亚洲市场和刚发现的美洲市场，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实践的狭隘范围。

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一起加紧在俄国培植现代化机械化大工业，丝毫也不触动沙皇制度，听凭地主们宰割农民，当时，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生产力的这种巨大增长会引起怎样的**社**

会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社会生产力方面的这种巨大的飞跃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农民联合起来实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他们只是想要极度地扩大工业生产，掌握巨大的国内市场，变成垄断资本家，并且从国民经济中汲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并没有超出他们的日常实践的狭隘利益。

因此马克思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即在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约·斯大林注〉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①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页）②

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从旧生产关系到新生产关系的过渡是一帆风顺、不经过冲突、不经过震荡的。相反地，这种过渡通常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旧生产关系、树立新生产关系的办法实现的。到一定时期为止，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候为止。而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体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只有通过新兴阶级的自觉活动，只有通过这些阶级的暴力行动，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扫除。在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新社会思想、新政治设施和新政权的**巨大作用**，它们的使命就是用暴力消灭旧生产关系。在新生产力同旧生产关系冲突的基础上，在社会新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社会思想，新思想组织和动员群众，群众团结成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编者注

为新的政治大军，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并且运用这个政权，以便用暴力消灭生产关系方面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于是，自发的发展过程让位给人们自觉的活动，和平的发展让位给暴力的变革，进化让位给革命。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共产党宣言》1938 年俄文版第 52 页）①

其次：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上，第 50 页）②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资本论》1935 年俄文版第 1 卷第 603 页）③

以下就是马克思在 1859 年为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有历史意义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所作的天才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3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1 卷第 272 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 2 卷第 256 页。——编者注

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270页）①

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情形。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

选自《列宁主义问题》
第629—657页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编者注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78]上
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摘录)

(1939年3月10日)

三
联共(布)的进一步巩固

从政治路线和日常实际工作方面看来，报告所涉及的时期是我们党的总路线完全胜利的时期。(长时间热烈鼓掌)

社会主义制度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确立，在新技术基础上对工农业改造的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的提前完成，谷物的年产量达到七十亿普特的水平，贫困和失业现象的消灭，人民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的提高，——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成绩。这些成绩表明我们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

在这些宏伟的成绩面前，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的人，各种各样的"左"派和"右"派，各种各样的蜕化变质分子，如托洛茨基—皮达可夫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分子都不得不缩成一团，藏起他们那陈旧的"政纲"，而转入地下。他们没有顺从人民意志的勇气，宁愿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32]、法西斯分子同流合污，为外国谍报机关效劳，充当间谍，答应帮助苏联的敌人来分裂我们国家，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奴隶制。

这就是反对我们党的路线、后来成了人民公敌的人的可耻下场。

党粉碎了人民公敌并肃清了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中的蜕化变质分子以后，在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上更加一致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周围了。(热烈鼓掌。全体代表起立向报告人致敬。高呼："斯大林同志乌拉！斯大林同志万岁！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万岁！乌拉！")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表明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党内生活的发展、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具体材料。

1. 改善党的成分的办法。划小组织单位。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巩固党及其领导机关的工作，首先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调整党的成分，排除不可靠分子，留下优秀分子；另一方面是，划小组织单位，缩小组织规模，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的、实际的、具体的工作。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65]共代表一百八十七万四千四百八十八个党员。如果把这个数目同前一次即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66]所代表的党员数目比较一下，那就可以看出，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到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党内增加了六十万个新党员。党不能不感到，在1930—1933年的条件下，这样大批的人涌入党内，是不健康地和不恰当地扩大了党员数量。党知道，加入它的队伍的不仅有忠诚老实的人，而且还有不合格的分子，还有企图利用党的旗帜达到个人目的的野心家。党不能不知道，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党员的数量，而且首先在于党员的质量。于是就提出了调整党的成分的问题。当时决定把1933年就开始的清洗党员和预备党员

的工作继续下去，这个工作确实一直继续到1935年5月。其次，当时决定停止接收新党员，到1936年9月止，确实一直没有接收新党员，直到1936年11月1日，才恢复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其次，基洛夫同志惨遭凶杀的事件证明党内有不少可疑分子，于是当时决定审查和换发党证，这两项工作直到1936年8月底才结束。只是在此以后，党才开始接收新党员和预备党员。由于采取了这一切措施，党才肃清了自己队伍中的不合格的、消极的、有野心的和公开敌对的分子，而留下了最坚定最忠实的人。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这一届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共代表将近一百六十万个党员，就是说，比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少了二十七万个党员。但这一点坏处也没有。相反，这是在好转，因为党是靠清除本身的坏东西而巩固的。现在我们的党在党员数量上虽然少了一些，但是在质量上却更好了。

这是很大的成绩。

至于改善党的日常领导工作，使它接近基层工作和进一步具体化，那么党认为划小组织单位，缩小组织规模，是使党的机关易于领导这些组织，并使领导工作本身变得具体、生动和实际的最好办法。划小组织单位的办法，不仅在人民委员部方面实行了，而且在行政区域的组织方面，即在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和区等等方面也实行了。由于采取了各种措施，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七个加盟共和国，而是十一个加盟共和国，不是十四个苏联人民委员部，而是三十四个苏联人民委员部，不是七十个边疆区和州，而是一百一十个边疆区和州，不是二千五百五十九个市区和乡区，而是三千八

百一十五个市区和乡区。与此相适应的是，现在在党的领导机关系统中总共有以联共(布)中央为首的十一个中央委员会，六个边疆区委员会，一百零四个州委员会，三十个专区委员会，二百一十二个市委员会，三百三十六个市区委员会，三千四百七十九个乡区委员会，十一万三千零六十个基层党组织。

决不能说，划小组织单位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这一工作很可能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不管怎样，它无论在改善日常领导工作方面，或者在使领导本身接近基层的具体工作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结果。我还不去说，划小组织单位的办法使我们能够提拔成百成千的新的人才来担任领导工作。

这也是很大的成绩。

2. 挑选干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

调整党的成分，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的具体工作，这并不是而且也不能是进一步巩固党及其领导的唯一办法。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所实行的另一种巩固党的办法，就是根本改善干部工作，改善挑选干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以及在工作过程中审查干部的工作。

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当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毕竟还不够。我们所以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而是为了贯彻实行。但是要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就要有干部，就要有懂得党的政治路线、把党的政治路线当作自己的路线来接受、决心实现它、善于在实践中实现它、能够对它负责、能够捍

卫它、能够为它而奋斗的人。否则，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有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

正是在这里才产生了正确地挑选干部、培养干部、提拔新人才、正确配备干部以及按其所做的工作来审查干部的问题。

正确地挑选干部是什么意思呢？

正确地挑选干部，这还不是说要为自己找几个副手和助理，成立一个办公室，从那里发出各种指令来。(笑声)这也不是说要滥用自己的职权，毫无道理地把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调来调去，进行无休止的"改组"。(笑声)

正确地挑选干部，这就是说：

第一，要重视干部，把他们看作是党和国家最宝贵的财富，爱护他们，尊重他们。

第二，要了解干部，细心考查每个干部的优点和缺点，了解每一个干部究竟在什么岗位上才最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第三，要用心培养干部，帮助每个进步很快的工作人员不断提高，不惜花费时间耐心地"照料"这样的工作人员，加速他们的进步。

第四，要及时而大胆地提拔年轻的新干部，不让他们老在一个地方停滞不前，不让他们消沉下去。

第五，在安排工作人员的岗位时要做到使每个工作人员都各得其所，使每个工作人员都能为我们的共同事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能，使干部配备工作的总方向完全适应于它所属的那个政治路线的要求。

在这方面大胆而及时地提拔年轻的新干部的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我认为，我们的人对这个问题还不十分清楚。一些人认为在挑选干部时主要应当注重老干部。相反地，另一些人则认为主要应当注重年轻干部。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老干部当

然是党和国家的巨大财富。他们有年轻干部所没有的东西：丰富的领导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锻炼，业务知识，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第二，一部分老干部有时候喜欢一味地朝后看，迷恋过去、迷恋旧事物而不能自拔，看不见实际生活中的新事物。这就叫丧失对新事物的感觉。这是很严重很危险的缺点。至于年轻干部，他们当然没有老干部所具备的那种经验、锻炼、业务知识和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年轻干部占大多数；第二，他们年轻，暂时还没有丧失工作能力的危险；第三，他们对新事物有足够的敏感，而这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工作者的宝贵品质；第四，他们成长得快，提高得快，上进心强，所以不久就会赶上老年人，同他们并肩前进，成为无愧于他们的接班人。可见，问题不在于要注重老干部还是注重新干部，而在于贯彻执行在担负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整个班子中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相配合、相结合的方针。(长时间鼓掌)

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及时而大胆地把年轻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党在巩固党的领导方面所获得的重大成绩之一，就是它在挑选干部时，正是自下而上地、卓有成效地实行了这个把年老工作者和年轻工作者配合起来的方针。

在党中央委员会里有些材料可以说明，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提拔了五十多万个年轻的党员布尔什维克和靠近党的布尔什维克担任国家系统和党的系统的领导职务，其中有百分之二十以上是妇女。

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呢？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自下而上地挑选干部的工作完全集中起

来，并把它提到应有的、科学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高度。

为此就要取消把考查、提拔和挑选干部的工作分散于各部各科的作法，而要把它集中在一个部门。

联共(布)中央干部局，以及每一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的相应的干部部，就应当是这样的部门。

3. 党的宣传工作。对党员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借以巩固党及其领导机关的另一件很要紧很重大的工作，就是党的口头上和刊物上的宣传鼓动工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的工作，提高党及其工作人员的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

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极重要意义，关于对我们工作人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极重要意义，大概已没有必要再来大谈特谈了。我所指的，不仅是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共青团、工会、商业组织、合作社、经济组织、苏维埃组织、教育组织、军事组织及其他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调整党的成分和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的事情，尽可以做得很满意；提拔干部、挑选干部和配备干部的工作，尽可以做得很满意；这一切尽可以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却因某种缘故而搞得不好了，如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干部的工作松懈了，如果我们对提高这些干部的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削弱了，而干部本身又因此而不再关心我们的发展前途，不再了解我们事业的正确性，而变成一些前途茫茫、盲目地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的事务主义者，那么我们国家和党的整个工作就一定会削弱。在国家和党的任何一个工作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

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这要算是一个定理。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来培养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从政治上来锻炼他们，使他们能够随时判明国内外的局势，如果我们能够使他们成为有能力解决国家领导问题而不犯严重错误的十分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我们就有一切根据认为，我们所有的问题十分之九已经解决了。而这个任务，我们无疑是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有解决这个任务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和可能。

我们年轻干部的培养和形成，通常都是按各个科学技术部门，按各个专业进行的。这是必要的，适当的。没有必要使一个医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个物理学专家或植物学专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有一门科学知识却是一切科学部门中的布尔什维克都必须具备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因为，那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譬如说局限于数学、植物学或化学，而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尽管他们自称为列宁主义者，但是决不能认为他们就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列宁主义者不能仅仅是他自己所喜爱的那门科学的专家，他同时还应当是个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应当密切关心本国命运，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善于运用这些规律，并力求积极参加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当然，这对于布尔什维克专家来说是一种附加的负担。但是，这是一种大有好处的负担。

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任

务，就是要帮助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关于改进宣传工作和改进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工作的办法问题，联共(布)中央曾经多次讨论过，参加讨论的还有各州党组织中的宣传员。当时注意到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1938年9月出版的事实。当时认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为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联共(布)中央这些工作的结果曾经公布在《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安排》① 这一著名的决议中。

联共(布)中央根据这个决议，并注意到1937年联共(布)中央三月全会《论党的工作缺点》的著名决议，规定了如下一些主要办法来消除在党的宣传工作方面的缺点，并改善对党员和党的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工作：

1. 把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集中在一个部门，把各个宣传鼓动部和报刊部合并为统一的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同时在每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成立相应的宣传鼓动部；

2. 认为迷恋于在小组中进行宣传的办法是不正确的，而由党员个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方法则是比较适当的，所以必须使党集中注意报刊宣传和组织讲演宣传；

3. 在每一个州中心为我们的基层干部设立一年制的进修班；

4. 在我国许多中心城市为我们的中级干部设立两年制的列宁主义学校；

5. 在联共(布)中央下面设立三年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以培养党的具有高度理论水平的干部；

① 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分册第501—521页。——编者注

6.在我国许多中心城市设立一年制的宣传员和报纸工作人员进修班；

7.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下面为各高等学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员设立半年制的进修班。

毫无疑问，这些已经在实行但还没有充分实行的办法，一经贯彻就会立即产生良好的结果。

4.几个理论问题

必须指出，在我们的宣传和思想工作中还有一个缺点，这就是我们有些同志对几个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理论问题缺乏十分明确的认识，有一种糊涂观念。我所指的是关于国家、而特别是关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以及关于我们苏维埃知识分子的问题。

人们有时问道："我们这里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了，国内已不再有敌对阶级了，没有什么人可以镇压了，这就是说，国家已不再需要了，国家应当消亡才是，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消亡呢？为什么我们不努力取消国家呢？难道现在还不是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的时候吗？"

或者还有人这样问："我们这里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正向共产主义前进，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应当有任何国家，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消亡呢？难道现在还不是把国家送进古物陈列馆的时候吗？"

这些问题证明，发问的人是非常认真地熟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学说的个别原理。但是这些问题同时又说明，发问的同志并没有了解这一学说的实质，并没有弄清这一学说的个别原理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尤其是不了解当前的国

际环境，他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危险的事实。从这些问题中，不仅可以看出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包围的事实，而且还可以看出他们低估了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关派遣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到我们国家里来、并力图寻找时机对我国实行武装侵犯的作用和意义；从这些问题中，同样可以看出他们也低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军事机关、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免受外来侵犯所必需的那种作用和意义。必须承认，犯这种低估过失的不仅是上面所讲的那些同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全体布尔什维克毫无例外地都犯了这种过失。我们直到最近，即在1937—1938年间，才知道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的上层分子所干的间谍活动和阴谋勾当，而从材料上却可以看出，早在十月革命的初期，这些老爷就充当了外国谍报机关的间谍，并进行了阴谋活动——这难道不奇怪吗？我们怎么会忽视这样严重的事情呢？这个过失应该如何解释呢？人们通常总是这样来回答：我们没有料到这些人竟会堕落到这样卑鄙的地步。可是，这不能算是解释，尤其不能当作辩护的理由，因为我们犯了过失的事实始终是事实。那么这一过失应该如何解释呢？这一过失应当这样来解释：人们低估了我们周围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谍报机关的力量和意义，它们竭力利用人们的弱点，利用人们的虚荣心，利用人们的无气节而把他们网罗到自己的间谍网中，用他们来包围我们苏维埃国家机关。这一过失应当这样来解释：人们低估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和我们国家的侦察机关的作用和意义，低估了这个侦察机关，却胡说什么苏维埃国家的侦察机关是不值一提和无关紧要的东西，胡说什么苏维埃侦察机关也和苏维埃国家本身一样，很快就要被送进古物陈列馆去。

我们的这种低估态度，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呢？

这种态度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某些一般原理还有不完善和不充实的地方而产生的。它所以能够流行起来，是因为我们对国家理论中的一些问题抱着一种不能容许的疏忽态度，虽然我们二十年来的国家活动的实际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进行理论总结的丰富材料，虽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顺利地弥补这个理论上的缺陷。我们忘记了列宁的一个极重要的指示，他认为我们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有义务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于这点，列宁说道：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卷第492页)①

例如，我们看一看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论的经典性的公式：

"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弗·恩格斯**《反杜林论》1933年党的出版社版第202页)②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3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321页。——编者注

恩格斯的这个原理是否正确呢？

是的，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在具有下面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条件时才是正确的：(一) **如果**仅仅从一国内部的发展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而预先撇开国际因素，并且为了便于研究起见，把它看作是一个离开国际环境而孤立存在的国家；或者是(二) **如果**假定社会主义已经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的包围已经代替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外来侵犯的威胁已不再存在，军队和国家已没有必要加强。

可是，假如社会主义仅仅是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获得了胜利，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撇开国际条件不顾，那又应当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的公式没有给予回答。恩格斯本来就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因此他也就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恩格斯是从社会主义已经大致同时地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这个假定出发的。所以，恩格斯在这里研究的并不是某一国的某个具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假定社会主义已在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的条件下的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其公式是："假定社会主义已在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试问：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发生怎样的变化？"只是因为问题带有这样一般的抽象的性质，所以恩格斯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时，完全撇开了象国际条件、国际环境这样的因素。

但是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不能把恩格斯关于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的一般公式，推广运用到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的这种个别的具体的情况，这个国家还受着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受着外来武装侵犯的威胁，因此不能撇开国际环境不顾，它应当拥有训练得很好的军队，组织得很好的惩罚机关和坚强的侦察机关，因而应当拥有自己的十分强有力的国家，以便保护社会主

义的成果免受外来的侵犯。

不能要求距今四十五至五十五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到每一个别国家在遥远的将来所发生的所有一切历史曲折。如果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每一个别国家在五十至一百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理论问题都给我们作出现成答案，使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来咀嚼这些现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全场大笑)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要求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局限于背熟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而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学会经常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存在二十年的经验，最后，并学会根据这个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使其更加确切和完善。列宁在1917年8月，即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成立以前的几个月，写了他那部名著《国家与革命》。列宁认为他这部著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学说，使它不被机会主义者歪曲和庸俗化。列宁本来还打算写《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第二部分，以便把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毫无疑问，列宁想在他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里根据苏维埃政权在我国存在的经验，来进一步探讨和发展关于国家的理论。可是，他的逝世使他未能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列宁所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业，应该由他的学生们来完成。(热烈鼓掌)

国家是在社会分裂为敌对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的产生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来控制多数被剥削者。国家政权的工具，主要集中于军队、惩罚机关、侦察机关和监狱。国家的活动表现为两种基本的职能：内部的(主要的)职能是控制多数被剥削者；外部的(非主要的)职能是靠侵略别国领土来扩大本国统治阶级的领土，或者是保护本国的领土不受别国的侵犯。从前的奴隶占有

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情形是这样。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形也是这样。

要推翻资本主义，不仅必须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权，不仅必须剥夺资本家，而且还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打碎它的旧军队、它的官僚机构、它的警察机关，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新的无产阶级国家不能够保存某些根据无产阶级国家需要而改变过的旧国家的职能。尤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应当始终不变，我们国家的一切原有职能在将来也应当完全保存下去。事实上，由于我国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将来还会发生变化。

列宁说得完全对：

"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393页)①

自十月革命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中，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月革命起到各剥削阶级被消灭为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镇压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反抗，组织国防以抵御武装干涉者的侵犯，恢复工业和农业，准备条件消灭资本主义分子。因此我们的国家在这个时期中实现了两个基本的职能。第一个职能是镇压国内被推翻了的阶级。这一点使我们的国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00页。——编者注

家在外表上和从前的国家很相似，因为从前那些国家的职能也是要镇压不顺从的人，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为了多数劳动者的利益来镇压少数剥削者，而从前的国家却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来镇压多数被剥削者。第二个职能是保卫国家以防外来的侵犯。这一点也使我们的国家在外表上和从前的国家很相似，因为从前的国家也用武装保护自己，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国家反对外来的侵犯是为了保护大多数劳动者的成果，而从前的国家反对外来的侵犯，却是为了保护少数剥削者的财富和特权。这里还有第三个职能，这就是我们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其目的是要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人。不过，这个新的职能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得到重大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从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起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全胜利和通过新宪法为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全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最后残余，组织文化革命，组织完全现代化的军队来保卫国家。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也因此而改变了。在国内实行武力镇压的职能已经消失了，消亡了，因为剥削制度已被消灭，剥削者已不存在，再没有什么人需要镇压了。代替镇压职能的，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免受盗贼和人民财富盗窃者损害的职能。武装保护国家以防外来侵犯的职能则完全保存着，因此红军、海军以及为缉捕和惩罚外国谍报机关派到我国来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需的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也都保存着。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仍然保存着，而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于我们的军队、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那么它们的矛

头已经不是针对国内，而是针对国外去对付外部敌人了。

由此可见，我国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并且按其形式和职能来说是和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不相同的。

但是，发展过程不能就此停止。我们还要前进，向共产主义前进。那么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在共产主义时期也要保存下来呢？

是的，要保存下来，假如那时资本主义的包围尚未消灭，假如那时外来的武装侵犯危险尚未消除的话。同时很明显的是，我们国家的形式，又会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不，不被保存下来而要消亡下去，假如那时资本主义的包围已经消灭，假如那时社会主义的包围已经代替资本主义的包围的话。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情形，就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就是苏维埃知识分子问题。

对这个问题，象对国家问题一样，在我们党内也存在一些模糊见解和糊涂观念。

虽然党对苏维埃知识分子问题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我们党内却依然流行着一种敌视苏维埃知识分子而与党的立场不能相容的观点。大家知道，持有这种不正确观点的人以藐视和鄙弃态度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一种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的确，知识分子在苏维埃发展时期，无论是在成分方面或地位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不仅接近人民，而且和人民真诚合作，这是他们与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则区别。可是，这些同志看来是根本没有考虑这一点的。他们依然弹着老调，错误地用旧的观点和态度来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持这样的观点和态度在从前是有理由的，因为那时知识分子是为地主和资本家服务的。

在从前，在革命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界首先是由有产阶级，即贵族、工业家、商人和富农等出身的人组成的。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也有小市民、小官吏、甚至农民和工人出身的人，可是他们没有而且也不能在其中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当时整个知识界都是由有产阶级供养并为它们服务的。因此，当时我国的革命分子，首先是工人，对知识分子怀着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甚至往往变成一种仇视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固然，旧知识分子中也产生了几个甚至几十个勇敢而革命的人物，他们接受了工人阶级的观点，并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结起来。但是这样的人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毕竟为数太少了，所以他们并不能改变整个知识界的面貌。

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被粉碎以后，特别是在工业化和集体化事业胜利以后，当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已创造了实际条件，使国家能够制定和实施新宪法的时候，知识分子的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旧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一部分人，还在十月革命的初期就脱离了其余的知识分子群众而反对苏维埃政权，并实行怠工。这一部分人因此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了。后来，其中保全下来的大多数人都被我国的敌人召募去做暗害分子和间谍，从而自绝于知识分子的队伍。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另一部分人，在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等候"好日子"的到来，但是后来他们看来是不抱什么希望了，这才决定去供职，决定和苏维埃政权和睦相处。现在旧知识分子中的这一类人，大部分都已经年老了，已开始丧失其工作能力。旧知识分子中的第三部分人，主要是比前一部分人的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靠拢人民，拥护苏维埃政权。他们须要补习，而他们也确实在我们

的高等学校里进行了补习。但是，与旧知识分子这种分化瓦解的痛苦过程同时进行的，还有新知识分子力量形成、动员和积聚的蓬蓬勃勃的过程。几十万从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出身的年轻人，进入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他们毕业后就补充了知识分子的人数减少了的队伍。他们为知识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并用新的方式，用苏维埃的方式使知识界复活起来。他们按照自己的模样彻底改变了知识界的整个面貌。旧知识分子的残余已溶解在新的、苏维埃的、人民的知识分子中了。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人民有密切联系，其中大多数人都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结果，我国现在就有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它无论在成分方面或社会政治面貌方面，都和旧的资产阶级知识界根本不同。

对于旧的、革命前的、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知识分子，完全适用关于知识分子的旧理论，即指出必须不信任他们并与他们进行斗争的理论。现在，这个理论已经过时了，已经不适用于我们的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了。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必须采用新的理论，即指出必须对他们采取友好态度，关怀他们，尊重他们，同他们合作，以便为工人阶级和农民谋福利的理论。

这看来是很明白的。

尤其使人感到惊讶和奇怪的是，虽然知识分子的状况发生了这一切根本的变化，可是在我们党内竟然还有人企图把那种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旧理论，用来对待我们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对待这个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原来，这些人武断地认为，那些不久前还是按斯达汉诺夫方式在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工作的工人和农民，后来一被送到高等学校里去受教育，就不再是真

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这样说来，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情。(笑声) 我们想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而且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照这些奇怪的同志看来，我们的这种计划竟包含着莫大的危险，因为在工人和农民一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以后，他们就有被列入第二等人的危险。(全场大笑) 也许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落到颂扬落后、无知、愚昧的地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理论上的错误从来没有使人得到好处，而且也不会使人得到好处。

关于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形就是这样。

*　　*

*

在进一步巩固党的方面，我们的任务是：

1.不断地改善党的成分，提高党员的觉悟程度，通过个别挑选的方式，只将那些经过考验的、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接收入党；

2.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从而使它们的领导工作日益实际和具体，日益减少忙于开会和文牍主义的情况；

3.把挑选干部的工作集中起来，关心对干部的培养，细心地考查工作人员的优点和缺点，更大胆地提拔年轻的工作人员，使挑选干部和配备干部的工作适应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

4.把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集中起来，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提高我们干部的理论水平，加强我们干部的政治锻炼。

选自《列宁主义问题》
第690—709页

广 播 演 说

（1941 年 7 月 3 日）

同志们！公民们！

兄弟姊妹们！

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

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向你们讲话！

希特勒德国从 6 月 22 日起向我们祖国发动的背信弃义的军事进攻，正在继续着。虽然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敌人的精锐师和精锐空军部队已被击溃，被埋葬在战场上，但是敌人又向前线投入了新的兵力，继续向前进犯。希特勒军队侵占了立陶宛全境、拉脱维亚的大部地区、白俄罗斯西部地区、乌克兰西部一部分地区。法西斯空军正在扩大其轰炸区域，对摩尔曼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斯摩棱斯克、基辅、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等城市大肆轰炸。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我们光荣的红军怎么会让法西斯军队占领了我们的一些城市和地区呢？难道德国法西斯军队真的象法西斯的吹牛宣传家所不断吹嘘的那样，是无敌的军队吗？

当然不是！历史表明，无敌的军队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拿破仑的军队曾被认为是无敌的，可是这支军队却先后被俄国的、英国的和德国的军队击溃了。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威廉的德国军队也曾被认为是无敌的军队，可是这支军队曾经数次败

在俄国军队和英法军队的手中，终于被英法军队击溃了。对于现在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军队也应当这样说。这支军队在欧洲大陆上还没有遇到过重大的抵抗。只是在我国领土上，它才遇到了重大的抵抗。既然由于这种抵抗，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精锐师已被我们红军击溃，这就是说，正象拿破仑和威廉的军队曾经被击溃一样，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也是能够被击溃的，而且一定会被击溃。

至于说我们的一部分领土毕竟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了，这主要是由于法西斯德国的反苏战争是在有利于德国军队而不利于苏联军队的情况下发动的。问题就在于，德国军队是进行着战争的国家的军队，它已经全部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德国用来进攻苏联并且集结到苏联边境的一百七十个师已经完全处于战备状态，只等进攻的信号了；而当时苏联的军队还需要进行充分动员，还需要向边境集结。这里还有一个情况起了不小的作用，就是法西斯德国不顾它会被全世界认为是进攻一方，而突然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它同苏联在1939年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显然，我们爱好和平的国家是不愿意首先破坏条约的，因此也就不能走上背信弃义的道路。

也许有人要问：苏联政府怎么会同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普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和恶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犯了错误？当然没有犯错误！互不侵犯条约是两国之间的和平条约。1939年德国向我们提出的正是这样的条约。苏联政府能不能拒绝这样的建议呢？我想，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不能拒绝同邻国缔结和平协定，即使这个国家是由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普这样一些吃人魔鬼领导的。当然，这是在一个必要的条件下缔结的，即和平协定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触犯爱好和平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荣誉。大家知道，德国同苏联订立的互不

侵犯条约正是这样的条约。

我们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得到了些什么呢？我们保证我国获得了一年半的和平，使我国有可能准备好自己的力量，在法西斯德国胆敢冒险违反条约进攻我国的情况下予以反击。这肯定是我们有所得，而法西斯德国有所失。

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撕毁条约，进攻苏联，得到了些什么，又失掉了些什么呢？这使它的军队在短期内取得了某种有利的地位，可是它在政治上却输了，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是血腥的侵略者。毫无疑问，德国在军事上暂时有所得，只是偶然因素，而苏联在政治上大有所得，却是重大的长久的因素，在这个基础上，红军在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胜利必将日益扩大。

正因为如此，我们全体英勇的陆军，我们全体英勇的海军，我们全体的飞行员——我们的雄鹰，我国各族人民，欧洲、美洲、亚洲所有的优秀人士，以及德国所有的优秀人士，都谴责德国法西斯分子的背信弃义行为而同情苏联政府，赞同苏联政府的行为，并且认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一定会被击溃，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由于强加于我们的战争，我国已经同最凶恶而阴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国军队正在同以坦克和飞机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英勇作战。红军和红海军正在克服重重困难，为保卫每一寸苏联国土而奋不顾身地战斗。拥有数千辆坦克和数千架飞机的红军主力正在投入战斗。红军战士的勇敢精神是举世无双的。我们对敌人的抗击日益加强。全体苏联人民都同红军一道奋起保卫祖国。

为了消除我们祖国面临的危险，需要做些什么呢？为了粉碎

敌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首先必须使我们苏联人了解到威胁我国的危险的严重程度，坚决克服泰然自若、漠不关心的心理，克服和平建设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战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当战争使形势根本改变了的时候，就是十分有害的了。敌人是残酷无情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侵占我们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土地，掠夺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粮食和石油。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地主政权，恢复沙皇制度，摧残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摩尔达维亚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以及苏联其他各自由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国家制度，把他们德意志化，把他们变成德国王公贵族的奴隶。因此，这是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享受自由还是沦为奴隶的问题。必须使苏联人了解这一点，不要再漠不关心，必须使他们动员起来，把自己的全部工作转到新的、战时的轨道上来，拿出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气概。

其次，必须使怨天尤人的人和怕死鬼、惊惶失措分子和逃兵在我们的队伍中毫无容身之地，使我们的人在斗争中无所畏惧，并且奋不顾身地投入我们反法西斯奴役者的卫国解放战争。我们国家的缔造者伟大的列宁曾经说过，苏联人的基本品质应当是在斗争中勇敢、大胆、不知畏惧、决心同人民一起为反对我们祖国的敌人而战斗。必须使布尔什维克的这种优良品质成为红军、红海军以及苏联各族人民中千百万人所具有的美德。

我们应当立即把我们的全部工作都转到战时的轨道上来，使一切都服从于前线的利益，都服从于粉碎敌人的组织任务。苏联各族人民现在都看到，德国法西斯主义对保证全体劳动者享有自

由劳动和美好生活的我们的祖国，是咬牙切齿、极为仇视的。苏联各族人民应当奋起反对敌人，保卫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国土。

红军、红海军和苏联全体公民都应当捍卫每一寸苏联国土，应当为保卫我国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应当表现出我国人民所固有的勇敢、主动和机智。

我们应当组织对红军的全面支援，保证大力补充红军队伍，保证供应红军一切必需品，组织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迅速运输，以及广泛救护伤员。

我们应当巩固红军的后方，使全部工作都服从于这个事业的利益，做到一切企业都能加紧工作，生产更多的步枪、机枪、火炮、子弹、炮弹、飞机，组织对工厂、电站、电话和电报通信设施的警卫工作，整顿地方防空事宜。

我们应当对一切扰乱后方分子、逃兵、惊惶失措分子和造谣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消灭间谍、破坏分子和敌人的伞兵，在这些方面及时地协助我们的铆奸营。必须注意到，敌人是阴险狡猾的，善于欺骗和造谣。必须估计到这一切，不要受敌人的挑拨。凡是因惊惶失措和贪生怕死而有害防务的人，不论是谁，都应当立即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当红军部队不得不撤退时，必须运走全部铁路机车车辆，不给敌人留下一部机车、一节车厢，不给敌人留下一公斤粮食、一公升燃料。集体农庄庄员应当把所有的牲畜赶走，把粮食交给国家机关保管，以便运到后方。凡是不能运走的一切贵重物资，其中包括有色金属、粮食和燃料等，都应当绝对销毁。

在敌占区，必须建立骑兵和步兵游击队，建立破坏小组，以便同敌军部队斗争，以便遍地燃起游击战争的烽火，以便炸毁桥梁、道路，破坏电话和电报通信设施，焚毁森林、仓库和辎重。在沦陷

区，要造成使敌人及其所有走狗无法安身的条件，步步追击他们，消灭他们，破坏他们的一切活动。

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绝不能看成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战争。它同时是全体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战争。这场反法西斯压迫者的全民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而且还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在这场解放战争中，我们不是孤立的。在这场伟大战争中，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受希特勒头目们奴役的德国人民，将是我们可靠的同盟者。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将同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他们的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这将是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奴役和奴役威胁而结成的统一战线。因此，英国首相邱吉尔先生关于支援苏联的历史性的演说和美国政府关于准备援助我国的宣言，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苏联各族人民对此只能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我们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趾高气扬的敌人很快就一定会相信这一点。同红军一道对进犯我国的敌人奋起作战的，有成千成万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我国千百万人民群众都将奋起作战。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劳动者已经开始成立有成千上万人的民兵队伍来支援红军。在我们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卫国战争中，在每一个遭到敌人侵犯危险的城市里，我们都应当成立这样的民兵队伍，发动全体劳动者起来斗争，挺身捍卫自己的自由、自己的荣誉、自己的祖国。

为了迅速动员苏联各族人民的一切力量，抗击背信弃义地进犯我们祖国的敌人，国防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它现在把国家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国防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它号召全国

人民团结在列宁—斯大林党的周围，团结在苏联政府的周围，以忘我的精神支援红军和红海军，粉碎敌人，争取胜利。

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来支援我们英勇的红军和我们光荣的红海军！

用人民的一切力量来粉碎敌人！

为争取我们的胜利，前进！

选自《斯大林文选》
第 262—268 页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 55 号。1942 年 2 月 23 日于莫斯科）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游击队员同志们！

我国各族人民是在反对卑鄙无耻地侵犯我们祖国的生存和自由权利的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的严酷日子里，庆祝红军建军二十四周年的。在从北冰洋到黑海的辽阔战线上，红军和红海军战士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以便把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从我国驱逐出去，捍卫我们祖国的荣誉和独立。

红军抗击敌人侵略，保卫祖国，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二十四年前建立红军，就是为了同当时力图瓜分我国、使我国丧失独立的外国武装干涉者的侵略军队作斗争。年轻的红军在初次作战时，在 1918 年 2 月 23 日，就在普斯科夫和纳尔瓦附近彻底粉碎了德国侵略者。所以 1918 年 2 月 23 日就成为红军的诞生日。从此以后，红军就在同外国武装干涉者作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它在 1918 年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中，捍卫了我们的祖国，把德国侵略者驱逐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它在 1919—1921 年同协约国军队作战中，捍卫了我们的祖国，把他们驱逐出我们国境。

由于在国内战争中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者，所以苏联各族人民得到了长期的和平和进行和平建设的条件。在这二十年的和平建设时期，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和集体农业，繁荣了科学和文

化，巩固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但是苏联人民从来没有忘记敌人有可能再来侵犯我们祖国。所以随着工农业和科学文化的高涨，苏联的军事实力也加强了。这个实力是某些喜欢侵占别国领土的人已经亲身领略过的。嚣张一时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现在正在领略这个实力。

八个月以前，法西斯德国蛮横无耻地破坏了互不侵犯条约，背信弃义地进犯我国。敌人估计，红军将一触即溃，并丧失抵抗力。可是敌人大大地失算了。他们没有估计到红军的力量，没有估计到苏联后方的巩固，没有估计到我国各族人民争取胜利的意志，没有估计到法西斯德国的欧洲后方不可靠，最后，也没有估计到法西斯德国及其军队内在的虚弱。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由于德国法西斯突然进犯，红军曾被迫退却，放弃一部分苏联领土。但是在退却时，红军消耗了敌人的兵力，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无论是红军战士还是我国各族人民都没有怀疑过，这种退却只是暂时的，敌人一定会被阻止，然后被击溃。

在战争过程中，红军不断汲取了新的活力，补充了人员和技术装备，得到了新的预备队师的加强。于是红军在辽阔战线的重要地段上转入进攻的时机来到了。在短时间内，红军就在顿河岸罗斯托夫和在提赫文附近，在克里木和在莫斯科附近，给了德国法西斯军队一个又一个的打击。在莫斯科附近的激战中，红军击溃了德国法西斯军队，解除了苏联首都被围的威胁。红军击退了莫斯科附近的敌人，并迫使敌人继续向西退却。莫斯科州和图拉州的全部以及暂时被敌人占领的其他州的几十个城市和几百个乡村，都已经从德国侵略者的铁蹄下完全解放出来了。

现在德国军队已经没有战争最初几个月里那种由于背信弃义

突然进攻所造成的军事优势了。作为德国法西斯军队一种潜力的突然性因素，已经完全消失。于是德国法西斯分子突然进攻所造成的战争条件的不均等状态也就消除了。现在战争的命运不会由突然性这种偶然因素来决定，而要由那些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后方的巩固性，军队的士气，师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装备，军队指挥人员的组织能力来决定。这里必须指出一点：当突然性这个因素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武库中刚一消失，这个军队就濒于覆灭了。

德国法西斯分子认为他们的军队是无敌的，断言在同红军单独作战时，一定能击溃红军。现在红军是单独对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不但如此，德国法西斯军队还有意大利、罗马尼亚和芬兰的军队在前线上的直接支援。红军则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支援。然而结果是：嚣张一时的德国军队正在遭受失败，红军却正在取得重大的胜利。德军在红军的强大打击下，正在向西逃窜，人员和技术装备受到巨大损失。他们节节顽抗，力图拖延他们覆灭的日子。但是敌人是徒劳的。现在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军手里，希特勒的这部松散生锈的机器，无论怎样拚命挣扎，也挡不住红军的攻击。不久以后，红军就会以强大的打击，赶走列宁格勒附近的野兽般的敌人，肃清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卡累利阿的城市和乡村中的敌人，解放苏维埃的克里木，那时红旗将重新在整个苏联领土上胜利地飘扬。

但是，如果满足于既得的胜利，以为德军已经不足为患，那就是不可饶恕的目光短浅的表现，那就是苏联人所不应有的虚夸和骄傲。不要忘记，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敌人虽然遭受着失败，但是还没有被粉碎，更没有被彻底消灭。敌人还是强有力的。它将鼓起最后的力量去争取胜利。并且它愈是失败，就愈加凶残。所以我国一分钟也不能放松组织后备力量支援前线的工作。必须

使源源不断的新部队开赴前线，打击野兽般的敌人，争取胜利。必须使我们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加倍努力地生产。必须使前线获得日益增多的坦克、飞机、火炮、迫击炮、机枪、步枪、自动枪和弹药。

这就是红军的力量和威力的主要源泉之一。

但是红军的力量不仅仅在于这一点。

红军的力量首先在于，它进行的不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的战争，而是解放的、正义的卫国战争。红军的任务是解放被德国侵略者占领的苏联领土；解放遭受德国侵略者压迫的我国城乡的居民，这些居民在战前是自由的，过着人的生活，而现在则遭到压迫和掠夺，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痛苦；红军还要解放遭受德国法西斯恶魔侮辱和欺凌的我国妇女。试问还有什么能比这种任务更高尚更光荣呢？但是，没有一个德国兵能够说他是进行着正义的战争，因为他不能不看到，他是被迫去为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而作战的。德国士兵没有能鼓舞他、能使他引为自豪的高尚光荣的战争目的。相反地，任何一个红军战士都能自豪地说，他是进行着正义的解放战争，进行着捍卫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战争。红军有鼓舞他们建立功勋的高尚光荣的战争目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在卫国战争中，涌现出成千成万为祖国的自由誓死奋战的英雄。

红军的力量就在于此。

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虚弱也就在于此。

有时外国报刊胡说什么红军的目的是要消灭德意志民族和消灭德意志国家。这当然是一种笨拙的谎言和对红军的愚蠢的诬蔑。红军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愚蠢的目的。红军的目的，就是要把德寇驱逐出我国和解放被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占领的苏联领土。解放苏联领土的战争，很可能导致希特勒匪帮的垮台或者覆灭。

这种结局我们是欢迎的。可是，如果把希特勒匪帮同德意志民族混为一谈，同德意志国家混为一谈，那就很可笑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希特勒之流可以上台下台，而德意志民族、德意志国家依然存在。

最后，红军的力量在于，它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对于其他民族的种族仇恨，对于德意志民族也是一样；红军是按照各民族、各种族一律平等的精神，按照尊重其他民族权利的精神教育出来的。德国人的种族理论和种族仇恨的实践，使得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都成为法西斯德国的敌人。苏联的种族平等理论和尊重其他民族权利的实践，则使得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都成为苏联的朋友。

红军的力量就在于此。

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虚弱也就在于此。

有时外国报刊胡说什么苏联人所以仇恨德国人，就因为他们是德国人；红军所以消灭德国士兵，就因为他们是德国人，就因为仇恨德国的一切；因此红军抓住德国兵就杀掉。这当然是同样的笨拙的谎言和对红军的愚蠢的诬蔑。红军没有种族仇恨心理。它没有这种卑劣情绪，因为它是按照种族平等和尊重其他民族权利的精神教育出来的。此外，还不要忘记，在我国，表现种族仇恨的行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但是既然德国法西斯侵略军想奴役我们祖国，那么当他们已经被我军合围而又不肯缴械投降时，红军当然只好消灭他们。红军消灭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德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想奴役我们祖国。红军同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一样，有权利而且有义务来消灭奴役自己祖国的匪徒，而不问他们属于哪一个民族。不久以前，在加里宁、克林、苏希尼契、安德列阿波尔和托罗彼茨等城市，当德军守备部队已经被我军合围时，我军曾建议他们投降并且答应在他

们投降后保全他们的生命。可是德军守备部队竟拒绝缴械投降。自然，只好用武力把他们赶走，于是就有不少的德国兵被打死了。战争总是战争。如果德军官兵愿意投降，那么红军就接收他们为俘虏，并保全他们的生命。如果德军官兵拒绝投降，而且还手持武器企图奴役我们祖国，那时红军自然就要消灭他们。请想一想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话吧："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①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游击队员同志们！我向你们祝贺红军建军二十四周年！希望你们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红军和红海军万岁！

游击队员万岁！

我们光荣的祖国，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

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伟大的列宁的旗帜万岁！

在列宁的旗帜下前进，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选自《斯大林文选》
第289—294页

① 马·高尔基的这句名言，是他发表在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见《高尔基论文选集》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25—128页）。——编者注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1946年2月9日）

主席：

现在请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讲话。

（斯大林同志一走上讲台，选民就热烈欢呼，欢呼持续了几分钟。大剧院内全体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场内不断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伟大的斯大林万岁，乌拉！""亲爱的斯大林乌拉！"）

斯大林同志：

同志们！从上届最高苏维埃选举到现在，已经八年了。这是一个富有极重大事件的时期。前四年是苏联人民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紧张工作的年份。后四年包括了同德国侵略者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战争的事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变。战争无疑是过去这一时期的主要事情。

如果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偶然发生的，或者是由于某些国家领导人犯了错误而发生的，那就不正确了，虽然错误确实是有过的。其实，这次战争是世界各种经济和政治势力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平稳地均衡地向前发展，而是经历着危机

和战祸的。问题在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通常经过相当时期就要剧烈破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均势，那些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就要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求有利于自己。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就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而进行战争。

如果这些国家能根据它们的经济实力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定期重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那也许能避免战祸。但是这在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一次危机的结果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危机的结果就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当然不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按其性质来说，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同的。要知道，主要的法西斯国家，即德日意三国，在侵犯同盟国之前，就把自己国内最后一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残余消灭净尽，在自己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蹂躏了各小国的主权和自由发展原则，宣布侵占他国领土是自己的国策，并公开声明他们要取得世界霸权，要在全世界推行法西斯制度，而且轴心国又以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中部地区的事实，表明他们决心把奴役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这种口头威胁变成现实。因此，反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的性质，它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恢复民主自由。苏联参加反轴心国的战争，只能加强——并且确实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的和解放的性质。

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苏美英以及其他爱好自由国家的反法西斯同盟，而这个同盟后来在粉碎轴心国武装力量方面起了决定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性质，就是这样。

现在，大概谁都承认：这次战争确实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各国人民生活中的一种偶然现象；它实际上成了各国人民为保护自身生存而进行的战争，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是一个速决的、闪电式的战争。

对于我国说来，这次战争是我们祖国历史上最残酷最艰苦的战争。

但是这次战争并不只是一件可诅咒的事情。它同时又是考验和检查人民一切力量的伟大学校。这次战争暴露了后方和前线的一切真情实况，无情地揭掉了遮住各个国家、各国政府以及各个政党真面目的种种掩盖物，使它们不戴面具、毫无粉饰地登上舞台，显露出它们的所有短处和长处。这次战争可以说是对我们苏维埃制度，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政府以及对我们共产党举行了一次考试，对他们的工作做了一个总结，好象是对我们说：看吧，这就是你们的人和组织，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和活动，——请仔细查看查看他们，并按他们的工作情况给以报偿吧。

这就是这次战争的好处之一。

这个情况，对我们选民说来，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和客观地评价党及其人物的活动，并作出正确的结论。要是在别的时期，就必须研究和分析党的代表人物的演说和报告，把他们的言论和行为两相对照，作出总结等等。这就需要进行一番复杂而困难的工作，并且还不能担保这中间不犯什么错误。现在却是另一种情形了，因为战争已经结束，而战争本身已经检查了我们各个组织和领导人的工作并且作出了总结。现在我们要把事情弄清楚并做出正确的结论，就容易得多了。

那么，战争的总结究竟怎样呢？

这里有一个主要的总结，所有其他的总结，都是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作出来的。这个总结就是，战争的结局是敌人失败，而我国和我们的盟国得胜。我们以彻底打败敌人结束了战争，——这就是这次战争的主要总结。但是这个总结太一般了，所以我们决不能以此为限。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史无前例的战争中打败敌人，这就意味着争得了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这毕竟还是一个一般的总结，我们也就不能满足于这一点。为了认识我们这次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就要更具体地来考察这个问题。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认识我们这次所取得的对敌人的胜利，从我国内部力量的状况和发展来看，这次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火中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

大家知道，在外国报刊上有人不止一次地断言，说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冒险试验”，说苏维埃制度在实际生活中没有根基，是肃反委员会机关强加于人民的一座“纸牌搭的小房子”，说只要有人从外面稍微推一下，这座“纸牌搭的小房子”就会完全倒塌。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次战争驳倒了外国报刊上这一切毫无根据的断语。战争表明，苏维埃社会制度是从人民中间生长起来并受到人民极力拥护的真正的人民的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有充分生命力的和稳固的社会组织形式。

不仅如此。现在所讲的已经不是苏维埃社会制度有没有生命力的问题，因为经过这次战争的明显的教训以后，任何一个抱怀疑态度的人都不敢再怀疑苏维埃社会制度的生命力了。现在所讲

的是，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

第二，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国家制度，我们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经住了战争的一切考验，证明它是富有生命力的。

大家知道，外国报刊上的著名人物不止一次地声称，说苏维埃多民族国家是一个“人工造成而不合实际的建筑物”，说一旦发生某种麻烦，苏维埃联盟的崩溃就是不可避免的，说苏维埃联盟一定会遭到奥匈帝国那样的命运。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次战争驳倒了外国报刊上这些毫无根据的议论。战争表明，苏维埃多民族国家制度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它在战争时期更加巩固了，证明它是具有充分生命力的国家制度。这些先生没有了解到，拿我们的国家和奥匈帝国相提并论，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们的多民族国家并不是在挑起民族间的猜忌和敌视的那种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苏维埃制度和资产阶级制度相反，它培植着我国各族人民相互友爱和兄弟般合作的感情。

不过，经过这次战争的教训以后，这些先生再也不敢否认苏维埃国家制度的生命力了。现在所讲的已经不是苏维埃国家制度有没有生命力的问题，因为它的生命力是不容置疑的。现在所讲的是，苏维埃国家制度是多民族国家的模范，苏维埃国家制度是把民族问题和各民族合作的问题解决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好的国家组织体系。

第三，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苏维埃的武装力量，是我们的红军，它以英雄的气概经受了战争的一切艰难困苦，彻底粉

碎了敌人的军队，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有人高呼："是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胜利的！"全体起立，热烈鼓掌，经久不息，转为欢呼）

现在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一致承认红军胜任自己所担负的伟大使命。但是在五六年以前，也就是在战争前夜，却不是这种情形。大家知道，当时外国报刊上的许多著名人物和外国许多公认的军事权威都不止一次声言，说红军的状况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说红军装备差，而且没有真正的指挥人员；说红军士气低得不成样子；说红军也许适于防御，但是决不适于进攻；说红军一遭到德军打击，就会象一个"泥足巨人"一样坍塌。这种议论不仅在德国有，而且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也有。

现在我们可以说，战争驳倒了这些毫无根据的可笑的议论。战争表明，红军并不是"泥足巨人"，而是拥有完全现代化的装备、非常老练的指挥人员以及优良的精神素质和战斗素质的现代头等军队。不要忘记，正是红军彻底粉碎了不久前还使欧洲各国军队胆战心寒的德国军队。

应当指出，这些评论红军的"批评家"愈来愈少了。不但如此，目前外国报刊上出现了愈来愈多的评论，赞扬红军的优良素质，赞扬红军的战士和指挥员的技术，赞扬红军战略、战术十分完善等等。这是很自然的。既然红军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在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在基辅和基洛沃格勒，在明斯克和博勃鲁伊斯克，在列宁格勒和塔林，在雅西和利沃夫，在维斯瓦河和涅曼河，在多瑙河和奥得河，在维也纳和柏林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当然也就不能不承认红军是很值得人们学习的头等军队了。（热烈鼓掌）

我们就是这样来具体地认识我国这次取得的对敌人的胜利的。

这次战争的总结，基本上就是这样。

假如以为不必预先使全国做好积极防御的准备，就能够获得这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那就错了。假如以为在一个很短的期间，在三四年以内就能够做好这种准备，那同样是错误的。假如以为我们获得胜利只是由于我国军队勇敢，那就更加错误了。没有勇敢精神，固然不能获得胜利。但是单靠勇敢精神，也还打败不了军队众多、装备优良、军官训练有素和供应良好的敌人。要能经住这样一种敌人的打击，并且给以回击，最后彻底打败敌人，那么除了我国军队那种无比的勇敢精神以外，还必须有完全现代化的并且是数量充足的装备，以及组织得很好的并且也是数量充足的供应。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而且是在数量上充分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的东西：制造武器、装具和企业设备用的**金属**，维持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用的**燃料**，制作军服用的**棉花**以及供给军队的**粮食**。

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已经拥有为基本上满足这些需要所绝对必需的物质条件呢？我认为是可以这样肯定地说的。为了准备这一宏伟的事业，必须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的三个五年计划。正是这三个五年计划帮助我们创造了这些物质条件。无论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在1940年，我国在这方面的情形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比1913年要好几倍。

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拥有怎样的物质条件呢？

为了帮助你们弄清这点，我现在把共产党在使我国做好积极防御方面所做的准备工作，简略地报告一下。

如果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1940年的材料来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1913年的材料比较一下，我们便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在1913年，我国生产了四百二十二万吨**生铁**，四百二十三万吨**钢**，二千九百万吨**煤**，九百万吨**石油**，二千一百六十万吨**商品谷物**，七十四万吨**籽棉**。

这就是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拥有的物质条件。

这就是旧俄可以用来进行战争的经济基础。

至于说到1940年，那么，我国在这一年里生产了一千五百万吨**生铁**，即几乎等于1913年的四倍；一千八百三十万吨**钢**，即等于1913年的四倍半；一亿六千六百万吨**煤**，即等于1913年的五倍半；三千一百万吨**石油**，即等于1913年的三倍半；三千八百三十万吨**商品谷物**，即比1913年多一千七百万吨；二百七十万吨**籽棉**，即等于1913年的三倍半。

这就是我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拥有的物质条件。

这就是苏联可以用来进行战争的经济基础。

可见，差别是极大的。

生产上这样一种空前的增长，决不能认为是国家由落后达到进步的一种简单平常的发展。这是使我们祖国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一个飞跃。

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是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开始，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在这个时期以前，我们必须恢复被破坏的工业，医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如果同时还注意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四年完成，而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在第四年度就被战争打断了的这种情形，那么，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

不能不承认，实现这样宏伟的事业，十三年的时间是一个非常短的期限。

其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当时这些数字一公布，就引起外国报刊纷纷议论。朋友们认为是出现了"奇迹"，而不怀好意的人却说五年计划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和"肃反委员会的把戏"。但是，既然世界上根本没有奇迹，而肃反委员会又不是那样神通广大，竟能把

社会发展的规律取消，于是，国外的“舆论”也就只好承认事实了。

共产党是依靠什么政策来保证我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创造这些物质条件的呢？

首先就是依靠了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政策。

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转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凑合着。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话：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是可以克服的。在这方面，工业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大大帮助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迅速聚集资金，把它转用到重工业方面去。

毫无疑问，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在这样短的期间把我国变成工业国。

第二，就是依靠了农业集体化政策。

为了消灭我国农业方面的落后状况，并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更多的棉花等等，必须由小农经济过渡到大经济，因为只有大经济才能采用新技术，利用农艺上的一切成就，并提供更多的商

品产品。但是，大经济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是集体的。共产党决不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出于原则上的考虑，而且因为这条道路需要有一个过长的发展过程，而且先要使农民破产，使他们变成雇农。因此，共产党走上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走上了把农户联合为集体农庄，以扩大农业规模的道路。结果表明，集体化的方法是最进步的方法，这不仅是因为它并不要让农民破产，而特别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在几年以内就使全国各地都有了能够采用新技术，利用农艺上的一切成就和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产品的巨大集体农庄。

毫无疑问，如果不实行集体化政策，我们就不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消灭我国农业历来落后的状况。

不能说，党的政策没有遇到过抵制。不但那些始终厌弃一切新事物的落后的人，而且党内有许多著名的党员，也一贯把党拉向后退，千方百计想把它拉到“通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托洛茨基派和右派所干的一切反党阴谋诡计，他们在暗中破坏我国政府的措施这方面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追求一个目的，即破坏党的政策并阻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事业。但是党既没有在一些人的威胁面前屈服，也没有在另一些人的号叫面前屈服，而是坚定不移地、不顾一切地前进。党的功绩就在于它并没有迁就落后分子，不害怕逆流而进，始终坚持着党内主导力量的立场。毫无疑问，共产党如果没有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那就不能坚持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

共产党是不是正确利用了这样造成的物质条件，来发展军工生产并供给红军必需的装备呢？

我认为它是做到了这点，并且做得极有成效。

如果不算战争的第一年，当时工业由于往东撤退而阻碍了军

工生产的发展，那么，党在战争其余三年中所取得的成绩，使它不仅能供给前线足够数量的火炮、机枪、步枪、飞机、坦克和弹药，而且还有了储备。同时，大家知道，我们的装备在质量上，不仅不亚于德国，而且一般说来，甚至超过了它。

大家知道，我国的坦克工业在战争的最后三年，每年平均生产了三万多辆坦克、自行火炮和装甲车。（热烈鼓掌）

其次，大家知道，我国的航空工业在同一时期，每年生产了将近四万架飞机。（热烈鼓掌）

大家还知道，我们的枪炮工业在同一时期，每年生产了将近十二万门各种口径的火炮，（热烈鼓掌）将近四十五万挺轻重机枪，（热烈鼓掌）三百多万枝步枪，（鼓掌）以及约二百万枝自动枪。（鼓掌）

最后，大家知道，我们的迫击炮工业在1942—1944年期间，每年平均生产了将近十万门迫击炮。（热烈鼓掌）

自然，我们同时生产了相应数量的炮弹、各种迫击炮弹、航空炸弹，以及步枪和机枪子弹。

大家知道，例如，单是在1944年内就生产了二亿四千多万颗炮弹、炸弹和迫击炮弹，（鼓掌）七十四亿发子弹。（热烈鼓掌）

红军的武器和弹药的供给情形大体上就是如此。

可见，这种情况同我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供给情况是不相同的，当时前线经常缺乏火炮和炮弹，军队作战没有坦克和飞机，三个士兵用一枝枪。

至于说到红军的粮食和军服的供给，谁都知道，前线在这方面不仅一点也不缺乏，甚至还有必要的储备。

我国共产党在战前和战时的工作情况就是如此。

现在我来稍微谈谈共产党在最近将来的工作计划。大家知道，这一计划已在最近期间就要批准的新的五年计划中载明。新五年

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我国遭受战祸的区域恢复起来，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较大地超过这个水平。至于最近期间就将废除配给制就更不用说了，（长时间热烈鼓掌）将来要特别注意扩大日用品生产，用不断降低所有商品价格的办法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长时间热烈鼓掌）广泛建设各种科研机构，（鼓掌）使科学能够发挥它的力量。（热烈鼓掌）

我不怀疑，如果我们对我国的科学家们给以应有的帮助，他们在最近期间就不仅会赶上，而且会超过国外科学的成就。（长时间鼓掌）

至于较长时期的计划，党打算造成国民经济的蓬勃的新高涨，使我们能够把我国工业水平提高到，譬如说，战前水平的三倍。我们必须使我国工业每年能生产生铁达五千万吨，（长时间鼓掌）钢达六千万吨，（长时间鼓掌）煤炭达五亿吨，（长时间鼓掌）石油达六千万吨。（长时间鼓掌）只有这样才可以认为，我们祖国有了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热烈鼓掌）这大概还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也许还要长些。但这是可能做到的，而且也是我们应当做到的。（热烈鼓掌）

这就是我关于我国共产党不久以前的活动以及它将来的工作计划的一个简短报告。（长时间热烈鼓掌）

你们的任务就是来裁判一下：共产党过去和现在的工作正确到什么程度，（鼓掌）它能不能做得更好些。（十分活跃，鼓掌）

据说，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79]，（活跃，鼓掌）对他们不应批评，不应检查。这话不对。对胜利者可以而且应当加以裁判，（欢呼，鼓掌）可以而且应当加以批评和检查。这不仅对事业有补益，而且对胜利者本人也有补益，（齐声赞同，鼓掌）这样就会少骄傲一点，多谦逊一点。（欢呼，鼓掌）我认为选举运动就是选民对作

为执政党的我国共产党进行裁判的法庭。选举结果便是选民的判决。（高声赞同，鼓掌）如果我国共产党害怕批评和检查，那它就没有多大价值了。共产党愿意接受选民的判决。（热烈鼓掌）

在竞选时，共产党并不是单独活动。它是和非党人士结成联盟进行选举的。从前，共产党员对非党人士和无党无派是有点不信任的。这是因为当时各种资产阶级团体在选民面前假若不戴起假面具，便很不利，所以它们往往用无党无派的旗子来掩饰。从前就是如此。现在我们的时代不同了。现在有一个叫作苏维埃社会制度的壁垒把非党人士和资产阶级隔开了。这个壁垒同时又把非党人士和共产党员联合成为一个由**苏维埃人**所组成的共同的集体。他们生活在共同集体里，一起为加强我国实力而斗争，一起为我们祖国的自由和尊严而流血战斗，一起锻造并锻造出了我国对敌人的胜利。他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一些人入了党，而另一些人没有入党罢了。但这是形式上的区别。重要的是两者都在创造一个共同的事业。因此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的联盟是一件自然而富有生气的事情。（长时间热烈鼓掌）

最后，请允许我对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长时间鼓掌，经久不息。有人高呼："使我们取得一切胜利的伟大统帅斯大林同志乌拉！"）提出我作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你们可以不必怀疑，我一定竭力不辜负你们的信任。（全体起立。热烈鼓掌，经久不息，转为欢呼。会场到处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万岁，乌拉！""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乌拉！""光荣属于伟大的斯大林！""全民候选人斯大林同志万岁！""光荣属于我们一切胜利的创造者斯大林同志！"）

选自《斯大林文选》
第441—454页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80]

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

有一部分青年同志要求我在报刊上就语言学问题，特别是就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发表我的意见。我不是语言学家，当然不能完全满足这些同志。至于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也和其他社会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同我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我同意回答这些同志所提出的几个问题。

问：说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是否正确？

答：不，不正确。

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①。

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设施；资本主义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

① 原文为"учреждение"，系指和一定的理论观点相适应的组织和机构。——编者注

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拿俄国社会和俄语做例子来说吧。最近三十年来，在俄国消灭了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此相适应，消灭了资本主义基础的上层建筑，创立了同社会主义基础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说，旧的政治、法律等设施已经被新的社会主义设施代替了。但是尽管如此，俄语在基本上还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样。

在这个时期中，俄语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俄语的词汇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这就是说，由于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由于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新的社会观点、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增加了一大批新的词语；许多词语获得了新的含义而改变了意思；若干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至于构成语言基础的俄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那么它们在资本主义基础消灭后，不仅没有被消灭和被新的基本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所代替，相反地，却完全保留了下来，没有任何重大的变化，而且正是作为现代俄语的基础保留了下来。

其次，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起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转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

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这也就说明，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剥削者服务，也为被剥削者服务。

谁都知道这样的事实：俄语为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资本主义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很好，现在为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同样服务得很好。

关于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摩尔达维亚语、鞑靼语、阿塞拜疆语、巴什基尔语、土库曼语以及苏联其他民族的语言，都应该说也是这样的，它们为这些民族的旧的资产阶级制度服务得很好，为这些民族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样服务得很好。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语言的存在和语言的创造就是要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为整个社会服务，就是要语言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的东西，成为社会的统一的东西，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不管他们的阶级地位如何。语言一离开这个全民立场，一站到偏爱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损害其他社会集团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

的本质，就会不再是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就会变成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而退化下去，以致使自己消失。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有原则上的不同，但和生产工具，比如说，和机器却没有区别，生产工具和语言一样，对各阶级也是一视同仁的，既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再其次，上层建筑是某个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那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若干时代的产物，在这些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炼起来。所以语言比任何基础、任何上层建筑都生存得长久得多。这正说明，不仅是一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而且好几个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也不致会在历史上消灭一种语言，消灭一种语言的结构，产生具有新的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的新的语言。

从普希金逝世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这个时期内，俄国曾消灭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并产生了第三个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说，已经消灭了两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并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及其新的上层建筑。但是，如果以俄语为例，那么它在这个长时期内，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并且现代俄语按照它的结构来说，是同普希金的语言很少有差别的。

在这个时期内，俄语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在这个时期内，俄语大大地增加了词汇；有很大一批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词的含义改变了；语言的语法构造改进了。至于普希金语言的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主要的都保存下来了，成了现代俄语的基础。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后，把现有的语言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都象对待上层建筑一样消灭掉，并以新的来代替，的确又有什么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鱼”、“人”、“走路”、“做”、“生产”、“做买卖”等等不叫作水、地、山等等，而叫作旁的名称，又有什么必要呢？使语言中的词的变化和句中词的组合，不按照现存语法而按照完全另一种语法来进行，又有什么必要呢？这样的语言变革对于革命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特别必要的时候，历史是决不会采取什么重大行动的。试问，如果证明现有的语言及其结构基本上完全适用于满足新制度的需要，那么这样的语言变革有什么必要呢？消灭旧的上层建筑并且用新的上层建筑来代替它，可以而且需要在几年中完成，以便使社会生产力有发展的天地，但是要在几年中消灭现有的语言，并创立新的语言来代替它，那不是会在社会生活中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使社会受到崩溃的威胁吗？除了象唐·吉诃德[51]之类的人以外，谁会提出这样的任务呢？

最后，上层建筑和语言还有一个根本区别。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的和有限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不仅同生产活动，而且同人的工作的一切领域（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因此语言反映生产的变化，是立刻、直接反映的，并不等待基础的改变，所以语言的活动范围包括人的活动的各个领域，它比上层建筑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

多、方面也多得多，不仅如此，它的活动范围几乎是无限的。

这就首先说明，语言，实际上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要求语言用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词语来充实它的词汇。语言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词充实自己的词汇，并改进自己的语法构造。

总括说来：

(一)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

(二)把语言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问：有人说，语言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阶级的语言；对社会共同的统一的语言、非阶级的语言、全民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不，不正确。

不难了解，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根本谈不到阶级的语言。原始公社氏族制度是没有阶级的，因此那时当然不可能有阶级的语言，那时语言对人们的整个集体是共同的、统一的。有人反驳说，所谓阶级，应当是指任何人类集体，包括原始公社集体在内。这种说法算不得什么反驳，而是玩弄词句，是不值得一驳的。

至于语言的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从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到民族(нация)语言①，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工具的语言，

① 俄文"народность"和"нация"一般都译为"民族"。斯大林在本文中把"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用来专指产生于部落之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把"нация"一词用来专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这个时期以后的人们共同体。本文中"народность"译成"民族"，并附注原文；"нация"译成"民族"，一般不附注原文，只是在同句中有"народность"时，才附注原文，以示区别。——编者注

对社会是统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这里我指的并不是奴隶时代和中世纪时代的帝国，例如，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和查理大帝等所建立的帝国，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整个帝国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集合体。因此，我指的不是这些帝国和类似的帝国，而是组成这些帝国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是各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语言的。历史表明：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是每个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方言①、土语，但是部落或者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统一的和共同的语言却占着统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语从属于自己。

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也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的语言。历史表明：民族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对每个民族的成员是共同的、对整个民族是统一的。

上面已经说过：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同样地为社会一切阶级服务，在这一方面表现出语言对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人们，即各社会集团、各阶级对于语言远不是漠不关

① 原文是"диалект"，指地域方言，在本文中还用于指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现统一译为"方言"。——编者注

心的。他们极力利用语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殊词汇即特殊用词和特殊用语强加到语言中去。在这一方面，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创造了“阶级的”方言、习惯语、沙龙“语言”[81]。在书刊中常常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错误地说成是语言，如“贵族语言”、“资产阶级语言”，与此相对立的则有“无产阶级语言”、“农民语言”。很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什么民族语言是虚构的，只有阶级语言才是实际存在的。

我想再没有比这种结论更错误的了。能不能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看作语言呢？绝对不能。其所以不能，第一，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没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要从民族语言中去借用。其所以不能，第二，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在某一阶级上层分子的狭窄范围中通用，完全不适用于作为整个社会中人们交际的工具。在这些方言和习惯语中到底有些什么呢？其中有的只是一些反映贵族或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别的词，一些抛去了民族语言中“粗鲁”用语和短语的特别风雅客气的用语和短语以及若干外来语。然而基本的词，即绝大多数的词和语法构造还是从全民的民族语言中拿来的。因此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全民的民族语言的支派，没有任何语言的独立性，而且是注定不能发展的。如果以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能够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能够排挤民族语言并代替民族语言，这就是看不到历史的前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有人援引马克思，引证他的《圣麦克斯》一文，那里有一处说到资产者有“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①，这种语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5页。——编者注

言浸透了重商主义和生意经的精神。有些同志想用这个引文来证明，好象马克思是主张语言有"阶级性"的，好象马克思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存在。如果这些同志能客观论事的话，他们就应当从同一篇文章中引证另一句话，马克思在谈到统一的民族语言形成道路的问题时说："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①

可见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高级形式，而作为低级形式的方言则从属于高级形式。

那么，马克思所说资产者的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是否认为这种语言和具有自己特殊结构的民族语言是同样的语言呢？马克思能不能把它看成这样的语言呢？当然不能。马克思只是想说：资产者拿自己的生意人的那套词汇玷污了统一的民族语言，这就是说，资产者有他们生意人的习惯语。

可见，这些同志曲解了马克思的立场。他们曲解了它，是因为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去引证马克思，而是以不深入问题实质的书呆子的习气去引证马克思。

有人援引恩格斯，引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话："……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② 有些同志根据这一句话就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他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其实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语言而是说方言，他完全懂得，方言是民族语言的支派，是不能代替民族语言的。可是，这些同志看来是不很同意语言同方言是有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0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2卷第410页。——编者注

区别的……

显然，这段话是引用得不恰当的，因为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阶级语言”，而主要是说阶级的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是绝对对立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同民族语言或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就能作为主张语言有“阶级性”的论据吗？或者作为反对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吗？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清楚地知道，在民族内部存在着阶级矛盾。这些同志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论点呢？

有人援引拉法格的话，说拉法格在《语言和革命》这本小册子中承认语言的“阶级性”，似乎他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这是不对的。拉法格的确谈论过“贵族语言”和社会各个阶层的“习惯语”。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拉法格关心的不是语言和习惯语的区别问题，他把这些方言有时叫作“人造语”，有时叫作“习惯语”。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肯定地说：“贵族所擅长的人造语……是资产者、手艺人、城市和乡村都讲的那个全民语言中分出来的。”

可见，拉法格是承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他完全懂得“贵族语言”及其他方言和习惯语是从属性的，是依附于全民语言的。

因此，引证拉法格的话没有达到目的。

有人说，有一个时期英国封建主“在几百年中”说法语[82]，而那时英国人民却说英语，这一情况似乎可以作为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和反对全民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但是，这不是什么论据，而象是一种笑话。第一，那时说法语的，并不是所有封建主，而是在国王宫廷和贵族府邸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英国封建主上层分子。

第二，他们并不是说什么“阶级语言”而是说普通的全民的法语。第三，大家知道，这种好讲法语的风尚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让位给全民的英语。这些同志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同英国人民“在几百年中”相互交谈时是经过翻译的呢？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完全不说英语、全民的英语在那时是不存在的呢？是否认为那时法语在英国比只在英国贵族上层的狭小圈子里通行的沙龙语言更广泛一些呢？怎么可以根据这种笑话式的“论据”来否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呢？

俄国贵族有一个时候在宫廷和沙龙里也有好讲法语的风尚，他们以讲俄语时夹杂些法语、以会讲总是带着法国口音的俄语而自鸣得意。这是不是说那时在俄国就没有全民的俄语，那时全民的语言就是虚构的，而“阶级语言”才是实在的呢？

这些同志在这里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于，他们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他们以为既然上层建筑有阶级性，那么语言也应当不是全民的而是阶级的。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语言和上层建筑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容许把它们混为一谈。

第二个错误在于，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之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当成社会的完全分裂，当成两个敌对阶级间斩断了一切联系。他们认为既然社会分裂了，再没有统一的社会，而有的只是阶级，那么就不需要有社会统一的语言，不需要民族的语言了。既然社会分裂了，并且没有全民的、民族的语言，那么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是阶级和“阶级语言”。显然，每个“阶级语言”都会有自己的“阶级的”语法——“无产阶级的”语法、“资产阶级的”语法。其实这样的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使这些同志感到为难，因为他们相信这样

的语法总会出现的。

有个时候，我国有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断言十月革命后在我国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无产阶级的”铁路。他们因此获得了一个外号，叫作“穴居野人”……

显然，这种对社会、阶级、语言的鄙陋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但是这种观点的确在我们某些弄糊涂了的同志的头脑中存在着，而且继续存在着。

以为有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社会似乎就分裂成了在一个社会中相互间再也没有任何经济联系的各个阶级，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相反地，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资产者和无产者相互之间便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个部分。资产者如果没有受他们支配的雇佣工人就不能生活和发财，无产者如果不受雇于资本家，也不能继续生存。中断他们之间的一切经济联系，就是中断一切生产，而中断一切生产就会使社会灭亡，阶级本身灭亡。显然，没有一个阶级情愿使自己灭亡。因此，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是不会引起社会分裂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无知，对语言的本质一窍不通，才会使我们某些同志说出社会分裂、“阶级的”语言、“阶级的”语法之类的荒唐话。

其次，有人引证列宁的话，说列宁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文化口号是民族主义的口号。这一切都是对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绝对正确。但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这些同志引证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两种文化的话，显然是想使读者相信：在社会上既然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那么语言也应当有两种，因为语言是同文化相联系

的，——由此可见，列宁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由此可见，列宁主张"阶级的"语言。这些同志在这里的错误，是他们把语言和文化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其实，文化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文化可以有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语言却是交际的工具，永远是全民的，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俄语、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现在为这些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得并不坏，正象在十月革命以前为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并不坏一样，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可见，这些同志断言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语言，就会导致否定统一语言的必要性，——这是大错特错了。

列宁说到两种文化的时候，所持的出发点正是：两种文化的存在，并不会导致否定统一的语言和形成两种语言，而肯定语言应当是统一的。崩得分子[83]曾指责列宁，说他否认了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而把文化解释为"无民族性的"。大家知道，列宁严厉地反驳了这种说法。列宁说：他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文化，而不是民族语言，他认为民族语言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论的。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步了崩得分子的后尘。

至于说列宁似乎否定了统一的语言的必要性，那么就应当听一听列宁说的下面的话：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①

可见，这些尊敬的同志歪曲了列宁的观点。

最后，有人援引斯大林，他们引用斯大林的话说："资产阶级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8页。——编者注

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在这个时期始终是这种民族的主要领导力量。"① 这都是正确的。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的确领导着资产阶级文化，正如无产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领导着无产阶级文化一样。可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民族语言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吗？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有名的公式：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等的文化，按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按其形式即按其语言是民族的？这些同志是否同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呢？

我们这些同志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他们看不到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内容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改变的，语言则在几个时期中基本上是不变的，同样地既服务于旧文化，也服务于新文化。

总括说来：

（一）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的一切成员是共同的；

（二）方言和习惯语的存在并不否定，而是肯定全民语言的存在，因为方言和习惯语是全民语言的支派，并且从属于全民语言；

（三）语言有"阶级性"的公式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问：语言的特征是什么？

答：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语言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90页。——编者注

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

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中词的组合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了。

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就不可能调整人们在同自然力的斗争中，在生产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就不可能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获得成就，因而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一切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就这个意义来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大家知道，语言中所有的词共同构成所谓语言的词汇。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就是基本词汇，其中就包括成为它的核心的全部根词①。基本词汇比语言的词汇少得多，可是它的生命却长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且为构成新词提供基础。词汇反映语言的状况：词汇越丰富、越纷繁，语言也就越丰富、越发达。

但是词汇本身还不是语言，词汇好比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建筑业中的建筑材料并不就是房屋，虽然没有建筑材料就不可能建成房屋。同样，语言的词汇也并不就是语言，虽然没有词汇，任何语言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当语言的词汇受着语言语法的支配的时候，就会获得极大的意义。语法规定词的变化规则、词组合成句的规则，这样就赋予语言一种有条理、有含义的性质。语法（词法、句法）

① 指仅由一个词根构成的单纯词。——编者注

是词的变化规则和句中词的组合的规则的汇集。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有了语法，语言才有可能赋予人的思想以物质的语言的外壳。

语法的特点在于，它得出词的变化的规则，而这不是指具体的词，而是指没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的词；它得出造句的规则，而这不是指某些具体的句子，例如具体的主语、具体的谓语等等，而是指任何的句子，不管某个句子的具体形式如何。因此语法从词和句的个别和具体的东西中抽象出来，研究作为词的变化和句中词的组合的基础的一般的东西，并且以此构成语法规则、语法规律。语法是人类思维长期的、抽象化的工作的成果，是思维的巨大成就的标志。

就这一方面来说，语法很象几何学，几何学从具体对象中抽象出来，把各种对象看成没有具体性的物体，从而得出自己的定理，它所规定的不是某些具体对象之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没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语言和上层建筑不同，上层建筑同生产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经济这个中介。语言则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着，正象它同人的工作的一切范围（毫无例外）中的其他一切活动直接联系着一样。因此语言的词汇对于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此外语言还有一点和上层建筑不同，它无须等待基础的消灭，它在基础消灭以前，且不管基础的状态怎样，就使自己的词汇发生变化。

但是语言的词汇的变化不是象上层建筑一样的，不是以废除旧的、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实现，而是以新词去充实现有词汇的方法来实现，这些新词是由于社会制度改变，由于生产、文化、科学等等发展而产生的。同时，虽然通常从语言的词汇中消失一些已经陈旧的词，可是增添的新词的数量却要多得多。至于基本词汇，基

本上是完全保留下来的，并且被当作语言的词汇基础来使用。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既然基本词汇能在许多历史时期中被有效地利用，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去消灭它，况且把千百年积累起来的基本词汇消灭掉了，又不可能在很短期间内创造出新的基本词汇，那就会使语言瘫痪，就会把人们相互交际的事情完全弄糟。

语言的语法构造比语言的基本词汇变化得还要慢。语法构造是许多时代以来形成的，它在语言中根深蒂固，所以它的变化比基本词汇还要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当然也发生变化，它逐渐改进着，改善和改正自己的规则，用新的规则充实起来。但是语法构造的基础在很长的时期中都保留着，因为历史证明，这些基础能够在许多时代中有效地为社会服务。

由此可见，语言的语法构造及其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

历史表明，语言有巨大的稳固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力。有些历史学家不去解释这种现象，而只是表示惊奇。可是这里并没有值得惊奇的任何根据。语言的稳固性是由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的稳固性造成的。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曾经在几百年中竭力摧残、破坏和消灭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在这个时期中，巴尔干各族人民语言的词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不少土耳其的词语，发生过"聚合"和"分离"，可是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还是坚持下来和生存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在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

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能把语言及其结构看作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语言结构，即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许多时代的产物。

可以推想，现代语言的要素还在奴隶制时代以前的远古时期

就已奠下基础了。那时语言是不复杂的，词汇是很贫乏的，但是有它的语法构造，虽然这种构造是很原始的，但总算是语法构造。

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的发展，商业更需要有条理的书信来往，印刷机的出现，出版物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给语言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中许多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分解了和离散了，混合了和融合了，而往后，就出现了民族语言和国家，发生了革命，旧的社会制度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所有这一切，给语言及其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变化。

但是，如果以为语言的发展也象上层建筑一样，是用消灭现存的和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发展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方法来实现的。并且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一下子破旧立新，而是经过语言的新质和新结构的要素逐渐的长期的积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

有人说，语言发展的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语言发展的阶段论认为突然的爆发是必要的，是语言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的条件。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个理论中，很难找到任何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如果阶段论真的认为在语言发展历史中有突然的爆发，那就更糟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在语言发展中有突然的爆发，有现存语言的突然死亡和新语言的突然创造。拉法格说在法国"1789年到 1794 年间发生突然的语言革命"（见拉法格的《语言和革命》这本小册子），是不正确的。那时在法国没有任何语言革命，更谈不上什么突然的语言革命。当然，在这个时期中法语的词汇增加了许多新词语，消失了一些陈旧的词，有些词的含义改变

了，仅此而已。但是这样的改变，丝毫也不决定语言的命运。语言中主要的东西是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语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保存下来，没有重大的改变，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直到现在，在现代的法语中还继续生存着。更不用说，要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立新的民族语言（"突然的语言革命"！），五六年的时间是少得可笑，这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从旧质过渡到新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

总之，应当告诉那些醉心于爆发的同志，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我们曾在八至十年的时间中实现了我国农业从资产阶级的个体农民的制度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的过渡，这是一个在乡村中消灭旧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可是这个变革的实现，不是经过爆发，就是说，不是经过推翻现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经过从乡村中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渐过渡来实现的。这件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种变革是根据现政权的倡导、在基本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实现的。

有人说，历史上有过各种语言融合的许多事实，由此可以推想，在融合的时候，新语言的形成是经过爆发，经过从旧质到新质的突然过渡而发生的。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对的。

语言的融合不能看作是在几年中就能得出结果的一次决定性

的突击行动，语言的融合是延续几百年的漫长的过程。因此这里谈不上任何的爆发。

其次，如果以为两种语言融合的结果，会得出一种新的第三种语言，它不象这两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并且同其中任何一种都有质的区别，这种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在融合的时候，通常是其中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保留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且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另一种语言则逐渐失去自己的本质而逐渐死亡。

可见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保留其中的一种语言，保留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使它能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

诚然，在这种情况下，胜利的语言会从失败的语言中吸取一些词来丰富自己的词汇，但是这并不是削弱它，相反地，是加强它。

例如，俄语就是这样，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同好几个民族的语言融合，并且总是成为胜利者。

当然，俄语的词汇由于从其他语言中取得了许多词而充实起来了，但是这不仅没有使俄语削弱，相反地，使它丰富和加强起来。

至于俄语的民族特质，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害，因为它保留了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继续前进，继续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趋于完善。

无疑地，语言融合论并不能给予苏联语言学任何重要的东西。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如果这是对的，那就应当承认，语言融合论不仅不能解决这个任务，甚至没有提出这个任务，——它简直是没有注意到这个任务，或者是不懂得这个任务。

问：《真理报》[4]开展语言学问题的自由讨论，是否做得对？

答：做得对。

语言学问题将朝着什么方向解决，这到讨论结束时就会清楚的。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说，这次讨论有了很大的益处。

首先，这次讨论发现了在中央和各共和国的语言学机关中，有一种为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所不应有的制度统治着。稍微批评一下苏联语言学状况，甚至连批评语言学中的所谓"新学说"的那种十分胆怯的尝试，都会遭到语言学界领导集团的压迫和制止。语言学方面的一些优秀的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由于对尼·雅·马尔的遗著采取了批判态度，由于对尼·雅·马尔的学说稍微表示不赞同，就被撤职和降级。有一些语言学工作者提升到负责职位，并不是由于他能干，而是由于他无条件地尊奉尼·雅·马尔的学说。

谁都承认，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可是这个公认的规则，竟被忽视和极粗暴地践踏了。一些自认为完全正确的领导者组成了一个排他的小集团，保证自己不受任何的批评，恣意横行，为所欲为。

举一个例子，所谓《巴库教材》（尼·雅·马尔在巴库所讲授的讲义）本来已经由著者本人废弃并禁止翻印，但是这帮领导者（梅夏宁诺夫同志称他们为尼·雅·马尔的"学生"）竟下令重印，并且把它作为参考书，毫无保留地推荐给学生。把本来已经废弃了的《教材》当作完备无缺的参考书，这就是欺骗了学生。如果我不是相信梅夏宁诺夫同志和其他的语言学工作者的诚实，那我就要说，这样的行为就等于暗害行为。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因为在语言学界形成的阿拉克切也夫制度[84]，养成不负责任的习气，助长这种专横行为。

讨论所以非常有益，首先是因为它揭露了这种阿拉克切也夫制度，并且把它打得粉碎。

但是讨论的益处还不限于此。讨论不仅粉碎了语言学界的旧制度，而且还暴露了对于语言学中一些最重要问题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糊涂观念，这种糊涂观念竟在这门科学的领导集团中占着统治地位。在开始讨论以前，尼·雅·马尔的"学生们"默不作声，隐瞒了语言学界的恶劣情况。讨论开始以后，到了无法再沉默的时候，他们才迫不得已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结果怎样呢？原来在尼·雅·马尔学说中有许多破绽、错误、不明确的问题和没有经过探讨的论点。试问，尼·雅·马尔的"学生们"为什么直到现在展开讨论以后才说出这些东西来呢？为什么他们以前没有关心这些东西呢？为什么他们当时没有以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公开老实地说出这些东西呢？

尼·雅·马尔的"学生们"承认了尼·雅·马尔的"某些"错误以后，看来还以为只有在"订正了的"尼·雅·马尔理论的基础上，苏联语言学才能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尼·雅·马尔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不，让我们摆脱尼·雅·马尔的"马克思主义"吧！尼·雅·马尔的确曾经想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曾经为此努力过，可是他没有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无产阶级文化派"[85]和"拉普派"[86]一样，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了。

尼·雅·马尔把语言是上层建筑这样一个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塞进语言学，他弄糊涂了自己，也弄糊涂了语言学。苏联语言学在这种不正确的公式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发展的。

尼·雅·马尔把语言有"阶级性"这另一个同样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塞进语言学，他弄糊涂了自己，也弄糊涂了语言学。苏联语言学在这种同各民族历史和各语言历史全部进程相矛盾的不正确的公式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发展的。

尼·雅·马尔给语言学界带来一种为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不

谦虚的、骄横的、妄自尊大的腔调，这种腔调轻率地空口否定尼·雅·马尔以前语言学中的一切成就。

尼·雅·马尔大肆叫嚣，污蔑历史比较法[87]是"唯心主义的"。其实应当说，历史比较法虽然有严重缺点，但是毕竟比尼·雅·马尔的真正唯心主义的四要素分析法[88]要好，因为前者还推动语言研究工作，后者却只是要人躺在炕上，围绕着标榜一时的四要素去胡思乱想。

尼·雅·马尔妄自尊大地贬斥研究语言类别(系族)的任何企图，认为这是"原始语"[89]理论的表现。其实，语言的亲属关系是无法否定的，例如各斯拉夫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无疑是存在的；研究这些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会在研究语言发展规律方面给语言学带来很大的益处。当然，"原始语"理论同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听了尼·雅·马尔的说法、特别是他的"学生们"的说法，会使人以为在尼·雅·马尔以前不曾有过任何语言学，语言学是从尼·雅·马尔的"新学说"出现以后才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要谦虚得多，他们认为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以前时期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科学发展的产物。

因此，这次讨论在另一方面也是有助于我们的事业的，因为它暴露了苏联语言学界的思想错误。

我想，我们的语言学愈快地摆脱尼·雅·马尔的错误，就能愈快地摆脱它现在所遭受的危机。

取消语言学界的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抛弃尼·雅·马尔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语言学中去，——我看，这就是苏联语言学健全发展的道路。

载于1950年6月20日
《真理报》第171号

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答叶·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

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

对你的问题回答如下。

1.**问**：你的文章令人信服地指出：语言既不是基础，也不是上层建筑。那么，认为语言既是基础所具有的，又是上层建筑所具有的一种现象是否恰当？还是认为语言是一种中间的现象更正确些？

答：当然，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具有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固有的那种共同特点的，这就是说，它为社会服务，正如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为社会服务一样。但是，一切社会现象所固有的共同东西，其实也仅限于此。再进一步，便开始了各个社会现象之间的严重差别。

问题在于，社会现象，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还有自己专门的特点，这些专门的特点使社会现象互相区别，而这些专门特点对于科学最为重要。基础的专门特点就是：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上层建筑的专门特点就是：上层建筑以政治、法律、美学等思想为社会服务，并且为社会创造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设施。语言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专门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工具使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并调整他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包括生产的领域，也包括经济关系的领域，包括政治的领域，也包

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工作。这些特点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正因为它们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语言才是独立的科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没有语言的这些特点，语言学就会丧失独立存在的权利。

简短些说，语言既不能列入基础一类，也不能列入上层建筑一类。

语言也不能列入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现象一类，因为这种“中间”现象是不存在的。

但是语言也许可以列入社会生产力一类，譬如说，列入生产工具一类吧？的确，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点：生产工具，象语言一样，对于各个阶级表现出一种一视同仁的态度，并能同样地服务于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不管是旧的阶级，或是新的阶级。根据这个情况是否可以把语言列入生产工具一类呢？不，不可以。

有一个时候，尼·雅·马尔看到他的“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公式遭到了反对，就决定“改造”一下，宣称“语言是生产工具”。尼·雅·马尔把语言列入生产工具一类，是否对呢？不，他完全不对。

问题在于，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的类似之处，只限于我刚才所说的那一点。但是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资料，而语言则什么也不生产，或者只是“生产”词而已。确切些说，有生产工具的人能够生产物质资料，但是同样这些人如果只有语言而没有生产工具，那就不能够生产物质资料。不难了解，假如语言能够生产物质资料，那么夸夸其谈的人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的人了。

2.**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语言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思想的

直接现实”①，是“实践的……现实的意识”②。马克思说：“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③依据你的意见，语言学应当在哪种程度上来研究语言的含义方面，研究语义学和历史语义学以及修辞学呢？或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只应当是形式吗？

答：语义学是语言学的重要部分之一。词语的含义方面在研究语言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应当保证语义学在语言学中应有的地位。

然而，在研究语义学问题和使用它的材料时，千万不可过高估计它的意义，尤其不可滥用它。我指的是某些语言学者，他们过分沉醉于语义学，无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同思维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他们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硬说语言在消亡着，没有语言也行。

请注意尼·雅·马尔所说的下面的话：

“语言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它以声音表露出来；思维的活动没有表露也可以进行。…… 语言（有声的）现在已开始把自己的职能让给那些绝对战胜空间的最新发明了，而思维则借其未加利用的过去的积累和新的成就而上升，并且将排挤和完全代替语言。未来的语言就是在不依赖于自然物质的技术中成长起来的思维。在它面前，任何语言，甚至有声的、仍然同自然规范相联系的语言也会站不住脚。”（见尼·雅·马尔的《选集》）

如果把这种施展“魔力”的玄妙莫测的话译成普通人讲的话，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尼·雅·马尔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

（二）尼·雅·马尔认为，人们的交际，不用语言，而借助不依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上册第109页。——编者注

赖于语言的“自然物质”、不依赖于“自然规范”的思维本身就可以办到；

（三）尼·雅·马尔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又使思维“不依赖于”语言的“自然物质”，他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有些人说，思想是在用言语表达出来之前就在人的头脑中产生的，是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外壳、可以说是以赤裸裸的形态产生的。但是这种说法完全不对。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思想的实在性表现在语言之中。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能谈到同语言的“自然物质”不相联系的思维，才能谈到没有语言的思维。

简短些说，过高估计语义学和滥用语义学，使尼·雅·马尔走向唯心主义。

因此，如果保护语义学，不象尼·雅·马尔和他的“学生们”那样加以夸大和滥用，那么语义学对语言学就能有很大的益处。

3. **问**：你十分正确地指出，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思想、观念、习俗和道德原则是截然相反的。这些现象的阶级性质必然反映在语义方面（有时也反映在语言的形式上即词汇上，如你的文章中所正确指出的）。在分析具体的语言材料时，首先在分析语言的含义方面时，可不可以说，语言表现了概念的阶级实质？特别是在讲到语言不仅表现人的思想，而且也表现人对现实的态度时（这时人的阶级属性表现得特别明显），可不可以说，语言表现了这些概念的阶级实质？

答：简单说来，你想知道：阶级是否影响到语言？阶级是否把

自己专门的词语塞进语言中去？人们依据阶级属性而赋予同一词语以不同的含义的情形有没有呢？

是的，阶级影响到语言，并且把自己专门的词语塞进语言中去，有时也对同一个词语有不同理解。这是不用怀疑的。

然而，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专门的词语以及语义上的差别，对于统一的全民语言的发展会有重大的意义，它们会削弱全民语言的意义或改变它的性质。

第一，这种专门的词语，以及语义上的差别，在语言中是极少的，未必能占全部语言材料的百分之一。因此，占绝大多数的其他所有的词语以及它们的语义对于社会各阶级是**共同的**。

第二，在言语中应用带有阶级色彩的专门的词语时，并不是按照某种"阶级"语法的规则（这种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而是按照现有的全民语言的语法规则。

因此，专门的词语的存在以及语义上的差别的事实，并不推翻统一的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相反地，是证实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

4. **问**：你在文章中完全正确地评价了马尔，说他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这是不是说：语言学家们，包括我们这些青年在内，应该抛弃马尔的**全部**语言学遗产呢？可是马尔仍然作过一些有价值的语言研究（契科巴瓦、桑热耶夫及其他一些同志在讨论中都曾写到这些）。我们在批判地研究马尔的同时，是否还可以吸取他的有用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呢？

答：当然，尼·雅·马尔的著作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尼·雅·马尔之所以犯了极重大的错误，是由于他把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塞进语言学中去，他企图创造一种独立的语言理论。但是尼·雅·马尔有个别优秀的、写得很精彩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

忘掉了自己在理论上的野心，诚实地而且可以说是很有办法地研究了某些语言。在这样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有价值的和值得学习的东西。显然，这种有价值的和值得学习的东西，应当从尼·雅·马尔那里吸取过来加以利用。

5. **问**：许多语言学家认为**形式主义**是苏联语言学停滞的基本原因之一。语言学中的形式主义究竟表现在哪里以及如何克服它？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很想知道你的意见。

答：尼·雅·马尔及其"学生们"责难一切不赞成尼·雅·马尔"新学说"的语言学者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当然是不严肃的和不聪明的。

尼·雅·马尔认为语法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认为那些把语法构造当作语言基础的人是形式主义者。这就是极端愚蠢了。

我认为"形式主义"是"新学说"的创造者们为了便于同自己在语言学界的对手作斗争而捏造出来的。

苏联语言学停滞的原因，并不是尼·雅·马尔及其"学生们"所发明的"形式主义"，而是语言学界的阿拉克切也夫制度和理论上的缺陷。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是尼·雅·马尔的"学生们"建立的。尼·雅·马尔及其最亲近的战友们给语言学带来了理论上的混乱。为了不再有停滞现象，就应该把两者一起铲除。铲除这些溃疡，才会使苏联语言学健康起来，才会使它走上康庄大道，才会使苏联语言学能够在世界语言学中占第一位。

1950 年 6 月 29 日

载于 1950 年 7 月 4 日
《真理报》第 185 号

答 同 志 们

答桑热耶夫同志

尊敬的桑热耶夫同志：

答复你的来信太迟了，因为你的信昨天才从中央机关转给我。

你无疑是正确地解释了我在方言问题上的观点。

“阶级”方言，正确些说，应当叫作习惯语，并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而是为少数社会上层分子服务的。此外，它们没有自己本身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此，它们无论如何不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

相反地，地方（“地域”）方言，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并且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此，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наци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并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语言。例如，成为俄罗斯民族语言基础的俄语中的库尔斯克-奥廖尔方言（库尔斯克-奥廖尔“话”），情形就是这样。成为乌克兰民族语言基础的乌克兰语中的波尔塔瓦-基辅方言，也应该说是这样的。至于这些语言中的其他方言，则丧失自己的独特性，溶入这些语言，并在这些语言中消失。

也有相反的发展过程，一个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发展条件而还未成为民族（нация），它的统一的语言由于该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国家的崩溃而瓦解；在统一语言中还没有消失的地方方言，却活跃起来并成为形成单独独立语言的基础。例如，

统一的蒙古语可能就是这样。

1950 年 7 月 11 日

载于 1950 年 8 月 2 日
《真理报》第 214 号

答德·别尔金和斯·富列尔两同志

你们的信收到了。

你们的错误是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并用另外的题目偷换了我给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的答复中所研究的题目。

1. 我在那封复信中批判了尼·雅·马尔，因为他在谈到语言（有声语言）和思维时，把语言同思维分割开来，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由此可见，我在复信中所说的是会讲话的正常的人。我并且断定说：这种人的思想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在会讲话的人那里，是不存在同语言材料没有联系的赤裸裸的思想的。

你们没有接受或驳斥这个论点，却举出了不正常的不会讲话的人、聋哑的人来，这些人不会讲话，当然他们的思想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由此可见，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我没有讲到也不能讲到，因为语言学所涉及的是会讲话的正常的人，而不是不会讲话的不正常的聋哑的人。

你们用没有讨论过的另外一个题目来偷换正在讨论的题目。

2. 从别尔金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把“词的语言”（有声语言）和“手势语言”（照尼·雅·马尔的说法叫“手”语）同等看待。看来他认为：手势语言和词的语言是同等的东西；人类社会有一个时期是没有词的语言的，当时“手”语起到了后来出现的词的语言的

作用。

但是，如果别尔金同志当真是这样想的，那么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有声语言或词的语言始终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能作人们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语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哪怕是最落后的社会，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民族学不知道有任何一个落后的民族(народец)，哪怕是象十九世纪的澳洲人或火地人[90]那样原始的或比他们更原始的民族(народец)，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脱出动物界、结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同自然力量作胜利的斗争并取得我们今天的进步的力量之一。

由于所谓的手势语言极端贫乏和有限，它在这一方面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其实这不是语言，甚至也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替有声语言的语言代用品，而是人们有时用来强调自己言语中的某些地方的辅助手段，这个辅助手段在表现方法上是极其有限的。不能把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等量齐观，正如不能把原始的木锄和带有五铧犁和条播机的现代的履带拖拉机等量齐观一样。

3.由此可见，你们所注意的首先是聋哑的人，然后才是语言学问题。显然地，正是这种情况使你们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好吧，如果你们要坚持，我不妨满足你们的要求吧。那么聋哑的人的情形到底怎样呢？他们的思维是否在活动，思想是否在产生呢？是的，他们的思维是在活动，思想是在产生。很明显，既然聋哑的人不能讲话，他们的思想就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这是不是说，聋哑的人的思想是赤裸裸的、同“自然规范”(尼·雅·马尔的用语)没有联系的呢？不，不是的。聋哑的人的思想的产生和能够存在，只能根据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视觉、触觉、味觉、嗅觉而形成的对于外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形象、知觉和观念。在这些

形象、知觉、观念之外，思想就是空洞的，没有任何内容的，就是说，它是不存在的。

1950 年 7 月 22 日

载于 1950 年 8 月 2 日
《真理报》第 214 号

答阿·霍洛波夫同志

你的信收到了。

由于工作很忙，答复稍迟了些。

你的信是从两个没有说出来的假定出发的：第一个假定认为，引证某一作者的著作时可以**脱离**引文中所讲到的历史时期，第二个假定认为，从研究一个历史发展时期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发展时期都是正确的，因而应当是**一成不变的**。

应当说，这两个假定都大错特错了。

举几个例子来说。

1.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多少平稳地在向上发展，向还未被它占领的新的地域扩张，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能充分有力地发生作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某一个国家内不可能胜利，它只有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里进行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这个结论后来便成了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原理。

可是在二十世纪初，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谁都明白，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显然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

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战争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的无法克服的弱点，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预先就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间不同，这时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出结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革命的成熟是不平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结论，它们不仅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某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不深入问题的本质，脱离历史条件而作形式上的引证，他们会说：这两个结论中有一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应当抛弃，而另一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应当推广到一切发展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结论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而列宁的结论则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

2.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家应当消亡。①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内的一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便以此为根据，开始要求党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国家尽快地消亡，把国家机关解散，把常备军取消。

但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当代世界形势的研究，得出了结论：在资本主义包围存在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只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而所有其他国家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革命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编者注

胜利了的国家，要想不被资本主义的包围击溃，就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大力加强自己的国家，加强自己的国家机关、侦察机关和军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恩格斯的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内获得胜利而言的，当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他一切国家仍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这个公式就不适用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互相排斥的公式。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会说：这种情形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状况，必须抛弃其中一个绝对错误的公式，而把另外一个绝对正确的公式推广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一切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因为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公式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是正确的，而恩格斯的公式则对于下一时期是正确的，即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陆续的胜利将导致社会主义在大多数国家内的胜利，从而造成实行恩格斯公式的必要条件。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

对于霍洛波夫同志信中引证斯大林的不同著作中关于语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公式，也应该这样说。

霍洛波夫同志引证斯大林《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著作，其中作了一个结论：譬如两种语言的融合，其结果通常有一种成为胜利者，而另一种则会死亡；可见两种语言的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其中的一种保存下来。其次，他又引证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另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说：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即当社会主义巩固起

来并深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各个民族语言就必不可免地会溶合为一个共同的语言，这个语言当然不会是俄语，也不会是德语，而是某种新的语言①。霍洛波夫同志把这两个公式对照了一下，发现它们不仅彼此不一致，而且互相排斥，于是失望了。他在信中写道："从你的文章里我理解了语言的融合**永远**不会产生某种新的语言，可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根据你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讲话，我曾确信：在**共产主义**时期，各种语言会溶合成一个共同的语言。"

显然，霍洛波夫同志发现了这两个公式间的矛盾，并且深信矛盾应当消灭，于是认为必须丢掉公式中的不正确的一个，而抓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都正确的另一个，但是究竟抓住哪一个呢，——他不知道。好象是走投无路了。霍洛波夫同志根本没有想到：两个公式可能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常常就是这样，他们不深入问题的本质，不管引文中所讲的历史条件而只作形式上的引证，就必然会走投无路。

然而，如果分析一下问题的本质，就没有任何根据感到走投无路了。问题在于：斯大林的《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小册子和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所指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因此所得出的公式也不相同。

斯大林在他的小册子中论及语言融合问题的那个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的时代，这时剥削阶级是世界上的统治力量，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仍然很厉害，国家的区别使民族隔离和各民族的互不信任根深蒂固，民族平等还不存在，语言的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20—321页。——编者注

融合是通过争取一种语言的统治地位的斗争进行着，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和平与友谊的合作条件还没有具备，摆在日程上的不是各种语言的合作和互相丰富，而是一些语言的被同化和另一些语言的胜利。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只能有胜利的语言和失败的语言。斯大林的公式说：譬如两种语言的融合，结果不是形成新的语言，而是其中一种语言胜利，另一种语言失败，这一公式正是指上述这些条件。

至于说到斯大林的另一个公式，即他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论及各种语言溶合为一种共同语言的这一公式，那么这里所指的是另外一个时代，也就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的时代，那时世界帝国主义将不复存在，剥削阶级将被推翻，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将被消灭，民族隔离和各民族的互不信任将被各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平等将会实现，压制和同化语言的政策将会取消，各民族间的合作将会建立，而各民族的语言将有可能在合作的方式下不受约束地互相丰富起来。很明显，在这些条件下，根本谈不到一些语言的被压制和失败与另一些语言的胜利。在这里我们遇到的将不是两种语言，其中一种遭受失败而另一种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而是好几百种民族语言。由于各个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长期合作，从这些语言中将首先产生出一些最丰富的统一的区域语言，然后这些区域语言再溶合为一个共同的国际语言，这种语言当然既不是德语，也不是俄语或英语，而是吸取了各民族语言和各区域语言的精华的新语言。

因此，两个不同的公式适应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时代，而且正因为它们是与之适应的，所以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

要求这两个公式不彼此矛盾，要求它们不互相排斥，这是何等的荒谬，这就象要求资本主义统治时代同社会主义统治时代不彼此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不互相排斥一样。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看作教条的汇集，这些教条是不顾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而"永远"不变的。他们以为，如果他们把这些结论和公式都背熟了，并把它们胡乱地引证一番，那么他们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指望背熟了的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对于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场合都是适用的。但是有这样想法的只能是那些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字母而没有看到它的实质、背熟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而没有懂得它们的内容的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完备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

1950 年 7 月 28 日

载于 1950 年 8 月 2 日
《真理报》第 214 号

选自《斯大林文选》
第 520—559 页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91]

给经济问题讨论会的参加者

对于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

我已经收到为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而举行的经济问题讨论会的一切文件，其中包括：《关于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建议》，《关于消除未定稿中的错误和不确切处的建议》，《关于争论问题的说明材料》。

对于这一切材料，以及对于教科书未定稿，我认为必须提出如下的意见。

1.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某些同志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质，特别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客观性质。他们否认政治经济学规律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的规律性。他们认为，由于历史赋予了苏维埃国家以特殊作用，苏维埃国家、它的领导人能废除现存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创造"新的规律。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显然，他们把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

一种是科学规律，它反映自然界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颁布的法律，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是决不能混为一谈的。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指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是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

这是不是说，例如，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即自然力发生作用的结果是根本无法避免的，自然力的破坏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以不受人们影响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出现的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认识了它们的发展规律，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把这些过程除外，在其他许多场合，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就是说，人们是能够影响自然界过程的。在一切这样的场合，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规律，考虑到它们，依靠它们，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便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界的破坏力转而有利于社会。

我们且从许许多多的例子中举出一个来看。在上古时代，江河泛滥、洪水横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庄稼的毁灭，曾经被认为是无法防止的灾害，是人们无力抗拒的。可是后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当人们学会了修筑堤坝和水电站的时候，就能使社会防止在从前看来是无法防止的水灾。不但如此，人们还学会了控制自然界的破坏力，可以说是学会了驾驭它们，使水力转而有利于社会，利用水来灌溉田地，取得动力。

这是不是说，人们因而就废除了自然规律、科学规律，创造了新的自然规律、新的科学规律呢？不，不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防止水的破坏力量发生作用并利用它以利于社会的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丝毫没有违反、改变或消灭科学规律，没有创造新的科学规律的。恰恰相反，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确切地根据自然规律、科学规律而实现的，因为对自然规律的任何违反，即使是极小的违反，都只会引起事情的混乱，引起工作程序的破坏。

对于经济发展规律，对于政治经济学规律——无论指资本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时期都是一样，——也必须这样说。在这里，也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把某些规律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向，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给予其他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但是人们不能消灭这些规律或创造新的经济规律。

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规律与自然科学的规律不同，不是长久存在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发生作用的，以后，它们就让位给新的规律。但是原来的这些规律，并不是被消灭，而是由于出现了新的经济条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台，让位给新的规律，这些新的规律并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而是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有人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引证他的这样一个公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人们将获得支配自己生产资料的权力；他们将摆脱社会经济关系的压迫而获得自由，成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这种自由叫作“被认识了的必然

性”①。究竟“被认识了的必然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规律（“必然性”）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以利于社会。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在同一著作中说道：

“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②

可见，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对那些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消灭现存经济规律和创造新经济规律的人们，决不是有利的。恰恰相反，这个公式所要求的不是消灭经济规律，而是认识它们和善于运用它们。

有人说，经济规律具有自发性质，这些规律所发生的作用是不可防止的，社会在它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不对的。这是把规律偶像化，是让自己去做规律的奴隶。已经证明：社会在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社会认识了经济规律以后，依靠它们，就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并“驾驭”它们，正如在自然力及其规律方面的情形一样，正如上面所举的江河泛滥的例子一样。

有人援引苏维埃政权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特殊作用，仿佛这种作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去消灭现存的经济发展规律，并“制定”新的经济发展规律。这也是不对的。

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苏维埃政权不能象以往的革命那样，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而必须消灭任何剥削；第二，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323页。——编者注

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然而苏维埃政权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它之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不是因为它消灭了什么现存的经济规律，“制定了”什么新的经济规律，而仅仅是因为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是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使它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如果没有这个规律，不依靠这个规律，苏维埃政权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经济规律，早已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它之所以还没有为自己开辟出道路来，还没有获得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是因为它遇到了社会上衰朽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在这里，我们碰到了经济规律的另一个特点。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规律或多或少是顺利的；与此不同，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规律，却要遇到这些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因此，就需要有能够克服这种反抗的力量，社会力量。当时我国有了这种力量，这就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在其他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这种力量。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粉碎旧的社会力量，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之所以在我国获得了充分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秘密就在于此。

有人说，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规律和创造新的经济规律。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

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

有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规律。这也是不对的。规律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规律，那也就能消灭规律，而代之以另外的规律。"改造"规律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规律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虽然关于改造经济规律的公式早已在我们这里流行起来，可是为了准确起见，必须把这个公式抛弃。可以限制这些或那些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可以防止它们的破坏作用（当然，如果有的话），但是不能"改造"或"消灭"规律。

因此，当人们讲到"征服"自然力量或经济力量，讲到"支配"它们等等的时候，他们决不是想说：人们能够"消灭"科学规律或"制定"科学规律。恰恰相反，他们只是想说，人们能够发现规律，认识它们，掌握它们，学会熟练地运用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从而征服它们，求得支配它们。

总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客观规律，它

们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否认这个原理的人，实质上就是否认科学，而否认科学，也就是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和众所周知的，可是里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因而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复众所周知的真理。当然，这里的确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如果以为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复我们所知道的某些真理，那就不对了。问题在于，每年有成千的年轻的新干部靠近我们领导核心，他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帮助我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显一显身手，但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许多真理，而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苏维埃政权的巨大成就使他们惊愕万分，苏维埃制度异乎寻常的成功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于是他们就以为，苏维埃政权是"无所不能"的，对它来说"什么都是轻而易举"的，它能消灭科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同志呢？应该怎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去教育他们呢？我认为，有系统地重复所谓"众所周知"的真理，耐心地解释这些真理，是对这些同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最好的办法之一。

2.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作得不对的。他们认为，党在当时就应当消除商品生产。而且，他们还引证了恩格斯的如下的话：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见《反杜林论》）①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编者注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吧。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这样了解，也可以那样了解。

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就是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

由此可见，恩格斯所指的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不仅在工业中，而且也在农业中，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充分发达，以致可以剥夺全国的**一切**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因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

在十九世纪末，在《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只有一个，这就是英国，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都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

在这里，我撇开了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意义这个问题，而对外贸易在英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极为巨大的。我认为，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英国的商品生产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的命运问题。

附带说一句，不仅在十九世纪末，而且在现时，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经达到了英国那样

的程度。至于其余的国家，虽然那里的农村中也发展了资本主义，可是仍然有一个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阶级，这些人的命运是应该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予以确定的。

于是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在某个国家内，譬如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资本主义在工业中已经使生产资料集中到可以剥夺并转归社会所有的程度，可是那里的农业，虽然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却分散在人数众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之间，没有可能提出剥夺这些生产者的问题，那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该怎么办呢？

恩格斯的公式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也不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公式是在另一个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另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应当怎样。

于是就要问，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又已经具备，那该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

当然，不能把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拒绝夺取政权，应该等着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生产者破产，把他们变为雇农，并使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选择这样的"出路"的，如果他们不愿意使自己丢尽脸皮的话。

也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

路，因为这样的道路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几篇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社计划”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

（一）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二）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

（三）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应该逐步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中，集体农庄中；

（四）用一切办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五）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即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集体农庄商业，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转中排挤出去。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规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

有人说，商品生产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

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只有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于市场而资本家能够购买并在生产过程中加以剥削，就是说，只有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否则，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

但是，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生产资料已经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社会主义财产，如果雇佣劳动制度已经不存在，而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那又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不，不可以这样认为。要知道，我国社会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制度早已不存在了的社会。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有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而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这也是不对的。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这种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以及种子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实上是由集体农庄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尽管它们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这些土地。

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也象大约三十来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怎样来建立这种单一的统一的成分呢？是让国营成分于脆吞没集体农庄成分（这是很难设想的，因为这会被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剥夺），还是组织统一的**全民的**（有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经济机构，即起初有权计算全国一切消费品，而经过一个时期也有权例如以产品交换方式来分配产品的经济机构呢？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特

殊问题。

可见，**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所以，有一些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不对的，他们宣称，既然社会主义社会不消灭商品生产形式，那么在我国似乎就应当恢复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切经济范畴：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剩余价值、资本、资本利润、平均利润率等等。这些同志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认为既然有商品生产，就应该有资本主义生产。他们不了解，我国的商品生产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根本不同的。

此外，我认为，也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我所指的概念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这样一些概念。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是为了说明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泉源，即剩余价值，并且给予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是和资本主义关系完全适合的。但是现在，当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政权和生产资料，反而掌握着政权和占有生产资料的时候，还使用这些概念，这就非常奇怪了。现在，在我国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佣”，这真是十分荒谬的：仿佛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佣，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现在来讲“必要”劳动和“剩余”劳

动，也是令人非常奇怪的：仿佛在我国条件下，交给社会去扩大生产、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组织国防等等的工人劳动，对于现在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象用来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个人需要的劳动那样必要的。

应该指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他的这本已经不是研究资本主义而是用了一部分篇幅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著作中承认交给社会用于扩大生产，用于教育、保健事业、管理费用、后备基金等等的劳动，是与用来满足工人阶级消费需要的劳动同样必要的。

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学家应当消除旧概念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新情况之间这种不相适合的现象，而用适合新情况的新概念来代替旧概念。

我们能容忍这种不适合的现象到一定的时候，但是现在已经是我们应当最后肃清这种不适合的现象的时候了。

3.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

有时人们问，在我国，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是不是存在，是不是发生作用呢？

是的，是存在的，是发生作用的。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

在我国，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过买卖的商品交换，包括主要是个人消费的商品的交换。在这里，在这个领域中，价值规律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

但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

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这在领导生产时是不能不考虑到的。问题在于，抵偿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需要的消费品，在我国是作为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的，而商品是受价值规律作用的。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价值规律对生产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格问题等等，就具有现实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规律的。

这好不好呢？这并不坏。在我国现今条件下，这的确不坏，因为这种情况教育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来合理地进行生产，并使他们遵守纪律。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计算各种生产数值，精确地计算这些数值，并且同样精确地估量生产中的实有的东西，而不去侈谈凭空想出来的“大概数字”。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寻求、发现和利用生产内部潜在的后备力量，而不去糟蹋它们。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不断地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并使企业能够赢利。这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它促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迅速成长，迅速变成现今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生产的真正领导者。

糟糕的并不是价值规律影响我国的生产。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在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国在价格政策问题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紊乱现象。这里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个：不久以前，为了植棉业的利益，曾经决定调整棉花和谷物的比价，调整出售给棉农的谷物的价格，并提高交纳给国家的棉花的价格。于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不能不使中央

委员们感到惊异，因为按照这个建议，一吨谷物的价格差不多和一吨棉花的价格一样，而一吨谷物的价格和一吨面包的价格相等。中央委员们指出：由于磨粉和烘烤的额外费用，一吨面包的价格应当高于一吨谷物的价格；棉花总应当比谷物值钱得多，棉花和谷物的世界市场价格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建议人对于中央委员们的这些意见，没有能够说出任何合乎情理的话来。因此，中央只得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情，降低谷价，提高棉价。假如这些同志们的建议获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结果会怎样呢？那我们就会使棉农破产，就会没有棉花。

然而，这一切是不是说价值规律在我国也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有发生作用的广阔的场所，价值规律在我国是生产的调节者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前面已经说过，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活动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必须这样说。无疑地，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存在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不能不限制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及其对生产的影响程度。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代替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有我国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国整个的经济政策，它们都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要求制定的。

这一切就使得价值规律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使得价值规律在我国的制度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因此也就有了这个“令人惊异”的事实：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和蓬勃地发展，价值规律在我国却没有引导到生产过

剩的危机，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发生作用的广阔范围的同一个价值规律，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速度很低，却引导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有人说：价值规律是一切历史发展时期都一定适用的永恒的规律；如果说价值规律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时期会丧失其交换关系调节者的效力，那么它在这个发展阶段中仍将保持其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相互关系的调节者、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分配的调节者的效力。

这是完全不对的。正如价值规律一样，价值是与商品生产的存在相关联的一种历史范畴。商品生产一消失，价值连同它的各种形式以及价值规律，也都要随之消失。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上，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量，将不是以曲折迂回的方法，不是凭借价值及其各种形式来计算，如象在商品生产制度下那样，而是直接以耗费在生产产品上的时间数量即钟点来计算的。至于说到劳动分配，那么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劳动分配，将不依靠那时已失去效力的价值规律来调节，而是依靠社会对产品的需要量的增长来调节的。这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生产将由社会的需要来调节，而计算社会的需要，对于计划机关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种说法也是完全不正确的，这种说法就是：在我们现今的经济制度下，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上，价值规律仿佛调节着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没有用全力优先发展最能赢利的轻工业，而去发展往往赢利较少、有时简直不能赢利的重工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关闭那些

暂时还不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不能产生“应有效果”的重工业企业，也不开设确实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能产生“巨大效果”的轻工业的新企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依据仿佛调节着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的价值规律，把工人从那些对国民经济很需要但赢利很少的企业，调到更能赢利的企业中去。

显而易见，如果循着这些同志的脚步走去，那我们就不得不把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让给消费资料的生产。然而，放弃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消灭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可能性，因为不把生产资料的生产放在首要地位，就不能使国民经济不断增长。

这些同志忘记了，价值规律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在存在着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下，才能是生产的调节者。他们忘记了，在我国，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被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限制着的，因而，也是被大致反映了这个规律的要求的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限制着的。

某些同志由此作出结论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和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消灭着生产赢利的原则。这是完全不对的。情形正好相反。如果不从个别企业或个别生产部门的角度，不从一年的时间来考察赢利，而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从比方十至十五年的时间来考察赢利（这是唯一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方法），那么，个别企业或个别生产部门暂时的不牢固的赢利，就决不能与牢固的经久的高级赢利形式相比拟，这种高级赢利形式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及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所提供给我们的，因为

它们使我们避免那种破坏国民经济并给社会带来巨大物质损害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保证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度地不断地增长。

简略地说：不容置疑，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不能是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的“比例的调节者”。

4.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以及关于消灭它们之间的差别的问题

这个标题涉及一些本质上互不相同的问题，但是我把它们都合并在一章中，这并不是要把它们混为一谈，而只是为了节省篇幅。

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问题。产生这种对立的经济基础，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商业、信用系统的整个发展进程所造成的对农民的剥夺和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破产。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应该看作是利益上的对立。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农村对城市、对一般“城里人”的敌对态度。

无疑地，在我国，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利益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结果也正是这样。社会主义城市、我国工人阶级在消灭地主和富农方面所给予我国农民的巨大帮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基础，而不断地供给农民及其集体农庄以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更使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当然，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仍然是两个在地位上彼此不同的阶级。但是这个差别丝毫不削弱他们的友谊关系。恰恰相反，

他们的利益是在一条共同线上，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线上。因此，过去乡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尤其是对城市的憎恨，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是毫不奇怪的。

这一切都表明，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的基础，已经被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

当然，这不是说，城市和乡村之间对立的消灭应当引导到"大城市的毁灭"（见恩格斯《反杜林论》）①。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

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个问题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问题。产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中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之间是存在着分裂的。大家知道，工人对待厂长、工长、工程师及其他技术人员就好象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这种敌对态度就是在这个分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显然，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利益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它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也消失了。现在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并不是敌人，而是同志和朋友，都是一个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都极为关心生产的进步和改善，他们之间过去的仇视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至于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6页。——编者注

间的差别消失的问题，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提出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

这个问题是不是臆造出来的呢？它对于我们有没有什么实践的或理论的意义呢？决不能把这个问题看作是臆造出来的。恰恰相反，它对于我们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例如，如果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差别来说，那么在我国，这种差别不仅归结为农业的劳动条件与工业的劳动条件不同，而首先和主要是归结为在工业中我们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全民所有制，而在农业中我们却有着不是全民的，而是集团的、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情况使得商品流通保存下来，只有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这个差别消失时，商品生产及其一切后果才会随之消失。因此，不能否认，农业和工业之间的这个本质差别的消失，对于我们应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本质差别的问题，也必须这样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开始展开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以前，我国工业的发展是进行得并不顺当的，许多同志甚至提出了放慢工业发展速度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太低，远远落后于技术人员的水平。然而当社会主义竞赛在我国已具有群众性的时候，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正是在这以后，工业就以加快的速度向前迈进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竞赛具有了群众性呢？因为在工人中间有了整批整批的同志，他们不仅掌握了基本的技术知识，而且更前进了，与技术人员站在同一水平上，开始修正技师和工程师的意见，打破已经陈旧的现行定额，实行新的更现代的定额等等。假如不是少数几批工人，而是大多数工人都把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了工程技术人员

的水平，结果会怎么样呢？我国的工业就会提高到其他国家的工业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因此，不能否认，用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到技术人员水平的办法，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对于我们是不能不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某些同志断定说，将来，不仅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会消失，而且它们之间的**任何**差别也会消失。这是不对的。工业和农业之间本质差别的消灭，不能引导到它们之间任何差别的消灭。由于工业和农业中的工作条件有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某种差别无疑是会存在的，虽然是非本质的。甚至在工业中，如果就它的各种不同的部门来说，那么工作条件也不是到处一样：例如，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械化鞋厂工人的工作条件，采矿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某些差别，就更加会保存下来了。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必须这样说。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即文化技术水平的悬殊，无疑是会消失的。但是某种差别，虽然是非本质的差别，还会保存下来，这至少是因为企业领导人员的工作条件与工人的工作条件不一样。

持有相反论断的同志们所依据的，大概是我的某些言论中大家知道的一个说法，在那里说到了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消灭，而没有附带说明，那是指**本质**差别的消灭，而不是一切差别的消灭。同志们正是这样理解我的说法，以为它的意思是说一切差别的消灭。但这就表明，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必须把它抛掉，代之以另一个说法：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将会消灭，非本质差别将会保存下来。

5.关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加深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由这种危机产生的。在战争时期互相厮打的两个资本主义同盟，其中每一个都指望粉碎敌方，而获得世界霸权，它们都想从这里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美国指望击溃自己最危险的竞争者德国和日本，夺取国外市场、世界的原料资源，并取得世界霸权。

然而战争使这些指望落空了。诚然，作为美、英、法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竞争者的德国和日本是被击溃了。但同时，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却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

应该指出，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它们对于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92]体系的苏联、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事实上并没有窒杀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

当然，在这方面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封锁，而是在于战后时期中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和互助。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象苏联那

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结果，在这些国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

但是，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这里。

这是资本家自己也感觉到的，因为失去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市场是很难不感觉到的。他们竭力想用“马歇尔计划”、侵朝战争、军备竞赛、工业军事化来解脱这些困难情况。但是这很象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样。

由于这种情况，在经济学家面前便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固定的论点，仍旧有效呢？

（二）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① 的论点，仍旧有效呢？

我认为，不可以这样断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42页。——编者注

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

6.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

某些同志断定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国际条件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美国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控制到了这种程度，能够不让它们互相作战和彼此削弱；资本主义的先进分子对于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严重损害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已经汲取到这种程度，不会让自己再把资本主义国家卷入相互间的战争，——由于这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便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些同志错了。他们只看见显露在表面上的外部现象，而没有看见那些暂时还没有明显地发生作用、但终究会决定事变进程的潜在力量。

从外表上看来，一切都好象是"平安无事"：美国已使西欧、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仰其配给；德国（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都陷入了美国的铁爪中，顺从地执行着美国的意旨。但是如果以为，这种"平安无事"会"永世地"保存下去，以为这些国家将无止境地忍受美国的统治和压迫，以为它们不会设法挣脱美国的镣铐，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那就错了。

我们首先看一看英国和法国吧。无疑地，这两个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无疑地，廉价的原料和有保证的销售市场，对于它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可不可以设想，当美国人在按照"马歇尔计划"进行"援助"的掩盖下，打入英国和法国的经济，竭力把它变成美国经济的附属品的时候，当美国资本在英、法殖民地夺取原料和销售

市场，从而为英、法资本家的高额利润制造奇灾大祸的时候，英法两国竟会无止境地忍受现在的这种情况呢？如果这样说：资本主义的英国，接着还有资本主义的法国，归根到底将不得不从美国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同美国发生冲突，以便保证自己的独立地位，当然也保证自己的高额利润，——这岂不是更正确吗？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主要的战败国德国（西德）和日本吧。这两个国家现在在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可怜的生活。它们的工业和农业，它们的商业，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它们的整个生活，都被美国的占领"制度"加上了镣铐。要知道，这些国家昨天还是震撼了英国、美国、法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统治基础的帝国主义大国。如果认为这些国家不会设法重新站起来，打破美国的"制度"，奔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就等于相信神怪。

有人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从理论上讲来，这当然是对的。这不仅在现时、在目前是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对于资本主义说来，对苏联作战，即对社会主义国家作战，是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更加危险，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第二，因为资本家虽然为了"宣传"的目的叫嚷什么苏联的侵略，可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苏联会侵略，因为他们估计到苏联的和平政策，并且知道苏联自己是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曾经有人认为德国是被彻底击溃

了，正如现在某些同志认为日本和德国是被彻底击溃了一样。当时也有人谈论和在报刊上叫嚷美国已使欧洲仰其配给，说德国再也不能站起来，说从此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再也不会发生了。虽然如此，但是，德国却在被打败后，经过这么十五至二十年的工夫，又从奴役下挣脱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作为一个强国站立起来并站住了脚。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帮助德国在经济上站立起来并提高它的军事经济潜力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英国和美国。当然，美国和英国帮助德国在经济上站立起来，意在指使德国站立起来之后反对苏联，即利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德国却首先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对英、法、美集团。而当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宣战的时候，英、法、美集团不仅没有与希特勒德国联合起来，反而不得不同苏联结成联盟来反对希特勒德国。

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试问，有什么保证能使德国和日本不重新站立起来，不设法从美国的奴役下挣脱出来，从而过自己的独立生活呢？我认为这样的保证是没有的。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是仍然存在的。

有人说，既然现今已经有强大的人民力量成长起来，它们正在保卫和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所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战争的论点，应该认为是已经过了时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现今的和平运动，其目的是唤起人民群众去为维护和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而斗争。因而，它所抱的目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和

建立社会主义，——它只限于为维护和平而斗争的民主目的。在这一点上，现今维护和平的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运动是不同的，因为后一运动曾经走得远些，它抱有社会主义的目的。

可能，在各种情况的一定凑合下，争取和平的斗争会在某个地方发展成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但这将不再是现今的和平运动，而是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了。

最可能的是，现今的和平运动即维护和平的运动，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会使**上述这个**战争得以防止，使它暂时推迟，使**当前的**和平暂时维持，使好战政府辞职而代之以别的愿意暂时维持和平的政府。这当然是好的。甚至是很好的。但是，这仍然不足以根本消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其所以不足，是因为纵然有保卫和平运动的这一切胜利，但帝国主义仍然保持，仍然存在，因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也仍然是存在的。

要消除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

7.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曾经几次在讨论会上提出过。在这方面发表过各种不同的意见，直到最荒谬的意见。诚然，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强烈的反应，而且在这方面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可是，参加讨论的人谁也没有否认这些规律的存在。

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不是存在呢？是的，是存在的。这规律是什么呢？它的特点何在呢？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这样一种规律，它不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某一个别方面或

某些个别过程，而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

价值规律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呢？不是的。价值规律首先是商品生产的规律。它象商品生产一样，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过，而且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后，例如在我国，也继续存在着，诚然，它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限制了的。当然，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广阔的作用范围，它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方面发生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不仅不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资本主义利润的基础，甚至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价值规律不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依据同一理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或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都不能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有人说，平均利润率的规律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是不对的。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不能满足于平均利润，何况这种平均利润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高而有下降的趋势。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比较正常地实现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最大限度的利润。

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个概念的，是剩余价值规律，即资本主义利润的产生和增殖的规律。这个规律确实预先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然而，剩余价值的规律是过于一般的规律，它没有涉及最高利润率的问题，而保证这种利润率却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要弥补这个缺陷，就必须把剩余价值规律具体化并加以发展，使之适应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同时要考虑到，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随便什么利润，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才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有人说，对于资本主义在现今条件下的发展来说，平均利润总还可以认为是足够的。这是不对的。平均利润是最低限度的赢利，再低下去，资本主义生产就会成为不可能了。但是，如果认为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头子夺取殖民地、奴役各国人民、策动战争只是想给自己保证平均利润，那就可笑了。不，不是平均利润，也不是那照例比平均利润稍为高些的超额利润，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润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动力。正是由于必须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垄断资本主义才采取这样冒险的步骤，例如奴役和不断掠夺殖民地和其他落后国家，把许多独立国变为附属国，组织新战争（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头子们看来，战争是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最好的"生意"），以及夺取世界的经济霸权。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意义之一也就在于：这个规律既然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方面一切最重要的现象，既然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涨和危机，它的胜利和失败，它的长处和短处，——它的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于是就使我们能够了解和说明这一切现象。

请看许许多多"令人惊异"的例子中的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实践中，有过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蓬勃发展的事实，那时资本家表现为先进技术的旗手、生产技术发展方面的革命家。但是大家同样知道，也有过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停止发展的另一种事实，那时资本家表现为新技

术发展方面的反动者，并常常转而使用手工劳动。

怎样来说明这种惊人的矛盾呢？只有用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必要性才能加以说明。当新技术向资本主义预示着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拥护新技术。当新技术不再预示着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反对新技术，主张转而采用手工劳动。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情形，就是如此。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不是存在呢？是的，是存在的。这个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何在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因而，不是保证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不是带有从高涨到危机以及从危机到高涨的间歇状态的生产发展，而是生产的不断增长；不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来的技术发展中的周期性的间歇状态，而是生产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不断完善。

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是不对的。如果不知道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是为着什么任务而进行，或者任务不明确，那么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以及或多或少真实地反映这一规律的国民经济计划化，是不能自行产生任何效果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只是在具有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所要实现的任务时，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本身并不能提供这个任务。国民经济计划化尤其不能提供这个任务。这个任务是包含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中，即表现于这一规律的上述要求内。因此，国民经济

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只是在它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依据时，才能充分发挥起来。

至于说到国民经济的计划化，那么，它只有遵守下列两个条件，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这两个条件是：（一）它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要求；（二）它在各方面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

8. 其 他 问 题

（1）关于封建制度下的经济外的强制问题。

当然，经济外的强制在巩固地主-农奴主的经济权力方面起过作用，但封建制度的基础并不是经济外的强制，而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2）关于集体农庄农户的个人财产问题。

如果教科书未定稿中说"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有乳牛、小牲畜和家禽供个人使用"，那就不正确了。大家知道，事实上，乳牛、小牲畜、家禽等等不是供集体农庄内农户个人使用，而是农户的个人财产。"供个人使用"这个说法，大概是从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中搬来的。但在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中是有错误的。在更加缜密制定的苏联宪法中，则是另外一种说法，即是：

"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拥有此园地上所有的副业，以及住宅、食用牲畜、家禽和小农具为其个人财产。"

这当然是正确的。

此外，应该更详细地说，每个集体农庄庄员按当地的条件，有一头到多少头乳牛，多少只绵羊、山羊、猪（也是按当地的条件由多少到多少）以及不限数量的家禽（鸭、鹅、鸡、火鸡）作为他个人的财产。

这种详细叙述对于我们的外国同志是有巨大意义的，因为他们想确切知道，在我国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是他个人的财产。

（3）关于农民交给地主的地租数额问题，以及关于购买土地的费用数额问题。

在教科书未定稿中说，由于土地收归国有，“农民免除了交给地主的地租，其总额每年约为五亿卢布”（应当说“金卢布”）。应该把这个数字弄准确，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数字所包括的并不是整个俄国的地租，而只是俄国大多数省份的地租。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在俄国的一些边区，地租是以实物缴纳的，看起来教科书未定稿的作者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此外，必须注意到，农民不仅免除了地租，而且也免除了每年购买土地的费用。教科书未定稿中是否考虑到了这一点呢？在我看来，并没有考虑到，然而这是应该考虑到的。

（4）关于垄断组织与国家机关的结合问题。

“结合”这个名词是不适当的。这个名词只是很肤浅和叙述式地表明垄断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接近，可是没有揭示这种接近的经济意义。问题在于，这种接近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不单是结合，而是国家机关服从于垄断组织。因此，应该去掉“结合”这个名词，而代之以“国家机关服从于垄断组织”这个说法。

（5）关于在苏联使用机器的问题。

在教科书未定稿中说：“在苏联，在机器能给社会节省劳动的一切场合下，都是使用机器的。”这完全不是应有的说法。第一，机器在苏联总是给社会节省劳动的，因此在苏联的条件下机器不给社会节省劳动的情形是根本没有的。第二，机器不仅节省劳动，而且同时还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因此，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情况不

同，在我国的条件下，工人是极乐意在劳动过程中利用机器的。

所以应该说，没有任何地方象在苏联这样乐意使用机器，因为机器给社会节省劳动，并且减轻工人的劳动；由于在苏联没有失业的现象，所以工人极乐意在国民经济中利用机器。

（6）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问题。

当人们谈到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通常总是指在业工人，而没有估计到所谓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物质状况。这样看待工人阶级物质状况的问题，是不是正确呢？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既然有失业工人后备军，而它的成员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无法生存，那么失业工人是不能不列入工人阶级之中的，但是，既然他们列入工人阶级之中，那么他们的赤贫状况，就不能不影响在业工人的物质状况。因此我认为，在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也应该估计到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状况。

（7）关于国民收入问题。

我认为，**一定**要在教科书未定稿内添进关于国民收入的新的一章。

（8）关于教科书中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者列宁和斯大林的专门一章的问题。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之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章，应该从教科书里删去。这一章在教科书中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它并未提供什么新东西，而只是乏味地重复那些在前几章中已经比较详细讲过的东西。

在其余的问题上，我对于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列昂节夫、谢皮洛夫、加托夫斯基和其他同志的“建议”，没有什么意见。

9.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国际意义

我认为，同志们没有估计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全部意义。这本教科书不仅对于我们苏联的青年是需要的；它对于各国共产党人以及同情共产党人的人们是特别需要的。我们的外国同志们都想知道，我们是怎样挣脱了资本主义的镣铐的，我们是怎样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了全国经济的，我们是怎样达到了和农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我们是怎样使得我们这个不久以前还是贫弱的国家变成了富强的国家的，什么是集体农庄，为什么我们虽然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了，但还没有消灭商品生产、货币、商业等等。他们想知道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并不单纯出于好奇，而是要向我们学习，并为了自己的国家来利用我们的经验。因此，一本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国内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

因此，需要一本能成为不仅是国内革命青年而且是国外革命青年的必读的教科书。它的篇幅不应太大，因为篇幅太大的教科书不能作为必读书，而且很难领会、掌握。但是它应当包含有关我国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和殖民地体系的经济的一切基本东西。

某些同志在讨论时提议给教科书添进许多新的章节，历史家就历史方面、政治家就政治方面、哲学家就哲学方面、经济学家就经济方面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这会使得教科书的篇幅无限扩大。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这本教科书是用历史方法来阐明政治经济学问题，但这还不是说，我们应当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变成经济关系史。

我们需要一本五百页至多不超过六百页的教科书。这将是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读书，是给予世界各国年轻共产党人的好礼物。

可是，由于外国大多数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水平不够，这样的教科书也会给予这些国家的非年轻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很大的好处。

10. 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办法

某些同志在讨论时过于热心地"斥责"教科书未定稿，责骂作者们的错误和疏忽，肯定说未定稿失败了。这是不公正的。当然，教科书中是有错误和疏忽的，错误和疏忽在大事情中差不多总是有的。但是不管怎样，绝大多数参加讨论会的人终究承认，教科书未定稿可以作为将来教科书的基础，只要作若干修正和补充就可以了。的确，只要把教科书未定稿和现在通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教科书未定稿比现有的一切教科书都高明得多。教科书未定稿的作者们的巨大功绩就在这里。

我认为，要改善教科书未定稿，应该指派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其中不仅有教科书的作者们，不仅有赞成讨论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的人，而且有反对讨论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和猛烈批评教科书未定稿的人。

最好是委员会中也包括一位有经验的统计学家来检查数字并给未定稿添加新的统计材料，而且也包括一位有经验的法学家来检查措词的确切性。

应该暂时解除委员会委员的其他任何工作，在物质方面给予他们充分的保证，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力于教科书的编纂工作。

此外，应该委派一个比方说由三个人组成的校审委员会来最后校审教科书，这对于求得文体的统一也是必要的，可惜在教科书

未定稿中没有做到这一点。

把最后定稿的教科书送交中央的期限为一年。

约·斯大林

1952年2月1日

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

诺特京同志：

我没有急于回信，因为你所提出的问题，我认为不是紧急的。加上另外有些问题带有紧急性，自然就把你的来信搁下了。

现在我来逐点回答。

关于第一点。

在我的《意见》中有一个大家知道的论点：社会在科学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就能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你断定这个论点不适用于其他社会形态，说它只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才有效，说经济过程的自发性质，比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社会没有可能利用经济规律以利于社会。

这是不对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例如，在法国，资产阶级就曾经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大家知道的规律来反对封建制度，推翻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并且使这种生产关系适合封建制度内部生长起来的生产力的性质。资产阶级做到了这一点，并不是它有特殊本领，而是因为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这样做。封建主反抗这一点，并不是由于他们愚钝，而是由于他们的切身利益要求他们阻挠这一规律的实现。

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应该这样说。工人阶级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且使这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工人阶级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由于它有特殊本领，而是因为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这样做。已从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先进力量变成了反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竭力反抗这一规律的实现，——它之所以反抗，并不是由于它没有组织性，也不是因为经济过程的自发性质推动它去反抗，而主要是由于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反对这一规律的实现。

由此可见：

1. 不仅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而且在其他社会形态下，都能在这种或那种程度内利用经济过程、经济规律以利于社会；

2. 在阶级社会里，利用经济规律无论何时何地都有阶级背景，而且为社会的利益来利用经济规律的旗手，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先进阶级，而衰朽的阶级则加以反抗。

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和其他曾经在历史上完成过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和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消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剥削，而是消灭任何剥削；而其他阶级的革命，却只是消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剥削，局限在它们和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相矛盾的狭隘阶级利益的范围以内。

在《意见》中说到为社会的利益来利用经济规律的阶级背景。那里说："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规律或多或少是顺利的；与此不同，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规律，却要遇到这些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但是你没有

注意到这一点。

关于第二点。

你断定说，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达到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的完全适合，而在其他社会形态下，只能实现不完全的适合。

这是不对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时代，当资产阶级破坏了封建的生产关系，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的时候，无疑有过一个时期，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否则，资本主义就不会有象它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有过的那样迅速的发展了。

其次，“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的现象。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

既然这样，那么“完全适合”这种说法该怎样来理解呢？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这种力量，当然不难克服，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

关于第三点。

从你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你把我们国有化企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首先是生产工具，看作是商品。

可不可以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看作是商品呢？据我看来，无论如何是不可以的。

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商品所有者在出售商品之后，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而买主则变成商品的所有者，他可以把商品转售、抵押或让它腐烂。生产资料是否适合于这个定义呢？显然，是不适合的。第一，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第二，生产资料所有者——国家，把生产资料交给某一个企业，丝毫不失去对它们的所有权，相反地，是完全保持着所有权的。第三，企业的经理从国家手中取得了生产资料，不但不会成为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反地，是被确认为受苏维埃国家的委托，依照国家所交下的计划，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

由此可见，无论如何不能把我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

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又讲生产资料的价值，讲它们的成本，讲它们的价格等等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是为了计价、为了核算、为了计算企业的盈亏、为了检查和监督企业所必需的。但这只是事情的形式方面。

第二，这是为了在对外贸易中便于把生产资料出售给外国所必需的。这里，在对外贸易领域内，并且**仅仅是在这个领域内**，我们的生产资料才确实是商品，才确实被出售（不是带引号的出售）。

这样看来，在对外贸易流通领域内，我国企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无论在实质上或形式上都保持着商品的属性，可是在国内经济流通领域内，生产资料却失去商品的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等）。

为什么会有这种独特现象呢？

原来，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并不是以变革的方式，而是以逐渐变化的方式进行的，旧的东西并不是干脆被废除干净，而是把自己的本性改变得与新的东西相适应，仅仅保持着自己的形式；至于新的东西，也不是干脆消灭旧的东西，而是渗透到旧的东西里面去，改变旧东西的本性和职能，并不破坏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的形式来发展新的东西。不仅商品是这样，而且我国经济流通中的货币也是这样，连银行也是这样，它们失去自己旧的职能并取得了新的职能，同时保持着旧的形式而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利用。

如果从形式上，从现象表面的过程来看问题，就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仿佛资本主义的范畴在我国经济中也保持着效力。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问题，即把经济过程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把深处的发展过程和表面现象严格区别开来，那就可以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的旧范畴在我国保留下来的主要是形式，是外表，实质上这些范畴在我国已经适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根本改变了。

关于第四点。

你断定说，价值规律对于农业中所生产的、依照收购价格交售给国家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发生着调节的影响。你在这里所指的是原料——例如棉花——这样的"生产资料"。在这里你还可以再加上亚麻、羊毛及其他农业原料。

应该首先指出，在这种情形下，农业所生产的并不是"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之一的原料。不能玩弄"生产资料"这个术语。马克思主义者说到生产资料的生产时，首先是指生产工具的生产，——马克思把这叫做"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

的骨胳系统和肌肉系统”，这个系统组成“一定社会生产时代的突出特征”。① 把一部分生产资料（原料）和包括生产工具在内的生产资料等量齐观，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和其他一切生产资料来比，生产工具是具有决定作用的。谁都知道，原料本身不能生产生产工具，虽然某几种原料也是生产生产工具所必需的材料，可是，没有生产工具是不能生产任何原料的。

其次，价值规律对农产原料的价格的影响，是否象你诺特京同志所断言的那样是**调节**的影响呢？如果我国存在着农业原料价格的“自由”涨跌，如果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在我国发生作用，如果我国没有计划经济，如果原料的生产不是由计划来调节的，那么，价值规律的影响就会是调节的影响了。但是，因为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并没有这些“如果”，所以价值规律对于农业原料价格的影响无论如何不会是调节的影响。第一，我国农业原料的价格是固定的，由计划规定的，而不是“自由”的。第二，农业原料的生产规模并不是由自发的力量，并不是由什么偶然的因素来决定，而是由计划来决定的。第三，为生产农业原料所必需的生产工具，不是集中在个别人或个别集团手中，而是集中在国家手中。既然这样，还有什么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呢？其实，价值规律本身也是由社会主义生产所特有的上述事实来调节的。

因此，不能否认，价值规律是影响农业原料价格的形成的，它是这方面的因素之一。但是尤其不能否认，这种影响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调节的影响。

关于第五点。

说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赢利，我在《意见》中曾经反驳了某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编者注

些同志，这些同志肯定说，既然我国计划性的国民经济并不偏重于赢利的企业，既然容许不赢利的企业也和这些企业并存，那它仿佛抹煞了经营的赢利原则本身。在《意见》中说，从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着眼的赢利，决不能和社会主义生产所提供给我们的那种高级赢利相比，因为社会主义生产使我们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并保证我们的生产不断提高。

但是，如果从此得出结论说，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的赢利没有特别价值，不值得重视，那就不对了。这当然是不对的。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的赢利，从发展我国生产的观点来看，是有巨大意义的。无论在计划建设或计划生产时，这都是应该注意到的。这是我国现今发展阶段上经济活动方面的起码知识。

关于第六点。

你在谈到资本主义时所说的“大大改变了形态的扩大的生产”，不知道该怎样了解。应该说，这样的生产，而且还是扩大的生产，是世界上所没有的。

显然，在世界市场已经分裂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已经开始缩小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生产的增长和减缩——一定还会存在。不过，这些国家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减缩下去。

关于第七点。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的。这是总危机的第一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展开了总危机的第二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一次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二次危

机，应该看作不是两次单独的、彼此隔离的危机，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发展的两个阶段。

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否仅仅是政治危机或仅仅是经济危机呢？二者都不是。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同时也就很清楚，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

约·斯大林

1952 年 4 月 21 日

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

今年 3 月 20 日，雅罗申科同志写了一封信分送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信中谈到在大家知道的十一月讨论会上所讨论过的一些经济问题。他在这封信中申诉说，在讨论会的一些总结性的主要文件中以及在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中，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没有得到任何反映”。此外，雅罗申科同志在信中还建议：请准许他在一年或一年半内编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给他两个助手来作这一工作。

我认为，必须从实质上来考察雅罗申科同志的申诉和他的建议。

我们先从他的申诉谈起。

在上述文件中没有得到任何反映的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

一

雅罗申科同志的主要错误

如果用一两句话来评定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那就应该说，他的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是极端错误的。

雅罗申科同志的主要错误就是，他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过分夸大了生产力的作用，同时还过分缩小了生产关系的作用，竟至宣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一部分。

雅罗申科同志同意承认生产关系在"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条件下有某种作用，因为在这里，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但是他把这种作用只看作是消极的作用，是一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的作用。生产关系的其他职能，任何积极的职能，雅罗申科同志是看不到的。

至于说到已经没有"对抗性的阶级矛盾"、生产关系"再也不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时，雅罗申科同志便认为，在这里，生产关系的任何独立的作用都在消失，生产关系不再是发展的重大因素，而且被生产力所吞没，犹如部分被整体吞没一样。雅罗申科同志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生产力的组织中，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手段、一个成分"（见雅罗申科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雅罗申科同志回答说："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关系，**而在于**探讨和发展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化的理论。"（见雅罗申科同志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

正因为如此，雅罗申科同志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这些经济问题，如我国经济中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商品流通、价值规律等等，也就不感到兴趣，认为这些都是只能引起烦琐争论的次要问题。他公然宣称，在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是争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如价值、商品、货币、信贷等等的作用，这种争论在我们这里常常带有烦琐的性质，而是健康地讨论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合理组织以及对这种组织的科学论证”（见雅罗申科同志在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这样就成了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了。

雅罗申科同志以为，只要安排好“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就可以没有特别困难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了。他认为，只要这样做，就完全足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公然宣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斗争，就是在社会生产中正确组织生产力和合理使用生产力的斗争。”（见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雅罗申科同志郑重宣称：“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

这样，“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就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了。

雅罗申科同志从这一切便作出结论说，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而应该有两种政治经济学：一种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各种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其对象是研究人们的生产关系；另一种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其对象应当不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而是研究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

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就是这样。

对于这种观点可以讲些什么呢？

第一，说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只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这是不对的。当马克思主义者讲到生产关系的阻碍作用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任何生产关系，而只是已经不能适合生产力发展、因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但是，大家知道，除了旧生产关系以外，还有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关系。可不可以说，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归结为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没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注定要萎缩下去，如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形一样。

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苏联工业的生产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中有巨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1917年10月用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如果我国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中没有发生这种变革，我国的生产力就会萎缩下去，如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力萎缩的情形一样。

谁也不能否认，我国农业的生产力在最近二十至二十五年中有巨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在三十年代在农村中没有用新的集体化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没有这种生产的变革，我国农业的生产力就会萎缩下去，如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业的生产力萎缩的情形一样。

当然，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永远是新的，而且也不永远是新的，它开始变旧，并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它开始失去其为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那时候，就出现新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经变旧了的生产关系，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就是充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进者。

生产关系从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以及从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要素之一。这是现在一切初学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的。看来雅罗申科同志却不知道这一点。

第二，说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独立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在消失，说生产关系是在被生产力吞没，说社会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归结为生产力的组织，这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是把社会生产看作一个整体，它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社会生产力（社会对自然力的关系，社会在与自然力作斗争中来取得必要的物质资料）和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虽然它们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的。正因为它们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它们能够互相影响。硬说这两个方面中有一个可以被另一个吞没而变成它的组成部分，就是极严重地违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说：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429页）①

可见，社会生产是由两个方面组成，这两个方面虽然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但却反映两种不同的关系，即人们对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只有具备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编者注

生产的这两个方面，才能有社会生产，——不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其他社会形态下都是一样。

雅罗申科同志显然是不完全同意马克思的。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个原理是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归结为合理组织生产力的问题，而抛开了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并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脱节。

这样，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波格丹诺夫的《普遍组织科学》[93]之类的东西了。

这样，雅罗申科同志在把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个正确思想拿过来以后，却把这个思想弄到了荒谬的地步，竟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作用；而且，本来是有血有肉的社会生产，在他那里却成了片面的和干瘪的生产工艺学，即布哈林的"社会组织技术"①之类的东西了。

马克思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即在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约·斯大林注〉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②

这就是说，每个社会形态，连社会主义社会也在内，都有自己的由人们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于是发生一个问题：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究竟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怎样的

① 参看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编者注

呢？大家知道，雅罗申科同志已经取消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这个多少带独立性的领域，而把生产关系剩下的一点点残余归并到生产力组织之内。试问，社会主义制度有没有它自己的经济基础呢？看起来，既然生产关系这一多少独立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消失，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只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了。

这样就成了没有自己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了。这是相当可笑的事情……

一般讲来，没有自己经济基础的社会制度是不是可能的呢？雅罗申科同志显然认为是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却认为，这样的社会制度在世界上是没有的。

最后，说共产主义是生产力的合理组织，说生产力的合理组织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了，说只要合理地组织生产力，就可以没有特别困难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不对的。在我们的文献中，对于共产主义有另一个定义，另一个公式，即列宁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①。雅罗申科同志显然不喜欢列宁的公式，而代之以他自己杜撰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

第一，谁也不明白，雅罗申科同志所吹嘘的这个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或“合理”组织究竟是什么，它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雅罗申科同志在全体讨论会和分组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几十次重复这个神话般的公式，然而他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没有试图用片言只字来说明，究竟应该怎样了解这个仿佛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的生产力的“合理组织”。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80页。——编者注

第二，如果对这两个公式加以选择的话，那么应该抛弃的，就不是唯一正确的列宁的公式，而是雅罗申科同志的所谓公式，他的这个公式显然是臆造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是从波格丹诺夫的武器库——《普遍组织科学》中拿来的东西。

雅罗申科同志以为，只要做到合理地组织生产力，就能获得极丰富的产品并过渡到共产主义，就能从"按劳分配"的公式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这是大错特错的，这暴露了他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一窍不通。雅罗申科同志过于简单地、象小孩那样简单地想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雅罗申科同志不了解，如果让集体农庄集团所有制、商品流通等等经济事实仍然存在，那就既不能获得能满足社会一切需要的极丰富的产品，也不能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雅罗申科同志不了解，在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以前，社会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造和文化改造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劳动将在社会成员的心目中从仅仅是维持生活的手段变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公有制则成为社会存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基础。

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1.必须切实保证的，不是生产力的神话般的"合理组织"，而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

2.必须用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

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别的什么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以利于社会。

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是错误的。当然，我国现今的生产关系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它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推动生产力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但是，如果以此自满，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只要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而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如果我们执行类似雅罗申科同志所推荐的不正确的政策，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

因此，领导机关的任务在于及时地看出日益增长的矛盾，并及时地采取措施，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增长，来克服这种矛盾。这里所涉及的首先是集团的即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商品流通这样一些经济现象。当然，在目前，这些现象还被我们有成效地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且它们对于我国社会肯定是有益的。毫无疑问，它们在最近的将来也还会是有益的。但同时这些现象已在开始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因为它们造成一种障碍，妨碍把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把农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如果看不出这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盲目了。不容置疑，愈向前去，这些现象就会愈加阻碍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所以，任务就在于，通过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办法，通过以产品交换制——也是逐渐地——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

3.必须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致由于现存的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为了做到这点，究竟需要什么呢？

如果认为不用大大改变现今的劳动状况，就可以使社会成员的文化达到这样巨大的发展，那就不正确了。为了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把每天的劳动时间至少缩短到六小时，然后再缩短到五小时。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来获得全面教育所必需的。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实行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自由选择职业，而不致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所必需的。再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至少提高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办法是不仅直接提高货币工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继续不断地降低日用品价格。

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就是这样。

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后，才可以希望，劳动将在社会成员心目中从累赘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①，"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恩格斯）②，公有制将被社会全体成员看作是社会存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基础。

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后，才可以从社会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将是从一种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到另一种更高的经济即共产主义经济的根本过渡。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333页。——编者注

可见，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件事，并不象雅罗申科同志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如果象雅罗申科同志那样，企图把这件需要进行极大经济变更的复杂多样的事情整个归结为“生产力的合理组织”，那就等于用波格丹诺夫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

二

雅罗申科同志的其他错误

1.雅罗申科同志从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出发，作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对象的不正确的结论。

雅罗申科同志认为每一社会形态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经济规律。他从这点出发，就否认需要有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但他是完全不对的，他在这里是与恩格斯、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背道而驰了。

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反杜林论》）①。因此，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某一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发展规律，而是各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发展规律。

大家知道，列宁是完全同意这点的，他在对布哈林的小册子《过渡时期的经济》所作的评注中说，布哈林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商品生产，首先是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这是不对的；他同时指出，在这里，布哈林是“比恩格斯倒退了一步”②。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中所下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与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编者注

② 参看《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页。——编者注

此完全符合的。在这个未定稿中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规律”的科学。

这是很明白的。各种社会形态在它的经济发展中，不仅服从自己特有的经济规律，而且还服从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例如，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的规律，在一切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关系的规律。所以，各个社会形态不仅以自己特有的规律互相分开着，而且以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互相联系着。

恩格斯说得完全对：

“要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反杜林论》）①

显然，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上，雅罗申科同志是和布哈林相呼应的。

其次，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在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如价值、商品、货币、信贷等等，**而是**健康地讨论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因而**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探讨和发展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计划化的理论等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在丧失自己独立的作用，并被生产力吞没而成为它的组成部分。

必须说，在我们这里还没有一个发了疯的“马克思主义者”讲过这种胡说八道的话。没有经济问题即生产问题的社会主义政治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0页。——编者注

经济学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吗？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用生产力组织问题来代替经济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雅罗申科同志正好是这样做的，——他在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他与布哈林扭在一起了。布哈林**说过**，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政治经济学也必定消灭①。雅罗申科同志没有这样说，却在这样**做**，却在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诚然，他同时装出不完全同意布哈林的样子，但这是诡计，而且是一钱不值的诡计。事实上，他所做的正是布哈林所鼓吹而为列宁所反对的事情。雅罗申科同志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

其次，雅罗申科同志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归结为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等。但是他大错特错了。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等，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是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混为一谈。雅罗申科同志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所以他碰壁了。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经济政策则由此作出实际结论，把它们具体化，在这上面建立自己的日常工作。把经济政策的问题堆压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葬送这门科学。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②；(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

① 参看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编者注

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这个定义中没有用恩格斯定义中的“交换”一词。所以没有用，是因为“交换”一词通常被许多人了解为商品交换，这种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而只是某些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现象，这有时就会引起误会，虽然恩格斯所说的“交换”不仅是指商品交换。但是，恩格斯用“交换”一词所指的东西，显然在上述定义中已作为其组成部分包括在内了。因而，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这个定义，就其内容讲来，是和恩格斯的定义完全符合的。

2.当人们谈到某一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时，他们通常是从下列这点出发的：社会形态不能有几个基本经济规律，它只能有某一个基本经济规律来作为**基本**规律。不然的话，每个社会形态就会有几个基本经济规律，而这是和基本规律的概念本身相矛盾的。然而，雅罗申科同志并不同意这点。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以不是一个，而是几个。这是难以相信的，但这是事实。他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中说：

“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总量的多少和比例，是由被吸引到社会生产中的现有劳动力和劳动力增长的前途来决定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构。”

这是他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雅罗申科同志在同一发言中宣称：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比例关系，是由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决定的，这种生产规模必须把一切能劳动的人口吸引到社会生产中来。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同时又是我国宪法根据苏联人享有劳动权这点所提出的要求。”

这是所谓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最后，雅罗申科同志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宣称：

"从这点出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在我看来，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生产不断增长和日益完善。"

这已经是第三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了。

所有这些规律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呢，或者仅仅它们中间的一个才是呢？如果是它们中间的一个，那么究竟是哪一个呢？对于这些问题，雅罗申科同志在最后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并没有给予回答。他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表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时，想必是"忘记了"他在三个月前全体讨论会上的讲话中他已经表述过的其他两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大概他以为别人不会注意这个很成问题的手法。但他的打算显然是落空了。

我们就假定，雅罗申科同志所表述的前两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已不存在，就假定雅罗申科同志现在认为在他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所表述的第三个公式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我们来看一看雅罗申科同志的这封信吧。

雅罗申科同志在这封信中说，他不同意斯大林同志在《意见》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定义。他说：

"在这个定义中主要的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这里表明，生产是达到满足需要这个主要目的的手段。这个定义使人有根据认为，你所表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不是从生产占首要地位出发，而是从消费占首要地位出发的。"

显然，雅罗申科同志完全没有了解问题的本质，并且看不见，谈论消费或者生产占首要地位，这与问题毫不相干。当人们讲到某种社会过程对其他过程占首要地位时，他们的出发点通常是：这两种过程多少是同一类的。可以而且必须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对消费资料的生产占首要地位，因为在这两种场合下，我们所说的都

是生产，因而它们多少是同一类的。但决不能说消费对生产占首要地位或生产对消费占首要地位，如果这样说，那就是不正确的。因为生产和消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诚然，这是两个互相联系着、但毕竟各不相同的领域。雅罗申科同志显然不了解，这里所说的不是消费或生产占首要地位，而是社会给社会生产定出什么**目的**，它使社会生产——比方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服从于什么**任务**。因此，雅罗申科同志关于“生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基础，犹如是其他任何社会的生活基础一样”的说法，也是与问题毫不相干的。雅罗申科同志忘记了，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他忘记了，跟满足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是会衰退和灭亡的。

究竟可不可以讲社会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讲资本主义生产或社会主义生产所服从的任务呢？我以为是可以而且应当的。

马克思说：

“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在其发展的形式上）；不是产品，而是剩余产品。从这一观点出发，劳动本身只有在为资本创造利润或剩余产品的情况下才是生产的。如果工人不创造这种东西，他的劳动就是非生产的。因此，所使用的生产劳动量只是在剩余劳动量由于它——或者比例于它——而增长的情况下，才会使资本感到兴趣。我们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东西，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如果劳动不产生这种结果，它就是多余的，就要被制止。

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在这种结果不是靠工人的过度劳动取得的情况下，这是资本的这样一种趋势：力图用尽可能少的花费——节约人力和费用——来生产一定的产品……

从这种理解来看，工人本身就象他们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表现的那样，只是生产资料，而不是目的本身，也不是生产的目的。”（见《剩余价值理论》第

2卷第2册)①

马克思这些话之所以精辟，因为这些话不仅简要而精确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提示了应当向社会主义生产提出的主要目的，主要任务。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取得利润，至于消费，只有在保证取得利润这一任务的限度内，才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在这以外，消费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就失去意义。人及其需要就从视野中消失了。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应当服从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象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中所说的那样，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②。

雅罗申科同志以为这里所说的是消费对生产"占首要地位"。这当然是糊涂想法。其实，我们这里的问题不是消费占首要地位，而是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它的主要目的——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因此，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这样。

雅罗申科同志想保持生产对消费的所谓"占首要地位"，于是断定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条件的生产不断增长和日益完善"。这是完全不对的。雅罗申科同志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624—625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69页。——编者注

粗暴地歪曲了和损害了斯大林同志《意见》中所表述的公式。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却把生产从手段变成了目的，而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却被取消了。结果弄成生产增长是为了生产增长，生产是目的本身，而人及其需要就从雅罗申科同志的视野里消失了。

所以，毫不奇怪，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人既已消失，雅罗申科同志"概念"里剩下的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也随之消失了。

这样，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就弄成了不是生产对消费"占首要地位"，而好象是资产阶级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占首要地位"这类的东西了。

3.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问题是要单独谈一谈的。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它不包含对于其他社会形态——其中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能发生效力的什么东西。他说：

"把马克思给资本主义经济制定的再生产公式搬到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上来，是对马克思学说作教条主义理解的结果，而且是和他的学说的本质相矛盾的。"（见雅罗申科同志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

其次，他断定说："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不能作为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基础。"（同上）

讲到马克思在其中规定了生产资料的生产（第Ⅰ部类）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第Ⅱ部类）之间的一定比例关系的简单再生产理论时，雅罗申科同志说：

"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是由马克思的第Ⅰ部类的 v＋m 和第Ⅱ部类的 c 这个公式① 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条

① 在这里，v 指可变资本，m 指剩余价值，c 指不变资本。这个公式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第 20 章。——编者注

件下，上述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在发展中的相互联系是不应当存在的。”（同上）

他断定说：“马克思所制定的关于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的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适用的，因为马克思这个理论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规律。”（见雅罗申科同志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

雅罗申科同志就是这样糟蹋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

当然，马克思由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结果而制定出来的再生产理论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自然也就具有商品的资本主义的价值关系的形式。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如果仅仅看到这个形式，而看不出它的基础，看不出它那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生效力的基本内容，就是一点也不懂得这个理论。假如雅罗申科同志稍微懂得这个理论，那么他也就会懂得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决不只限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它同时还包含有对于一切社会形态——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发生效力的许多关于再生产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些基本原理，比如关于社会生产之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原理；关于在扩大再生产下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关于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原理；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关于社会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原理；关于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一切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值得注意的是，雅罗申科同志本人虽然如此高傲地蔑视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但他在讨论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时却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去求助于这些“公式”。

列宁、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注，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这些意见中，大家知道，列宁承认，马克思关于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比例关系的公式，也就是雅罗申科同志所极力反对的公式，不论对于社会主义或"纯粹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二阶段，都是有效的。

至于马克思，那么大家知道，他不喜欢离开对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研究，他在自己的《资本论》中并没有研究过他的再生产公式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的问题。然而，他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章《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这一节中论述第Ⅰ部类的产品在这一部类内的交换时，顺便指出，这一部类内的产品交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下那样不断地进行。马克思说：

"如果生产是社会公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Ⅰ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见马克思《资本论》俄文第8版第2卷第307页）①

因此，虽然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但他决不认为他的再生产理论仅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才是有效的。恰恰相反，他显然认为他的再生产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生产也会是有效的。

应该指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时，是从他的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的，他认为这些基本原理对于共产主义制度是一定适用的。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73—474页。——编者注

也应该指出，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的那种“共同社会体系”和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时，也是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的，认为这些基本原理对于共产主义制度是一定适用的。

事实就是如此。

结果，在这里，在再生产问题上，雅罗申科同志虽然对于马克思的“公式”发出放肆的议论，却又碰了壁。

4.雅罗申科同志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的末尾，建议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写道：

“根据我在全体讨论会和分组讨论会上以及这封信中所表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定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我能在一年内，至多一年半，在两个人的帮助下，从理论上来解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基本问题，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定会把这一科学变成人民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有效武器。”

不能不承认，雅罗申科同志所犯的毛病并不是谦虚。如果使用某些著作家的笔法，可以说：“甚至完全相反。”

上面已经讲过，雅罗申科同志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领导机关的经济政策混为一谈。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国民经济的计划化、社会基金的形成等等——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是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

我更不必说，雅罗申科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使我们不能给予他这样的委托。

* * *

结论：

（1）雅罗申科同志对讨论会领导人的控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讨论会领导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不能在自己总结性的文件中反映雅罗申科同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2）雅罗申科同志提出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请求，不能认为是严肃的，至少是因为他这请求中充满着赫列斯塔科夫[94]的气味。

约·斯大林

1952年5月22日

答阿·弗·萨宁娜和弗·格·文热尔两同志

我收到了你们的信。可以看出，你们是在深刻地认真地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信中有不少正确的说法和有意思的见解。但除此以外，信中也有一些严重的理论上的错误。我在这封回信中只想谈谈这些错误。

1.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断定说："仅仅由于从事物质生产的苏联人的自觉行动，才产生出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这一论点是完全不正确的。

是不是在我们之外客观地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呢？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存在于我们

之外的客观规律性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但是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公式对这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这就是说，这两位同志是站在不正确理论的观点上，这种理论断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由社会领导机关所"创造"、"改造"的。换句话说，他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

当然，人们能发现这些客观的规律性，认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它们。

假定说，我们暂且采取不正确理论的观点，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生活中有客观规律性的存在，并宣告可能"创造"经济规律，"改造"经济规律。结果会怎么样呢？这就会使我们陷身在混乱和偶然性的王国，使我们处在奴隶似地依赖于这些偶然性的地位，使我们不仅失去了解事情的可能性，而且简直无法在这偶然性的混乱中找出头绪来。

这就会使我们取消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因为不承认客观的规律性，不研究这些规律性，科学是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取消了科学，我们就没有可能预见国内经济生活中事变的进程，即没有可能把哪怕是最起码的经济领导工作做好。

归根到底，我们就会听凭那班不理解和不考虑客观规律性而决心"消灭"经济发展规律和"创造"新规律的"经济"冒险主义者任意摆布。

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里曾经提出了如下一个马克思主义对这问题的经典说法：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

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象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象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象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①

2.关于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办法问题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这当然不是全民所有制）提高到全民的（“国家的”）所有制的水平，必须采取些什么办法呢？

有些同志以为，应该依照从前处理资本主义财产的例子，干脆把集体农庄财产收归国有，宣布它是全民的财产。这个建议是完全不正确的，是绝对不能采纳的。集体农庄的财产是社会主义的财产，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象处理资本主义财产那样来处理它。无论如何不能因为集体农庄的财产不是全民的财产，就说集体农庄的财产不是社会主义的财产。

这些同志以为，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财产转归国家所有，是唯一的或无论如何是最好的国有化形式。这是不对的。事实上，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9—320页。——编者注

转归国家所有，这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国有化形式，而是原始的国有化形式，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关于这点所正确说过的那样。当国家还存在的时候，转归国家所有，无疑地是最容易理解的原始的国有化形式。但国家并不是永世长存的。随着社会主义的活动范围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扩大，国家将日渐消亡，因而把个别人的财产和个别集团的财产转归国家所有的问题当然也就会消失。国家一定消亡，而社会是一定留存下来的。因此，作为全民财产的继承者的，已经不是将要消亡的国家，而是以中央经济领导机构为代表的社会本身。

那么，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

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所建议的提高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基本办法是：把集中在机器拖拉机站的基本生产工具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这样来解除国家对农业提供基本建设投资的负担，让集体农庄自己负责维持和发展机器拖拉机站。他们说：

"如果以为集体农庄的投资应该主要用在集体农庄的文化需要上，而用于农业生产需要的投资，大部分仍旧应该由国家负担，那就不正确了。由于集体农庄已经完全能够把这一负担承当起来，解除国家这一负担，岂不是更正确些吗？为了使我国的消费品极其丰富，国家在自己的投资方面还有不少的事情要做。"

为了论证这一建议，建议人提出了几个论据：

第一，建议人援引斯大林所说生产资料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这句话，而对斯大林的这一论点表示怀疑，宣称国家毕竟在向集体农庄出售生产资料，如象大镰刀、小镰刀以及小发动机等等之类的小农具。他们认为，既然国家把这些生产资料出售给集体农庄，那么国家也可以把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之类的一切其他生产资料

出售给集体农庄。

这一论据是不能成立的。当然，国家是把小农具出售给集体农庄的，依照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和宪法，这是可以的。但是可不可以把小农具和象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那样的农业基本生产资料相提并论，或者，把它们和也是农业基本生产资料之一的土地相提并论呢？显然，是不可以的。其所以不可以，是因为小农具丝毫也决定不了集体农庄生产的命运，可是象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以及土地这样的生产资料，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决定农业的命运的。

不难理解，当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出售给集体农庄的时候，他所指的不是小农具，而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即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土地。建议人玩弄"生产资料"这个字眼，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他们不知不觉地碰了壁。

第二，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又引证说，在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开始的时期——1929年底和1930年初，联共(布)中央自己曾经主张把机器拖拉机站转归集体农庄所有，同时要求集体农庄在三年内偿清机器拖拉机站的价值。他们认为，虽然这事情当时"因为"集体农庄"贫穷"而失败了，但是现在，当集体农庄已经富裕的时候，可以重新实行这个政策——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

这一论据也是不能成立的。在1930年初，联共(布)中央确实曾经通过一项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的决定。当时是按照一部分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的建议，作为试验、作为尝试而通过这个决定的，为的是在不久之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加以考察。但头一次检查就表明这一决定是不妥当的。过了几个月，即在1930年底，就把这个决定取消了。

后来集体农庄运动进一步的增长和集体农庄建设的发展，使集体农庄庄员以及领导工作人员都最后地确信，把农业的基本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集中在机器拖拉机站手中，是保证集体农庄生产高速度增长的唯一方法。

我们大家都庆幸我国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谷物、棉花、亚麻、甜菜等等生产的增长。这种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呢？这种增长的源泉就是现代技术，就是许许多多为这一切生产部门服务的现代化机器。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技术，而是在于技术不能停止不前，它必须继续日新月异地改进，旧的技术必须作废，代之以新技术，新的再代之以最新的。不这样做，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不断进步就是不可思议的，要取得丰富的收获，要使农产品丰富，也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要把几十万台轮式拖拉机作废，代之以履带拖拉机，把几万台陈旧了的联合收割机作废，代之以新的联合收割机，以及例如，为经济作物制造新的机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负担几十亿的支出，这些支出非经过六至八年之后不能完全收回。即使我国的集体农庄是百万富翁，它们负担得了这样大的支出吗？不，负担不了，因为它们没有力量负担要在六至八年之后才能完全收回的几十亿的费用。这种支出只有国家才负担得了，因为国家，并且只有国家才负担得起由于旧机器作废和换用新机器所受到的损失，因为国家，并且只有国家才能在六至八年之内承担这种损失，直到这笔费用收回为止。

既然如此，那么要求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使集体农庄遭受巨大损失，使集体农庄破产，破坏农业的机械化，减低集体农庄生产的速度。

由此可得出结论说，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建议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就是向落后方面倒退一步，就是企

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

就暂且假定一下，我们接受了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建议，并着手把基本生产工具、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这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第一，结果就会是集体农庄成了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换句话说，它们就会处于我国无论哪一个企业都没有的特殊地位，因为大家知道，在我国，甚至国有化的企业也不是生产工具的所有者。究竟用什么来作为集体农庄的这种特殊地位的根据呢？这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进步的、前进的考虑呢？可不可以说，这样的地位就会促使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就会加快我们的社会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呢？如果说这样的地位只会使集体农庄所有制离开全民所有制更远，不是使我们接近共产主义，反而远离共产主义，岂不是更正确些吗？

第二，结果就会是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因为巨量的农业生产工具会投进商品流通的范围。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是怎么想的呢？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能不能使我们向共产主义推进呢？说它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岂不是更正确些吗？

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他们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大概他们以为，就是有商品流通，也可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商品流通是不会妨碍这个事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而犯的严重错误。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里批评杜林主张的在商品流通条件下活动的“经济公社”时，确凿证明商品流通的存在必然会使杜林的所谓“经济公社”走向复活资本主义的地步。大概，萨宁娜和文

热尔两同志是不同意这一点的。那就对他们更糟了。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从这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以及按照需要来分配产品的共产主义原则，是排斥任何商品交换的，因而也排斥把产品转化为商品，也就是把产品转化为价值的。

关于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建议和论据的情形，就是如此。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

集体农庄不是普通的企业。集体农庄是在土地上工作，而它耕种的土地早已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而是全民的财产。因而，集体农庄并不是它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

其次，集体农庄借以进行工作的基本生产工具，并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而是全民的财产。因而，集体农庄不是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

再次，集体农庄是合作企业，它使用自己庄员的劳动，按照劳动日把收入分配给庄员，而且集体农庄有自己年年更换的、用于生产的种子。

试问，集体农庄究竟占有一些什么？它可以完全自由地任意支配的集体农庄财产又是什么呢？这种财产就是集体农庄的产品，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即谷物、肉类、油类、蔬菜、棉花、甜菜、亚麻等等，而建筑物和集体农庄庄员园地中的个人副业不计在内。问题在于：这种产品的大部分，即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进入市场，从而列入商品流通系统。正是这种情况现在阻碍着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所以正应该从这一方面展开工作，来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我们还没有发达的产品交换制度，但是有产品交换的萌芽，即农产品的"换货"。大家知道，对植棉、种麻、种甜菜和其他的集体农庄的产品早已实行"换货"了。诚然，这是不完全的、部分的"换货"，但总算是在"换货"了。要顺便指出："换货"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应该用"产品交换"来代替它。任务是在于，要使农业的一切部门中都培植这些产品交换的萌芽，并把它们发展成为广泛的产品交换系统，使集体农庄用自己的产品换得的不仅是货币，而主要是必要的制成品。这样的制度需要大量地增加城市送交农村的产品，所以，推行这种制度不能过分性急，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积累的程度而定。但是应该一往直前、毫不犹豫地推行这种制度，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

这样的制度既缩小着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就使社会主义易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此外，它使我们有可能把集体农庄的基本财产即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纳入全民计划的总系统中。

在我国现今条件下，要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这将是实际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办法。

这样的制度对于集体农庄的农民是否有利呢？无疑是有利的。其所以有利，是因为集体农庄农民从国家手中获得的产品，将比在商品流通中获得的要多得多，价钱也更便宜。大家知道，和政府订有产品交换（"换货"）合同的集体农庄所获得的利益，较之没有订立这种合同的集体农庄，要多得无比。如果把产品交换制度

推广到全国所有的集体农庄，那么我国全体集体农庄农民就都能享受这些利益了。

约·斯大林

1952年9月28日

选自《斯大林文选》
第571—649页

附　录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结　束　语

对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可以作出什么样的基本总结呢？

联共(布)的历史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

（1）首先，党的历史教导说，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清除了机会主义、对妥协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党的历史教导说，把无产阶级弄到没有这样一个党，就是把它弄到没有革命的领导，而把它弄到没有革命的领导，就是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遭到失败。

党的历史教导说，能够成为这样的党的，决不是通常那种西欧类型的社会民主党，那种在国内和平条件下薰陶出来、被机会主义分子牵着走、幻想"社会改良"而害怕社会革命的党。

党的历史教导说，能够成为这样的党的，只能是新型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主张社会革命的党，能够训练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决战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党。

这样的党在苏联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斯大林同志说："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力量，议会斗争形式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后来在公开的革命搏斗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重大的和决定的意义。考茨基在第二国际遭受攻击时替它辩护说：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战争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时期，就没有力量采取什么重大措施。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们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而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统治的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并不是党，而是议会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个时期只是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和服役者。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是谈不到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的。

可是，新时期一到来，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新时期是公开的阶级冲突的时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是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要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去教育工人，要训练后备军并使他们跟上来，要和邻国的无产者结成联盟，要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如此等等。如果以为这些新任务可以用那些在议会制度的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使自己陷于绝望的境地，遭到必不可免的失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而仍然以旧的政党为领导，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装。几乎用不着证明，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形的。

因此，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随机应变的本领，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62—63页）①

---

① 见本选集上卷第259—261页。——编者注

(2)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掌握工人运动的先进理论，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当不了本阶级的领导者，就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才能信心百倍地前进，并引导工人阶级前进。

相反地，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却不得不徘徊摸索，对自己的行动失去信心，没有能力引导工人阶级前进。

有人也许以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是用心熟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中的某些结论和原理，学会及时引证这些结论和原理，而且这样就心安理得，满以为熟读的结论和原理能用于各种环境、用于实际生活的一切场合。但这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看成是教条汇编、看成是教义问答、看成是信条，而把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看成是一些咬文嚼字的人和书呆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它既是一种科学，就不会也不可能停留不前，而会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显然，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不能不用新的经验和新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用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结论和新原理来代替。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决不是说要熟读它的一切公式和结论，抱住这些公式和结论的每一个字句不放。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必须学会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开来。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说要领会这个理论的实质，学会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条件下运用这个理论来解决革命运动的实际问题。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说要善于用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用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发展和推进这个理论，不怕根据这个理论的实质去用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它的某些已经陈旧的原理和结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在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 年 2 月）以前，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个社会最适宜的政治组织形式。固然，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不是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组织。但可惜马克思的这一指示没有在著作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于是就被人遗忘了。此外，恩格斯在 1891 年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中所作的权威性声明，即“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①，也无容置疑地表明马克思主义者继续认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恩格斯的这个原理后来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奉行的准则。但是，俄国 1905 年的革命，特别是 1917 年 2 月的革命，提出了工农代表苏维埃，即一个社会的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根据他对俄国两次革命经验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不是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是苏维埃共和国。根据这一点，列宁在 1917 年 4 月，即在从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74 页。——编者注

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提出了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的口号。当时各国机会主义者都抱住议会制共和国不放，责备列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破坏了民主。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机会主义者则把这个理论向后拉，把它的一个原理变成了教条。

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不敢用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适合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来代替恩格斯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旧原理，那么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党就会在黑暗中徘徊，苏维埃就会瓦解，我们就不会有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遭到严重的损害。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获得胜利。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研究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它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举行进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胜利。这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说的。这个结论后来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奉行的准则。但是，到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成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已经变成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根据他对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当时各国机会主义者都抱住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不放，责备列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机会主义

者则把这个理论向后拉，把它变成木乃伊。

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如果他在理论上没有足够的勇气抛开马克思主义的旧结论，而代之以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一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结论，那么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党就会在黑暗中徘徊，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失去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开始衰退。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获得胜利。

机会主义并不总是意味着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机会主义有时还表现在企图抱住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已经过时的原理不放，把它们变成教条，以便阻碍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从而也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逝世后，最伟大的理论家列宁，以及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学生，是唯一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新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

正因为列宁和列宁主义者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布尔什维克党的先进干部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他们没有学会把这个理论看作行动的指南，如果他们没有学会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这个理论，那么布尔什维克党就不会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恩格斯在批评那些担负着美国工人运动领导工作的侨居美国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时写道：

“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606页)①

列宁批评加米涅夫和某些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即在革命运动已经向前发展而要求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仍抱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旧公式不放时写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公正地讥笑了只会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人们，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些任务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必然有所改变。…… 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100—101页)②

(3)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从而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

我们党的历史是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32]、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并把它们打垮的历史。不战胜这些党派，不把它们从工人阶级队伍中驱逐出去，就不能达到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没有工人阶级的统一，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打垮这些起初主张保存资本主义、到十月革命后又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党派，那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战胜外国武装干涉和建成社会主义。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4页和第26页。——编者注

一切为了欺骗人民而自称"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党派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就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政党，后来又变成了外国资产阶级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变成了一帮特务、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凶手和叛国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列宁说："在社会革命时代，只有依靠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其他一切党派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团结。"(《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50页)①

(4)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打垮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当不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

我们党内生活发展的历史，是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派"、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和民族主义倾向分子作斗争并把他们打垮的历史。

党的历史教导说，所有这些投降主义集团实质上都是孟什维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孟什维主义的仆从，是孟什维主义的继续。它们也同孟什维主义一样，起着在工人阶级中和党内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作用。因此，消灭党内这些集团的斗争，就是消灭孟什维主义的斗争的继续。

如果不打败"经济派"和孟什维克，我们就不能把党建立起来并引导工人阶级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不打败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我们就不能为建成社会主义准备好必要的条件。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72页。——编者注

如果不打败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我们就不能用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人民，就不能保住苏联各族人民伟大友谊的旗帜，就不能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起来。

也许有人以为，布尔什维克用了过多的时间去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过高估计了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作用。但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有机会主义，正如不能容忍健全的肌体上有脓疮一样。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部队，是它的先头堡垒，是它的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决不能容许信念不坚定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有立足的余地。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去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敌的地位。不难理解，这样的斗争只会遭到失败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必须在工人阶级的党内，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内，在工人阶级的先头堡垒内，把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和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反对列宁反对党，遭到了与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同样的结局，即变成了法西斯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变成了特务、暗害分子、凶手、破坏分子和叛国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列宁说："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明显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经验具体证实了的。……在俄国……曾经有**很多次**处于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我们党内……那么苏维埃制度就**一定**会被推翻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62—463页)①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45页和第346页。——编者注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说我们党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么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95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72页)①

(5)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它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它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来教导和教育干部，如果它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党隐瞒自己的错误，掩饰老大难的问题，用虚假的表面上的一切满意来掩盖自己的缺点，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浸透自满情绪，一味妄自尊大，躺倒在功劳簿上，那它就会遭到灭亡。

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00页)②

又说：

"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

① 见本选集上卷第271—272页。——编者注

②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3页。——编者注

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60—261页)①

(6)最后，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同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能够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

如果党善于象列宁所说那样“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74页)②，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党派圈子里，如果它脱离群众，如果它蒙上了官僚主义的灰尘，那它就会遭到灭亡。

斯大林同志说：“当布尔什维克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相反地，布尔什维克只要一脱离群众和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只要一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他们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

在古代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名叫安泰，据神话说，他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对生育、抚养和教导他成人的母亲是非常依恋的。没有哪一个英雄能同这个安泰抗衡。大家公认他是无敌的英雄。他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往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可是他毕竟有一个弱点，就是怕别人用什么方法使他离开地面。敌人注意到他的这个弱点，于是时刻暗中窥伺他。后来有一个敌人利用了他的弱点，就战胜了他。这个敌人名叫海格立斯。可是，他是怎样战胜安泰的呢？原来这个敌人使安泰离开了地面，把他举到空中，使他无法再接触地面，这样就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5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2页。——编者注

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很象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有一切把握，始终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不可战胜的关键。”（**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①

以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的基本教训。

发表于1938年9月

选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88—399页

① 参看《斯大林文选》第147—148页。——编者注

注　释

1　有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参加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于1928年4月6—11日举行。全会讨论了本年度粮食收购工作和1928—1929年度粮食收购运动的安排、政治局特设委员会关于为克服因发生沙赫特案件而暴露出来的缺点所要采取的实际措施的报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1928年工作计划。斯大林在4月10日的会议上就政治局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作了讲话。全会通过了一个特别决定，规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以及其他领导干部每年至少参加地方工作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以便加紧克服地方工作中的缺点，改进中央机关的领导。——第6、57页。

2　指1923—1928年顿巴斯的资产阶级专家反革命组织进行暗害活动的事件，由于这个组织是1928年初在顿巴斯的沙赫特区破获的，故称沙赫特案件。1928年5月18日—7月6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在莫斯科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公开的审判。审判表明，沙赫特暗害分子执行过去煤矿老板（俄国的和外国的资本家）和外国间谍机关交给的任务，对顿巴斯煤炭工业进行破坏。他们故意进行不合理的开采以减少采煤量，从国外采购质量低劣的过时的设备，毁坏贵重机器和通风设备，炸毁矿井，烧毁工厂和发电站。他们还有意破坏消费品的供应，违反苏维埃劳动保护法，使矿工物质生活条件恶化，甚至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第6、35、56、120、271页。

3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1927年12月2—19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制定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

农村工作等。斯大林于12月3日作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12月7日作了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委托中央委员会继续执行维护和平及加强苏联国防力量的政策，用毫不减低的速度继续推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扩大和巩固城乡的社会主义成分，实行消灭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大会作出了关于制定苏联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大会通过了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拟订了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计划，并规定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法。大会讨论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问题，指出党与反对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成为纲领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经走上反苏维埃斗争的道路，因而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人不能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大会批准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1927年11月）关于把列·达·托洛茨基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的决定，并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所有骨干分子和民主集中派的全部成员开除出党。——第6,48,57,64,95,229,329页。

4 《真理报》(«Правда»)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它最初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日报，是遵照列宁的指示，由斯大林、米·斯·奥里明斯基和尼·古·波列塔也夫发起创办的。创刊号于1912年4月22日(公历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从1917年3月5日(公历18日)起，《真理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中央机关报。——第10,117,520页。

5 《工农检查院专页》是《真理报》在1928年3月15日—1933年11月28日办的一个定期专刊，目的是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参加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第10页。

6 《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机关报(日刊)，1925年5月24日创刊。——第10,36,61页。

7 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1926年本)第一〇七条："以收买、隐匿或囤积商品为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的，处一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不没收财产。上述行为如查明

有商人串通的，处三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没收全部财产。”根据这条法律，法庭可将拒绝按固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的富农和投机分子判罪，并没收其粮食。——第 19 页。

8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 于 1919 年 3 月 18—23 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党纲、共产国际的建立、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农村工作、组织问题等。列宁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党纲的报告和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新党纲。大会讨论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列宁所作的农村工作报告和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作出的决议，规定党要对中农采取新的政策，即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到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并在这个联盟中保持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政策。大会根据列宁制定的党的军事政策的基本原则，通过了建立具有严格纪律的正规红军的决议。大会驳斥了否认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机会主义集团，还通过了关于普遍重新登记党员和改善党的社会成分的决议。——第 21、159、229 页。

9 指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1926 年 3 月 29 日颁发的第三十三号通令《关于组织工业企业管理》及其附件《关于金属工业和电器工业中技术厂长的权利和义务的总则》。——第 28 页。

10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 1928 年 5 月 5—16 日在莫斯科举行。大会讨论了下列几个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和前途以及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因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而产生的青年的劳动和教育问题、共青团的儿童工作以及其他问题。斯大林在大会的闭幕会上发表了演说。——第 33 页。

11 **斯摩棱斯克事件** 指 1928 年初揭发出来的斯摩棱斯克某些党政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事件。据揭露，这些人贪污受贿，酗酒成风，同富农分子和过去的地主分子相勾结，任人唯亲，压制批评，粗暴地破坏党内民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于 1928 年上半年讨论了这一事件，决

定把那些政治上道德上腐化堕落的党员开除出党，并将一批触犯了刑律的党政工作人员交付法庭审判。——第37页。

12 **阿尔乔莫夫斯克事件** 指乌克兰阿尔乔莫夫斯克专区党政机关的某些人员政治上道德上腐化堕落的事件。1928年初被揭发，1928年3月联共(布)中央对这一事件作了处理。——第37页。

13 指联共(布)中央给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各中央局、各边疆区委员会、各州委员会、各省委员会、各专区委员会和各县委员会的公告：《争取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基本任务）》。这个公告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维·米·莫洛托夫签署，在1928年5月16日《真理报》第一一二号上发表。——第39页。

14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 即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是苏联培养党政干部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它的前身是1918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倡议成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附属鼓动员和指导员训练班。1919年1月该训练班改组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附属苏维埃工作学校。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在这个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1919年7月，根据俄共(布)中央组织局的决定，这个学校改为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第42页。

15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于1925年12月18—31日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于12月18日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12月23日作了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大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还讨论了工会工作、共青团工作、修改党章等报告。大会一致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批准了党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的总方针，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同一切破坏党的统一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大会在决议中着重指出了在依靠贫农的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和中农的联盟去同富农作斗争的重要性。大会指出了必须支持和推进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技术，通过合作社把更多的农户引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根据大会决议，俄共（布）改称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第49、95页。

16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五十八个国家的五十八个共产党和八个其他组织的代表四百零八名。列宁在会上作了题为《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的提纲，批准了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关于共产党员在工人运动中的任务、关于东方问题等提纲，通过了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等决议。大会着重讨论了工人统一战线问题，号召各国共产党根据统一战线的策略在群众中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加强工人的团结，击退资产阶级的进攻。——第50页。

17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五十二个国家的四十八个共产党和五十五个其他组织的代表共六百零五名。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制定新的战略和策略，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列宁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他在大会上作了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演说，并作了关于俄共(布)策略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被大会一致批准。大会号召各国共产党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作坚决斗争，清除机会主义的影响，根据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列宁指出，这次大会各项决议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为新的、日益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无论是防御战或是进攻战)作更周密、更切实的准备"(《列宁全集》第32卷第509页)。——第52页。

18 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3月27日—4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是列宁出席并直接领导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列入大会议事日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工会问题、红军问题、财政政策、清党的总结和巩固党的队伍以及附属于这个议题的关于青年工作、关于报刊和宣传工作的补充报告等。大会对新经济政策第一年的实行情况作了总结。列宁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场"谁战胜谁"

的殊死斗争，同时宣布，现在退却时期已经结束，必须重新配置力量，对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坚决的进攻。列宁提出：党的当前任务是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为了顺利完成党的当前任务，必须正确地挑选干部和检查执行情况。大会严厉地谴责了工人反对派的派别活动。这次代表大会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选举斯大林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第 56、229 页。

19 《交易所报》(«*Биржёвка*») 即《交易所新闻》(«Биржевые Ведомости») 是俄国的一种低级趣味的资产阶级报纸，于 1880 年在彼得堡创刊。这个报纸的名称后来成了没有原则和卖身求荣的资产阶级报刊的通称。1917 年 10 月底，该报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第 60 页。

20 **轻骑队** 是苏联青年参加国家和社会监督的一种组织形式，1926 年根据共青团员的倡议而产生。轻骑队小组由共青团基层组织建立，团员和团外青年都可以参加，小组的工作受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指导。轻骑队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机关、企业的工作进行检查，就地帮助克服缺点，并在各种会议和报刊上揭露和批评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1928 年 12 月，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颁发了关于轻骑队小组的通令，明确规定轻骑队的任务是：同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合作社机关和工会机关的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作斗争，贯彻节约制度，监督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工程的进度，监督粮食采购运动，监督商业和供应等。——第 61 页。

21 《舍米雅卡审判》是俄国十七世纪的一部讽刺小说，描写审判官舍米雅卡误以为被告会给他贿赂，便作出偏袒被告的荒谬判决。后来“舍米雅卡审判”成了不公正审判的通称。——第 61 页。

22 **特米多尔主义** 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对联共(布)的诬蔑。斯大林说：“反对派说现在我们这里发生了特米多尔式的蜕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国的经济和政治正在破产和倒退，我们不是在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在走向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当然是奇怪的、愚蠢的。”(《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293—294 页)特米多尔，亦译热月，是 1793 年法国国民公会重颁的革命历法的第十一月，相当于公历

7月19—20日至8月17—18日这段时间，共和二年热月9日，即1794年7月27日，发生了热月政变，雅各宾派革命专政被推翻，政权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手里转到了大资产阶级手里。——第70页。

23　1928年7月4—12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全会听取了关于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一些问题的情况报告，基本上同意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全会通过了有关粮食收购政策、建立新的国营农场（谷物农场）、改进培养新专家的工作等问题的决议。斯大林在7月5日、9日和11日的会议上先后发表了《论共产国际纲领》、《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三篇演说（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5—137、138—163、164—170页）。——第73、85、149页。

24　这里提到的中央委员是指米·巴·托姆斯基和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关于这个问题，参看《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二七八至二七九页。——第74页。

25　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参加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1928年11月16—24日举行。全会审查了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讨论了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初步总结和继续实行这种工作制的问题、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问题以及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和发展农业的措施的报告。斯大林在11月19日的会议上就议程的第一个问题发表了《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第76、130页。

26　法文原文为“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意思是谁想做什么就让他做，谁想到哪里去就让他走，听其自然。这是十八世纪中叶法国经济学家的一个论点：要求国家不干涉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第97页。

27　召回派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代表人物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等。召回派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拒绝参加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放弃一切合法斗争。召回派以“革

命"词句作幌子，执行了取消派的路线。列宁把召回派叫作"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全体会议）斥责了召回派，把波格丹诺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第99页。

28 **"左派共产主义者"** 是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俄共（布）党内出现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集团，产生于1918年1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格·列·皮达可夫和卡·伯·拉狄克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可能性，认为没有西欧革命的直接支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必定在国际资本的打击下毁灭。他们反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主张同帝国主义进行战争，以"促进"国际革命。在苏维埃政权缔结了和约，取得了喘息时机并着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4月发表了一个《时局提纲》，同列宁的《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相对抗。他们否定过渡时期的必要性，反对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和国家资本主义，反对在企业中建立纪律和实行经济核算，认为实行列宁的这些政策就是恢复资产阶级秩序。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夏承认了错误。——第101页。

29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于1924年6月17日—7月8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四十九个共产党及其他组织的代表共五百零四名。大会讨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活动、世界经济状况、苏联经济状况和俄共（布）党内的争论、法西斯主义、工会运动中的策略、生产单位的支部等问题，还讨论了个别国家的党的问题、纲领问题、民族问题、土地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斯大林是大会主席团委员并且是几个最重要的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纲领委员会、关于列宁主义的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和波兰委员会的主席。大会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批准了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并决定把它作为共产国际的决议予以公布。大会通过决定，要求加强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使这些党布尔什维克化，成为依靠工会的真正群众性的党。——

第 106 页。

30 中央六月宣言 指联共（布）中央 1928 年 6 月 3 日就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发布的告全体党员和全体工人书。这个文件说："中央认为，如果不是最大胆、最坚决、最彻底地吸引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由千百万群众对所有的机关实行检查和监督，清除其中不称职的分子，那么改造时期的任务是无法解决的。"文件还说："只有彻底实行党内民主和工会民主等（党和工会的各级机关真正由选举产生，任何一级的书记、常委会、委员会等等都完全能够撤换），才能形成群众的经常的监督，才能清除我们机关的官僚主义赘瘤，才能清除官僚主义压制、互相包庇、官吏式的阿谀逢迎、胡作非为、忘记群众利益和小市民的高枕无忧等的种种表现。没有这些措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就会变成一纸空文，而且只会使这个口号，使党的领导和党本身在群众心目中丧失威信。"——第 107 页。

31 这次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于 1929 年 4 月 16—23 日举行。全会审议了党内事件问题、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会议问题和清党问题。全会通过决议，赞同 1929 年 2 月 9 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斥责了尼·伊·布哈林、阿·伊·李可夫和米·巴·托姆斯基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全会同意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关于发展农业的途径和减轻中农赋税以及关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和当前任务等提纲，并决定把它们提交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审议。全会还决定把它基本上同意的关于清洗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提纲提交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审议。斯大林在 4 月 22 日会议上发表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第 112 页。

32 社会革命党 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1 年底—1902 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杂烩，他们"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钉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列宁全集》第 9 卷第 295 页）。社会革命党人否认农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

人多数支持沙皇俄国的战争政策；少数反对战争，形成了后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核心。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党的领袖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在临时政府内担任要职。1917年11月，社会革命党的左翼组成了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段时间内承认苏维埃政权，同布尔什维克合作，但很快又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始终敌视十月革命。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策划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内战结束后，它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被苏维埃政权粉碎。——第115、301、437、455、619页。

33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于1928年7月17日—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五十七个国家的五十个共产党和十五个其他组织的代表共五百一十五名。大会讨论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活动的总结报告、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还讨论了消除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办法、共产国际纲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苏联经济状况和联共（布）党内状况，批准了共产国际章程。大会在决议中指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增长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稳定的动摇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大会根据工人阶级斗争的新条件规定了共产国际的任务，并动员各国共产党加紧同右倾这个主要危险以及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大会指出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这些成就对于巩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阵地的意义，号召全世界劳动者保卫苏联。斯大林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纲领委员会以及拟订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提纲的政治委员会。——第126页。

34 **“喜欢效劳的熊比敌人更危险”** 这句话出自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隐士和熊交了朋友。有一天，他们一同出去游玩。途中隐士困倦酣睡，熊用大石头打隐士额角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隐士的脑袋砸成了两半。——第134页。

35 **讲坛社会主义** 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十九世纪后半期产生于

德国，代表人物是大学教授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他们在大学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不幸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恩格斯说："我们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在理论方面一向顶多不过是一些略带博爱主义色彩的庸俗经济学家，而现在他们简直已经堕落到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辩护士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75页）在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宣扬过讲坛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第137页。

36 **立宪民主党**（或称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领袖是巴·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企图用立宪君主制的形式保存沙皇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1917年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占据领导地位。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和暴乱。在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被击溃后，立宪民主党上层的大部分人逃亡国外，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活动。——第154、301页。

37 **《青年国际》**（«*Jugend Internationale*»）是靠拢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1915年9月—1918年5月在苏黎世出版，由威·明岑贝尔格编辑。1919—1941年，该杂志成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919年7月前为季刊，后改为月刊。——第164页。

38 **《〈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Сборник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列宁创办的布尔什维克杂志，由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两期（1916年10月第1期和12月第2期）。——第169页。

39 **捐献**是当时苏联动员贫农和中农同富农作斗争的一种方法。根据1928年1月起在苏联农村中实施的捐献法，为举办本地的文教福利事业，村农民大会可以通过募款决议，向各个农户摊派捐款。摊派的原则

是绝大部分捐款由富农和富裕中农上层负担，贫农和力量单薄的农户可以免除捐献。——第178页。

40 **贫农委员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的法令建立的乡村贫农组织。当时苏维埃俄国农村里的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很大一部分乡村苏维埃处于富农影响之下。6月11日的法令规定贫农委员会吸收中农参加，其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和富人手里的余粮，供给贫农和送到国家粮食收集站；同粮食私贩和粮食投机活动作斗争；组织播种和收割，保护庄稼等。贫农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在巩固苏维埃政权、清除苏维埃中的富农分子和争取中农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议，贫农委员会同乡村苏维埃合并。——第179页。

41 **喀琅施塔特暴动**指1921年2—3月间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白卫分子在波罗的海海军要塞喀琅施塔特发动的反革命叛乱。促使这次叛乱发生的原因是：当时波罗的海舰队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水兵都上了前线，补充的新水兵多半是农民，而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有不满情绪；喀琅施塔特党组织由于多次动员上前线而受到了削弱。叛乱分子首领采取新的斗争策略，提出"没有共产党员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企图使政权转移到小资产阶级政党手里，为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2月28日和3月1日叛乱分子首领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让所谓"左派社会主义政党"自由活动，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允许自由贸易，改选苏维埃。3月2日叛乱分子逮捕了舰队司令，占领了喀琅施塔特。叛乱分子并且同外国帝国主义者建立了联系。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为平定叛乱采取了果断措施，派出以克·叶·伏罗希洛夫为首的约三百名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到红军第七军加强工作。3月18日叛乱被彻底粉碎。——第185页。

42 **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指1917年12月—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同德奥等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和签订和约前后的时期。当时，俄国的旧军队已经瓦解，不能继续作战，建立工农军队的工作刚刚开始；人民已经筋疲力尽，渴望结束战争；其他国家还没有爆发革命。列宁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进行战争，那就便于帝国主义摧毁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主张不惜接受苛刻的议和条件，立即签订和约。但是列宁的方针在党内遭到尼·伊·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列·达·托洛茨基的反对，他们或主张对德国宣布革命战争，或主张"不战不和"。当德国提出最后通牒时，担任苏维埃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违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的指示，拒绝签订和约，同时又声明说：我们在复员军队，我们不进行战争。这样，德国军队就在1918年2月18日发动全线进攻，占领了苏维埃国家的许多领土，并威胁首都彼得格勒。列宁号召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年轻的革命军队英勇地抗击了德国强盗的入侵。同时列宁跟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说服了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终于在比德方原来的最后通牒更加苛刻的条件下于3月3日缔结了和约。列宁曾指出，俄共(布)这次"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机之一"(《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62页)。——第187页。

43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本是社会革命党内的左翼，1917年11月组成独立政党，领导人为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马·安·纳坦松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十月武装起义，参加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参加了人民委员会。但是他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在布列斯特谈判期间，他们反对缔结和约。在1918年3月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后，他们退出了人民委员会。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开展和贫农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7月，他们刺杀了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威·米尔巴赫，随即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叛乱被粉碎后，左派社会革命党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在1918年9月组成了"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组织在1918年11月和1920年先后与俄共(布)合并)，另一部分领导人坚持原来立场。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最终退出了政治舞台。——第187页。

44 由"左派共产主义者"尼·伊·布哈林、恩·奥新斯基、瓦·尼·雅柯夫

列娃、英·尼·斯土柯夫、瓦·尼·曼采夫等控制的党的莫斯科区域局在1918年2月24日通过的决议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讨论了中央的工作，对于中央的政治路线和中央的成员表示不信任，主张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此外，莫斯科区域局认为没有义务绝对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决议所附的"说明"说："莫斯科区域局认为党在最近将来的分裂恐难避免"；"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列宁把上引"说明"中的后一句话叫作"奇谈怪论"。——第187页。

45 **公民死刑** 是俄国中世纪对犯人施行的侮辱性假死刑。其做法是，把犯人带上断头台，要他跪下，由刽子手在他的头顶上折断一把剑，然后用铁链把他拴在耻辱柱上。——第189页。

46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 于1929年4月23—29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发展农业的途径和减轻中农赋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和最近任务、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等问题。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会议否决了右倾投降主义者所维护的五年计划最低方案，通过了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执行的最高方案。会议听取了维·米·莫洛托夫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和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所发表的演说《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传达报告，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告苏联全体工人和劳动农民书。——第192、193页。

47 **连续生产制** 又称连续生产工作周，是一种充分利用现有设备的工时制度。实行这种制度的单位昼夜不停地工作，节假日也不例外，所有职工轮班休息，没有大家共同的休息日。——第197、283页。

48 **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 于1929年12月20—27日在莫斯科举行。它是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科学研究机关、农业高等学校和经济高等学校、杂志和报纸编辑部的代表共三百零二名。斯大林在12月27日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上发表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第210页。

49 《在国外》(«За рубежом»)杂志由马·高尔基主编，于1930年创刊，1932年改成杂志式的报纸，1938年停刊。——第235页。

50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所写短篇小说《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中的主人公。他骄傲自大，愚昧无知，蛮不讲理，干涉他人自由，想压制和窒息一切有生气的东西。——第241页。

51 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米·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主人公。他读骑士文学迷了心窍，竟异想天开地要模仿书中人物，做一番骑士的事业。他把虚妄的幻想当成现实，结果到处碰壁。后来，唐·吉诃德就成了脱离实际、充满幻想的人物的代名词。——第256、299、505页。

52 死魂灵一词出自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所谓死魂灵，是指已经死去的农奴，而这些农奴在《纳税人口花名册》上还有名字，所以在重新进行户口登记以前仍算作活人。此后，死魂灵一词常被人们用来比喻虚构或虚报的人。——第258页。

53 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31年1月30日—2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工业公司的代表、工厂厂长、工程处长、工程师、工长和优秀的工人突击队员、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领导者，共七百二十八人。会议听取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洛·康·奥尔忠尼启泽作的关于1931年度控制数字和经济组织的任务的报告。2月3日，人民委员会主席维·米·莫洛托夫在会议上发表了《经济计划的基本前提和执行情况》的演说。2月4日，斯大林在会议上发表了《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说。会议提出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关键性的第三年完成国民经济计划的实际措施。会议着重指出，经济工作人员的基本任务是：掌握技术，提高领导生产的质量，贯彻一长制，实行经济核算，为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和改进产品质量而斗争。——第266页。

54 彭帕杜尔本来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姬，她专断弄权，飞扬跋扈。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借用这个名字，在他的《彭帕杜尔列传》等小说中塑造了一批专横昏庸，作威作福，自己不学无术，也不许别人读书的俄国官场人物的形象。——第270页。

55 工业党是苏联旧的上层资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中的一个反革命组织，存在于1925—1930年，为首分子主要是旧工程师和过去的资本家。工业党的某些成员在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等领导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工业党是国际资本的工具，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间谍破坏活动。1930年11月25日—12月7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在莫斯科审判了工业党案件。——第272页。

56 经济工作人员会议 于1931年6月22—23日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各经济组织和苏联供给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斯大林在23日的会议上作了《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演说。——第276页。

57 《绝顶聪明的鲈鱼》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的一篇寓言故事，描写一条鲈鱼因为感到处处有丧生的危险而不敢外出，整天躲在仅能容身的洞里，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它自以为绝顶聪明，可是大家却认为它是傻瓜。——第296页。

58 指1917年10月29日（公历11月11日）沙皇俄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在彼得格勒发动的反苏维埃的武装暴动。这是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叛乱的一个组成部分。领导这次暴动的是以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阿·拉·郭茨为首的一个反革命组织“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指挥这次暴动的是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格·彼·波尔柯夫尼科夫上校。暴动者计划占领电报局、米哈伊洛夫练马场、彼得-保罗要塞和斯莫尔尼，逮捕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暴动原定在10月30日发动，由于阴谋暴露而提前。部分士官生部队曾占领了米哈伊洛夫练马场和电报局。当天傍晚暴动被水兵和赤卫队平定。——第301页。

59 十二月党人起义 指俄国贵族革命家(几乎全是贵族出身的军官)于1825年12月发动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十二月党人由此得名。十二月党人建立了三个秘密革命团体：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北方协会、巴·伊·彼斯捷尔领导的南方协会和安·伊·波里索夫、彼·伊·波里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些团体都要求废除农奴

制，废除君主政体或限制沙皇权力。1825年12月14日清晨，北方协会率领拒绝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的士兵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举行起义。当天傍晚起义被镇压下去。半个月后，南方协会在乌克兰举行起义，也遭到沙皇军队的镇压。著名的十二月党人彼斯捷尔、谢·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康·费·雷列也夫、米·巴·别斯图热夫-留明、彼·格·卡霍夫斯基被处绞刑，一百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列宁在评论这个时代的俄国革命运动时指出："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2页）——第302页。

60　凡尔赛体系　指英国、美国和法国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击败了德国及其盟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各国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体系。它的基础是凡尔赛和约以及与这个和约有关的其他条约，其中包括确定欧洲各国新疆界的条约。——第307页。

61　指斯大林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1907年在伦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以及1912年和1913年出国到克拉科夫、维也纳期间同列宁的会见。——第310页。

62　沙洛顿堡　是德国柏林市的一个贵族住宅区。拉丁区在法国巴黎，区内有许多学校和文化科学机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是大学生和贫苦知识分子的聚居地。——第311页。

63　国社党人　即德国法西斯主义政党国社党的党徒。国社党的前身是1919年在慕尼黑成立的德国工人党，阿·希特勒加入后，于1920年进行改组，改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或纳粹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被盟国管制委员会宣布为非法组织。——第312页。

64　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　于1933年2月15—19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一千五百一十三人。大会讨论了巩固集体农庄和春季播种任务问题。斯大林在闭幕会上发表了演说。苏联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在告苏联全体集体农民书中，号召把集体农庄变成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开展以争取丰产、争取模

范地准备和进行春季播种为内容的全苏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社会主义竞赛。——第313页。

65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于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组织问题（党的建设和苏维埃的建设）等。斯大林于1月26日作了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大会根据斯大林的报告通过决议，完全赞同联共(布)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大会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肯定党的总路线已经取得了胜利。大会根据维·米·莫洛托夫和瓦·弗·古比雪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的决议，要求在计划期间完成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更迅速地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大会根据拉·莫·卡冈诺维奇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党的建设和苏维埃的建设）的决议，要求提高一切部门的工作质量，首先是提高组织领导和实际领导的质量。大会决定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成立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大会还通过了新的党章。——第329、456页。

66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于1930年6月26日—7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关于工业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集体农庄运动和农业的发展、工会在改造时期的任务等。斯大林于6月27日作了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7月2日作了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大会一致赞同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工作，责成中央今后继续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尔什维克速度，争取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坚定不移地在全线举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进攻并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大会委托党中央委员会继续执行和平政策，巩固苏联的国防力量。大会作出了关于全力发展重工业并在苏联东部建立新的煤炭钢铁基地、关于改造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和加强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的作用、关于吸引全体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等指示。大会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并宣布右倾反对派的观点和联共(布)的党籍不能相容。大会责成各级党组织加强反对民族问题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对这两种倾向的调和态度的斗争，坚决执行列宁的民族政策，保证广泛发展苏联各民族的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第330、456页。

67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于1932年1月30日—2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了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关于1931年度工业发展的总结和1932年度的任务的报告、维·米·莫洛托夫和瓦·弗·古比雪夫关于制定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的指示的报告。会议指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保证苏联经济独立的决议已经顺利实现。会议批准了1932年度社会主义工业发展计划。会议在关于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中规定了这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指出它的主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任务是在最新的技术基础上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第331页。

68 《公报》即《反对派公报》(«*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是托洛茨基派刊物，1929—1941年先后在巴黎、柏林、纽约等地出版，共出了八十七期。——第340页。

69 职能管理制是通过职能机构分散地进行管理的制度，其特点是机关和企业设置大量的职能机构和副职领导人员，职能机构在基层生产单位有自己直属的组织或特派人员，可以越过生产单位的领导而直接干预生产。苏联在1934年以前，由于干部文化水平低，缺乏管理复杂经济的经验，曾经采用过这种制度，结果造成了经济管理中的一些缺点，例如：职能机构各自为政，基层生产单位的领导不能掌握完成生产计划的各种手段，不能独立解决生产中的迫切问题，形成无人负责现象；对执行情况无法进行检查；许多技术干部脱离生产，集中在管理机构的办公室里，公文报表繁多，行政开支增大等。为了改进经济的管理，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一切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中的职能管理制，从基层生产环节起到人民委员部止都按生产和地区原则加以

改组，扩大机关和生产领导人的职能、权限和责任。——第344页。

70 **宪章运动** 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为争取实现《人民宪章》而展开的革命运动。列宁称它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1页）。《人民宪章》是伦敦工人协会在1837年拟订、1838年用法案形式公布的一个争取普选权的文件，它包括六项要求：凡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实行无记名投票；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1838—1839年出现第一次高潮，在致议会请愿书上签名者约一百二十八万人；1842年出现第二次高潮，签名者约三百三十万人，请愿书上除提出实行普选等政治要求外，还要求减少工时和提高工资；1848年出现第三次高潮，签名者达一百九十七万人。随着请愿还举行了工人集会、游行、罢工和抗暴斗争等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其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力图使它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第365页。

71 **“衰败城镇”** 是指英国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一些人口减少但仍沿袭旧制享有选举议员权利的小城镇和乡村。“衰败城镇”的议员大多数实际上是由支配着当地居民的大土地贵族指派的。“衰败城镇”的这种特权被1832年和1867年的选举改革所取消。——第365页。

72 指1926年5月3—12日英国工人举行的总罢工。参加罢工的有各主要工业部门和运输部门的五百多万有组织的工人。斯大林在《关于英国罢工和波兰事件》的报告中对这次罢工作了论述（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40—149页）。——第365页。

73 **总理事会** 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1921年在加的夫代表大会上首次选出。——第365页。

74 **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 于1935年11月14—17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三千名工业和运输业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起者们和生产革新者们在会上交流了工

作经验，讲述了他们是怎样掌握技术而达到高度的劳动生产率的。11月17日，斯大林在会议上讲了话。苏联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在会议上讲了话。——第374页。

75 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于1936年11月25日—12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是为了审查和批准苏联新宪法而召开的。大会在12月5日通过了新的苏联宪法，并委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新宪法制定和批准选举条例，确定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日期。大会宣布12月5日为全民的节日——宪法日。——第390页。

76 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二千二百一十五名，其中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一千七百二十七名，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三百六十四名，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九十一名，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三十三名。大会选举列宁为名誉主席（他因病未能出席），米·伊·加里宁为主席。斯大林在大会上作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29—131页）。大会批准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的宣言和条约，宣布莫斯科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都，并选出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7页。

77 “波将金的村落”是指装饰门面借以骗人的东西。格·亚·波将金是沙皇俄国的将军、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宠臣，1783年策划把克里木并入俄罗斯，因此被授予塔夫利达公爵的封号。据传说，1787年他陪同叶卡特林娜二世南巡时，为了向女皇显示新兼并的克里木的繁荣，在沿途修建了许多假的居民点、粮仓、堡垒等物。——第404页。

78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于1939年3月10—21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第三个五年计划、修改党章、选举修改党纲的委员会等。斯大林于3月10日作了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大会一致赞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大会根据维·米·莫洛托夫的报告批准了1938—1942年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根据安·亚·

日丹诺夫的报告对党章作了修改，并一致通过了联共(布)的新党章。大会选出了由二十七人组成的联共(布)党纲修改委员会，斯大林为委员会主席。——第 455 页。

79 **"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 这句话出自一则俄国故事。据说俄军名将亚·瓦·苏沃洛夫 1773 年在俄土战争中违反彼·亚·鲁勉采夫元帅的命令进攻图尔图凯获胜，因此被交付军事法庭裁判。叶卡特林娜二世得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第 499 页。

80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是斯大林在 1950 年 6—7 月间写的。1950 年 5 月 9 日—7 月 4 日，苏联《真理报》组织了语言学问题的讨论，每周定期出版两整版的讨论专刊。该报编者说：组织这次讨论的目的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语言学发展中的停滞现象，确定这门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这次讨论引起了苏联语言学界和知识界的热烈反响。在讨论中间，斯大林针对一些青年同志向他提出的问题写了《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发表在 6 月 20 日的讨论专刊上。随后，他为答复另一些同志的来信，又写了《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和《答同志们》，分别发表在 7 月 4 日的讨论专刊和 8 月 2 日的《真理报》上。上述这些著作于 1950 年 8 月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为书名由真理报出版社出了单行本。——第 501 页。

81 **沙龙语言**，即客厅语言，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中流行的一种所谓"雅语"。沙龙是法语 "salon" 一词的音译，意即客厅。——第 508 页。

82 1066 年，英国被法兰西化了的诺曼人所征服，诺曼底公爵威廉便成为英国国王。此后法语曾被当作英国国语，在很长时期内通行于英国上层封建主之间和宫廷、议会、法院、教会等统治机构中。这种状况直到十四世纪才改变过来。——第 510 页。

83 **崩得分子**即崩得的成员。崩得(依地语"Bund"一词的音译，意即联盟)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成立于 1897 年，参加者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1898 年 3 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 1903 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以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崩得形式上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它在党内一直支持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它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权这个纲领性的要求相对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俄共(布)。——第513页。

84 阿拉克切也夫制度　指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在俄国施行的警察暴虐、军阀专横、用暴力镇压人民的制度，因其推行者陆军大臣阿·安·阿拉克切也夫伯爵而得名。——第521页。

85 无产阶级文化派　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活动家。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1917年9月在彼得格勒成立的群众性的独立的工人文化教育团体，十月革命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分会。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是亚·亚·波格丹诺夫、瓦·费·普列特涅夫等，他们在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坚持该协会的"独立"，拒绝苏维埃政府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派宣扬屏弃文化遗产，鼓吹走脱离实际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他们以"无产阶级文化"作幌子，贩卖哲学上的马赫主义，艺术上的颓废主义和未来主义。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等著作中批判了他们的错误理论。1925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归属工会，1932年解散。——第522页。

86 拉普派　即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俄文简称"РАПП"的音译)的成员。拉普成立于1925年在团结无产阶级作家和同资产阶级流派进行斗争方面起过一定作用，但也犯了政治思想错误。它提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机械地把哲学范畴搬用于艺术领域。它否定文化遗产，培植宗派主义，排斥非党作家，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对待作家。根据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

议，成立了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解散了拉普。——第522页。

87 **历史比较法** 是十九世纪初开始采用的一种研究语言史前史的方法。它通过亲属语言或方言的比较，揭示其语音对应规律，构拟原始语的系统，以说明亲属语言和方言的形成和演变。——第523页。

88 **四要素分析法** 即尼·雅·马尔的所谓四要素古生物学分析法。马尔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发音成分不外四个要素，每一要素由两个辅音组成，按原来图腾部落的观念和名称分别称作 сал, бер, йон, рош；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是由这四个要素发展而来的。——第523页。

89 **原始语** 亦称基础语，母语或祖型语。按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的一般理解，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都是由同一原始语分化发展而成的。——第523页。

90 **澳洲人** 指澳大利亚土著人。他们在十九世纪时还保存着原始氏族公社制度，崇拜图腾，各部落有自己的语言。据调查，澳洲土著人的语言不下百余种。

火地人 指南美洲南端火地岛的印第安人。他们是十六世纪被欧洲殖民者从南美洲大陆驱逐到这个苦寒地区的，以数十人的亲属集团为单位营渔猎生活，十九世纪时仍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第532页。

91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是斯大林在1952年2—9月间就1951年11月经济问题讨论会的有关问题而写的著作，包括两篇论文和两封书信，最早发表在1952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八期上。这次讨论会是联共(布)中央为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而召开的。教科书的第一版于1954年出版。——第539页。

92 **马歇尔计划** 即《欧洲复兴方案》，由美国国务卿乔·凯·马歇尔于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演讲中提出。1948年4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对外援助法》是这个计划的法律形式。计划规定美国拨款援助西欧各国复兴战后经济，但受援国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货，尽快撤除关税壁垒，取消或放松外汇限制，接受美国对使用美援的监督，把本国和殖民地出产的战略物资供给美国，保障美国私人投资和开发的权利等。西欧绝大多数国家按照这些条件分别同美国签订了双边协定。

计划原定期限为五年（1948—1952），1951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用“共同安全计划”取代了它。——第561页。

93 *《普遍组织科学》*是亚·亚·波格丹诺夫在1913—1917年出版的一部著作。该书认为，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建立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均衡”，是“组织”生产力，而生产力是和生产关系无关的单纯的工艺学。——第587页。

94 ***赫列斯塔科夫***是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招摇撞骗、虚伪轻浮、厚颜无耻的典型人物。后来“赫列斯塔科夫”成了撒谎家和吹牛家的代名词。——第603页。

95 ***取消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孟什维克右倾机会主义派别。它出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代表人物是巴·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等。“所谓取消主义，这就是，‘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企图取消〈即解散、毁坏、废除、停止〉现有的党组织，代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即“公开”存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即过去经验〉为代价’。”（《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58—459页）取消派是自由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代理人。1912年1月，党的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会议把取消派清除出党。——第622页。

人名索引

A

阿布拉莫维奇，拉法伊尔（Абрамович, Рафаил 1880—1963）（真名雷因，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 Рейн, Раф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俄国崩得领袖之一。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分子。1912年参加反党的八月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1917年属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右翼。十月革命后反对布尔什维克。1920年流亡柏林，同马尔托夫创办和编辑《社会主义通报》，反对苏维埃政权。1923年参加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任执行局委员。三十年代移居美国。——第207页。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见高尔基，马·。

埃韦特，阿尔图尔（Ewert, Arthur 1899—195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1908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19年参加德国共产党，在哈雷—梅泽堡、东萨克森、黑森—法兰克福、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等地区领导党的工作。1923年起多次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内犯过调和主义错误。1928—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7年在巴西因进行革命活动被捕，判刑十三年。1947年回国。——第129，130页。

艾亨瓦尔德（Айхенвальд, А. Ю.）——苏联经济学家，写了一本包含布哈林派观点的经济政策教科书《苏维埃经济》（第五版于1929年出版）。——第206页。

安贝尔-德罗，茹尔（Humbert-Droz, Jules 1891—1971）——早年加入瑞士社会党，跟该党左翼。1921年参加创建瑞士共产党。1921年起先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组织局委员、政治书记处成员和主席团成员。1929年7月被免去在共产国际的职务。1931年起参加瑞士共产党的活动，任中央政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1941年被免去领导职务，1943年被开除出党，后来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1947—1958年任该党书记。——第130，131页。

安德列也夫，安德列·安德列也维奇（Андреев, 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1895—1971）——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活动家。1914年入党。十月革命后在乌拉尔和乌克兰做党和工会工作。1920—1922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22—1927年任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20年后多次当选中央委员。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6年起先后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书记。1930年后历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交通人民委员。

1935年后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等职。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第89页。

奥斯特罗维季诺夫，康斯坦丁·瓦西里也维奇（Островитян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Васильевич 1892—1969）——苏联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1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47—1953年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48—1954年任《经济问题》杂志主编，1949—1953年任苏联科学院经济学哲学法学部代理院士秘书。1953—1962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是1954年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者之一。——第572页。

B

巴扎罗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заров,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74—1939）（真姓舍德涅夫 Руднев）——俄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896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4—1907年是布尔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宣传"造神说"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以马赫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17年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编辑之一，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起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第233、434页。

柏拉图（Plato 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古代哲学中客观唯心主义派别的创始人，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第128页。

鲍洛特尼科夫，伊万·伊萨也维奇（Болотников, Иван Исаевич 死于1608年）——俄国农民起义领袖。1606年夏在俄国南方发动和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封建压迫。这次农民战争席卷了俄国广大地区。1606年10月率起义军围攻莫斯科，被沙皇军队击败。次年10月在图拉被俘，解到卡尔哥波尔后被残酷处死。——第304页。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建人和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867年起领导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是第一国际会员。多次当选议员。1869年与威·李卜克内西共同创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持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第167页。

彼得大帝（Петр Великий 1672—1725）（即彼得一世 Петр I）——俄国沙皇，第一个全俄皇帝（1682—1725年）。——第78、298、299页。

彼得罗夫斯基（Петровский）——联共（布）党内的布哈林右倾集团成员。——第153页。

彼尼科夫（Пеньков）——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常委、罗戈日-西蒙区委员会书记。因犯右倾错误于1928年10月被解除职务。——第73页。

别尔金，德·（Белкин, Д.）——第531—533页。

别尔津（Берзин）——联共（布）奥列霍沃-祖耶沃区委员会书记。——第74页。

波格丹诺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Богда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

рович 1873—1928）（真姓马林诺夫斯基 Малиновский）——俄国哲学家，经济学家。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1906年当选中央委员，1907年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参加过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无产者报》和《新生活报》的编辑工作。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成为召回派和前进派的领袖。在哲学上，试图建立自己的体系——“经验一元论”（马赫主义哲学的变种），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1909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十月革命后在莫斯科大学讲授经济学。1918年成为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思想家。1926年起任输血研究所所长。——第434、587、589页。

伯恩施坦，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之一，修正主义理论家。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81—1890年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恩格斯逝世后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公开地全面地修正马克思主义。1902年后多次当选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反对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第168页。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Бухарин,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88—1938）（笔名Nota Bene）——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莫斯科工人区进行宣传工作。1911年侨居国外，研究经济学。1917年当选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真理报》主编等职。1918年组织“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组织“缓冲”集团，1928年同李可夫等人结成右倾集团。1929年被撤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职务，1937年被开除出党。——第86、87、112—117、119、124—148、150、151、153、154、157—159、163—171、178—180、184—187、189—192、200、205、215、337、338、587、592—594、601页。

布兰德勒，亨利希（Brandler, Heinrich 1881—1967）——德国共产党右倾机会主义派别领袖之一。189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联盟，后为德国共产党党员。1919—1923年为德共中央委员。同塔尔海默一起把持德共中央领导期间，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923年秋，当德国形成革命形势时，要求把斗争限制在和平罢工的范围，破坏起义的准备工作。1923年底被解除党内领导职务，后又进行反对德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派别活动，1929年被开除出党。——第130、131页。

布伦坦诺，路约（Brentano, Lujo 1844—1931）——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教授。鼓吹放弃阶级斗争，认为通过组织改良主义工会和工厂立法就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就能调和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在土地问题上维护反马克思主义的小农经济稳固论和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第135页。

布瑟京，亚历山大·哈利东诺维奇（Бусыг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Харитонович 生于1907年）——苏联高尔基市莫洛托夫汽

车厂锻工，机器制造工业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起人之一。1935年9月初创造在一班时间内锻曲轴九百六十六根的记录（当时定额是六百七十五根），后又把这个成绩提高到一千一百四十六根。——第375、378—380、385页。

C

查理大帝（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王国国王（768—814年）。800年由罗马教皇加冕称帝。通过武力征伐，建立了一个东至易北河和多瑙河、西南至埃布罗河、北达北海，席临地中海的庞大帝国。帝国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查理大帝死后迅即瓦解。——第507页。

D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创始人。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揭示了生物的起源、变异和发展的规律。——第421、427页。

大卫，爱德华（David, Eduard 1863—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经济学家。1893年入党。1897年参加创办机会主义者杂志《社会主义月刊》。1903年出版《社会主义和农业》一书，宣扬反马克思主义的小农经济稳固论，维护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1903—1918、1920—1930年为议员、社会民主党党团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9年参加魏玛共和国第一届联合政府，1919—1920年任内务部长，1922—1927年任政府驻黑森的代表。——第216页。

邓尼金，安东·伊万诺维奇（Деникин, 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1872—1947）——沙俄将军。1917年4—5月任俄国军队最高总司令的参谋长。积极参加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与科尔尼洛夫等人组织反革命“志愿军”。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充当英、法、美帝国主义的走卒，任反革命的“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1920年3月逃亡国外。——第64、406页。

杜林·欧根·卡尔（Dühring, Eugen Karl 1833—1921）——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第336、428、602、609页。

E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第165、167、168、218、306、309、335、336、424—428、432—434、450、464、466—468、509、510、523、525、533—535、541、542、545—547、557、558、591—593、595、602、605、604—606、609、615—619页。

F

菲什，汉密尔顿（Fish, Hamilton）——美国政治家。第270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安德列亚斯（Feuerbach, Ludwig Andreas 1804—1872）——德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第425页。

弗龙托夫（Фрунтов）——联共（布）博哥罗茨克县委员会书记。——第64页。

弗鲁姆金，莫伊塞·伊里奇（Фрумкин, Моисей Ильич 1878—1939）——1898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先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西伯利亚西部边疆区等地担任党和苏维埃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副粮食人民委员、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和副财政人民委员等职。1928年参加布哈林右倾集团。1937年被开除出党。——第86—88、90、94—98、172页。

福特，亨利（Ford, Henry 1863—1947）——美国大垄断资本家。曾在底特律爱迪生公司任总工程师。1903年创立福特汽车公司，这个公司后来发展成美国和世界最大的垄断组织之一。——第357页。

富兰克林，本杰明（Franklin, Benjamin 1706—1790）——美国政治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学家。曾创办美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在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中，参加制定美国独立宣言，并任驻法代表，促成美法同盟和法国对英作战。主要研究物理学，发明了避雷针。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最先有意识地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第449页。

富列尔，斯·（Фурер, С.）——第531—533页。

G

盖森，约瑟夫·弗拉基米罗维奇（Гессен, Иосиф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66—1943）——俄国政论家，律师，立宪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与米留可夫一起，先后主编立宪民主党机关报《人民自由报》和《言语报》。1907年当选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杜马司法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支持俄国反革命首领尤登尼奇，后逃亡国外。1920年起在柏林出版白俄报纸《舵轮报》，1921年起出版《俄国革命文库》。——第207页。

高尔察克，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Колчак,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4—1920）——沙俄海军上将，君主派分子。1916年任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在外国帝国主义支持下，自封为俄国的最高执政，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政府。1919年被平叛的红军俘虏，1920年2月7日被枪决。——第406页。

高尔基，马克西姆（Горький, Максим 1868—1936）（真名彼什科夫，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 Пешков, 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苏维埃文学的创始人。——第234—237、367、487页。

高尔斯华绥，约翰（Galsworthy, John 1867—1933）——英国作家。——第367页。

哥白尼，尼古拉（Copernicus, Nicolaus 1473—1534）——波兰天文学家，日心说的创始人。用日心说否定了统治西方千余年之久的地心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神权的统治。——第434页。

格尔哈特（Gerhart 1897—1968）（真名艾斯勒，格尔哈特 Eisler, Gerhart）——1918年起是奥地利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的宣传家和活动家。1927年当选德共中央委员。在党内犯过调和主义错误。1933年流亡国外。1941年起为美

国共产党报纸撰稿。1949年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后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1962年起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广播委员会主席。1967年起任国际广播电视组织主席。——第129、130页。

格罗曼，弗拉基米尔·古斯达沃维奇（Громан, Владимир Густавович 生于1874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曾参加孟什维克《我们的事业》杂志的编辑工作。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分子。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粮食委员会主席，1918年任北方粮食管理局局长。1928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内行情处处长，后任国家计委主席团委员和中央统计局领导成员。1929年被撤职。——第221、233页。

郭茨，阿布拉姆·拉法伊洛维奇（Гоц, Абрам Рафаилович 1882—1940）——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1906年参加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1907年被判八年苦役。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十月革命期间是反革命组织"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参加策划了彼得格勒士官生叛乱。1920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捕，1922年因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案被判刑，获释后从事经济工作。——第301页。

果戈理，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Гоголь,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09—1852）——俄国作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之一。——第407页。

H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 约公元前540—480）（爱非斯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辩证法的创始人之一。——第432页。

赫兹，弗里德里希·奥托（Hertz, Friedrich Otto 生于1878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社会民主党人，修正主义者。1899年出版《从社会主义观点看土地问题》一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土地问题学说，企图证明小农经济的稳固性和小农经济对抗大经济竞争的能力。——第216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辩证法。政治观点上是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第424、428页。

霍洛波夫，阿·（Холопов, А.）——第533—538页。

J

基洛夫，谢尔盖·米朗诺维奇（Киров, 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1886—1934）（真姓科斯特里科夫 Костриков）——苏联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1904年入党。曾参加彼得格勒的十月武装起义。1919年2月任阿斯特拉罕边疆区临时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率领第十一集团军参加粉碎邓尼金的战斗。1921—1925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1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年起为中央委员。1926年2月起历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员会第一书记、联共（布）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1934年起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34年

12月1日在列宁格勒被暗杀。——第457页。

季诺维也夫，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Зиновьев, 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1883—1936）（真姓拉多梅斯尔斯基 Радомысльский）——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起为中央委员。1908—1917年侨居国外期间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委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编委。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对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派持调和态度。1917年4月回国。十月革命前夕同加米涅夫公开发表声明，不赞成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从而泄漏了党的起义计划。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1917年11月主张成立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1925年参加组织"新反对派"，1926年同托洛茨基结成反党联盟。1927年被开除出党。后来两次恢复党籍，两次被开除出党。——第108、115、116页。

加勒，约翰·哥特弗利德（Galle, Johann Gottfried 1812—1910）——德国天文学家，1846年根据勒维列的计算发现了海王星。——第434页。

加米古洛夫（Камегулов）——第237页。

加米涅夫，列夫·波里索维奇（Каменев, Лев Борисович 1883—1936）（真姓罗森费尔德 Розенфельд）——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对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派持调和态度。1917年二月革命后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十月革命前夕同季诺维也夫公开发表声明，不赞成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从而泄漏了党的起义计划。十月革命后历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17年11月主张成立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1925年参加组织"新反对派"，1926年参加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1927年被开除出党。后来两次恢复党籍，两次被开除出党。——第113、115、116、186、191、619页。

加托夫斯基，列夫·马尔科维奇（Гатовский, Лев Маркович 生于1903年）——苏联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65年起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1954年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者之一。——第572页。

伽利略，伽利莱（Galilei, Galileo 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力学原理的创始人。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落下的速度和重量成比例"的错误论断，发现了落体定律。不顾罗马教廷的打击、迫害和判罪的威胁，反对托勒密的地心说，支持和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第421页。

捷宁（Зенин）——第234页。

杰姆钦科，玛丽亚·索弗朗诺夫娜（Демченко, Мария Софроновна 生于1912年）——苏联乌克兰"共产国际"集体农庄生产组长。1935年2月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每公顷单产甜菜超过五百公担的保证，结果当年每公顷单产五百二十三点七公担。她的这个创举在全国得到广泛响应，发展成争取甜菜高产的"五百公

担运动"。——第385页。

居鲁士（Kurush 或 Cyrus 约公元前600—529）——古波斯帝国国王（公元前550—529年），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创立者。公元前550年建国，公元前546年向外征伐，先后征服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两河流域的新巴比伦王国。——第507页。

K

卡冈诺维奇，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Каганович, 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生于1893年）——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1911年入党。十月革命后担任党政领导职务。1924年起先后当选俄共（布）中央委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1924—1925和1928—1939年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30—1935年任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1934年任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1935年后历任交通人民委员、重工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4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47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1957年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第348页。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Caesar, Gaius Julius 公元前100左右—44）——著名的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著作家。公元前60年与克拉苏和庞培一起结成三头政治（联盟）。出任高卢总督，征服高卢全境。公元前49—45年先后战胜庞培等人的军队，统治了地中海沿岸和欧洲西部地区，成为终身独裁者。著有《高卢战记》、《内战记》等书。——第507页。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第434页。

考茨基，卡尔（Kautsky, Karl 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派领袖，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家。1875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3—1917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主编。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写过一些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也暴露了一些机会主义观点。1910年以后逐渐转到机会主义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提出超帝国主义论，大战期间打着中派旗号支持帝国主义战争。1918年以后发表《无产阶级专政》等书，攻击俄国十月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第167—169、614页。

科尔布，威廉（Kolb Wilhelm 1870—191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者，《人民之友报》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168、169页。

克拉舍宁尼科娃，叶·（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а, Е.）——第524—529、531页。

克拉斯诺夫，彼得·尼古拉也维奇（Краснов,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9—1947）——沙俄将军。1917年8月参加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期间被临时政府调往彼得格勒镇压革命。所率哥萨克部队被击溃，本人被俘，后获释。1918—1919年领导顿河哥萨克白匪军进行武装叛乱。1919年逃亡国外，继续进行反苏维埃政权活动。1941—1945年为希特勒分子效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死刑。——

第27、301页。

克里沃诺斯，彼得·费多罗维奇（Кривонос, Петр Федорович 生于1910年）——苏联斯拉维扬斯克机务段司机，铁路运输业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起人。1935年把蒸汽机车的技术速度提高到每小时四十六到四十七公里，超过定额一倍。——第375页。

克鲁普斯卡娅，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Крупская, 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1869—1939）——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列宁的妻子和战友。1890年开始革命活动。1895年参加组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入党，协助列宁做党的工作。1905年11月起担任党中央委员会秘书。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积极同取消派和召回派作斗争。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十月革命后任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0年任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主席，1929年起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24年起当选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当选中央委员。——第170页。

克伦斯基，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Кере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орович 1881—1970）——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首脑，社会革命党人。1912—1917年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劳动派党团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护国派分子。1917年二月革命后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3—5月任司法部长，5—9月任陆海军部长，7月21日起任总理，9月12日起兼任俄国军队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1918年逃亡国外。——第207页。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独立党领袖，英国护国公。1640年开始参加政治活动，被选为长期议会议员。国内战争爆发后，组织了一支以农民为主的队伍，这支队伍后来成为议会正规军的核心。1648年第二次国内战争胜利后，从议会中清洗了代表伦敦上层资产阶级的长老派，处决了国王，宣布成立共和国。同时，又残酷地镇压了平等派和掘土派的民主运动以及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民族解放运动。1653年建立军事独裁统治，任护国公。——第309、362页。

库比雅克，尼古拉·阿法纳西也维奇（Кубяк, Николай Афанасьевич 1881—1937）——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俄共（布）彼得格勒省委员会书记、全俄农林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责任指导员等职。1921年参加"工人反对派"。1922年起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伊万诺沃州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全苏城市公用事业委员会主席。1923年起当选中央委员，1934年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第92页。

库什特谢夫（Куштысев）——第110、111页。

L

拉狄克，卡尔·伯恩哈多维奇（Радек, 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85—1939）——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但表现向中派动

摇。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十月革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俄共（布）第八次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1926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1918年为"左派共产主义者"，1923年起为托洛茨基派骨干分子，1926年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第235、236页。

拉法格，保尔（Lafargue, Paul 1842—1911）——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政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1866年加入第一国际，任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曾领导波尔多无产阶级保卫公社。公社失败后流亡西班牙和葡萄牙，参加建立西班牙和葡萄牙国际支部，积极反对巴枯宁主义。1879年和盖得等人创建法国工人党。1891年当选众议员。写过许多著作，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第510、518页。

拉辛，斯切潘·季莫费也维奇（Разин, Степ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1630左右—1671）——俄国农民起义领袖，顿河哥萨克。1667年春组织哥萨克远征伏尔加河下游和里海地区。1670年春又组织一次远征。在阿斯特拉罕起事后，溯伏尔加河北上，所到之处群起响应，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农民起义队伍。这次农民战争席卷了俄国广大地区。起义失败后，率残部返回顿河流域。1671年4月被叛徒缚送沙皇政府，同年6月在莫斯科就义。——第302、304页。

勒维列，乌尔本·让·约瑟夫（Le Verrier, Urbain-Jean-Joseph 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1846年与英国天文学家亚当斯同时独立地计算出当时还不知道的海王星的轨道，并确定这个行星在宇宙中的位置。——第434页。

里宾特洛普，约希姆·冯（Ribbentrop, Joachim Von 1893—1946）——德国法西斯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主要战犯之一，原为酒商。1930年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1936—1938年任驻英国大使，1938—1945年任外交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第476页。

李可夫，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Рыков,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1881—1938）——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起为中央委员。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对孟什维克、前进派和托洛茨基派持调和态度。1917年二月革命后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十月革命后历任内务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俄罗斯联邦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1919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7年11月主张成立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主张被否决后，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28年同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结成右倾集团，1937年被开除出党。——第88、94、113—116、118、125、150、171—175、177—179、181、183、184、186—190页。

列昂节夫，列夫·阿勃拉莫维奇（Леонтьев, Лев Абрамович 1901—1974）

－苏联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19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布)。1946—1953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著有许多政治经济学著作，是1954年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者之一。——第572页。

列宁(乌里扬诺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Ленин(Ульянов),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1870—1924)——第13、21—23、28、30、47、48、50—53、54—58、65—70、74、79—83、93、99、101—105、108、110、111、118、119、135—137、140—144、151—153、163—167、169—171、174、175、179、184、187、189、193、194、196、198、200、203、206—208、215、217、218、225—227、229、232、246—254、259、260、262、274、280、288、298、299、309、310、323、325、336、340、341、345、351、369、370、388、397、417、418、422、423、429、432—435、466、468、469、478、481、487、496、512、513、534、548、550、562、565、572、588、589、592、594、601、602、615—623页。

路德维希，埃米尔(Ludwig, Emil 1881—1948)——德国政论家，作家和戏剧家，写过歌德、拿破仑、林肯等的传记，认为个人是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第298—312页。

罗济特(Розит, Д. П.)——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曾当选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是布哈林右倾集团成员。——第133、134、153页。

罗曼诺夫王朝(Романовы)——沙皇俄国王朝(1613—1917)。——第302页。

罗斯福，富兰克林·德兰诺(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1882—1945)——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1913—1920年任海军部副部长。1928—1932年任纽约州州长。1933—1945年任美国总统。——第351、353—355、366页。

洛克菲勒，约翰·戴维逊(Rockefeller, John Davison 1839—1937)——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财团的创始人。从美孚油公司创立起，洛克菲勒财团逐步发展成以石油工业为主的大垄断集团，拥有大金融机构和许多大企业，对美国的内外政策有重大影响。——第357页。

M

马尔，尼古拉·雅柯夫列维奇(Марр, 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1864—1934)——苏联语言学家和东方学家。1900年起任彼得堡大学教授，1912年起为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语言及高加索地区其他语言。——第521—523、525—529、531、532页。

马尔科夫(Марков)——第180页。

马赫，恩斯特(Mach, Ernst 1838—1916)——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1864年任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数学教授，1867年任布拉格大学物理学教授，1895—1901年在维也纳任哲学教授。在认识论上复活贝克莱和休谟的观点，认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感觉是"世界的真正要素"。主要哲学著作有《感觉的分析》、《认识和谬误》等。——第434页。

马克思，卡尔(Marx, Karl 1818—1883)——第54、167、168、213、217、218、280、299、300、306、308、309、335、336、395、424、425、433、437、439、442、449、450、452—454、464、466、468、508、509、523、525—527、533、534、551、552、557、558、586、587、591、594、598—602、615—617、

619 页。

马列茨基（Марецкий, Д.）——苏联《真理报》编委，布哈林右倾集团成员。——第 153、171 页。

马蒙托夫，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Мамонт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69—1920）（真姓马曼托夫 Мамантов）——沙俄上校，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白卫军的骑兵军长。1919 年 8 月率骑兵袭击南线红军后方，到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作，1919 年 10—11 月被击溃。——第 27、301 页。

马萨里克，托马什·加里格（Masaryk, Tomáš Garrigue 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哲学家。1882—1914 年任布拉格大学哲学教授。1900 年创立自由资产阶级的捷克人民党，主张捷克在奥匈帝国内自治。多次当选奥地利议会议员。1918—1935 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第 304 页。

马歇尔，乔治·凯特勒特（Marshall, George Catlett 1880—1959）——美国政治家，将军，民主党人。1939—1945 年任陆军参谋长，1945—1947 年任美国总统驻中国特使，1947—1949 年任国务卿，1950—1951 年任国防部长。——第 561—563 页。

梅夏宁诺夫，伊万·伊万诺维奇（Мещанино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883—1967）——苏联语言学家，考古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1937 年任苏联科学院人类学、考古学和人种志学研究所所长。1934—1950 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和文学语言学部院士秘书。1935—1950 年任苏联科学院语言思维研究所所长。研究乌拉尔图语和一般语言学。——第 521 页。

米库林娜，叶·（Микулина, Е.）——《群众的竞赛》一书的作者。——第 193、195 页。

米留可夫，巴维尔·尼古拉也维奇（Милюков, 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9—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905 年 10 月参加创建立宪民主党，后任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机关报《言语报》主编。1907 年起先后当选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 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推行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帝国主义政策。1917 年 8 月参加策划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策划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后逃亡国外。——第 154、207 页。

摩根，约翰·皮尔庞特（Morgan, John Pierpont 1837—1913）（习称老摩根）——美国金融寡头，大垄断资本家，摩根财团创始人之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和父亲朱尼乌斯·斯潘塞·摩根在英国创办汇兑所，将英国资本大量输入美国。二十世纪初组织许多托拉斯，建立垄断地位。——第 357 页。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Молотов, 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生于 1890 年）（真姓斯克里亚宾 Скрябин）——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1906 年入党。1912 年在《明星报》工作，后任《真理报》编委和秘书。1917 年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俄局委员。1919 年起任下新城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俄共（布）顿涅茨省委员会书记。1920 年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21 年当选中央委员。1921—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0—1941 年任苏联人民委员

会主席。1941—195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几度兼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长）。1926—1952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52—1957年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7—1960年任驻蒙古大使。——第39、379页。

穆辛斯基，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Мусинский, Васил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生于1907年）——苏联阿尔汉格尔斯克市锯木厂排锯工人，锯木工业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起人。——第379页。

N

拿破仑第一（Napoléon I 1769—1821）（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Bonaparte）——法国资产阶级军事家和政治家，法国皇帝。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自任第一执政，实行军事独裁统治。1804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颁布《拿破仑法典》。1812年率军进攻俄国失败。1814年欧洲反法联军攻陷巴黎后，流放于厄尔巴岛。1815年重返巴黎，建立百日王朝。滑铁卢之役战败后，流放于圣海伦岛。——第475、476页。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见克鲁普斯卡娅，娜·康·。

南森，弗里特奥夫（Nansen, Fridtjof 1861—1930）——挪威海洋地理学家，社会活动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任国际联盟战俘事务最高委员。1921年参加创办国际赈济饥民委员会。1925—1929年领导亚美尼亚难民遣返委员会。1927年为挪威驻国际联盟裁军委员会的代表。——第182页。

涅克拉索夫，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Некрас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21—1878）——俄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第273页。

涅姆钦诺夫，瓦西里·谢尔盖也维奇（Немчинов, Василий Сергеевич 1894—1964）——苏联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全苏农业科学院院士。1926—1935年在苏联中央统计机关工作，担任过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1940—1948年任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院长。1949—1963年任苏联科学院生产力研究委员会主席。——第44、221页。

诺特京，亚历山大·伊里奇（Нот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生于1901年）——苏联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第575—582页。

诺伊曼，海因茨（Neumann, Heinz 生于1902年）——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多次当选德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年当选议员。193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第130页。

P

帕帕宁，伊万·德米特里也维奇（Папанин, 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ич 生于1894年）——苏联极地探险家，地理学家。1919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布）。1932—1935年先后领导季哈亚湾和切柳斯金角的极地考察站。1937—1938年领导苏联第一个设在北极地带流动冰块上的科学考察站。1939年起任北方海洋航道管理总局局长，苏联科学院海洋考察研究所所长。——第422、423页。

潘涅库克，安东尼（Panneckoek, Antoi-

nie 1873—1960)——荷兰社会民主党人，天文学家。1907年参加创办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机关报《论坛报》。1909年参加创建荷兰社会民主党(论坛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主义者，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理论刊物《先驱》的出版工作。1918年加入荷兰共产党，并参加共产国际工作。因采取极左的宗派主义立场而受到批判。1921年退出荷兰共产党，不久退出政治活动。——第168页。

彭加勒，雷蒙 (Poincaré, Raymond 1860—1934)——法国政治家，律师。1887—1903年为众议员。1893年起多次参加法国政府。1912—1913年任总理，1913—1920年任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俄国十月革命后是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策划者之一。1922—1924和1926—1929年任总理，力主分割德国(1923年占领鲁尔区)，企图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第270页。

皮达可夫，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 (Пятаков, 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1890—1937)——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乌克兰和国外做党的工作。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基辅委员会主席，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十月革命后任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18年领导乌克兰"左派共产主义者"。1920年起历任中央顿巴斯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纲领。1923年起是托洛茨基派骨干分子。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第163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一八四八年革命期间当选制宪议会议员。——第167页。

普加乔夫，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Пугачев, Емельян Иванович 1742左右—1775)——俄国农民起义领袖，顿河哥萨克。1773年8月，自称遇救的彼得三世皇帝，在亚伊茨基地区的哥萨克村落发动哥萨克起事。这次农民战争席卷了俄国的广大地区。1774年8月起义军失败后，率残部退到外伏尔加草原地带，9月被叛徒缚送沙皇政府，次年1月在莫斯科就义。——第302、304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叶甫盖尼·阿列克谢也维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86—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十月革命期间是乌拉尔区域党的领导人，国内战争期间任第三集团军政治部主任。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20年当选中央委员，后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纲领。1921年起先后任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主席、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总局局长。1923年起是托洛茨基派骨干分子。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后来再次被开除出党。——第229页。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 (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一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俄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参加民粹派运动，是民粹派组织土地和自由社成员及土地平分社领导人之一。1883 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写过不少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批判了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派、马赫主义。二十世纪初与列宁一起编辑《火星报》和《曙光》杂志。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反对列宁的民主革命的策略。后来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摇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反对取消主义，领导了孟什维克护党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 年二月革命后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第 303、422 页。

普罗宁(Пронин, И. К.)——苏联康德罗沃造纸厂工人，斯达汉诺夫运动发起人之一。——第 375 页。

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Пуш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9—1837) ——俄国诗人。俄国新文学的创始人。——第 504 页。

Q

契科巴瓦，阿尔诺尔德·斯捷潘诺维奇(Чикобава, Арнольд Степанович 生于 1898 年)--苏联语言学家，格鲁吉亚共和国科学院院士，第比利斯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卡尔特韦厍语和普通语言学。——第 528 页。

恰扬诺夫，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Чая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生于 1888 年)——苏联农业经济学家，农业经济学中所谓新民粹派的代表。--第 218 页。

邱吉尔，温斯顿 (Churchill, Winston 1874—1965) ——英国政治家，保守党领袖。1906—1917 年历任副殖民大臣、贸易大臣、内政大臣、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1918 -1921 年任陆军和空军大臣，是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策划者之一。1921—1922年任殖民大臣。1921--1929 年任财政大臣。1939 年任海军大臣。1940—1945 年任联合政府首相，1940—1955 年为保守党领袖。1951--1955 年任首相。1955 年辞去首相和保守党领袖的职务，从事著述。——第 270、480 页。

S

萨哈罗夫(Сахаров)——联共(布)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委员。——第 74、75 页。

萨宁娜，阿·弗·(Санина, А. В.)——第 603—612 页。

桑热耶夫 (Санжеев, Г. Д. 生于 1902 年)--苏联语言学家，教授。曾任亚洲人民研究所突厥、蒙古和远东语言研究室主任，《语言学问题》杂志编委。主要研究蒙古语。--第 528、530、531 页。

沙屠诺夫斯基，雅柯夫·莫伊塞也维奇(Шатуновский, Яков Моисеевич 1876--1932) ——1918 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布)。十月革命后从事教育和军事政治工作，1920 年 8 月起从事经济工作，曾任劳动国防委员会运输委员会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部成员。

1927年为右倾分子，但不久即退出反对派。——第94、102页。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 Max 1806—1856）（真名施米特，卡斯帕尔 Schmidt, Kaspar）——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第308页。

施利希特尔，亚历山大·格里哥里也维奇（Шлихтер,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68—1940）——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活动家。1891年入党。十月革命后任农业人民委员、粮食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驻奥地利全权代表、外交人民委员部驻乌克兰全权代表。1927—1929年任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1923年起先后当选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175页。

施略普尼柯夫，亚历山大·加甫里洛维奇（Шляпн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1885—1937）——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彼得格勒五金工会主席。十月革命后历任劳动人民委员、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职。在党的第七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分别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1920—1922年是“工人反对派”领袖。1933年被开除出党。——第74页。

斯达汉诺夫，阿列克塞·格里哥里也维奇（Стаханов, Алекс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生于1906年）——苏联煤炭工业的革新者，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起人。1927年起在顿巴斯的矿井工作，1933年起当风镐采煤工，1935年8月30日夜间创造了一班（五小时四十五分）采煤一百零二吨的纪录，相当当时定额的十四倍，9月19日又创造了一班采煤二百二十七吨的新纪录。他的创举在顿巴斯和全国得到热烈反响。1936—1941年在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1941年起先后任矿井工段长、无烟煤托拉斯副经理、副总工程师。——第374、375、378—380、385、422、423页。

斯克雷普尼克，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Скрынник,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72—1933）——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活动家。1897年入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成员、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教育人民委员等职。1933年任乌克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曾当选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第339页。

斯列普科夫（Слепков, А. Н.）——1919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布）。曾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责任指导员、《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是布哈林右倾集团成员。——第153、206页。

斯梅塔宁，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Сметанин, Николай Степанович 生于1905年）——苏联列宁格勒制鞋厂工人，制鞋工业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起人。1935年9月21日由于改进操作法，完成了生产定额的两倍。——第375、379页。

斯滕（Стэн, Я. Э.）——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曾当选联共（布）中

央监察委员。——第165、166页。

司徒卢威，彼得·伯恩哈多维奇(Струве, 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70—1944)——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鼓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要适应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二十世纪初投靠资产阶级自由派阵营。1902年起编辑自由资产阶级的《解放》杂志，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组织"解放社"的理论家和组织者。1905年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鼓吹俄国帝国主义向外侵略。十月革命后敌视苏维埃政权，参加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反革命叛乱。后流亡国外。——第207页。

索科林斯基(Соколинский)——苏联高尔基市莫洛托夫汽车厂锻工车间主任。——第379页。

T

塔尔海默，奥古斯特(Thalheimer, August 1884—1948)——德国共产党右倾机会主义派别领袖之一，政论家。1904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斯巴达克联盟，后为德国共产党党员。1918—1923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编辑。同布兰德勒一起把持德共中央领导期间，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923年秋，当德国形成革命形势时，要求把斗争限制在和平罢工的范围，破坏起义的准备工作。1923年底被解除党内领导职务，1929年被开除出党。——第130、131页。

台尔曼，恩斯特(Thälmann, Ernst 1886—1944)——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共产党领袖。1903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7年转入独立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前线士兵中进行革命活动。积极参加了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1920年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同共产党合并后成为共产党员。1923年当选德共中央委员，领导了汉堡无产阶级武装起义。1925年起任德国工人自卫组织——红色战士联盟主席，1925年为德共中央委员会主席。1924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委员，主席团候补委员、委员。1924—1933年为议员。希特勒上台后，1933年3月3日被秘密警察逮捕，1944年8月18日在集中营遇害。——第129、130页。

唐恩，费多尔·伊里奇(Дан, Федор Ильич 1871—1947)(真姓古尔维奇 Гурвич)——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894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成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领袖、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支持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1922年初被驱逐出俄国，在柏林领导孟什维克进行反革命活动。1923年参加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41—1947年在美国出版孟什维克流亡者刊物《新路》杂志。——第207页。

托尔斯泰，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Толстой,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83—1945)——苏联作家，苏联科学

院院士。——第235页。

托勒密，克劳狄乌斯（Ptolemaeus, Claudius 二世纪）——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发展了地心说，提出了宇宙的地心体系（又叫“托勒密体系”）。这一学说流传千余年之久，中世纪后期成为西方教权统治的重要理论支柱。——第384页。

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Троцкий, 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1879—1940）（真姓勃朗施坦 Бронштейн）……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火星报少数派分子，会后同孟什维克一起反对布尔什维克。1905年同帕尔乌斯一起提出和鼓吹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以调和派面貌出现，实际上持取消派立场。1912年组织反党的八月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参加区联派，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随区联派集体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1918年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1920—1921年挑起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列宁逝世后进行反党派别活动。1925年被解除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和租让总委员会主席。1926年与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党联盟。1927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驱逐出境。在国外继续进行反对苏联党和国家的活动。死于墨西哥。——第74、87、88、99、106、303页。

托姆斯基，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Томский,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1880—1936）（真姓叶弗列莫夫Ефремов）——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列韦里、彼得堡等地做党的工作，担任过《无产者报》编委。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对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派持调和态度。1917年十月革命后历任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主席、全俄（后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出版总局局长、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19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支持“民主集中派”，1928年同布哈林、李可夫结成右倾集团。……——第74、112—116、125、150、189—192页。

W

威尔斯，赫伯特·乔治（Wells, Herbert George 1866—1946）——英国作家。1920和1934年两次访问俄国，同列宁和斯大林谈过话。——第351—367页。

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888—1918年）。——第475、476页。

维伯，悉尼·詹姆斯（Webb, Sidney James 1859—1947）——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边社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24和1929—1931年任工党政府大臣，与其妻比阿特里萨·维伯合写过许多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理论方面的著作，宣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可能和平解决工人问题的改良主义思想。——第135页。

维诺格拉多娃，叶夫多基娅·维克多罗夫娜(Виноградова, Евдокия Викторовна 1914—1962) 和维诺格拉多娃，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Виноградова, Мария Ивановна 生于 1910 年)·苏联维丘加诺根纺织厂的织布女工，纺织工业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起人。由于努力改进操作法，大大地增加了看车的台数，推动了各纺织企业的社会主义竞赛。——第 375、385 页。

维托尔夫，约翰(Wittorf, Johann)——德国共产党汉堡党组织的书记，1928年因被控盗用党的经费被开除出党。——第 129 页。

文热尔，弗·格·(Венжер, В. Г.)——苏联经济学博士，教授。写过一些关于集体农庄经济问题的著作。——第603—612 页。

沃朗斯基，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Вро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84—1943)·苏联文艺评论家，政论家，作家。——第 236 页。

乌格拉诺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Углан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86—1940)·—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 1917 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19 年任彼得格勒省工会理事会书记、彼得格勒粮食委员部部务委员。1920 年起历任俄共(布)彼得格勒省委员会委员和书记、下新城省委员会书记、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劳动人民委员等职。1921 年起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23 年起为中央委员。1927 年12月起为中央政治局、组织局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28 年参加布哈林右倾集团。1932 年被开除出党，后恢复党籍，1936 年再次被开除出党。——第107、108、112 页。

X

希法亭，鲁道夫 (Hilferding, Rudolf 1877—1941)——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1907—1915 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编辑。1910 年发表《金融资本》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1917 年成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战后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提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1924 年起为议员。1923 和 1928·1929 年任魏玛共和国政府财政部长。法西斯上台后流亡法国。——第 127 页。

希特勒，阿道夫 (Hitler, Adolf 1889—1945)·——德国法西斯头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号战争罪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德军上等兵。1921 年成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即纳粹党) 的领袖。1933 年 1 月在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出任德国总理，1934 年兴登堡死后，取消总统职位，自称国家元首，解散国会，实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1938 和 1939 年先后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1939 年 9 月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 年 6 月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1945 年 4 月 30 日，在法西斯德国覆灭前夕自杀。——第 475、476、480、484—486 页。

谢德林 (Щедрин 1826—1889) (即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米哈伊尔·叶甫格拉福维奇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俄国讽刺作家，文艺评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第270、

296、404、405 页。

谢皮洛夫，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Шепилов, Дмитрий Трофимович 生于 1905 年）——苏联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6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布）。1949 年任苏共中央鼓动宣传部部长。1952—1957 年为中央委员，1956—1957 年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1952—1956 年任《真理报》主编。1956—1957 年任苏联外交部部长。1957—1962 年任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是 1954 年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者之一。——第 572 页。

Y

雅罗申科，尔·德·（Ярошенко, Л. Д.）——第 582—603 页。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 356—323）——古代著名统帅，马其顿国王。公元前 336 年即位。公元前 334 年率军征伐，占小亚细亚，灭波斯，又经中亚东征印度，在东起印度河西抵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疆域内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该帝国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只是一个不稳固的军事和行政联合体，亚历山大死后迅即瓦解。——第 507 页。

伊里奇——见列宁，弗·伊·。

尤什凯维奇，巴维尔·索洛莫诺维奇（Юшкевич, Павел Соломонович 1873—1945）——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哲学上是马赫主义者，鼓吹经验符号论。哲学著作有《从经验符号论来看现代唯物论》（此文收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等。——第 434 页。

Z

扎波尔斯基（Запольский）——第 63 页。

* * *

Nota Bene——见布哈林，尼·伊·。